

● 主编 / 马焰

鄂、 皖、 江、 淮、 河、 港

■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驰骋江淮河汉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老战士回忆录

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FS28/O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驰骋江淮河汉/马焰等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5033-1404-4

I. 驰… II. 马…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239 号

书 名: 驰骋江淮河汉

作 者: 马 焰等

责任编辑: 冯抗胜

装帧设计: 许向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07 千字

印 张: 20.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04-4/I·1218

定 价: 36.00 元

新四军第五师暨豫鄂
边区中原军区领导人



李先念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



郑位三 华中局党代表、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局代理书记。



朱理治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陶 铸 新四军豫鄂独立
游击支队代理政治委员。



王 震 中原军区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树声 中原军区副司
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



王首道 中原军区副
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陈少敏 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治
委员。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长。



任质斌 新四军第五师副政治
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副
政治委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刘少卿 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



许子威 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主
席。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主席。





新四军五师负责人与美军情报联络组人员 1945 年摄于湖北大悟山

前排左起：索尔斯 艾格斯 李先念 埃尔默 比格勒 帕特森
 后排左起：蒋 立 周光策 翁可叶 X X X 唐健白 周志刚
 陈一翼 赵 俊 文建武 童世光 吴若岩 夏农荪



李先念在行军途中

陈少敏在行军途中



任质斌（左2）在行军途中





1940年春，豫鄂挺进纵队和豫鄂边区党委领导人在京山县大山头。前排左起：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后排左起：郑绍文、刘少卿。



刘少卿与司令部工作人员在大悟山。



豫鄂挺进纵队部分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姚家山。任质斌（左4） 栗在山（组织部长，左5）、刘放（宣传部长，左6）。

栗秀真（左5）与野战医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





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政治委员杨煥民(右)与第六团政治委员周志刚合影。

1942年3月初，第五师第十四旅主力在潜河镇进行自卫反击。歼国民党第二纵队1个支队。图为潜河镇战斗旧址。



史沫特莱与安娥在京山八字门纵队门前。



豫鄂挺进纵队指战员在雪地行军。

第五师机枪分队。



豫鄂边区妇女救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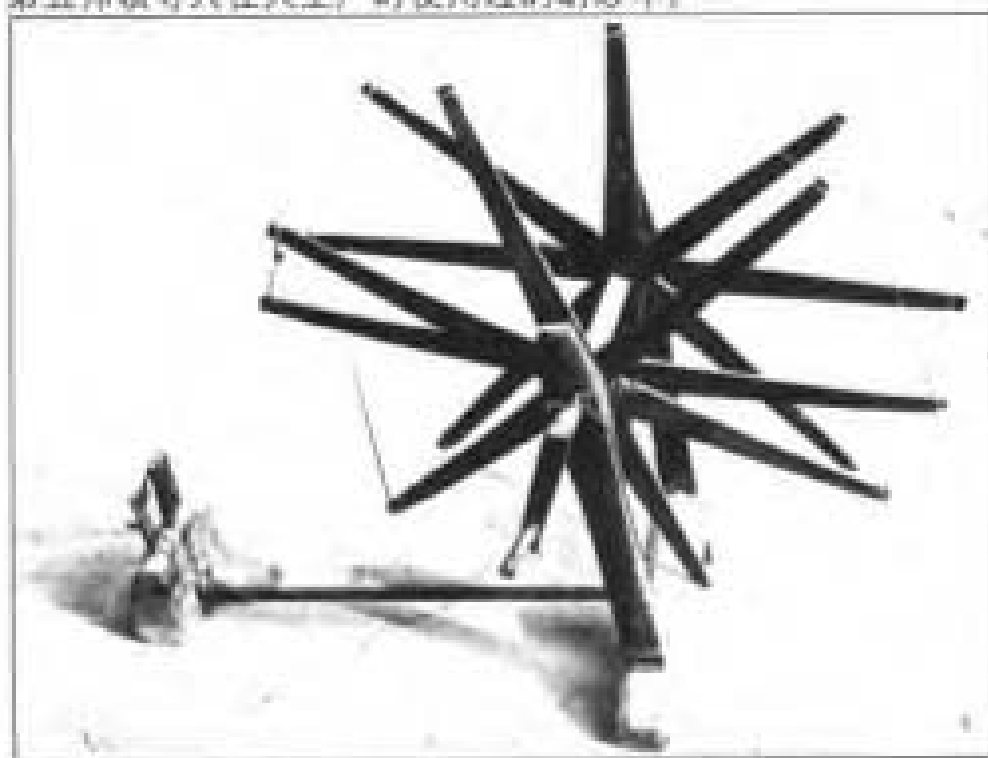
师卫生部手术组在做手术。





新四军指战员帮助群众进行春耕生产。

第五师领导人在大生产时使用过的纺纱车。





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在会师时互相致敬。

豫鄂边区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



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 革命史的几个问题^{*}

(代序之一)

李先念

一、要写党的路线正确，不要突出个人

五师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正在向前发展。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央的指示，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华北地区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深入大江南北敌后，创建根据地。这种形势，对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和创建根据地，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抗战初期，王明到武

^{*} 1982年和1983年，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几位同志，曾三次看望先念同志。在交谈中，先念同志对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讲了几个问题。这是他的谈话摘要。

汉，领导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充分利用武汉沦陷前的宝贵时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没有准备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这次全会后，党中央派我们到鄂豫边区，就是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路线，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组织和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央路线，认真消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师的创建、成长、壮大和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写这段历史应该把功劳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奋斗，决不要突出个人。

二、要写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

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我们始终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坚持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我们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正确掌握党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我们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纯、孙耀华、蔡韬庵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实行了真诚合作。在我到鄂豫边区之前，信阳地区的党组织和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已共同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蔡韬庵也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李范一、李相符等人组织了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孙耀华由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派当了应城县长，在建立应城

抗日游击队的过程中，同我们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李德纯等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积极争取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川军孙震的部队虽然同我们搞过一些磨擦，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他的部下有一位师长叫陈离（静珊），和我还是好朋友。我在他的师部住过好几天，他送给我们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等。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小的。团结和合作都是互相的。当友军同日军作战时，我们也尽量给予帮助。例如，1940年5月，川军一二五师的一个团在安陆李家冲被日军包围了，我们主动驰援，使其得以安全突围。桂军是国民党军队留在大别山区的主力，抗战初期同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但是，当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时，桂军就开始同我们磨擦，打我们，杀我们的人。在抗日战争中期搞磨擦比较多，后期又稍好一点儿。就整个桂系来说，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当他们一旦坚决执行国民党当局反共命令时，我们从自卫立场出发，也坚决予以还击。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我们对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鄂中）专员石毓灵这样的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恰如其分的斗争。我到鄂中时，曾见过石毓灵，他表面上装得很客气，但是对我党我军竭尽污蔑之能事，又搬出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那些陈词滥调。他还问我，知道不知道王鉴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黄安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很有名的一位领导

人。石毓灵说：“那个人可厉害了，天有王鉴，日月不明；地有王鉴，草木不生；人有王鉴，胆战心惊。”对他的这种恶意攻击、诽谤和挑衅，当然要给予严厉驳斥。后来的几次反共高潮，他都积极参加了。安陆有一个国民党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开始和我们合作抗日，后来受顽固派的拉拢和收买，同我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向我白兆山根据地进攻。因此我们决定打击他，一打就把他俘虏了。然后我们又客气地招待他。我说：“我们是朋友，你太对不起人了，不该同我们作对！”说得他羞愧无言。临走时他要求给他几支手枪。我说你要枪，国民党顽固派会缴去的。他说不要紧。我们就给了他十五支手枪。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果然把他的枪全部缴去了。我们的原则是，顽固派如果助敌反共，破坏抗日，就坚决消灭他们。对应城的李又唐就是这样。但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把事情做绝，既显出我军的军威，又尽可能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在鄂东地区对李九皋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程汝怀的斗争，也有很多生动的事例。

三、要写大胆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鄂豫边区是中日两军相持的前线。日军对城市和交通沿线控制很严，对广大农村控制就差一点儿。我们到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有力地打击日伪军，而且顽固派要搞我们也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要同他们闹矛盾，影响两党合作抗日，人民也不愿意，而且搞不好有被顽固派消灭的危险。因此，要不要深入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恋国民党

统治区，不愿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我和周志坚等同志率领一百多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不久，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同志也先后率领部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同我们会合在一起。我们到了敌后，确实发展很快。这当然同这个地区原来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有关。还在徐州沦陷、武汉危急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指示，中共河南、湖北省委就曾派了一批干部到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是抵制了王明的错误的。我们南下同豫南等地的武装力量先后会合，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服动员一些同志坚持敌后或转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信阳敌后地区的四望山，同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合时，要他们坚定不移地在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京汉铁路东面大别山地区的狮子口，同罗厚福、贺建华等同志领导的六大队会合时，听说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领导的五大队和李丰平、郑重等同志领导的八大队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立即让贺建华同志想法告诉他们转到敌后去，不然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的意见当时不知转达了没有。五大队原来叫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他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有警惕的。1938年12月，鄂豫皖区党委为了使这支部队取得合法名义，以便解决给养问题，经过同桂军谈判，才改称为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防区在麻城的夏家山一带，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挨着。1939年9月，正当五大队准备转移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命令部队向夏家山等地发动进攻，致使五大队和地方党组织及群众遭到一些损失。五大队在“夏家山事件”发生后，迅速转移到敌后，发展很快。八大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转移，结果几乎全部被国

民党顽固派消灭了。我们到敌后孝感中和乡地区，原红四方面军伤残干部许金彪同志在那里组织了五百人枪的队伍，诚恳表示听从党的指挥。到应山，杨焕民同志带领一支队伍也找到了我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就把几支分散的小股部队，汇集成为一支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部队，并成立了鄂豫边地区的第一个主力团——新四军挺进团。

四、要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我和周志坚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从竹沟出发就用的是新四军的番号，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在这以前，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搞起了几支武装力量，为了取得“合法”名义，除六大队外，都还没有打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四军的旗帜。1939年春，我们挺进到鄂中，同陶铸、杨学诚、许子威、蔡松荣、郑绍文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了。陶铸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就到了鄂中，在应城汤池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一公开形式，培养了一些抗日骨干。武汉沦陷后，他和杨学诚等同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我们到鄂中不久，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带一些干部和二百余战士也来到了安陆的赵家棚。1939年6月间，我们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日形势，研究了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的问题。经过认真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和整编豫南和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高举起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旗帜，解决了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

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陶铸同志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这次会议，对五师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同它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总之，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到鄂豫边不久，就看到了国民党中央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们不理它那一套，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壮大自己的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当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一方面公开提出强烈抗议，揭露顽固派的罪行，教育人民和部队；另一方面随时进行自卫战争，坚决打击那些专门吃磨擦饭的家伙。我们的这些做法，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给予了充分肯定。

五、要写党的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1939年11月“竹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在这之前，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朱理治、任质斌同志已率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六百余人撤离竹沟来到四望山，同我和陈少敏等同志一起，召开了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部队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指挥问题。当时，我们同日、伪、顽分割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很激烈，党的各种力量如果不统一领导，协力战斗，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的危险，所以统一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四望山会议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充分讨

论，决定建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统一管理原豫鄂边区党委、鄂中区党委和鄂豫皖省委鄂东地委的党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任代理书记。同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由朱理治同志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朱理治同志回延安，由任质斌同志代理政委和书记职务）。至此，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

1940年8月1日，我们在白兆山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我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意义，并对不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党对军队的领导。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命令：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我为师长兼政委。6月间，五师在白兆山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切实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这样，新四军第五师就成为一支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六、要写人民群众的支持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为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

“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边区的抗日人民战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民兵、自卫队为基础，以主力部队为“拳头”，去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在群众的支持下，五师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几个干部带上一支小的部队就能在敌后同敌人扭打。地方干部也会打游击。当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常常有人向我报告，说是某某县委书记不见了，某某区委书记“失踪”了，某某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我就讲：“不要紧，敌人退了，他们就会钻出来的。”果然敌人一退就都钻出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在同日、伪、顽只隔一条路或一条河的“三角斗争”地区设立医院，安置伤病员，住上几个月或者一年，敌人也发觉不了。我们的部队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敌、伪、顽夹击中，无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打运动战都很自如了。

这种奇迹的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的群众基础很广泛，但同时也是和我党我军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分不开的。这里的人民群众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抗战中，我党我军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农业低税制，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直到今天，安陆县还保留着当年修的汪公渠，湖区保留着围田，山区保留着这个塘、那个堰。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进行群众战争动员，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这是五师取得生存发展、夺取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

七、要写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证

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会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大小不一，开始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相互间没有或者很少联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统一起来之后，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没有什么山头之分，门户之见。虽然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比较好地解决了，始终没有影响团结和战斗力。

五师的干部，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其中，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干部，约有一百多人。这些同志大多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在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一部分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出来的白区党的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这两部分干部是部队的主要骨干。再就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此外，钱瑛同志也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干部。党从重庆还派来了一些干部。我们对干部的使用，是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为数不多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大都放在团以上主要军政领导岗位。他们在作战和建军中起带头和骨干作用。同时又配备了一批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由于五师部队发展很快，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我们又通过办教导队、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培养了大量新的军政干

部。这些人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富有创造精神，经过老同志的传帮带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很快就成长起来了。总的来看，五师在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我还要说一下，五师知识分子干部是很多的，他们为五师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师干部来源这样广泛，各自出身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都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奋斗。

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写史时，应加以充分反映。

八、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

应该把竹沟的作用写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曾设在竹沟。竹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又是新四军发展的出发点之一。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这里出发，会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河南省委在这里办过教导队、党训班，先后培养了3000余名青年干部，扩大了留守处的基干武装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了很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时，在竹沟住过一个时期。在竹沟工作过的还有朱理治、陈少敏、彭雪枫、王国华等同志，健在的有周骏鸣、张旺午等同志。

七里坪留守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是在这里集结后东进抗日的，五大队、六大队也是

从这里开始发展起来的，湖北省委在这里还培训了一批干部。应城汤池在聚集革命力量、培训党的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湖北省委在七里坪和汤池时的工作，历史上都应作相应的记载。

九、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

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失误，也有教训，写历史对这方面也不应当回避，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1944年初，有个别同志一度认为五师战斗太频繁，边区根据地发展太快，因而提出了“以巩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减少战斗频繁”，实际上是搞收缩，影响了根据地的扩大和部队力量的发展。当时，对此是有争议的。开始我没看出这个方针有什么问题，后来跑了一些地方，看到根据地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抢占去不少，觉得不对头，就怀疑这个方针了。尽管有许多同志反对这个方针，但没有彻底纠正过来。同年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之后，在片面强调“以巩固为中心”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有一次很大的失误，没有集中主力沿平汉路向河南敌后发展。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妄图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线，发动了河南战役，打垮了国民党40万军队。在37天中，占领了郑州和湖北老河口等38座城镇。这时，中央决定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新四军第四师西进，第五师向北发展。随后，中央根据鄂豫边区党委的意见，考虑到五师的财政困难和干部短缺等问题，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以原地区巩

固为主，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但是仍然希望我们能相机沿平汉路向北发展，以求和华北的八路军打通联系。我们由于只注意了巩固原地区，没有派大部队向河南发展，仅派了一支 1200 人的部队进到豫中嵒岈山一线。虽然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孤山冲一带老根据地，以后又争取了国民党河南游击十三纵队程耀德 5000 人的起义，但是没有很好地完成向河南发展、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我们在鄂豫边区，原来天天讲“孤悬敌后”，总是千方百计想和华东、华北根据地打通，敌人发动河南战役后，为我们造成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好条件，我们没有全力以赴地去发展，失去了和华北联成一片的机会。那时湖北的形势，留 1 万人是那样，留 2 万人、留 5 万人也是那样。在讨论发展河南的会议上，我很欣赏张执一同志的那一炮。他说要“倾巢而出”！这当然是极而言之话。如果当时能派出足够兵力发展河南，我们不仅能同华北根据地打通，而且还能进一步扩大自己，扩大回旋余地。

写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写成绩，不要写成“老子天下第一”；写缺点，也要恰如其分。这样才符合历史实际，内容也显得丰富。在写党内矛盾和分歧时，要讲怎样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党和军队更加团结。

十、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倚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准备，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我们党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自己的力量发展很快，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

夕，人民解放军已有 120 多万，除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中原解放军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嵩岳（河南）军区部队，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组成的。1944 年 11 月，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于 1945 年 1 月到达鄂豫边同五师会师。随后，又跨长江到湘鄂赣和湘粤赣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求达到北和鄂豫边区的五师、南和广东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南征北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和中央部署的变化，他们又北返，和我们在中原重逢。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也是经过艰苦奋战才从嵩岳地区到达桐柏山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正式组成中原军区。这几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在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6 月的十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的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 30 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

军，打过去毫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准备让出的八个解放区就有湖北和河南。随后，我们让王震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估计到中原解放军是要吃苦的，要准备做出重大的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1946年突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6月23日的电报中说：“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我们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又在7月15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我们打电报，对这次突围作了正确评价。他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中又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截至1947年2月，中原解放军又在敌后转战了八个月，继续牵制了国民党24个以上的正规师和大量保安团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

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中原突围战役中，广大指战员为了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英勇奋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重重包围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下来近两万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张才千、李人林同志率领千余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汉水，跨长江，进到湘鄂西部地区，王定烈同志也同他们转战大江南北。皮定均同志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后，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熊作芳等同志率部在大别山地区，刘昌义等同志率部从鄂西北到皖西地区，罗厚福等同志率部在鄂西北地区，文建武、汪锋等同志率部在豫鄂陕地区，还有一些同志率领小股部队分散在中原地区。他们都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开展了游击战争。这些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党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后来又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三十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

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的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但如果离开历史实际，凭想象说东道西，就不妥当了，既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

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任质斌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工作过的健在的老同志很多，做编写工作的同志，可以去入或去函了解，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

由于事隔几十年，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能回忆起来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上面讲的几个问题，供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 及其实践经验*

(代序之二)

任质斌

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1984 年年会，是在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重要历史时刻，在迎接建国 35 周年大庆的日子里，在伟大的整党声中召开的。这就给这次年会赋予了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使这些宝贵经验能够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伟大斗争服务。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一盛会，并将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及其实践经验，向大会作一发言。为了便于同志们、特别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我在这里向大家提供一些历史情况和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 此文是任质斌同志 1984 年在武汉举行的“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1984 年年会”上的主体报告，被收录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一书中。

一、背景及特点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我党在 1938 年日寇占领武汉，全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才着手创建的。五师及其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与这样一些有利因素分不开的：

一、从 1937 年“七七”抗战，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全国各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在这 15 个月的过程中，日寇利用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战略，囊括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与此相反，当国民党军队从他们正面战场上大批溃退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却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不断取得胜利，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收复了由国民党丧失的大片国土，从而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并使他们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二、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我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错误路线，做出了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指明了方向。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派了大批干部到鄂豫边区来进行工作。

三、鄂豫边区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经过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红军长征后，这里又是南方八省游击区之一，“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之一。因而这里的人民群众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武装斗争经验，蕴蓄着坚实的革命潜在力量，一经我党号召，便挺身而出，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持边区抗日游击战争

的开展，成为我党我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是，这支部队 and 这个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有其特别艰苦的一面：

一、五师的创建，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做基础。红军长征后，原在鄂豫皖、湘鄂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早在武汉沦陷前即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没有留下连以上建制的部队。五师部队的前身是以个别红军排、少数红色便衣队员，和党中央先后派来的百余名红军干部，结合党的地方组织与散处在边区的共产党员，通过发动群众和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起来的一支支小游击队，然后经过逐步会合，经过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的过程，像“滚雪球”似的“滚”起来的。她是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军队。

二、处在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敌人的近后方，日寇和国民党军队两大阵营之间，面临着敌、顽的夹击。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一个敏感地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而把主要压力放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集中兵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扫荡”，并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国民党也转变为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并加紧了投降活动。五师就是在这样严重困难的时刻，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寇占领武汉后，即在武汉屯以重兵，同时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铁路、公路、长江、汉水伸出触角，占领重要城镇，控制交通要道，经常盘踞着6个师团2个旅团，计达15万重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驻有2个师团10个旅团），还有8万多伪军供其驱使。从而把武汉周围沦陷区，分割成为一块块小的“豆腐块”，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民党在其周围也有第一、五、六、九等4个战区（1944年重划

为一、三、五、六、九、十等6个战区)，其中第一线部队近40万之众。他们对日寇实行消极防御，对共产党、新四军进行积极磨擦和“围剿”。我们就是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并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夺得胜利的。

三、长期孤悬敌后，与兄弟部队和其他解放区相隔绝。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新四军第五师及其根据地——鄂豫边区，一直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的战略区。国民党在“武汉会战”大溃退后，以43个正规师和3个挺进军、21个地方游击队，分别占据了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以与日寇相持，并包围了边区，隔绝了新四军第五师同华北、华中兄弟部队的直接联系，加以敌寇沿江封锁，致使五师部队处于孤军奋战的艰苦境地。这支部队和这个边区从诞生之日起，直至日本投降，基本上没与其他解放区和兄弟部队联系起来（有时曾一度联系上，但很快又被敌人切断），就像是下围棋时投下的一颗“飞子”。她同党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和军部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只有无线电通讯，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能及时从电讯中得到上级指示，在战略上能同兄弟部队遥相配合外，五师无法在战役、战斗上取得兄弟部队的配合，更不可能在财力、物力上得到外援。一切困难都必须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解决。

二、抗战历程

回顾鄂豫边区人民及其子弟兵——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前后经历了四个大的斗争阶段。

第一阶段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冬。这是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太原失守，到武汉沦陷，为鄂豫

边区抗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南京、徐州相继失陷，日寇步步进逼武汉的时候，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节节溃退；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捷报频传。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界人民都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在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我们党领导他们武装起来打敌人。当时，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各种机构土崩瓦解，国民党溃军到处乱丢武器。一块钱，一套便衣，甚至一碗稀饭，也可以换到一支枪。有些爱国军人，自动携带武器，脱离国民党军队，到处找我们党领导抗日。

在徐州失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对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党的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这一地区把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当做中心任务；要求动员住在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要求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当时长江局在武汉虽然做了很多发动群众的工作，但主要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搬用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做法去“保卫大武汉”，而没有拿同样大的力量，或用更大的力量，来准备武汉沦陷后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派了一部分人员到农村去工作，但没有强调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战争，所以搞起来的武装大都热衷于追求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而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时，又没有对国民党保持阶级警惕。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深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组织武装，甚至不准下面干部收集国民党溃军丢掉的武器。有些地方，党组织虽然搞起了武装，却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被国民党“吃掉”，使自己发动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到严重挫败。

这样，就错过了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好机会，直接影响了我在鄂豫边区初期的发展，造成了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先

天不足，并给边区各地的民族败类以招兵买马的机会。一时间，牛鬼蛇神，都抓起了枪杆，“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司令”大多数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成为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绊脚石。

幸而，边区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不同程度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在豫南、在鄂中、在鄂东、在鄂西、在鄂南的部分地区，燃起了武装抗日的烽火，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和五师部队的创造，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豫南确山竹沟镇，是我党发动和组织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党在这里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名义，在豫南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开展了统战工作，特别是放手发展了武装并陆续派赴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在信阳地区，党争取和支持了国民党信阳县县长，组织起抗日武装，协同党所领导的“七七工作团”武装在信南四望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鄂中的党通过民主人士的关系，在应城的汤池举办了“农村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干部训练班，训练了300多个进步青年，为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干部。接着以应城党所控制的八条枪为基础，通过进步的应城县县长，组织起“应城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应抗），在应城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孝感中和乡的共产党员，和本地爱国青年一道，赤手空拳，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组织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孝感的中和乡，建立了小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鄂东党的组织，在黄冈以红色便衣队加上所收藏的七条半枪为基础，积极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动员党员、积极分子

带头参军，组织了“鄂东游击挺进队”，并在黄冈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驻黄安（红安）七里坪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加上黄陂地方党所组织的“梅店自卫队”，组成了“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在黄陂、孝感、礼山（大悟）边界，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上述我党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武装，就成为新四军五师以后发展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第二阶段自1939年初，至1940年冬。这是鄂豫边区及其主力军发展和统一的阶段。坚决向敌后发展，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部队由小到大，从分散到统一，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在中原前哨坚持抗战的战略地位由此奠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彻底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消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以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南下，坐镇华中，从此华中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9年1月，党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同志带领160多人（包括干部60多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这时，鄂豫边地区的党所面临的局面是：敌人已在沦陷区遍设据点，并大肆搜罗民族败类，拼凑伪政权，组织伪军；国民党接受华北的“教训”，也在利用其社会基础——反动封建势力，或在其龟缩深山的数十万正规军的卵翼下，组织反动地方武装，或采用“曲线救国”办法，投降日寇，充当伪军，妄图恢复其反动统治。不同的阶级集团都有他们的组合。敌、伪、顽相互纠缠着，矛盾着，把沦陷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广大的人民群众挣扎在这座一片黑暗和混乱的地狱里，而寄

托着人民群众希望的我们党所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却十分弱小而分散，没有形成一支足以打开一个光明局面的力量。但我们必须打开这样一个局面。

“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这是李先念同志在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从延安动身到鄂豫边区之前，少奇同志对他的指示。为了打开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局面，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创建一支党直接领导的足以打开局面、承担这一地区的战略任务的人民军队。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无法生存。

1939年6月，鄂中区党委召开的养马畈会议，是解决这一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一个里程碑。当时，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绕道鄂东，联系了那里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后，到达了鄂中，参加领导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接到刘少奇同志的电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当时鄂豫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吃紧。国民党五中全会为准备妥协投降而制定的“防共”“限共”“融共”的反动政策，已在这里付诸实施。1939年4月，国民党解散了上年11月成立的进步力量占优势的统战组织——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事件标志着武汉沦陷后我党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存在过的相安共处的统战关系的结束。5月，国民党军队吞并了我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铁道破坏大队。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已从这时开始）。而在鄂中，当新四军的旗帜刚一出现，蒋介石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和第五战区当局，妄言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国民党三青团和鄂中专署，则阴谋策动原由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应抗”第二支队李又唐部叛变。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养马畈会议，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指示，决定整编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具有无产阶级远见和革命胆略的决定，是边区党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肃清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影响和束缚的胜利。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建立，就指挥所属4个团队，在统一战略部署下，高举着抗日旗帜，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敌后，广泛而勇猛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1939年8月，第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罗山县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了日寇80余名。9月，第一团队在第二团队一部的配合下，严惩了前来鄂中京山新街镇“扫荡”的日寇，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突围逃窜。与此同时，我军还抓紧时机，消灭鄂中孝感、应城等地的伪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天一夜时间，迅速全部解决了叛军原“应抗”二支队李又唐部3000余人。从而树立了军威，振奋了群众，使应城、云梦、孝感各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确立了我军在鄂中敌后抗战的阵地。第四团队还飞越汉水，一度攻克汉阳蔡甸镇，痛击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十二师熊光部，把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到武汉近郊。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更加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投降日寇的准备。9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国民党桂系军队第一七二师两个团，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围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第五大队。这一情况表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必将进一步嚣张。10月，再次到达竹沟的刘少奇同志，做了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根据他的部署，驻在竹沟的机关干部和部队立即撤离竹沟，转入了鄂豫边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只留少数部队在竹沟坚持。11月11日，国民党

反动派果然制造了“竹沟惨案”。少奇同志这次具有预见性的部署，不仅大大减少了我在“竹沟惨案”中的损失，而且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有着重大意义。

为了统一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3个区党委，统一成立豫鄂边区党委，新的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于11月在四望山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精神，研究了具体部署，统一整编鄂中、鄂东、豫南3个地区的党领导的武装，编成了6个团队，建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仍任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任政治委员，陈少敏同志任区党委代理书记。

中共中央对这支英雄部队在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中诞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一切敌后地区我党均可建立武装部队，并可存在与发展，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要有组织武装的坚强信心，要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中央还对纵队的活动方针，及时做出指示说：挺进纵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4万人枪，主要发展方向是鄂东。要加强根据地和游击队的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分别建立民兵、青年、妇女的救国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自卫军，还要发展党。军队工作必须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要在武汉等敌占区建立秘密党的堡垒，要加强对周围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纵队创建伊始，即面临着敌顽夹击的形势。

1939年12月5日，日寇千余，附炮3门，在飞机掩护下，“闪击”我领导机关驻地——京山八字门，妄图一举毁灭我指挥武汉外围敌后战场作战的神经中枢。经过一番抗击后，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

国民党鄂东专员、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2万多地方顽军，继续依附桂军，勾结敌伪，破坏抗战。他们在围攻我党在鄂东的武装第五大队后，进一步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并残酷摧残我地方党组织，成为开展鄂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积极破坏者。纵队为了配合兄弟解放区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牵制进攻我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桂军，从1940年1月至4月，先念同志指挥纵队主力，曾3次出击盘踞大小悟山的程汝怀部，歼灭了他的第十九纵队的部分有生力量，为开辟鄂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纵队的另一部高举着抗日旗帜，以机动灵活、跳跃回旋的英勇姿态，于2月中旬，飞越汉水，初战汉阳侏儒山，进击伪军汪步青部，直叩武汉门户，使武汉敌人戒严三天。

5月，日寇集中了6个师团的兵力，对鄂西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役性进攻，以压蒋投降。6月1日侵占襄樊，6月15日占领宜昌。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改善我军在鄂中的阵地，扩大回旋地区，纵队主力于6月回师路西，进军白兆山和京（山）钟（祥）以南山区，7月进军襄（河）西，8月进军天门、京山、潜江边界地区，并于7至10月在白兆山腹地，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平坝镇的3次进攻，给以重大的杀伤，使敌人在大洪山根据地内的主要支脉——白兆山安上钉子的阴谋破灭了。

在我军军事威力的震慑与党的敌伪军工作的争取下，汉阳伪中国人民自卫军两个旅于8月13日反正，参加我军抗日。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部队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的指示，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工作，边区军政委员会于8月1日，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集中地反对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从而使由各个山头会合而成的边区党的武装，从思想上真正地达到统一，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在新四军五师的

建军史上，具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中，边区在进行强有力的武装斗争的同时，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迅猛地开展起来。1940年1月，鄂中根据地的基本区内，开展了民选运动，改造或重建了乡、保政权。同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上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全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10月，召开了边区财经会议，试发了流通券。民兵与基干队的组织纷纷成立。文教事业亦大力开展。这年秋收之后，信阳和应城还进行了减租减息试点工作。

至此，边区已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建立了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也从一支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拥有1.5万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约10万人。从而奠定了边区我党我军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在坚持中原前哨的抗日战争中，开始发挥其战略作用。

第三阶段自1940年冬至1943年。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是边区我党我军坚持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部队和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阶段。

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以消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目的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的反革命暴行，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军委及时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在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暴风雨中，我师在挺进纵队的基础上，边作战、边建军。4月5日，全师组建完毕，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同志在白兆山中通电就职。于是新四军第五师就诞生在这样的峥嵘岁月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撤出皖南，四师由豫皖苏边区转移至皖东北，鄂豫边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和孤立，敌顽我三角斗争也

日益尖锐化。日寇虽然为了迫蒋投降，在边区周围发动了几次对正面战场的战役性进攻，但主要的则是对边区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又连续在全国和边区发动了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多次深入边区，某些顽军更进一步与敌伪勾结，甚至合流，以联合对我。我军遭到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与此同时，边区由于敌伪顽的掠夺和破坏，特别是1940年与1941年连续发生了旱灾，五师部队遇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因而，这一阶段的边区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紧张的时刻，我党我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鄂豫边区的人民和五师的指战员们，没有被各种困难所吓倒，而是充分发扬了艰苦奋斗、勇敢作战的精神，更高地举着抗日的旗帜，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伪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不断开辟新区，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发展和巩固了部队的力量。

在对敌斗争方面，五师诞生后便以崭新的战斗姿态，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投入了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严重斗争。为粉碎敌人“扫荡”，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我师于1941年6月进一步开辟了直逼武汉近郊的汉（汉阳、汉川）孝（感）（黄）破地区。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我师选择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日寇兵力减弱的有利时机，向敌后作战略展开，以相当兵力南下（汉）川汉（阳）沔（阳），发起了侏儒山战役。我军三打侏儒山，每战皆捷，歼灭了驻守在这里实力最强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解放了紧逼武汉西郊的大片国土。侏儒山战役震动了武汉，给予武汉人民极大的兴奋，也给予武汉日寇极大的威胁。1942年5月，日寇开始进攻浙赣线，为牵制日寇的新进攻，我师又以相当兵力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打开了鄂南抗战的新局面，既创造了从南线

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战场，又扩大了我军的回旋地区。同年12月，日寇以第三师团全部、第四十师团和伪第一师一部共万余人，附炮80余门，分14路合击“扫荡”我大小悟山，企图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趁各路敌伪尚在运动之际，连夜分数路向平汉路西和陂安南等外线地区突围，粉碎了日寇的万人大“扫荡”。1943年2月，日寇进犯襄南。为配合鄂西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与打击日寇，扩大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军又进军襄南，进一步从西线推进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发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我军进一步向湘北敌后发展，于11月挺进洞庭湖滨和桃花山地区，开辟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反顽斗争方面，边区我军首先配合全国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不仅坚持了鄂中、信南等基本区，而且打开了鄂东局面，在大小悟山建立了边区的指挥阵地；并一度与战斗在皖西的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取得了联系；继续发展了襄西、豫南等地区。1941年9月至11月，当桂顽第七军3个师及地方顽军大举向皖东新四军第二师地区进扰时，我师遵照军委命令东进鄂皖边，从战略上策应了我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并且发展了鄂皖边地区。当鄂东桂系势力与程汝怀矛盾冲突时，我军则利用这一矛盾，对程汝怀各部队进行了广泛的争取工作，以孤立桂军。当程顽依附桂系疯狂反共时，我军则果断地还击了程汝怀部队，于1942年1月至3月先后进行了浠水、广济、蕲春漕河镇等战斗，打退了鄂东的反共高潮。1942年5月至12月，更是风狂雨暴的8个月。在这8个月里，国民党第五战区对我全边区发动了反共高潮，先后投入进攻边区的兵力，计有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支队，人数计达10万之众。顽军还无耻地勾结日伪军向我夹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严重敌顽夹击，我们确定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

战，坚决自卫”的方针，首先对深入根据地的顽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主力以运动战相机歼灭反共而孤立的顽军。五师师部的主力部队第十三旅，转战四方，配合各军分区部队给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其中8月底至9月初的礼北战斗，我军歼灭了顽保四旅旅部及两个团，该顽旅长蒋少璦、三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长钟锦德等均被我俘获（战后将其释放）。军部首长曾来电嘉勉这一战役的胜利。经过8个月的生死搏斗，虽然我白兆山、天汉湖区、襄西等地一度被敌顽侵扰，但边区我党我军不仅没有被顽军的“清剿”所消灭，反而在战斗的烈火中，又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新建立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配合全国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师又击退了第五战区对我鄂东地区的进攻。李宗仁8月20日致李品仙电，承认了又一次失败，说：“自剿匪以来两个月，不惟无多结果，反使共匪流窜我军防地，似此情势，言之实堪痛心。”

这一阶段还加强了部队建设。当1941年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师军政委员会于6月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工作水平，对巩固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政工会议后，部队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进行日常工作的锻炼。为了大力培养干部，以适应部队发展和提高的需要，于10月间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还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工作建设，加强了行政管理和后勤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巩固部队的工作。1942年5月，在全边区建立了3个军分区，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统一了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师部除第十三旅仍作为师部的主力部队担负全区战略机动任务之外，其他正规旅都基本上固定在一定地区作战。还将一部分主力转化为小团，分布到各军分区以便在敌顽

夹击的严重局势下，能够独立、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于第五师与军部的交通联系一直没有打通，毛主席于7月21日亲自拟电稿，同意华中局意见，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五师的行动。1943年2月，五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五师诞生以来的军事斗争经验，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建设问题。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并在秋季开展了全师整训运动，既抓住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又普遍进行了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军事素质。

边区的根据地建设，在这一阶段也全面展开。为统一与加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间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正式选举产生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各地结合战争动员，加强了改造政权、组织群众、发展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等各项工作。为支持长期抗战，战胜严重财政经济困难，边区党委于1942年1月做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3月召开了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使边区掀起了根据地建设高潮。1943年1月，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李先念同志任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边区自此全面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蒋家楼子会议”，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主要解决了增强战争观念的问题，统一了对于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之重大关系的认识，通过了1943年边区军事建设计划。会后，边区党政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保证了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政权工作、群众工作与军事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互相促进。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经过这几年的艰苦卓绝斗争，胜利地形成了从东、西、南、北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截至

1943年冬，我主力军与地方军由1940年底的1.5万余人发展到近4万人，地区上由1941年初的10余县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边区人口由1942年的473.5万余人（基本区216.4万余人，游击区257.1万余人）发展到1020万人（基本区420余万人，游击区600余万人）。

第四阶段自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是边区在胜利与失误交织中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

为了加强对鄂豫边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华中局于1943年底派遣郑位三同志来边区任华中局代表。在郑位三同志的倡议和边区党委的同意下，从1944年起执行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进行了整风、生产和组织群众等巩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特别是整风运动，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抵制了康生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始终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和风细雨的方法，所以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健康的。在这段时间里，郑位三同志传达和介绍了延安整风情况，使长期孤处敌后的边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摆脱困境，急图将中国大陆变作它垂死挣扎的基地，于是发起了豫湘桂战役。4月上旬，日寇首先以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汤恩伯和胡宗南的40万军队，一触即溃，竟在37天内，失城38座。饱受“水旱蝗汤”之苦的河南人民，渴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进军敌后，领导抗战。中央及时指示五师和华北、华东兄弟部队同时向河南敌后发展，完成绥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但当时边区领导正处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中，在指导思想过分寄希望于华北多派八路军南下，同时对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的形势估计不足，

因而在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中央指示下达后，仍坚持实行“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的方针，只派遣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挺进河南敌后。这支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了豫南、豫中 7 个县的新区，开辟了东西宽 140 余里，南北长 200 余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 8000 余人；一度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情况表明，河南敌后形势确实极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如果五师当时能拿出较大兵力进军河南，完全可以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实现席卷中原的战略任务。这样，不仅使边区长期力图解决的“改变孤悬敌后处境”的战略目的能够实现，而且还可以为五师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转变时，造成背靠华北，威逼武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为有利的局面。

在“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五师大部主力陈兵大悟山中，一则固守大悟山阵地，一则进行长期整训，和进行“组织群众大多数”的实验工作。1944 年 2 月至 5 月，国民党广西军集中了几千人的兵力向大悟山连续进行了两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则以打阵地战的作战方法，死守硬拼，拒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壮烈的“大悟山保卫战”。这就使一部精锐主力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受到完全可以避免的消耗；加上坐吃山空，财经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当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跨入 1945 年时，正是德日法西斯处于总崩溃的前夕。为了争取在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945 年 1 月，从延安奉命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胜利地到达边区，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至此，边区党委才确定将工作方针改为发展为主。派出鄂东军区的一部兵力，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但五师的主力仍驻守大悟山中未向河南进军，放对大局未起决定作用。

三五九旅南下，为边区送来了大批红军老干部，大大增强了五师的骨干力量，这对提高五师部队的素质起了重大作用。但边区领导在调整和配备部队的各级领导骨干时，对一部分原来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干部未做适当安排，这对以后更为艰巨的斗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庄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在抗日期间，英勇转战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我新四军第五师，由于党中央、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斗争中，团结抗日的各阶层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以鄂东大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由开始的几支小游击队发展到5万余人的人民武装。这支英雄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大部或一部和伪军全部。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五师部队曾对敌伪军作战1035次，共歼灭敌伪军4.16万名，其中毙伤俘敌伪军3.01万名，敌伪军投诚与反正1.15万名。作战中缴获炮23门，掷弹筒39个，机枪218挺，长短枪1.15万支。她对于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起了重大的战略配合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这部抗日战争历史时，不能不想起那些成千上万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沉痛的怀念。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三、几点经验教训

如前所述，新四军第五师的历史，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兄弟部队的历史一样，是极其雄伟壮丽、光辉灿烂的历史。无数英雄人民在谱写这部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走过一些迂回曲折的道路。在这部历史里，绝大部分是成功的经历，但也夹杂着某些失误。关于这些历史经验，我以为有以下几条值得特别介绍的：

一、高举抗日大旗，深入敌后，坚决打击敌伪气焰，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是我党、我军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但在执行这项使命时，又必须从抗日战争全局出发，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不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敌后活动初期，尽管部队初建，力量不大，但一开始即敢于高举抗日大旗，深入敌人后方，坚决打击民族敌人的侵略气焰，充分显示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这一新生力量的强大威力。这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正规军和畏敌如虎、专事扰民的国民党游击队，形成鲜明的对比。人民群众普遍称赞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支持和拥护，就是我军赖以立足生根和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经验证明：在以军事力量打开敌后抗战局面和创立根据地时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乘日寇深入冒进之际，寻找有利地形和时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力争初战胜利，借以挫敌凶焰，振奋人心，树立我军声威，坚定群众抗战信心，掀起敌后抗战热潮，开展各项根据地建设，奠定我党在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不这样，便不能发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也无从生存和发展；不这样，便不能建立抗战秩序。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以游击战争为主，作长期打算，切不可死拼硬打，孤注一掷。第五师转战的武汉外围，是日寇继续进犯我大后方的军事集结和物资供应基地，是两军对峙的前线，是敌人的近后方。日寇在每次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前后，都要对敌后我军进行“扫荡”，以确保其军事行动的安全；日寇为了扑灭我有生力量和进行经济掠夺，经常对边区进行各种突击性和季节性的“扫荡”。因而敌人对鄂豫边区的“扫荡”特别频繁。针对敌强我弱和敌人“扫荡”频繁的特点，第五师采取的对策是：一而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一面积蓄力量，长期坚持，在坚决粉碎敌伪“扫荡”、“清乡”和“蚕食”的前提下，注意休养生息，以争取自己的长期存在和对敌人作长期斗争。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坚持自卫立场，敢于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敢于放手反磨擦。

新四军第五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鄂豫边区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创建起来的。但在初创阶段，由于受国民党的约束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所掌握的部分武装，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高度的阶级警惕，或则不敢放手发展，听从国民党“划地为牢”，或则受国民党收编被国民党吃掉，或则被国民党突袭攻垮，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特别是刘少奇同志到达中原前线以后，坚决肃清王明的错误影响，部署了中原敌后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树起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大旗，提出了坚决反磨擦的方针，这种情况才改正过来，局面为之一变，使我们敢于在放手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中，不断发展自己和壮大自己。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全面掌握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贯彻党中央关

于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同边区周围拥有 40 万大军的国民党相周旋中，争得了一定的主动地位。

第五师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在力量对比上是十分悬殊的。国民党部队数量众多，装备精良，是既成局面；第五师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国民党始终未肯承认第五师在边区的合法地位，地方武装又大都十分顽固；五师部队一直被国民党部队看做眼中钉，妄图加以消灭。面临这样的险恶环境，第五师是怎样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呢？我们的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泛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另一条是放手还击坚决反共的少数顽固派部队，特别是顽固的地方部队。我们争取到大多数川军和西北军的中立，是前一条经验的实例。我们磨垮了以程汝怀为首的鄂东顽固派地方部队，是后一条经验的实例。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实践，我们虽然经历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的围攻，不但没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消灭，反而从不断还击反共顽固派的自卫斗争中，获得了发展和壮大。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三、抓住一切机会，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不能机械地停止发展，片面地去求巩固。

由于第五师所处的客观环境是敌强我弱，顽大我小，面临敌顽的双方夹击，主观力量是缺乏成建制的部队做基础，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起来；加上长期孤悬敌后、单独作战，与兄弟部队相隔绝，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便决定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必须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在尖锐的三角斗争中，便不可能争得发言权和立足点，也不可能坚持长期斗争，更不可能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同时，武汉四周都有广大的沦陷区。日寇虽在这些沦陷区设立了大量据点，妄图使之变为巩固后方。但由于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心做亡国奴，这就为我提供了发展游击战争的广阔天地。只要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有利形势，并充分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取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新四军第五师能够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旗帜插遍在鄂、豫、皖、湘、赣5省的广大地区的客观根据。

当然，我们在大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发展的间隙中，必须注意部队的巩固和边区的巩固。我们并不是一股劲儿地发展，完全忽视了巩固；而是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但是，经验证明，我们决不可长时间片面地强调以巩固为主的方针，以此来错过客观发展的大好时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1944年在发展河南问题上所犯的战略失误，是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

四、努力求得革命力量内部的紧密团结，一致对外，才能在敌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争取生存和发展。

第五师对军民关系，始终很重视。军队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一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一直是处在军爱民、民拥军的比较融洽的境地。边区广大人民，是把第五师部队当做自己的子弟兵看待的。这是第五师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五师军队和地方党、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虽然有一个时期，由于军队发展较快，地方负担很重，部分地方干部一度出现畏难情绪。但1943年在蒋家楼子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把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的重大关系阐述清楚后，地方干部便勇敢地承担起支援军队的重任。五师师部的主要领导干部和边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干部决定一切，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的团结一致，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第五师的干部政策，在长时期内是注意到紧密团结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骨干力量的。第五师既依靠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干部，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又放手使用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预部分领导工作，加以培养和锻炼，使之各得其所；既注意使用这一山头的干部，又注意使用其他山头的干部。既注意使用外地来的干部，又注意使用本地干部。并注意引导各种干部，扬长避短，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使他们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在对干部的管理上，既及时而坚决地反对闹独立、闹宗派的不良倾向，又注意发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的独立作战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都应针对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特点，特别应从游击根据地这一总特点出发，决不应生搬硬套较巩固的兄弟根据地的经验。这是我们带根本性的，贯串以上4个方面的总的经验教训。

第五师的客观环境（接近中日战争的前线、敌人设立的据点很密）和主观力量（敌人的力量和顽军的力量都大大超过我们），决定着鄂豫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是一个动荡不稳、起伏不定、并分散成若干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不可能建成一个稳定的连成一片的巩固根据地。

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部队没有过分集中，采取了适当分散的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组织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曾经注意过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因情变化，不强求一律。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组织财政来源上，在大多数时间里，曾经主要依靠到武汉外围的广大回旋地区去开辟税源，以及从开辟新区中去扩大财源。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后勤工作和兵工建设等方面，采取了分散隐蔽的办

法，依靠群众的掩护立足生存。

但是，我们当时限于领导水平，虽然我们的实际工作是适应和符合豫鄂边区的总特点的，但自觉性并不高，特别是未能提到理论高度来系统地加以肯定。因此在后期曾经一度搬用过某些巩固根据地的经验，不适当地长期坚持“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不适当地强调部队的集中训练和正规化，不适当地采用一种形式“组织群众大多数”，不适当地摒弃了从扩大游击区来减轻财粮困难的做法。所有这些，都使工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目 录

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

革命史的几个问题(代序之一) 李先念(1)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及其实践

经验(代序之二) 任质斌(18)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前后 刘少卿(1)

竹沟在新四军第五师及豫鄂边区

发展初期的作用 牛书涵 薛国恒 肖 健(6)

汤池对创建豫鄂边区及新四军五师

战略支撑点的作用 须浩风(15)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抗战初期鄂中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夏 夔(31)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铁军战旗飘扬豫鄂边 马 焰(45)

——浅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建与发展

新四军五师和边区的卫生医疗工作 汪钦文(61)

新四军第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

工作初探 王之铎 王培德 李振华 马 焰(79)

关于《新四军文献》一份电报的辨析 马 焰整理(92)

——任质斌同志访谈录

中原突围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 夏 夔(100)

——纪念中原突围 55 周年

陶铸同志的领导方法 顾大椿 李荫田(115)

豫鄂边区的反顽斗争纪实·····	马 焰(124)
开创信应抗日根据地的“三角”斗争·····	冯仁恩(145)
胡家台战斗·····	潘友诤(159)
挺进河南敌后·····	陈佑铭(165)
忆爬头寨战斗·····	潘友诤(183)
合水镇战斗·····	陈佑铭(190)
王家坊——黄冈沿江湖区抗日根据地 的建立与作用·····	王石泉(197)
战地黄花分外香·····	肖 鹤(202)
——在血沃中原的峥嵘岁月里	
彭雪枫智退国民党一个团·····	薛国衡 肖 健 牛书涵(217)
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	栗秀真(221)
日本法西斯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夏 夔(226)
——忆新四军第五师营救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 “你们要甘当无名英雄”·····	周玉中(233)
——记师首长对三处同志的教诲和勉励	
我在豫鄂边区的经历(1938—1945)·····	须浩风(238)
在新四军五师战斗的岁月·····	王之铎(243)
抗大十分校·····	李国超(256)
——鄂东教导团生活琐事	
忆我在五师文工团的一段历史·····	原 野(265)
司令部生活的片断回忆·····	汤正义(275)
无尽的思念 难报的恩情·····	仲 平(279)
一首拨动心弦的歌——《新四军里真快乐》·····	张育英(284)
从八路军到新四军·····	常志义(286)
星光灿烂·····	任宁芬(292)
“洪山公学”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晓 阳(301)
我们所知道的罗礼经光第三纵队·····	戚 涛 狄文蔚(308)

忆战斗岁月·····	喻 真(310)
饮水思源·····	沈文倩(313)
情系中原·····	林 扬(325)
——一对未婚夫妻奔赴鄂豫边区纪实	
中原突围和我投奔五师·····	周志钧(337)
回忆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二三事·····	何 冰(342)
实验小学给了我革命启蒙教育·····	朱忠华(346)
忆中原北路突围·····	马兆祥(349)
中原突围的片断·····	王景瑞(353)
血战前坡岭·····	周 村(356)
——中原突围途中东赵川战斗一角	
历尽艰险话突围·····	马 焰(364)
——中原北路突围纪事片断	
我在中原突围中做报务工作的回忆·····	苏 明(391)
中原突围第一夜·····	欧阳树强(398)
护送干部队渡黄河·····	北 沙(401)
停战前的一仗·····	陈士俊(409)
杀出包围圈 转战鄂西北·····	王定烈(411)
迟到的春天·····	沈旬之(424)
——对坚持鄂西北斗争经历的回忆	
从襄南坚持到创建荆当远根据地·····	李秉范(453)
智取郝穴 飞渡长江·····	张育英(461)
——李人林支队渡江传奇	
少女随军突围记·····	范兆林(467)
想念菠萝崖的亲人们·····	李 炬(477)
我在鄂西北的片断经历·····	罗会三(484)
中原东路突围亲历记·····	何根毅(489)
中原东路突围二三事·····	袁文通(495)

坚持不掉队·····	王克(501)
突围前组织干部化装转移·····	须浩风(505)
从中原到苏北·····	甘迈(513)
——一个化装突围组的经历	
化装突围追记·····	肖仁(518)
怀念敬爱的刘子久校长·····	龙世华(522)
怀念杨学诚同志·····	须浩风(528)
一纵队文工团的姑娘们·····	王培德(532)
岁月如歌·····	潘成(546)
——时乐濂和他的战友们	
电键声声响到今·····	潘成(555)
——忆王子贵、王占鳌同志	
缅怀胞姐欧阳辉·····	欧阳树强(564)

附 录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五师分会(1997—2001)	
名誉会长、顾问、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及工作机构成员名单·····	(568)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五师分会会员照片、简历·····	(571)
未寄照片及简历会员名单·····	(601)
1997年10月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成立后	
已故会员名单·····	(602)
五师分会老战士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员名单·····	(603)
编后记·····	(604)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前后

刘少卿

1939年6月，我在延安中央军委任作战科长时，中原局书记少奇同志找我谈话，派遣我去河南竹沟任中原局军事部的参谋长，指示我组织一批干部报他审批后，由我带往中原地区工作。给予我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开列了百余人名单，由少奇同志批准随我同行。出发前，少奇同志指示我们：到敌后要发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日，要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根据地。我们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9年7月13日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这里是河南省委和中原局的驻地，由中原局委员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主持全面工作。对外统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后方留守处。

竹沟是桐柏山区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界的一个小镇，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原是王国华（人称王老汉）、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又是延安通向华中的交通枢纽，抗战初期发动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撑点。这里群众基础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许多进步青

年，从四面八方奔向竹沟参加革命队伍。河南省委在这里开办有党校、军政教导队和各種训练班，先后培养了各类干部 3000 余名，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到竹沟工作时，先念、少敏同志已挺进武汉外围敌后，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大约是 9 月里，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少奇同志再次由延安来竹沟，组织中原局转入敌后，部署中原地区党和军队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进一步推动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奉命带两个连到舞阳县境迎接他，随同少奇同志来的还有徐海东、刘瑞龙、向明等同志。记得是少奇同志到达竹沟后的 10 月初，他在竹沟寨外的太阳底下，召集朱理治、我和王国华等人开会。他向我们讲了国内外新形势，传达中央决定中原局机关转移敌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成新的河南省委，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工作。另将豫南、鄂东、鄂中三个地区党组织合并，统一组成豫鄂边区党委，整编党领导的武装，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并告诫我们，要高度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对他们制造的反共摩擦，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要我们率领竹沟机关、部队的大部分人员迅速撤离竹沟，挺进四望山与先念同志会合，进行整编。他已电告陈大姐来竹沟接我们去鄂中。

说话间，陈大姐来到竹沟，少奇同志笑着对我们说：“说曹操，曹操到。”只见大姐齐耳短发，一身灰军装，打着灰绑腿，显得端庄严肃和干练。说实在话，与其说她是位大姐，不如说她很像西北军的军官，这是我初见陈少敏大姐的印象。少奇同志把我们讲的话，又对陈大姐说了一遍。大姐问新党组织叫什么名称？少奇同志说：“就叫豫鄂边区党委。”这就是豫鄂边区名称的由来。后来成立的豫鄂边区行政公署，行文、布告等，都盖着刻有这个名称的大铜印，发行的钞票（边币）上，也印着豫鄂边区

银行的名称。直到抗战胜利后，都没有改变过。少奇同志向大姐介绍了我的简历和职务，开玩笑地说：“陈大姐在鄂中工作，干部多半是九头鸟，现在再给你一个九头鸟参谋长。”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次会议后，我们就立即投入了挺进敌后的准备工作。

当年10月中旬，我们欢送少奇、徐海东、刘瑞龙等同志东进华中后，留下王国华等坚持留守竹沟，我和朱理治、陈少敏等也率党委机关、部队向豫南四望山进发，在四望山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同志。11月16日，我们召开了四望山会议，讨论贯彻少奇同志的指示，研究党组织合并、统一整编武装等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记得有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我和任质斌、刘子厚等，有些负责同志因环境、情况不允许，未来与会。讨论整编后部队番号时，我直率地提出就叫豫鄂挺进纵队，经商量一致同意这个番号。根据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指示：陈少敏任区党委代理书记，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我们分别率部挺进鄂中。从此，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领导重心，完全转入敌后。

1940年1月3日，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医等处和作战、教育、侦察、通讯等科；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锄奸、联络、民运、敌工等科和《挺进报》社。部队编成5个团、3个游击总队和随营军事学校。应城伪军郭仁泰部起义，又成立了第六团，全军约达7000余人。经过一段调整、整顿，部队工作逐渐走向完善，我这个参谋长，也成了纵队战略指挥中心的成员之一。

我从延安出来时，从军委作战科带了两份豫鄂两省的地图。先念司令员指着地图向我介绍鄂中的形势，显然我们是处在敌伪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之中，我们必须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根据一段工作、作战实践经验，我坦率地向司令员建言：纵

队指挥机关活动地区长期放在八字门、大山头、马家冲是不利的。特别是八字门，外面是丘陵、西边是汉水、北面山区驻有国民党两个集团军、东边是宋（汀）应（城）公路、南边是京山县城，进出只有一条通道，敌人一封锁，我们转移就很困难。先念司令员赞同我的见解，遂同我商量如何转移指挥阵地和活动地区，我认为部队在哪都好说，指挥机关最好放在平汉铁路东边的大、小悟山，那里靠近大别山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消息灵通，进可攻退可守，是战略中心之地。他对我的意见十分重视，并予采纳。

当时大、小悟山地区，盘踞着多股伪顽武装，不肃清他们，我们是进不去的。为此，我们一面将东进大、小悟山的意见呈报中央和中原局审核；一面调查研究分析敌情。了解到大、小悟山周边的小河溪、白杨岭、范家燕窝一带，驻有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十九游击纵队的刘梅溪、杨希超、尹昌彦、赵光荣、胡翼武等部，共约三四千人马。他们明里打着抗日招牌，暗地里却和日伪勾勾搭搭，反共残害人民，实质是伪顽两面派武装。我们决定先打弱者，先念司令员说，他初到鄂中时，在云梦、安陆一带，一个晚上就摸垮了13个司令。这些人各自为头，有二三十人即自封为什么鸟司令，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上述的杨、尹、赵、胡四股，都是被他摸垮后跑到小悟山来的。其中的胡翼武、刘梅溪是我纵队二团队副团长许金彪的孝感中和乡同乡，胡还和许是拜把兄弟。我们派许金彪做他俩的统战工作，把他们分割开，不能互相支援，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恰好此时中原局来电，指示我纵队向东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就立即命令部队投入战斗，一个上午就把这四股散兵游勇全部摧垮，俘敌两千，缴枪1500来支。这一仗不仅取得了军事胜利，锻炼了自己部队；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纷纷传颂：新四军扫清了这帮汉奸流寇，为我们老百姓

除了大害！这就为我们战略指挥中心的转移，打下了基础。用先念司令员的话来讲：“我七个营打垮敌人数千，缴获的枪支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这是十分值得的一仗。”

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开始后又改变为新四军第五师到日本投降，整整六年的抗日战争生涯，我都和先念司令员在一起，我们共同打了许多胜仗，发展扩大了五师部队，扩大巩固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把五师锻炼成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一支劲旅。五师全体指战员以坚忍不拔、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革命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耀千秋。

竹沟在新四军第五师及豫鄂边区 发展初期的作用

牛书涵 薛国恒 肖 健

李先念同志生前曾多次谈到编写五师战史和豫鄂边区革命史，“要把竹沟的作用写够”。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成立后不久，在分会会长顾大椿同志主持下，于1998年和1999年两次讨论，决定把竹沟在抗日战争头几年，对中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作用，尤其对五师及豫鄂边区创建和发展的作用，好好写一写。在1999年初的一次理事会上，确定将此专题，列为1999年要完成的三个课题之一，并分工专人负责。我们先后采访了原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原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刘子厚，原中原局秘书、五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栗在山，以及长期在豫南竹沟一带工作，曾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王景瑞等同志，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协助。

一、竹沟的地理、历史简介

竹沟，当地群众也称它沟竹。属河南省确山县。是一个居民

不过千人、半山区河边小镇。地处河南省南部，桐柏山脉北麓，平汉铁路以西约 30 余公里。在确山、桐柏、泌阳、遂平、信阳五县交界处。它西通泌阳、唐河连接豫南重镇南阳、鄂北襄樊、陕南商洛；东出确山县城而去豫东、皖北、苏北，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之后，我党在中原前线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据点”。当时我党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交涉，复经蒋介石面允设立的。公开名义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实际上则是我党在中原发展的基地。它掩护了我党在中原国民党统治区各条战线工作的开展，领导并指挥了华中各省（豫、鄂、皖、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这里，不仅驻有我党竹沟县委、竹沟地委；中共中央中原局，鄂豫边区党委也曾一度在此办公。1938 年 5 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河南省委在开封沦陷前在省委书记朱理治率领下迁往竹沟。1938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进驻竹沟，直到 1939 年 11 月，“竹沟事变”前撤离。

二、竹沟的革命传统和历史地位

竹沟的革命传统，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1927 年“确山暴动”。当时正值北伐军进入河南，杨靖宇、张耀昶等为迎接北伐军，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确山县城。后来又在刘店举行了秋收起义。李畔林、赵子东在竹沟建立了党的组织。竹沟从此保持了革命火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1934 年 1 月，王国华（时任确山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委员）与张星江（时任鄂豫边临时工委书记）到江西瑞金黄土岭，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聆听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

作方法”的报告，当年10月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接见王国华，王国华提出：回河南家乡怎么干？组织关系怎么接？毛泽东提出要坚持武装斗争，并亲笔题写了“党不离枪”四个大字交给王国华。周恩来说：“我就是你的组织关系，什么时候都承认你的党籍。”陈云说：“你回河南后，要继续发动群众，牵制敌人，配合南方红军长征。”王国华、张星江返回河南后，坚决执行了这些指示和全国苏维埃二大精神，在主力红军长征后，领导竹沟地区民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被誉为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旗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坚持在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桐柏山的游击队，整编为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长。八团队在竹沟整编后，由周骏鸣率领开赴安徽敌后，成为新四军二师主力部队之一，家属、伤病员留守于竹沟。经我党与国民党交涉，在确山县设立了联络站，在确山西之竹沟镇，设立了八团队留守处。从此，竹沟便成了新四军合法的留守处，掩护了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8年2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王国华时指出，“竹沟在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同一般。我们共产党人要抗日，要革命，也要有人、有枪、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依托。竹沟就是我们在中原的依托”。

为了加强竹沟根据地的建设，党中央于1938年初，调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少将处长彭雪枫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并主持竹沟留守处的工作。接着又调临汾八办参谋长张震，任竹沟留守处参谋长。同年5月，河南省委在省委书记朱理治率领下奉命由开封迁至竹沟办公。从此竹沟就成了河南全省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

1938年11月，我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和王明的领导职务，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

局，并明确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同志在河南浉池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后，于1939年1月到达竹沟，根据中原地区日寇已占领开封、信阳、武汉的形势和党的工作基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决定撤销河南、湖北两省委，建立豫鄂边区（住竹沟）、鄂中、鄂西北三个区党委，以及豫皖苏、鄂豫皖省委。并明确提出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群众武装，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从1938年底中原局到达竹沟始，到1939年11月“竹沟事变”之前，竹沟就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的领导中心，长江以北豫、鄂、皖、苏各省敌后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也成了中共中央从延安向华中输送党政军干部、武器弹药的桥梁和堡垒。后来，河南省委依照中央指示，独自招收、培训各类青年干部，先后开办了军政教导队4期，党训班、政训班以及卫生、机要、电讯、青年、妇女等训练班共6期，共培训各种干部3000多人，并组织整编部队16批，约4800余人，分别输送到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使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局面得以迅速发展。竹沟被誉为中原的“革命摇篮”。

竹沟留守处机关、部队、各种训练班的学习、工作、生活作风，完全仿照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规范，抗日救亡的歌声，此起彼伏。工农商学兵各司其事，安居乐业。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友军关系亲密友好。每逢赶集，四面八方，人群汇集，熙熙攘攘，笑逐颜开，处处显示出人民生活安定，精神振奋，随时准备上前线和支援前线的热情。刘少奇同志到达竹沟不久，看到竹沟如火如荼、生机勃勃的大好形势，曾经高兴地说，竹沟真成小延安了。这样，原来已在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竹沟是中原地区的小延安之说，更加迅速地传遍中原大地。

竹沟形势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使国民党顽固派极端仇恨，在不断造谣诬蔑、挑衅滋事的同时，于1939年11月，纠集竹沟周围专区各县保安团、队数千人突袭竹沟，河南省委（豫鄂边区党委离开竹沟后重建）、竹沟地委、县委以及留守处机关和警卫分队共500余人，在刘子久、危拱之、王国华、张旺午等同志指挥下，奋起反击，经三昼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离。敌人惨杀我军民、伤病员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史称确山惨案或竹沟事变）。我党中央及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纷纷以各种名义，发表通电、声明，谴责顽固派的罪行。后来，竹沟地区军民，在我党领导下，在桐柏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竹沟的建设。1956年春，在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旧址，建立了竹沟革命纪念馆，周恩来同志亲笔题写“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馆名。同时，在竹沟北王庄，建立了竹沟革命烈士陵园。李先念同志题词：“继承先烈遗志，高举革命大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84年10月，为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在竹沟的光辉业绩，建立了竹沟革命纪念碑，李先念同志题写了碑名。1986年和1987年，先后经国务院批准，竹沟革命旧址群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列为国家级纪念建筑重点保护单位。

三、竹沟对我党创建新四军五师和 豫鄂边区所发挥的作用

竹沟对新四军五师及豫鄂边区创建的作用，是与它当时的历史地位分不开的。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进驻竹沟后，竹沟在中

原的地位，像延安在全国一样，起着领导中原地区全面工作及抗日战争的作用。所谓竹沟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党中央（后来又是中原局）的直接指导下，通过竹沟的传承和执行所起的作用。具体说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供了稳定的基地和可靠的后方。竹沟是当时中共中央向中原各省发展的前进基地，又是豫鄂边区和五师的依托和后方。延安同边区与中原各地人员的往来，经费物资、交通运输的中转，经过竹沟，安全便利。在这个“红色据点”的掩护下，不仅吃的、住的、行程护照和给养不用担心，而且没有国统区警察、宪兵特务的盘查诘难。一段时间内，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均住在竹沟办公，既避免了敌后日伪军“扫荡”的危险，又排除了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干扰，更有利于领导工作的展开与实施。由于靠近领导，消息灵通，对于形势任务、方针政策的了解及时准确，可以事半功倍，成为安全稳定高效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

第二，为边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基础，为各条战线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一个和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从1938年春开始彭雪枫主持竹沟工作期间，除了扩大武装、整编八团队、开办教导大队培养干部之外，还大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在王国华、张震等同志协助下，取得了打开局面、打基础的成就。尤其使国民党信阳警备区三十二师夏华国团（原西北军一八八团）进驻竹沟10天，在我党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原则下，并施以以诚相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工作，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取缔竹沟留守处的阴谋不能得逞，该团深受教育，最终撤离。竹沟经过一场惊险斗争化险为夷后，形势更加稳定发展，成为我党统战工作极其成功的范例。

刘少奇到达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在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等协助下，取得了很大成就。

他主张，根据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当主要在上层进行，在军官中开展，注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工作，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改变土地革命时期，只在敌军士兵中秘密进行的做法。他从延安到竹沟，经过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了解到我党工作人员遭国民党顽固派绑架的情况后，即偕同彭德怀前往一战区长官部，与卫立煌联系，交涉放人，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途经南阳，听取豫鄂边区党委王阡西等有关对驻南阳蒋军十三军军长张轸进行工作，取得该军赠送我弹药、建立工作联系的汇报，该军在抗战初期，一直与我军友好，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率部起义，并协助程潜起义。接着又派豫鄂边区统战部的刘贯一，前往襄樊五战区李宗仁长官部，争取了李宗仁对我党我军敌后抗战的同情。到达竹沟后，又先后派遣豫鄂边区统战部长王恩九，展开对竹沟周围国民党各级军政首脑人物的工作，建立了统战工作关系，取得他们对我党我军深入敌后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如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丰、张克侠等，或接济我财物、或支援我武器弹药、或交换情报、或组建联合抗日剧团和战地服务团等等。七十七军工作团在团长朱大鹏（我党党员）率领下，在豫南一带活动，他们对我敌后根据地初期的发展、抗日武装的巩固和扩大，均起到良好作用。

在竹沟周围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和我党有统战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如：汝南专员张振江、南阳专员朱玖莹等。多个县级政府，如确山、桐柏、泌阳、镇平、南召、西华、信阳等。这对竹沟政治形势的稳定与抗日工作的开展，以及对豫鄂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直至1939年11月竹沟事变时，汝南专员张振江对于派兵进攻竹沟由拒绝执行，到消极应付，直到我军撤出竹沟后，才派一个大队开进竹沟走了一趟。六十八军一直不派兵进攻竹沟，当我竹沟部队突围经过其防区时，

还命令所属部队让路，使我军安全通过。

第三，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统一协调和组建武装力量。竹沟先后向五师和边区共输送干部3批1000余人。这些干部，有的从延安来经过竹沟到五师去的；有的从延安到竹沟工作一段时间后去的；有的则是由竹沟招收冀、鲁、豫、苏、皖已沦陷区和即将沦陷的华中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经过培训，分批输送到五师和边区的。时间大多在武汉沦陷前后至1939年底，正值豫南、鄂中、鄂东各县各抗日游击武装，尚处于分散、无统一番号、未形成统一组织领导之际。时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李先念和周志坚、谭子正率领的独立游击大队，就是竹沟留守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红军干部于1939年1月17日离开竹沟，开赴鄂中的。他们经过信阳四望山，在文敏生陪同下，做了信阳国民党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商定信阳挺进队和独立游击大队，在必要时统一指挥。2月又与刘子厚、姜光琦一同到大洪山，做李范一（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委员会委员）的统战工作，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使我鄂中党组织派到各县的干部，有了合法掩护。在小悟山青山口，与红军老战士许金彪组织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团。

1939年4月，陈少敏与中原局秘书栗在山，率领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和竹沟同来的50多名干部，共200余人南下，在安陆县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6月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建立了新四军游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对外打出了新四军的旗帜。

1939年10月，朱理治、任质斌、刘少卿等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及教导大队，共600余人，南下信阳四望山，并于11月中旬，由朱理治主持，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参加，召开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将上述三地区的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把上述三

地区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陈少敏任区党委代理书记（拟任书记郑位三因病未到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成为豫、鄂、皖、湘、赣边区抗战主力，直到1946年中原突围。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在豫鄂边区和五师发展初期，由竹沟派出的干部，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至于当时派到五师和边区的团以上干部，诸如：周志刚、王海山、方正平、韩东山、黄霖、黄春庭、钟伟、王友德、肖远久、冷新华、黄德魁、娄光琦、刘放、李人林、罗通、冯仁恩、余潜、许道琦、刘友海、夏世厚、张水泉等；地方县以上干部如：危拱之、夏忠武、吴祖贻、孙西岐、张旺午、王良、方毅、夏农苔、郭欠恒、徐达三等，都先后成了分区或地委、边区党委班子中的成员。大批青年干部，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汤池对创建豫鄂边区及新四军 五师战略支撑点的作用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须浩风

汤池位于湖北省应城县城西 50 里丘陵地带的一块小小的盆地上，三股从地底涌出清莹灼热的泉水，远远望去，犹如白玉化云，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颂为：“神女没幽境，汤池流大川”。这就是古称“玉女温泉”的汤池。1937 年冬，由我党实际领导，以国共合作形式创办的一所抗大式革命学校就建立在这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为我党在鄂中（湖北省中部地区）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此，党在汤池点燃了鄂中的抗日烽火。

1984 年 10 月 31 日，国家主席李先念欣然命笔题词：“汤池是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98 年 3 月，我们曾召开了“汤池训练班对准备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和经验教益”的座谈会，出席的有顾大椿、聂菊荪（易家驹）、夏菲、栗秀真、李蒿田、庞俊、胡冰和须浩风。何奇伟、吴文风因病住院请假。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参阅有关资料，整理一个初步史料，今年交以上诸位征

求修改，充实意见，后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再参阅了沈少华（即沈德纯）、何奇伟、庞俊、李荫田等同志的书面回忆，整理了这件历史资料：

一、汤池对豫鄂边区及五师的创建和发展所起的战略支撑点作用是以举办“汤池训练班”（原名“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为起点的

（一）汤池训练班的筹办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形势下，由我党的大力推动，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抗战，挽救民族的危亡。1937年9月，党中央代表董必武到武汉，12月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12月南京沦陷后，各种救亡团体及华北、华东各大城市的流亡学生，纷纷云集于武汉，一些爱国的国民党重要官员和进步人士，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投降政策极为不满，其中不少人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周恩来、董必武谋求救国之路。

汤池训练班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经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布置，取得国民党进步人士的支持，由陶铸同志正确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路线办起来的。它是统一战线的产物。

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当时任湖北省建设厅技正兼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的杨显东博士，认为武汉保不住，他主张国共合作，请共产党人相助训练农村合作事业人才，遂向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谈了他对抗战形势的估计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培训农村合作事业人员的想法，立即得到石瑛的赞同和支持。1937年11月，董必武辛亥革

命时期的老朋友石瑛在一天夜晚秘密地来访董老。董老和石瑛讨论了今后如何合作抗战，特别是如何利用建设厅这一机构做些抗日救亡有益的工作。石瑛反映，建设厅有一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经济。他对董老说，现在国民党政府训练出来的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只知做官，不会做事，希望用共产党的办法训练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通过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动群众抗战。他打算办这样一个训练班，得到了董老的支持。石瑛回建设厅，谈了农村合作训练班的事。当时杨显东建议，训练班可由李范一负责（李也是董老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因为李当时在汤池办农村改进实验区，与当地群众有一定联系。杨显东还建议：训练班必须由共产党派人领导。石瑛同意了杨显东的建议。杨显东即同孙耀华（当时是中国农民银行农村贷款部主任辅导员）于12月初去应城县汤池找李范一。李范一本来与石瑛交厚，自己又是农村合作委员会的委员，也对国民党政府训练出来的农村合作指导员只拿钱不做事不满，所以要他负责办训练班很愿意接受。只是对共产党来具体领导表示犹豫。后经杨显东、孙耀华解释说服，李范一终于同意了。杨显东、孙耀华在征得李范一的同意后，连夜去向董老报告，由于这事石瑛早已与董老谈妥了，当然得到董老的支持。不久，石瑛即正式提出此训练班设在汤池，定名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由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兼汤池农村改进实验区负责人李范一主持，学员的招收、训练等工作由我党派人负责，所需经费和学员结业后的分配问题由建设厅解决。据杨显东讲，当时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严立三）亦起了重要作用。当石瑛找董老达成共识之后，即与严重谈过，严表示同意和支持。汤池训练班得以及时具体办成，当时作为李范一得力助手的许子威做了许多具体工

作，和汤池镇所在地的应城县第三区区长李伯仁的支持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训练班的领导、方针、任务

周恩来、董必武决定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培养一批党的抗日干部，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准备。湖北省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深知此时培训干部是决定性的环节，并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可用来培养我党军政干部的好场所，立即自告奋勇向湖北省工委提出了去创办汤池训练班的要求，后经董必武的指示，湖北省工委研究，决定派陶铸去领导汤池训练班工作。陶铸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暴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他出色地组织和指挥过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并先后创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具有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

1937年12月初，训练班招生开始，陶铸在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口试，招收的学员们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12月中旬，第一批学员由陶铸率领乘轮船到达天门县的皂市，步行八里即到汤池，其余的学员也陆续由武汉来了。许子威陪同陶铸和李范一见面，并立即将陶铸安置在和李范一毗邻的房间住下。

陶铸在开学前，与李范一商量，成立了训练委员会，由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任教务主任、许子威管总务、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筹措经费。训练班对外由李范一向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由陶铸领导。

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正式开学。陶铸亲自抓训练班的教学方针、教学任务，指出：“办这个训练班固然是培养合作指导员，但更重要的要通过一个月的短期训练，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的青年，要在他们中间发现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把他们吸收入党，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和领导这批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力量，通过农村合作去接近群众，组织群众，开展

广泛的抗日游击战，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原，赶出中国！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陶铸还规定了训练班的学习内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钻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刻苦掌握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以及如何从事党的建设和发动、组织群众等等；同时也要学合作社的章程业务。由于陶铸在此努力贯彻党中央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抗大为榜样，领导这个训练班（包括后来的临时学校），从培养革命抗日干部、恢复与发展党组织到筹建武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并与后来以杨学诚为首的中共鄂中特委的共同领导下，将汤池变成为准备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战略支撑点。

二、汤池为发动鄂豫边区及五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

（一）利用合法地位，培养革命的抗日干部

汤池训练班培养干部的目标，主要是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依靠群众的观点，密切联系群众，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等。训练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农民运动、统战工作、游击战术和合作社业务等。内容包括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中国农村的性质和现状，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方法，军事方面注重游击战争的研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先后派曾霞（即曾志）、雍文涛、刘顺元、李华、陈辛仁等一批干部，另外还有许子威、沈少华、童世光、蔡承祖、吴声凯到汤池训练班任教员和行政工作。陶铸经常给学员讲课，要求大家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为了真正弄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抓住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组织学

员进行专题讨论，使他们逐渐对革命产生正确的认识。在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方面，陶铸不仅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学员，而且经常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气节教育。一些青年的人生观在这革命熔炉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李范一先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十分感慨地对陶铸同志说：“这个办法好！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抗战一定会胜利！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不愁办不成大事！”并写了一幅条幅赠陶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表示对陶铸同志感激钦佩的心情。

训练班第一期学员 60 余人，于 1938 年 1 月 20 日结业，当时没有马上分配，而是组织他们到应城的膏盐矿区、陈家河、巡检司、田店、长江埠、杨王岭等去实习，让他们进入矿区去体味工人生活，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进行社会调查。陶铸亲自冒着风雪，到各实习点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鼓励他们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

第二期开学的时间，与第一期毕业为同一天，这一期学员也是 60 多人。学员的来源，仍是各地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另外，这一期还吸收了一批旁听生。第二期训练班于 1938 年 2 月 20 日毕业，连同第一期毕业的同学，由省建设厅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鄂中应城、京山、天门、汉川、荆门、钟祥、安陆、云梦等县。

第三期开学时间，也是第二期毕业同一天。学员的来源与第一、二期略有不同，为了培养地方干部，所以这期除吸收一批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外，还着重吸收了一批当地的知识青年。因此第三期学员较多，共 110 多人，编为 4 个队，其中一个女生队。第三期在学习期满后，在应城各合作社实习数日，全部委派为农村合作指导员。由于人员增多，工作范围扩大，就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把原来在应城县工作的若干同志抽出来带领第三期部分

学员到鄂西荆门、远安、宜昌、恩施、建始等县去开展工作。另外抽调第一期和第三期同学 20 余人，由李华和沈少华率领到武昌，准备分别到鄂东、鄂北两地开展工作，到武昌后，石瑛发现他们只 20 个人，力量不足，就要他们在武昌再办一期，人数定为 100 人。陶铸接到他们的报告不久，就亲自到武昌来领导。

这一期训练班通常称它为汤池训练班第四期，人数约 100 人，其中除吸收一批流亡武汉的大学生外，还吸收了一批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毕业和七里坪党校的同学，他们参加训练班受训，主要是为了取得湖北建设厅的名义，以便于取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合法身份。这一期训练班是 4 月中旬开学，5 月中旬毕业，庞俊带 40 位同学先分配去鄂北工作，另外，同学们毕业前到武昌青山区实习一周，以后分赴鄂东、鄂北两地开展工作。

由于汤池训练班的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子福、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等要员，先后以巡视、访问为由，到汤池进行调查，寻找扼杀借口。蒋介石为此质问王明，“你们在延安办了抗大，在这里还办什么训练班？”王明顺从蒋介石旨意，竟指责陶铸太“左”了，要汤池训练班立即停办。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断威胁石瑛，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经费，在这样双重压力下，汤池训练班于 1938 年 3 月被迫停办。陶铸愤慨不已，坚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坚决表示：“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用别的名称；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惟独内容不能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抗日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他同李范一协商，决定用余下的经费，继续在汤池开办一个以补习文化为名的“临时学校”。周恩来、董必武对这一行动给予大力支持。

1938年4月中旬，汤池临时学校在汤池夏家庙正式开办。陶铸任校长（后为童世光），蔡承祖任副校长，教务主任须浩风，总务主任李守慈、李逊夫，其他负责人及教员有沈少华、吴声凯、李苍江、潘乃斌（潘琪）、林镇南、余一梦、胡笃仲、吕谨、张烈、李平等。这所学校的开办，既及时满足鄂中各地失学青年积极学习要求，又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愿望。在夏家庙、九龙庙、龙溪彭家祠堂三个大队，每队经常保持80余人，全部是鄂中各地的进步青年。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学期不限，只要工作需要，随时可以分配，但每个队总保持80余人。到1938年10月，应城县沦陷前夕为止，临时学校向鄂中各县、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鄂东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输送干部、学员，前后共计300余人。

这样，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共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先后分别派到鄂中、鄂北、鄂东、鄂西各县，以发放农贷为“敲门砖”，在农村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群众的活动，播下革命种子，特别在鄂中地区，为武汉沦陷前后及时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干部准备，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许多同志后来成为豫鄂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骨干，还有一些同志在斗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以汤池训练班为基地，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准备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坚强的基层领导核心重建和发展鄂中地区的党组织，是汤池战略支撑点一项重要任务，而这项工作的展开是在陶铸领导下与训练干部同时进行的。

随陶铸从武汉最早到汤池的共产党员有曾志、刘顺元、李华、顾大椿、刘慈恺、夏菲、郑速燕、童世光等。训练班一开

始，陶铸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训练班开学的第二天，陶铸就领导在党员中建立了党小组，由顾大椿任组长。1937年12月下旬，汤池训练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在学员中培养进步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了迅速将党的工作扩大到鄂中各地，1938年2月建立了中共汤池特别支部，童世光、蔡承祖先后担任特支书记。陶铸代表中共湖北省工委领导两个支部。这时，训练班毕业的一、二期学员分赴鄂中各县，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牢记陶铸关于“应当把办合作社当敲门砖，敲开共产党组织的大门”的指示，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合法身份，一边办农村合作社发放贷款，宣传抗日救亡；一边联系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老党员、老红军、各种进步人士在农村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并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团结各阶层和开明士绅，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识字班、训练班，广泛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扩大党的工作基础。鄂中特别支部以汤池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党员为核心力量，很快在应城、荆门、京山、钟祥、天门、安陆建立了六个党支部、两个党小组。1938年4月，建立了中共鄂中中心县委，1938年6月中共鄂中中心县委扩大为中共鄂中特委，刘青、何彬、杨学诚先后任特委书记、顾大椿任宣传部长、蔡承祖任组织部长，特委机关仍设在汤池临时学校内，从而统一了鄂中党的领导。

鄂中特委以应城矿区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发展了鄂中各县的党组织。在应城，鄂中特委派蔡承祖、沈少华深入矿区，恢复了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邓先柱、戴惕安等的组织关系，吸收了蔡松云（现名蔡斯烈）、安琳生（后名余秉熹）等人党建立了潘家集党的小组；直属鄂中特委领导。此后建立了中共应城矿区区委，徐休祥任书记。1938年7月中共京山工作委员会建立，顾大椿任书记。同年同月中共钟祥县委重建，刘慈恺任书记。荆门县委重建，郑速燕任书记。1938年夏，中共天门区委组建，童世光

任书记，童调离后，曹志坚任书记，安陆成立了中共安陆特别区委，由肖松年负责。8月，中共随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陈秀山任书记。10月，中共天汉工作委员会组成，童世光任书记。至1938年10月，在中共鄂中特委领导下，建立了三个县委、两个区委及三个工作委员会，共有党员300余人。

在恢复和建立鄂中11个县党组织的同时，陶铸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进一步注意外县党组织的发展”决定，又将汤池训练班的学员遍布到全省32个县、市（不完全统计）。陶铸和中共鄂中特委，以汤池为策源地，以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的党员为骨干，帮助各地重建和发展党组织，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坚强的基层组织。

由于陶铸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到王明的打击迫害，1938年5月，陶铸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降为一般党员，并指示鄂中特委要敢于领导他。在此情况下，陶铸同志向省委表示，在组织上服从党的决定，但在思想上，仍保留原来意见。在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9月，王明又要将陶铸调离鄂中。周恩来鉴于武汉沦陷在即，进行了干预，要陶铸留在宜昌待命，以便随时返回鄂中领导游击战争。陶铸同志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为鄂中人民所崇敬，是汤池战略支撑点上实际上的主心骨。

（三）积极准备组织武装，发动游击战争

陶铸在汤池训练班，准备敌后游击战争的思想非常明确，坚持以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全体学员，在共产党员中明确进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训练班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训练，把游击战争的理论作为主要课程。

1938年春，陶铸经征得李范一的同意，拿了汤池农村合作社资金3600元，通过董老委托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买了24支德国造驳壳枪，积极准备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夏，陶铸亲自率领训练班的李守慈、林镇南深入大洪山勘测地形，绘制了三十几张军用地形图为日后创立抗日根据地做准备。陶铸在汤池训练班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为组织和发动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思想、干部、组织、物质等方面的准备。1938年7月至10月，武汉外围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中共鄂中特委及陶铸、杨学诚领导下，鄂中地区的武装准备工作以应城矿区、陈家河、京山石板河等地为重点，加紧进行。在应城矿区，潘家集党小组以护矿为名，秘密组织工农进步青年，开展军事训练，蔡松云、戴惕安、安琳生等人到京山县丁家冲、猴子凹一带察看地形，选择抗日据点。在陈家河，以汤池训练班一、二期结业学员12人组成农村合作小组，组长汪心一，在农民、渔民、矿工、青年知识分子、地方上爱国人士，乃至封建帮会组织——“汉流”中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准备组织武装。

1938年10月1日，武汉危在旦夕，中共鄂中特委在杨学诚主持下，在应城矿区潘家集蔡松云家的盐矿棚内，召开了紧急的特委扩大会，出席的有顾大椿、蔡承祖、刘慈恺、童世光、郑速燕、邓先柱、陈秀山、沈少华、蔡松云（最后一天列席）。会议通过了“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10月21日，日机六架轰炸应城，国民党县长鲍福田弃城面逃。而中共鄂中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五支武装队伍，纷纷集中到京山县的山区石板河乡丁家冲。

10月23日，应城潘家集党小组以八条枪，蔡松云为首十三个人打出“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旗号，由杨学诚、沈少华率领奔赴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第一个据点京山丁家冲，建立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支抗日革命武装。

应城矿区邓先柱等组织矿区北山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收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一挺机枪、步枪十余支，组成的一支二十余人的工人武装，迅速奔赴丁家冲，汇入杨学诚亲自率领的部队。

应城陈家河由汪心一领导的党小组，帮助汉流郭仁泰、姜泽如分别在陈家河湖区、矿区西山一带收集了几十支枪，组成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大队，姜、郭任正副大队长，汪心一任政治主任，他们迅速发展到了150余支枪，也即上山到京山县丁家冲来了。

京山石板河，由李蔺田等建立发展起来的京山石板河党支部，在党员徐履青、黄定陆（原为联保主任、汉流大哥）等人的领导下，利用手中掌握的石板河的联保武装和民间防匪武装，加上收集溃军丢弃的枪支，组成了有50余支步枪、五支手枪、一挺机关枪的京山自卫队于1938年10月24日挺进丁家冲。

原汤池24支驳壳枪，由许子威、鲁尔英组织天门皂市米厂工人、汤池小学教师及附近进步农民并收编汤池原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第二中队组成的70人的汤池抗日游击队，暂移天（门）汉（川）湖区一带活动，后也来到了京山丁家冲。

这五支武装都是中共鄂中特委由陶铸、杨学诚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有组织有准备发动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的初步形成，为创建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8年11月上旬，陶铸从宜昌返回鄂中，在丁家冲受到热烈欢迎。鄂中特委分工他负责军事。1938年11月末，上述几支武装统一整编为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孙耀华任应城县县长兼总队长，许子威任副总队长，孙耀华不久调走，许子威任总队长，张文津任参谋长。“应抗”在陶铸及鄂中特委的领导下，高举抗日大旗，驰骋于应城、京山、钟祥、安陆、云梦之间。

1939年3月底，陶铸亲自指挥了京山公安寨伏击日军的战

斗，击毙日本皇族劳军团团长（日本皇室贵族）和日军 20 余人。

1939 年 4 月底，陶铸又亲自率领“应抗”一、三支队，夜袭云梦县，首创了攻破敌占县城的战例，极大鼓舞了民众，建树了军威！

“应抗”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经过三次整编，到 1940 年初，迅速发展到了 3000 多人枪。

1939 年 6 月，李先念、陈少敏分别从豫南率部南下鄂中，在京山县大山头与“应抗”会师，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应抗”三支队（蔡松云部）和京应独立中队（黄定陆部）改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三团队，蔡松云任团长，黄定陆任副团长；杨焕民任政委，陈一震、吴若岩先后任政治处主任；“应抗”四支队（张文津部）和原新四军挺进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团队，张文津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1940 年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原“应抗”一支队（郭仁泰部）和第二支队（徐休祥支队）先后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六团队和八团队。中共钟祥县委（书记刘慈恺）组织的抗日武装于 1939 年 4 月编入“应抗”第四支队，7 月又编入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队。

至此，“应抗”共向新四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四个支队，3000 余人枪的武装力量，为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夺取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抗日阵营

首先，汤池训练班的倡办、办成、办得有成绩，主要是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陶铸对李范一的自始至终的团结合作，对国民党派来监视训练班的应城县教育局督学张谦光，在陶铸讲学的革命熏陶下，张谦光成了一名积极的学员，并入了党，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应城县党部书记长彭绳武，教育界的李必烈、李必超等都来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训练班

分配到鄂中、鄂东、鄂北的学员，在各县工作，都很注意统一战线，很快团结了广大群众。

陶铸等同志在鄂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有国民党的中下级军政人员；既有爱国的进步人士，也有各种各样的中间势力甚至可以利用的个别顽固分子，为了壮大抗日力量，陶铸注意做“汉流”会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绩。

“汉流”是一种帮会组织，在鄂中分布很广，影响很大。陶铸认为“汉流”骨干多系流氓无产者，其余大部分都是工农群众，必须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否则，一旦为日伪利用，就会成为我党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大障碍。在他的倡导下，中共鄂中特委成立以沈少华为主任的鄂中汉流工作委员会，并决定部分同志有计划加入“汉流”组织（蔡松云、汪心一、陈秀山加入后，成为“汉流”大哥），并把争取重点放在鄂中势力最大的“九龙山大寨主”郭仁泰身上。

争取“汉流”会团结抗日，其中有最成功的两例：

一是京山的黄定陆。他是“汉流”九龙山的寨主，龙头大哥，可以设香堂收弟兄，在石板河、黄家畈一带很有影响。对参加抗日有一定积极性。1938年3月，陶铸先后派沈少华、李蔺田等同志以“合作社指导小组”的名义前往京山做黄的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黄的思想有很大进步，拥护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石板河地区的局面便随之打开。黄于当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沦陷时，黄定陆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集合了石板河联保处、黄家畈防匪自卫枪支，以及国民党溃兵丢弃的枪支，编为京山县自卫队，到丁家冲与杨学诚率领的武装会合，为开拓京山县东北山区的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二是应城的郭仁泰。他也是能设香堂收弟兄的“汉流”会九

龙山寨主、龙头大哥，在应城陈家河一带很有影响。国民党借口安定后方，取缔“汉流”会，逮捕了郭仁泰、沈少华。根据陶铸的指示，通过李范一和矿区区长的关系，向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将郭仁泰保释出狱。郭得知陶铸为了抗日而救他，感激不尽，表示愿与陶先生一起上山打游击，共同抗日，并对我党在应城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和帮助。武汉沦陷时，郭仁泰在我党组织汪心一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汉流”会的弟兄，拉起了一支队伍——“应城游击司令部第一支队”，后来发展到数百人枪，编为“应抗”第二大队。1939年春节前，盘踞京（山）应（城）日寇全部出动，向石板河、丁家冲、熊家滩、八字门线，对我抗日根据地行大“扫荡”，当敌人发动进攻时，郭仁泰跟着部队当了伪军，后经做了工作，又从伪军中拉了过来，变成了新四军，郭仁泰也随之过来，当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六团团长。1940年8月，郭仁泰离开六团，再也没有回来。但他的那支部队，早期对开展鄂中游击战争，还是起了作用的；后经改造，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

由于争取了黄定陆、郭仁泰二人参加抗日，以及他们的影响，应城、京山、天门、汉川等地的汉流多数采取了和我党合作的态度，从而减少了阻力，对我们开辟山区工作，巩固后方很有帮助。由于我党对“汉流”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对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争取爱国矿商的合作，筹集抗日经费

从开办汤池训练班、临时学校到组建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是靠爱国工商业者的捐助来解决的。

汤池训练班的经费，除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发给部分外，教员的生活费和办公费用，则由省棉业改良场场长、进步人士杨显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节约分行经费中开支，另汉口上海银

行经理周苍柏乐捐 3000 元，每月由杨显东亲自送到汤池。后来办汤池临时学校，经费也靠社会捐助解决。陶铸一开始就重视应城膏盐矿区的工作，因为矿区是工人集中的工业区，又是经济来源富裕的地区，就成了鄂中党的工作重点。1938 年 11 月，党派沈少华等到应城膏盐矿区对爱国矿商募捐抗日经费，我们则严格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部队的供养。由于进步矿商龙镜明、陈愚安等的带头，工作进展尚顺利。1939 年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鄂独立游击支队南下，人数增加，应城盐矿商的抗日乐捐由每月 10000 元，逐步增加到 125000 元，大大缓解了我军经费短缺的困难。所以鄂中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是与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汤池训练班，从 1937 年 12 月 20 日在应城汤池正式开学，至 1938 年 10 月停办，为鄂中及湖北各地共培养了 600 多名抗日干部；恢复和发展了鄂中各地的党组织，“应抗”为新四军五师主力队输送了 3000 余人枪以及鄂中人力、物力的支持，为准备发动鄂中及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鄂豫边区的三大战略支撑点之一”，而载入了革命的光辉史册。1984 年 10 月 31 日，当时国家主席李先念欣然命笔，题词“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鄂中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夏 夔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大环境中创建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自从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后，鄂豫边区就没有成建制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来打开局面，配合当地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政权而创建、发展根据地。它的特点，正如边区创始人之一的陶铸同志所说：“鄂豫边区的初建过程，完全是由在武汉失守后，留在敌后鄂中、鄂东、豫南三处的共产党人及各界抗日先进，积极发动与组织游击战争，组织抗敌的民间武装，在敌后打击敌伪，组织民众，恢复政权，在这种基础之上创造发展起来的。”原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任质斌同志也说过：“五师的创建，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做基础”，“是在武汉沦陷之后，由几支小部队‘滚雪球’滚起来的”。

鄂中抗日根据地不仅是鄂豫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发祥地之一。抗战初期鄂中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开展鄂中根据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鄂中根据地地处平汉铁路以西，汉水（襄河）以北以东，河南桐柏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有应城、京山、钟祥、安陆、应山、云梦、汉川、天门等十多个县；是湖北的腹地，武汉的屏障。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拥护。国民党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使我党得以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党中央派董必武同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达武汉，一面指导鄂豫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工作，一面着手恢复和重建湖北的中共党组织；同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陶铸是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性领导人；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则是鄂中抗日根据地得以开基创业的真正“法宝”。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为达到其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野心，又集结重兵向武汉进逼。周恩来、董必武和湖北省委考虑到武汉周围地区甚至武汉三镇可能沦陷，必须在农村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被称为鄂豫边区三个“战略支点”之一的汤池，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创办了闻名全国的汤池训练班，它是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摇篮，也是我们党在鄂豫边区开展统战工作的范例之一。

1937年11月，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石瑛前来拜访，两人恳谈抗战救亡之道。石瑛对中国共产

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表示赞同和钦佩；并说他所属的农村合作委员会的那些国民党的指导员，只会做官，不干实事。经董必武同志做工作后，石瑛同意用共产党的办法来训练、培养一批新型的指导员。经周恩来、董必武的积极支持和进步人士、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李范一的全力赞助，双方议定在鄂中应城县的汤池开办一个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李范一任训练班主任，中共湖北省工委派陶铸同志去主持工作。

党派陶铸去汤池训练班主持工作，除了他的才干和魄力外，还出于准备在鄂中发动游击战争的考虑。陶铸是黄埔学生，懂军事，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在苏区做过军事工作，领导过游击战争，有战斗经验。实践证明，陶铸的这些长处在发动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鄂中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在鄂中地区，陶铸等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充分利用合法地位开办训练班，培养革命干部。1937年12月17日，陶铸亲率在武汉招收的60多名学员到达应城汤池。20日，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开学。这期学员多数为平津各地的流亡学生和武汉等地的知识青年。教员都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来的，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随同陶铸前来汤池的共产党员有曾志、刘顺元、李华、陈辛人、顾大椿、刘慈恺、夏菲、郑速燕、童世光等，他们分别在训练班担任教员或参加学习。汤池训练班课程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农村信贷工作、群众工作、游击战术等以及唱抗战歌曲、演抗战戏剧等课外活动。训练班还组织小分队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周围农民的抗敌精神。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工作，培养骨干，训练班

在学员中建立了党支部，努力发现和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的青年；并在其中吸收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汤池训练班的创办及其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不安和惊恐。特务头子康泽、徐恩曾等均先后窜到汤池进行侦察和监视，蒋介石出面干涉，他责问王明：“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汤池训练班这样搞，影响统一战线。”处处迁就国民党，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竟不分是非地胡说：“陶铸太‘左’了！汤池训练班不要讲共产党，不要讲游击战争，只讲农村合作发放农贷就行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于是，汤池训练班办了短短的三期就结束了，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也停发了经费，终止了“合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但是陶铸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他认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不能放弃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坚信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并武装起来，才能有效地拖住日寇西进的后腿。于是他置蒋介石的责难和王明的批评于不顾，继续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进。他说：“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惟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陶铸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的赞同和支持。在李范一的大力配合和协助下，在武汉又办了第四期汤池训练班，不久又在汤池夏家庙办了一所由童世光、蔡承祖、须浩风等负责的与汤池训练班同样性质的临时学校，前后一共有600多学员毕业，先后分别派到鄂中、鄂北、鄂西各县，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以发放农贷为“敲门砖”，在农村广泛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发动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陶铸还派出工作组，在应城等地举办了保甲人员

训练班，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游击战术为主要学习内容，培训了一批农民骨干。

陶铸等在鄂中地区除大量培训抗日骨干外，还以汤池训练班为基础，通过多种关系，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陶铸深知，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发挥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破坏和镇压，在鄂中已无共产党组织存在和活动，少数党员已和党组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重建和恢复党的组织，陶铸除了在汤池训练班学员中建立有党的支部外，1938年2月，又成立了中共鄂中特别支部，以领导地方党的工作。汤池训练班党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鄂中各县，其中的共产党员以“合作指导员”的合法身份，努力进行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他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土地革命后期失去组织关系的一些党员的情况，使一些老党员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组织生活，又吸收了一些青年加入共产党，于是“合作指导员”所到之处，很快就有了党的组织。应城、京山、钟祥、天门、安陆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区委、工委和县委，党员达250余人。

1938年6月，屈从于国民党压力的王明，把陶铸排除于湖北省委领导班子之外。9月，王明把陶铸调离鄂中。周恩来进行了干预，要陶铸留在宜昌待命，以便随时返鄂中领导游击战争。10月1日，武汉形势由于日寇逼近而岌岌可危，以杨学诚为书记的鄂中特委，落实董必武关于赶快在武汉沦陷后抓枪杆子的指示，通过了“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会议，进一步抓紧在鄂中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会议，进一步抓紧在鄂中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会议。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行的。陶铸在创办汤池训练班时，一手抓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一手积极组织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和发展统一战线。由于面临日寇一天天逼近，形势紧迫，但共产党人还是赤手空拳的现实，陶铸为了

迅速取得武器，组织武装，征得李范一的同意，从汤池合作社拿出准备发放的农贷资金 3600 元，通过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从香港买到 24 支驳壳枪，这些枪运回汤池，加上当地党组织掌握的一部分乡保武装，在武汉沦陷前夕组织了“汤池抗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应城矿区的共产党员蔡松荣，根据鄂中特委的指示，以护矿为名，私人购枪八支，于 10 月 23 日成立了“潘家集商民自卫队”，这是鄂中党组织掌握的第一批武装力量。

1938 年 10 月 25 日—27 日，日寇侵入武汉三镇，并向西向南发动所谓“追击作战”，对周围城镇狂轰滥炸；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政府机关闻风逃窜。很快，鄂中、鄂南包括孝感、云梦、安陆、应城、京山等县在内的 28 座县城先后沦陷，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使命落在共产党人的肩上。

1938 年 10 月 23 日，应城沦陷前夕，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带着由 8 条枪、13 名矿工组成的潘家集自卫队撤退到京山的丁家冲；几天后，中共应城矿区中心区委领导的一支由矿工、农民组成的队伍，在邓先柱、陈瑞云率领下，背着刚捡起的被国民党溃兵丢弃的十余支枪也到了这里。京山县的共产党员黄定陆集合了石板河乡联保处的联保队和 16 条枪，编为京山抗日自卫队，也开进了丁家冲。丁家冲成了鄂中开展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基点。

11 月上旬，陶铸从宜昌返回鄂中，在丁家冲受到热烈欢迎。鄂中特委随即决定由他负责军事，不久，在应城沦陷时转移到汉川沟江湖活动的由 24 支手枪武装起来“汤池抗日游击大队”在鲁尔英率领下也来到丁家冲会合。原应城县政府常备队、安陆巡检司商民自卫队以及由“汉流”大哥郭仁泰组织的武装等数支拥护抗日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到丁家冲。陶铸以他的军事才能和经验，学习红军的办法，在部队中建立党支部、进行军政训练，整顿作风纪律，不到两个月，陶铸提出的“为一百支枪而奋斗”的目标已大大超过，鄂中特委所掌握的武装已发展到 500 人枪。

1938年11月间，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时任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尚有一定的抗战热情，其防区包括鄂中大洪山及豫南桐柏山地区。由于李宗仁的桂系和蒋介石的嫡系存在着矛盾，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布置，由共产党员钱俊瑞、胡绳等去五战区，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统战工作，后来李宗仁又接受了我党的建议，于11月17日成立了“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在豫鄂边的13个县的范围内，动员和武装民众支援抗战。李范一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政治指导部部长，武大教授李相符为副部长，他们聘请陶铸任政治指导部顾问。这就为我党在鄂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提供了颇为有利的条件。原汤池训练班的一些干部成了政治指导部的工作人员和主要骨干；政治指导部又推荐拥护抗日的进步人士孙耀华为应城县县长。鄂中特委将所掌握的应城、京山、钟祥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以孙耀华为司令，共产党员张文津任参谋长，这是当时由我党领导的、国民党五战区认可的一支“合法”武装。也是统战工作的一大成就。

12月上旬，日军数十人由京山宋河镇侵扰丁家冲，“应抗”二大队给敌人突然袭击，毙伤日军4人，打响了鄂中敌后抗战第一枪。1939年3月31日，陶铸指挥“应抗”一部在京山公安寨伏击日寇百里余人组成的船队，毙敌慰问团长10余人。5月1日又袭入云梦县城，歼伪军20余人，解救群众多人，这是抗日军队在鄂中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这些胜利，使日本侵略军大为震动，部队战斗力得到锻炼，特别是大大增强和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信心和热情；青年纷纷参军，力量进一步扩大。

在鄂中，除了“应抗”以外，我党通过统战工作，掌握的抗日武装还有：由负伤返乡的红军干部、共产党员许金彪组织的孝感中和乡抗日自卫队，应山县政府抗敌自卫第二大队，汉川县自

卫第三中队，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以及第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队和第五战区第一行动部队等。

抗日武装创建以后，面临的第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抗日经费的保障。为此，陶铸等通过统一战线，广泛争取爱国工商业者的合作，筹集抗日经费。共产党在鄂中创基立业，可以说是“手无寸铁，身无分文”。从开办汤池训练班到组建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是靠爱国工商业者的捐助来解决的。

汤池训练班的经费，除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发给少部分外，教员的生活费和办公费用，则由省棉业改良场场长、进步人士杨显东（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节约部分行政经费中开支，汉口上海银行经理周苍柏乐捐 3000 元，每月由杨显东亲自送到汤池。接下来办汤池临时学校，经费全靠向社会募捐解决。

以后随着抗日武装的组建发展，要吃饭、要穿衣，经费从何而来？国民党当然是分文不给的，只有自力更生。1938 年 11 月，党派沈德纯等到应城膏盐矿区对爱国矿商做工作募捐抗日经费，我们严格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矿商晓以大义，请他们每月乐捐一万元（法币），以保证部队的给养。由于有进步矿商龙镜明、彭正模、龙作云、陈愚安等的带头，工作进展顺利。1939 年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南下，与“应抗”等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人数增加，法币开始贬值，应城膏盐矿商的抗日乐捐由每月 10000 元，增加到每月 45000 元，1940 年 2 月每月又增加到 85000 元，1941 年又增加到每月 125000 元，大大缓解了我军经费短缺的困难。

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鄂中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是与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陶铸等同志在鄂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有国民党的中下级军政人员；既有爱国的进步人士，也有各种各样的中间势力甚至顽固分子，为了壮大抗日力量，陶铸特

别注意做“汉流”会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绩。

“汉流”是一种帮会组织。其起源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些有民族意识的人为了反清复明而组织的秘密团体。明是汉族，故称“汉流”；明初年号“洪武”，故“汉流”亦称“洪帮”。其成员多数为劳动人民和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在鄂中分布很广，影响很大。陶铸考虑到“汉流”会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反抗性的一面，如果引导得好，也可能参加抗日，形成抗战力量，因此，专门成立了由沈德纯同志负责的“汉流工作委员会”，积极做“汉流”会的工作，对其加强领导，加强改造，争取团结抗日。其中最成功的有两例：

一是京山的黄定陆。他原是国民党京山县石板河乡的联保主任，又是“汉流”双龙山的寨主、龙头大哥，可以设香堂收弟兄；在石板河、黄家畈一带颇有影响。黄定陆因不受国民党信任而被解职，正在家乡设私塾教书，对参加抗日有一定的积极性。1938年3月，陶铸先后派汤池训练班的沈德纯、李蔺田等同志以“合作社指导小组”的名义前往京山做黄的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黄的思想有很大进步，拥护我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石板河地区的局面便随之打开。黄于当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沦陷时，黄定陆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集合了石板河乡联保处的16支枪，黄家畈防匪自卫步枪20余支，以及一部分国民党溃兵丢弃的枪支，编为京山县自卫队，到丁家冲与杨学诚率领的武装会合，为开拓京山县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二是应城的郭仁泰。他也是能设香堂、收弟兄的“汉流”会九龙山寨主、龙头大哥。在应城陈家河一带很有影响。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借口安定后方，取缔“汉流”会，逮捕了郭仁泰、吴文安。沈德纯根据陶铸的指示，通过李范一和矿区区长的关系，向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将郭仁泰等人保释出狱。郭得知是陶铸为了抗日面救他，感激不

尽，表示愿与陶先生一道上山打游击，共同抗日，并对我党在应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和帮助。武汉沦陷时，郭仁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汉流”会的弟兄，搜罗武器弹药，拉起一支队伍——“应城游击司令第一支队”，接下来发展到数百人枪，编为“应抗”第二大队。虽然郭仁泰本人在日伪军残酷“扫荡”下，经不起考验，自行离队，但他的那支部队，早期对开展鄂中游击战争，是起了作用的；后来经过改造，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团队。

由于争取了黄、郭二人参加抗日，以及他们的影响，京山、应城、天门、汉川等的“汉流”会多数采取了和我党合作的态度，从而减少了阻力，对我们开辟山区工作，巩固后方很有帮助。由于我党对“汉流”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对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

正当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处在关键的时刻，党中央于1938年9月底到11月初，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政治路线；批判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倾向，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以统一领导开展华中敌后的游击战争。1939年1月，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两个中队及60多名干部共160多人向武汉外围挺进，负责领导中原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南进途中，李先念于2月

亲赴均川做国民党专员石毓灵的统战工作，并与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政治指导部长李范一，进行彻夜恳谈，共同签订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该会名义开展活动。回程途中，李先念拜访了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商讨团结合作、协同作战问题，为两军日后友好合作抗日打下了良好基础。陈离还送李先念15瓦电台一部和所需的军用地图。5月，李先念率部到达赵家棚，立即张贴布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同时通过国民党安陆县区长兼游击支队长杨弼卿，召集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各区区长及开明绅士开会，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战事宜。李先念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鄂中敌后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这时，鄂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奋斗，根据地已初步形成。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应抗”已发展到四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加上其他武装，共约两千余人枪。在应城、京山、钟祥、安陆、云梦、汉川、汉阳等县，成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部分地区成立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使鄂中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良好局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形势严峻。鄂中特委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一部到达京山大山头，与鄂中特委及“应抗”三、四支队会合，于6月中旬在养马畈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等问题的指示，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公开打出新四军番号，按照中原局决定，鄂中党领导的“应抗”及其他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为挺进支队），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为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中原局号召鄂中党“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大与创

立一支 5000 人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从此，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

鄂中党创建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立足生根，主要是由于陶铸、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同志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因而成绩显著，经验宝贵。

(1) 必须“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鄂中党一开始就牢牢掌握了这个大方向。从董必武说服石瑛创办汤池训练班，派陶铸去主持训练班工作，在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到通过李范一同意拿钱到香港购买枪支以及争取五战区成立“豫鄂边区抗战工作委员会”等等一系列工作，无一不是为了准备在鄂中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果离开了这个大方向，为统战而统战，结果只能是“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帮了国民党的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极不利于抗战。

(2)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开办汤池训练班的问题上，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反对迁就国民党的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做法；同时也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破坏，坚决按我们的一套办法，像“抗大”那样办学。在发展武装问题上，坚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未打出新四军旗号之前，尽可能争取合法，但要警惕和防止国民党收编、吞并，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例如我党领导的原京山县政府特务二中队，1939 年 1 月，顽固派企图吞并，经过

斗争、交涉，将该中队调出作为抗敌工作委员会军医院的警卫部队；但也有反面教训；原汉川游击大队企图“合法解决给养”，受编为国民党军一二八师独立团，但没过几天，1939年5月即被一二八师缴械，干部几乎被全部杀害。

(3) 坚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的策略。在开展统战工作中，我们团结了李范一、孙耀华、杨显东一批进步人士，与之真诚合作；争取了石瑛、周苍柏等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能在汤池开办训练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对于在汤池训练班进行破坏活动的顽固分子，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陶铸说：“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因而得到李范一等人的全力支持，又在武昌办了第四期，在汤池另办“临时学校”，使更多的青年受到革命教育。孙耀华担任应城县长后，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法化，鄂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后来国民党背信弃义将孙撤职，而我已在应城立足生根，得到广大群众拥护，顽固派委任的反共县长曾宪成在声势浩大的“拥孙拒曾”运动面前始终不敢到职。

(4) 十分注重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道：“共产党人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鄂中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在统战工作中可以说是忠贞不渝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而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李范一当时就讲过：“要抗战，就要团结、进步，就要学习和依靠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分子，不愁办不成大事”。李范一对陶铸的高贵品质与人格力量尤为敬佩，他手书一条幅赠与陶铸：“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直贴在陶铸的宿舍墙壁上，又如国民党为了破坏汤池训练班，曾派应城县督学张谦光到训练班“听课”，实际上是监视共产党的活动。张谦光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旧社会知识分子，他在“听课”的过程中，对国共两党作了相互比较，在实践中摸索、探讨真理，他深深被共产党的救国理论和革命精神所感染，找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所在，毅然决然倒向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正义道路，张谦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区长、县长、专员、抗战胜利后又担任党的地委书记，解放战争初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如原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在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几个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的：“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原五师副政委任质斌总结五师抗战实践经验时也说过，五师在敌顽夹击险恶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泛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另一条是放手还击坚决反共少数顽固部队。”我们今天回顾这一历史，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指导思想，统一战线仍然是今后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宝”。

铁军战旗飘扬豫鄂边

——浅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建与发展

马 焰

60年前，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新四军第五师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在武汉外围敌后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这是中原地区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里程碑，对进一步发展、巩固与扩大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一、冲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束缚，豫鄂边共产党点燃了中原敌后抗日的星星之火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挺进华北沦陷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深入大江南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徐州失守后，日寇继续西进，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发展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豫鄂边区地处中原腹地，南扼长江、北带淮河、东临苏

皖、西屏秦蜀，长江横贯东西，平汉、粤汉铁路纵穿南北，扼交通要冲，控入川门户，武汉在其包围之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对这一地区的工作，特别做了具体的布置和要求。这对我党在豫鄂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是极为重要的条件。

然而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却违背中央确定的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正确方针，另搞一套。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公开宣扬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抛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在实际工作中，他把党的行动限于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不敢斗争，反而限制自己，消极退让。在鄂中竟应合蒋介石的指责，赶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持汤池训练班工作、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陶铸，使党组织和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他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忽视人民战争的威力，把抗战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没有充分利用武汉沦陷前的宝贵时机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准备发动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在豫鄂皖边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沦陷敌手，国民党军队丢枪溃退时，王明和受其右倾错误影响的某些党组织的个别领导人，不动员党员及抗日分子到敌后捡枪建立武装，还不准党员抗日群众捡枪，甚至命令把已捡到的枪送还国民党乡政府。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武汉沦陷后，豫鄂边各地党组织力量薄弱，以至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多为地主、土匪、流氓所得。一时间，豫鄂边地区汉奸伪军蜂起，土豪劣绅、草莽英雄纷纷拉队伍称“司令”，各霸一方，为非作歹。使我党丧失了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的最好时机，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只是由于有周恩来、董必武、

叶剑英的支持，朱理治、陶铸、郭述申、方毅等和豫南、鄂中、鄂东一些党组织及一批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他们挺身而出。以竹沟、汤池、七里坪为支撑点，领导陷入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走上武装抗日保家的道路。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夹缝里，在没有成建制红军做基础的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组织许多支小股抗日游击队，才使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中开展起来，为后来开展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二、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刘少奇部署开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详尽分析了武汉、广州失陷后的抗战形势，总结了15个月的抗战经验，明确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党在敌后武装斗争中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39年1月来到河南确山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他倾注全力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十分重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明确规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未沦陷区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他反复强调：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共产党才能向敌后发展，也只有深入敌后，才能使新四军真正坚持独立自主的道理。要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大胆深入敌后，敢于树立起新四军的抗日救国大旗，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坚决纠正某些地区党领导的武装，不敢独立自主放手发展，听从国民党“划地为牢”捆住自己手脚，或缺乏警惕性，被改编吃掉的被动局面。指示豫鄂边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迅速挺进武汉外围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切实地担负起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的领导责任。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暨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扫除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三、李先念率部挺进武汉外围敌后，新四军战旗飘扬豫鄂边

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实施豫鄂边区的战略展开，1939年1月，中原局派李先念在我党发动中原敌后抗战指挥中心的竹沟，组成一支160余人的精干武装，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支队）的番号，沿平汉路两侧向敌后挺进。执行党中央赋予的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在向敌后挺进的征途上，李先念联络豫南地区由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等组织的信阳挺进队；罗厚福、熊作芳以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警卫队28条枪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孝感中和乡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等，向他们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发展抗日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动员大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此后，党领导的各路武装，纷纷向敌后发展，经过应山余家店、黄陂蔡店、杜涂垸、孝感联曹（曹省三地方游击队）打胡（胡翼武伪

军)等一系列对日伪军战斗,我军连战皆捷,军威大震。组建了新四军挺进团队,建立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游击根据地,传播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开创了鄂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4月,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奉命率200余人,由竹沟出发经四望山向鄂中挺进。6月初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一起赴京山养马畈,同陶铸、杨学诚、蔡松荣、郑绍文等领导的鄂中地区的抗日武装会合。陶铸在武汉沦陷前,就与李范一在汤池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一公开形式,聚集革命力量,培养抗日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和杨学诚等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为李先念胜利打开鄂中敌后抗战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后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豫鄂边地区的抗日形势和国共合作局面发生逆转的情势,研究了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立起新四军旗帜的问题。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统一整编鄂中、豫南党的武装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高举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大旗,使党在中原敌后有了一支由我党直接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的主力游击兵团。独立游击支队一经建立,就遵循中原局关于积极打击敌伪,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向汉水、淮河之间作战略展开。在罗山朱堂店、京山新街、安陆熬山寺对日作战告捷,在汉阳蔡甸、云梦、孝感等地打击伪军获胜,开辟了京(山)安(陆)和天(门)汉(川)地区,巩固了赵家棚、大山头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战的信心增强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我们的部队迅速壮大起来,边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养马畈会议是我党在武汉外围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过程的一个转折点,对五师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不仅加强了鄂中区党委的领导,而且鲜明地树起了

新四军旗帜，正确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使鄂中、豫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在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阔步前进，从而为豫鄂挺进纵队暨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豫鄂挺进纵队胜利建军，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对抗战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了“融共”、“防共”、“反共”方针，会后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1939年11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由政治反共为主转为军事“剿共”为主方针，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趋严重。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湖北夏家山、河南竹沟惨案，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下令要“扫荡”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指示“决以军事力量肃清鄂中的新四军”。大批国民党军队遂以对日“冬季攻势”为名，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受到极大威胁。以武汉为基地的日军，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也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发展伪军、汉奸组织，并开始以军事“扫荡”手段对付我军。以上格局表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及其抗日根据地，随时都处在敌伪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之中。

面临严峻的局势，中原局领导人认为分散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很难抗拒敌顽夹击。只有统一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坚持

和发展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此，中原局做出了《关于创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豫鄂边、鄂中三个区党委最重要的任务。”“要加紧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以拆散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反投降的统一战线。”^① 1939年11月，中原局委员朱理治和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在信阳四望山召开鄂东、豫南、鄂中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遵照中原局的既定部署，对鄂东、豫南、鄂中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并由区党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全面领导边区工作。四望山会议为共产党新四军在豫鄂边区粉碎敌顽夹击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是武汉外围敌后分散的抗日游击区向统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转化的标志。

12月初，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筹组完毕，下属4个地委、8个直属县委。各地武装力量9000余人，整编为5个团队和3个总队，一个随营军事学校。1940年1月3日，刘少奇等电示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纵队”。^② 遵照刘少奇电示，豫鄂挺进支队改称挺进纵队，并于同日在八字门举行建军典礼。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3月朱理治奉命回延

① 1939年9月18日，中原局致胡服电。《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121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558页。

安，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职务由任质斌代理。

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建立，全面实现了鄂东、豫南、鄂中党组织和军队的完全统一，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对进一步开创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原局和党中央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关于中原局工作报告》中说：“豫鄂边区的党在完全没有（成连建制的红军）基础的条件下，创立了大的武装部队，并建立了相当大的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到汉口近郊。在不断的战斗中打击了敌伪，锻炼了部队的战斗力，胜利地坚持了武汉附近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成绩。”^① 党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指示》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和意志”。^② 中原局和党中央的评价是对豫鄂边区军民的巨大鼓励，也是对豫鄂边区党组织创建与发展抗日武装经验的最好总结。

五、在抗日反顽冲破敌顽夹击的英勇搏斗中茁壮成长

豫鄂挺进纵队建军后，坚决遵循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高举抗日大旗，用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广泛打击

^① 《地方革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8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559页。

敌伪，还击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2月，首战侏儒山，直扣武汉西大门，毙俘伪军营长以下120余人，使盘踞武汉的日寇戒严3天。3月，粉碎日寇对安陆赵家棚、桑树店、京山大山头、丁家冲等地的“扫荡”。4月，奉刘少奇、张云逸等的《豫鄂挺进纵队东进策应皖西之军事行动方针指示》，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还击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部的反共挑衅，击溃其刘梅溪、杨希超、刘亚卿支队，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同时在京（山）安（陆）地区也打退了国民党川军一六一师对大山头的进攻。这时，挺进纵队已扩大到9个团队。

5月根据战局变化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牵制日寇进攻鄂西北，纵队向西战略展开，借以相机改善鄂中敌后的抗日阵地。主力遂由鄂东回师平汉路西，袭击敌据点马坪、王家店等20余处，配合群众破坏公路百余里，收割电线万余斤。解救被敌包围于安陆李家冲的川军一二五师李团，收容国民党江防军伤员300余名，治愈送回原部。6月进军白兆山区，解放伪顽两面派丁巨川、谢占奎部盘踞的重镇坪坝，切断了安陆日寇与三阳店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至10月，日寇先后3次出动兵力2800余人进犯坪坝，企图重建据点，均被我军击退。在3次保卫坪坝战斗中，我三团政委王友德、随营军校大队长杨永寿、平汉支队参谋谢平光荣殉国。后来主力一部又挺进京山南山、西渡襄河，开辟了京（山）钟（祥）和荆（门）当（阳）地区；南越汉宜公路，解放了天（门）潜（江）地区，从而扼制了襄河两岸的交通线，发展了大片根据地。

挺进纵队高举抗日团结旗帜，打击敌伪，反对摩擦，与周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我军以最坦诚、最亲切的态度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与他们交朋友，保持发展了友好关系。对伪军以政治争取为主，辅以军事力量打击，进行瓦解工作，争取了应城伪军郭仁泰部和汉阳伪军汪步青部一个旅又一个

团反正。并在武装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发动民众抗日基础上，积极摧毁伪组织、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新四军军威远扬，巩固地确立了新四军在中原敌后抗战的阵地。

伴随着挺进纵队的发展壮大，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也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夏天，边区军政委员会为维护军队的统一领导，批判纠正个别中层干部比较严重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决定对中高级干部进行一次党性教育。7月召开了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8月1日开始，又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会议根据刘少奇电示，讨论了扩大部队和根据地，加强锄奸工作等问题。李先念作了军事总结报告，陈少敏作地方党和政权建设问题报告，任质斌发表了克服不良倾向问题专题讲话。会议严肃批判和解决了钟伟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错误，也批评了一些干部的军阀残余，执行政策不坚决和游击习气等严重毛病。遂后又向全军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反不良倾向的斗争问题》，系统地开展此项工作，提高了干部素质，对以后部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会议还决定立即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构，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

这次会议，是边区党组织和军队实现组织统一后，进而从思想上实现统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挺进纵队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坚持政治建军，为挺进纵队开创政治工作新局面铺平了道路。对大大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内部团结，真正做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纵队和边区以后的发展、壮大、巩固，提供了胜利的保证。

1940年秋天，全边区党组织已有地方党员万余人，经过整顿教育，党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党组织走向更加纯洁。广泛

开展了群众工作，在抗日十人团的基础上，各地先后组织了农民、妇女、青年、商民救国会和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全边区成立了各界救国总会。政权建设工作，从年初就开展民选运动，发动人民参政改选，重建乡保政权。一些作威作福的腐化分子被赶下台；一些工农分子被选为乡保长和乡保委员。民选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积极性，农村气象为之一新，社会治安大为改善。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根据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社会基础。9月1日，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遵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了军政联合办事处，推举许子威、文敏生为正副主任。在军政联合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边区的财经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都有很大发展，成效显著。截至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1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挺进纵队也扩大到1.5万余人，并拥有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及近10万民兵。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以消灭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为目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总司令，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率30万大军向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五战区当局集中10万兵力，划豫鄂边区为鄂中、襄西、鄂东三个“清剿”区，妄图于1941年2月底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指示华中的党和军队，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坚决打退反共军的进攻。中原局新四军军部赋予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战略任务是：独立坚持战略地位重要，而在地理位置上却远离兄弟解放区、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边区抗日根据地，以一部武装沿江而下，打通与皖中新四军的联系。1941年1月

下旬，李先念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反共军的新进攻》的命令，宣告“豫鄂边区的各武装部队，决心粉碎顽军的进攻，坚持游击战争，并配合皖东、皖北我军作战。”依此命令，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反内战动员，利用蒋嫡系部队与杂牌军、地方势力派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大力争取中间势力。这就便于边区党和军队取得政治、军事的主动权，集中力量对付顽固派的进攻。

从1月至3月，挺进纵队在鄂东粉碎了程汝怀发动的“三月清剿”，争取了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五战区游击纵队司令沈光武与我签订互不侵犯和团结抗日协议。纵队九团东进宿松与皖中新四军挺进团胜利会师，并在沿江地区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在鄂中首战刘店，打掉了新二军的反共气焰。在信（阳）应（山）罗（山）礼（山）还击国民党两个游击纵队的进攻，稳定了豫南局面。在襄西也打退了国民党军九十一师、五十九军和地方顽军曾宪成部的进犯。从而粉碎了五战区当局妄图歼灭我军的阴谋，捍卫了边区的抗日阵地，与全国挫败第二次反共高潮相一致，豫鄂边区的反共高潮于4月初基本平息下来，挺进纵队也于此时正式宣布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月5日，李先念师长等全体将领于白兆山通电就职。

综上所述，李先念率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遵循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以一支短小有力的精干武装，大胆深入敌后，会合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建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支部队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灵活运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加强各方面工作，消灭了大量伪军，扩大了对日作战规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经过将近二年的英勇斗争，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部队由几支分散的游击武装，发展成为一支1.5万人的主力游击兵团，并拥有若干分散游击队

和 10 万余民兵；活动区域从竹沟、七里坪、汤池三个战略支点，扩大成为已建立 14 个县级政权的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 243 次，毙伤俘日军 2400 余人、伪军 8400 余人，伪军反正 2650 人。缴获大小炮 31 门，各种枪 6000 余支。破坏公路 1870 余里，桥梁 90 余座，飞机两架，汽车 18 辆。给日寇以沉重打击”。^① 从而，确立了共产党新四军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六、豫鄂挺进纵队创建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豫鄂挺进纵队暨豫鄂边区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原地区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里程碑，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挺进纵队暨其边区的创建与发展，为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敌后建立武装，开辟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的有益的实践经验。1940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刘少奇）、李先念的电报，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个评价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挺进纵队与其开辟的边区，是我党在中原敌后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它虽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却可和苏皖的新四军相呼应，在战略上配合苏皖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起着牵制国民党反共顽军对苏皖新四军进攻的作用。1940 年刘少奇、张云逸等数次电示豫鄂挺进纵队东进，策应皖西军事行动。同年 5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南局指示电，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

^① 《李先念文选》23～24 页。

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这都说明了豫鄂挺进纵队暨其边区创建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

豫鄂挺进纵队暨豫鄂边区创建与发展的实践，其基本经验可归纳为：

（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认真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正确运用有理、有利、有节和利用矛盾、统此打彼、各个击破的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广交朋友，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同国民党各派势力和地方势力派又联合又斗争，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党在敌后创建与发展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保证。豫鄂挺进纵队及其前身——独立游击支队，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和发展武装，才能在敌顽夹击、犬牙交错的残酷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胜利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二）坚持高举抗日大旗，大胆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是挺进纵队赖以生存发展、争取胜利的关键。因为豫鄂边区地处中日两军相持的前沿，在面敌背顽、面顽背敌的夹缝里，新四军只有深入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和发展。正如李先念说：“我们到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有力地打击日伪军，而且顽固派搞我们也不容易。如果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要同他们闹矛盾，影响两党合作抗日，人民也不愿意，而且搞不好有被顽固派消灭的危险。因此，要不要深入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恋国

民党统治区，不愿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①武汉沦陷初期，豫鄂边的少数抗日武装，没有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是接受国民党军队番号，受其限制，以致被吞并招致失败，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正确处理发展与巩固的关系，是挺进纵队和以后第五师及其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挺进纵队建军伊始，就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挺进纵队工作方针“军队中的工作是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的指示，结合自己所处环境特点，确定军队建设、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一切都围绕着“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建军与整顿同时进行”这个方针。以发展为主，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不断在发展中求生存、求巩固。因为，当时挺进纵队所处的客观环境是孤悬敌后，与其他兄弟部队没有地域上的联系，不发展不行。挺进纵队活动的地区是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沿，被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分割包围，周边还驻有40万国民党军队，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矛盾错综复杂。处在夹缝里的挺进纵队，面临敌顽夹击，斗争异常艰难残酷。如果军队和根据地不搞大一点儿，日军一“扫荡”，顽军一进攻，没有回旋余地，就无法生存。所以挺进纵队就必须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生存。而且当时中央认为“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作战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4万人。”^②挺进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行事，抓住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溃退，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广泛拥护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这个历史机遇；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

① 《李先念文选》439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559页。

出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的东风，把发展看做硬道理，放开手脚搞发展，在发展中求报国、求生存。这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的总结。

鉴往知来，醒世育人。我们探讨豫鄂挺进纵队暨豫鄂边区创建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就要继承和发扬挺进纵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把发展看做硬道理，团结内部依靠群众，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由马焰执笔，征求顾大椿、栗秀真、须浩风、肖健、夏夔、李振华等同志意见，修改而成。）

新四军五师和边区的卫生医疗工作

汪钦文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新四军五师的白衣战士，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按照五师和边区党委、首长的指示，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历程，至今令人难忘。为此，我们这些当年新四军五师的白衣老战士，把在党的领导下，创建进行医疗卫生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以达到与参加“三讲”教育的同志们交流心得，互相勉励，共同提高的目的。

一、五师卫生医疗工作的组建与发展

五师和边区的卫生医疗工作是从竹沟起步，随着部队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需要，而组建和发展的。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在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卫生队（医院），队院合一，有50多人。

中共河南省委于1938年冬成立了卫生处，处下设一门诊部，

一医训队，有 30 多人。

在信南，信阳挺进队于 1938 年 11 月在四望山成立时建立了卫生所，有十多人。

在红安七里坪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迁往河南经扶白马山时建立了医务室，有 10 余人。1939 年 1 月鄂东特委和留守处撤销，卫生工作人员分别到新成立的罗礼陂孝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第六大队工作。

1938 年 10 月在张家山成立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建立了近 30 人的医院。到 1938 年 12 月鄂东抗日挺进队改编为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时，医院还自办了训练班。

在孝感中和乡，1938 年 4 月许金彪同志建立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于同年 11 月成立了卫生所。到 1939 年 6 月发展为 50 多人，改编为路西医院。收治五、六大队及抗日友军伤员，还自办了医护训练班。

在应城汤池，1937 年 12 月陶铸同志主持举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建立了医务室。1938 年 12 月上旬应城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时建有卫生所。1939 年 1 月初，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委员会二分区指挥部所属的军医院改名为“应抗”司令部军医院，院长栗秀真。

1939 年 6 月，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整编成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支队），将“应抗”所属军医院改为支队司令部野战医院，各团部设有卫生队。

1940 年 1 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宣布成立后，司令部设军医处，处长钟华，2 月撤处，改为卫生队，队长杨昭铭。原支队野战医院改名为纵队司令部野战医院。1940 年 8 月纵队司令部设医政处，管理全纵队的卫生医疗工作。栗秀真同志任医政处长兼野战医院院长，汪进先同志任医政处政治委员，李晓白同志任医院政治委员。处院合一办公，孙光珠、谈泰阶同志分别任正、

副医务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6月，五师成立了卫生部，栗秀真同志任部长，曾昌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孙光珠同志任医务主任。与此同时，为加强对作战部队卫生救护工作的领导，司令部成立了军医处，谈泰阶同志任军医处处长。各野战旅成立了卫生科，充实团卫生队编制，加强了力量，营配备医助，连配备卫生员。豫鄂边区党委、行政公署、抗大十分校、各支队部都设有卫生队（所）。并先后扩建和组建了黄岗医院、陂安南医院、白兆山医院、天汉湖区医院、赵家棚医院、信南医院、京山小花岭医院等。1942年，新建了师部军医院、鄂皖军分区医院。1943年秋，又组建起襄南医院。各医院根据收容任务的变化和敌情变化，一般编有1~3个分所分散隐蔽。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宣化店的兰田村组建了善后救济医院。

1943年底，五师和边区卫生工作序列的实力人数已达到2800余人，其中卫生队长，所长以上领导干部120余人，医生140余人，医助130余人，形成了一支很壮观的卫生工作大军。1944年10月叶果同志从新四军军部到边区任五师卫生部部长，随行卫生干部4人。1945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批卫生工作人员留在豫鄂边区，1946年春重庆党组织又为边区输送六名医学院校毕业的医、护、药干部。新老卫生工作者同舟共济，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克服困难，共同完成各项卫生医疗工作任务。

二、服务部队无微不至，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五师部队的卫生工作，是在流动大、战斗频繁的条件下进行

的。

我五师部队被敌、伪、顽分割封锁在边区的几十个块块中，是在东拼西杀的战斗中生存发展的。当时，部队指战员尽管都是来自劳苦大众，过得了艰难困苦生活，但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休息时间少，生活条件差，理发、洗澡、换衣、洗被不能保证，又缺少雨具、蚊帐，再加上饱一餐饥一餐，常常在风雨霜雪中行军作战，因而在指战员中生虱、长疥、湿疹、疖肿、关节炎、扭伤、劳损（腰腿病）、冻伤、中暑、疟疾、痢疾、胃肠炎、上消化道溃疡、感冒、肺炎、贫血、肾炎等常见病，在部队中发病率较高。卫生人员则废寝忘食，抓紧在行军作战休息、宿营或休整时的空隙时间，巡诊看病、送药、打针、换药、穿泡、推拿、冷热罨包、查铺盖被、督促熏蚊、泡脚、喝姜汤等，努力降低部队发病率，减少疾病和非战斗减员，巩固部队战斗力。

部队卫生工作在防治季节多发病、常见病和传染病的过程中，渐渐地建立起了一套卫生工作制度。连队救亡室（抗日军人俱乐部）设有卫生委员和卫生干事，负责卫生宣传教育——办墙报、介绍防病卫生常识等；组织开展卫生活动——每到一驻地打扫卫生、挖厕所、剃头、剪指甲、洗澡、洗衣晒被、制止喝生水或吃不清洁的瓜果等。内务值日员，要照顾病员的饮食、茶水和服药，烧水洗脚、穿泡。

部队作战时的战地救护和伤员后送工作，一直抓得很紧。旅、团卫生部门集中精力进行战场抢救，做好分类留送工作，除留治能随队者外，重伤病员都尽快送往就近医院，并积极完成创伤清除术、抗休克、抗感染和后送途中的医护工作；营、连则由一政工领导干部负责组织搬运队及时完成搬运伤亡人员的工作。指战员在阵地上负伤后，能立即得到临阵随行的连队卫生员、营卫生所医助的当场救护和抢运；由连、营担架搬运队把伤员尽快送往卫生队；或转送到指定的医院治疗。

三、深山、芦荡建医院，救死扶伤六万余

五师和边区的医院，开初是军医院，继之是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和高干休养所。师军医院和高干休养所直属师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其他医院则分属各军分区、旅领导。各地区的医院，负责收容所在地区党政军民的伤病员任务，除个别的伤员外，一般不互相转院。各医院由院长、政委统一领导，配备有医护人员、政工人员、管理人员、警卫人员，共同完成医院的工作任务。

这些医院，分处在山岳、湖区、平原三种不同的地区。他们的共同点是环境动荡，远离上级军政和卫生后勤领导机关，靠自己单独活动坚持斗争；靠所在驻地的党政军机关的直接指导帮助和群众的掩护开展工作。其不同点是：山区医院伤员平时集中几个村抓紧治疗，遇有敌情则靠担架搬运，疏散隐蔽在密林、山坳、窑棚、山洞，伤病员的吃、喝、医治都由隐蔽在山间的群众和医院工作人员分片包干进行；在平原丘陵区医院，重伤病员则分散在村户居民家中的夹墙里，生活和安全由住户群众负责，治疗一般是由医院的医护人员定点包干巡回进行，轻伤病员组织起来同敌人周旋“打游击”；湖区医院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除了驻偏僻的湾子、台子外，还在荒野宽旷的偏僻密湖林土丘上，自盖棚房居住。如湖区医院建在汉川县杨业陂附近的冯家大湾，自1940年一直驻到1944年。襄南医院建在潜江县西北偏僻的湖林（秆柴山、芦林、蒿荡的合称）中，在烟火铺附近的龚、毛、孙王三台上用芦苇、秆柴、茅草搭盖的房子，自1943年住到1945年。这些地方敌人的大队去不了，小队又不敢去，就像“世外桃源”。湖区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给医院配备有固定值班的船队，常年随同医院一起生活。遇有敌情时，医院的伤病员和工作

人员编好队都生活在船上，在广阔湖林中与敌人周旋，坚持斗争。船上的给养用完后，供应船就在夜间向各船输送补充。

五师和边区的医院，收治伤病员的任务是很重的。一个收容两百左右伤病员的医院，往往要收容四五百个伤病员住院，一年要完成近千名伤病员的治疗出院任务。当时医院从院领导到看护员、炊事员都不知道有什么节假日，工作做不完就睡不上觉，不病倒在床是没有休息的。党团员带头任劳任怨地干，经常突击完成任务。同时组织伤病员发扬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轻伤病员照顾重伤病员，老的照顾新的。就这样，医院在条件困难、设备简单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1940年春，著名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冲破重重阻碍和敌伪封锁，带着翻译安娥女士到达豫鄂边区采访李先念将军及所率部队。当她参观访问野战医院的手术室、诊断室、病房时，夸赞我们“精神振奋，工作先进，中国人民了不起！”

在抗日战争期间，五师和边区的几所医院共收治伤病员达58000多人次。除了收治边区的抗日军民伤病员外，还收治了大批的友军、盟军和敌军俘虏中的伤员。1938年中秋节信阳失守后，我信阳人民抗日挺进队的医院收治被日机轰炸、扫射受伤的国民党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数十名伤员，又收治广西军从武胜关、中华山败退下来的57名伤员；1940年春我路西医院收治国民党游击队杨弼卿部19名伤员；1940年春湖区我四团留守处医院两次收治国民党一二八师王劲哉部58名伤员；1939年5月我“应抗”军医院在钟祥赵新河收治国民党一二五师七三一团53名伤员；1940年5月我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收治国民党九十四军牟廷芳部在京山徐店、田店同日军作战受伤的300多名伤员；1940年秋二野战医院收治罗店、平坝战斗日军战俘森田博美、岸上次典等数名伤员；1944年夏三军分区、一军分区医院收治我边区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白劳得等数名伤员。这些工作为增强抗

日团结，开展统战工作，瓦解敌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处理战伤外科上一方面坚持抓紧时机、严格消毒、细致操作。另一方面，凡是希望恢复的肢体尽力保存，不轻易截肢，认真治疗，直到取得理想的效果。1941年10月，在白兆山医院住院的伤员战士王八斤，右手炸伤，中指、无名指及掌骨已丧失，软组织已化脓，伤员痛苦难忍，几次要求将手锯掉，经医生反复检查认为拇指、食指可以保留，手术中只除去碎骨片，切去部分坏组织，后经两个多月治疗，结果保存了拇指、食指、小指伤愈出院。战士吴明右脚足背部贯通枪伤，因伤后感染化脓，全足肿胀痛苦不堪要求锯掉患足，经医生手术除去碎骨片，手术之后又进行精心的治疗护理为战友保住了一只脚，伤员痊愈出院。还有干部伤员吴百川，1942年右侧下肢枪伤，胫骨骨折，干部伤员陈国良左侧膝关节上股骨下端骨折，都因伤后感染肿痛难忍要求截肢，医生采取清创取骨折片手术也都保住了肢体。采取不施行截肢手术而治愈伤员，这不仅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战友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了基本保证。同时，也为党、为部队、为革命保存了旺盛的战斗力量。

四、千方百计，解决药品器材的 供应为治疗伤病员服务

五师和边区的医药、器械供应是很困难的。当时，能生产西药、器械、材料的工厂全部在敌占区大城市，敌人控制封锁得极严。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相隔遥远，也不能供给我们药品。我们药品、器材来源主要依靠接收、采购、自制、缴获以及其他途径来解决。

（一）接收方面。

1. 1939年元月，经栗秀真将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公署卫生戒烟院（驻随县）委托她在京山卫生所保管的六担药品、器械带到军医院为部队使用。

2. 1939年一、二月，“应抗总队”将应城医院隐蔽在京山县丁家冲汪家垱村的药品、医疗器械数十担运到军医院为部队使用。

3. 1946年5月，中原解放区善后救济委员会，派代表栗秀真、翻译熊沙等赴汉口，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行总湖北分署交涉，申述我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及目前困难，理应得到一批救济物资，在中外友好人士的赞同支持下，分到数十箱常用药品、器械运回宣化店，分给军民医疗单位使用。

（二）采购医药。

主要是通过家住我根据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商人，或在城市的大商户同边区通商时采用用药品抵税收。

采购药材的办法，主要有：

1. 经地方党和统战关系，由商人到敌占区武汉等城镇采购。药材是敌人对边区封锁禁运的重要军用物资之一，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做掩护，将药材通过敌人数道关卡运出来。一般情况下，将药材化整为零地偷运，例如：用粪桶夹底瞒过敌人哨卡，用人力车座夹层带出，数量多的时候就采用“送葬”的棺木装运。

2. 直接派人到敌占区采购。例如老红军漆先庭同志和十四旅后勤处处长江南阶同志利用汉流关系亲自到敌据点团风、大冶、武汉等地用粪船伪装装运药材到根据地。

（三）就地取材自制药材。

五师卫生部建有制药所，十三旅和其他各军分区（旅）医院也都办起了制药所或制药组。这些制药单位，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

法，自制了脱脂棉、纱布、敷料、绷带和各种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这些自制的药品，对满足战伤外科和常见病的治疗急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其他途径。

一些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受到我军英勇抗战的鼓舞，给予同情、捐助。国际友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就通过朋友资助了边区一些药品。我军在同敌伪顽的战斗中，也能缴获一些药品和器材。

总之，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卫生医疗工作者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基本保障了部队和边区的需要，使战伤救护与医疗任务顺利完成，为提高指战员的健康水平，增强部队战斗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自力更生培训医疗卫生干部

为了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建设的需要，为了解决部队战斗中伤病员的救治与医疗，边区党委和部队首长非常重视培养医疗卫生技术干部，不断地充实和壮大卫生队伍，尽可能地提高医疗卫生技术水平。采取了切实可行而又有效的办法，实施自力更生，集中培训与在职学习同时并行的方法，培训医疗卫生干部。

早在1939年7月至12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军医处就在河南确山的竹沟开办了有40多位学员参加的医训班。豫鄂挺进纵队创建时期（1939年至1941年）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医务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卫生所、豫鄂挺进纵队医政处都开办了医训班，共培训学员130多人。1941年8月至1945年7月，新四军第五师卫生部先后开办了三期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又培训医疗卫生技术干部近300人。

参加各期培训班的学员主要是部队各级卫生机构和各地医院、医疗所，或者是部队中政治素质好，热爱医务卫生工作，具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年。当时的学习条件是异常艰苦的，没有教室，晴天就在禾场上、大树下、山坡树林处，雨雪天则在祠堂（家庙）里讲课，学员以背包当坐凳，膝盖当课桌。借用群众的门板代替黑板，用红土、木炭或用石灰加点熟石膏制成粉笔。没有自来水钢笔，有的人就用子弹壳或竹管自制土钢笔，没有墨水则用颜料化水代替。学员晚上自习或开会讨论，每班每晚只能领到点木梓油做照明用，有时则到山上砍些油松（松明子）燃着代替油灯，有时就在月光下进行。

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的堂屋里，一户只能住五六人。春、秋、冬季都用稻草搭地铺，天气太冷时就在夹被上加点稻草保暖，夏季则借用群众的门板、晒箔等做铺。

学员的伙食按部队标准供给。粮食由学员翻山越岭背运，厨房烧柴和冬季取暖用柴，多是学员利用星期天到山上打来枯树干枝，蔬菜供应不上，学员就到山上、河边采摘野菜补充。

培训班的教学内容分业务、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业务培训以部队卫生防病、内科、外科、战伤外科急救为主，还辅之以生理解剖，药物调剂，及医用外文。政治课主要学习时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等。

军事课主要讲：军事常识、队列操练及射击、投弹基本动作。

学习教材：业务课只有油印讲义，由授课教师自编教材。政治、军事课没有教材，多是报告、口头宣讲和示范动作。教师都是兼职，多采取集中一段时间一科一科地讲，学完为止。

课程力求少而精，坚持突出重点，深入浅出，具体通俗，一听就懂的原则；多联系实际，多举实例，着重示范、演练；注意

启发学员学习，注意培养学员兴趣，培养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不搞“填鸭式”，不死背条文。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部队的发展，战斗频繁，伤员增多，伤员中急需手术者和手术难度大的与日俱增，同时医院驻地分散，战伤外科技术力量薄弱，医疗器械缺乏。为改善战伤外科现状，师卫生部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建立一支精干机动的巡回医疗手术组，一则协助各医院解决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和疑难病症的诊治，二则培训创伤外科的专业人员。1942年7月，师卫生部巡回医疗手术组在天汉湖区成立，由卫生部医务副主任乔明志同志负责，并从第三期医训队结业学员中调王楚英、吕希高、李守义三人任医生，袁树棠任医助兼看护长，另调李世民任消毒员。通过短期的准备，即在天汉湖区医院边学边做就地进行手术工作。同年10月，卫生部巡回医疗手术组改名为师军医处医疗巡视团兼手术组，乔明志任主任。至1943年11月，医疗巡视团兼手术组已发展到20余人。先后培训医生6人，医助、司药、看护长4人，消毒员、调剂员4人，为基层创伤外科打下良好的基础。11月底，根据边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撤销医疗巡视团兼手术组，卫生技术人员分配到各军分区医院继续开展创伤外科等医疗工作。

医疗巡视团兼手术组的任务，除对本组医务人员加强战伤外科的理论学习和手术操作学习，并对疑难重症伤病员实施手术疗法外，巡视团还代表师军医处，了解各医院医疗工作情况，指导、协助各医院提高业务理论，讲解诊断和实施手术疗法的原则，讲解医疗技术上的操作方法。手术时邀请医院的医、护人员参加，共同从实践中提高创伤外科手术的理论和技術操作水平。还为驻地群众施行各种手术、接生（难产），诊治疑难病症。

在开办医训班集中培训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在职卫生干部的教育。在职教育以自学为主，通过分发学习资料，以老带新、举

办讲座，定期测验和学习评比等各种有效的形式，组织各级医疗卫生人员进行理论和技术学习。这些在职学习虽然是边工作边学习，但由于是用什么，学什么，互教互学，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多年对医务卫生技术干部的培训，不但及时补充了部队急需的医护人员，而且使五师与边区的各级卫生领导和骨干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使卫生医疗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从而为新四军五师的部队和边区的建设，为保持部队旺盛的战斗力和整个豫鄂边区军民的身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

日、伪、顽军频繁“扫荡”、“清乡”、“清剿”侵扰根据地，这给医院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医院不同于兵工厂、被服厂等后勤单位，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机器埋在地下或沉入水塘，工作人员可以转移。而医院的工作对象是伤病人员，严峻的事实是情况越紧张，伤病员就越多，医院的任务就越重。医院既没有武装部队保护，又无自卫能力，如何确保伤病员的安全就成为医院工作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紧紧依靠上级领导、地方党组织、地方政府，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与掩护，一次次渡过难关。

天（门）汉（川）湖区医院，1942年住汉川冯家大湾一带时，天汉县委书记吴云鹏亲自发动群众为医院建立情报网，三里一岗，五里一站，一直伸到敌据点，随时掌握敌人动向。他们还还为医院准备了100多只渔船，将船编号，工作人员编组，平时渔船照常捕鱼，发生敌情各自对号上船，执行任务。

医院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所以，卫生医疗工作人员对军

民鱼水情体会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把拥政爱民遵守纪律变成自觉的行动，群众也把我军作为子弟兵，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病员。1943年敌人“扫荡”京山南山根据地，京山南山医院重伤员莫光明来不及转移，只好留在杨家畈李老太婆和吴姐大嫂家里。鬼子向杨家畈搜索，婆媳两人急中生智，将莫放在儿媳床上，盖上被子，将窗户堵上，有意将尿罐弄倒，老婆婆哭丧着脸坐在门口，大嫂坐在床边，两个鬼子气势汹汹进房用电筒一照，见大嫂坐在床边哭泣，房内又阴暗又脏又臊臭。伪军捏着鼻子对鬼子说：是传染病，鬼子立即走了。这个故事一直在南山军民中流传。

工作人员住在群众家里，经常帮助群众打扫卫生、看病、接生，农忙时参加农田劳动，因此，军民关系密切。1941年，汉川左家渡一农民小孩放牛时，从牛背上摔下来，牛角刺伤腹部，肠子脱出。所长王桂英立即作了紧急处置，很快将患者转到院部，院长谈太阶亲自为他做手术，病人得救了，直到解放后，左家渡的老人提起此事，仍满怀感激之情。

1944年春，在云梦上邱家湾，分散隐蔽的信南财政科长刘子佩，因患肺病和中耳炎住院。一天早晨，听说日、伪军出发了，他和通信员尹德贵、金医生走出大门观察动静，眼见10多个日本兵端着枪快到村头了。房东老婆婆见了，急中生智，连忙吩咐金医生和尹德贵装作放牛娃钻进麦田里和群众一起干活，把刘子佩引到土地庙烧香。日本兵一点也没有察觉新四军的伤病员住在村里，从村中一穿而过。这种爱军如子的老婆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数不胜数。

1942年10月，日寇对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边区行政公署医疗所住在小花岭的小泉冲，由所长易齐萍、指导员王瑞华带领数十名伤病员，其中有七八名临产妇和一个日军俘虏伤员，在当地老乡陈治国侦察敌情、供给粮食的全力支持下，他们依靠

左家坡的密林、山洞，坚持了四天四夜，胜利渡过了险关。

信南地区常遭日、伪、顽军的夹击，由于情况紧张，医院只得将伤病员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群众的家就是病房，一住就是半年或一年，群众从不拒绝。陈家湾刘秀蓉负责一位姓陈的重伤员，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把对在战场上牺牲的丈夫的爱，倾注在这位为抗日流血身负重伤的战士身上。她为陈擦洗血迹，洗晒衣被，喂水喂饭，端屎倒尿，一连几天未曾合眼。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照顾，这个战士痊愈，重返抗日前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又疯狂地发动内战，派重兵进攻我根据地。10月，鄂东军区医院（对外称独立支队），由支队（院）长俞英、政委彭镇宇带领向天台山、卡房一带大山里分散隐藏。大队长黄卓、政委向前带500多名轻、重伤病员分散隐藏在天台山老虎沟、仰天窝山洞里，顽军和地方土顽黄古儒部不断围攻、搜山、烧山。当地党支书吴芝傲发动群众，以砍柴掩护为伤病员站岗、放哨，有的以放牛“吹牛角”送情报，有的以唤猪声（表示敌人走了）和唤牛声（表示敌人来了）做暗号，给医院传递情报，多次避免了危险。共产党员寇绍坤不仅自己献粮、送炭、送盐、送菜，还发动群众送粮。医院在这里一直坚持到停战令下后，转移到宣化店以西张家湾。

在一次战斗中，大悟山一位村干部余乐兰带着担架组一天就抬运了52名伤员到接转站，直到伤病员全部安置好才休息。白云湾一位50多岁的理发师傅何光润有病在家休养，见青年人个个都上阵抬伤员，自己就带病上阵，一连背了7名伤员到救护所。马吼岭塘角的农民王高才奋勇抢救伤员时，腰部和小腿负伤，战斗结束还表示不要抚恤金。

在边区凡是有我们五师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地方，群众受伤或患传染病，或急、危、重病人，如孕妇难产等，我们都有求必应，而且吃、住、医疗全部免费。当地的群众，至今还怀念着当

年的医院，写信或带口信向原医护人员和领导们问好。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7月成立的五师卫生部巡回医疗手术组，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给驻地群众施行大小各种手术、难产接生、诊治疑难病约160多人。

七、舍生忘死救战友，血洒战场真英雄

部队作战时，在必须通过的道路及开阔地段上，在强渡的河段或湖面上，在敌据点前沿等处，敌人防守很严，炮火配备很强，组织密集射击面和交叉的火力网，这常常使作战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在这关键时刻参加救护工作的人员就需要有奋不顾身、勇敢沉着、机智顽强、行动迅速有效地完成抢救伤员、包扎、搬运后送，同时要能在不利的天气、复杂的地形、激烈的炮火中，果敢行动，不遗漏一个伤员，还要能连续作战，适应战况变化，适应战场的频繁变动转换，始终紧跟部队开展工作。第五师的卫生医疗工作人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舍生忘死救战友，英勇杀敌，血洒战场的英雄事迹，数不胜数，可歌可泣。

1940年的7月、9月、10月，豫鄂挺进纵队平汉支队的一、二团队及六团队，先后三次在京山县平坝镇英勇顽强地击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每次战斗都异常激烈，日寇伤亡惨重，我方也有较大伤亡。我参战团队的卫生队长章勇、刘良璧、钟毓、钟华、严荣（女）都带领各队卫生人员临阵对所有伤员都做了良好的救护医疗。严荣同志在阵地上奋不顾身救护伤员时，得知爱人王友德（三团政委）同志阵亡，她含着悲泪使尽全力坚持阵地救护伤员。战斗结束后，她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化悲痛为力量，又立即参加慰问团的工作，慰劳作战负伤的指战员同志。这位在红军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表现了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革

命情操和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

在1943年持续的反“清剿”战斗中，四军分区卫生科长田惠甫同志，在战场上奋不顾身，抢救伤员，是部队“救死扶伤”的一面光辉旗帜，最后在王家坊四道沟救护背运伤员黄冈指挥长汪进先时，腰腹部受重伤壮烈牺牲。

在1944年，保卫大悟山抗日根据地的战役中，我三十九团卫生员廖光福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在阵地前沿抢救20多名伤员，包扎，背运奋不顾身，衣服被子弹打烂了，身上多处受伤，血染全身，坚持不下火线。鄂东军区医院重伤所，1945年12月26日在西大山（河南罗山）遭国民党六十六军宋瑞珂部袭击时，医生袁树棠与敌人搏斗，英勇牺牲，他妻子孙秀珍见状义愤填膺，冲上去同敌人搏斗，也壮烈牺牲了。天（门）汉（川）湖区医院看护班长赵春芝出身贫苦，入伍后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工作一贯积极。医院在平坝战斗后收治100多名伤员，每天换下来的血衣血被、绷带、敷料很多，她为了保证给伤员按时更换，天天及时洗涤。天寒地冻，她破冰取水，血水染红了池塘。她的手因长期在冰水中浸泡而破裂，裂口渗出的血和伤员的血一起溶到塘里，而她从不叫苦叫累。

在战斗频繁，高度分散，条件艰苦的环境里，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时时处处发挥着先锋和模范作用。那时医生、医助、看护员中的共产党员，常常一个人带二三十名伤病员单独分散隐蔽在深山沟里或芦苇荡里，他们既是医生，又是领导，既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又做医疗护理工作，既要管好伤病员的伙食与生活，又要搜集情报注意敌人动向以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师军医院所长马国英，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被誉为救死扶伤的典范，凡是在他所里住过的伤病员，无不赞扬他持病人如亲人。宣传股长李必超被日寇用刺刀刺得遍体鳞伤，因失血过多处于休克状态，送来时没有棉被盖，马国英

立即将自己的棉被给他盖上，他自己晚上盖稻草。平坝战斗负伤下来的王大富和沈大家一个想吃点糖，一个想吃点鸡蛋，马国英悄悄地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津贴费买来了糖和蛋，满足了伤员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五师医疗卫生工作者奋不顾身救战友，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就有 50 多名，因公负伤致残者也不在少数。还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累病晕倒了，醒过来接着坚持干，终因劳累过度而积劳成疾，最后为革命光荣殉职。

这些革命英烈是永垂不朽的！他们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结 束 语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有 56 年了，而英勇抗战的往事仍经常在我们这些老战士头脑中呈现。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亲身参加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难以忘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八年英勇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乃至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伟大的意义，它既开创了在战争全局上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新局面，结束了一百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历史，又空前地发展了我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大大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历史进程，还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我们要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而进行革命的

光辉历史，教育每一个党员，教育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全国的每一个青少年，永远不要忘记历史，永远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定信心，扎实工作，为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文是在栗秀真部长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在动笔之前，她不但帮助笔者准备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就文章的内容结构指导思想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文章草稿完成后，她又亲自召开讨论会，征询当年在新四军五师和豫鄂边区工作的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继后她又逐字逐句地修改文章草稿，订正史实，使本文得以完成。）

新四军第五师暨豫鄂边区 文艺工作初探

王之铎 王培德 李振华 马 焰

革命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历来都是我们党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作为团结教育人民，分化瓦解敌人的有力武器，对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弘扬新四军优良传统，根据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要求和五师分会专题研究规划，王之铎、原野、李振华、吴道英、王培德、马焰几个曾在五师暨豫鄂边区从事过宣传、文艺工作的同志，对五师及豫鄂边区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几次座谈研讨，现将我们的共识整理成文，供研究新四军文艺工作历史作参考。

一、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队伍 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

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队伍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中原敌后

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的同时诞生的。这支文艺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八年抗日烽火的锤炼，发展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文艺大军。

五师建立的第一支专业文艺队伍，是1939年12月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孩子剧团为基础组成的豫鄂挺进纵队（五师前身）政治部宣传队，全队约20余人，都是未满弱冠的小同志。他们一般都只读过小学，极少读过中学的，对他们说来，加紧政治、文化与业务学习尤显重要。因此，建队开始就提出“工作不忘学习，学习不忘工作”，明确规定队长胡旋（女）负责业务技术教育，政治指导员程里（女）负责政治文化教育和生活指导。另外还由队员中推选积极分子担任生活队长和小组长与戏剧、歌咏、民运、教育干事协同管理队务。1940年7月，纵队领导决定，撤销宣传队，另行组建演剧队。

纵队政治部演剧队成立时，只有三男三女和三个孩子，人们戏称其为“三三制”演剧队，后来逐步扩大到20余人。队长由纵队政治部文艺科长唐亥兼任，唐亥抗战前就读于上海艺专，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又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戏剧运动。他能写能画，多才多艺，在戏剧方面，更是集编剧、导演、表演于一身的全面人才。副队长陆诚、党支部书记胡旋。胡旋和王坪（女）、方西擅长表演。栗野（女）曾任光明话剧团党支部书记，能作曲、指挥。三个小孩都是原纵队宣传队队员，能歌善舞，也会演戏。后来吸收的一些知识青年，也都有一定的业务专长。该队是一个人员精干、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文艺队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军向豫鄂边区大举进攻，演剧队被迫分散或调部队工作或进随营军校学习。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宣告成立，师政治部决定组建文工队，除召回原演剧队成员外，又陆续吸收了一批来自部队和国统区、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为适应湖北籍广大指战员的爱好，文

工队内又增设了一个楚剧组,全队共约30余人。队长仍由唐亥担任,副队长先后有陆诚、王坪和方西。同年6月,在全师政治工作会议期间,文工队与十月剧团联合演出,影响遍及全军。1941年底,文工队下放到特务旅,翌年初,被分散到各团做宣传工作。

1942年初夏,文工队大部分人员又调回师政治部,恢复了文工队建制。8月,区党委与五师领导研究决定,文工队与十月剧团合并整编为师政治部文工团,唐亥兼任团长,方西、周辛(女)、杜薇(女)为副团长,胡旋任政治协理员。楚剧组扩编为楚剧队,方西兼任队长,黄英雄任副队长。1944年初,文工团集中整训,团员已达百人以上,是五师文艺队伍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为减少作战部队负担,文工团将年轻力壮的团员武装起来,自己保卫自己。

1944年冬,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业务素质,师政治部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艺术训练班”,文工团员大都进入该班学习。艺训班结业后,从戏剧班选拔了30余人重建师政治部文工队,方堃任队长,胡旋、杨景成分任正副政治指导员。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师主力组成野战军,文工队又吸收了一大批从重庆等地来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师政治部把他们分编为十三、十四、十五旅的文工队,分别由方西、方堃、杨景成任队长。五师文工团(队)至此完成了它抗日的历史使命。

1945年10月24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嵩岳)军区、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与五师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1946年2月,以随三五九旅南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为基础,加上部分原五师的文艺工作者和从国统区来的部分知识青年,组成了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徐苓为团长、胡代伟为政治指导员。以原五师野战军十四旅文工队为

基础，改组为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方堃、政治指导员黎阳，原五师十五旅文工队与十三旅文工队合编为第二纵队十三旅文工队，队长方西、政治指导员首任王坪、继任杨景成。

豫鄂边区党委领导的文艺团体，是以代理党委书记陈少敏亲切关怀下于1940年7月组建的解放剧社开始，同年11月7日，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专场演出时，更名为“十月剧团”。团下属社员组、孩子队两个部分。首任团长是曾在开封孩子剧团做过领导工作的苏菲（女），二任团长吴超荣（女），三任团长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擅长作曲、指挥，时任洪山公学艺术系主任的周辛（女），副团长杜薇（女）曾在上海参加过左翼文化活动，既能编剧也会表演。先后任政治指导员的是刘克斌、高非（女）。鼎盛时期全团曾达到70余人。十月剧团历时两年，在边区文艺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3年7月，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以原十月剧团孩子队转入实验中学学习的部分同志为骨干，组建了巡回宣传团。先后由李垠（女）、蔡康志（女）任团长，皮革为副团长，全团约20余人。1944年冬，大部分团员转入五师政治部艺术训练班学习，巡回宣传团也更名为行政公署教育工作团。

五师和行政公署楚剧队，是由师政治部文工队楚剧组扩大组建的。1943年2月，五师精简领导机关，楚剧队划归行政公署教育处领导。同年年底，楚剧队回归师政治部，并增添了一些演员。1944年初，楚剧队扩编成两个队，一队由汪洋、黄英雄率领，调归十三旅政治部领导；二队由殷诗全、俞洪斌、陈声德带队，调归第三军分区政治部领导。1945年2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渡长江，以当地一个“草台戏班”为基础，成立了楚剧三队，王劫任队长。9月，楚剧一队由十三旅调归新组建的五师野战军（后改组为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领导。1946年3月，楚剧三队在宣化店并入一队。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时，这些文艺团体都参加了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中原突围的壮举。

在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工作团体里，还有一支必须充分肯定而又不可忽略的队伍，它就是1941年至1944年之间，五师各旅（军分区）及主力团队和根据地基本区地、县党政机关成立的宣传队或剧团。他们名称不一，人数不等，时有时无，但却十分活跃。他们一般都能结合部队、地方斗争实际，自编自演活报剧、小歌舞和快板、鼓书等，运用战士、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开展文娱工作。他们还担负着宣传群众、检查群众纪律，行军作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火线喊话、看管教育俘虏，照顾伤员、动员民夫等战勤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信阳的孩子剧团，十三、十四旅（四军分区）一、三军分区（十五旅）的宣传队。他们存在的时间虽不很长，但对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对鼓舞士气，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五师暨边区文艺战线上的朵朵奇葩。

二、文艺工作的主要活动及作用

五师暨边区的文艺队伍，诞生于豫鄂之边武汉外围，这一地区三楚民歌，久负盛名。洪湖之滨，大别山麓，淮河两岸，桐柏山中，流传着大量的革命歌曲，流行着各种曲艺、花鼓和传统的灯会，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娱活动，哺育了人民文艺战士。五师部队创建之初，就继承红军光荣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演唱抗战歌曲，堪称拿手好戏，无论行军宿营，列队集会，啦啦队拉歌喊声此起彼伏，众人纵情歌唱，四野应和，群情振奋。边区人民群众深知五师部队这一生活特色，边沿地区的群众就常以此作为识别新四军和其他军队的明显标志。

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宣传队，以演歌舞为主，兼演活报剧、歌舞剧和小话剧。宣传队的演出活动面向部队兼顾地方，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偶尔也为友军演出。演出空隙，还深入连队帮助基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教唱歌曲、组织文体比赛等。1940年2月，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中国女作家安娥到豫鄂边区访问，在欢迎晚会上，宣传队为她们演出了歌舞和小话剧《军民合作》、《团结舞》、二部合唱《红缨枪》等，受到史沫特莱的高度赞赏；安娥被宣传队孩子们朝气蓬勃、不畏艰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曾写下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颂他们：

中国是光明的啊！
可爱的孩子们，
从你们可以看出，
祖国的新时代，
尽管你们还会跌跤。
在你们的手里，
四季的气候将变化，
山河面貌将更改，
大地将为你而温暖，
鲜花将为你而盛开。
只有你们能批判地继承过去，
能辉煌地创造未来。
你们现在几乎一无所有——
头上缺帽，脚上也没有鞋。
但孩子们，战斗下去吧，
你们将有一个新世界。^①

① 安娥著《五月榴花照眼明》52页。

挺进纵队政治部演剧队以话剧表演为主，兼演唱歌曲。在纵队八一军政大会期间，该队组建伊始，立即投入排练演出活动，经常是白天排练、晚上演出。会后又派往各团巡回演出。每次演出的硬景、软景，化妆的油彩、胶水，都是自制、自绘、自配，服装道具也是以借为主。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队员都能情绪饱满地完成演出任务。演出剧目计有《满城风雨》、《可以来往的朋友》、《菱姑》、《搜查》、《人约黄昏》以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

从文工队到文工团，除恢复上演演剧队的某些剧目外，又陆续排演了一些新剧目，如《一心堂》、《一条腿的战士》、《狐群狗党》、《雾重庆》、《马门教授》、古装话剧《李秀成之死》等。在当时那种艰苦险恶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引进这些大型话剧、古装剧，确非易事，一应服装、道具、布景全靠自己动手制作，是一次大胆的、创造性的尝试，给人们以抗日爱国教育和新奇的开阔眼界的享受。

1941年6月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强调文艺工作面向连队，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同时要求广泛开展对日、伪、顽的宣传活动。贯彻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是五师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在此精神指引下，文工队成立了楚剧组，并联系部队和边区斗争实际，自己动手创作上演了花鼓戏《赵连新归队》、《赶杀记》，话剧《蠢猪拖枪》等一批新剧目，演唱了栗野作词配曲的《伪军月下叹五更》、集体作词、翟民作曲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冷新华填词的《新四军里真快乐》等歌曲。唐亥还创作了《刮民党》、《异曲同工》等一批漫画。这些作品对巩固部队、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了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文工队（团）除演出外，还经常深入连队，哨所教唱歌曲，

排练小型节目说快板、鼓书等，辅导连队开展文娱活动，这对活跃部队精神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夏，文工队奉命派出部分队员，参加改造新收编的周良玉伪顽两面派地方武装。1944年又奉命组织工作队，深入到（黄）陂（黄）安南农村参加“组织人民大多数”的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就是在这里，曾创作过《挺进进行曲》、《组织起来力量大》、《夜行军》等一大批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歌曲。年轻有为卓越的音乐工作者邓耶不幸溺水遇难，这是五师和边区文艺团体的重大损失。

1945年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来到大悟山，带来了延安的秧歌剧。在随三五九旅南下的延安鲁艺同志的辅导下，新组建的五师文工队改为以上演秧歌剧和歌剧为主。演出歌舞剧没有乐队，那时购置乐器非常困难。由延安鲁艺来的能作曲、写词、指挥教唱和演奏小提琴的杨景成和胡安、方云等就亲自设计并与一些队员就地取材自己制作乐器装备培训乐队，使得歌剧兴旺起来。排演的主要剧目有延安带来的《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钟万财起家》、《赵富贵自新》、《周子山》等，后来自己以五师营救美国飞行员及部队整训和边区的斗争实际，创作了秧歌剧《营救》、《官逼民反》、《铁路下的随南》和大合唱《练兵》。

豫鄂边区党委所属的十月剧团，以演出活剧为主，兼演戏曲和歌舞。该团先后演出的话剧有《民哨》、《新四军快来》、《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游击队之子》、《新星》、《穷孩子过年》等。京剧既演传统戏《小放牛》、《打渔杀家》等，也有新编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的《新南阳关》和反映军民团结歼灭顽匪的《黑色伪匪》。此外，还有豫剧、楚剧清唱和邓耶创作的《挺进进行曲》、《战洪山》、《夺长江》等。他们不仅有独唱、齐唱、轮唱、男女声二重唱，还组织演出过《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舞蹈是孩子队的主要演出节目，除演出纵队宣传队带来的红军时代留下来的《叮呤舞》等舞蹈外，还自编了《春耕舞》等。

1941年4月，应应城县委邀请，十月剧团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由县大队护送到敌占区附近进行抗日募捐演出，被敌袭击险遭聚歼。为团结共同抗日，还和友军部队举行过联欢演出。

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巡回宣传团，在建团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除参加（黄）陂（黄）安南“组织人民大多数”的工作外，主要活动是文艺演出。演出节目基本是恢复原十月剧团的部分剧目，也有少量自己新创节目，如新编京剧《东条求救希特勒》、歌曲《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还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借用民间旧有文娱活动形式如《踩高跷》、《划彩船》、《耍蚌壳》等，填上新词，在元旦、春节期间的“拥军爱民”活动中演出，这种民间的文娱形式，极受军民欢迎。

楚剧队成立后，立即排演了新创作的花鼓戏《赵连新归队》、《反共害民记》，受到李先念师长的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1942年春天，他们带着描写伪军反正的剧目《赶杀记》，到敌占区黄陂县的建安集演出，吸引许多伪军来观看，在群众和伪军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43年，又新编了现代戏《法场风波》、《偷牛》、《贪污乡长》，移植了京剧传统戏《打渔杀家》等。1944年初，楚剧队和文工团一起参加整训，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展诉苦教育，这对提高楚剧旧艺人的政治觉悟和端正文艺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排演了唐亥编写的大型现代戏《长沙沦陷记》。楚剧队一分为二调归十三旅和第三军分区领导，他们适应形势又新编古装戏《风波亭》、《王佐断臂》、《新农家乐》和鼓书《周志坚三打孝感城》，还排演了楚剧传统剧目《葛麻》，移植京剧《三岔口》、《群英会》、《黄鹤楼》等，其中以《新农家乐》和《周志坚三打孝感城》影响较大。1944年秋后，配合边区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又集体创作了古装戏《卧薪尝胆》。1945年1月，在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业余文工团帮助下，又排演了新编古装戏《逼上梁

山》和现代戏《血泪仇》。

1945年10月，我军发起反对内战的桐柏自卫反击战役，相继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等县城。为庆祝自卫反击战胜利，楚剧队创作演出了大型现代戏《解放桐柏》，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

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工作的作用，表现在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了许多青年人自愿参军，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他们的演出活动，调剂了部队和地方群众的精神生活，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争热情。激励五师的数万指战员及豫鄂边区的广大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和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顽固派军队浴血奋战。他们演的戏剧和唱的歌曲，富有深厚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教育干部战士和人民决心把抗日、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创作的楚剧《赶杀记》、歌曲《伪军月下叹五更》、《新四军真快乐》等，在边区、部队和前线阵地普遍传唱，给伪军、伪人员和反共顽军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削弱了敌军斗志，不少伪军逃亡或投诚我军；也使一些顽军士兵进攻我军时消极怠战、朝天开枪。文艺队伍成员有一定专业能力的知识分子、民间艺人，也有来自劳动人民的青少年。他们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培养，大都成为文艺专业人才，或成军队、地方的领导干部，文艺团体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正如原五师副政委任质斌为《硝烟春蕾》（五师文艺工作史资料集）所写序言说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数万指战员及豫鄂边区的广大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浴血奋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后又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奋战数年，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胜利的篇章中，都闪烁着文艺工作者的光辉。”

三、几点体会

五师暨豫鄂边区文艺工作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体会：

（一）基础较好。五师和边区的文艺工作，是在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武汉沦陷以前，平津、京沪、武汉、开封、洛阳等地来的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团体——河南战时教育促进团、光明话剧团、开封孩子剧团、青年救国团、华北流亡同学会、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抗敌演剧队等等，便在豫鄂边和武汉外围开展过波澜壮阔的文艺宣传活动。豫鄂边区的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后，便以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上述文艺团体留在边区的人员为骨干，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和年少的工勤人员，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文艺宣传队伍。大体说来，1940年以前是初创时期，此后是发展时期，而1942年到1944年则是文艺工作最兴旺繁荣的阶段。五师和边区文艺工作能够迅速建立和发展，则是和武汉沦陷前的文艺宣传团体奠定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的。

（二）领导重视。豫鄂边区党委和五师的领导，从创建部队开辟根据地之始，就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工作。他们对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和旧艺人，采取团结教育方针，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在那风雨如晦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不论环境如何险恶，战斗多么频繁，生活何等艰苦，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抓得很紧，从没有放松过。楚剧队、十月剧团，就是李先念师长、陈少敏同志亲自倡议建立起来的。他们不仅从政治上指导文艺工作方向，关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还亲自为文艺团体挑选领导干部，批专款解决物质困难，演出过程出现突发故障停演时，还亲自出面为剧

团“救场”。1945年3月，师文工队在大悟山举行晚会，演出中间汽灯出了毛病，怎么也点不着。观众等得着急，场上有点骚动。李师长就走上台，一番诙谐风趣的讲话，台下顿时活跃起来，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部队和根据地创建初期，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地委书记刘子厚、李守宪，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刘放、敌工部长邝林等，都亲自在演出剧目中扮演角色。五师和边区文艺工作在当时那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自始至终非常活跃，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成效显著，领导重视是根本的前提。

（三）方向明确。五师和边区的文化艺术工作和部队根据地一样，也是在远离中央和其他兄弟部队及根据地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特殊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它虽然不无缺点和走过弯路，如演出一些从国统区引进的大型、古装剧目，并不完全符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实际斗争需要，也不适应工农兵的欣赏接受水平。但总的说来，基本是符合党的文艺工作政策和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既继承了红军时期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又借鉴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经验，吸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开展文艺工作的好东西与五师和边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具有新的创造和特点，形成自己的传统和作风。做到了一切活动都服从于人民利益，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文艺宣传突出直接为抗日服务，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现代戏为主，演传统戏要古为今用，有利于抗日斗争。文艺宣传内容、形式、语言，强调发扬民族传统，强调群众性，适应边区群众和五师战士文化生活的习惯、要求；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创作的戏剧、歌曲短小精干、通俗易懂，富于民族风格，具有浓郁的边区特色。深受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喜爱。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上更加明确了文艺工作的任务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抗日民主政治服务。解决了

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后，五师和边区的文艺工作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广泛的群众性。五师和边区的文艺工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他们以专业队伍为骨干，通过各种方式发动、辅导人民群众和干部战士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军队和地方各单位都自己组织文娱晚会，由干部战士和群众自编自演节目。1945年以后，文工队大都深入连队广泛开展秧歌运动，许多连队在他们辅导下组织了秧歌队，以本连队实际斗争生活为素材，自编自演秧歌剧，大大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提高了战士政治思想觉悟，鼓舞了战斗意志。在这些活动中，专业文艺工作者同根据地的工人、农民一样吃糠咽菜，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同部队战士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出没在枪林弹雨之中。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安危，他们流血流汗，牺牲了一切，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五）形式多样，活动灵活，作风艰苦。五师和边区的文艺队伍，既有根据战争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小型多样的组织形式，适应农村战争条件，因陋就简、机动灵活的活动方式；又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因而不论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下，都能因地、因时、因势制宜地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活动。他们不仅能演能舞能唱能说能写，同时也能深入农村和前线动员民夫、筹集粮草，宣传鼓动、战地采访、火线喊话、救护伤员、管理教育俘虏，直接为战争服务。他们做到了既是文工队，又是工作队和战斗队，是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又是一支高度适应战时工作需要的多面手队伍。在五师暨豫鄂边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岁月悠悠，这一切往事都已逝去成为历史。今天回顾五师和豫鄂边区文艺工作走过的道路，养成的传统作风，研讨传播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弘扬革命文艺工作传统，启迪后人继往开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也不无现实意义。

关于《新四军文献》一份电报的辨析

——任质斌同志访谈录

马 焰 整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第三卷 685 页，选载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3 年 5 月 17 日致华中局陈、饶^①并告郑位三的一份电报，内称：“中央决定以郑位三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为了帮助郑去解决五师问题及华中局了解五师情况起见，书记处提议加派刘晓同郑一起到五师”。“郑与刘暂缓起程，待中央指示机宜及电告某种机密事件后再起程”。“位三带去五师的干部，必须选择前四支队的老干部对位三有很好信仰者，要有几个旅团干部同去”，因“还准备从五师调一批高级干部到华中局”。电报还指出“五师机要科内部已有奸细打入”，要郑由前四支队人员中选两个译电员，“在五师必须另组织一个私人用的机要室，以后才好办事”。我们抗战时期一直都在五师工作，对此事却一无所闻，今读电报甚为震惊，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我们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五师分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马焰等人，就这份电报的问题走访了原第五师副

^① 指陈毅、饶漱石。

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任质斌同志，以下是我们与任质斌同志的访谈录。

问：我们看到中央书记处 1943 年 5 月 17 日这份非比寻常的电报，甚为震惊。请教任老，这份电报是怎么一回事？

答：《新四军文献》选载的这份电报，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的，以前也不知道。我认为对这类有关一个师的政治评价的电报，公开发表前，应尽可能向当时有关人员核查清楚，加以必要的注解或说明，才是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像现在这样，不加注解、说明，就公开发表，对不了解五师历史情况的人们，读了会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第五师是一支组织不纯、机要部门有奸细等严重问题的部队，才发生了中央书记处要采取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我作为当时五师领导者之一，有责任对这段历史予以辨析和郑重说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问：那么，真实情况如何？

答：新四军第五师是 1938 年 10 月日寇侵占武汉后，豫南、鄂中、鄂东的共产党地方组织点燃抗日烽火，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的一些抗日游击武装，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下，与李先念率领自竹沟南下挺进武汉外围的独立游击大队合并组成的。最初的番号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以后发展了，又与鄂东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改编为近万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不久又改称纵队；皖南事变后，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这支部队在它组建的过程中，虽无成建制的红军大部队做基础，但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遣了近百名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老干部来充任部队的领导骨干。因此，这支部队从它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继承了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遵照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进行活动。其间，虽曾收纳过少数愿来敌后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和一些反正起义的伪军，但都及时对他们进行了改编和思想改造，使之成为党领导下

的抗日武装。当然，也还有极少数没来得及改造而叛逃的，这在当时艰苦险恶的斗争情况下，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这支部队遵循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既定部署，在武汉外围江淮河汉之间，积极打击敌伪，进行过余家店、李新湾、蔡甸、朱堂店、新街等许多战斗，攻入云梦、孝感、麻城、蕲春县城，三次保卫坪坝，三打侏儒山，大悟山粉碎日寇万人大“扫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赣北、鄂南，挺进襄南、洪湖，完成了四面包围武汉的态势，确立了新四军在中原敌后抗战的地位，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适可而止的休战原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配合了苏皖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维护了中原敌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毛泽东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称赞说：“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①“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②

自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它虽被国民党军切断了同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陆上交通联系，陷入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独立作战的境地，但它一直有无线电台保持着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空中联络。五师的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工作部署、干部调动任免，都向华中局、军部和党中央、中央军委请

^{①②}《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二卷755、756页。

示报告，都是遵照上级指示或取得他们的批准进行的。历史证明：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支队、纵队，从未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军部闹过独立性；也未发生过不尊重上级领导、不服从上级命令和指示的事情。

问：中央书记处电报中说“郑与刘暂缓起程，待中央指示机宜及电告某种机密事件后再起程”，任老能否谈谈您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

答：我对此毫无所知。但几乎可以肯定，“某种机密事件”是与五师有关的。现在我要说的是，在郑位三来五师之前和来以后，边区和五师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尽管当时在敌伪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斗争十分艰苦、复杂，但广大干部依然英勇奋战、努力工作。郑位三来后，从1944年到日本投降，边区和五师办了三期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县、团、地、旅等中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整顿思想作风，提高觉悟，增强团结，纯洁队伍。在参加学习的数百名干部中，并未发现特务、奸细之类的问题，也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性行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借“受降”之机，侵占了我大块根据地，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艰险，但部队情况稳定，干部战士斗志昂扬，在反内战、反围困和突围斗争中，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这充分证明，边区的党组织和五师部队是无限忠于党、坚持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

问：电报说奸细打入了五师机要科内部，确有其事吗？

答：至于说奸细混入五师机要科内部一事，在郑位三同志到达五师以后，几经反复审查，始终未能证明确有此事。而且五师机要干部骨干，大都是由延安派出和刘少奇同志从洛阳带来的。五师自己培养的机要人员，也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从教导队、警卫员、宣传员、勤务员中选择的忠诚党员，现仍健在的由延安

派来的红军机要工作者、原五师司令部机要科长宋世荣证明，从抗日战争到中原突围，五师机要人员从未发生过问题。1946年中原突围前，郑位三在宣化店机要人员会议上讲话，曾表扬五师机要人员在孤悬敌后极重要的机要通讯岗位上，埋头苦干，积极工作，很好完好了党交给的任务。鼓励他们做无名英雄^①。这证明五师的机要干部队伍，是一支对党忠诚的可以完全信赖的队伍。

问：当时中央书记处为什么会发出这份电报？

答：现在看来，当时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发出这份电报，而且采取了非比寻常的部署，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掌握五师的真实情况。因为：

我们五师建军伊始，就受敌伪顽夹击，与其他兄弟部队完全隔绝，孤悬武汉外围独立奋战。只能通过无线电台向中央和军部报告部队简要情况，不可能具体、详细地反映部队全貌。而且，建军初期的两三年里，部队发展又大又快，开辟地区辽阔，还吸收一大批人参军、入党，任用了一批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改造了一批反正伪军参加抗战行列。这些特殊情况，增加了中央和军部掌握五师全面真实情况的难度。1942年7月18日，陈毅、赖传珠就以“军部与五师电台经常不畅通或中断”，“增加指挥上的困难”为由，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五师归军委指挥”。7月2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同意五师归军委直接指挥。8月7日，陈毅致电李先念：“五师地区全部工作归军委直接指挥”，“主持全局责任应由你负责”。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五师孤悬敌后，下情不易上达的实情。

在此情况下，加上1943年4月3日，中夹发布《关于继续

^① 原中原军区机要科副科长杨光远、第二纵队机要科副科长吴玉阶《回忆一事》。

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大背景下，被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提供的某些领导层干部不可信任的错误情报所误导，康生又掀起“抢救运动”，用逼、供、信手段制造了“特务”张克勤冤假错案，^①进而诬指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省党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所谓“红旗党”。而五师正是由河南、湖北党组织领导创建发展起来的，不少干部又来自这两个省的党组织，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作用。中央书记处为加强五师领导班子建设，在李先念坚持要求不做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治委员的情况下，^②特派郑位三任五师政委兼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在最初酝酿阶段，郑位三身体欠佳不愿意来，怕再遇到像四支队那样的事难以应付^③。因此，中央书记处在郑同意到五师后，便做了5月17日电报列举的以防万一的安排。1943年11月，郑位三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来到五师，受到李先念等热忱欢迎。郑来后负责全面领导工作，五师原有的领导人，都对他非常尊重，所有重要问题的决策，都是他一锤定音，凡有意见不统一，一切取决于郑。

问：郑位三来后，中央和军部对五师的看法有无变化？

答：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中局、军部和党中央听取了刘晓关

① 张克勤，1936年参加“民先”，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延安。1942年整风期间，有人检举张是特务，康生马上采取逼、供、信手段审讯张克勤，迫使张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参加的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康生抓住他制造的这个典型假案，把它当做一个大问题的突破口，进而把许多省市地下党组织打成了“红旗党”。

② 1943年2月13日、4月15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并华中局，要求不做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治委员，请求另派人来。

③ 郑位三在1937年被派到四支队工作时，遇到过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

于五师情况的报告，五师真实情况日益明朗，他们对五师的看法很快改变。1944年3月15日，华中局曾致电郑转李、任、陈称：“你们数年来在艰苦条件下，建立了广大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数质均相当强大的主力与地方军。这是由于你们内部团结，正确灵活执行中央路线（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了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结果。”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部署中，委五师以重任。5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华中局并豫鄂边区党委发出向河南发展方针指示，明确规定“豫南地区由豫鄂边区党委负责”。刘少奇、陈毅6月23日致电张、饶、李、郑^①：“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7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郑、李、任、陈^②并告华中局：“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汉平路两侧向北发展，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8月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湘、粤，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使其北与豫鄂边区，南与东江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线，指示五师协助南下支队实现向湘粤进军。这些足以证明中央书记处已消除了对五师的某些误解，对五师是充分信任的。

问：中央已决定郑位三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治委员，为什么他一直以党代表名义领导工作，而不宣布他的区党委书记兼政委职务？

答：从文献看来，中央决定郑位三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治委员确有此事，但这项决定未在边区及五师公布，郑位三没有就任也是事实。现仍健在的许多五师老同志，包括当时的区党委秘书长顾大椿、五师参谋处长栗在山、卫生部长栗秀真、十

① 指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

② 指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

五旅政治部主任刘放等高级干部，也都不知道郑位三曾任此两职。据我所知，早在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就决定李先念担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1943年2月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豫鄂边区党委，再次明确中央决定李先念为区党委书记兼师长、政委。据此，区党委蒋家楼子会议决定对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宣布中央关于李先念任职的决定。李曾两电中央及华中局，坚持要求不做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治委员。1943年2月18日，刘少奇致电李先念、陈少敏和我说：“关于区党委书记问题，中央既已久经考虑，决定要先念负责，还是不再变动的好”。“关于这个问题，望再不要提出意见，中央亦很难变更上项决定”。5月31日，即在上述5月17日电报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李先念及边区党委并华中局：“关于区党委常委组成，我们认为人数不宜太多，常委以李、任、陈组织之，以便更能集中解决问题”。此后直至1945年8月鄂豫皖中央局（后改称中原局）成立，中央并未免去李的书记、政委职务。郑位三来五师后，直到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前，都是以华中局党代表名义领导工作，从未宣布他为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1944年7月6日，华中局对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电报也说：“今后鄂中工作在华中局党代表郑位三与李、任、陈等同志领导下，我们深信你们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与华中局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和获取更大胜利”，7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关于“豫鄂边区举行首届临时参议会”的新闻报道也称：“当中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同志讲话时，台下热烈鼓掌欢迎……”究竟是何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他认为“党代表”身份，更有利于对五师的领导吧。

中原突围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

——纪念中原突围 55 周年

夏 夔

今年是中原突围 55 周年。

1946 年 6 月 26 日开始的中原突围战役揭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它的历史地位和对全国解放战争的作用与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也是不能低估的。李先念同志讲过：“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李先念文选》第 450 页）所以，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原突围，必须要了解历史情况，首先是要了解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斗争形势所作的决策与措施。在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及《毛泽东文集》等文献中，有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有关中原突围的大量文电指示。认真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了中原突围；突围前后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或批准的；同时，毛泽东对中原突围的意义和作用，也做出了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根据历史文献来阐述这个问题。

“中原逐鹿”引发了中原突围

要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原突围，必须回顾突围前的一段历史。

中原地区地处中国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有人说过：“谁控制了中原，谁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同志在文电所说的“中原部队”、“中原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豫鄂边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从河南西、中部南下的八路军王树声部以及南下湘粤边后又被迫北返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这三支部队会合后组成以李先念、郑位三为首的中原军区，辖有野战部队两个纵队，三个军区独立旅及地方团队共约六万之众，雄踞的中原解放区，是全国六大战略区之一，地处豫鄂边区的广大地域，构成对平汉铁路和武汉三镇的直接威胁。坚决反共的蒋介石认为这支军队是他发动全面内战、独霸天下的严重障碍，视之为心腹大患，必欲首先消灭而后快。日本一投降，他乘机调动大军，包括他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后改编为整编十一师）、六十六军（师）、七十五军（师）等嫡系部队，借“受降”之名，抢占武汉及其周围的多个军事要地，向中原我军大举进犯。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当然洞察蒋介石的狼子野心，他知道中原一失，蒋军势必集中全力进攻我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于是国共两党展开了“中原逐鹿”的严重斗争。《毛泽东军事文集》（以下简称《军事文集》）第三卷的《河南部队的任务》及《在桐柏山区域创造新战场》两文，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针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上造谣污蔑，毛泽东又公开发表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指出：“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

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逼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167—1168页）1945年11月下旬，“紧紧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达11个军24个师以及8个游击纵队（见《中原突围史》第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原军面对30余万敌人的围追，主力东移到平汉路东之大悟县宣化店地区。此时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蒋介石利用所谓“军事调处”为缓兵之计，继续调集、部署大军向中原军进攻。他们和日寇、伪军相互勾结，“接收”了武汉周围和鄂豫边区内的全部日、伪据点，又侵占我解放区的许多重要城镇，修筑了数以万计的碉堡工事，使我中原军处于被严重包围分割的十分不利的境地。主力四万余人被压缩在宣化店周围方圆不足一百公里的狭窄地区。国民党军又步步进逼，严密封锁，不断蚕食，紧缩包围，使中原军陷于绝粮断炊、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4月29日，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与国民党及美国代表谈判，争取中原军合法转移。（《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4—75页）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划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军事文集》第三卷189页）中原军区也提出“移兵五河^①就食”的要求，但均遭对方拒绝。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部消灭我中原部队，控制整个中原地区。5月1日，党中央三次电告中原军区：国民党有在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向西为适

^① 五河系安徽省东北部县名，当时在苏皖解放区内。

宜（引自《中原突围纪事》）。5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复电中原军：“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易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军事文集》第三卷197页）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于5月1日与国民党代表交涉，指出国民党军30万人包围我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六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制止。5月5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撤出。（《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5页、79页）5月6日，周恩来又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区视察，8日抵达宣化店，听取了中原军区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围攻情况的揭发。经过谈判，达成了停止冲突的四条协议；并向中原部队领导人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作战略转移的决定，详细研究了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等工作，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5月10日，周恩来同国民党、美方代表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事的《汉口协议》。（《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81页）使国民党于5月初进攻中原军区的计划被迫推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即使国民党军队蓄谋于短期内聚歼我中原部队，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还没有做出要中原军区主力突围、放弃根据地的最后决定；即使主力转移，也要留部队原地坚持，决不能让国民党轻易席卷中原。

胜利突围——伟大的战略转移

很久以来，流行一种说法：似乎突围是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自行决定的，是一种仓促行动；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更

有所说“李先念听从蒋介石的指令，背着党中央私自放弃大别山”等胡说八道。

历史决不能任意捏造。

国民党被迫签订的《汉口协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协议的墨迹未干，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准备更加紧张地进行，目的是在消灭我中原部队之后，腾出这30万大军去进攻华北、华东，发动全面内战，在关外、关内大打。毛泽东于5月2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各军区“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39页）6月1日，毛泽东电告中原军区领导人：“美蒋态度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同上，第246页）中原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突围作战的多项准备工作：复员一万人，通过合法手段转移伤病员近千人，化装转移一大批干部到华北等老解放区。可见突围并非“仓促行事”，也不是“毫无准备”。

6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指出蒋介石决定大打，中原部队要随时准备突围。突围的方向第一是争取可能向北，第二是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军事文集》第三卷274页）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大打，6月22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全面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要求两区部队大举向南出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徐州。毛泽东指出：“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五师^①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并指出“这一计划可保障我五师不致被消灭我吃大亏”。（同上，第284页）这样，就使中原突围和全国的战略计划紧密

^① 因中原军区部队大部分为新四军第五师所组成，故当时习惯上仍称中原部队为五师，以下各处提到的五师与此同。

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盘棋”了。6月23日，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已箭在弦上，迫在眉睫，毛泽东命令中原军“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同上，288页）6月26日，国民党军突然发起进攻，中原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除留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以一部向东行动，主力约七个旅和中原军领导机关分南北两路突围西进。

毛泽东对中原军突围极为关注。6月27日，他以中央名义电告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负责同志：“蒋介石所谓四十八小时后有惊人之举，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宥（即26日——引者注）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军事文集》第三卷303页）。当中原军主力突破蒋军平汉路封锁线后，毛泽东感到欣慰，7月5日，他致电周恩来，告以“我五师已脱危险期，到了随枣^①以北地区”。（《军事文集》第三卷322页）据现有资料，从7月3日到7月15日，毛泽东连续四次致电中原军领导人，通报敌情，指示行动，交待任务。在7月5日的电报中：向中原军通报了“蒋介石以武庭麟、宋瑞珂作战不力，未能阻我西进，饬令查办，并称，此次‘剿匪’关系整个战局及建国前途，要求努力作战。从各‘剿匪’蒋军反映一切‘剿匪’部队，均未完成任务，我方损失甚微，彼方毫无所获”。当中原突围部队粉碎了敌人追堵，分别越过丹江、襄河而进入豫陕边和鄂西北地区，毛泽东又于7月15日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原军胜利突围的意义：“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军事文集》第三卷346页）7月20日，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已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8月29

^① 指湖北省的随县、枣阳。

日，王震率三五九旅也返回陕北根据地。整个中原部队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现在还有人说：新四军五师部队在突围中被消灭了，有的被打散了，这完全不是事实。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参加中原突围的部队共约五万人（原六万，已复员及转移约一万人），在8月初，突围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我中原部队除去战斗伤亡及非战斗减员约八千人外，尚保存主力有四万之众，占85%；而且占大半的非战斗减员中，还有经组织批准沿途化装转移到各解放区的各级干部，因伤病隐蔽在群众中休息治疗的约千人。这样，我军的损失只占总兵力的15%左右，而国民党军则被歼约一万人（其中正规军占一半），并没有成建制地消灭我军一个连甚至一个排，真是“毫无所得”！蒋介石妄图一举歼灭我中原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外线作战的伟大战略作用

当中原军主力已进入豫陕边、鄂西北地区后，为什么没有转入老解放区呢？因为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统筹全局，权衡利害，立即赋予中原军以新的战略任务。7月13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原军领导人：“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的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域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军事文集》第三卷338页）7月15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

北、华中主力之作战。”（《同上》，第344页）为使中原军各部充分理解和坚决执行这一战略任务，7月24日，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南路突围部队领导人，再次明确指出：“你们的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一任务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并且要求各部“转变向华北归队及向西与郑（位三）、李（先念）会合的思想”。（《同上》362页）7月25日，毛泽东致电突围到陕南的中原军领导人指出：“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营为标准。”（同上，第364页）9月10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原局所属鄂西北区党委，要求“使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在敌人后方创立几个根据地，立稳脚跟，钳制大量敌人，这是你们的神圣任务。”（《同上》，第三卷第472—473页）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从1946年7月5日——10月23日，毛泽东对中原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电报指示达23份之多，其中有时是一天两次，不仅有发给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中原军区领导人的，还有直接给地区负责人方正平、张体学的电报指示。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原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外线牵制敌人如此重视，为此反复强调，一再说明这是光荣、伟大、神圣的战略任务，并要求把这一任务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这是他和党中央从当时形势和战争全局出发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中原逐鹿”的继续。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记载：全面内战爆发时，

国民党总兵力约 430 万人，陆军有 86 个整编师（军），248 个旅（师）。约 200 万人。蒋介石企图用 193 个旅约 160 万人（占陆军兵力 80%）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加上大量的空海军配合，力争在三至六个月首先消灭关内我军，然后解决东北问题。除其中的 11 个整编师（军），26 个旅（师）用以包围、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外，用于进攻华北、华东、晋察冀、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及广东、海南岛我游击部队的共 165 个旅。不言而喻，中原解放区牵制的 26 个旅，在战争的天平上，是一个不小的砝码。正如陈毅同志后来说的：“没有你们（指中原军）的牵制，这 30 万蒋军主力无论压在哪个头上，都是吃不消的。”（《郑绍文回忆录》第 146 页，国防大学出版社）由于当时我各个解放区军民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各种准备，兵力和装备都处于严重劣势，不得不以自卫手段进行内线作战；从战争全局考虑，我军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兵团在外线作战，用以钳制敌人，配合内线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把这一重大而光荣的战略任务赋予中原军，是对中原军的信任和重托。但是形势也是极为严峻的，国民党为防止我军立足生根，将追击和“围攻”的兵力增加到 32 个旅。共 36 万余人，中原军面临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8 月 9 日，他以军委名义致电刘邓、陈毅、粟裕说：蒋军程潜、刘峙、胡宗南及重庆行营、桂军共计 39 个旅，其中除一个旅（五十三旅）入晋，六个旅守备洛阳、潼关、西安线外，“全部用于对付我中原军，故我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因此，毛泽东要求太行、山东、华中我军积极作战，在一个月內各歼敌二至三个旅，则不仅可以使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新黄河受我威胁，而且“中原军而前之蒋军被转向东、向北者必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军事文集》第三卷 396 页）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华中、华东、华北

连续大捷之后，蒋介石不得不从追击的国民党军队陆续抽出一部分兵力去增援应急，但到9月11日，围攻我中原军的还有十四个正规旅，兵力超过我军三倍以上，而且敌军装备精良，粮弹充足；而陕南、鄂西北地区，都是山大人稀，地瘠民贫，粮食奇缺，我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无法医治，集中则遭敌正规军“围攻”，分散活动受敌地方保安团队袭击，战斗频繁，部队疲劳不堪，人员有减无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仍英勇无畏，艰苦奋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鄂、豫、皖、陕、湘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把蒋军十多个旅死死拖住，给在内线作战的我华北、华东主力以有力的支援和配合。起到了极重要的战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当我北路突围部队越过丹江即将入陕时，蒋介石惊恐万分，三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歼灭。”胡宗南便将他的精锐嫡系整编第一师、七十六师、九十师各一部进至鄂、豫、陕边进行堵击，阻止我军人陕；据其战区政治部主任、西安警备司令当时自述：“李先念之企图系占领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军事文集》第三卷346页）。后来我主力进入陕南，王震所部占领镇安以后，胡宗南又不断增兵防堵、“围剿”，共达九个旅之多，使进攻延安的计划再度推迟。这就为我陕北军民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准备工作赢得了半年以上的宝贵时间。这种战略上的配合作用，还可以从华北战场看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记述：“中原解放军自6月底开始突围，到8月中旬，敌人追围堵截的兵力增加到30多个旅，并大部被我牵制到豫西、陕南地区……陇海路开封，徐州之间及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只有敌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共6个旅及地方团队担任守备。”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机于8月10日发动了陇海战

役，攻占兰封等五座城，歼敌两个旅连同保安团队 1.6 万余人。该《战史》指出：“中原解放军英勇突围坚决奋斗，拖住了五倍于己的敌人……给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反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野战军战史》第 47—50 页）

关于中原军外线作战所起的作用，连我们的敌人也是承认的。当时参加“围剿”我鄂中、鄂西北地区的蒋军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后来写道：“蒋介石、陈诚妄想一举消灭李先念所部于宣化店地区，不但被李先念将军等先期行动所粉碎，而且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回到陕北，皮定均率一纵一旅到达苏皖地区，王树声、刘昌义、罗厚福等开辟鄂北游击区，张体学在鄂东，李人林支队在鄂中，均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四个师的兵力，迫使蒋军整编十四师、十五师、六十六师和七十二师在 1946 年下半年不能北调苏鲁战场，这就大大削弱了蒋军的作战能力，并对以后解放军的战略反攻起了一定的作用。”（引自《文史资料选编》第 81 期）宋瑞珂在这里没有提到陕南、豫西，那里被牵制的蒋军远超过了这四个师。

从以上事实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中原部队在外线作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对全局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为了全局的胜利而牺牲局部是值得的。刘少奇同志当时在延安曾对李先念等同志说道：“中原部队在外线作战，今天已经起了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起的作用小。”陈毅同志在 1947 年 10 月接见中原部队干部时说：“有人说中原突围是个错误，部队受了损失……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李先念传》第

鼓励、表彰与评价的六个“极大”

全军最高统帅毛泽东，深知中原军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在解放战争的全局棋盘上，把这枚重要的“棋子”落在何处，如何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又如何保存这枚“棋子”不被敌人吃掉，是他昼夜思考、运筹帷幄的大问题。为了在中原逐鹿，毛泽东曾指示中原军在桐柏山区开辟新战场；国共停战协定后，为争取和平，曾要中原军就地停战，等待整编；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紧密包围，阴谋聚歼时，又计划使中原军合法转移；遭到国民党拒绝后，这才下令“立即突围”；突围胜利，他立即决定中原军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境内，进行外线作战，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内线部队取得胜利。实践证明，这实在是一着妙棋。中原军在外线作战，虽然受到不小损失，但没有被消灭。在皮定均旅进入苏皖解放区，王震率三五九旅安抵陕北根据地后，在豫鄂陕边区及鄂西北、鄂中、鄂东等地作战的，还有两万多人战斗部队。到1947年3月、4月间，这些部队虽有不同程度的减员，但在豫鄂陕边、鄂西北、鄂东、皖西及大江南北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原部队还有一万多人，继续执行着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大量牵制敌人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对这些部队的安危表示严重关切。1947年3月11日，是胡宗南进攻延安，战斗万分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就在这一天，致电刘邓及陈赓：“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部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部队救援”；“一个旅渡（黄）河接护五师，主力四个旅即刻占领同蒲线。”（《军事文集》第四卷7页）4月15日，当中原部队一部撤到黄河以北山西境内时，毛泽东即

致电刘邓等晋冀鲁豫军区负责人：指出：“五师文（建武）汪（锋）部 7000 人是该师精华，你们应当做自己的建制部队一样给以积极帮助”，补充兵员武器，进行整训，给予适当战斗任务“使该部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以便将来和大军一道出河南作战”。（《毛泽东年谱》下卷 185 页）中原部队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的期望。这支部队在山西晋城休整短时期后，整编为一个纵队，当年 10 月，由李先念率领南下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会合，同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原独立旅合组为江汉军区，进军平汉路西，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当时这支部队的兵力为三个旅，1.1 万余人。这是由在外线作战的中原军集中组成的一支成建制的部队。他们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作战，到 1949 年 5 月即中原突围三周年前夕，共歼敌七十九军、二十八军等部 4.6 万余人，部队发展到 4.3 万余人，不仅全部收复了失地，还扩大了解放区。（据《江汉军区战史》。不包括皮定均旅及三五九旅，也不包括在陕南、鄂东、皖西坚持的中原部队）谁能说中原部队在突围中被消灭了呢？！

毛泽东对于中原军胜利突围和在外线作战所起的作用，是了如指掌的，他多次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 7 月 15 日他为中央起草致中原军领导人电指出：“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军事文集》第三卷 346 页）。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毛泽东评价中原军突围和在外线作战的意义及其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的很大，或者是重大、巨大，而是“极大”。据辞书解释，极者是达到顶点，有最高的意思。“极大”一词，显然比很大、重大、巨大……包含有更大一些、更为重要的分量，据我所知，毛泽东用“极大”来评价、鼓励、表彰中原军的行动与任务，先后还有五次之多。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荣。中原突围后不久，即 7 月 5 日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原军领导人郑

位三、李先念等同志：“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等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军事文集》第三卷324页）7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领导人：“希望你们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并为全局牵制大批敌人，这有极大战略意义。”（《毛泽东年谱》下卷105页）9月11日，当中原军已开始分兵创建根据地，正处于被敌重兵“围剿”的困难时刻，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电中原局和鄂西北、鄂皖边党委，通报各地战况及中原军任务，再次指出：“在陕南、鄂西、鄂中、鄂东对付我中原军者共14个旅……我中原军的任务就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创立根据地，钳制这十四个旅，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你们过去两个月的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要起同样的作用。全党全军均关心你们，你们不是孤立的。”（《从延安到北京》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①在著名的《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又一次写道：“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的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207页）1947年5月28日，在中原军已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解放战争即将进行全面反攻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部队全体同志的慰问电中，第六次用“极大”来肯定中原部队的斗争及其所起的战略作用：“我中原部队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鄂西、鄂中、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

^① 此电未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集》，据《毛泽东年谱》下卷132页记载，系毛泽东起草。

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以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斗争中，虽然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郑）位三、（李）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 250 页）

读了这份慰问电，我想，没有谁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原军的战斗历程，也没有谁能够把中原军对全国解放战争的作用和贡献做出如此光辉的总结和崇高的评价。

中原突围已经过去了 55 年。重读这份慰问电，重温这六个“极大”，过去中原突围的是非功过、得失胜败，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了！而一切参加过这一斗争的同志，都应该感到自豪和光荣；所有在这一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先烈都可以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了。

陶铸同志的领导方法

顾大椿 李简田

抗战初期，陶铸同志在湖北鄂中主办的汤池训练班，其规模不过是一个百人左右的小单位，连续办了四期，训练了 600 余名干部，以此为基础，创建了鄂中抗日根据地。因此，他受到了党中央的称赞和同志们的敬佩。这表明他在领导工作中出色地使用了毛泽东的若干领导方法，不论现在和今后，这些方法都有借鉴的意义。现试析它的主要点，供作研究参考。

一、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方向

抗战时期，国内存在着两条对立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压迫人民，实行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而共产党实行的是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人民战争的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争取斗争胜利的方向。陶铸同志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1974年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为陶铸同志致悼词时就指出：“陶铸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创造了鄂中游击区。”高度评价了陶铸的领导工作成绩和领导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军事路线处于异常重要地位。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他提出武装人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① 1938年5月又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② 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文中指出：“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③ 敌后游击战争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陶铸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这一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把建党、统战、发动群众、办训练班等工作都紧紧为了一个总目标，即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华北、华东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展开，根据地已有一定规模。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指示长江局准备发展游击战的情况下，认识和准备发展游击战，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并不是难事，贵在陶铸一开始时就深刻地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自觉地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后来他虽受到当时长江局主要负责人王明的错误指责、撤职，以及蒋介石、省主席陈诚和国民党政务组织纷纷出动所进行的阻挠破坏、扣押、驱逐出境，他始终不动摇，机智地和王明的错误及国民党的破坏作斗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终于创建了鄂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到1939年6月，李先念南下与鄂中特委和陶铸会合时，鄂中地区已有武装2000余人枪，活动地区达9个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3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4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09页。

成为豫鄂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方向，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而且要紧紧抓住不放，顶住一切困难，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是一个重要领导方法，也是优秀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职责。

二、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

（一）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9月，中共驻武汉代表董必武由延安来到武汉。他德高望重，广泛接触了老友新朋、各界人士，广泛开展统战活动，他和湖北建设厅长石瑛商定办训练班，培养干部，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经杨显东（建设厅技正）、孙耀华（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发贷主任、辅导员）居间联系活动，很快决定在汤池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建设厅出经费，董老派干部来主持。

当时，陶铸刚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认识到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自告奋勇去办训练班，经董老同意，从此他全部精力都投入这个工作。

办训练班培养干部是我党的传统。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董老、周恩来也曾对杨显东说过，目前国难当头，抗战第一，要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把敌人赶出去，办好汤池训练班非常重要。这是发动群众的一条必由之路。汤池训练班的工作意义重大，必须把它办好。

（二）毛泽东在论述战略领导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时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

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去规定”。“总之，一个原则，就是要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

董老高瞻远瞩，从当时湖北即将沦陷，鄂中大部分地区没有红军游击队和党的组织的实际情况，抓住通过办训练班培养干部，发展党组织，以便发动群众，准备游击战争，这个关系全局的重要关节，显得格外重要。陶铸同志也同样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办好汤池训练班这个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上，他和李范一、杨显东团结合作，推诚相见，互相尊重，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领导管理训练班的各项工作，终于培养了大批干部，至武汉失守前发展了200多名党员，建立了鄂中地区11个县的党组织、群众团体，并且通过统战关系掌握了一批武装，为开展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做了最实际的准备。武汉、鄂中相继沦陷后，他大力抓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和武装斗争，成功地创建了鄂中抗日根据地。1984年10月，李先念题词：“汤池是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高度评价了汤池和竹沟、七里坪一起作为三个战略支撑点起了战略作用。

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必须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重要的领导方法。陶铸遵循毛泽东1938年关于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右倾投降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176—177页。

义倾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认为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的教导。^① 正确地运用这个领导方法，同“左”和右的倾向作了斗争。

（一）放手发动群众，防止关门主义

陶铸在鄂中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其中有国民党官员、乡保人员、爱国资本家、商人、地主、农民、绅士、教师、知识青年、妇女。汉流遍布鄂中，陶铸提出“汉流里有群众，凡有群众的地方，就应到那里去工作”。为此，设立了汉流工作委员会，成功地争取了汉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收编、改造了他们所掌握的武装。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锻炼成为军政领导干部。陶铸在统战工作、汉流工作以及发动群众等等工作中，既抓紧放手发动，又防止关门主义，不仅作一般号召、指示，而且他总是亲自动手，典型示范，实行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既训练了干部，又推动了整个工作。

（二）向统一战线问题上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1937年，王明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经党中央，公开散布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他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拒不执行中共中央要华中与豫鄂边区动员武汉群众，到乡村去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屈服于蒋介石、国民党地方政府、特务的压力，三令五申要湖北省委解散党在鄂东七里坪和鄂中汤池办的训练班，批评陶铸太左了，不准陶铸在训练班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 394、532 页。

共产党、讲游击战争。还说如再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等等。国民党方面也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汤池训练班只好停办。但陶铸坚定地表示：“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用别的名称办，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但内容不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陶铸目标明确，态度坚决。坚决抵制来自国民党和王明两个方面来的压力。在李范一先生协助下又办了一期“临时学校”。他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但惹恼了王明。1938年6月，在王明指示下，湖北省委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给他扣上“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以“另有任用”为借口，撤除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王明的错误严重危害了党在长江流域的工作。陶铸坚定地反对了这一错误倾向，减少了工作损失。

在吸收党员中，防止了“左”右倾，他既重视发展矿工为党员，又大量吸收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吸收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职员中的进步分子如张谦光，以及地主阶级和汉流头目中的进步分子如黄定陆。陶铸实行了毛泽东提出的对党员条件，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主要是重在政治表现的要求。

在党内斗争方面，他坚定地反对了王明的右倾错误，面在王明和省委错误地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受到错误处分时，他向组织上公开表示思想上不同意，但在组织上“服从组织决定”，表示他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

在训练班的课程设置方面，他坚持设置马列主义、游击战争课程，反对取消这些课程的主张，同时也设置了合作社课程，把它看做是重要业务课，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敲门砖”，纠正了轻视它的“左”的观点。

四、领导必须有预见

毛泽东历来重视领导必须有预见。1936年他就指出，战略指导者，估计前途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政治对战争是不利的。1945年更明确提出：作为领导，必须有预见。先预见就是预见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陶铸在鄂中工作时，运用了预见方法推动了工作。他在汤池办合作社训练班时，预见到武汉鄂中沦陷后，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就坚持以培养游击战争骨干为主，以最后赶走日本鬼子为主要目标。预见到下一步就是要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夏，他亲自带领干部前往京山、钟祥、大洪山一带考察，并绘制了地图，以便选定根据地的地点。武汉沦陷后，鄂中特委杨学诚集结部队进入京山石板河、了家冲，后来这个地区成为鄂中党委，豫鄂边区党委多年的驻地，也是边区根据地中心地区之一。他预见到打游击时需要救护队，就在汤池训练班增设了救护工作训练。1938年8月日机轰炸京山县城，他带师生组成的救护队前往慰问、救护治疗。鄂中游击战开始后，就建立了医疗队伍。栗秀真是救护训练工作和医疗队的负责人。

武汉沦陷前，他预见到鄂中游击战的前景，湖北省委撤除他的职务，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要求仍回鄂中工作。国民党驱逐他出境，周恩来鉴于武汉沦陷在即，指示他暂留沙市、宜昌待命，随时准备回鄂中。1938年9月初，他离开汤池训练班时，面对热烈欢送的群众激情地表示，“走是暂时的，一旦沦陷我一定回来和你们一起打游击。”10月武汉沦陷，日寇铁蹄踏进鄂中，陶铸立即从宜昌起程，穿过向西溃逃的国民党乱军洪流，向东前进，11月上旬到达京山丁家冲，和鄂中特委杨学诚及其武

装会合了，从而实现了他的诺言和预见。鄂中的干部、战士也欣喜若狂，庆幸有了坚强的领导人。他回来后狠抓发展武装、建党工作，鄂中工作迅速发展，并于1939年初亲自率领队伍，在京山公安寨伏击日军皇族劳军团，击毙其团长和日军20余人，攻进日寇占领的云梦县城，震惊了敌伪，振奋了人心，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抗战的信心。

1940年5月，他奉调去延安，仍然关心豫鄂边区，写出专论，论述了豫鄂边区的战略作用和发展前景及其在抗日反攻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他设想豫鄂边区和苏皖等地连接起来，是很有远见的。他是毛泽东所提出的那样的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五、优良作风

优良作风也可以说是一种领导方法，它无声无字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影响力。陶铸自觉地保持了党的优良作风，其突出之点是：

（一）忠心耿耿 抗战前他被国民党判无期徒刑，坐牢五年，坚贞不屈。他写诗道：“五年狱里艰辛过，一笑昂然对镜头，珍重此身须记取，阶级仇恨有深留。”表达了豪迈、坚贞的胸怀。1937年国共合作经周恩来营救出狱，投入工作8个月左右，被王明错误地撤除了职务，又为国民党驱逐出鄂中。鄂中沦陷后，他主动重返鄂中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被国民党第五战区扣押，在川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郑绍文把他保释出来后，他又很快回到鄂中根据地。陶铸同志1937年出狱后，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受到打击、迫害，他不仅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更加坚强了。1939年他写的《大洪山打游击》一诗曰：“寇深日

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日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这是何等豪迈的誓言！

1937年毛泽东论述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①陶铸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富于牺牲精神的干部和领袖。

（二）以身作则，艰苦奋斗 他在党员中起了模范作用，他带病工作，生活朴素，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战斗，言传身教，熏陶了广大干部。鄂中党在陶铸同志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李范一和陶铸共事相处，深有感触地说：“要抗战，就要团结、进步，就要学习和依靠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分子，不愁办不成大事。”他写了一个条幅送给陶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贴在陶铸宿舍的墙上。陶铸同志的好作风使党和人民心连心。

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更是革命者的本色。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继承发扬它，永远不能变。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风问题成为党和人民关心的焦点，让陈云的告诫，作为警钟长鸣。把革命先烈优良传统和作风继续发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 277 页。

豫鄂边区的反顽斗争纪实

马 焰

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停止战略进攻，开始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诱降活动，蒋介石也为妥协投降制定了反共政策，挑起反共摩擦，与日寇的诱降相呼应。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融共方针，秘密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防止异常活动办法》议案，加强国民党组织和保甲制度，制造反共摩擦，以限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①。随后就在豫鄂边制造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摩擦事件，镇压取缔抗日进步力量。捕杀共产党员，袭击吞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严重阻碍了动员组织人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这年春夏之交，新四军挺进鄂中敌后打击敌伪，深受人民拥戴，但遭反共顽固派仇视。蒋介石数次电令新四军军部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说鄂中不是新四军防区，在鄂中、鄂东活动的新四军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顽固派还在鄂南袭击、吞并、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318、323、325页。

瓦解了中共领导的樊湖大队、梁湖大队、阳新八路军抗日游击大队、鄂南抗日游击纵队第四支队、崇阳自卫大队、崇阳抗日游击支队、湘鄂赣游击总指挥部直属咸宁第二大队。在鄂东歼灭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惨杀指战员和抗日群众 200 余人；偷袭新四军挺进团后方机关，围攻张体学领导的二十一集团军独立第五大队制造“夏家山事件”，杀害干部战士 100 余人。在鄂中，五战区当局解散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鄂中国民党专员石毓灵撤销应城进步县长孙耀华职务，并一度扣押共产党人陶铸，广西军鲸吞共产党员杨威领导的应山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一二八师骗编周干臣领导的汉川抗日游击大队，连以上干部几尽被杀害。在豫南，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调走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信阳县长李德纯，破坏了信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第一战区当局借口点验，编并了千余人枪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国民党罗山县长梅治朝勾结黄瑞华游击纵队，乘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深入（黄）陂孝（感）敌后进击敌伪时，突袭该大队杨店通讯处，杀害中共罗山县委书记兼通讯处主任杨厚益等五人。11 月 11 日，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派少将参议耿明轩为总指挥，纠集 2000 余人围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竹沟留守处，残杀伤病员和家属 200 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原的“竹沟惨案”。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 年 1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由政治反共进入军事“剿共”，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豫鄂边区地处中原抗日前哨，敌伪和顽固势力并存，各种矛

盾互相交织，斗争错综复杂。华中日军由于共产党新四军在武汉外围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阻滞了他们向川陕进攻势头，打破了他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美梦。为克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困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巩固其统治，就以驻武汉外围9万兵力的半数和拼凑的3万伪军，以军事“扫荡”为主要手段，把主要矛头指向新四军。国民党组织的武汉会战失败后，退居武汉外围豫鄂湘赣边界山地的40万国民党正规军和隶属于他们的10万余形形色色的地主反动武装，在蒋介石“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反动指令下，以对日伪发动“冬季攻势”为名，派出大批部队伸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磨刀霍霍，操戈以待。这一格局表明，豫鄂边区的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随时都处于敌伪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中，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为坚持和发展武汉外围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敌后根据地，边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关于创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统一整编三地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五师前身），坚决遵循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高举抗日旗帜，积极打击敌伪，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严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旗帜鲜明、勇敢坚定地展开自卫斗争，坚决还击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配合苏皖兄弟部队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驻大洪山中的国民党川军一六一师，在五战区驱使下，向新四军大山头根据地进攻。我挺进纵队致函该师官长，印发告川军书，呼吁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对敌。但该师不听劝告，我军迫不得已起而还击。该师在丢人失枪后，停止进攻，据险对峙。我军依据自卫斗争的休战原则，适可而止，不予追击。发动指战员阵前喊话，向川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被俘川军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予以释放。川

军官兵有所触动，不得不悬崖勒马，撤回原防。

驻防监（利）沔（阳）的国民党王劲成一二八师一部，3月间越过襄河，进入天门干镇驿、竹桥一带，伪装土匪进行抢掠，企图侵占我天（门）汉（川）抗日根据地。我挺进纵队四团应群众要求，配合地方武装将其击溃。战后对其进行统战工作，该部退回原防。5月，李先念司令员亲赴天汉，派地委组织部长易家驹与王劲成谈判，达成各守防区，互通情报，共同对敌的谅解协议。襄（河）西地区的党和部队，积极开展对原属西北军的三十三集团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长期在国共摩擦中基本保持中立。

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游击总指挥程汝怀是个反共老手。他曾任湖北省防军和国民革命军的旅、师长，因“清党”有功，升任国民党十九军军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第四行政区专员和保安司令。十年内战时期，他在鄂东组织民团，编保甲，修碉堡，围困革命根据地，疯狂镇压革命力量。抗战爆发后，他率所部地方武装2万余人盘踞鄂东，不打日寇，专事反共，“游击”百姓，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群众欠下了累累血债。1940年初，又乘挺进纵队配合友军反攻平汉路日军，破坏罗（山）黄（陂）公路时，令其所属十九游击纵队截击新四军后卫部队，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据此，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令挺进纵队进军鄂东，反击程汝怀部，建立鄂东抗日根据地。1月中旬，纵队首长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亲率两个团，穿越平汉铁路进击驻小悟山的十九游击纵队刘梅溪支队，经两昼夜激战，歼其700余人，残部逃往大悟山。为避免与广西军直接冲突，我乃撤军西返。2月中旬，挺进纵队两个团再次进军小悟山，全歼伪顽两面派贺永慈部。3月蒋介石策划华中顽军进攻新四军皖东根据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挺进纵队进军鄂东，牵制大别山广西军东调，从战

略上配合新四军四、五支队的反顽斗争。挺进纵队组建鄂东独立团，向黄冈敌占区挺进，中途遭程汝怀部十六游击纵队袁绍祺支队截击，独立团奋勇还击，将袁部驱逐到黄（安）麻（城）边。第一次反共高潮末尾，国民党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部，图谋进攻新四军淮北、皖东、苏北根据地，中央军委、中原局电令挺进纵队，在平汉路西取守势，增兵路东打击程汝怀，牵制广西军进攻皖东。4月17日，李、任、刘率主力一、二、三团及信应总队，东进大、小悟山，击溃顽军2000余人，生俘支队长刘亚卿及其特务大队长以下百余人，完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使陂孝与（黄）陂（黄）安南根据地连成一片。至此，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豫鄂边区以失败而告终。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豫鄂边区顽固派的反共挑衅并未完全停息。4月23日，程部十六游击纵队李九皋率2000余人窜扰陂安南，被鄂东独立团驱逐。5月初，广西军一个团入侵陂安南根据地，杀害中共县委书记杨业珍。中旬平汉支队二团东进，配合鄂东独立团收复了陂安南。6月2日，国民党广西军第七军军长张淦指挥两师、两个游击纵队共万余人，分路进攻大、小悟山，新四军奋战四昼夜，于5日全部突围转移平汉路西，顽军惨杀我伤病员和群众400余人。为揭露顽固派挑起内战，破坏团结的血腥罪行，李先念6月20日通电全国，向国民党五战区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斗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过程中，数度东征，歼灭了程汝怀的部分有生力量，牵制了广西军向东进攻新四军的兵力，并于安陆李家冲主动驰援被日军包围的川军一二七师李团安全突围，收容国民党九十四军对日作战的伤员。团结抗战支援抗日友军，戳穿了顽固派的造谣诬蔑，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

的政治影响。

粉碎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以消灭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为目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总司令，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率30万大军向华中新四军进攻。

在蒋介石策动下，五战区对豫鄂边区的反共活动空前加剧。10月国民党新二军九十一师一部配合地方顽军曾宪成、周赞廷、左墨香部3000余人，向驻石牌地区的挺进纵队襄西独立团进攻，独立团给顽以沉重打击后，转移襄（阳）沙（市）公路西休整。几天之后，新四军一部歼灭了窜入南湖的曾宪成部手枪队和一个中队，重新控制了石牌地区。同月，程汝怀调集十七、十八游击纵队和保安八团，在鄂东发动了所谓“三月围剿”，进攻活动在浠水、蕲春、黄梅、广济的挺进纵队鄂东独立团。该团留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派小兵力向广济湖区和陂安南行动，以分散顽军兵力；主力部队则远出宿松、太湖边境，在外线牵制顽军。顽军找不到独立团主力，日夜奔波，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此后独立团在宿松两次反击顽军，歼其一个中队，程汝怀的“三月围剿”即告失败。11月，国民党三十九军向鄂中抗日根据地进犯，由于新四军做好了战斗准备，对川军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及某些地方势力开展了颇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基本稳住了鄂中局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国民党五战区集中10万兵力，划豫鄂边区为鄂中、襄西、鄂东三个“清剿”区，妄图于2月底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边区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指示华中的党和军队，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坚决打退反共军的进攻。中原局、新四军军部赋予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战略任务是：独立坚持战略地位重要，而在地理位置上却远离兄弟解放区，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的边区抗日根据地，以一部武装沿江而下，打通与皖中新四军的联系。1月下旬，李先念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反共军的新进攻》的命令，宣告“豫鄂边的各武装部队，决心粉碎顽军的进攻，坚持游击战争，并配合皖东、皖北我军作战”。命令强调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必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坚定与最积极的军事行动来完成。”^①命令还规定了反顽作战方针和工作部署：挺进纵队普遍向指战员进行了深入的形势教育，极大地激起了干部战士的阶级义愤，决心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报仇，保证奋勇杀敌，保卫边区抗日阵地。各地党政部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反内战动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准备妥协投降的罪行，宣传共产党新四军反对内战、坚持抗日的政策和决心。农民、妇女、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协助政府扩军、筹粮，许多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

党政军民还利用蒋嫡系部队与杂牌军、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很多杂牌军对反共内战消极观望，他们有的按兵不动或略作敷衍，有的事前还给新四军送来情报。坚决执行反共命令的只有蒋嫡系部队和部分广西军及程汝怀、曹勳等地方顽军。这就便于边区党和军队取得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权，集中力量对付顽固派，从全局上粉碎顽军的进攻。

^① 《李先念文选》，26、28页

1941年1月中旬，蒋嫡系新二军等5万余人向信（阳）应（山）随（县）地区进攻，企图捣毁驻白兆山地区的纵队首脑机关。挺进纵队主力按预定战略转移京（山）安（陆）地区，待机反击，主力一部配合地方部队在白兆山开展游击战，迟滞顽军前进。另以一个团配合京（山）应（城）地方武装在京北活动，防止顽军伸向该区。侵入白兆山的顽军，奸淫烧抢，肆意破坏抗日根据地，引起群众切齿痛恨。1月底，纵队集中两个团及京安应随地方武装，运用迂回包围战术，突然夜袭在刘店一带过春节的新二军预备十五师一个团，连续攻克青、白莲寨，直取刘店街，歼灭该团大部，击溃曹勛第六游击纵队两个支队，反共军气焰大挫。此时，中原日军乘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之机，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溃败，进攻边区的顽军撤回原防，白兆山区重归新四军控制。

2月，进攻河南的日军撤兵，怯于对敌勇于反共的国民党顽军卷土重来，再次部署对边区的全面进攻。顽军新二军3个师配合7个游击纵队，向豫南鄂中侵犯。广西军两个师和4个游击纵队“清剿”鄂东，五十九军一部配合荆门、当阳、钟祥地方顽军，向襄西根据地进犯。他们扬言要在4月以前，歼灭豫鄂边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决定乘顽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首先打开鄂东局面，而后回击鄂中顽军。部署部分兵力，分别在鄂中、豫南、襄西坚持斗争，牵制豫南顽军南下和襄西顽军东进。

2月10日，程汝怀的十六游击纵队袁绍祺支队，侵入陂安南觅儿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我纵队一、九两团发起反击，当即将袁部全歼，并打退了前来增援顽军的一个支队，巩固了陂安南地区。

2月17日夜，纵队以4个团兵力进击占领大、小悟山的程汝怀十九游击纵队，经3天战斗，攻克顽军全部阵地，并击退由应山以北来增援的广西军。这次战斗俘顽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

2000 余人，使大、小悟山从此成为边区首脑机关新的指挥阵地。战后释放了刘亚卿，并与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

2 至 4 月间，坚持鄂中斗争的部队，紧密依靠群众，打退了顽新二军及第六游击纵队对随（县）南的进攻，保卫了中心根据地。豫南部队击退广西军和地方顽军对信南、信罗边、罗礼边的进攻，粉碎了敌伪千余人的“扫荡”，恢复了四望山地区，进一步巩固发展了豫南抗日根据地。坚持襄西的部队，粉碎敌伪对石牌、四明山两次“扫荡”后，又相继打退了顽军周赞廷部和五十九军对荆（门）南、当阳等地的进攻，保卫了襄西根据地中心区的安全。

3 月，纵队九团再次东进鄂皖边，在浠（水）、蕲（春）边彭思桥反击顽军蕲春县自卫队，并对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沈光武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火线统战工作，向该部宣传新四军团结抗战主张，送还其被俘人枪，让道将沈部放走，沈部保证不再参加反共内战。沈部撤走后，守碉堡顽军求援无望，乃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彭思桥战斗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策略取得军事、政治双胜利，是“大线”统战工作的范例。4 月该团东进宿松陈汉沟，与新四军七师挺进团胜利会师，首次沟通了与兄弟部队的联系，并在沿江地区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鄂皖边敌后抗战局面。挺进纵队也于此时正式宣布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经过上述一系列斗争，与全国挫败第二次反共高潮相一致，豫鄂边区的反共高潮也于 4 月初基本平息下来。但为时不久，程汝怀甘受李品仙驱使充当反共先锋，又向鄂皖边进攻。五师遵照军部指示，投入 3 个团兵力发起浠水、广济、漕河 3 次战斗，歼灭程部县自卫队 7 个中队、一个游击支队和保二旅第二团。任质斌副政委亲赴前线，运用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争取了保一旅 4 个营千余人脱离程部，被编为鄂东抗日自卫团，成

为五师的外围军。不久，该旅余部又在麻城乘马岗被五师歼灭。1942年3月，广西军和程汝怀部又以9个团兵力进攻鄂皖边五师十四旅部队，十三旅一部挺进顽军后方分散游击，与十四旅遥相呼应，鄂东反共浪潮遂于4月平息。

挫败五战区连续8个月的“围剿”

1942年春天，日寇进攻南洋战争告一段落。蒋介石集团估计德军对苏联夏季攻势开始时，日军必会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便想借机掀起新的反共高潮。3月28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首先歼灭华中新四军，并要五战区短期内消灭第五师。后因日军并未进攻苏联，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未能得逞。但国民党五战区却对豫鄂边区发动了连续8个月的大“围剿”，日伪也不断对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五师遭受敌顽夹击，局势空前严重。可以说，在此后风狂雨暴的8个月，是豫鄂边区和五师生死存亡的8个月。

国民党五战区当局此次进攻，具有明显特点。一是乘日军进攻浙赣线，驻中原兵力空虚的时机发动。二是兵力庞大，部署周密。此次国民党军投入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游击支队，总共兵力达10万之众。将豫鄂边划为5个“清剿”区，任命陈鼎勋等5个军长为“清剿”司令。各区按计划统一行动，实施大“围剿”。三是军政配合，将国民党豫鄂党政总队分属各“清剿”区，疯狂破坏根据地建设，恢复反动统治。四是勾结敌伪夹击新四军。鄂东顽军程汝怀、王啸风致函麻城伪县长，保证决不攻击日军，要求日伪在其进攻新四军期间“予以谅解”。还与汉口日军特务部交涉，彼此承认为中立军，互不侵犯。鄂中顽军曹勛派人请求京山、安陆日伪军与其配合“进

剿”新四军。国民党五十五军也向礼山余家店日军保证：“专打新四军，决不扰乱皇军。”五是采取多路推进战术，各路同时展开进攻，一齐向中心区推进，妄图将五师主力压迫于平汉铁路两侧，加以歼灭。4月下旬，各路国民党顽军先后到达边区周围，5月1日展开全面进攻。窜入根据地中心区的国民党党政特工人员，四处编制保甲，实施“五家连坐”，培植土匪势力，杀害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疯狂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

面对紧张、复杂和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形势，五师和边区人民以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决心“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坚决粉碎敌顽夹击，打退新的反共高潮。区党委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自卫斗争。五师确定先对深入边区的顽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以运动战相机打击坚决反共的顽军。大力向鄂南敌后发展，扩大回旋地区。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敌伪军工作，充分利用顽军内部和敌顽之间矛盾，粉碎敌顽夹击阴谋。

首先抓住有利时机，反击进攻的顽军。在信南歼灭地方顽军两个中队，将顽第一游击纵队逐出大庙畈；顽六十八军两个团在群众空室清野困扰下，被迫北撤，信南局面趋于稳定。我军又集中4个主力团，6月5日发起圣场战斗，痛击反共最坚决的蒋嫡系暂一师，全歼该师第二团两个营，毙伤俘营长以下700余人，沉重打击了暂一师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前后，坚持白兆山区顽后斗争的部队，对顽作战40余次，阻击侵犯京北地区的部队，顽强抗击暂一师及第六游击纵队的进犯，歼顽500余人，迟滞了顽军前进，胜利完成了牵制顽军的任务。

与此同时，十四旅一部飞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为创建大幕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京山、天汉、襄西和破安南的地方武装，也粉碎了敌伪有意识配合顽军夹击新四军发动的数次“扫荡”，歼敌伪430余人。

六七月间，各路顽军向边区中心区进逼。在顽敌勾结下，敌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日益频繁。日伪在襄南、鄂中增设据点，强化敌伪统治，边区许多重要山地湖沼地带，或被顽军侵占或被敌伪“蚕食”。边区领导机关和十三旅、十五旅部队，被压迫至平汉路以西、沮水以东的狭长平原及丘陵地带，战局转入更加艰苦、更加严重阶段。

区党委、五师首长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及军部指示精神，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做出新的部署。确定3个主力团于平汉路两侧，抓紧战斗间隙休整补充，提高战术水平，寻找战机打击坚决反共的顽军。对非嫡系国民党部队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其暂时中立。抽派精干小部队，配合各分区地方武装，分路挺进顽军后方开展游击战，牵制顽军对中心区的进攻。命令活动于鄂皖边的部队，配合二、七师反击广西军第七军的进攻，保持江北与鄂南的联系。继续发展鄂南，积极袭击敌伪据点，开展对敌伪军的政治攻势，利用敌顽矛盾，打破敌顽勾结对我军的夹击。

军事上采取避实击虚突然袭击战术，打击鄂东分散薄弱之顽军。6月底顽军保一旅二团侵入黄安八里湾地区，捕杀五师后方医院伤病员和地方工作人员。五师两个团反击该顽，经两昼夜战斗，歼其一个营，残顽狼狈北窜。8月初，十三旅北进配合自卫四团，发起两道桥战斗，反击侵占（黄）安麻（城）边的保三旅一团，摧毁顽军碉堡10余座，全歼顽军两个营，击溃来增援的桂军4个营，策应鄂东反顽斗争。十四旅分东西两路再次进军鄂南。7月中旬在咸宁高榎桥会师。8月进行了刘仁八战斗，击溃阻挠我前进的顽湘鄂赣第五游击纵队3个支队，俘顽官兵300余名。

8月，蒋介石集团在我党政治揭露和军事反击下，迫于国内外压力，放弃了全国性反共军事计划，全国形势趋向好转。武汉日军向边区根据地“扫荡”，侵占鄂中的顽军仓皇后撤，鄂中局

势稍有缓和。这时，国民党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又开进鄂东，配合保四旅向大、小悟山根据地进攻。五师集结十三旅等4个团配合一分区3个小团地方武装^①，于31日晨发起反击保四旅的礼（山）北战斗。采取围点打援、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和中立一部、歼其大部的策略^②，取得了全歼保四旅旅部和两个团及礼山县3个自卫中队的胜利，活捉顽旅长蒋少璠、团长刘亚卿、县长钟锦德以下官兵2000余人。战后经教育将蒋、刘、钟释放。进攻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和（黄）安麻（城）边的顽军闻风丧胆，纷纷北撤。罗礼经光、安麻边与礼（山）孝（感）（黄）陂中心区连成一片，鄂东局面也趋缓和。礼北战斗长了新四军的威风，灭了顽军的凶焰，军部首长来电嘉勉五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鄂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策应鄂东三十九军反共行动，派一二七师侵入鄂中随南地区，暂一师、保九团和独立游击一、二支队侵扰安陆、云梦、应城，第六游击纵队伸入京（山）钟（祥）宋（河）应（城）公路两侧。为恢复京安应、天（门）汉（川）沔（阳）根据地，切断顽军南北联系，十三旅两个团西进京山地区配合十五旅两个团发起京北战役，经9月19日丁家冲、10月6日大、小槐岭战斗，歼灭顽军一个大队，收复了京北根据地。接着挥师南下，跨越京钟、汉宜公路，向伸入天（门）京（山）潜（江）地区的顽一二八师反击。10月30日至11月上旬进行了天西战役，经曾家湾、石家河、田二河、干镇驿等战斗，歼其一个营，打垮两个营，毙伤俘顽400余人。我逐步恢复巩固了天京潜地区。正当五师主力西进南下转战四方，国民党五战区又调整部

① 军分区所属小团，直辖5个连，不设营级机构。

② 国民党保四旅第一团和五师有统战关系，礼北战斗前，五师对其做了争取工作，战斗打响后，该团自动退出战斗北撤。

署策划新的反共浪潮。日伪军也乘机于 11 月对边区根据地进行新一轮大“扫荡”，集结万余兵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战术，在飞机配合下，分 14 路分进合击大、小悟山根据地，我军安全转移。此后顽军反共活动减弱，持续 8 个月的反共高潮渐告平息。

这次长达 8 个月的反顽斗争，五师部队一面坚决反击顽军自卫作战，一面坚持抗战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终于打破敌顽夹击，粉碎了顽军的“围剿”，共歼灭顽军 6000 余人，使顽军“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受到了应受的惩罚”。^① 同时挫败了日寇的“扫荡”计划，歼灭日军 500 余人，使日寇歼灭我主力及首脑机关的美梦成为泡影。英雄的五师部队不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卫了鄂中、信南根据地基本区，打开了鄂东局面，在大、小悟山建立了巩固的指挥阵地，发展了襄西、鄂南，创造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战场，而且自身力量也得到了锻炼和壮大。截至 12 月底，主力军发展到 12000 余人，地方军也发展为 13000 余人枪。

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 年春天，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英美分别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发起战略反攻，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妄想以中国大陆作为与反法西斯盟军决战的战场。它一方面继续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巩固其占领区；一方面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进行军事逼降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 279 页。

和政治诱降。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扬言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出版《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集团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这年5月，蒋介石亲自命令五战区以主力部队与鄂豫皖三省地方顽军协同“进剿”新四军。桂系的白崇禧、李品仙声称：目前任务主要是“剿匪”。蒋嫡系陈诚也叫嚷，鄂豫皖三省军政以协同“进剿”共军为首要任务。国民党五战区以配合六战区作战为名，全面部署对豫鄂边区的“夏季清剿”，限令各路军队5月25日进入划定地区，妄图于6月底前肃清五师部队。此时，正在全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打击侵犯湘北、鄂西日军的五师部队，向国民党五、六战区呼吁团结对敌，抢救湘北、鄂西无效，再次被迫进行自卫。6月2日，反击侵入陂安南中心区的蒋嫡系三十九军暂五十一师，激战两昼夜将其驱逐。接着东进浠水发起白石山战斗，给前来“进剿”的鄂东挺进军十七游击纵队以歼灭性打击。6月30日，三十九军配合两个游击纵队、一个保安团，勾结伪军十一师李宝琰部，在3架飞机掩护下，想要夹击“围歼”五师主力于巴河东岸。五师以地方武装与其原地周旋，主力跳出包围圈西返。敌伪夹击阴谋和“夏季清剿”计划宣告破产。

这时候，蒋介石集团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撤退河防部队6个师，协同原有封锁陕甘宁边区军队，准备“闪击”延安，7月7日，国民党军队炮击关中分区，全国性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趋向白热化。

豫鄂边区军民闻讯群情激奋，纷纷召开声援陕甘宁边区大会。李先念师长作了《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内战》的报告，号召以实际行动声援陕甘宁边区的

自卫斗争。并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要配合全国斗争，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坚持抗战到底。

国民党五战区也于7、8月间，对五师连续发起军事“进剿”。鄂东顽军侵入黄冈、冈麻边基本区，大搞特务活动，肆意烧杀抢掠，仅黄冈被杀即达300余人。我四军分区遵照师部决定，留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与民兵坚持原地斗争，主力部队轻装转移，分别向宿松、太湖、岳西、英（山）罗（田）边及鄂南阳新、大冶地区活动。各路顽军四处扑空找不到五师部队，反被地方武装突袭20余次，后方老窝受到威胁，只得撤返原防。9月挺进十八团进入皖西，再次与七师部队会师，后又南渡长江伸入江西瑞昌、彭泽，开辟了赣北沿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了与七师保持经常联络的沿江游击走廊。

在此形势下，李品仙又策划新的“进剿”计划，重新部署进攻。五师部队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利用顽军之间矛盾，正确运用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争取了襄西、鄂中大部分国民党杂牌军保持中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在鄂东、鄂南等地对顽军进行了50余次战斗，阻挠顽军前进，再次打破了李品仙苦心策划的“进剿”美梦。国民党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致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这次反共军事行动，“不唯无多结果，反使‘共匪’流窜我军防区，似此情势，言之实堪痛心。”^①

由于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全国进步人士与国际舆论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被迫于9月停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豫鄂边区军民用自己的英勇斗争，为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196页。

大悟山三次保卫战

1943年冬，华中局代表郑位三来到五师地区，提出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1944年初区党委扩大会议通过这一方针，决定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发展生产和组织人民大多数，主力部队集中训练。于是五师集中5个主力团于大、小悟山，一面整训，一面保卫首脑机关和开展组织人民大多数工作。各军分区部队也相应集中于各区比较安定的地带进行整训。

国民党军队趁五师主力部队集中整训之际，配合各地土顽游击武装，纷纷向边区进袭。1944年春，驻大别山的广西军进攻鄂皖边；驻湘鄂赣边界的川军和国民党别动军，也向鄂南抗日根据地侵犯。同时，国民党顽军还发动3次进攻大悟山的战斗，妄想摧毁五师首脑机关，歼灭五师主力部队。

2月2日，国民党三十九军暂五十一师和第四游击纵队二支队，向五师三十九团娘娘顶、董子岩阵地进攻，经两昼夜激战，将顽军击退。5月7日，广西军一八九师六五五团配合一个游击支队，假借“反攻”日军，再次向大悟山进攻。声称必须通过五师防地，要五师让路。为了团结抗战，五师主动与其联络，并让出玉堂寨一线前哨阵地，仅在歪边咀、大山寺、七里岗一线戒备。8日晨顽军突然向我左右两翼阵地进攻，五师部队一面抵抗，一面致函广西军呼吁停止进攻共同对敌，并邀请礼山4名著名士绅亲去劝他们悬崖勒马。广西军竟以“通匪”罪名将4士绅扣押，继续进攻不止。五师部队被迫自卫，坚守阵地激战3天。10日拂晓，十三旅一部向顽军侧翼出击，一分区部队袭扰顽军后方，顽乃被迫撤退。8月22日，广西军一八九师和3个游击支队，又一次进攻五师大悟山歪边咀、大山寺、七里岗阵地。十

三旅奋起应战，激战5日，大山寺前沿大包子阵地失而复得，双方争夺相持不下。五师首长命令一、四军分区部队向顽军侧后迂回，进击顽黄陂站、丰家店、三里城等据点，罗礼经光地方武装奔袭顽军后方。顽军迫不得已撤至王家冲、丰家店一线，战斗遂告结束。

3次大悟山保卫战，五师部队顽强守备，勇猛反击，运用阵地防御战与顽后游击战相配合，粉碎了顽军占领大悟山的企图，保卫了边区。此后国民党军队与五师具有全面性质的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乃渐告平息。

运用毛泽东策略思想的胜利

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五师及其抗日根据地，处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前沿与侵华日军的近后方，孤悬武汉外围敌后，与其他兄弟部队地区相隔绝，敌强我弱，顽大我小，始终处于敌伪顽夹击的严重态势中。五师部队何以能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粉碎敌伪“扫荡”、“蚕食”，打退反共高潮？归根到底来说，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二是边区党委和五师正确处理了抗日与反顽的关系，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始终把抗日斗争放在第一位，迫不得已进行反顽斗争也是为了坚持抗日，反顽服从于抗日；三是边区党、人民群众和五师全体指战员的主观努力。正如当年五师副政委任质斌在关于边区打退反共高潮的总结报告所说：“虽有客观的因素，主要的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主观努力的结果”，“我们正确执行了自卫斗争的方针”，“我们灵活运用了策

略方针”，“我们在紧张的战斗中，未忘记加强自己的力量等”。^①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② 这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边区党委和五师部队，自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起，就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而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与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广泛联络、广交朋友，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一面“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③ 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进步势力的方针，“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同它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作各种形式的斗争。”“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壮大自己的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扩大自己的阵地。”^④ 事实证明：只有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才能在敌后生存发展；反之，就只能被国民党捆住手脚，成为顽固派囊中之物。五师创造性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从而改善了边区党和部队的战略处境，夺取战略主动权，取得了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敌顽夹击的胜利。

毛泽东教导说，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只是为防御他们的进攻，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的时间，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不可缺少的手段。”^⑤ 五师部队坚

① 《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1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新版第二卷745页。

③ 《李先念文选》436页。

④ 《李先念文选》442页。

⑤ 《毛泽东选集》新版第二卷749页。

持抗战，反对摩擦，把抗日与反顽结合起来，正确掌握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当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一面公开提出强烈抗议，揭露顽固派的罪行，教育人民和部队；另一面随时进行自卫战争，坚决打击那些专门吃摩擦饭的家伙。”^① 排除顽固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阻挠破坏，保证敌后抗战的胜利。实践表明，只有对顽固派采取强硬态度，才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能迫使他们不敢轻易分裂投降，抗战才能坚持下去。但如果忘了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忽视争取团结工作，使斗争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因此，五师在每一次反顽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都要主动对国民党军队做争取团结工作，从而较好地维持了边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

反顽斗争必须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适可而止”的休战原则。五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打”与“统”结合起来，明确“统”是目的，“打”是手段，通过“打”达到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还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不同情况，采取先统后打，先打后统，边打边统，统打结合多种方式，取得了显著效果。每当顽军进攻时，一般都力求避免冲突，通过谈判说理，争取其转向抗战或保持中立，只有当他们不听劝告时，才进行反击。对坚决反共顽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坚决反击，打后再进行争取工作。对反共动摇不定的顽军，当其表现友好时，即与其保持发展友好关系；当其反共时，则予一定打击，打后即进行争取工作。对从顽军中分化出来同情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进步力

^① 《李先念文选》442页。

量，如五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司令戴焕章^①，则与其秘密协商达成统战协议。当他们不得不执行反共命令时，谅解其处境，主动撤出阵地让其报功邀赏；他们则提供顽军情报，有意遗弃弹药物资，助我抗日。五师正确掌握上述斗争策略，争取了多数，拆散了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阵线，挫败了日寇军事逼降，政治诱降阴谋，发展了中原敌后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

在军事上运用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结合顽我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反顽作战具体方针。基本上采取主力内线作战，“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争取主动，派遣小部队坚持边沿区、深入顽后方牵制顽军。扩大利用敌顽矛盾，改变力量对比。广泛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顽军，在机动地区控制一定主力，准备随时反击顽军薄弱环节。战略上进行长期准备，战斗上力求速决。实施这一作战方针，避开了顽军长处，抓住利用了顽军的短处，发挥了我之长处，避开了我之短处。五师的反顽斗争，基本上没有轻易与顽军主力作战，没有硬拼消耗，而是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威力。事实表明，这也是取得反顽斗争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今天，回顾抗战时期新四军五师运用毛泽东策略思想指导反顽斗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实践，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对当前现实也不无可以借鉴之处。

^① 戴焕章，河南邓县人，主张抗日，痛恨国民党反共妥协政策，同情共产党团结抗战主张。1940年和新四军建立统战关系，成为五师的朋友，两军友好相处，互相提供敌伪和国民党顽军情报。戴秘密赠送五师弹药，掩护来往延安与解放区干部过国民党封锁线，协助新四军抗日、反顽斗争做了有益工作。

开创信应抗日根据地的“三角”斗争

冯仁恩

193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华中战场上，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40万大军，奉行“不抵抗主义”，如决堤倒山，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四川一线狼狈逃窜。日寇北沿平汉路南下，南自长江下游溯流而上，10月下旬侵入武汉，武汉周围20多个县（市）先后沦陷。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广大群众惨遭涂炭，陷入水火倒悬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根据会议精神，河南省委决定，以四望山为中心，组织发动群众，筹建抗日武装力量，建立豫南山区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从延安抗大毕业不久，被分配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警卫大队任副大队长。10月中旬的一天，留守处王海山同志找我谈话，传达了省委开辟四望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让我和他一起到四望山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一听高兴极了，说：“从延安回来就憋了一股劲，早就想到前线去呢。”王

海山同志和我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并从警卫大队精选了60多名年纪轻、思想好、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同志，准备随同行动。这时，在豫南地区坚持地下工作的刘子厚同志来到竹沟，要求组织上派干部去协助工作。11月上旬，在刘子厚、王海山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到了信阳县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一带，从此开始了我在信（阳）应（山）县为期3年多的敌后游击斗争生活。当时，国共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暗中勾结日伪，处处和我们搞摩擦。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一方面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寇作战，同时，还要与国民党中的反共势力作斗争，这就形成了诸矛盾交叉、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3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艰苦的斗争环境，独特的斗争方式，在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至今历历在目。这里记叙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四望山坐落在信阳县西南约三四十公里处，海拔900多米，大别山、桐柏山如两翼东西逶迤数百里，峰峦叠嶂、挺拔俊秀，绵亘穿过豫中平原和江汉平原，远远望去，气势磅礴，宛如一条镇守中原大地的长城。这里山高林深，回旋余地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战场的遗迹清晰可见。我们控制了这一带，当时有利于包围信阳及附近的敌据点；以后，南取武汉，北进河南，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地。

豫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26年，著名的杨靖宇将军曾在这里发动过武装斗争；红军主力长征后，这里是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地下党组

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救亡团体、抗日武装（如河南省委领导的“战教团”、朱大鹏同志带领的“七七”工作团等等），以及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组织，还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大大小小的有十几股，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人员组成也很复杂，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军人等等。他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形不成拳头。根据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指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抗日力量汇集起来，统一编制，统一领导，成立“豫南抗日挺进队”。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为了争取改造实力较强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团结更多的人抗日，我们打的是国民党信阳县政府的旗号。这样做也给收编带来了一定困难。有的抗日武装领导人一听，说他们只跟共产党走，与国民党“井水不犯河水”，拒不入编。实在做不通工作的时候，我们只好跟他们透底，这样一来，很痛快，他们表示，人枪都是党的，坚决服从领导。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收编工作基本就绪，“豫南抗日挺进队”正式成立，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原信阳县政府常备队，支队长是余镜清。第二支队支队长是张裕生，我任副支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挺进队领导人共4名，李德纯任司令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王海山任参谋长。李德纯是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是个有爱国心的民主人士，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大骂不战而逃的国民党军队。刘子厚同志当时是我地下党豫南特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信阳县政府的一名科长，名字叫马致远。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早就开始和李德纯交“朋友”，做李德纯的工作，带领我们来到信阳后，又和李作了两次长谈。在第二次谈话之后，李就表示跟共产党走，并把留在县政府的四个连交给我们指挥，拒不执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让他把军队交给国民党五战区的命令。为了利用县政府的合法名义和李德纯的威信，更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上层人物抗日，就推举李当

了司令。其他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支队中的干部，除余镜清部以外，大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不少是老红军。这样，党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队伍。李德纯的爱国行动，触怒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再加上反共老手余镜清不断地向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报告说李德纯“通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免去了李的县长职务，并调他到省政府分配工作。我们断定这是敌人的一个阴谋，李此去肯定凶多吉少，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征得他本人同意，把他送到延安。李到了延安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入了党，成为我党的一名领导干部。

在收编各路队伍的同时，我们还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部队每到一地，就三五人一个小组走村串户，贴标语，开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提出一些简洁、显明的口号，如“团结一心，抗日救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等等。“七七工作团”和“战教团”的男女知识青年比较多，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编排了许多反映日寇抢劫财物、屠杀我同胞、污辱妇女的文艺节目，走上街头演出，组织群众学唱抗日歌曲。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也抽出时间，给群众讲话，每逢集日和节日，群众聚集，是宣传的好时机，工作再忙我们也要去讲演，随便找个高台子，不用什么稿子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们讲话从不干干巴巴地背诵政治纲领，而是联系战争的形势、日寇的暴行、人民群众的生活等大量实际，讲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感染力很强，讲到悲愤之处，声泪俱下，人群中一片呜咽之声，自发地呼起口号，场面十分感人。有趣的是，国民党也搞“抗日宣传”，但他们除了虚应故事，做做样子，就是自吹自擂，说他们如何抗日。群众听了直撇嘴，场面冷冷清清，与听我们的讲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民群众听了我们的宣传，伸出大拇指，说：“这才真正是抗日的！”有的说：“这些人就跟当年的红军一个样。”配合政治宣传，我们还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减租减

息运动，把群众从高利重租下解放出来，减轻他们的负担，改善生活，这就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把群众动员起来了。整个豫南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造成了一个抗日光荣，甘当亡国奴可耻、投降卖国当杀的强大声势，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上战场的热潮。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人加入我们队伍的，有的是兄弟双双入伍，还有女青年。不少是听了讲演，看了节目，当场跟我们走的。一次，在南王岗集市，我们刚讲演完，马上就有四五个青年要求带他们走，态度十分坚决。在参军的人中，多数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爱国的知识青年，他们接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不顾家庭的阻拦，舍弃学业，离开优雅的生活环境，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有一个女子，叫什么记不住了，年轻漂亮，又有文化，家里是经商的，很富有，坚决要求参军。家里几次把她找回去，她一次又一次地跑出来，终于如愿以偿。参加我们队伍的，还有不少是跑反的难民。日寇侵占北京、武汉铁路沿线的城市以后，城里群众纷纷逃到乡下，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奔友，无亲无友的就扶老携幼四处流浪，夜间还常受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抢劫，情景十分凄惨。不少人听到我们唱《松花江上》的歌曲时，禁不住失声恸哭。其中的许多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我们进入四望山地区的初期，还没有稳固的落脚点，经常活动的冯家庄、南王岗一带，都有日寇维持会。他们常常给日寇通风报信，国民党地方武装余镜清部也跟我们捣乱。我们不得不展开游击式的发动群众工作，一天换一个地方，有时住村庄，有时就露营在山林里，让敌人摸不到规律。后来，我们专门组织了“锄奸队”，对那些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反动地主、汉奸、维持会长，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大张旗鼓地开公判大会。这样一来，日寇失去了耳目，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活动的天地就大了，常常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去发动群众。对此，日寇很恼火，他们派出许

多奸细，化装成小商贩什么的，来刺探我们的行踪，出动部队偷袭。但是，我们凭着人熟地熟，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带的部队和特委机关共 200 多人，住在天山半腰的明家老湾。下半夜突然被 600 多名日军包围，我们从枪声判断，敌人环山成马蹄形三面包围，只有天山顶方向是个缺口，就决定从这里冲出去。撤退时，几百人的队伍，没有灯火，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声，到拂晓的时候，全部撤出明家老湾，顺着山梁转移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但有敌情顾虑，生活也非常艰苦。没有被子，睡觉都钻稻草窝；下大雪了，身上还穿着单衣；每天连 5 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有时连咸菜也啃不上。同志们手脚都冻肿了，裂开长长的血口子，有的得了夜盲症，但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情绪十分高涨，一有空就“拉歌”、做游戏，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从县政府过来的 4 个连，过惯了舒服日子，尽管我们处处给他们以特殊照顾，但他们起初还是不太适应，后来都被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没有出现一个逃兵，还主动提出不要“照顾”，说：“都是抗日的，都要一样。”就这样，我们闯过一道道难关，克服了一个个障碍，进行收编部队、发动群众工作，挺进队沐浴着战斗风尘迅速发展壮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 300 多人、百儿八十条枪，发展到 2000 多人，1000 多件轻重武器。

制裁国民党反动势力

对于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四望山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从一开始就处处设障，竭尽破坏之能事。崔仁甫和余镜清是“三角”斗争中国民党反共势力的主要代表。

崔仁甫是国民党的一个正规团团长，手下有 600 多人，在前

线被日寇击溃后逃到豫南，驻扎在四望山南侧的祖师顶下仙石畈、粉房湾一带。我们曾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参加挺进队，共同抗日。但他坚决不肯，连我们派去的干部面都不见，反而与信阳县反动县长马显扬、常备队队长余镜清沆瀣一气，与我们作对，搞摩擦。崔部占据的地区是我们南北活动的主要通道，他卡在那里不便通过，我们多次派人交涉，他都置之不理，还捕杀我们零星活动的工作队和干部。为此，特委决定首先扫除崔部这个主要障碍，把余镜清孤立起来。李先念同志亲自组织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和刘子厚同志从拟制作战方案到战斗结束，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我们两个大队 1000 余人，黄昏从大庙畈出发，拂晓赶到崔团部所在地粉房湾。他们正在出早操，我们轻重火器一阵猛烈射击，操场上当时敌人死伤不少，剩下的敌人抱头鼠窜。崔仁甫还没起床，听到枪声后，一骨碌爬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逃跑了。我们抓到了他的勤务兵，缴获了他的马、望远镜、饭盒和手枪等。这次战斗持续到中午 12 点左右，敌人全部被歼，我们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马匹和军用物资。

余镜清是信阳县的一个区长，是地方武装的头子，也是一个反共老手。他控制着县政府的 18 个大队，实际上是 18 个联保处。成立挺进队时，他起先是拒不入编，由于司令是县长李德纯，名义上是县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迫于压力，勉强同意入编后，又一再声称“受编不受调”，提出不接受我们派去的干部，害怕队伍给“赤化”了（实际上，在这之前，由于我们地下党的工作，这支部队中有不少人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后来如约倒戈，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挺进队司令部开会，他拒绝参加，有时来了，也是立马横刀，带着一大串警卫，向我们炫耀示威。余部对我们发动群众抗日，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我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他就派人来捣乱；我们减租减息，他就抓丁派款。他们还捆绑吊打地方干部和群众，制造和散布我们的谣言，以致公

然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1938年年底，一位地方党的同志告诉我们，国民党主力部队溃逃时，在大庙畈丢弃了部分枪支弹药。王海山同志让我带一个中队去取。在我们取枪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崔家河桥上，突然从正面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像飞蝗一样朝我们打来。我当即命令部队跳水散开，迅速向正面的一个山头发起冲击。守敌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们很快占领了山头，突出包围。经审问俘虏知道他们是十八大队山门寨联保处的，有600余人，企图将我们吃掉。结果我们无一伤亡。他们不但没有占到便宜，还死伤、被俘十儿人。据说，我方事后对余提出质询，余一口咬定不知此事，说完全是误会。当时我们刚进入四望山地区不久，为了尽量团结他抗日，就没有深究。

但是，余仗着人多，对我得寸进尺，特别是李德纯被挤走以后，新任县长马显扬是个极其反动的家伙，余与我们的摩擦加剧了。为了钳制我们的活动，破坏我们发动群众的工作，余在我们活动的南王岗附近的小庙建立了一个据点，在这里派住了一个中队，有七八十人。他们监视我们的活动，向日本人报告，还趁夜间敲诈群众，抢劫“跑反”的难民，闹得人心惶惶，成了我们活动的一个极大障碍。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这个据点的中队长在余的指使下，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日寇还给他颁发了委任状。于是，特委决定让我带一个中队拔掉这个“钉子”。战士们早就对这些家伙恨得咬牙切齿，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战斗从拂晓开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将敌人击溃，敌人的中队长想从后门逃跑，刚出门就当俘虏。打扫战场时从敌人宿舍和仓库里搜出了日寇给伪中队长的委任状、膏药旗，以及大批从群众那里抢来的被装、衣物。大约10点钟左右，我们正准备押着俘虏撤离的时候，余镜清的十八大队队长许古希带着四五个警卫突然闯进来，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你们为什么攻打我们的人？”

“我们打的是投降日本的伪军，你们是伪军吗？”

“有什么证明？你们这是破坏抗日！”

我把委任状、太阳旗啪地摔在他们面前：“是谁破坏抗日，看看吧！”

许傻眼了，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接着又要挟说：“不管怎么说，不把人交出来，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着指了指四面山上，扭头就走。原来，他们已经将我们团团包围。我喊道：“站住！想打吗？告诉你，别看你们人多，我们根本不怕，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们的中队长舒××勾结日寇，投降卖国，证据确凿，理应严惩不贷，你却要出面保护，这是站到哪一边去了？而且还要对我们诉诸武力，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抗日，如果你们任意胡闹下去，要负完全责任……”战士们都气炸了肺，也纷纷责问许古希。许的威风完全给打下去了，马上满脸堆笑，说了许多好话，赔礼道歉，但还是坚持要人，说回去一定要严加处置。我们几个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带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决定交给他，但要许亲自写收条：太阳旗、委任状是他们投降的证据，坚决不给。许照办了。回到部队，我们把收条以及缴获的东西交给了刘子厚同志。

我们反摩擦斗争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余镜清丢兵折将，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对我们日益扩大的抗日武装更是恐慌不安。他清楚地知道，用武力消灭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的，小打小闹的摩擦也没有什么用处，反面更加被动，唯一的办法是搞掉我们的领导人，趁群龙无首之际，搞垮我们这支队伍，或者取而代之，利用他在挺进队的合法身份，掌握这支队伍。于是，他便精心策划了一幕新“鸿门宴”。

1939年年底的一天，余镜清在西河村宴请当时我们在四望山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我当时在地委负责军事工作，也受到邀请。余手枪队的一个队员是我们的关系，送来情报说，这是余的

一个阴谋，企图在宴席间干掉我们，动手信号是某一道菜（什么菜记不清了）。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和开明人士，为了表示与我们共同抗日的诚意，经常请我们吃饭，我们有时也回请。但这次是什么样的宴席呀！去不去呢？去，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去，余肯定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我们没有合作的诚意，瞧不起他们。为了挫败余的阴谋，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应约赴宴，并让我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那天，我带着十几名精心挑选的战士随同刘子厚、张裕生、王光力、文敏生等领导同志去赴宴，每个人的手枪都压满子弹，上了“红膛”，并在西河村四面山上部署了部队，约定枪响为号，下山接应。

宴会在村中的3间北屋里举行。按照计划，我们的战士控制了门口和窗口，密切注视敌人手枪队的一举一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离开。他们出席的有余镜清、马显扬等5人，双方人员交叉入座，共摆了两桌，我和余镜清同桌，坐在他的对面，打算一有情况就先把他干掉。

宴席相当丰盛，有30多样菜，鸡鱼肉肘，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余、马频频举杯敬酒，大讲什么“精诚团结”、“齐心抗日”的鬼话。刘子厚同志侃侃而谈，不时发出畅亮的大笑。表面上看，美酒佳肴，宾主谈笑风生，气氛十分热烈，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像是揣着一团火。我更是焦虑不安，食而不知其味。组织上把保护首长安全的任务交给我。他们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如果有半点差错，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呢！我决心就是自己牺牲，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余再三向我劝酒，我婉言谢绝，说从来不喝酒。余“热情”地安排我们的战士去伙房吃饭，战士们都说吃过了。为了防止敌人投毒，他们的筷子往哪伸，我们也往哪伸，他们不先吃的菜，我们坚决不动。狡猾的余镜清看出我们来者不善，有了准备，一直没敢动手，席间他到伙房去了两趟，大概是去吩咐撤掉那道“信号菜”吧。吃完饭，余说了些饭菜不好的客

气话，刘子厚同志擦了擦脸，一语双关地回答：“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我还从没有吃过这么有味道的饭菜。”说完哈哈大笑，带领我们扬长而去。

余镜清的阴谋破产以后，仍不死心，变本加厉地加紧摩擦，公开声称要独立，不再受挺进队的领导，并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我“游而不击”。余死心塌地反共，屡屡反我，已到了不可救药、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对此，我们决定消灭这股反共卖国势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在祖师垸、余家寨打响了讨余的战斗，余部除遵约倒戈的以外，大部被歼，他只带少数人逃出了信阳。从此，四望山地区真正成了我们的天下。

抗击日本侵略者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挺进队的首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在与国民党反共势力作斗争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游击战，打击日寇。我们第一次与日寇交锋是在1939年秋天。

李德纯被免职，反动县长马显扬上任以后，信南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余镜清和崔仁甫部联合起来向我发难，派部队卡住了我们来往铁路东西、南下湖北的道路，摩擦日益加剧和公开。日寇对我的骚扰也更加频繁，听到我们的一点动静就紧追不放，这些都使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对此，我们决定暂避敌锋芒，从铁路东的当谷山一带转移到铁路西的四望山活动。

豫鄂边区抗日领导机关对我们这支部队的行动十分关心，经常派人或送信来传达党的指示，了解情况。就在我们打点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先念同志从湖北的大悟专程赶来，听取了特委机关的汇报，同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路线，分析了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对我们到四望山后的活动作了许多具体指示，然后看望了

机关、部队，他看到我们携带的行李比较多，就说，我们是敌后抗日武装，机动性大，不要舍不得坛坛罐罐，给自己背上“包袱”，要轻装前进。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我们精简了行装，可带可不带的东西坚决不带。出发前，刘子厚同志请先念同志给部队讲话，部队听说要聆听闻名中原的先念同志讲话，高兴极了。先念同志讲了全国抗日的形势，还针对部分同志的思想，讲了部队要轻装的问题，使大家很受教育。

入夜，部队出发了，我带一个连担任前卫。到达东双河附近时，我们立即布置警戒，准备掩护机关过铁路，因为这一带常有日寇的军车、装甲巡逻车通过，必须格外警惕。谁知警戒还没布置好，就从北面开来一列车，我们立即开枪射击，打了一阵之后，列车开走了。我们估计，附近柳林的日军可能很快就会赶来。我一面通知机关、部队迅速过铁路，一面在铁路两侧的高坡上布置了两个连，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旦日军赶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掩护部队转移。果然，部队刚刚过完，就从柳林方向开来一列满载日军的敞车。我们居高临下，突然一起开火，手榴弹像冰雹一样落到车厢里，敌人顿时血肉横飞，乱作一团。一个叫王传煦的排长，是个老红军，作战十分勇敢，他扒上火车，端起机枪对着敌人猛烈扫射。由于车头被打伤，车开得很慢，这就更有利于我们发扬火力。日寇被打懵了，在我密集的火力的之下，连头都抬不起来，一个个趴在车厢里听天由命。敌人始终没敢停车，一直开进了东双河车站。天还不亮，敌人不敢贸然追赶，发疯似的朝我们的方向盲目打了一阵炮算完。战士们戏谑地说：“小日本真够意思，还鸣炮送行呢！”3天以后，从信阳传来消息，夜袭列车战斗，打死打伤日军300多名，信阳车站上躺满了死尸和伤兵，而我们无一伤亡。曾有人形容日寇如何有战斗力，说得神乎其神，这一仗打破了对日寇的“迷信”，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过去，日寇在这一带很猖狂，经常三三两两地到村子里强奸

妇女，抢劫财物，从这以后，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随着挺进队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在消灭了余镜清部以后，我们在四望山站稳了脚跟，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掌握了对日斗争的主动权；经常主动出击，袭扰敌人，围歼小股日军，不断给日寇以打击。1940年五六月间，日寇的一个机枪中队从潼关败退下来，驻扎在鸡公山新店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趁敌人新来乍到，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他们。事先，派手枪队队长周子怀同志带人进行侦察，摸清了日寇的人数、装备、住址、岗哨等情况。一天晚饭后，我带一个大队，奔袭20里，将敌人团团包围。发起进攻之前，我们割断了电话线，在铁路一线布置了部队，阻敌增援，周子怀同志带领手枪队员潜进村子，摸掉了敌人的岗哨，翻窗进入日寇中队长小川的房间，把这个罪恶累累的侵略者扼死在床上。战斗打响以后，敌人失去了指挥，像无头苍蝇一样，光着膀子到处乱撞，有的在梦中就去见了“天皇”。战斗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最后剩20名日寇躲在放机枪的房子里，负隅顽抗。八九挺重机枪一齐疯狂地向外射击，我们没有重武器，很难接近。考虑到这里离日寇据点不远，不宜久战，便主动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100多名日寇，除那20余名以外，全部被击毙，缴获了30多件武器和大批弹药，我们只伤亡了几个同志。

1941年秋，我接到命令，调到重建不久的新四军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任团长，我带着一个团的部队，从信阳出发，到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报到。途中，我们在广（水）应（山）公路南侧的一个村庄休息，应山县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来报告说，最近每天拂晓都有日军的马车队从县城运物资经过这里，有300多辆马车，约40多名武装日军护送。我马上到村子里找群众进一步作了调查，得到证实。我想，决不能让这些物资落到敌人手里去杀

害我们的同志，再说，新四军经过“皖南事变”重建不久，这是个补充给养的好机会，就决定劫车队。由于上级急着让我报到，我就把指挥这次战斗的任务交给了团参谋长朱方同志，给他留下两个连的兵力。临走前我和朱方同志一起勘察了地形，详细研究了具体打法，并一再交代，缴获的物资能运走就全部运走，实在运不走就烧掉，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粒子弹、一片布。我一到大悟山，李先念师长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在广应公路留部队打仗了？”我很吃惊，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师长笑着说：“你们打的是日军第三师团运输队，影响很大，消息传得很快，国民党的电台已经广播了，延安刚才发电报来询问这件事。”第二天朱方同志回来了，非常高兴地汇报了战斗经过。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运输队日军全部被消灭，300多辆马车的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被服、马匹全部缴获，发了个大“洋财”，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公路上只剩下死尸了。而我方只有一名通信员轻伤，头皮被子弹擦了一下。朱方同志还给我带来一匹东洋白马，我把它送给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开了一阵玩笑后收下了。这次战斗对敌人的打击很大，广应运输线中断了好几个月。当地的群众有不少人目睹了战斗情景，在那一带广泛传颂，至今还常常提起。

3年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信阳挺进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转强，建制也几经变化。先是编入信（阳）应（山）纵队，后又属新四军五师领导，最后除留少数部队作为信阳的地方武装外，其余的全部编入五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以四望山为中心，开辟和巩固了豫南革命根据地，不断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深入动员武装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先后向主力部队输送了3个团的兵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家台战斗

潘友诒

在湖北省仙桃市东南方彭家场附近，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叫胡家台。58年前，在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激烈、并致日本军队惨败的战斗，它就是远近闻名的胡家台战斗。

1942年1月下旬，我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十五旅各一部，在沔阳王家场、余家场一带歼灭伪军定国军第一师后，为追捕该师漏网头目汪步青，2月2日，我十三旅旅长周志坚、副旅长黄霖，率领三十七团二营、三十八团三营，紧急赶往彭家场。此时已近傍晚，且下着小雪。周旅长决定，部队就在附近的一个叫曼家台的小镇宿营。

部队刚刚驻下来，从胡家台方向匆匆跑来三个老百姓。他们向我三十八团八连哨兵说：距此不远的胡家台村刚才开来一股日本鬼子，约有一百四五十人，他们还带有民夫七八十人，眼下正在抢居民的东西。

得知这一消息后，八连立即向团、旅首长报告。周旅长闻讯立即派出两名侦察员去胡家台侦察。约两个多小时，侦察员回来了，证实胡家台确实驻有日本鬼子，其指挥所就驻扎在村中心祠

堂里。

周旅长、黄副旅长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分析：这股日本鬼子是为我们歼灭了汪步青伪军，特来寻求报复的；同时也想趁机抢劫农民的粮食。他们自以为日本军队天下无敌，可以横冲直撞，事实上他们是盲人骑瞎马，闯到我军眼皮底下，却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应趁其不备，打它个措手不及，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胡家台是坐落在洪湖地区一条南北方向大堤上的一个村庄。村子南北头各居住十几户农家，全是茅草屋；村中央有一座四合院式的砖瓦房，比较坚固，是这个村的祠堂。在村前大堤下，有一南北向的水渠，水及腰深。水渠西岸有个村子叫何家台，与胡家台隔水相望，两村居民几乎可以互相听到说话。村子东面，是一大片数百亩积了水的农田，没有可行走的道路。胡家台与曼家台同在一条大堤上，相距只有八里路，从曼家台行军，不到一小时就能到达。

周旅长下了攻打胡家台日本鬼子的决心以后，立即召开三十七、三十八团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首先讲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意义：日军历来在襄河（汉水）以南地区气焰嚣张，我军尚未在这一带重创过日本鬼子。必须打掉日寇的霸气，才有利于我襄南游击根据地的开发经营，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他接着向两个团下达了战斗任务：三十八团七连和八连由曼家台西水渠的木桥过到西岸，然后顺着西大堤南下。七连穿过何家台，由这个村南边的木桥上，过到胡家台村以南二里处的大堤上，构筑阵地，预防胡家台之敌南逃。八连占领何家台，在胡家台战斗打响后，以火力支援九连。九连作为攻打胡家台战斗的主力，由曼家台顺大堤南下，直奔胡家台，三十七团二营做战斗预备队，在九连后面跟进。各战斗部队必须在夜间九点钟以前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周旅长又征询了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团、营、连干部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晚饭以后，我团（三十八团）七连、八连于七时半，先后出发；我当时在九连任指导员，我连于八时半，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胡家台驰去，并于九时准时抵达胡家台村北头。在朦胧的夜色里，一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突然，一个日本鬼子从正前方匆匆向我连跑来，一头撞在了走在最前头的我尖兵班长怀里。估计此人是敌哨兵，他见势不对，调头就往回跑，一边叽里呱啦地乱叫，一边鸣枪向其上级报告，很快便钻到不远处路东边一所房子里去了。

我连跟着敌哨兵冲到那所房子前面，但见有一二十个日本鬼子惊恐万状地由房子里跑出来，争先恐后地向村中心逃去。我们一边追，一边向敌人射击，刹那间将七八个鬼子撂倒在地，接着我们朝祠堂方向冲去。此时，忽见四五十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向我连冲来。我连的四挺轻机枪一齐向这伙敌人射击，渠对岸何家台八连的机枪、步枪也猛烈地向这伙鬼子射来。顷刻间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东倒西歪，剩下的十几个鬼子兵竞相逃命，抱头鼠窜跑回祠堂去了。

我连趁战斗间隙收拣了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并把他们的伤员及死尸搬到堤岸边。我和我连连长陆光普正在商量下一步该如何组织火力、布置兵力攻打祠堂里的日本鬼子时，有三四十个鬼子兵却在我们发起攻击前先跳了出来。但这些鬼子兵一个个缩头缩脑，很明显已丧失斗志。此刻，在何家台八连的机枪、步枪首先向他们开火，我连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也同时向鬼子兵发起了射击，敌人一下子死伤一片，未死伤的又调头拼命逃回祠堂。在这些溃兵中，有六七个人停了下来，浑身哆哆嗦嗦，双膝跪在地上，举枪向我们投降。二班的战士缴了敌人的枪以后，班长常占山戏谑地说：“不是说大日本皇军很厉害吗？竟然主动下跪缴械，可真够好看的呀！看来，赫赫有名的日本军队也不过如此。”

不一会儿，那几个日本鬼子兵仿佛从刚才的败兵窘境中醒了

过来，由于他们的反动本性使然，竟策划企图夺我们战士的枪。此刻，杀红了眼的战士出于义愤，断然送他们见阎王去了。

日本鬼子跪下缴枪这种罕见的事，震动了我团和旅的首长。黄霖副旅长与我团冯仁恩团长，一同来到我连前沿阵地，对大家进行夸奖，同时要求我们尽快把祠堂拿下来。就在此时，忽然从祠堂里蹿出一个身材颇高的日本鬼子来，此人一身军官打扮：头戴钢盔，肩披斗篷式风衣，足登长靴战靴，腰间佩带一支手枪，脖颈上挂一副望远镜，手持指挥军刀，张牙舞爪地朝着黄副旅长冲杀过来。黄副旅长见状，大呼一声：“潘友诤，日本鬼子冲着我杀来了，你们还不把他干掉！”我立即指挥一班班长李法堂带几个战士迎上前去，将那歇斯底里的日本军官团团围住，有的战士开枪射击，有的则执刺刀捅。不一会儿，那家伙就被撂倒在地，他还未来得及多哼哼几声，就像一头刚刚被宰杀的猪一样，蹿了几下腿，口流鲜血，一命呜呼了。

我走向前去，弯着身子，看了看那日本指挥官的肩章符号，是一名中佐。陆光普连长摘下他头上戴的钢盔、身上携带的武器和望远镜，我让通信员取下他的手表。清点了需要上交的战利品以后，一班战士将其尸体拖到一所房屋墙根下，拉一捆稻草将他掩盖了。

九连击毙日军指挥官，三营上下士气更加高昂。营长杨振山来到九连，与连长陆光普高兴地热烈交谈着，二人边谈边朝祠堂那边走去。当走到祠堂门洞时，敌人的一挺重机关枪横在那里挡住了去路，他们立即俯身去搬它，谁料藏在祠堂里的日本鬼子，向他们射来一梭子子弹，二人同时被击中。

当战士们迅速将负伤的营长、连长刚刚抢救下来，还未来得及向敌人还击，两个日本鬼子猛冲出来，把祠堂大门严严实实地关闭了。随后，从祠堂里发出马达的嗡鸣声，想必是敌人用电台在与外界联系。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鬼子是下定决心要固守这祠堂了。

鉴于从祠堂的正面攻击敌人将十分困难，我当即将二、三排的部队调到祠堂北屋背后，从那里以人梯把四班的战士送上房顶。正当他们揭开房瓦向屋内的敌人射击时，岂料祠堂里的日本鬼子已先于我们爬上了南房屋脊，该敌人一梭子子弹向我们的战士射来，两名战士当场牺牲，另有三名战士胸部和手臂负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考虑到我们在房上作战的不利情况，我放弃了这样的打法，而敌人也未敢轻举妄动。战事，一时呈胶着状态。

这种相持一直到午夜一点钟。周旅长考虑到我九连已连续作战四个多小时，干部、战士打得十分疲劳，且部队也有一定的伤亡，便决定将我连撤出战斗，由三十七团四连接替，并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时机再向祠堂里的敌人发动进攻。

三十七团四连进入阵地后，日本鬼子利用在祠堂北房北墙上挖的枪眼，不断向他们射击。该团参谋长肖刚曾指挥四连两次向敌人发起进攻，但都没有成功。肖自己也负了伤。此时鬼子兵又从祠堂南房上，向祠堂北边东侧的茅屋发射了燃烧弹，一时间，被烧着的房屋将祠堂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三十七团要想接近祠堂更困难了。

我三十七团部队与日军鏖战到天亮以后，从武汉方向飞来两架敌机，在胡家台上空盘旋数圈后，扔下许多纸片。三十七团战士拣了几张，交给一名懂日文的敌工干事看，那上面写的是：援军已到沙湖（仙桃东南方一个大镇），正准备向胡家台开进。你们要坚守阵地，突围定能成功。三十七团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旅部，周旅长考虑到敌人援军就要到来，我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对我方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部队全部撤离胡家台战区，向西流河转移。

我军撤出胡家台以后，沙湖的敌人援军由于怕遭受我军打击，畏首畏尾，行动缓慢，其进军速度就像乌龟爬行一样。由沙湖镇至胡家台不过三十余里的路程，他们从早晨走到当天下午，

才到达胡家台村，将残余的鬼子兵接走。

坚决、无畏、勇猛的胡家台战斗，至此结束了。这次战斗，我军没有全歼敌人，但是给日寇以惨重打击，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的目标达到了。在此次作战中，我三十八团八连、九连共击毙击伤日军官兵60余人（其中击毙敌中佐军官1人）。仅我九连就缴获敌人轻机枪2挺，掷弹筒1门，三八式步枪32支，手枪1支，战刀一把，望远镜一副，手榴弹80余枚，子弹10000余发；解放被日本鬼子裹挟的民夫80余人。

但是，更值得称颂的是，胡家台战斗我军打得日本鬼子魂飞胆丧，打出了我军军威，鼓舞了江汉地区广大人民的抗日情绪，新四军的抗日声誉传遍了敌占区，远扬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虽然我参战的三十七、三十八团部队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但这次战斗在我五师抗日史上则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与朱堂店战斗、新街战斗以及平坝战斗共同谱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

还有一点有必要说明：新四军与日寇在胡家台的战斗，被国民党的情报人员知道了，他们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下令国民党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连续两天向全国、全世界播报：我军与日军鏖战湖北仙桃^①，沉重打击了日寇，击毙击伤日官兵近百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我们五师师长李先念听了国民党的这一广播后，饶有兴趣地说：蒋介石这个鬼家伙，明明是新四军打鬼子打了胜仗，怎么倒成了“我军”了？不久前你的军队向我们进攻时，还口口声声称新四军是匪军。好事嘛，就尽往自己脸上贴金，还知道一点儿羞耻吗？

^① 国民党广播，我军与日寇鏖战湖北仙桃，指的就是胡家台战斗。因为胡家台是一小村庄，对外鲜为人知。仙桃是一个镇，小有名气，从地图上可以查到它。

挺进河南敌后

陈佑铭

一、挺进淮北

1944年4月，日寇集结五六万兵力，从河南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就开始溃退，农村到处是散兵游勇和丢弃的枪支弹药。我及时将这些情况报告领导，并建议独立二十五团配合淮南支队和独立二十六团配合信南支队沿平汉线铁路东西两侧向北挺进，深入敌后农村，收容散兵，收集枪支弹药，开创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总队领导担心与边区党委“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不符，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5月初，信应罗礼总队部、中心县委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研究新形势下是继续执行“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还是向河南敌后发展。会上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开辟河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并建议上级增派一部分主力部队向淮河以北发展。总队部将会议讨论的意见上报，几天后地委、分区复电：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问题，在区党委、师部没有指示之前，为了不失时机，可由娄光琦同志率领

独立二十五团一部去淮南，以淮南为前进基地，相机向淮北发展。

总队部领导经过研究并报军分区批准，姜政委带总队电台及全体报务、机要人员和我（作战参谋）率独立二十五团一、三、五连及重机枪排、总队部警通连两个排、侦察队一个班，于6月初到达罗山县五里店以北、陡沟以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们到达淮南后，河南战役已基本结束，汤恩伯溃散在农村的散兵游勇和枪支弹药已为数不多了，外省人员大多已趁机回家，本省人一部分被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收容，组成河南挺进总队第十三、十四、十五纵队，主要分驻在汝南、正阳、确山及以东地区；一部分被伪军李玉霖收容组成豫陕绥靖救国军第一、二、三、四师，主要分驻上蔡、西平、遂平、叶县、舞阳等豫中、豫西各县县城及公路沿线一些较大的城镇；有的被地主、恶霸所收容，成了地方的保安队、游击队；有的当了土匪。沦陷区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烧、杀、抢、强奸妇女，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一向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部队）”之苦的河南人民，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军队扰民有余，保民无能，渴望新四军挺进敌后领导抗战。但可惜的是我们行动太晚，错失了发展的良机；现在渡淮向北发展，需要比较大的力量，力量小了打不开局面，付出的代价也要大得多。

部队到达淮南后姜光琦立即召集淮南县委、淮北工委书记肖章、淮南支队长闵南俊等领导同志研究如何向北发展的问题。肖章、闵南俊先后介绍了淮南淮北日伪及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后提出：淮南游击区的主要城镇都被日伪军或国民党地方军队所控制，作为向北发展的前进基地是不巩固的，只有消灭颍店、肖王店地方保安大队，并控制这些地区，淮南根据地才较为巩固；淮北汝南、正阳、确山县城及公路沿线大城镇都被日伪军控制，其他一些大的集镇都为河南挺进总队所控制，一些大的村寨也被地

方乡保和地主恶霸武装占据，依靠独立二十五团三个连及淮南支队5个中队的兵力很难打开淮北的局面，建议师部速派一部分主力北上，组成统一的领导机构，统一组织领导开辟河南的工作。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同意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淮南县委和淮南支队积极开展敌后地下工作和对敌、伪、顽情况的侦察，积极进行开辟淮北的准备工作。

二是将独立二十五团其余部队全部集中到淮南，在淮南支队配合下相机攻打肖王店和顾店，然后向北发展。

三是报告分区和师部，建议速派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干部开辟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成立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

四是由我带一个连和重机枪排到陡沟以北地区进行活动，一方面试探一下敌、伪、顽的反应，另一方面配合地方党开展工作。

会后第三天夜间，我带二十五团三连和重机枪排（两挺马克辛重机枪）由陡沟西沈湾渡过淮河，进到陡沟西北十五六里之胡家大湾。我们宿营后不久，听到西北几处有枪声，经派人侦察，系乡保武装打枪。据此判断，可能已发现我们过淮河。为了防敌偷袭，又派出手枪队员向陡沟方向进行侦察监视。拂晓前，手枪队员报告，陡沟敌人向我方开来。我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村南、村东的交通壕（国民党军队修筑的交通壕，村与村相通），准备迎击敌人。不久，村南、村西方向先后响起枪声，向我们驻地盲目射击，但枪声持续了几分钟，仍不见敌人，我当即告诉任连长：敌人不敢前进，说明他们对我们情况不明，怕遭我伏击；陡沟住两个大队，可能出来一个大队，我们要在天明之前对敌实施突然袭击，将敌打垮，不然天明后敌人看清了我们的情况，会缠住我们不放，这对我们的行动极为不利。你率一排、带着司号员守住村南、村西，我带其余部队顺交通壕绕到村东南，在敌侧后发起突然攻击，你们听到我冲锋号后即吹起冲锋号，向敌猛打猛冲。

我带二、三排在重机枪排掩护下，在敌侧后发起突然猛攻，敌人遭受我突然袭击后迅速向陡沟溃逃，我们直追到陡沟北三四里的地方才停止。此次战斗，俘十四纵队特务大队一中队长以下80多人，打死3人，打伤1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70多支。我在攻击中右小腿擦伤，在追击中一排李排长不幸牺牲。

战斗结束后，敌中队长供称：你们渡过淮河不久，十四纵队司令部即得悉你们有一股部队渡过淮河，但有多少人，什么企图都不清楚，司令部命令特务大队向陡沟西北方向搜索前进，查明渡河部队的情况；当搜索到胡家大湾南面时，听到胡家大湾及周围村庄狗叫，看到胡家大湾有火光，但怕遭受埋伏，大队长命令向胡家大湾开枪搜索，一听到你们的冲锋号就叫快撤，我们中队被你们的重机枪打死了三个人，都吓得不敢跑了，所以，被你们抓住。

我们第三天夜间回到淮南，当天下午将战斗情况及侦察的情况向娄政委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如下建议：

1. 我们渡河后不久，陡沟的敌人就得到我们渡河的情报，估计他们在淮河边设有情报站，专门监视我们的行动，建议地方党设法查明此情况，以便采取对策，否则将对我们今后的行动不利。

2. 我们渡淮后地方的乡保武装都跑到胡冲店及周围大镇子去了；地主武装紧闭寨门不出，既不打我们，也不让我们进寨，这些对我们今后根据地建设很不利，建议淮北地下党查明情况，然后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置：对愿意接受我们领导参加抗日的，我们公开或秘密地加以委用，成为我们的地方武装，待建立起我们的民主政权后再加以改造；对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向我们提供敌伪情报，支援新四军抗日的，可允许存在，待建立起我们的民主政权后再行妥善处置；对与日伪有勾结、反共的顽固分子，派精干的小分队采用偷袭的办法加以消灭；对大地主看家护院的

武装，动员将枪交给新四军抗日，如不愿意交出，但保证支援新四军抗日，不与敌、伪、顽勾结反共，可暂时允许保留，待民主政权建立后再行收缴。

3. 俘虏兵大多是本地人，建议将成分好的经过教育后补充淮南支队，再从淮南支队抽调四五十人充实警卫、侦察部队，将两个警通排扩大为警通连，将侦察班扩大为侦察队，补充一些本地人，对加强侦察工作有很大好处。

娄光琦政委表扬了这次战斗打得好，这是过淮河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对那些反共的顽固派是一个打击；你指挥机智果断，部队沉着、勇猛。然后说：淮北汝南、正阳、确山等县的保安队、游击队、乡保及地主武装的情况，淮北工委基本了解，最近肖章同志找来了几个地方党的支部书记，谈了很多情况，你可找胡冲店地区的支部书记尹道德谈谈情况，研究一下对这个地区的保安队、乡保及地主武装的处置措施；俘虏不能留下，经教育后都放回去，这样对做好十三纵队、十四纵队的统战工作及地方土顽作战都有好处；张和智团长（独立二十五团团长）最近带二、七连来淮南，我们研究先打肖王店的土顽，下一步再打顾店，你布置一下侦察工作，尽快把肖王店、顾店的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

二、肖王店战斗

1944年7月初，张团长带二、七连到淮南，娄政委召集淮南支队、淮南县委、独立二十五团负责同志研究打肖王店的问题，我汇报完肖王店的敌情和地形后提出：肖王店的碉楼比较坚固，强攻很难打得下来，建议采取偷袭的办法。经过讨论，确定由二十五团打肖王店，淮南支队向五里店（驻日寇一个小队，伪

军一个中队)、顾店(驻一个保安大队)各派一个中队警戒。

肖王店驻罗山县保安大队，约200人，日寇侵占县城后逃到肖王店，与五里店的日伪军有勾结，经常到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地进行骚扰。镇东、西、南有三个碉楼，三个中队各守一个碉楼。张团长决定用一、三、五连分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偷袭三个碉楼，但五连在接近镇南碉楼时被敌哨兵发现，开枪射击，突击队迅速冲进碉楼，将敌全部消灭，除被手榴弹打死十余人外，其余50余人被活捉。由于五连的行动提前了十来分钟，镇东、西的两个碉楼的敌人听到枪声后紧闭碉楼，向一、三连射击，部队强攻两次，均未成功，结果伤5人，牺牲1人，为了减少伤亡，天明后即撤出战斗。

三、抓获国民党军统局河南站长

7月中旬，接到第二军分区电报：区党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军河南敌后问题，在未做出决定之前，独立二十五团和淮南支队除继续配合地方搞好淮南工作外，可抽出部分兵力渡过淮河，开展宣传工作，侦察情况，建立立足点。

根据分区的指示精神，姜政委率领二十五团一、三、五连和淮南支队两个连于7月29日夜间在陡沟西沈湾与邱湾之间渡过淮河，进入正阳县胡冲店以南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侦察情况，我连夜率一连进到胡冲店西南十余里的地区活动，中午侦察员在通往胡冲店的大道上抓住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和一个上尉。当侦察员拦住他们乘坐的马车时，这位上校问：“你们是不是十四纵队的？”

“我们是十四纵队的谍报员。”侦察员机警地回答。

“快送我到你们司令部去。”上校神气十足地下命令。

“我们司令部的谍报参谋在南边村子里，请你去那里吧！”侦察员沉着地应答。

我听了侦察员的报告后决定摸清他的来历和到十四纵队的使命，当即命令侦察员告诉一连：不要暴露我们部队的身份，如果上校问我们部队番号，就说是十四纵队特务大队。

“你是哪一部分的？”我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问。

“我从重庆来，到张主席这里来公干。”上校俨然回答。

“杨上校是国防部军统局新委任的河南站站长。”上尉赶紧向我介绍。

“有什么文件能够证明你们身份呢？”我疑惑地问。

“重庆有电报给张主席，我带着胡宗南长官给张主席的介绍信，请你派人送我到你们司令部去，我跟你们纵队司令是同乡、同学。”上校生气地打着官腔。

“请你把信拿出来，我要看看。”我仍表示不相信。

上校打开皮箱拿出一个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信封不声不响地放在我面前。我看完胡宗南给张轸的信，又仔细检查了印章，然后把信装进信封交还给上校：“对不起，我是十四纵队司令部的中校谍报参谋，看不到官方文件我是从不轻易相信的，这年月，国军、伪军都穿一样的军服，很难分清，再说，我也怕新四军冒充国军！”

“淮北不是没有新四军吗？怎么怕新四军冒充呢？”上校惊问。

“你怎么知道淮北没有新四军呢？”我像“自家人”一样地同他闲聊。

“我从豫陕绥靖救国军第二师那里来，听张国威师长讲，新四军还没有到淮河以北来。”

“豫陕绥靖军是汉奸部队，你怎么敢到那里去呢？”我知道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有勾结，但为了弄清他到伪军去干什么，故作惊

奇地问。

“我是拿胡长官的信去的。老弟，你不了解情况，绥靖军也不是真心当汉奸，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和胡长官有联系，我这次去是叫他们注意与张主席的部队取得联系，互通情报，防止新四军过淮河。”上校非常神秘地小声告诉我。

“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河南被日寇占据了，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过淮河呀？再说，有什么办法能堵住他们过淮河呢？”我听了他这一套曲线救国的汉奸逻辑非常气愤，但为了弄清他们怎样防止新四军过淮河，还是心平气和地问。

“新四军说是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游而不击，他们是扩大实力，抢占地盘；不是用堵的方法，最好的办法是把地方部队集中整编，住在集镇上、寨子里，修筑坚固的碉堡，不要分散被他们一个一个吃掉；你们要与绥靖军取得密切联系，互通情报，配合行动，一致对付新四军，这样新四军就不敢过淮北来，即使过了河，也很难站住脚。”上校恶毒地污蔑新四军，讲出了顽、伪联防反共的阴谋。

上校吃完饭出去小便，回到屋里后向我提出：“今晚我们要赶到陡沟，你们有公务，我们自己坐马车走。”上尉还解释说：“我是陡沟附近的人，到陡沟的路我熟悉。”

“那样急干吗？”我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同我们一起去陡沟。”

“也好！”上校面对上尉，“明天同他们部队一起去更安全！”

“等一会我们去与姜大队长带的部队会合，在那里住一宿，明天上午回陡沟。”

“现在走多好，等一会天就黑了！”看样子上校有些焦急。

“这里的事办完了就走。”我怕白天去与姜政委会合他们看出破绽。

天黑后我率一连到事先约好的地点与姜政委会合。当晚姜政

委就找上校谈话。

“娄上校是十四纵队特务大队长。”我故套近乎说，“杨上校，你要找张主席公干，可娄大队长就是张主席的外甥，他陪你去你看好不好？”

“太好了！”杨上校哈哈大笑，“这太巧了！真乃天助我也！我来的时候还怕找不到合适的地点设站，现在看，不仅张主席处可设站，老兄这里做我的后台更好！”

“站座！不管私事、公务，尽管下命令，我们照办就是了！”我也跟着他打哈哈。

“上校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有些什么公务要我们干？”娄政委为了弄清敌伪顽怎样联合反共的阴谋，故意试探。

“先把河南站组建好，然后开展工作。”杨上校神气十足地说，“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张主席的几个纵队与李司令的几个师之间的关系搞通，形成联防，互相支援，共同对付新四军！”

“我们怎么与他们联系呢？”我疑惑地问。

“你们每个纵队指定一名对党国忠诚的联络参谋，专门跟我一起去绥靖救国军几个师进行联系，协调行动！”杨上校更进一步说，“为了联系方便，我已经和李司令谈妥，他们每个师也指定一名联络参谋，专事联络协调工作，都要随身携带对方的谍报证。”

“有了紧急情况怎样联系呢？”娄政委故表担心。

“这不用你们操心！”杨上校表示成竹在胸，“我与李司令已商量好，他派两名机要秘书住在张主席挺进总队司令部，专事无线电联络；请张主席也派两名机要秘书住绥靖救国军司令部，专事无线电联络。”

天明后，他们去野地大小便回来可能发现“照顾”他们的“勤务兵”是在监视他们，上尉又向我提出：“上校怕耽误你们的公务，我们早餐后自己去陡沟！”

我看他们神情紧张，估计他们已看出破绽，又怕他们动武拼命，立即缴了他俩的手枪，看管起来。

他们知道反抗无用，乖乖举起了双手，让手枪队员缴下了手枪。上校却嘴硬地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你们不能缴国军的枪！”

“我们是和真正抗日的国军合作！但对你和那些与日伪联合反共的顽固派决不合作！”我十分气愤地说，“我将把你们与日伪勾结，联合反共的事实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揭露！”

四、顾店战斗

1944年7月中，第二军分区电报传达师部的决定：师部根据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确定以原在豫南活动的淮南支队三个中队，信应独立二十五团五个连和十三旅三十八团第三营等部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任命十三旅副旅长黄霖为司令，向河南敌后进军。游击兵团以淮南县委所属地区为前进基地，经平汉铁路东敌占区之信阳、正阳、确山交界的走廊地带，前进至舞阳，建立与中央的联络点，迎接八路军南下。同时成立豫南工委，发展汝南、正阳、确山地方工作，掌握豫东、豫南及桐柏山一带情况。

8月初，黄霖率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九连和工作人员约200人，从大悟山出发，进抵淮南地区，在肖王店西北黎山头地区与我们会合。第三天黄霖与娄光琦一起召集淮南支队，淮南县委和淮北工委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华中局刘少奇、陈毅同志6月23日电报指示“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后说：7月末，李先念师长根据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向进军河南的干部作了动员和

工作部署。强调大力发展河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勉励大家利用有利形势打通与八路军、新四军四师的联系，改变五师孤立地位。他强调游击兵团进入河南后，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同时责成淮南县委做好进军的一切准备工作。

黄霖传达完后，集中讨论怎样向北发展的问题，经过讨论，决定：第一步消灭顾店的土顽；第二步以淮南县委所属地区为依托，渡过淮河，消灭胡冲店的土顽；然后以胡冲店为中心，开辟汝、正、确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三步以汝、正、确根据地为依托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平）遂（平）叶（县）舞（阳）发展，打通与北面兄弟部队的联系。

我对区党委和师部的决定有些不理解，会后找姜光琦政委提出：我认为区党委和师部的决定不符合中央和华中局进军河南的指示精神，行动迟缓，错过了发展的良好时机，现在伪军、国民党地方军都组织起来了；现在派这样少的部队，很难完成打通与八路军、新四军四师联系的任务；组织领导关系也不明确，规定二十五团五个连和淮南支队三个连归豫南游击兵团，我们总队还管不管？总队部的领导、电台和人员算不算游击兵团的？姜政委听完后无可奈何地说：你提这样多的不理解，我跟你一样回答不了，你去找黄司令谈谈。

黄司令听完我的意见后不大高兴：区党委扩大会议那样多的领导提意见都不采纳，你在这里讲这些意见有什么用！师部命令二十五团五个连和淮南支队三个连归游击兵团，你们总队部的人不归豫南游击兵团，我管不了。

“这样说，姜政委只好带着电台和总队部人员回总队部去！”我也不高兴地起身往外走。

“陈参谋，你不要跟姜政委讲，我跟他商量后再定。”黄司令似乎觉得说的不妥，马上作了纠正。

黄司令与姜政委经过商量，决定：姜政委带来电台和人员同

黄司令带来人员一起行动，由黄、娄共同指挥。

虽说共同指挥，但娄光琦是信应罗礼总队的政委，豫南游击兵团没有职务，下达干部任免、作战等命令无法按规定写职务，只能写名字；部队作战指挥及平时各项工作，娄光琦通过我指挥二十五团和淮南支队，黄霖通过薛国衡（黄带来的十三旅作战参谋）指挥三十八团九连；警通部队也是各用各的，工作十分别扭，有时黄、娄交办的事项有矛盾时，得靠我们参谋协调，协调不好，两面受责备，搞得我们参谋人员十分为难。

黄到淮南后第四天夜间打顾店，商定由我率二十五团一、五连打顾店，由镇南进入；由三十八团三营黄副营长率九连打镇北小山岭，由镇北进入；二十五团三连及警卫部队随指挥所行动，做预备队；淮南支队两个中队，向五里店警戒，防日伪增援；规定夜 11 时打响，天明前结束战斗。战斗结果比较顺利，全歼通敌反共的保安大队，俘敌大队长以下 180 多人，缴获轻机枪 4 挺，步枪 100 多支；我三十八团三营黄副营长和 3 名战士牺牲，3 名战士负伤。

五、挺进豫中

1944 年 8 月 29 日，黄霖、娄光琦率三十八团九连，独立二十五团一、二、三、五、七连和淮南支队两个中队，在陡沟西沈湾附近渡过淮河，以数十里的远距离奔袭正阳县胡冲店，全歼通敌反共的保安大队，俘敌大队长以下 180 多人，打死打伤 30 多人，缴获轻机枪 6 挺，步枪 100 多支；我伤亡数人。

战后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9 月初，接受了赞同共产党抗日主张，愿意参加新四军的地方游击大队乔玉林部参加游击兵团，与淮南支队一个中

队合编为挺进三团，独立二十五团改为挺进二团。

鉴于我熟悉二十五团部队的情况，原来二十五团没有团的领导干部，快过淮河时才调来邵敏为团政委。娄政委要我去该团任参谋长，并调二十五团见习作战参谋来接替我的工作。但当我要去二十五团报到时，委政委却告诉我：黄司令要调三十八团参谋长林国平任团长，说你的资历太浅，要从老红军中选调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后来又决定暂不配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调我去暂任作战参谋，李民任政治协理员兼党总支部书记，由林国平（当时未到职）、邵敏、我和李民组成团军政委员会，由邵敏任书记。

我在总队部任作战参谋时，常带二十五团一两个连打仗，我也很喜欢打仗，去团里工作比在指挥部工作单纯得多，所以，我愉快地到了挺进二团。当时团领导只有邵敏政委一人，一般的军事工作都由我做主，大的问题才请示政委；我经常带一两个连去打伪军或顽军的乡保武装，打了不少小的歼灭战，工作很顺利，上下级关系很好。

9月下旬，我们部队在汝南县兰青店附近活动，地方干部跑来报告：兰青店来了广西军，有几百人，戴的钢盔，到了兰青店就抓人、打狗吃。我们分析，广西军驻豫东地区，离这里很远，不会派几百人来，可能是十四纵队冒充广西军。经过研究决定：我率一、二、三连包围进攻窜扰兰青店的敌人，邵敏政委率五、七连跟进，同时报告兵团司令部（位于住地西五六里的地方）。当我们分三路包围兰青店时，敌仓惶溃退到镇东北村子里，我们尾追到该村将大部分敌人歼灭，大队长率30多人在一个独立大院内顽抗，我们向院内投掷60余颗手榴弹都拒不投降。总队部杨参谋（见习作战参谋）前来传达命令：为了减少伤亡，不要强行攻击，将部队后撤，待敌逃跑时，在野外予以消灭。但杨参谋在进村时头部负伤（拍下去后牺牲）。当我们后撤时敌突围逃跑，二连尾追五六里，将大部分敌人消灭，仅大队长带数人逃

脱。

此次战斗，歼灭十四纵队特务大队，俘中校副大队长以下200余人，打死30多人，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我牺牲3人，伤6人。十四纵队遭受这次打击后，再未到兰青店以西我游击根据地骚扰过。这次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在总结会上，黄司令讲话时却批评二团：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暴露了二团战术素养差，不讲战术，蛮干，陈佑铭一个人就投了几十颗手榴弹，两个通信员给他送手榴弹，把手榴弹往手枪上碰（木柄枪榴弹，当手榴弹使用时，先碰底火后投掷），不利用地形地物，乱冲，结果总队部的参谋也牺牲了。对此批评我很不服，在讨论发言时很不冷静地说：我不懂什么叫战术素养，在野外不猛打猛冲能消灭敌人吗？猛打猛冲时没有伤亡人，是在攻村庄时伤亡的，杨参谋牺牲与我们没有关系，是他自己进村时负伤牺牲的；木柄枪榴弹刚发来不久，很多战士不敢投，我示范一下，战士就敢投了，手榴弹在土墙上不好碰，在手枪上碰方便，这怎么能说是蛮干呢？会后姜政委批评我发言不冷静，并说，司令部对我们战前未请示有意见，你这样跟他顶，他更不会同意你当参谋长了。

六、挺进豫西

为了巩固铁路东，开辟铁路西，豫南游击兵团决定在路东以淮南、汝南、正阳、确山、上蔡、遂平为基础，成立路东指挥部，留挺进三团协同地方坚持淮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建设根据地，兵团主力挺进路西。

1944年9月底，挺进二团和三十八团九连、兵团警通连在黄霖司令员率领下，由张杨店奶山地区出发，在明港以北越过平

汉铁路，向西挺进，到达确山县沙河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10月中旬，挺进二团在沙河店至驻马店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溃日军掩护队，打死日军2人，打伤多人，缴获步枪2支，药品5万多件和一批衣物。在衣物中有一件羊皮大衣，团没收委员会看我没有棉被，执意要分给我既当大衣又当被。我第一次接受没收委员会分给我的东西。我很少穿它，只是晚上睡觉当被盖，把两只脚伸进大衣袖内，盖在身上挺暖和。有了大衣，再不用向老乡借棉被盖，这既减少了老乡的麻烦，也免得勤务员到宿营地又弄稻草又借被。河南农村，一般农民都生虱子。我刚到河南时很怕虱子，情愿盖稻草，也不借老乡的被子盖。后来时间长了，我身上也有了虱子。

1945年10月，我得了伤寒病，住在四方山医院里，身上虱子很多，羊皮大衣里的虱子多得更是吓人，抓又不好抓，也不能用开水烫。勤务员小李想了一条“妙计”，把皮大衣放在蒸笼里蒸。他蒸完后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我想了一条好办法，到老乡家里，用蒸笼把皮大衣蒸了一家伙，虱子都蒸死了！”我看他那得意的样也高兴地笑了。可是，第二天下午，小李拿着大衣，低着头，流着泪跟我说：“这下全完了，大衣皮子都碎了，你再没有皮大衣盖了！”我恍然大悟：“对呀！皮子用蒸笼蒸熟了，晒干后可不就碎了，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看小李难过的样子，便跟他开玩笑：“小李呀，你不是会唱《游击队歌》嘛！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你不用发愁，到天冷时敌人自会给我们送来的，不过不能哭，你哭敌人就不怕，就不给送了！”

1944年10月中旬，师部增派的三十八团七、八两连来到路西，补充了一批参军的农民，编为挺进一团；10月下旬，师部又增派四十五团二营到铁路西，与地方武装合并编为挺进四团。兵团以确山县郭山冲为中心，建立了路西的豫南抗日根据地，挺

进二团主要活动在西平、遂平、舞阳地区，根据地在这里。

七、酒店战斗

挺进二团在路西活动中，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是 1944 年 12 月，歼灭遂平县伪保安大队。酒店是遂平县一个较大的镇子，镇东有一条河，河东岸有座小山，镇内驻着一个伪保安大队，160 多人，镇东、镇西各有一碉楼，碉楼内及附近民房各驻一个中队，大队部和一个中队驻街北。镇内有一家卷烟厂，经理王方明是当地我党负责人，战前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敌情和地形，并同我们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确定采用偷袭的办法，一连攻镇东、二连攻镇西、五连攻镇北的敌人，镇内由我统一指挥，我随五连行动；邵敏政委率三、七连位于河东岸小山上，向西平、遂平方向警戒。

部队经过充分准备，于夜间 11 时 30 分，在地方党的同志引导下，由镇子南面野地里摸进镇子内，同时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一、二连准时摸到碉楼，将大部分敌人消灭，少数敌人逃进民房，天明后也被活捉；五连一举攻进大队部，将大队长活捉，经他喊话，一个中队也投降了。此次战斗，俘敌大队长以下 150 多人，缴获轻机枪 3 挺，步枪 100 多支，我无一人伤亡。

歼灭保安队后我带着部队搜索到卷烟厂，“快叫你们掌柜的来，我有话问他！”我指着几位伙计说。

“掌柜的不在家。”一位伙计笑脸说。

“商会的会长也是他吧？”我故作气愤的样子说，“烟厂不给新四军交税，商会也不给新四军交税，把钱交给保安队，你们说是不是汉奸！”

“保安队在镇子上住，我们不交钱不行呀！”几个伙计几乎同

时解释。

“快叫他出来见我！”我大声说。

“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快去搜！”我给警卫班杨文森班长下命令。

“这家伙躲在烟库里面！”过了一会儿，杨文森把王方明带到我面前，高兴地指着他说。

“你这个汉奸，一个月给保安队交多少钱？”

“交二三百块钱！”王方明害怕的样子，我想想就好笑。

“全商会呢？”我大声吼问。

“五六百块钱！”王方明撒谎说。

“商会一个月交一千多，你这样不老实，我们来了你还躲起来，快把他捆起来带走！”

杨文森找了一根绳子把他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几个伙计都一齐向我哀求：“长官，我们愿意受罚，把掌柜的带走了生意就垮了，我们生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知道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为我们工人行行好吧！”

“看在工人的面上，今天饶了你，赶快把今年的税补交我们。”我指着几位伙计对王方明说。

“今天柜上没有钱，烟还没有批发出去，你们要烟可以随便拿。”王方明哀求。

“胡说，我们又不是土匪，能拿你的烟吗？”

“长官，我是说用烟顶钱，弟兄们也是要用钱买烟的。”王方明赶忙解释。

天明后，邵政委要通信员通知我，遂平县的日军已出城增援，把部队迅速撤出酒店。我顺势给王方明和几位伙计说：“遂平的日本鬼子来了，我要带部队去打鬼子，以后把税钱给我们补交去。你们都是中国人，要支援新四军打鬼子，不要支援汉奸和鬼子。”

后来酒店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王方明同志经组织批准也参加了游击兵团工作。有一次他来团里吃饭，他见我叫“佑铭同志你好”时，我故作严肃地说：“你叫得不对呀，为什么不叫我长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杨文森在一旁老盯着王方明，我知道他感到奇怪，便逗趣地说：“杨文森你傻看什么，还不赶快向王方明同志赔礼，你在酒店把他捆得那样紧！”

“哦！难怪面孔这样熟呢！”杨文森似有所悟地说，“那不能怪我，首长事先也不告诉我们，我看陈参谋对你那样凶，我真把你当汉奸对待的。”

“谢谢你捆得紧，不然怎么骗过保安队呢！”王方明伸手拉着杨文森哈哈大笑。他接着问，“事先他不知道内情，怎么一到烟库就把我抓住了呢？他好像知道我躲在烟库里似的！”

“他是活猫逮住个死耗子，他要逮不着还得我亲自去抓你这个‘汉奸’！”我接着向王方明同志介绍，“杨文森当时是警通连的班长，现在是邵政委的警卫员，当时没有跟连以下人员讲你的情况。他怎么知道你是自己人呢，更不知道你躲在烟库里。”

编者按：陈佑铭同志委托编辑转告读者，因年代久远，有些问题记不太清，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欢迎更正。

忆爬头寨战斗

潘友诒

1944年初冬，我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一部攻打爬头寨的战斗，是同年我五师部队进入河南后，为开辟根据地而进行的一次大的战斗。战斗激烈，战果丰硕，影响深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值此，爬头寨战斗5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作为当年战斗的参加者，感慨颇多，心情不能平静。今天用我拙笔将那次战斗的情景写出来，以表达我对那次战斗牺牲烈士的缅怀之情。

那是1944年9月间，我三十八团政委周庆鸣，奉师长李先念之命，率领本团第三营的七连和八连及团直机炮排，增援豫南游击兵团。当时，我任三十八团党总支部书记，协助周庆鸣同志工作，因此随同三营一起开赴河南。

10月上旬，周庆鸣率领的部队在确山瓦岗镇南木讷岗村与黄霖指挥长会合，部队遂即编入豫南游击兵团建制序列。在木讷岗村，黄霖指挥长兼中共豫南工委书记，召开了豫南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根据豫南地区形势，初步规划了创建汝（南）正（阳）确（山）、信（阳）北、确（山）西及桐（柏）东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0月中旬，我游击兵团在确山以西的竹沟、瓦岗以及卢庄一带，摧毁了当地曹茂臣、赵崇武、李连堂、师子卿等人的反动武装，控制了确山西部大片地区。惟独惯匪张明泰的土匪队伍，仍盘踞在石滚河以南山区爬头寨上。张明泰是确山县和信（阳）桐（柏）泌（阳）边缘地区著名的土匪头子。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满肚子的坏水。他天生两条兔子腿，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步履如飞。他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以拉杆子起家，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纵容下，八九年间就收容了许许多多亡命之徒，搞起了五六百人的土匪队伍，在确山西部山区当上了“座山雕”。

张明泰还是1939年参与制造“竹沟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罪恶深重。确山沦陷前夕，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刘茂恩委任他为豫南国民自卫军第八总队总队长头衔，准备在确山沦陷于日寇之后，让张明泰留在敌后执行反共任务。日寇占据确山后，他多次勾结日本鬼子向抗日民众施虐，血债累累，人民恨之人骨，实为我军创建确山西部桐柏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为此，我游击兵团指挥部研究决定，坚决消灭张明泰这支土匪队伍。

爬头寨位于确山县石滚河镇东南方向一座海拔700多米的山峰顶上。它东临团山，北靠黄土岭，西与老鹰崖相望，南近铁幕山；山峰三面悬崖陡壁，不易攀登。这个山寨原是当地老百姓为防备土匪抢劫而建的，后被张明泰强占，成了他的土匪老窝。日寇占据确山城后，竹沟、瓦岗、石滚河、卢庄等地的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有一部分逃到爬头寨山下陈冲，投靠了张明泰。此时，张明泰共有四个中队（其中特务中队最为强悍），拥有匪兵600多人。装备有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长短枪380余支。且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又有山寨作依托，非常利于他牢牢固守此寨。由此可见，要消灭爬头寨上的张明泰匪军，绝非易事。我军攻坚任务之艰巨，不亚于歼灭一支国民党正规军精锐部队。

11月19日夜，我三十八团三营和独立二十五团部队，由乐山（确山北）以西的熊庄出发，20日晨，二十五团3个连分别抵达爬头寨周围地带，成包围之势。为了紧缩包围圈，黄霖指挥长特令我团三营教导员刘建钧，率领该营七连攻占老鹰崖，并将山下陈冲的敌人打垮，以防张明泰匪军向铁幕山逃窜。

20日中午，黄霖、邵敏（独立二十五团政委）指挥二十五团3个连，由爬头寨北面的磨镰石沟，佯攻山寨，敌人故作镇定，纹丝不动。张匪防御重点是爬头寨北门，而我军欲拿下爬头寨，必须由北门攻取之。张匪十分狡猾，二十五团部队距他们远时，他不予理会，迫近他们时，他就推寨墙上的大石块往下滚，使二十五团部队无法靠拢寨墙。

下午三时，为增援豫南游击兵团，由周春鸣率领的十五旅四十五团二营赶到了，黄霖指挥长将他们布置在老鹰崖一线。下午四时黄霖命令我三十八团部队在黄土岭集结，同时令三营于五时向爬头寨敌人发起总攻，务求全歼敌人。二十五团部队仍在原地监视敌人，以防张匪突围。

周庆鸣政委根据黄霖指挥长的命令，遂令三营于四时半在爬头寨北门外约500米处集合待命，同时指定八连担任主攻，九连做总攻第二梯队，七连为预备队。八连到达集合地点后，及时做好了战斗准备。连长樊远芳将全连分成8个战斗小分队，由他和指导员彭松青各带4个，并指定了担任突击任务的尖刀小分队，并为他们补充了弹药。准备完毕，周庆鸣通知兵团迫击炮连和我团机炮排，于四时五十分开始向爬山头寨北门之敌进行轰击。

下午五时整，在炮火掩护下，樊远芳带领八连开始向敌北寨门阵地运动。他走在前头，彭松青跟在他率领的战斗小分队后面。当樊远芳带领的尖刀小分队将要接近敌阵地时，守敌的机枪突然向他们疯狂射击，尖刀小分队即刻发起攻击，在攻到距敌阵地不足20米时，尖刀小分队队员一齐向敌人投掷手榴弹，在确

烟弥漫中，战士们勇敢地冲上去，同跳出工事向他们杀来的匪兵展开搏杀。几个回合下来，死伤的敌人倒在地下一大片，然而敌方不断增派兵力，拼死顽抗，以致我尖刀小分队未能攻下敌人的阵地。就在此刻，寨门洞内敌人轻重机枪猛烈向尖刀小分队和跟随樊连长攻上来的其他小分队进行扫射，樊远芳和 20 余名战士顷刻间中弹牺牲了。

彭松青指导员目睹此情景，忍着悲痛，立即指挥轻机枪手向敌人还击，并令小分队的战士，将一颗颗手榴弹向敌阵地投去，顿时敌人阵地硝烟四起，枪声停息，他立刻带领各战斗小分队向前冲锋，不料北门两侧寨墙上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又一齐向他们射来，倏忽间，雨点般的子弹击中了指战员的胸膛和头颅，彭松青和他带领的战士，纷纷倒在血泊中。这两次冲锋只不过一会儿的时间，在北寨门外不长的一段山梁上，躺下了我八连 40 多名伤员和 30 多名烈士的身躯，那景象是何等惨烈与悲壮啊！

作为总攻第二梯队的九连指战员，眼望着八连壮烈牺牲的战友，眼睛都湿润了。他们悲愤地向连领导齐声呼喊：我们要求立刻投入战斗，为八连死难战友报仇。这时，只见九连连长肖久唤来该连四名轻机枪手，要他们一字排列，他本人也加入到他们中间。五个人肩并肩迈开大步向前走，全连指战员紧跟在他们后面，雄赳赳、气昂昂地踏着八连攻击走过的地方，向前奔去。

当他们行进到要发起冲锋的地点时，四名轻机枪手各自端起自己手中的机关枪，一边连续向北门之敌扫射，一边随着肖连长勇猛向敌人攻击。这时，全连指战员情绪十分高昂，人人争先，前仆后继，潮水般地往前冲去。

此时，我兵团总攻击的强大炮火，异常猛烈，持续不断。特别是我团机炮排两门经过改装的平射迫击炮，大显神威，终于把敌人重兵防守的北寨门轰塌了。乱石块砸毁了张匪构筑在寨门洞内外的工事，守敌非死即伤，一片狼藉。残余匪兵不敢再抵抗，

仓皇向寨里逃遁。我九连一排乘敌败退之机，像一支支从弓弦上射出的利箭，迅猛地攻进了北寨门，追击逃跑之敌。此刻，黄霖、周庆鸣和我冒着被敌人射来的子弹及匪兵从寨墙上推下来的大石块击中的危险，穿过滚滚硝烟，疾步走到北寨门前，随同英雄九连后续部队的指战员一起冲进爬头寨内。

爬头寨依山势而建，寨墙全用大石块筑成，厚1米，高3米，周长400来米，呈三角形，寨子里面面积较大，虽地处山峰顶端，但地势平缓。匪首张明泰在寨内建筑碉堡四座，住房二十多间，并构筑了工事。

我九连攻入寨内后，撤退到寨里的大部匪军与我军展开激烈巷战。九连指战员杀红了眼睛，在拼杀中将敌人一一击毙。另一部分匪兵钻入碉堡里进行顽抗。这时，已在攻寨时负伤的肖连长，仍不肯下战场，坚持继续指挥战斗。九连指导员文道经攻入寨内后，与肖连长一起向碉堡内的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不料想，从碉堡里突然射出几发子弹，击中了文指导员的胸脯，他即刻倒在地下，奄奄一息。临牺牲前，他还不停地说：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坚决消灭他！

在文道经指导员的壮烈牺牲面前，肖连长强忍着悲痛，立即抽调精干战士，用长木杆捆上手榴弹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将它一一送进敌人碉堡射击孔内，碉堡内敌人大部分被炸毙，残余部分，不敢继续顽抗，打出白旗，向我九连投降。至此，一场十分激烈，异常惨烈的爬头寨战斗胜利结束了。

此次战斗，我军全歼张明泰匪军四个中队，击毙张明亮（张明泰之弟）等四名匪中队长及匪兵400多人，击伤和俘虏匪兵150多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长短枪360余支，以及其他部分军用物资。唯一遗憾的是，顽匪头子张明泰漏网没有被抓获。张是在我军刚攻入寨内时，眼看大势已去，乘混乱之际，着人拿20余匹白布结成一条长长的布绳，将绳的一头拴在

东寨墙边一棵大树上，另一头甩出寨外。他带了几个心腹，拉着这根长绳，贴着峭壁滑到谷底，逃往确山投降日本鬼子去了^①。

我军攻入爬头寨内，还拯救出被张匪掳来的青年妇女 80 多人。战斗结束后，当地人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亲自送饭上寨，慰劳我军。

我军一举歼灭作恶多端臭名远扬的张明泰顽匪全部 600 多人，这在确山全境引起强烈震动。各乡镇几乎所有的地主武装皆闻风丧胆，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在此种态势下，县南任店乡的高章亭；新安店乡的刘汉三；县东南杨店乡的余旭轩、张明斋；留庄乡的彭杰三；县东刘店乡的张绍英；县北驻马店镇的杨宪民；朱胡同乡的陈占宾；胡庙乡的龚云琦；县西北蚁蜂店乡的王子玉等诸多地主武装首领，纷纷主动找上门来，与我兵团黄霖指挥长接触，表示愿意接受我军改编，参加新四军一同抗日。

爬头寨一仗，打开了确山西部和与之相毗邻的信（阳）、桐（柏）、泌（阳）边缘地区的局面，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衷心拥护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他们打日本鬼子。我游击兵团很快在确（山）西桐柏山区的孤山冲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先后建立了汝正确、确泌桐和信确三个县级政权——行政委员会，并为开辟豫中抗日根据地打开通途。

这里特别值得颂扬的是，在爬头寨战斗中的樊远芳、彭松青、文道经、肖久四壮士和他们率领的八、九两连的勇士们，为民除害，为创建豫中南抗日根据地的宏伟事业，不惜洒热血、捐身躯，充分体现了革命军人为抗日、为革命、为解放人民，赴汤蹈火，义不容辞，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攻打爬头寨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你们为人民、为革命伟大的献身精

^① 张明泰在确山投降日寇后，暗中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继续作恶。日本投降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方的“谍报队”。因闹内讧，被同伙李树森杀死。

神，可歌可颂，惊天地，泣鬼神，你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爬头寨战斗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每当我想起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对他们总是非常崇敬，同时心中也很难过，我多么怀念樊远芳、彭松青、文道经三位年轻优秀的干部啊！多么痛惜那 30 多位年轻的战士为人民早早献出他们短暂的生命啊！难忘的战友们，你们的光荣业绩，永远与日月同辉，你们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爬头寨战斗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合水镇战斗

陈佑铭

1945年初春，豫中大地万物回生，一派盎然生机。坚持在豫中地区敌后抗战的我新四军五师河南游击兵团广大指战员，展开了对日、伪攻势作战，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城镇，基本上把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处于守势。

这年三月，河南游击兵团挺进二团，在豫中嵯峨山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一仗，全歼敌伪一个保安大队，俘敌300多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七八挺，手枪十多支，还有一些战马；特别是俘伪豫陕救国绥靖军第二师少将师长张国威和少将副师长兼西平、遂平地区五乡联防保安司令吴春亭，打死日本指导官松木。

这一仗虽不大，但一次战斗俘伪军两名少将，尚属首次，对中原地区影响很大，使豫中敌我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气焰，振奋了军民的抗日热情，扩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顽联防反共的阴谋。

合水镇因漯河、宜河两水流至西平境内合水镇汇合，然后流入淮河，故称合水，它是西平、遂平、上蔡和舞阳四县之间重要

的据点。五乡联防保安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镇子周围有四米米高、一米来厚的寨墙围着。沿着寨墙，又有三四米宽、二米来深的水壕，把镇子死死包住，镇子通往外面的出路，仅有4个厚厚的寨门和四座石桥。每个寨门都设有碉堡，封锁着石桥。碉堡里日夜有伪保安队放哨。到了夜间，还强迫群众提着灯笼设岗放哨。镇子里住着洪溪乡保安大队的三个中队和乡公所、镇公所的地方武装，共300多人，配有9挺轻机关枪、300来支步枪，归吴春亭指挥，吴春亭原是国民党西北军冯玉祥的第八师少将师长，50多岁，是河南鲁山县人。他和豫陕绥靖公署主任兼豫陕救国绥靖军司令李玉霖是东北讲武堂同学。

新四军五师刘少卿参谋长奉调去延安，路过嵯峨山，因交通线未打通，滞留在兵团司令部。李先念师长写信要他留在河南兼任河南游击兵团司令（1944年11月，豫南游击兵团改为河南游击兵团），将原司令黄霖调走。

3月10日左右，邵敏政委告诉我：明天上午同林团长和他一起去刘参谋长处开会，研究攻打合水镇的问题；刘参谋长原来想要挺进一团攻打合水，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打，现在想要我团打，你好好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怎样打。

第二天我们三人到达刘参谋长住处时他正和路西指挥部的几位领导看地图，他在招呼我们坐下后说：今天找你们来是研究攻打合水镇的问题。合水是日伪西平、遂平、上蔡、舞阳四县之间的重要据点，攻克后可将敌人逼到县城和铁路沿线去，扩大我们的游击根据地，粉碎敌、伪、顽联合反共的阴谋。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打，理由是：合水镇墙高、壕宽、水深、四城门有碉楼，易守难攻；离县城近，日伪军一个多小时就能增援。你们看能不能打？怎样打？希望你们讲心里话。

经过一分多钟冷场后林团长说，据侦察，进镇只有四座石头桥，城门天不黑就关闭了，四门都有碉楼，用机枪把石桥一封锁

就很难过得去，确实很难攻打，如有内线接应就好了。邵敏政委指着我说，陈佑铭讲讲你的意见。

我知道刘参谋长想打，有的同志不同意打，林团长也不大想打，但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口气说，昨天接到邵政委通知后我仔细作了分析，合水镇墙高、壕宽、水深、有碉楼，强攻短时间很难攻下，时间长了敌人会增援，但我认为，采用突袭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成功的，理由有四：一是敌人自以为设防坚固，只要顶上一两个小时，城里日军增援即到，我们不敢打他，有麻痹思想，防守松懈。据侦察，夜间保安队住在碉楼里，城墙上老百姓放哨；二是日军夜间一般不敢出来，伪军更不敢单独来增援，若我们夜间实施偷袭，速战速决，天明前结束战斗，日、伪军再多，也不起作用；三是镇子周围村庄少，大多是麦地，麦子长得很高了，容易隐蔽接近，发起突袭；四是碉楼枪眼是对寨外的，进寨后由里向外打，很容易攻下。如领导决定打，建议用三个连从东、西、北三个门隐蔽接近，突然袭击，天明前撤出。万一偷袭失败，不要强攻，尽快退出战斗。

邵政委接着说，我同意陈佑铭的意见，如首长决定打，我意由陈佑铭带一、三、五连攻合水，其余部队掩护，我们回去再具体研究布置。

刘参谋长在询问大家没有意见后说：我看陈佑铭讲的有道理，不是胡乱参谋，如果大家不反对，今天就定下来：

1. 挺进二团用3个连攻打合水镇，其余部队作掩护和预备队。我和林团长、邵政委在后面指挥，由陈佑铭带3个连攻城。

2. 要采取偷袭的办法攻城，部队要轻装，攻城的梯子要轻便结实，每个连要组织强有力的突击队，隐蔽接近，迅速靠梯登墙。

3. 部队天黑后出发，两点左右打响，拂晓前结束战斗，撤出合水镇。

4. 地方部队担负西平、遂平方向的警戒掩护。部队要接近县城近一些，如敌人出城增援，要边打边撤，并迅速派人报告，具体布置我们另行研究。

5. 今、明、后三天准备，××日行动。要注意保密，准备时排以上干部可以说明打合水，战士要在战前动员时才说是打合水。

我们按照刘参谋长的指示，研究了攻打合水镇的具体部署，决定一连从东门、三连从北门、五连从西门三个方向偷袭，七、九连向西平、遂平方向警戒掩护，二连、机枪连、警通连、手枪队跟随指挥所。我又派了侦察员去合水、西平、遂平进行了侦察，敌情没有异常变化。

3月的一天，艳丽的晚霞沐浴着战士们轻快的脚步，轻装简履，向合水镇急速前进。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入敌占区。在一位老大爷的指点下，我们朝着亮灯的合水镇方向直插过去，迅速地接近了护寨河边。敌人近在咫尺，墙上放哨的清楚可见。

“干什么的？”我还没来得及部署部队，敌哨兵就大声问。“查哨的！”一连连长沉着响亮地回答。“查哨的怎么这样多人，在麦地里干什么？”显然，按原计划的作战方案，把部队沿护城河散开，各自从东、西、北三门分别进攻，已不可能了。时间紧迫，又不允许到后面去请示。于是，我立即命令一连迅速过桥，“靠梯子上！”

刹那间，几个梯子同时靠墙。我英勇无畏的战士，如猛虎般开始登梯，压得梯子嘎吱嘎吱直响。

“新四军来啦！”放哨的伪军发疯地狂叫。

喊声未落，碉堡里敌人的机枪便开始向我们盲目射击。驻碉堡下面的两个伪军分队，拼命向寨墙上爬。这时，我命令三连以密集的火力压住碉堡里的机枪。在火力掩护下，我第一批英勇无畏的战士已登上寨墙，敌人也几乎同时爬上寨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机枪班长眼疾手快，一梭子弹把冲在前面的几个敌人打

倒，后面的敌人掉屁股就往回跑，另一部分战士敏捷地迂回到碉堡后面，扔进几颗手榴弹，只听几声巨响，碉堡里的敌人死的死，降的降，就这样，一连部分指战员，用了几分钟时间，就顺利地拿下了第一个碉堡。他们随即打开寨门，后续部队似潮水般地涌进寨里。

我命令五连沿着寨墙向左边扩展，占领碉堡；三连去占领右边的碉堡；我率领一连尾追逃向镇子中心的敌人。借着微弱的月光，双方展开了巷战。胆怯的敌人渐渐退向他们主子的巢穴——保安司令部所在地乡公所。

五连不到十分钟就接近了南门的碉堡，仅用几分钟时间，就击溃了守寨门的一个中队。西门碉堡也由一个中队把守，三连仅二十来分钟的时间，就全歼了顽抗的敌人。这样，我们几个连像收网一样，向敌乡公所突击。我立即命令各连展开搜索，抓俘虏。

“你们当官的住在什么地方，都是谁？”我审问一名俘虏。

俘虏说：“吴春亭就住在乡公所的院子里。听说昨天下午从西平县来了个姓张的大官，还有几个日本人，都骑着高头大马”。

“姓张的？”我略一沉思，“莫不是张国威？”此人原是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五军暂编二十七师少将参谋长，后来在李玉霖部任第二师少将师长，驻防上蔡县城。他和日本人来合水镇，事先我们一无所知。

听了俘虏的口供，我心里暗自高兴。正在这时，邵敏政委也进了镇子。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得知合水镇有几条“大鱼”，非常高兴。我们叫通信员把这一情况告知各连，并报告指挥所。刘参谋长命令我们严密搜索，一定要抓到。

“报告，抓到了张国威”。

我和一连李连长来到了乡公所院子里。见张国威身着整齐的少将军服，站在院子中央，显得很镇静。我向他问了有关情况。据他说，他和西平县、遂平县两个指导官及随从3人来合水镇，

是来整编西平、遂平五个乡的保安大队的，计划将他们编为第二师第二、三团，战斗打响后吴春亭从这儿跑出去集合部队。

张国威当时在思想上已基本同情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被俘后经过刘参谋长亲自谈话教育，思想认识提高很快，答应参加我党的地下工作，保持联系，不久，刘参谋长率警卫连将他秘密地送到西平城附近，潜回部队。直到解放，他一直保持和我们联系，提供了不少情报。他在担任国民党军沈阳、南京师管区司令期间，曾三次在押送壮丁去国民党部队时通知我军中途拦截，对革命做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将他分配到运输公司任股长，后到北京任东城区政协委员，离休后住在北京。合水战斗情况有些细节都是他提供的。

搜索部队不断报告：“不见日本人和吴春亭”。我们很焦急，命令部队反复搜索。

在一所院子里，警卫班发现日本人躲在麦草垛子里。立即围住院子。这时，指挥所通知我们，日军正向合水镇扑来，我县大队在阻击他们，命令我们抓紧搜索，准备撤出。天越来越亮，我心急如焚，来不及抓活的了。我立即向院内草垛子上扔进一个燃烧手榴弹，闪到屋角旁边，瞄准那个日本指导官，当他第二次跳墙，双手刚刚扒上墙头时，我一抠扳机，结果了松木的性命。另一个日本随从也被战士们击毙了。

天已亮了，日军增援部队的枪炮声，越来越近，邵敏同志再次命令我们撤出镇子。可吴春亭还未抓到。我告诉一连加紧搜索到最后十分钟。

当我们搜索到一个药店时，发现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先生”站在柜台边。这么早他站在柜台边干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我疑惑地问。

“我是药店老板。”他俨然应答。

当我从身边走过，脚踏后院门槛时，一眼瞧见一个十二三岁

的小男孩，站在门外杳晃处。他机灵的双眸焦急地盯着我，小嘴冲着那位“药店老板”直努。我心里明白了，便倏然转身，大声吼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快说！”战士用枪逼着他。

“我确实是药店老板。”他还诡秘地一笑。

鬼子的炮声越来越近，时间不容多问。我命令“带走！”我们刚把他押出药店，迎面来的俘虏认出了这位“先生”就是吴春亭。后来经过刘参谋长教育后，吴春亭表示愿意参加我军抗日，争取立功赎罪。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秘密地任命他为西平县警备司令，随后，他秘密地回了西平。他回去后，经常向我们提供情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把他杀害了。

抓住了吴春亭，大家开心极了，我立即命令部队：“全部撤出！”我们押着吴春亭，跑步来到城外，与带部队迎接我们的邵政委相遇，他满面春风地问：“都撤出来了吗？”

“全部撤出！”

“连吴春亭也‘撤出’来啦！”不知是谁风趣补充，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战斗结束后，在西平县嵯峨山地区召开了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请豫剧团演了三天戏，部队进行了总结和讲评，刘参谋长表扬挺进二团这一仗打得漂亮，部队勇猛沉着，指挥机智果敢。团没收委员会决定将被打死的日本指导官松木的派克钢笔奖励给我。

我在纪念合水镇战斗五十周年时曾写过一首词：

鹧鸪天

重镇壕宽水四瀛，墙高壁厚堡坚城。
我团巧施偷袭战，日伪全歼敌震惊。
师长虏，缚司令，生擒敌伪数百名。
日军毙命嗷嗷叫，群众欢欣排队迎。

王家坊——黄冈沿江湖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作用

王石泉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湖北黄冈（含今新洲县）地区，积极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主张，动员人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地推动了王家坊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鄂东沦陷后不久，王家坊就成为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对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王家坊位于黄冈县境的中部，东西南北距县界都在 25 公里以上，距县城黄州镇（今黄州市）大约 25 公里。这一带大小河流交织如网，湖泊塘堰星罗棋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王家坊的西面是涨渡湖和举水河，东面是黄草湖和倒水河，湖里河边都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形成天然的隐蔽屏障。涨渡湖周围，人口稠密，王家坊就是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较大村庄，加上附近的曾家湾、李家湾、长林咀等村，共有五六百户人家。这些村庄相距很近，远的不到一公里，近的只有二三百米。由于水网密布，村村都有许多各式各样捕鱼和运输的大小船舶，这一带不仅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优越自然条件，而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黄冈县就是鄂东重要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将领辈出，即使在极其困难的白色恐怖中，不管革命力量遭受多么严重的损失，革命的烽火也始终没有熄灭过。

说到王家坊和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不能不提到抗日战争初期，诞生在黄冈、由我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鄂东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独立游击第五大队”。

“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前身是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组建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1939年1月，为了取得“合法”名义，解决给养问题，中共鄂豫皖区委经与当时在大别山驻防的国民党桂系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谈判，把“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由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代管，并划黄冈、麻城交界的夏家山、芦四坳一带为驻防区。半年之后，这支部队已发展成一个团的规模，有11个中队1300余人。尽管名义上归国民党管辖，但实际上仍然由我党领导，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先后袭击了淋山河、方高坪、宋埠、中馆驿等日寇据点，火烧巴铺大桥，截断公路交通，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基本控制了黄冈的一、二、三、四区，麻城的四区，以及白果以南、汉麻公路以东的广大农村，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鄂东地区抗日军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鄂东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起家的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深感威胁和不安。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引导下，他们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9月，反共老手程汝怀部纠合桂军一七二师，对“五大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制造了“夏家山事件”。“五大队”奋起反击，主力部队

分散突围。

“夏家山事件”后，我党决定把鄂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王家坊这块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文祥和漆少川等率领的“五大队”三营一支30多人的小部队，突破顽军包围后，遵照大队的指示，“留在黄冈，坚持斗争”创建的。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王家坊地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部队很快就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不久，突围西去的张体学率“五大队”三营主力一部又返回鄂东，与文祥、漆少川等会合，王家坊地区很快成了黄冈、乃至鄂东抗日游击运动的新热点。

1939年底，黄冈中心县委转移到王家坊，在那里领导全县积极恢复和发展组织，使基层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同时，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先后建立了十多支武装便衣队，后来发展成为有300多人的县大队；还在王家坊所在的黄冈县二区及西邻的冈西叶店、彭城、汪集等地区，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一批群众性的抗日保家自卫队。1940年4月，黄冈县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区政府——二区民主政府成立，王家坊本村开明绅士王维让当选为区长；5月，黄冈县抗日民主宪政促进会在邻近王家坊的冈西余家楼成立；12月，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诞生；许多群众抗日组织也陆续在王家坊地区产生，如1940年3月在王家坊召开黄冈县妇女代表大会并成立了黄冈县妇女抗日救国会，5月成立了黄冈县农民抗日救国会等。在这一时期，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经常在王家坊及周围地区流动办公，黄冈和鄂东地区的许多抗日工作都以王家坊为中心，向四周延伸。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这片根据地又逐渐向黄冈沿江的大埠街、团风、黄州和阳逻等广大农村和乡镇扩大，最终形成了以王家坊为中心的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

王家坊地区是我党鄂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后方基地，是向

鄂南、鄂皖边进军的跳板。从早期的秘密游击队、鄂东游击挺进队、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到鄂东独立团、五师十四旅和挺进十七团等，他们在各自的历史阶段，都曾经驻扎在王家坊地区。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前夕，第五师主力和鄂东地方部队，为扩大鄂东抗日根据地，打通与新四军第七师的联系，建立与军部的通道，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多次东进鄂皖边和南渡长江。部队在行动前，经常在王家坊地区进行战前准备。如1940年8月8日，刘西尧、张体学率鄂东独立团东进鄂皖边，1943年10月上旬，挺进十七团南渡长江，部队在王家坊进行战前准备时，黄冈中心县委动员了全县的党员群众，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干部出干部，全力以赴支援部队。笔者就是在挺进十七团南渡长江前夕，和王家坊另外三名青年一起参军的。当时挺进十七团在王家坊地区进行战前准备后，突然在一个晚上悄悄出发，直奔长江北岸，当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时，部队在沿江群众的帮助下，顺利渡过长江，挺进鄂南。

部队在王家坊地区驻扎期间，衣、食、住、行和活动经费，除正常的税收外，很多都是由沿江湖区当地政府和群众筹措的。张体学、漆少川等，在部队经济困难时，都曾派人来沿江湖区，找当地党政组织筹过款。

“夏家山事件”后，“五大队”被服厂转移到王家坊继续坚持生产。随后，汉宜公路西侧游击区的一个小被服厂也转移到王家坊，与“五大队”被服厂合并，1941年4月改为十四旅随军被服厂，共有100多人，50余台缝纫机，可以满足鄂东党政军近万人的衣被等军需物质的供应。部队的兵员也是在当地补充的，黄冈县就为部队提供兵员2000人以上。

王家坊当地群众与部队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如一家。部队进出王家坊地区，当地群众驾船摆渡运送，当劳力紧张时，连在校学生也赶来帮忙，连夜赶运。部队的一些领导人，如刘西尧、张

体学、漆先庭、漆少川、文祥、易鹏和孙侠夫等，平易近人，与当地群众十分熟悉。

1939年底到1940年初，黄冈中心县委在王家坊、曾家湾和赤脚寺，分别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和鄂东青年培训班。参训学员由基层选送，县委领导亲自讲课，学员毕业后输送到黄冈及鄂东各县工作。这些同志很多成为鄂东各地抗日运动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已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鄂东的大地上。

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王家坊地区，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进行扫荡和清剿。特别是1942年和1943年间，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剿，当地军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很多群众和党员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许多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掠夺。记得一次日军来王家坊扫荡，因当地军民事先得到情报作了准备，绝大部分群众都乘船隐蔽到涨渡湖的芦苇丛里。敌人进村后，搜查半天没有发现一个新四军，恼羞成怒抢走群众的财物，放火烧了整个村子。还有一次，新洲的鬼子来扫荡王家坊，中午到达王家坊河北岸，由于群众及时转移了渡船，敌人眼睁睁地看着河对岸的王家坊，无法过河。而我军隐蔽在河南岸的河堤下，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相持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始终不敢渡河，最后无可奈何地撤走了。

以王家坊为中心的黄冈沿江湖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鄂东地区建立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之一，王家坊是这片根据地的主要支撑点。它为鄂东人民坚持抗战，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扩大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起当年在王家坊生活和战斗的经历，作为出生和成长在王家坊的一名抗日老战士，我深深地为故乡在鄂东抗战中的伟大功绩而骄傲和自豪，也深深地怀念那些为鄂东人民的解放而捐躯的战友和乡亲们。

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血沃中原的峥嵘岁月里

肖 鹤

一、刘少奇同志教导我们，“做无名英雄”

1939年春，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坐镇竹沟，主要通过无线电密码电报通讯联系，领导指挥开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对机要工作很重视，对机要人员的成长关怀备至。

我于1939年8月，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教导队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中原局机要科工作。机要科和少奇同志住一个院内。

9月的一天中午，天气闷热，我们人少工作多，个个埋头伏案，汗流浹背，紧张地翻译电报。

少奇同志漫步走进机要科，微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赶紧站起来。

少奇同志走近我的身旁，拍拍我的肩膀，顺便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然后，向大家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他亲切而又严

肃地教导我们：“我们远离党中央和毛主席，与中央保持联络，全靠你们了。如果没有机要通讯联络，得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你们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呀！”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党的传令兵，人人都要政治思想好，业务工作好，埋头苦干，做无名英雄，保证机密、准确、及时地翻译电报。机要工作做得好，只要党知道就行了，你们为党立下的功劳，党是不会忘记的！”

大家聆听着少奇同志的教导，感动得连连点头称“是。”

少奇同志在百忙中经常亲自过问机要人员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当他了解到机要科工作量大，人员少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薛丹浩和宋世荣两位科长：“你们要办个机要译电训练班，选调政治思想好，有文化的年轻共产党员培训，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时，少奇同志的生活同样很清苦，每天都是粗茶淡饭。但是，他考虑到机要人员工作过劳，夜间工作量最大，又都是年轻娃娃，便亲自向后勤干部交代：“你们要保证机要科的夜餐，并尽可能供给每人每天一个鸡蛋。”

60年后的今天，对少奇同志的这些教导和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做无名英雄”是我终生的座右铭。

二、竹沟惨案



1939年9月17日，我们机要科收译了党中央的紧急指示：“鄂中、鄂东、竹沟各部队要提高警惕，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在严格自卫立场上，对敢于前来进攻的顽军予以应有的还击，以争取人民抗日武装的存在和发展。”

10月初，少奇同志再次由延安，赶回竹沟，立即对豫、鄂边区应付突然事变问题作了详尽指示，决定中原局和河南省委逐步撤离竹沟，把主要力量放在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上。

10月底，我们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跟随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东进皖东敌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不久，我和宋世荣科长等跟随朱理治、任质斌首长离开竹沟，到达信阳县四望山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1月1日，我地方工作人员4人，在竹沟附近的婆婆寨惨遭顽军捕杀，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竹沟的信号。11月11日，国民党信阳、确山、泌阳、汝南4县的常备队和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共2000余人，围攻尚留竹沟的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及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我少数警卫部队和留守处干部奋勇抗击。

首长表扬杨凯等同志是优秀的机要战士，光荣的无名英雄，为粉碎顽敌的进犯，保卫我首脑机关和部队的安全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陶铸政委培养我们良好的工作作风

1939年秋，根据中央局的决定，统一整编了豫南、鄂中党的抗日武装队伍，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陶铸代理政治委员。11月，我调来鄂豫独立支队机要科工作。

陶铸政委年近30，中等身材，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我们机要部门由政委主管，陶政委很关心和爱护我们机要人员的成长，经常启发和教育我们应具备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无产阶级

的高尚情操，指点我们如何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那时，陶政委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崇敬的首长，总在不知不觉中效仿着他。

初冬的一个中午，陶政委身着整洁的粗布军衣，稳健地走进我们机要科，亲切地望着我们，微笑着问寒问暖。他说：“我们经常行军打仗，到了宿营地，应该休息了，你们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大家辛苦了！”

他严肃而又亲切地教导我们：“机要工作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你们是构成这一命脉的传令兵，你们的天职就是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党的密码电报通讯任务。”

他走过来摸摸我们的头，拍拍我们的肩膀，态度和蔼地强调：“机要人员需要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养成整洁和井然有序的工作习惯，便于保密和卓有成效地完成任务。”

我们经常出入陶政委的办公室，虽是农舍简室，但却整洁，墙上挂着地图和陶政委的亲笔书画。

我们遵循陶政委的教导，精神饱满乐观，办公室整洁，工作分清轻重缓急，井然有序，机密、准确、及时地收发电报；工作完毕后，立即清理，片纸只字不留，任务完成圆满，从未发生过延误电报或失泄密等较大事故。

1941年，我在十三旅机要股任股长。3月，部队转移至大小悟山一带休整，我们随旅部同住在滚子河村。我们机要股住处清洁整齐，墙上贴着条幅和绘画，室内肃静、清新、舒畅。周志坚旅长和方正平政委看后很高兴，乐于到机要股阅读文电以及我们翻译的新华社发的新闻电稿。首长赞赏地说：“在战争环境中，机要股整洁、肃静，像个办公室的样子，旅部各机关都应当学习机要股的工作作风！”

四、“脑记密码”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在敌情十分严重，不能保证密码安全的情况下，经首长批准，可以将密码销毁，使用“脑记密”通报。“脑记密”就是将通报双方预先约定的简易密码记在脑子里，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1940年4月，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电令豫鄂挺进纵队在路西采取守势，增兵路东，打击桂军程汝怀，以拊其侧后，牵制桂军向新四军四、五支队进攻。纵队决定进军鄂东。这时，我和贾开公同志由纵队机要科，调往鄂东地委机要股工作。

4月，鄂东地委书记程坦率领地委机关和独立团第三大队由路西到达（黄）陂、（黄）安南，建立了陂安南县委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不久，又深入到经扶（新县）一带活动。

5月初，桂军一个团侵入陂安南，县委书记杨业珍被杀害。5月25日，我们与桂军在二房湾一带遭遇，展开了激战，独立团参谋长李宗南和二团三大队队长袁高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当时，环境艰苦，敌情危急，斗争十分残酷，鄂东地委和部队完全靠无线电密码通讯与上级保持联络。程坦书记非常注意密码和机要人员的安全。行军和作战时让我们紧随着他；每到宿营地，总是叫我们与他同住一起，甚至让我们住在里屋，他与其爱人小向住在外屋，并微笑着说：“为了安全，理应如此。”

1940年10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下辖十三、十

四、十五旅，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5月，日、伪、顽军分进合击，对我进行“蚕食”性的残酷“扫荡”，妄图一举歼灭陂安南的我五师主力部队和鄂东地委领导机关。一天，我们被敌军包围了，程坦书记把我和贾开公同志叫到身边，严肃地问道：“现在处境十分危险，只有突围了，需要烧毁密码。你们能否用‘脑记密’与十三旅沟通联络？”

我们坚定地回答：“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彻底清理了密码、文电，反复熟记了“脑记密”，又武装好了自己。入夜，我们接到通知，立即沉着地烧毁了密码和文电，清理了现场。深夜，地委机关和警卫部队，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突围。

突围后，我们马上用“脑记密”与十三旅通报联络。在十三旅的接应护卫下，地委机关平安转移至黄安。为此，我们受到了程坦书记的表扬。

五、李先念师长让我骑他的马

1941年我由鄂东地委机要股调回五师司令部机要科工作。

李先念师长经常单独带着电台和一两个机要人员以及警卫部队，转战于鄂东和鄂中一带。机要科指派我跟随李师长工作。

11月下旬，我们随李师长来到安应中心区的赵家棚。27日，应山、广水、花园、王家店的日寇2000余人，突袭赵家棚，情况紧急。当夜李师长率领我们撤离赵家棚。临行时，李师长叮嘱我：“现在敌寇分进合击，在交通要道设埋伏。小肖，保护好密码，紧跟着我，不要掉队。”

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时，李师长命令：“跟上，不许出声，

快速前进！”他又回头低声问道：“小肖，跟上没有？”我赶紧回答：“跟上啦！”

越过封锁线，已是深夜，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冷风迎面扑来。这时，侦察员报告：“敌寇占领了赵家棚。”李师长率领我们，沿着小路，继续急行军。路上，他总是问我累不累，并几次让我骑上他的马，我执意不肯。他关切地微笑道：“那好吧！快跟上，拉紧我的马尾巴走吧！你这样可以减少疲劳，又不至于掉队。”我高兴地赶上前，一只手拽紧马尾巴，紧随着李师长走。真灵，在马尾巴的带动下，顿感身轻步快，疲劳消失了，心里暖烘烘的。

黎明前，我们平安转移到大鹤山一带，李师长命令部队宿营休息。然后，命令电台马上架线，与三十七团联络。我们收到了三十七团“立即回电”的万万火急电报。我报告李师长后立即翻译。李师长来到我身旁，看我译出的电文。当时，由于电波干扰，有两组电码不清。我一面请电台重收，一面认真译校，急得满头大汗。李师长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肖，不要着急嘛！注意准确翻译。噢，这两组电码，我看可能是地名谢湾吧？”经电台重收后，很快译出，内容是报告敌情，请示作战部署。那两组电码，果然是地名谢湾。李师长知己知彼，对这一带地理了如指掌。我暗自钦佩。李师长阅报后，当即草拟了回电。我译好，交电台，及时发出了。

敌寇占领赵家棚后，构筑工事、碉堡，夜晚伏击，白天扫荡。李师长指挥五师主力部队，不断袭击敌人据点，并以我之伏击，对敌之伏击。地方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空舍清野”，袭击和牵制敌人。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敌人清乡和扫荡的地区日渐狭小，最终全部撤退，赵家棚又回到我们手中。

在外出工作期间，李师长和我们机要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每次开党小组会，他无论有多忙，多累，都必然认真参加。

有一次，我看到李师长工作实在是太紧张了，开党小组会就没通知他参加。事后，他严肃地批评我：“我是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认真地过组织生活。你这个党小组长，今后召开党小组会，必须通知我参加！你们绝不能把我视为特殊党员。”

在孤悬敌后的艰苦斗争岁月里，李师长一贯重视机要工作，对机要人员倍加爱护。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胜利地完成任务。

六、历尽艰险的八个月

1942年春，国民党五战区对我鄂豫边区发动了长达8个月的反共高潮。日、伪、顽勾结夹击，我五师一部分主力留在内线，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群众和地方组织，袭扰敌军。大部分主力转移至外线，对敌各个击破。

机要科的工作量剧增，电报如雪片似飞来，又都是“万万火急”、“立等回电”。我们经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不能合眼。战斗又频繁，我们白天行军打仗，夜晚通宵工作。在行军途中或战斗间隙，电台架起天线联络，如有电报，我们就在隆隆的炮声中，席地而坐，皮包放在腿上当桌子，聚精会神地将电报译发出去，或译校出来。

当年春天，我十四旅在浠水战斗胜利结束后转移，机要科在山坡下湾子里，坚持收译完最后一份急电。这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紧急情报，报文告知：“十四旅行军途中，桂顽设伏。”旅首长见报，当机立断，改变行军路线，使我军免遭伏击。

这年夏季酷热，干旱缺粮，生活很艰苦，常常是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缺粮时，就以藤萝花及树皮、树根充饥。机要科有的同

志患了疟疾，发高烧又发冷，仍带病坚持工作。我浑身长满疥疮，奇痒难忍，就想了个法子，工作时坐在盛满冷水的盆里，清凉解痒，坚持工作。有的同志开玩笑，戏称我是勇敢的“癞蛙王子”。

10月，日寇对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战斗频繁、激烈。我们经常急行军，设伏阻击敌寇。冬天，我师部机关和部队驻在大小悟山一带。顽军分兵几路，向我逼进夹击。师首长决定分路突围。当夜，细雨濛濛，枪炮齐鸣，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沉着地处理完密码电报后，才紧随师首长，在夜幕的掩护下，沿着崎岖坎坷的山路，冒雨穿插而行，机智地与敌军近距离相向而过。翌晨，突出重围。

从5月至12月，我五师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的连续扫荡。机要科的全体同志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年仅18岁的机要员宋琳同志为革命英勇牺牲。

七、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1943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月底，蒋嫡系三十九军暂五十一师主力，深入我抗日根据地陂安南中心区。我五师部分主力，由任质斌政委率领迎击顽军。师部派我携带电台赶赴陂安南，随任政委工作，并派了一个警卫班护送。我们日夜兼程，一天中午，途经一个小镇，恰遇一股日、伪军骚扰，形势危急，我当即带着电台和警卫班，离开大路，沿山沟转移，在山包的灌木丛中隐蔽起来，并做好战斗准备。敌军没有发现我们。黄昏时，他们龟缩回碉堡。暮色降临，我们离山，紧急行军。黎明，安抵陂安南。向任政委报到。他亲切地微笑着说：“辛苦了，路上好险呀！小肖，指挥隐蔽得不错嘛！”我们安顿好

后，电台架线，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八、不要“连箩筐一起卖了”

1943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来豫鄂边区领导党政军民的工作。11月18日，边区党委抓紧相对稳定的局面，全面开展整风。在整风中间，郑位三同志特别教育我们机要科要注意保密。他说：“我们边区孤悬敌后，机要工作非常重要，上呈下达都要靠无线电密码通讯。我们只有及时得到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们肩负着党的重任，必须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甘当无名英雄。”他着重强调，“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他风趣地比喻说：“别人卖米，是一碗一碗地卖。你们卖米，那就连箩筐一起卖了！”言简意赅，比喻生动，寓意深刻。

经过整风运动，我们机要人员思想和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在一次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上，师首长表扬机要科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为司令部的同志们树立了榜样。

年底，我们边区有三大喜事：欢迎党代表郑位三同志；向民主人士杨经曲和涂云庵两位政府副主席祝寿；祝贺任质斌政委新婚。师机关开了大会，干部会餐，晚会演戏。我们机要科全体同志合唱：“到敌人后方去。”我个人表演的节目似京剧非京剧，动作四不像，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最后，由地方京剧团演出了“打渔杀家”。首长和师部全体工作人员都很高兴，我们机要科这帮年轻人开心极了！在欢歌笑语中，辞别了1943年，迎来了1944年。

九、跟随“虎将军”挺进豫南敌后

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对五师发出关于发展河南的电示。7月，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任命黄霖为指挥部司令员，向河南敌后进军。师部派我负责，组成机要股，随指挥部出征，沟通无线电密码通讯联络。

8月，豫南游击兵团主力北渡淮河，越过平汉线西进。兵团北上以来，连战皆捷，纪律严明，深受河南人民的爱戴，所到之处，男女老少箪食壶浆，夹道欢迎。我们以竹沟东南的郭山冲为中心，建立了路西的豫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兵团需要及时向师部请示报告，机要股的工作极其繁忙，收发报又多又急。同时，战斗频繁，经常行军打仗。黄司令员很关心我们，总叫我们与他同宿同食，在战斗中关照我们紧紧跟随在他的身边。

10月中旬，我兵团主力开始向豫中挺进，从嵯峨山经舞阳庙街，挺进到叶县三皇店、罗冲一带。沿途，我们与日寇、顽军、伪军以及土匪作战，多达数十次。一次，我们从遂平境内向叶县转移，途中十余里被顽军和日寇、伪军严密封锁，很难通过。恰于此时，我们得知情报，顽军独立第八团近日由此经过。黄司令员当机立断，决定伪装为顽独立第八团，白天从顽军的封锁线通过。

当晚，黄司令员把我找去，交待说：“分散保管好密码，如遇万一，当即销毁”。

次日，黄司令员骑着高头大马，神气十足，泰然自若。我们机要人员和警卫人员紧跟在首长左右，大摇大摆地走在公路上。部队有开路的，有断后的，有左右警戒的，威武挺进。实际上，

我们都已做好应战准备，个个武器在身，枪弹上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沿途，保安团设有茶水摊子伺候，不少保安团的官兵站在路旁观看。凡遇有茶水准备不足或无礼貌的保安团官兵，警卫班长便将其叫至马前，黄司令员大加斥责。就这样，我们没有费一枪一弹，顺利地通过了敌人封锁线。

10月底，部队转移至叶县西南的罗冲一带，被日寇和伪军包围了。当晚，黄司令员把我找去，严肃地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决定突围。小肖，我们研究一下，是否烧毁密码，暂用‘脑记密’与师部联络？”经过分析敌情，反复认真考虑，现在日寇战局不利，又一贯欺压伪军，日、伪之间有矛盾；再加上我地下党对伪军施加的影响，伪军一怕日寇长不了，想留条后路；二又对我不摸底，我们号称挺进兵团先遣支队，不知我军兵力有多少？为保存其实力，不敢对我轻举妄动。因此，突围还是有把握的。最后，黄司令员决定不烧毁密码，备用密码交由司令员亲自妥善保管携带，现用密码由我负责贴身保管好。如遇危急情况，即可分别处理销毁。

半夜，黄司令员率部，在靠近伪军防线的空隙间突围。果然，只闻伪军鸣枪，不见伪军行动；日寇，则忙乱成一团。我们机要股突出重围过桥时，驮着行装的马前蹄踏空，掉下了河。我把密码交给王元凯同志妥善保管，立即冲下河拽马，衣服都湿了，也没有把马拉上岸。此时，四周的枪声越来越紧。正在危急中，黄司令员发现我们掉队，马上派了一个警卫班来接应，很快把马拉上岸，赶上了队伍，安全转移。

在进军豫南的日日夜夜，我们机要股在黄司令员和其他首长的关怀下，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机要通讯任务。

十、“寒风吹不凉我们的心”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边区军民载歌载舞，一片欢腾。蒋介石则忙于调兵遣将，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

那时，我已调回五师机要科。全科同志为纪念抗战八年来在机要战线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情谊，在白果树湾合影留念，并题词“寒风吹不凉我们的心”，以表达继续战斗，夺取最后胜利的決心。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豫鄂皖湘赣边区成立中原局，中原军区，五师野战军编为第二纵队。我分配在二纵司令部机要科，任股长。

10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电示中原军区：“集中主力，充分准备，打几个胜仗，歼灭国民党一部分主力，才能稳住中原局势。大量牵制蒋军，也就是支援了华北、华东的斗争”。10月20日，我军发起了桐柏山自卫反击战，严正地还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无理进犯。

在整个战役期间，电报频繁。在新形势下，我们机要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工作范围广，联络的电台成倍增加。我二纵除了与中原局、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三五九旅等各台联络外，尚需与江汉、河南军区等部队联络。我们机要科人少，每个人都要同时负责几个台，使用几套密码，电报多而急。电台电波干扰大，增加了收译电报的难度。同时，战斗频繁，经常行军打仗，我们工作异常紧张劳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坚持连续几个昼夜工作，电报随来随译随送，并在技术上刻苦攻关，保证机密、准确、及时地翻译电报。我是股长，除了担负几个台的译电任务外，还努力帮助股里工作忙的同志译电和解译疑难电文。我们全

科同志，严于律己、同心协力，积极主动，克服困难，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野司首长对机要人员极为关心爱护，部队打下枣阳县城休整时，任政委特派警卫员送来几斤猪肉和羊肉，改善机要科的伙食。机要科的詹万全和尹志良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任政委在百忙中亲自送药慰问，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也因工作过于忙累，神经衰弱失眠，以至于擦枪时走火。首长闻知后，让我留在枣阳县城休息，我执意不肯，周志坚副司令员亲自下命令，并留下一个警卫员照顾我。我只好在县城多休息了一两天，便赶忙赶上部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抗日战争八年，从1939年8月调做机要工作起，我始终坚持战斗在新四军五师机要第一线。在血沃中原的峥嵘岁月里，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我把中原人民当成我的亲人，把新四军五师机要科当成我的家。从这里，开拓了我真正的人生。

十一、中原突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困我中原军区。突围势在必行。

1946年1月16日，我奉命调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机要科工作，任三股股长，主要负责与我中原军区的密码电报联络。当时，形势严峻，电报都是“十万火急”的，我怀着十分关切和焦虑的心情，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确保了电报的畅通。

在此期间，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与延安党中央、南京中共代表团以及我中原军区等的来往电报更加频繁和紧急。我们机要科的全体成员都投入了紧急战斗，分秒必争，一丝不苟，为我中

原解放军胜利突围的生死决战而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着。

1946年6月26日，我中原解放军分路战略转移，胜利地实现了中原突围。

当我译出我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的电报后，我们全体机要科的同志不约而同地轻声地欢呼起来。我因工作而熬红的双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朦胧中似乎看到了我新四军第五师机要科的亲密战友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带着胜利的微笑，踏着坚定的步伐，奔向新的征程！

“中原突围”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彭雪枫智退国民党一个团

薛国衡 肖 健 牛书涵

正当我军在豫南的工作刚刚打下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蓬勃展开之时，却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嫉恨和仇视。他们造谣中伤，滋生是非，制造磨擦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到何应钦、蒋介石那里。1938年5月蒋介石电令信阳警备司令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负责查清此事，并派夏华国率其一八八团火速从桐柏城进驻竹沟，取缔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周恩来同志获悉此阴谋后，立即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竹沟留守处预作应对。干部纷纷议论对策，有的同志主张打，有的同志主张走。当时竹沟只有一个排的武装，情况十分严重。彭雪枫、王国华决定“不打也不走，争取夏华国团，保住竹沟。”夏华国系行伍出身，冯玉祥旧部。彭雪枫原是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学生，叔父彭禹廷是西北军秘书长，遂派竹沟中心县委书记娄光琦利用此关系代表彭雪枫前往迎接夏华国。夏华国客气地说：“你先回去。彭禹廷是我的老上司，彭雪枫是彭禹廷的贤侄，我一定去拜访他。”娄光琦返回竹沟。当天彭雪枫、张震、王国华一面迅速组织机关部队撤出竹沟，转移隐蔽，以防不测，一面积极准备与夏华国谈判。

当夏华国率一八八团到达大罗庄时，姜光琦前去迎接。夏华国见新四军如此礼遇，决定就地宿营，次日再进竹沟。第二天姜光琦引导一八八团从东寨门进竹沟镇内，方中铎身佩值星官红绶带，张震、岳夏佩带八路军臂章带领留守处人员和竹沟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夏华国看到一张张友好面容，特别是东寨门口“欢迎友军”的大幅红标横在上面，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彩旗标语，很受感动。竹沟镇为夏华国团准备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彭雪枫还指示部属，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让夏华国住，这一非凡之举，使夏团由戒备很快转为友谊。这天彭雪枫没有出面迎接夏华国。晚上夏华国亲自去拜访彭雪枫，彭雪枫以礼相待，共叙在西北军的旧事，有了共同语言，初步建立了感情。第二天彭雪枫派王国华、姜光琦与夏华国谈判，并具体交待他俩“既要表现出沉痛，又要理直气壮，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做到争取夏团，保住竹沟。”彭雪枫风趣地说：“必要时还可以痛哭流涕嘛！学一学刘备取荆州。我看这出戏王国华一定演得很精彩。”王国华同夏华国谈了两个多小时，理直气壮地陈述建立竹沟留守处是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是经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政治部部长陈诚批准，蒋委员长亲自允许的。为何出尔反尔？抗日何罪？救国何罪？为何听信谣言，要取缔留守处？年近半百的王国华假戏真唱，痛哭流涕地说：“抗战要有个后方，家属伤员才好安置，才无后顾之忧。竹沟留守处没有了，前方将士何以安心抗战？”此情此景，夏华国深表同情，慌忙掏出自己的手帕给王国华擦眼泪。王国华又说：“贵党贵军如此不能见容于我抗日军民，不断搞摩擦、诬陷，豫南的大好局面将毁于一旦啊！”夏华国说：“兄弟实不相瞒，这次是让我来赶走你们的。我不进竹沟是不行的，回去不好交待。但我到这里的所见所闻并不是传说的那样。我回去一定把情况说清楚，尽量说好话，你们放心好了。”

过了两天，彭雪枫、王国华请一八八团连以上干部会餐。宴

会开始，彭雪枫自我介绍并送给夏华国一张印有“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名片。又一一介绍随员姓名、资历。当夏华国听到王恩九任过西北军少将机要秘书，方中铎与其师长王修身同为吉鸿昌将军的旧部时，大为吃惊！“唉呀！还不知道诸位都是冯老先生的旧部呀！”彭雪枫慷慨陈词：我们是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来协助整编新四军第八团队开赴抗日前线抗日的。八团留守处除工作人员外多为伤病员及本军官兵家属。希望夏团长对留守处安全予以保护，发扬西北军反帝爱国精神，在此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夏华国频频点头，气氛比较融洽。夏团进驻竹沟第五天，在竹沟东门外河滩广场检阅双方部队。当晚夏华国又找彭雪枫叙旧，回忆在南苑军官子弟学校西北军的往事，双方感情进一步加深。接着留守处又开了一次热烈欢迎——八八团团结抗日大会。会上彭雪枫大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讲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他着重回顾了冯玉祥副委员长领导下西北军反帝爱国壮举，再三强调我们是一个目标一个任务，极力夸奖赞扬一八八团是他所看到的友军中军容最整齐的部队。夏团官兵听了心里自是熨帖。这次会后又召开了一次联欢会，演出了许多抗战剧目，如《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烽火》等。当剧情展现日本鬼子打进中国奸淫烧杀，新四军、八路军和边区人民与败退下来的中央军通力合作打垮了日本侵略军时，幕后唱起了共产党、国民党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歌声。这次演出深深打动了夏团官兵的心。使他们从中悟出了团结抗日的道理，抗日情绪高昂。夏团在竹沟期间，留守处动员群众给他们担水、扫地、送给养；遇到夏团中开小差的士兵，动员说服他们返回部队；捡到他们的子弹交给他们。还组织夏团官兵参观留守处教导大队俱乐部“救亡室”，夏团长赞扬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表示回去也要按照竹沟的做法办起“救亡室”。夏团还对一个小小的竹沟明察暗访，里

里外外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看到这里社会秩序安宁、生产发展、拥军支前团结抗战的形势，很受鼓舞。夏华国如实向上级报告说：“竹沟新四军非常友好，没有什么违犯抗日宗旨的不规行为”。夏团临走那天，竹沟留守处动员附近好几千群众和自卫武装夹道欢送。排出了二里多长，口号声、抗战歌声响彻一片。夏华国感动得眼泪直流说：“共产党确实为抗日做了不少事情，这几天我们学了不少东西。”他的一位副团长开始很反动，后来也被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夏华国还当了师长。夏团从竹沟撤走后，国民党当局电告一战区卫立煌暨河南省政府说“竹沟留守处与民间一切正常，所传各节乃属子虚”。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当局土豪劣绅造谣生事的阴谋彻底揭穿了，再也没有轻举妄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39年11月，竹沟事件中，竹沟周围的国民党正规军没有一个参加进攻竹沟行动的。参与进攻竹沟的地方武装中，担负包围西寨门外的两个中队还主动撤离，给我们让开了一条通道，让我们的部队得以安全转移。

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

栗秀真

收治抗日友军伤员经过

1940年春天，我任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院长期间，依据纵队领导指示，带领一批轻伤病员，由大山头转移到宋（河）应（城）路西京山县石板河东北的赵家冲。这里丘陵起伏，丛林密布，比较偏僻，便于隐蔽。距路西指挥部所在地八字门，只有二三十里路程，也便于和领导机关联系。

四月初的一天，沈德纯同志由驻八字门的指挥部赶来，传达指挥部政委杨学诚同志的指示：我们驻地一带来了不明番号、不明来意的国民党部队。为了安全，要医院转移到大山头或应城湖区。我们决定到大山头。当晚就带领医院机关转移到石板河附近的龚家湾，准备当夜过宋应公路。但侦察员回来报告，此路沿途国民党部队岗哨很多，不能通过。我们只好就地宿营，计划次日下午去应城的湖区。第二日下午，我们和要返回应城膏盐矿区的沈德纯同志同行向应城方向前进。走了约二三里路，遇到了很多国民党军队的岗哨。此时，田店方向已有枪声，哨兵阻止我们前

进，说前方已在打仗，不准通行。我们与哨兵交涉无效，随即提出要见他们的负责军官。哨兵告诉说负责人在侧面的村子里住。无奈，只好让工作人员就地休息，我与德纯同志去找军官交涉。到孙家冲我们向守卫的战士讲明有事要见他们的负责军官。不久，即有一位年龄约五十岁左右的军官出来接见。我们说明来意及身份（新四军）后表明：希望通过他们的哨所到应城地区执行任务。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国军九十四军，准备进攻应城的敌人。这时，枪声、炮声越来越响，我们建议可以前去参加战场救护工作。他讲：前方救护，部队有安排，就是药品缺乏，很想向我们买一点药品。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药品，也很困难，如果你们有困难，常用急需的药品，可以赠送你们一点，但不能卖。他说：“你们如果不要钱，我们也不好要药”。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前方战斗更激烈了。传来消息说：应城及宋应公路上敌据点的日寇出动，在田店与徐店之间的邓家畈一带与他们的军队作战。当时情况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他们部队已有较大的伤亡，（敌人伤亡更大）；二是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与他们配合得很好。战场附近的居民给他们烧水、送饭、送米汤、煮豆豉慰问他们，并帮助把伤员抢救下来。

这时，同我们谈话的军官就不再坚持出钱买药了。他自己介绍说：“我叫牟廷芳，贵州人，是九十四军的军长。不再谈向你们买药了，有件事情想请你们支援，我们这次作战的伤员无法带走，要劳驾你们代为收治。”我们当即应允，并表示伤员的吃、住、治疗均由我们全部负责，但要他派个联络员在此负责，便于随时将治愈的伤员接回。牟廷芳似乎很受感动地说：“你们的地方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这次对日寇作战，得到了你们很大的支援，这是在其他战场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情况，报告给蒋委员长。”说到这里，他指着瞎了的一只眼睛问我们：“你们知道我这只眼睛是怎样瞎的吗？”他说，

“我这只眼睛是在贵州同共产党作战时被打瞎的。蒋委员长知道我同共产党有仇，我反映的情况，他一定会相信。”

双方商议转送的地址后，我们即告别，让医院的同志仍返赵家冲，等待接受友军伤员。当天夜晚九十四军撤走后，就有伤员送来。第二日，我地方工作人员组织担架队，源源不断地把九十四军留下的伤员 300 余人，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石板河东北的赵家冲、郭家冲、艾家冲。接收友军伤员的第二天，我们即将这一新情况，向路西指挥部作了报告，并请转告纵队司令部。我们自作主张，收容了这批友军伤员。路西指挥部和纵队领导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并复函表示赞扬。

组织力量，突击治疗

随我行动的工作同志很少，突然收容了大批伤员，人力物力均感不足。为做好收治工作，迅速从大山头、路东调来部分医护人员支援。将原住此地的轻伤病员出院或转到其他医疗单位，腾出房子，入住友军伤员。在收治过程中，我们的白衣战士，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

为了便于治疗和护理，我们按伤情分类，将重的集中住在一个村，轻的编组成队分村住下。全院同志在“团结抗战，支援抗敌友军”的号召下，发挥每个同志的革命积极性，做到了既是医务人员，又是政治宣传员。这批友军伤员在住院期间，除受到热情照料和精心治疗外，京山地方党委、应城矿区和石板河一带群众，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慰劳，赠送毛巾、鞋、袜、牙刷、牛奶、橘子罐头、猪肉、鸡蛋、白糖、香烟等慰问品和大批慰问信件。各界慰劳代表亲自到重伤员床头慰问，组织轻伤员参加慰问大会

和小型座谈会。在接收初期，医院附近的群众自动帮助看护人员为伤员拆洗血衣血裤，艾家冲一个堰塘的清水，都被洗涤这批伤员的血衣血裤染红了。

友军伤员住院过程中的一切待遇，完全和我军重伤员一样。天气热了，我们发给他们夏季服装。医院的政工干部和医护人员到伤员床前，给他们读报、讲我军对敌作战的实例、讲团结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还代他们写家信。他们伤势轻了，医院就组织他们学文化、学政治、参加文艺活动等。这些友军伤员对我边区党、政、军、民给予他们的优待和照顾，很多人都流出了感激的热泪。其中部分轻伤员，还主动帮助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也有些伤员表示伤好后要参加我军，共同抗日。我们劝他们“要坚守岗位，不能留下”，动员他们伤愈后回自己部队，他们却说：“你们把我送走了，我还会再跑回来的。”总之，友军伤员中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只有少数连、营军官，总是心怀恶意，监视他们士兵的举动，暗中说些坏话。但事实胜于雄辩，他们那些流言蜚语，毕竟是站不住脚的。

组织荣誉大队，分批出院

时间过的很快。几个月，敌寇未向这一带进行“扫荡”，伤员入院后未搬动过，在这一安静的环境中治疗，伤员得以一批一批康复出院。

开始几批轻伤员治愈后，是通过驻扎在大洪山内的川军转送给九十四军的，并告知他们要陆续派人来接回其余的伤兵。为了等待他们来接，我们将治愈的伤员集中起来，组成荣誉大队，集中休养、学习，直接由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校负责领导。约在1940年的7月末，九十四军派了一个副官来接最后的

一批伤兵，这位副官从这批伤兵中了解到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情况以及对这些伤兵的优待和关心治疗以后，他很受感动。当我们在丁家冲侧面的马家湾备酒为他们饯行的时候，酒过三巡，这位副官从裤腰的深处，突然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当时我们很奇怪！他说：“现在我了解了你们的政策，我才敢把这支枪拿出来。当我路过曾宪成（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头目）的地方，他们曾阻止我，不要我来，说来了，你们会活埋我。我是奉命前来完成任务的，只有冒险。因此，我把所带的人都留在曾宪成那里，自己一人前来。这支手枪，就是准备在你们活埋我时自杀用的。现在才知道曾宪成他们全是造谣污蔑。”

总之，这次我们收治友军伤员，虽然用去了一些经费、物资、药品，工作人员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政治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给国民党军队中愿意抗战的将士以良好的印象。这对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有利的。

日本法西斯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忆新四军第五师营救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

夏 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今天》（长征出版社 1986 年版）一书记载：1944 年 5 月 6 日，我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湖北监利县周老咀附近营救美军飞行员一名；两天以后，又在湖北营救另一名遇难的美国飞行员（第 167 页）。

对于这一完全真实的历史，我是亲自经历者之一。虽事隔 50 多年，但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那是 1944 年 5 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襄南指挥部驻地江陵县的赵家垸，忽然大声鼎沸，热闹非凡。“快来看啊”的喊叫声和奔跑的脚步声响成一片。我当时是指挥部的秘书，正在屋子里写点材料。听到有人叫我：“夏秘书，夏秘书，快来看！”好奇心驱使我急忙走出去，一面随着人群朝小河边跑去，一面忙问道：“怎么回事？”“来了一个‘洋人’”，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同志回答道。我想：大概是日本俘虏兵，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跑到河边一看，一只小木船正在靠岸，船舱里坐着一个身穿飞行服的碧眼金发的青年军人，身旁还有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他的降落伞）。护送的有两名

带枪的游击队员，撑船的是一位 50 开外的老民兵。“洋人”上岸后，用惊疑不安的目光东张西望，似乎想要发现和寻找什么。我把他们一起带到指挥部政委李人林同志的住处，在座的还有吴云鹏、李正乾、徐达三等几位领导同志。“洋人”还是显得十分惶惑、紧张，我见到他飞行服的左臂上缀有 U·S·A 字样，判断一定是在空战中被日军击落被迫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该怎么办呢？几年前在中学学过的英语还没有完全忘记的几个单词帮了大忙，我急中生智向他说了一句“Sit down please（请坐）”，“洋人”这才松了一口气，高兴地笑了笑，在一条板凳上坐下了。他以为我们是懂英语的，就叽里呱啦讲起来，可是我们却听不懂。这时，两名随他来的游击队员向指挥部首长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上午，周老咀上空传来了飞机的声音，人们抬头看去，只见一架飞机冒着黑烟由东向西飞来，从飞机上掉出来一个小黑点，接着，火光一闪，飞机轰的一声爆炸了，一个倒栽葱掉进湖里。那个小黑点越飘越大，不一会就坠落在周老咀南面的稻田里，看得很清楚，是个人，大家以为是日本鬼子。一定要捉活的，民兵、游击队，还有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纷纷拿着武器、锄头、扁担……从四面八方围上去。不料走近一看，不是东洋人，是个西洋人，他们就没有动手。“洋人”双脚陷在稻田里，动弹不得，怎么也出不来，他们就去了几个小伙子连拉带扯，把他救了起来。看样子，他有点害怕，给饭不吃，给水不喝，说话又不懂，区里同志说，这可能是美国人，是帮助中国打日本的，是我们的盟友。于是就由区中队派了他们两个马上送到指挥部来。周老咀离日本人据点新沟咀很近，怕日本军队出来抢走他，叮嘱他们要一路小心，平平安安把他送到。听游击队员们这么一说，情况十分清楚了，这是一位遇难的美国飞行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于是我用英语向他问好，又问他的姓名，他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许多。说他叫莱威士（Lewess），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前面引用

的《军史上的今天》中说他的名字叫叶里洛拉，恐不确。一是当时电讯设备比较落后，可能译名有误；二是可能把外国人的姓和名分开了。但这第一个遇救的美国飞行员叫莱威士，我记得十分清楚。不过是姓是名我就不明白了）。接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图囊，指着飞行地图比划说：他驾驶的是一架 P-40 战斗机，从湖南芷江基地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武汉的日军军事目标。他的飞机在返航途中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箱，不能继续航行，只好跳伞，被农民救起来了。非常感谢。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中英文对照的卡片，是专门给遇难的美国飞行员使用的。上面印有“我是美国人”、“请送我到中国军队那里去”、“这里有日本人吗？”以及“我饿”、“我要喝水”……等等，他指着其中的一行字问我：你们是中国游击队吗？我一面点头称是，但却不知道怎么能说得更清楚才好。后来费了很大劲，几经比划。不断用手势加点英语单词向他解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是 Anti-Japan（抗日）的”。接着又指着莱威士和坐在周围的同志们：“We are friends（我们是朋友）”，摇手示意他不要害怕。这样一说，莱威士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露出了微笑。我们知道他一天没有吃东西，一定又饿又渴，于是很快弄来了开水和米饭，他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勺子，高高兴兴边吃边喝起来。后来，他发现我们的战士佩有“N4A”臂章后，马上说：“New Fourth Army”。原来，莱威士知道敌后战场有一支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是我从莱威士那里学到的第一句英语：新四军的英语称呼。

指挥部首长把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请况通过电台向第三军分区作了报告。军分区复电指示说：第一，要保护他的安全；第二，在情况许可时派部队把他护送到分区，以便能送（五师）师部。那时军分区驻在襄河以北的天门地区，襄河是日军的封锁线，不

时有日伪军骚扰，来往并不方便。我们在襄河以南的江陵、潜江、监利地区，根据地比较巩固，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断失利，兵力愈感空虚，所以我们纵横百余里内没有敌人据点，就是潜江县城离赵家埡也有七八十里。平时我们十天半月不移防，但为了这位美国友人的安全，防止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当夜指挥部机关还是转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并加强对周围日军的侦察和警戒。

我和莱威士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除了工作以外，就是陪伴他。可是找不到一点娱乐工具，连扑克牌都没有；为了保密，外出散步都受到限制。不过，我们过的还是挺愉快，很快成了好朋友。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连一本英文字典都找不到。每天只好用手势和英语单词交谈。我有时按他带的卡片上的中英文对照的词语教他中国话，他也拣一些实物教我几句英语。我们尽量想办法用多种方式沟通思想，克服语言障碍。不过，有时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那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极其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莱威士来的第二天，指挥部专门为他做了一床新被子，一顶新蚊帐。襄南是湖沼地区，蚊虫又大又多，美国兵大概用惯了驱蚊药之类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尽管他用英语叫嚷，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教他扎好蚊帐睡觉。他的日用品丢的精光，我们设法给他买来了新毛巾、牙刷、牙粉（那时我们还未见到过牙膏），他也不习惯。只好教他把牙刷用水打湿，再沾上点牙粉，将就使用。不过，他很快也就习惯了。莱威士的饮食是单独为他做的，还特地给他弄到了一个专用的搪瓷碗。顿顿是炒鸡蛋，炒肉丝、米饭。开始他还顶爱吃，过了两天，感到不合口味了，要我把鸡蛋拿来他自己动手。我以为他要做西餐，想开开眼界，但大失所望，他做的是煎荷包蛋。从此，炊事员把炒鸡蛋改成了煎荷包蛋。有一天，莱威士忽然敲打他的餐具，口里不断说：“Sugar!

Sugar! (糖)”想不到这个在初中学过的单词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我连忙告诉管理员：“美国朋友想吃糖。”可是，根据地那么艰难，到哪里去弄到糖呢？只好专门派人到四十里外的熊口镇才买到了一斤白糖。莱威士一看，十分高兴。连说谢谢。我开始以为他要冲糖水喝，谁知不然。这天吃晚饭时，他把炊事员送来的米饭和糖拿到房东的灶台上，自己动手把锅刷洗得干干净净，要我帮忙把灶内的柴火烧燃。我好奇地问他想要做什么样好吃的饭菜。可是出乎我的意外，他把米饭倒在锅里炒热，再加两勺子糖，来一个糖炒饭。对于我这个只吃过油盐炒饭的中国人，看他吃的那么津津有味，真有点惊异不解。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尝过糖炒饭是什么滋味！

莱威士和我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星期。他度日如年，天天想回他的部队去。我终于使他知道了：我们的 Commander (司令员) 是李先念将军，几天后，我们将派部队护送他到他的 Headquarters (司令部) 去 (这个词也是莱威士教给我的)。然后从那里再去重庆。他显得十分高兴，几乎一天问几次：什么时候能动身？一次我听说第二天可能走，就兴冲冲地告诉他：tomorrow (明天)！可是因故又推迟了一天，决定后天启程。他十分焦急，问我怎么呐？我一看他那着急的样子，想告诉他后天一定可以走，但这个初中就学过的词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说：tomorrow，然后用手一翻：tomorrow，莱威士懂了我的意思。然而他又觉得好笑，连忙纠正说：“after tomorrow”。这真是出了一个大洋相，以后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时，无不捧腹大笑！

莱威士要走了，指挥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班，由一个排长指挥，在夜间渡过襄河到军分区去。临走的那天下午，指挥部领导同志专门为他饯行，有不少菜，还有酒。他还是用他的刀、叉和搪瓷碗。他到中国时间并不长，始终没有学会用筷子。为了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友谊，襄南指挥部赠送给

莱威士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一面小型的日本“太阳旗”。莱威士对此十分满意，他高兴地说：我要是在天空上打日本，是得不到这种战利品的。

莱威士临走的那天上午，专门写了一封信交给我，是留给以后再遇难的美国人的。大意是说：他在遇险跳伞以后，中国人民救了他，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和十分良好的待遇。如果你们不幸遇难了，千万不要忧愁。这里的军民是真正抗日的朋友，一定会使你们生活得很愉快，并能帮助你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去……没过几天，我军在洪湖地区又营救了一名美国上尉飞行员，在路过襄河指挥部时，我给他看了莱威士的这封信，他高兴极了，说他们认识。莱威士的信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可惜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内战，在1946年的一次战斗中遗失了。

莱威士获救后，新四军第五师专门发过一个指令：要求所属部队及各地游击队，民兵积极营救遇险的美军飞行员（包括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这个指令是被认真执行了的。据《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一书中记载：从1944年到1945年，先后有6名美军飞行员被迫降落在豫鄂边区的洪湖、天汉、鄂东等根据地内，他们都一一被当地军民奋勇营救，受到了边区政府和五师部队的热情照顾和款待；并设法通过国民党五战区防地返回重庆。美军驻华的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为此特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要求在华中敌后根据地建立美国空军情报系统，并很快达成了协议。1944年12月，美军炮兵少校欧高士率领美军十四航空队情报组人员正式到达新四军第五师驻地大悟山，双方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互相提供日军情况，使中美军队得以更准确地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投降后，该情报组才撤回美军总部。这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美军直接合作，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

50多年过去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

早已屈膝投降。莱威士如果还健在的话，也该和我一样年过古稀了吧！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十分惊险而又十分有趣的经历，但是，我是非常怀念这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朋友的。

“你们要甘当无名英雄”

——记师首长对三处同志的教诲和勉励

周玉中

1945年1月底，我正在大悟山五师政治部举办的艺术训练班学习，一天下午班主任杜陵同志通知我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司令部做参谋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服从决定。”杜说：“要组建一个新的单位，急需干部，具体干什么不清楚。你明天就去报到。”第二天，我带上行政和党员介绍信翻了一座小山，到师部驻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拐子垱村。

拐子垱村两侧环山，松柏翠绿成荫，中间一条小河，既隐蔽，又安静。驻在这里有中央军委派下来的工作班子，有三五九旅参训队和五师抽调来的干部。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迎接新的重要任务。

新四军五师党委遵照中央军委总部指示，决定成立五师司令部第三处，并决定任质斌副政委主管和直接领导三处的工作。

1945年4月初，在大悟山拐子垱村，任副政委亲自主持司令部三处的成立大会，宣布处领导班子的任命名单。他在讲话中除了讲成立三处的意义和承担的任务外，还代表师首长特别要求参加三处工作的同志要做好两点：一要埋头苦干，刻苦钻研；二

要甘当无名英雄，功劳不能宣扬。

三处同志把师首长的要求当做教诲与勉励，以甘当无名英雄的气概，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怕艰险困难，敢于胜利的战斗意志，积极紧张地投入工作。

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五师首长的作战部署，三处工作紧紧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在配合五师主力部队开辟与坚持鄂东南、豫南、鄂北和洪湖地区的斗争以及在配合王震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赣粤的战略行动中，做出了成绩。师首长当即鼓励三处：“再接再厉，乘胜前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我中原解放区。面对严重敌情，三处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在配合王震南下支队北返、桐柏战役、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南下、我军主力向平汉铁路以东战略转移及配合谈判，揭露敌人等工作中，次次都取得了成绩。师首长亲自或派人到三处驻地给予了表彰和鼓励。

1946年3月，陈少敏同志亲自到三处驻地（三处驻宣化店附近郑家湾）慰问，并对全处同志讲话。他说：“三处同志日夜工作，非常辛苦。我代表中原局、军区党委看望你们。向三处全体同志表示慰问。”“你们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你们的功劳不能向外宣扬，党知道，中原局、军区领导知道。”

1946年4月王震同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来到三处，把大家召集到办公的房间，亲切地向三处同志说：“……你们是无名英雄，你们的工作我了解，大家知道。指挥打仗，没有情报是不行的。你们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每个字都不能马虎，出差错就会误大事。”又说，“我这次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手中有确凿的材料，狠狠地揭露了他们一下。”“我们准备合法的走出去，也要准备打出去。……但你们要把军区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好。”

1946年5月李先念司令员专门到三处办公地点，对全处同志讲话。他说：“……三处同志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军事斗争

做出了贡献。今年以来，你们的工作搞的更好，我很放心。”“……你们这种埋头苦干，不计名位，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和学习。”“蒋介石打内战是定了的，我们不要抱幻想。现在就是要针锋相对，准备打仗。”他诙谐地说，“周围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他们不听我的，就交给三处同志好好指挥吧！”

三处跟随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于1946年6月29日晚突破敌人设在平汉铁路的封锁线之后，战胜疲劳、饥饿、酷暑，抓紧行军间隙坚持工作。军区领导及时掌握敌情后，力避敌之打击，令我军日夜兼程，连续向西突进。致使蒋介石在天河口、高城一线、苍台地区及唐河、白河地带多层设堵，妄图截击、围歼我军的阴谋均遭破产。7月13日夜抢渡丹江，李先念、王震同志率主力分左右翼两路纵队西进。三处同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跟随李先念一路，一部分跟随王震一路（我跟随李先念同志一路），在冲破敌人荆紫关、南化塘、鲍鱼岭等各线的截堵后到陕南洛南县白鲁础，李先念接到党中央电示，就地坚持和开辟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原局7月23日决定三处同志由部队护送回归陕甘宁边区。后因敌情严重，不能出走。豫鄂陕军区成立后，经军区首长批准，三处工作暂告一段落，工作人员暂分配到机关或部队，承担军事或政治工作。这样，三处同志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团结战斗，从1946年8月至1947年3月在陕南山区（秦岭）、豫西伏牛山区，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7年2月接党中央指示，我北路军主力分两批，跨陇海路、过黄河，于同年二三月到解放区山西省晋城休整。接着中原局在晋城成立中原党校。三处工作人员除突围中牺牲、掉队的以外回到山西晋城的幸存者有15名同志。（三处另一部分人员随三五九旅回到延安）。经军区领导批准，将分散在部队工作的三处15名同志集中于中原党校学习、休整，准备恢复三处工作。

李先念司令员从延安出发到晋城前路过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商定中原军区三处同志归并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二局，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李到达晋城后得知三处尚有 15 名同志在中原党校学习很高兴。他告诉司令部安排时间接见三处的同志。

1947 年 6 月 10 日下午，李先念司令员在晋城郊区南石店村他住的简陋房间里，召见我们。15 位同志围拢坐下，听司令员讲话。他说：“三处的同志情报工作搞得很好，对人民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我记得很清楚，突围前一天（指 6 月 25 日）你们送来的一份情报非常重要，使我们提前三天行动。要是晚两三天，想突围出来就困难了！就这件事，三处同志为人民立了大功。”又说：“准备打回中原去，现欢送你们先走，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那里，继续当无名英雄，搞好你们的情报工作，为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1947 年 6 月 12 日，我们 15 位同志由张天华副处长率领，经高平、长治、潞城、黎城到达晋冀鲁豫（二野）司令部驻地。住了几天，跟随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的几个野战纵队出发东进，到达山东阳谷、寿张，于 6 月 30 日晚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地区作战。配合我军歼灭国民党九个半旅之后，于 8 月 12 日由商丘跨过陇海铁路。不管敌人前堵后追、空中轰炸，我们日夜兼程，先后抢过涡河、颍河、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于 8 月底进入大别山区。“打回中原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96 年 6 月 11 日，原中原军区三处老同志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原突围 50 周年座谈会。任质斌同志亲临会议并讲话。他说：“……中原军区三处的同志们在日本投降后的 10 个月的艰苦斗争中，战胜各种困难，日夜坚守岗位，忘我拼搏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原局、军区领导是满意的。”

又说：“……三处的同志们忠诚党的事业，发扬了埋头苦干，不怕牺牲，甘当无名英雄的革命精神，为中原局、中原军区首长发挥了很好的耳目作用，为我军保存自己、战胜敌人，为胜利的中原突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所有这些，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它将永载历史史册。”

我在豫鄂边区的经历

(1938—1945)

须浩风

抗战期间，我在豫鄂边区的革命活动是从进入“汤池训练班”时开始的。因此，在讲述我此段经历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通过统战关系，借用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合法名义所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学校。该训练班从1937年12月20日在应城汤池正式开学，办了三期，遭到蒋介石和党内王明的反对，后来改名为“汤池临时学校”。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时停办。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时学校先后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为恢复、发展鄂中党组织及准备发动豫鄂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1938年5月15日下午到达应城汤池临时学校的。陶铸、曾志、蔡承祖同志向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性质、任务、课程和教育方法，商定我担任临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并教授“爆破”课程。我在清华大学读的化学系，讲“爆破”不成问题，但对教务主任工作，甚感陌生，好在副校长蔡承祖给我介绍了校内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游击战术等课程，都请哪些

人讲。一位 1927 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沈少华（即沈德纯）同志，也非常热情地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也就逐步熟悉了工作。后来陶铸、承祖、少华同志给学校题字，其中一副是：“把广大农民武装起来走上抗日战争的最前线！”那是多么鲜明动人啊！1938 年 6 月 10 日，蔡承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对我来说，是走向革命旅途的新起点！

临时学校的生活很朴素，饭菜是煮大白菜或萝卜，睡稻草地铺，我和大家都能适应。但确实营养很差，卫生条件不好，每人身上都长疮，受疟疾侵袭，我也都害上了。我上午疟疾病发，下午继续去上“爆破”课；下午发病，我则上午上课。学校一有病号，教员或队长就带着学员到八里外的皂市医院去看病，病重的由沈少华同志送到武汉去医治。当时师生之间，真是亲密无间。

当时我从上海到武汉，去汤池只穿了一套衣服，到临时学校后没有替换衣裤，少华同志知道了，就把他过去在中国大学读书时穿的旧西装裤给我，我当时有些不好意思要，他就慈祥地对我讲：“浩风，你一定要拿去穿！”我内心很感动，就收下了。这条长裤，虽是条旧的，却很结实。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穿了多年，后来膝盖上破了，我仍舍不得丢，补了又穿，一是需要，二是在我困难时少华送给我的，这是多么珍贵的友情啊！

1939 年 2 月，在鄂中特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鄂中省委，我党与国民党专员任司令的豫鄂边区游击司令部，合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我的公开身份是青训班的少校教官，实际是鄂中省委组织部的秘书，是负责了解青训班党支部工作的联络员。鄂中省委还在长岗店西边河对面的罗家台子办了个党训班，也由我负责联系。

1939 年 4 月 7 日，鄂中省委宣传部长夏忠武同志派我到河南四望山大王庙给李先念同志送一份南下鄂中的路线图和 500 元法币。夏菲同志帮我缝在棉军装的背面里。我穿着一套灰军装，

挂着少校军衔，带着豫鄂边区政治部的通行证和一名通信员出发北上。3天后到达四望山大王庙。先念同志到前线去了，由参谋长王海山接待我。他叫小鬼到河里抓了一些小虾，拿来炒鸡蛋给我下饭，这在当时真是美餐了！小鬼在旁盯着我吃，我饭毕，盆里还留一些虾子炒鸡蛋，小鬼马上拿走了。饭后，海山对我讲：“先念同志一时回不来，你带来的东西我转他，你明天就可回去了。”这样，我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到鄂中省委。

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率挺进团到京山县大山头，与中共鄂中省委及所领导的“应抗”会师。这时“应抗”武装已发展到3个支队，3000余人，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同志任司令。1939年10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后，我先后在区党委组织部任秘书、组织科长、干部科长。1939年上半年至1940年冬，是边区党组织大发展时期，1940年10月至1943年是边区党组织巩固为主的时期。当时我随陈少敏同志，对小花岭附近的一个党支部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区委委员张祥云策划“小组织活动”，为报私仇，打击报复党支部书记李士民的事件。我们和中共京山县一起，花了一个多月把情况搞清，召开了党支部大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党支部的问题。当时，我写了题为“×支部的脓疮开了刀”的报导文章，登在《党的建设》上。

1943年日寇对边区进行大“扫荡”、“清乡”，区党委为了反“扫荡”、反“清乡”，号召开展反自首斗争，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我受区党委的委托，专门写了一篇“准备反清乡斗争中，党支部展开反自首教育”的文章，登在区党委内部刊物《党的建设》上。该文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在党支部展开讲述烈士生平传记的热潮，发扬阶级气节。

（二）在党支部内揭发自首是无耻的事，造成反自首舆论。

(三) 在党支部告诉党员怎样应付被捕的办法。

(四) 加紧反“清乡”斗争的政治动员，消灭动摇情绪。

并提出了四个讨论题：

1. 什么是自首政策？阴谋是什么？
2. 为什么今天要进行反自首斗争？
3. 怎样驳斥自首的借口？
4. 怎样进行反自首教育？

1942年9月，区党委召开了边区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陈少敏同志提出的“斗争中建设党”。为了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改善人民的生活，决定开展反封建斗争，提高党员觉悟，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好党。当时鄂中地区正开展减租减息，天汉地区天门在开展柴山斗争，鄂东地区黄冈在开展反湖霸斗争，烟叶打包行工人中在开展增加工资斗争。1942年冬，陈少敏大姐指定我和孟昭毅、程里同志去黄冈中心县委，我配合中心县委民运部长王正春同志（当地农民领袖）去发动詹家湖周围渔民反湖霸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发动工作，群众起来了，要求湖主减交湖税，湖主一百个不愿意，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群众将詹家湖开了湖（群众叫“乱湖”），300多条渔船，一起下湖打鱼近8个小时，胜利完成了斗争任务。

接着在黄冈四家烟叶打包行，发动打包工人增加工资斗争，经过一个星期发动，采取对四家行主各个击破的办法，斗争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两场斗争，均通过党支部，首先发动支委和党员，再在群众中发动，斗争中均由他们自己出面，面对面斗争，我们在幕后指挥。斗争胜利后，都开了总结会，提高了阶级觉悟，并发展觉悟高的群众为党员，实现了在斗争中建设党。回党委后，我和王正春同志一起在蒋家楼子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汇报，会后我写了一篇“詹家湖反湖霸斗争和烟叶行打包工人增加工资斗

争”的总结报导文章登在《党的生活》上。

我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的时间很久，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整理和保管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干部档案，接待来组织部接受分配工作或过往边区党校学习的干部，同他们谈话，和为病弱干部提供保健药品。当时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大姐专门给我一只从前线缴获日寇的黄毛皮的背包安放干部档案，另给我一匹马，为行军时赶前卫部队用。每次在战斗行军时，我都将包挂在背上，保证不丢失，不掉队。当时的工作作风是比较民主和关心干部的，对于干部分配工作和进党校学习，首先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就执行，如有意见，就反复说明理由，如还有意见，就请他再考虑考虑，如还不能接受，我就请部长们和干部谈话说服，或请示领导考虑调整工作了结。对病弱干部、高级干部过境留招待所休息，根据病情，主动给些合适的保健药品，帮助恢复健康。干部对区党委非常感激，觉得区党委组织部是“干部之家”，这种作风到解放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一直保持着。我对边区的老同志，一直记忆在心。1995年10—11月“金秋湖北行”，我还访问过88位边区老战友和一些老战友的遗孀，见面时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新四军五师战斗的岁月

王之铎

豫鄂边区的大悟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曾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直到抗战胜利。那里的山山水水，洒遍了我的足迹；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哺育着我成长，支持着我战斗，5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怀念着难忘的往事。

一、初到鄂豫边区

我1938年参加皖南义勇队。皖南事变后（1941年4月）我在山东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扣留，被释放脱险以后，党组织派我回到鄂西北的襄樊。那里是我的家乡，便于隐蔽，约定由地方党组织来找我，接组织关系，规定了化名、联络暗号。1941年7月下旬，我便回到了襄樊。在家等了三个月，天天盼着地方党组织有人来找我，可是一直没有消息。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看不到抗战初期到处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烈场面，襄阳中学已经迁到了郢阳，曾经和我一道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学，一

个也找不到了。党的组织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按照党的布置，我接不上头时，要主动去找党的关系。当时有三个方向：到重庆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去找中央组织部；到就近的八路军、新四军去。三条路，只有到就近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去最方便。我从新华日报和民间广泛的传言中得知鄂中、鄂东、京广线两侧的敌后沦陷区，有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和陈少敏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最近的地方就在随枣一带的大洪山地区，以及东边的大悟山地区。当时国民党五战区军装被服所用的棉花、棉布，都是在樊城市面收购，由鄂中、鄂东、黄陂、孝感的许多小商贩运来的。从敌占区的鄂东沦陷区，有一条肩挑贩运的通道，从这条路自襄樊可以进入大悟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我作好了周密的调查和准备，找到了小商贩交朋友，他们答应带我“做生意”。

1941年11月5日清晨，我也装扮成运销棉花棉布的小商贩，和这群同伴离开了襄樊，一同上路了。

经过张家湾、梁家咀，进了大洪山，途中过了国民党五战区十三集团军汤恩伯部队的最后一道哨卡，再向前就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了。第三天便到了随南的均川，环潭，街头上贴着新四军五师的布告和标语。已经进入新四军五师根据地了，我心中暗自高兴。

我已经不需要同行的小商贩的掩护了，便借故肚子疼要休息一下，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一路的照顾，请他们先走。

这天正逢集，等到中午集散了，我才独自上路前进。谁知走了不远便被几个背着驳壳枪的便衣队员拦阻了。原来，他们早已发现了我，并从与我同行的小商贩中了解到我的来历。为了不惊动赶集的人，等到下午我出了街，才把我拦住，仔细盘查。

我估计他们都是新四军五师的便衣，正是我要找的人，所以我坦然自若。他们把我带进一个村庄，一位身穿军服，臂上带有

“N4A”符号的正规军人，详细向我问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文训，是随南游击队的教导员。我对他详细讲了我的来历和一切真相。他对我很亲切。吃饭时，特为我加了两个菜：炒肉片和炒鸡蛋。并给我指路，让我到洛阳店去找师部。

到洛阳店我找到了统战部的宋彬同志，他派侦察员送我到九口堰师部。我见到政治部秘书毛昌熙同志，他忙于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部队又有紧急任务，立刻要出发，于是送我到警卫连。后来我才知道，部队忙于向大悟山转移。

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走了3天穿过了京汉铁路，进了大悟山。我仍在警卫连。路上碰到了毛昌熙，他问：“为什么把你送到警卫连看押？”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来找党的。国民党扣押我，我感到光荣。到了新四军，你们也关押我，你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吗？”

一位骑马的人走过来，看见我盛气凌人，毛昌熙却支支吾吾，便对毛昌熙说：“派人把他身上搜一搜，弄清情况，是国民党派来的，还是日本人、汉奸派来的。”我怕他们真的这么干，被吓毛了。满腔的怒气变成了恐惧。

中午，部队在山坡上休息，毛昌熙叫我去见政治部主任。我镇静下来，自信只要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我总能说清楚。

原来政治部主任就是刚才那位骑马的人。他以敏锐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便连珠炮似的、一句紧跟一句、不让我有思考余地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住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大哥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他现在哪里？”我一字不错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你让我慢点说不行吗？”我抽空顶了他一句。他停下来望着我思索着，我请他听我说明我的来历。他说，“好吧，你慢慢说，不许说假话。”我把对文训、宋彬、毛昌熙等人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你见过朱瑞吗？那你就详细说说朱瑞的情况。”

“朱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山东分局的书记，江苏盐城人，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在山东我们见过多次，听他传达中共六中全会的报告。我们派到国民党鲁苏战区工作时，我们的党员名单，就由他保存在山东分局。”

我如实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的疑惑逐渐消失了，又问：“你大哥王之铮跟家中通信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的情况怎样？”我如实回答了。他不再发问了，说：“你这个小伙子太性急了。不要火气大嘛？我们的侦察员报告你从老河口来，和一伙小商贩同路，他们说你不是他们的人，你又没有任何人介绍，也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把你的来历搞清楚，难道不应该吗？你现在说的情况，你的党组织关系，我们还要通过延安向山东分局查清楚。不过，我们还是相信你说的。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到组织部招待所去住。”这样就解除了警卫连对我的看管。他又说你们襄阳五中的许多同学在这里，等一会叫他们来看你。

毛昌熙从警卫连送我到组织部招待所。小勤务员用门板给我搭了个铺。我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我正躺着休息，突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王之铎，王之铎！”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廖佑昆、李宗仙同乡同学，我们自小一起长大的。过了一会，文工团的徐垠、李野、汪洋、方堃等都来了，挤了一屋子。我身上还有一二十块银元，掏出一元叫小勤务员去买了一篮子花生，大家围成一圈，边吃边说。抗战时期，意气相投的救亡青年热烈聚会的情景，呈现在这小小山村的农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他们问我带来了什么材料，政治的、时事的、文化的都好。我化装成小商贩哪能带什么材料。他们又问华北八路军、苏皖新四军、五战区老河口等情况以及文化、戏剧、歌咏情况。可惜我回答不出多少，最后唱了一支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下，文工团搞音乐的李野、翟民就抓住不放，要我反复唱，他们记谱的记谱，记词的记词。以后，这支歌按他们所记下来的谱词在新四军

五师广为流传。

组织部长顾循同志和我谈了一次话，谈到向山东分局查询我的组织关系，分配我到抗大十分校工作。

二、在抗大十分校

我从路东又回到路西的白兆山抗大十分校。校长、政委都是李先念师长兼任，副校长徐休祥、副政委黄春庭主持日常工作。训练部长张水泉、政治部主任冷新华。我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化名叫金铎，大家叫我金干事。开始，宣传科只我一人，没有科长。后来来了一位女同志名叫任重。我们负责学员的政治文化学习、对内对外时事宣传和文娱活动。不久，又调来两位同志：李国超，广东梅县人；王坪，河南信阳人。组织科长曾昌华、杨子谦都负责过我们的工作。以后训练部由余潜任副部长，领导政治文化教育和宣传科的工作。

那时，五师刚开过政治工作会议，黄春庭同志在全校讲了一次：“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是老红军政工干部，不仅从理论上讲了如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还特别强调爱护战士、关心战士，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搞好伙食。他确实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可惜，在国民党顽固派一次进攻中，黄春庭政委中弹牺牲。这对抗大十分校的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1942年夏季路西的环境由于顽固派的进攻动荡恶化，抗大十分校转移到环境比较安定的路东大悟山地区，住在姚家山一带。

我军三打伪军汪步青，俘获了敌人的一个军乐队。为争取他们参加我军，全班人马调给了抗大十分校，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这是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铜管乐队。大喇叭、小喇叭金光

闪闪，吹打起来非常热闹。他们每天除了吹打练习，由宣传科给他们上政治课，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

春耕大忙季节，部队的干部学员，都要帮助群众割麦插秧。我们动员军乐团的同志参加，主要从政治方面使他们了解我军的军民关系，并不要求他们都下地干多少活儿。

当地群众在插秧的时候，村子里轮流帮工，家家插秧时也请吃秧酒。

我们住的房东家，插秧那天，一定要请我和军乐队队长吃酒。我们推脱不了，只有从命。在民间这是很隆重的农家宴会，菜肴很丰富，鸡、鸭、鱼、肉、豆腐、蔬菜，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搬出来，慰劳辛苦了一天的人。我虽然也下了田，但活儿干得很差。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不能吃人家的酒席，我灵机一动，掏出一枚银元，给房东的孩子，说是给他买糖果吃，实际是作为我和军乐队长的饭费。事后军乐队长说，你这一着干得很漂亮，你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是和别的军队不一样。不过，你一个月才五角钱津贴，一顿饭吃了你两个月的钱，以后，一点零用钱也没了。

经过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军乐队的人提高了觉悟，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救亡。但是，他们的家都在武汉，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于是，我们调了一批年少的战士来学习军乐。每天一起床，便到山头上使劲吹号，一直吹到把尿憋没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学不会五线谱，各种复杂的铜管乐技巧，短时掌握不了，而原来那些军乐队队员，要求请假探亲，或者接家属来队，或者回武汉抚养老人。我军的政策是：“留队欢迎，要求走则不勉强留，并发给他们足够的路费，准其回家”。最后只几个人和军乐队队长留下参军了。他们大都改做了其他工作。调来的青年战士也回原单位了。军乐队就这样结束了。

在抗大十分校，组织上调给我的勤务员，是个年龄只有12岁的小孩子，名字叫模范，京山人，父亲被日伪军拉夫，死在外面了，母亲改嫁了。他要为父亲报仇，就参了军。我们叫他“小鬼”。他的工作是每天为我打饭、打菜，晚上领一碗豆油，点燃一盏豆油灯。行军时，每到驻地还要为我向房东借一块门板，支一个铺。有时间还要给房东挑水，保持水满缸。烧水、烧柴也要由他到山上去拾树枝、割柴草。

我每天晚上教他认字、唱歌。他不肯学，说：“我当勤务员，不会认字、唱歌，也能做好工作。”

有一次，部队发布鞋给干部，战士和勤务员没有，模范有意见，就用唱歌来表示不满。有支歌“新四军里真快乐”，歌词是“新四军里真快乐，官兵平等津贴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好话对你说。”模范却唱成“新四军里不快乐，干部穿鞋勤务员打赤脚，还要上山拣柴火。”

五一劳动节那天早上，他没给我打洗脸水，一天也没照面。晚上他回来，我问他今天怎么不工作了。他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指导员讲了勤务员都放一天假。”我才恍然大悟模范今天不工作，是过劳动节，应该的。

这孩子，实在可爱，他虽年龄小，却干跟大人一样的重活。为了培养他，我送他到抗大的青训队去。我原以为他会很高兴，谁知他不去，还说他一不当学员，二不当干部。如果我不要他了，他愿意到连队去当兵，背杆枪去打仗，打死一个汉奸、日本人，也算给他父亲报仇了。我耐心的劝说他去学习，谈了两三天，他才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是学完了还要回来做勤务员。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学习去了，以后他的情形我就不清楚了。我感激他小小年纪，在生活上给了我那么多的帮助。他那幼小而顽强的形象，深刻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却好像是在昨天。

三、在师文工团

我到抗大十分校不久，政治部副主任余潜同志便找我谈话。说山东分局已经回电报给五师，证明我在1938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入党，经山东分局派到国民党所属鲁苏战区，抗敌演剧第六队工作。皖南事变后，该队全部被国民党拘留。以后的情况，分局就不清楚了。五师政治部认为，虽然我入党的情形有了证明，但被扣留后的情况以及被释放后的经历，都无人证明，由于我千里跋涉投奔新四军，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可以先重新入党，过党的组织生活，保留原来的党籍，待得到证明，再恢复党籍。余潜副主任愿做我重新入党的介绍人。经过多次交谈，我坚持要恢复党籍，不愿重新入党，认为我没有问题，没犯错误，已经有了入党的证明，为什么不恢复党籍，要再重新入一次党呢？五师政治部如果不给我恢复党籍，我可以回山东去，找山东分局。解决党籍问题。

这样，抗大十分校说服不了我，把我送到师政治部。组织部长顾循同志和余潜一样，要我重新入党，我又重复讲了自己的理由。顾部长说：“你的意见可以考虑，但现在只能重新入党。”我要求到山东去。他说：“到山东去或是到军部去，目前都不可能，交通过不去。从鄂东到皖中，被敌伪顽部队隔断。等到将来根据地打成一片，才能过去。现在只能等着。”我也无可奈何。顾循同志又说，“你的工作，可以不回抗大。现在师政治部正在扩大文工团，你可以暂时到文工团去。等有机会，往东边的路通了，我立刻送你到山东去。”1942年秋天，我到了文工团。团长唐庆、助理员周辛对我说，知道我是失掉关系的党员同志，政治上不会歧视我，让我参加创作组，按营级干部待遇。和从事文艺工

作的青年在一起，很谈得来，与唐庆、方西、胡旋、周辛、汪洋、方堃等人一见如故，志趣相投。我虽然是从全国闻名的演剧队来的，但无一技之长，不会演戏。在文工团多年，未做出成绩。只在《太平天国》一剧中扮演了林福祥；在《雾重庆》中扮演了诗人老艾。

1943年文工团在大悟山演出大型话剧《雾重庆》是件有很大影响的事。在没有剧场，只有山坡的土台子的偏僻山区上演，大城市的戏。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首都，要把它搬上舞台，光是布景、道具方面的难度就很大，何况演员的水平不高，甚至数量都不够。

文工团长唐庆同志是位有相当造诣的艺术家，很有组织指挥能力。我们的实力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干劲，加上当时文工团已有一批诸如方西、胡旋、周辛、王萍、方堃、汪洋等音乐戏剧的骨干人才。唐庆担任导演并扮演《雾重庆》中的男主角，女演员还请了当时师长的爱人尚小平来客串。为了制作布景，专门找来木工做道具沙发。由于工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们就用麻袋装上稻草，外面罩上布单，做成舞台上的沙发。

演这个戏是否适宜，颇有争论：“对抗战无益啊，”“不适于敌后农村环境啊，”“不符合普及与提高的方针啊，”众说纷纭。唐庆和文工团部分领导同志力排众议，认为演这个戏，很有好处。它揭露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腐败黑暗，宣扬坚持抗战，是有积极的宣传教育意义的。演这个大型的多幕剧有一定难度，但它可以培养锻炼人。事实上，经过排演《雾重庆》，文工团的业务水平普遍有了提高。

戏排好了，究竟演不演，其说不一。唐庆告诉大家，各军分区、旅的首长正在师部开会，听说文工团排了大戏，一定要看。如不演这个戏，他们就要砸文工团的舞台。这说明当时的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独幕剧、小歌舞，如“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小剧目

了，有更高的艺术享受要求。当时的大悟山根据地已经是纵横千里的大块根据地的中心，是千万人向往的地方，艺术上也不能没有较高水平的东西。《雾重庆》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干部群众从很远的地方到师部驻地来看演出。大悟山根据地的各村庄，以至整个边区都轰动了。在敌后边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人们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水平高的优秀剧目，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的确是很难得的。

我在文工团除了参加文艺演出等工作外，也常常承担一些特殊任务。1943年下半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缅甸、泰国、新加坡等地，在大陆打通了粤汉线，国民党军队放弃了长沙。五师部队左面从湖南的湘鄂赣边区开辟了阳新、大冶、通山、岳阳、鄂城根据地，右边从洞庭湖以北的常德、桃花山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从而对武汉的敌军、日军的华中派遣军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这时文工团在襄南活动。我被指派随军到江南挺进支队做青年工作与政权工作，组织青救会和地方政权。我到过桃花山，后到江北。文工团回师部，我也回大悟山。我又提出到军部或山东去接党组织关系，没获准许。我从文工团调出，到挺进报社任编辑，不久又任随军记者。

调出文工团时，团长唐庆同志按组织部的交待，劝我留在五师工作；先重新入党，以后得到证明再恢复党籍。唐庆愿做我重新入党的介绍人，没有候补期。我接受了唐庆的意见，第二次加入了共产党。我在挺进报社是正式党员。

挺进报是五师政治部的机关报，已有三四年历史，从最初的油印报，到石印报到现在的铅印报。师部在大悟山的陈家大湾，挺进报社在隔一二里路的秦家湾，社长马仲凡，编辑有马焰和我，我们住在老乡家的一间堂屋，每人编一二个版面。马焰在报社时间长，很有经验。马仲凡为人严肃认真，对我细心的教导。我现有的一点文字功夫，得益于他不少。

我们从选稿到改编、标题、画版面的大样，弄好经马仲凡过目，审定以后才发稿。

我们还要做通讯员的工作，退稿要写信详细对来稿作评讲，指出其优点及不足之处。报社的印刷厂在大悟山脚下的杨家湾，离师部只有十几里路，有十几名工人，一部四开平台印刷机和一台圆盘机。

三五九旅南下到大悟山时，我先在十三旅连队采访，以后到三五九旅的连队采访，写了一篇字数较长的专题新闻，马仲凡看了很高兴，对我大加表扬，全文刊登在第一版，并加上了通栏标题：《在欢乐的日子里——记三五九旅到达鄂豫边区与五师会合》。我的工作又改派到河南军区，到四望山做六分区的随军记者。

随军记者一般不回报社，只有开会或大的军事行动，大家才能碰到一起，交换工作经验，交流情况，互相学习。

过去，我很少参加战斗，担任随军记者参加战斗就多了。有一次，我随三十七团行动。在团指挥阵地上，除了警卫班占据着指挥所，参谋、干事都下到连队去了。团长夏世厚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正准备逃跑，便对我说“金记者，你快跑下去告诉一营营长，快抄近道抢到敌人前面去堵住敌人，不要让敌人逃跑了。”就这样我这随军记者当了团长的传令兵。

战斗中我常跟着主攻部队行动，有时跟着尖兵班走。战士们端着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射击，而我连一颗手榴弹都没有，我的武器是采访笔记本和笔。

战斗结束了，战士们有的休息，有的搜集战场上的战利品和物资资财。随军记者要加班加点工作，写新闻通讯、统计数字以及力所能及的战场上的其他工作。工作紧张、有序，我的心情十分愉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我正在六军分区，准备进城

接受日军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却下令不许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日寇，并命令日伪军不得向我军投降，坚守阵地，等待国民党军队从峨眉山上下来，到豫鄂边区接管防务，并准备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民族战争没有结束，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开始发动国内战争了。

我们不得不转移了！再见，大悟山！

为准备应付内战，成立了中原野战军，我们这些记者都到部队任职。我分到十三旅三十七团任宣传股长。三十七团驻在宣化店南边的吕王城。

6月26日黎明前，全团在宣化店南边的河滩集合，部队排成凹字队形。平常这时都是我指挥部队唱歌，或读报、宣讲新闻，或担任司仪请首长讲话。今天夏世厚团长亲自喊口令，指挥部队。他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注意听讲。过了一会儿，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到了。夏团长向师长报告了人数之后，请李师长讲话。李师长站到队伍的中心，用他那浓重的黄安口音讲话。他首先问：“同志们好！”鼓励三十七团，称赞三十七团，他说：“现在你们是中原野战军，作战勇敢，获得了许多胜利。你们是中原军区和中原人民的保卫者。”接着他讲了全国形势和中原军区面临的问题：“国民党已经用三十万大军包围了我们，各路进攻的部队都已开始行动，要在7月1日会师宣化店，合围歼灭我中原军区。”他说：“敌人要把你们全部都俘虏了去；把我们的根据地全部占领，把我也俘虏了去。你们说行不行？你们答应不答应？”部队爆发出强烈的反应，高喊：“不行！”“我们坚决不答应！”

当李师长把部队的情绪调动起来后，他又诙谐地向大家讲道理。他说：“敌人虽然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突围出去。”他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你们上了楼，人家把楼梯一抽，你没有楼梯了，就下不来楼。敌人包围了我们，但不能

像抽楼梯那样，把我们脚底下的路，全都竖起来，这条路堵住了，我们还可以走那条路，我们有两只脚，就是没有路，我们也能踩出一条路来。”

最后师长向大家明确交待任务，就是要打出一条路来，保卫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胜利突围。

师长讲完了，团领导干部讲话：“部队出发，刀出鞘，弓上弦。”部队的将士们憋了一肚子的气要求作战，像出膛的子弹飞射向前，从宣化店向京广铁路飞奔前去。中原大军突围的行动开始了。

再见，宣化店！再见，大悟山！再见，滚子河、陈家大湾……再见，大悟山秋天的红叶，春天开遍满山的杜鹃花！再见，大悟山的父老兄弟、红军的家属、抗日烈士的妻子儿女！抗战八年，我们烧了你们多少柴草，喝了你们多少清水，吃了你们多少粮米青菜！我们像婴儿一样吸吮了大悟山母亲的多少奶汁！大悟山人民给予我们多少恩德慈爱！这些都铭刻在我们心里。再见，大悟山！但，我们还要回来的，我们一定要回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和无限的关怀与爱戴。

抗大十分校

——鄂东教导团生活琐事

李国超

1942年1月，我从广西到达新四军五师。2月，五师政治部派我到抗大十分校工作，历时3年，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政治教育干事、文化教育主任。我到抗大十分校时，正好分校第一期在白兆山随县洛阳店开学。抗大十分校是在原来五师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的，是五师培养军队干部的最高学府。由师长李先念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副校长先为肖远久，后为杨焕民。副政治委员郑绍文，教育长邝林（黄宇齐），郑绍文调离后由邝林任副政治委员。学员主要是从各部队干部中择优选送的连、排干部，每期学员1000多人。第1期至第3期军事政治干部混合编队学习，第4期起军事政治干部分开编队学习，第1期有知识青年队，主要是河南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学习时间一般半年。课程设有军事课、政治课和文化课。军事课包括军事理论、基本战术、游击战术、射击兵器、工事伪装、夜间训练、简易测量等。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抗战理论等。文化课包括语文、算术等。

政治课的许多课程，都参考延安抗大的有关教材，自己编写

教学提纲进行讲课。约在 1943 年春，在教育长邝林亲自领导下，分工编写社会发展史教学提纲，从人类起源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分工负责编写资本主义社会部分。重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五种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发展规律，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43 年秋，邝林教育长要我讲一次豫鄂边区地理常识课，并尽量结合实际来讲。我根据领导指示精神，搜集了有关材料，绘制了简要地图，介绍了豫鄂边区的地域范围，山川湖泊，物产气候，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阶级矛盾，革命传统，特别是豫鄂边区的战略地位。豫鄂边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谁占据了大别山，大洪山，谁占据了江、河、湖、汉，谁就能经略中国。

1942 年，河南、湖北大旱，路有饿殍。上级领导动员干部战士，上山采野菜，掺在稀饭里吃。在采集的野菜中，黄金叶最难吃，虽然开水煮，在凉水里漂，苦味还很大。但这种东西山上多，能充饥。我们还上山挖桔梗等中药材，晒干后上交出卖。1943 年，领导又动员大家开荒种菜，减轻人民负担。每个干部战士一年要交 450 斤蔬菜，没有肥料就自己动手挖粪坑积肥。我种的是莴苣，1943 年交了 500 斤，超额完成任务。单位还集体养猪，改善部队生活。

抗大十分校是个教学单位，师首长尽量照顾我们，把我们放在比较安定的地方。但是，敌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摩擦频繁，学校的驻地经常流动。从 1942 年初到 1945 年初，学校驻地就从白兆山到赵家棚、到大小悟山、到陂安南，还到过襄河边的刁叉湖地区和北面的信（阳）南地区活动过。碰上敌人，还要作战自卫。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还分散活动。1942 年是豫鄂边区最困难的一年。从 4 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从西面、北面和东面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摩擦，日本鬼子又频繁“扫

荡”，在敌伪顽的夹击下，边区的西面、北面和东面形势严重。抗大十分校奉命南下襄河边的刁叉湖地区活动和教学。我们南下湖区两个多礼拜，又碰上日本鬼子“扫荡”湖区，白天黑夜和敌人兜圈子打游击，处境也相当困难。就在这时，我患了疟疾，天天发烧 39℃ 多，跟随部队行动十分不便。领导把我和通信员小李委托乡政府，安排在芦苇深处的一家老百姓家里隐蔽治疗。这家老大爷姓胡，五十多岁了，家里 3 口人，除了种地主的两亩多田外，主要靠打鱼为生。胡大爷一家对我们十分关怀，鬼子“扫荡”了，他们也不敢出去打鱼，白天把我们带到芦苇深处藏起来，他和儿子在附近轮流放哨，顺便找些野菜吃，天黑后再把我们带回他们家里睡觉，躲过了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搜查。我深深地感到边区军民的鱼水情。

1942 年的 12 月下半月，日寇武汉派遣军指挥官西尾，动员了 15000 多日军和 12000 多伪军，分 12 路从东西南北 4 个方面，对驻在大、小悟山的新四军五师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铁壁合围。当时抗大十分校驻在小悟山的陈家畈一带，按照师部的反“扫荡”部署，我们按时向陂安南方向突围。12 月 16 日天黑后，分校的队伍在陈家畈东面集合，从小路向东面的蔡店方向出发，天很黑，下着毛毛雨，路不好走。到达蔡店时已是午夜 1 时左右。在路上还和三十八团发生了误会。幸好没有伤亡。当地老乡说，一个多钟头前，有四五百日本鬼子和伪军进到蔡店烤火休息，听到西边枪声，就急忙离开蔡店，走大路向小悟山方向去了。我们就加快速度通过了河口到黄陂的公路，天亮前到达了陂安南目的地。3 天后，从师部传来了喜讯，五师军民，经过艰苦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4 年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派八路军南下豫鄂边区的好消息。1945 年 1 月 27 日，王震和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4000 多人到达大悟山和五师会师。29 日上

午，在大悟山陈家湾举行会师大会，南下支队和五师的队伍首先进入会场，在前面并排摆好方阵。抗大十分校的部分队伍也参加了大会。举着一面面红旗的群众队伍，从附近的山沟里、大路上向陈家湾前进。青年男女驾着彩船，抬着猪羊，熙熙攘攘地拥向会场。妇救会员每人提着一个竹篮，满满地装着红枣花生，一进入会场，就把红枣花生撒向南下支队的队伍。军乐声、鞭炮声响彻会场，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师长首先致欢迎词，他说：“战友们，同志们，我今天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讲了，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表达我们对八路军老大哥的热烈欢迎。同志们知道，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豫鄂边区已经有6年历史，可是在这6年中，一直没有见过八路军老大哥，我们天天想，日日盼，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老大哥，你说，我们多么高兴啊！”李师长最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派八路军南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豫鄂边区是个突出地带，我们在同日伪军和反动顽固势力的包围夹击之下，战斗非常频繁，很希望老大哥来助一臂之力。今天你们来了，我们就不是一支孤军了。你们的到来，把华北、华中打成一片，将来你们南下，又把华中、华南打成一片。”李先念师长的讲话，表达了我们五师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南下支队的王震司令员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晚上，在陈家湾又召开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南下支队的领导，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其中，特别是毛主席指示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那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缺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共产党员就是要把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听了毛主席那松树和柳树的生动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年春，五师首长根据部队和根据地扩大的需要，决定抗大十分校除直接办学外，派出干部和教员，到离师部较远的地区创办教导团。增加教学单位，扩大干部教育面。在十三旅二、四军分区，三军分区和鄂东军分区各办一个教导团。我被分派到鄂东军分区教导团。抗大十分校分派到鄂东军分区教导团的干部，除了我，还有白相国、布风友、吴律西等人。教导团下属三个学员队，一队是连级干部队，二队是排级干部队，三队是班级干部队，每队学员100多人。另还有一个警卫连。每学期5个月左右。教学课程都采用抗大十分校的。我开始在三队，后调二队任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到新四军五师的几年，最深刻的印象是，五师对军队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是十分重视的。在职学习、学校教育都抓得很紧。在五师的干部中，抗战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数量少，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五师却能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取得胜利，重视干部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

教导团在第一期的政治教学中，我仍然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讲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物质极大丰富，人们都有高度的文化科学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人人都过着美好的生活的崇高理想时，有一个学员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到了共产主义，我就每天吃豆腐熬猪肉，我就穿绸子长袍，丝袜子，毛料布鞋，住三堂二横的堂屋。四周把墙围起来，四角盖上炮楼。”当时，有学员问他：“四角盖上炮楼干什么用呢？”他说：“防土匪啊！”有的学员又问道：“到了共产主义，还有土匪吗？”这一问，他答不出来了。大家一阵大笑。我听了这个学员发言后，深深感到，我们的许多干部，农民出身，长期生活在农村，而农村生活得最好的就是地主。他们没有到过大城市，没有见过大工厂，在他们的脑子里，总是离不了农村的具体环境。因此，许多农民出身的干部，要从科学的

理论上认识和树立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还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深入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

转眼到了1945年的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但只给中央军缴枪。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令日伪军投降，我军要立即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如遇敌伪军拒绝投降，应予以坚决消灭。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刚饮了抗战胜利的喜酒，我们鄂东军区就进行攻打日寇在鄂东的重要据点河口。教导团接到命令：全团迅速开赴冯树垵，把那里的小据点拔除后，就驻守在该地，阻击黄安县城的日军增援河口。冯树垵在河口东南，距河口40多里，东南距黄安县城约20里，是黄安县城到河口的必经之路。日本鬼子在这里修了一个炮楼，驻有20多个鬼子兵。教导团到后就把炮楼围起来，教导团警卫连的两个排部署在冯树垵东面的山上，阻击黄安县城的敌人增援。天黑后由我们二队和警卫连1个排主攻炮楼，三队为预备队。打了半夜没有攻下来。敌人虽然被打死两个，打伤数人，但仍不投降。我们二队也牺牲两名学员（排级干部）。天亮前，炮楼里的敌人逃奔黄安县城，我们立即出击，又打死3个鬼子，打伤数人，占领了炮楼。第三天三队接替二队驻守炮楼。上午约10点多钟，黄安县城的日本鬼子100多人倾巢出动，反击冯树垵，企图增援河口。敌人来势凶猛，打得很激烈，守在东山的警卫连撤退下来，占领炮楼北端阵地抵抗，敌人就猛攻三队据守的炮楼和炮楼山上的阵地。三队的王指导员牺牲了，警卫连也有几个战士负了伤。下午，鄂东军区派了1个连来增援，从北头的侧面攻击敌人。敌人支持不住，又逃回了黄安县城。河口的仗也打得激烈，几天后，河口镇收复了，所有的炮楼都打下来了，伪军300余人全部投降，剩下的日军20余人携械逃窜。收复河口后不久，鄂东军区就接到师部命令，立即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大举进攻的斗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 20 多个师和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方向鄂豫边区扑来。国民党蒋介石早已下定决心，要在抗战胜利后，就立即开始进行大规模内战，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独裁统治。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料到国民党蒋介石企图进行内战的阴谋，深知中原地位的重要，就在日本投降的当天，电示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你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准备一切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1945 年 10 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并立即集中中原军区主力在桐柏地区展开作战以配合重庆谈判。鄂东地区只有鄂东军区的地方部队坚持斗争。我们鄂东军区教导团，奉命在鄂东地区活动，坚持游击战争，对外番号改为鄂东独立团。教导团政委白相国是个政治坚定，精明强干的同志。副团长石天华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作战经验丰富，鄂东礼山县人，抗战开始后调回边区担任过经扶、罗（山）礼（山）等县委书记及陂安南中心县委指挥长多年，熟悉本地情况。我们二队也增调来冯老一同志任副队长。他也是鄂东人，在鄂东陂安南等县担任过多年的县大队长，也是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熟悉地方情况。我们学员队当时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游击战，有条件时再进行军政教育。自 1945 年 9 月起，我们就一直在鄂东和豫南的礼山、黄陂、黄安、罗山等县的大山里和国民党的部队兜圈子。每天晚上行军转移，白天隐蔽休息。没有情况就进行学习和做群众工作。从 1945 年 9 月下旬开始到 1946 年 1 月中旬停战协定生效为止，在 4 个月的游击战争中，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也没有大的战争，有我们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地方党、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都感安心和鼓舞。1945 年末，中原军区主力从桐柏地区转移到鄂东地区作战，我们教导团配合主力加强活动，1 月中旬，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教导团胜利完成了坚持游击战任务，奉命开赴宣化店 3 个队的学员全部分配去部队工作。

鄂东教导团学员的分配工作结束，教导团建制撤销，教导团政委白相国调中原局组织部工作，协助处理干部问题。不几天，他找我谈话，说：“现在虽然停战了，但是形势紧张，国民党 30 万大军包围我们。我们随时准备打大仗。现在边区的干部太多，需要部队掩护，对作战很不利。组织上决定：调大批干部到别的解放区去工作，干部自愿和组织决定相结合。现在征求你的意见，是留在边区分配到部队工作呢？还是转移到别的解放区去工作呢？”我考虑后说：“我愿意转移到别的解放区去工作。”就这样，我调到华东解放区去。组织上发给我 5 万元法币。经武汉去华东。又由教导团副团长石天华的爱人魏素娟同志给汉口家里的哥哥魏学楷写了一封信，帮助我转移。3 月的早春，虽然天气晴朗，仍有一些寒意。我穿一件长衫，沿着宣化店南流的河水，顺路徒步南下，当时，心潮起伏。是啊！我参加豫鄂边区和五师的艰苦奋斗已有 4 年多了，而今要离别了，留恋之情，有许多说不出的滋味。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向北望宣化店，那里有我的许多亲密的战友。我通过地方的秘密关系，在平汉铁路广水车站上了火车，直奔汉口，找到了住在汉口汉正街中和善堂的魏学楷家里。魏学楷和他的母亲一家人都十分亲热，招待我吃住，给我办了由汉口到苏北高邮的通行证，帮我打听到南京的轮船。魏学楷对我说：“由汉口到南京的轮船船票 8 万元。”这就难住我了，组织上只发给我 5 万元，哪里拿得出 8 万元船费呢？而且到南京后还要转苏北。后来我亲自到码头打听到坐木船到南京的船费只要 3 万元（包括吃饭）。于是我就坐木船到南京。在木船上结识了一位从重庆经汉口到苏北扬州的单身电器工人，带的东西多，为了便于掩护自己，就和他顺路结伴同行，帮他照顾行旅。到南京后转乘火车到镇江，渡长江到扬州。电器工人的老家在扬州往北 20 多里的农村。到他家后，了解到他家乡是我们的游击区，有乡村民主政权组织。我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的乡政府送

我到区政府。我是由中原军区到达华中军区最早的一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承，十分关心中原军区的情况。听到我是从中原军区化装出来的，就把我找去询问。我汇报说：“全面情况，我不甚了解。据我所知，我中原军区主力一纵、二纵、包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刚从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地区，转移到路东的宣化店地区，局面还没有打开就停战了。部队多，驻地狭小。河南军区和江汉军区部队，仍在平汉路西地区。现在国民党约30万部队围困中原军区，构筑碉堡，妄图困死我军。当前粮食缺乏，经费困难，部队都吃掺了野菜的稀饭，但斗志昂扬，情绪很高。”张鼎承司令员听后说：“华中军民十分关心中原地区的艰苦斗争，我们正在设法秘密用木船运黄金支援中原的斗争。”我听后深感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是一个整体。一方有难，各方支援，积极配合，相互支持。

两个月后，我中原部队英勇突围，拉开了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序幕。

忆我在五师文工团的一段历史

原 野

我从事文艺工作是从1939年冬天调进“十月剧团”开始的；1942年8月，“十月剧团”与五师文工队合并组建师文工团，我又成了五师文工团的成员。在这段时间里，我既当演员，又担负布景和道具工作。有时还被派往部队教唱歌曲、做教育改造俘虏工作。

一、参加演出教唱活动

文工团的主要任务是演出。每逢重大节日，边区的党、政、军重大会议、部队打了胜仗都要演戏。记得演出的大型剧本有：《雾重庆》、《狐群狗党》、《马门教授》；历史剧《忠王李秀成》；独幕剧有《搜查》、《人约黄昏》、《新四军快来吧》、《民哨》等。这些话剧对揭露打击敌、伪、顽，鼓舞我军士气，团结抗日，都起了一定作用。在这些话剧中我除了扮演了一些角色外，还担负了所有布景和道具工作。

1943年夏季，文工团又扩充了一个湖北地方戏——楚剧队。队员都是从敌占区吸收来的旧艺人。楚剧很受部队官兵和群众的喜爱，有时戏演罢了，观众们总呼喊“再来一个！”我记得演出的节目有《风波亭》、《打渔杀家》、《王佐断臂》等。这些虽然是旧剧目，但经过艺术加工，去其糟粕，很有教育意义。如《风波亭》就是影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惨案而改编的。有一次团队领导派我去教中央军的俘虏唱歌。我是第一次担任这样的任务。我想：教俘虏唱歌，就不能像教自己部队唱歌一样。应该是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融在一起，于是我选择了一首《国共合作》的歌曲。歌词的内容是：“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北伐军队雄师到长江。帝国主义吓得缩紧了头，军阀官僚一扫光。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北江。四万万同胞得到了解放，全国人民喜洋洋。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这首歌既歌颂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绩，也宣传了抗日统一战线，把这首歌教国民党俘虏兵唱，很适合当时情景。俘虏们深感大敌当前，不打日寇反而打抗日的新四军实在不对。后来释放他们时，很多俘虏表示：回去以后一定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再也不打内战了。

二、文工团的整风学习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个讲话，对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震动很大，自然也涉及到豫鄂边区。1943年秋，师政宣传部指示文工团进行一次文艺整风学习。目的是解决革命的文艺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即所谓是搞“阳春白雪”还

是搞“下里巴人”的问题。不管是先搞哪一套，目的是一个：“团结自己，打击敌人”。记得当时我把这八个字用仿宋体写成横幅标语，粘贴在学习室的墙上。

根据文艺整风要求，我们检查了以往的工作。认为过去对文艺应当为谁服务、普及和提高等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思想上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过去的演出中，多数都是些引进的大型话剧。这些剧，没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历史知识是看不懂的。剧中人不是“洋人”就是达官贵人、小姐太太。我们的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似懂非懂只是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能够反映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的节目太少。这足以说明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再就是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上，我们只注意了自身的提高，以致常常演大型话剧。诚然，这对文工团本身的表演技术、布景、化装等方面是有很大提高，却忽视了如何开展部队群众文艺，忽视了深入连队、农村体验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文艺整风以后既普及了工农兵文艺，又充实提高了文艺队伍。

这里还应当提到当时楚剧队的文艺整风。他们都是从敌占区来的旧艺人，文化思想水平较低。为了让他们安心革命工作，所以对他们都给了优厚的工资待遇（当时我们是没有工资的），其中少数名演员工资更多些（达一百多元）。经过教育、熏陶和学习“讲话”，他们提高了觉悟，感到拿工资唱戏好像给老板唱戏的戏班子，不像干革命的样子。他们纷纷提出不要工资了，要与文工团的同志们一样，做一个光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到边区后，从没听到有人称他们是“戏子”，而称同志。这也促使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虽然在“讲话”学习中表现了很大进步，但领导还是考虑到他们过去的生活习惯，有的还要养家糊口，就没有撤销他们的工资待遇。后来中原军区突围时，就是这支楚剧队集体化装成“戏班子”，在敌占区数次遭到盘查、逮捕。

但在王韧、韩光表同志的领导下，没有一个叛变的。而且在湖北老河口，为营救集中营的同志，做了不少工作。我在集中营时也曾被他们营救过。他们历尽艰险困苦，最后终于集体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次文艺整风使我们明确了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兵。解决了革命文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为边区文艺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深入连队体验生活

通过“讲话”学习，使我们认识到以往的文艺工作缺乏扎实的群众生活基础。搞创作的写不出工农兵的剧，搞表演的演不好工农兵的戏，所以我们的舞台上，很少有适合于广大战士口味的节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开始分批深入连队体验生活。首先由副团长方西同志带着我们少数同志深入十三旅三十九团。我被分在二营六连。这是我第一次下连队，吃住都在连队。为了工作方便，我以副指导员身份在连队工作。

由于没有连队工作经验，开始工作不知何处下手。我想既然是帮助连队工作，我就利用自己文化特长来进行。于是白天我就教战士们唱歌、讲解歌词内容，把文化课和政治课与唱歌融为一体，晚上就找几个战士谈心搞调查、交朋友。问他们教的歌好不好学，歌词懂不懂。喜欢什么样的歌，喜欢看什么戏。有时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学瞄准。这样过了几天就和战士们混熟了，战士们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讲。在谈心交往中（实际上是搞调查），我了解到战士们的爱好和特长，如有的会说大鼓书，有的会唱家乡小调，有的会唱地方戏。发现这些人才，我就深入到各班把能说会唱的组织起来，同时根据战士最喜爱的文艺形式新编了一出

说唱剧《张先生讨学钱》，找两个战士演。在他们练兵结束时开了一次连队文艺晚会，差不多各班都有节目，内容丰富极了。这是连队创建以来第一次兵演兵的文艺晚会。由于内容他们懂，形式又喜闻乐见，所以战士们很喜欢看。我也第一次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后来团政治处还把我开展连队文娱活动的方法，向其他连队介绍。

三十九团工作结束后，我们又深入到三十八团一营。三十八团是一个能攻善守、战斗力很强的团队。当时在边区很有名气，曾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而一营又是该团主力营，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该营营长竟是我本家哥哥周子怀。他打仗勇敢，负伤多次。我们兄弟见面分外高兴。他就叫我们住在营部，并派一通信员照顾我们的生活。白天我下连队开展文娱工作，搞调查研究，晚上回营部和他聊天。从他讲的战斗事迹中，收集创作素材。他曾向我讲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大义灭亲的真实故事。他本来还有个弟弟，小名叫黑子，在家被国民党抓壮丁拉去了。后来当上了国民党部队的一名连长。那时周子怀也是我军连长。1940年春夏之交，我们部队要通过一个封锁线（实际上是一个山寨子），碰巧这道封锁线，就是周黑子带的一连人把守。为了避免伤亡，领导就派周子怀去劝说他弟弟让开一条道好让我军过去。可是周子怀怎么劝说弟弟，他就是不肯。硬是要兵戎相见。提出：“你共产党有本事就打过去，否则别想通过我这个路口。”说罢举起手枪朝天哗哗打了一梭子，向周子怀示威。周子怀一气之下也想拔出手枪还他一梭子，可一想我们的子弹来之不易，不能赌气浪费。就大声向周黑子吼道：“你听着，小黑子！我三天以内要不把你这个破寨子攻下来，就他妈不是你哥！”结果当天夜里，他带着部队攻进了寨子，周黑子看势不妙就狼狈逃窜。我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我说这个事迹太好了，我把它写个剧本怎么样？名字就叫《两兄弟》。可是他坚决不同意。这件事一直埋藏在我心

里，很遗憾过去没有把这个剧本写出来。

在三十八团一营，我收集了一些民歌和战斗小故事，春节时又组织战士自编自演小节目，很受战士们欢迎。这次深入连队生活，我体会了战士们的思想感情，了解到他们的爱好，熟悉了他们的语言，这对我以后的表演和创作，打下了很好的生活基础。

四、到农村去参加组织人民大多数

1944年2月，边区党委决定在根据地组织人民大多数（以下简称“组大”），并以礼（山）南县安来乡作为“组大”试点，由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同志亲任工作队队长。这是当时边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目的是组织起二百万人民，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接新的任务，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组大”试点乡的干部是由党、政、军、群临时抽出来的。我有幸也参加了“组大”试点。

我的工作组长是边区行政公署秘书长陈守一同志，加上一位姓朱的同志，三个人负责一个保的试点工作。领导要求我们吃住都在老乡家。记得我是扎根在一家孤儿寡母家。她家缺少劳力，白天我帮她在地里干活，晚上召集老乡开会。宣传团结起来搞生产，要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农救会等组织。但是群众对这些组织不积极。我一调查，原来有些比较富裕的户，不愿和劳力弱的、家中穷的搞互助，怕吃亏。针对这一情况，我采取把他们认为是穷的、劳力弱的几户先组织起来互助作为试点。当时正是锄草农忙季节，在春锄时这个生产互助组很快就把麦地锄完了并立即转入了追肥。而那些单干户还在慢慢地锄草哩。我抓住这一事例，再次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如果大家怕吃亏，可以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经我这一讲大家都赞成。很快自找对象组成

生产互助组，大多数都是三五户为一组。没几天生产互助组全都组织起来了。

生产互助组搞起来了。我进一步组织变工队（也叫换工队）。就是在农忙时，哪个组农活忙不过来，可以组织各互助组之间的换工。同时让大家公认：人工和畜力换工的等价。组织起来的变工队，为4月份割麦插秧大忙季节打下了组织基础。

生产互助和换工使农民们尝到甜头，我的工作转入了社会组织活动：开办了农民识字班、组织农救会、妇救会、成立了儿童团。教他们唱歌、放哨。儿童团在安来乡成立农救会时，还表演了节目，受到“组大”工作队队长陈少敏同志和开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但是正在这时，当地群众和边区首脑机关却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患病时头晕、呕吐、四肢无力。蔓延很快，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和“组大”工作。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边区卫生部门要求工作队同志都学会扎磁针抢救病人，即用碎磁片砸成针尖状，在患者舌根青筋部刺破，放出乌血就好了。我学会这个土办法，曾为老乡们治愈过不少患者。保证了农业生产和“组大”工作的进行。

两个多月的“组大”试点工作结束了。下一步是在边区全面铺开。这一次我们文工团全体参加。集体分到陂安南中心县，加上当地干部组成“组大”工作队。由县委书记任士舜同志亲自领导。

开始我被分到“组大”第一线，但不久就调回县委“组大”办公室，和文工团王之铎、朱大才同志一起编印“组大”快报，主要任务是传达“组大”工作指示、交流“组大”工作经验。王之铎是总编，我负责组稿和刻版，朱大才负责油印和发行。快报虽不定期，但领导要求出版及时，我们几乎五天出一期。尽管战争年代条件差，我们有时还出套色版。后来文工团搞美术的姚文

光同志也来了，不时加上一些漫画，使小报更活泼生动，受到工作队同志们的赞扬。

在“组大”工作中，文工团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不论是演员还是搞创作的，都有很大收获。特别青年音乐家邓耶同志创作了很有农民生活气息的《农救会会歌》。歌词通俗易懂，富有号召力。曲调又是民歌形式，唱起来顺口流畅，自然和谐。如再配上锣鼓乐器，更显出浓郁的地方色彩。这首歌对动员农民参加农救会，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但是文工团没想到在这里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我们的青年音乐家邓耶同志，不幸在游泳中牺牲。其实邓耶的游泳技术是很好的，参军前常常邀游长江，这次却因跳水撞到水下石头。当时我们有好几个人在场，见他好久没上来，感到不对，我立即扎一个猛子下水，发现他躺在水底不能动，就一手挽住他的腋下游了上来。“快点！邓耶出事了！”我大声叫起来。唐振元立即帮我把他抬上岸。此时发现他的后脑有一血洞，鲜血直向外流。腹部也鼓鼓的，便立即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他的伤口已大量进水，怎么也抢救不过来了。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了我们，牺牲时年仅22岁。全团同志无不失去一位战友，失去一位年轻有为的音乐家而痛心、惋惜。他去得太早了。由于天气炎热，尸体不能久放，当即买了两丈白布、一副棺材，由我亲手用白布把邓耶的遗体裹起来抬进棺材，掩埋在出事地点的土坡上。坟前立了一个木牌，写上“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文工团员邓耶同志之墓”。邓耶（原名邓承富）生前非常崇拜音乐大师聂耳，为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邓耶。意思是取聂耳的姓作为自己的名字。（音乐家聂耳有三个“耳”，邓耶也是三个“耳”）。说也奇怪，音乐家聂耳也是二十二岁时游泳牺牲的。但还应该提到，聂耳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乐章，而邓耶同志也给边区留下数十支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另一件事是文工团担任剧务的丁可人被师政锄奸部逮捕了。原来

他是打进我部的一个特务。就在搞“组大”工作时，他多次给敌人送情报。此事使文工团同志们大吃一惊，我们真没想到一个平时表现不错的小伙子竟是一个特务。这使我想起来我们在舞台上演戏时，总是把特务、反革命分子化装得不像个人样，叫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坏人。眼前的事实，对我们公式化的化装和表演是一个极大讽刺。试想如果特务都像我们舞台上表演的那样，那么他一走进解放区就会被识破抓起来。

两个多月的“组大”工作基本结束。收尾工作由当地干部负责。我们文工团全体撤回五师政治部。

五、文工团充满生机的时刻

文工团经过了以“讲话”为主旨的整风学习，又经过下部队、到农村的体验，好像擦了油的机器铿锵运转起来。在文艺工作指导思想上，首先是大型话剧基本停演了，接着而来的是自己创作的独幕剧《张大发的转变》、配合整风任务的《反贪腐》以及反特斗争的《民哨》、《一条腿的战士》等，广大工农兵不仅看得懂，也深受教育。在音乐上，邓耶生前创作的《农救会会歌》、《今年打败希特勒》；周辛谱写的《明年打败小日本》等都是很流行的歌曲。与此同时，楚剧队也创作演出了《长沙沦陷记》。它反映的是日军南下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失守长沙的故事。这是豫鄂边区最早用现代题材写的楚剧。它从台词、化装到表演技巧都作了突破性的改革，很受观众欢迎。我认为这个时期是五师文艺工作的黄金时期。

1945年1月，三五九旅到达边区。兄弟部队兴奋地会师在大悟山下。为庆祝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周辛同志谱写了一首《南北大会合》。歌词大意是：“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大

会合，军民共欢腾！这是我们喜庆的日子，我们心中多快乐。”这首歌表达了当时边区部队喜悦的心情。

三五九旅的到来，为豫鄂边区传播了陕北秧歌剧和秧歌舞的文艺种子。从此《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钟万财起家》等著名秧歌剧在边区广泛流传。老大哥为丰富边区的文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下支队来边区前，文工团进行了整编，我被调到抗大十分校宣传干部班学习。作为五师文工团团员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司令部生活的片断回忆

汤正义

1943—1945年间，我在五师司令部情报处三科任书记。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收听境外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1945年8月末的一个夜晚，我收听到东京广播电台用华语广播的一则共同社消息：苏联红军在卢龙方向越过长城向南推进。第二天早晨，我将这一消息连同当晚收听到的其他消息一并整理成简报交给科长黄涛若同志。过了一会儿，处长吴若岩同志手拿科长刚送去的那份简报来到科里，指着前面提到的那则消息问我：“这则消息原话是否这么说的？你有没有听错？”我不知道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便含糊地回答说，好像就是这么说的。吴处长说：“苏美两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定了彼此在远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分界线，在我国大陆以长城为界。可是现在又说苏军越过长城向南推进，这是怎么回事？”吴处长还说：“任政委很重视这则消息！要我们跟踪收听有无后续报导。”后来，与此有关的后续报导果然未再出现，任政委也未再过问此事。但我却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师首长十分重视我们所提供的每件情报，以及任政委本人非常富有国际问题素养的明确信息。以后工作，更加认

真，力求不出差错。

吴处长经常教育我们说：“不要小看听广播的工作，它是我们获取战略情报的重要渠道之一。”听广播，在和平时期，也许首长自己就能做。但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在技术条件十分低劣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很难，必须指定专人去做。我们用于完成收听任务的工具是一台缴获来的笨重的8个电子管的家用收音机。所使用的电源是由数十节手电筒，用一号电池组装起来所产生的直流电。这些电池是侦察员和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购买来的，必须十分节省使用。行军时这些东西要请民夫挑着走，扁担的一头放收音机，另一头放油印机和电池。到达驻地后要上房架设天线。没有天线或天线不够高，收听效果就差了。

当苏德战场战事正酣之际，某天，吴处长拿着一张英文版的苏联西部地区图来到科里。他说这张图就放在我们科里，由我保管。这张地图只有八成新，是舶来品，印刷较国内产品精美。在那个年代，一般人要想弄到这么一张地图很不容易。吴处长没有把它留在自己手边，而是交给我使用，说明他对我在业务上的成长寄予期待。我一边查看地图，一边整理给首长看的新闻简报，对情报工作的兴趣日渐浓厚。

提到地图，我还回忆起另一件事。有一天，吴处长命令我到陈大姐那里取一张上海市街图。这是为向美空军联络组提供的一份情报绘制附图所需用的。陈大姐把地图递给我，笑眯眯地说：“用完后别忘记还给我。”看得出，陈大姐对地图也有特殊爱好。而且，这张图是她早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收藏物，对她有纪念意义。我连声说：“是，是。”但是，回来后吴处长却说，这张图就留在我们处里，不还她了。我争辩说，陈大姐说过，她还要！吴处长说，甭管她。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是，后来见到陈大姐，我发现她早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司令部工作期间，我得以多次聆听李先念同志的教诲，使

我获益匪浅，终生不忘。

李师长经常教育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做参谋工作的人要学会当无名英雄，牢记自己做助手的职责。打了胜仗，那是首长指挥有方。打了败仗，那是你做助手的人没有做好工作。”我不是参谋，但我认为，师长关于参谋职业道德的谈话对我本人也是适用的。对于一个投身革命的人来说，能给像李师长、任政委、刘参谋长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当助手，或者只是助手的助手，这确实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成为合格的助手，并非易事。

李师长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对司令部的干部战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做队前讲话。

一次，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到达新驻地，地方很穷，村子很小，天色已晚，天气很冷，还有将近半数人没有住进房子去。李师长视察阵地后回来，刚一下马，就命令重新集合队伍，他要发表讲话。李师长说：“有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有牛棚，就住牛棚；有马棚，就住马棚。今天，我们给你住马棚、牛棚，明天，我们解放了城市，就让你住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李师长是在告诫我们，革命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

还有一次，边区遇到财政困难，部队没有钱买粮食蔬菜，便发动战士采野菜、树叶充饥。有一天中午，司令部吃蒸槐花。这槐花当然不是城里人吃的又鲜又嫩的那种。这天送回伙房的剩饭比平日显著地增多了。第二天，早操结束后，李师长又发表队前讲话。他说：“我奉劝各位，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你不吃，就没有力气，就不能工作，不能走路，不能革命！”诚然，司令部的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他们每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但是，有时有人也会淡忘，需要别人善意的提醒。只要一提到革命，那就什么困难也不在话下了。不管多么难以下咽的食物，都

能有滋有味地吃下去。

在李师长的严格要求下，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较大的进步，成长为具有较高阶级觉悟，较强组织纪律性，能吃大苦、耐大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无尽的思念 难报的恩情

仲 平

我是个独生女，家庭环境还可以，但我当年的生活和今天的独生子女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因为日本鬼子侵入我国，为了赶走他们，1940年，我才12岁就告别了父母和家园，投身抗日队伍。先是当宣传队员、文工队员，后来到实验中学学习。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吃的是包米糊糊煮萝卜，长年累月几乎不知鱼肉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课堂。哪里离敌人远，比较安全，学校就搬到哪里。没有课桌、没有凳子，我们随处坐在背包上就可以上课。哪天敌人不骚扰，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完成当天的课程。

1943年敌人“扫荡”我豫鄂边区，学校迁往黄冈滨湖咀、张道湖沿湖的村落，分散隐蔽到群众中去，分班或分组上课学习。初夏的一天，我们部分人正在禾场上听老师讲课，忽然校领导匆匆赶来说：“接到情报，敌人出动了，正向我们这个方向赶来。”校领导要我们立即分散，和群众一起离开。

我和同学周芬抓起背包就随人群一起来到一个小村，实际上

这里算不上什么村子，它只有一个祠堂。祠堂里只有一户人家，住两间小屋，3口人：一个50来岁的大婆、一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在小村的前面有个名叫桃园的大村。大村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此时已过晌午，大婆见我们是新四军，还没吃饭，就连忙烧水下面疙瘩。边做饭边说：“这里是个破祠堂，目标小，日本人不会来，你们不用再跑了，要是不行，我家还有条小船，可以送你们走。”见大婆这样好，她的话又很有道理，我们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吃罢饭，我们来到门外禾场坐下，拿出课本复习功课。此时太阳渐向西斜，已近黄昏了。忽然背后传来小姑娘的声音：“你们看哪，那边来了好多船！”我们回头一看，果然有10多条船正向桃园村驶去。距离太远，又近黄昏，我们辨别不出是什么队伍，只能看见穿的是黄军装。周芬认为我们的部队都穿灰军装，这些人是不是伪军？而我却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比周芬多参军两年，经历比她多，就不以为然地说：“那可不一定，我们的部队也有穿黄军装的。”

船在桃园靠岸了，那群人向岸上狂奔而去，这时我们才看清一面太阳旗低垂在斜阳中。这是日本鬼子和伪军！而且还有三四条小船的伪军未上岸，向我们这里一直开来。现在我们是插翅也难飞出去了。但我们不能等死，要想想办法。我们提起背包和挎包，奔向草堆，但草堆太小，藏不下我们两人，我们只把背包、挎包藏了进去，然后飞奔进屋里，但两个小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们躲藏，只有一张大床紧靠后墙，我们立即相互帮助着钻进床底下。仅隔两三分钟，我就听见一声子弹上膛的咔嚓声，接着传来一声大喝：“你是新四军吧？快投降！”

“我不是新四军，你看，我有良民证。”年轻人回答道。

“你这里有隐藏的新四军吧？！”

“我这里没有，没有新四军。”

“你不说老实话，老子打死你。”接着就听见伪军殴打人和年轻人痛叫的声音。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差不多快从喉咙眼里跳出来了。

“老总呀，我们这里实在没有新四军呀！”年轻人毫不动摇地回答道。

“你说，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年轻人痛苦的呻吟着，但却坚持着说：“没有呀，实在没有呀！”

“你还不说，我要你的命！”

此时一阵滴滴哒哒的号声传来，日本鬼子的集合号声吹响了，这些家伙这才放开年轻人集合去了。

我出了一口长气，紧张的心逐渐松弛下来，以为危险终于过去了，正想从床下钻出来，突然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传来，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大叫道：“有两个女匪到哪里去了？”

“这里哪有两个女匪呀！”还是年轻人的声音。

“妈的，你还不说实话，这不是她们的东西吗！快说，你再不说，可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我大吃一惊，看来这些家伙搜出了我们藏在草堆里的东西了。我的心紧张得快停止跳动了，看来这场祸很难躲过了。我紧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

“老总啦，我们确实不知道这里有新四军的东西。”

“你着看，这包袱里不全是女匪的东西吗？你还敢不承认，老子崩了你！”匪军大声吼叫。

“我们实在没看到，说不定是她们路过这里，看到你们要来，丢在这里的吧。”年轻人死不承认。这些伪军一边用皮带、枪托拍打年轻人，一边审问。但任这些匪军如何凶残，大婆和青年俩就是不说。这些家伙急了，就派出几个人到屋里来搜。现在天已经暗下来了，屋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俩又屏住呼吸，一点声音也没有。伪军便着急地大叫：“快点灯！”

“我想这下完了，做定俘虏了！此时我心里猛然升起一股豪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死又何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丧失党员气节。如此一想，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静待其变。

“老总啦，这里实在是没有新四军，你们要是搜出来，把我的头砍下来……”

“哒哒哒……”这时响起了日寇的第二次集合号声。年轻人的话还没说完，这些家伙就急急地赶回小船撤走了。

待船去远，大婆叫道：“同志快出来吧，鬼子走了，没事了。”我们从床下爬出来，看见大婆紧张后松弛下来的面容，看见年轻人遭毒打后留下的伤痕，一阵感激的热浪涌上心头，这次我们能够死里逃生，多亏了他们拼死相救。我深深地感受到，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再生父母。

虽然我们逃过了劫难，但却和学校失去了联系，这家人又用小船送我们去找，最后终于把我们送到了校部。

当时我们毕竟是年轻单纯，竟然没有问清大婆一家的姓名和这个小村的名称，以致后来无法联系。

之后，动荡的环境，紧张的学习、工作，中原突围，我无暇去寻找、探望救我性命的一家。全国解放后，我进了城，甚至调往南方大城市——广州工作，远离这一地区。尽管我常常思念他们，但工作繁忙，经济上也不允许，无法前往看望。想要写信问候，又苦于没有地址姓名，至今我仍深感愧疚。离休之后，终于有时间和条件了，1992年，我和老伴及几位战友重返这一地区。当我们踏上这阔别半个世纪，亲切而又熟悉的土地时，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举目四望，故地已是旧貌换新颜了，往日湖水淹没的地方已成万顷良田，绿油油的秧苗正茁壮成长，祠堂也已消失，这户人家已不知去向。屈指计算，大婆该已年过百岁，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遗憾地仰望长天，默祝已逝者好好安息；在

世者健康幸福！这英勇顽强的一家。他们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曾激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他们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永志不忘。

一首拨动心弦的歌

——《新四军里真快乐》

张育英

从1943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前，我一直在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团学习和任教。

这是一座特殊的战地学校，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日子。每当部队集合的时候，或是在行军的路上，不论是连、排级干部队、还是班级队、地方干部队、外来军官队，总是此起彼伏地高唱战歌。激昂的情绪传遍了乡村原野、学校营区，感染着每一个军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等，一个接一个，纵情高歌。

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首用民间曲调谱写而成的歌《新四军里真快乐》，它是拨动军民心弦的歌。

根据回忆并经我当时同学同事蔡忠同志核对，现将我们教导团在传唱中略有改动的其中两段歌词，抄录于下，以飨读者。对于原词曲作者，我当时不知道，也无从查考，现在知道是冷新华词、翟民谱曲。

（一）新四军里真哪真快乐，吃穿平等津贴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呀，同志！好话向你说呀，生活真快乐。

(二) 个人学习进哪进步多，部队巩固越打越“发作”，黑夜快熬过呀，同志！胜利属于我呀，快乐不快乐！（注“发作”即发展）

这首歌，歌词朗朗，脍炙人口，催人奋进，通俗有似童谣。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它起过很大的而且是多方而的作用。

首先，经常用心传唱这支歌，对于鼓舞士气、巩固部队，潜移默化地起了教育作用。歌词说的是部队实情，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做的，职务不同津贴待遇一样，大家深有体会，看得见摸得着。

其次是起到了动员青年参军的作用。我们整天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几乎吃、住、上课、学习、娱乐都在老百姓家里、场院，甚至一块劳动、一块唱歌，军民一家人。长年累月、耳濡目染，青年人受到感染，纷纷要求参军。

再次，对于被俘或投降起义人员，也起到了教育感化的作用；在战场上唱歌、宣传喊话，还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事实就怕对比，对比就可鉴别。我军官兵平等，不打又不骂。国民党部队打骂、捆绑、关押、体罚等，那是常事，抓住逃兵就枪毙。两军对比，一目了然。

教导大队——团，从第一期办到第七期，来自襄南湖泊、江汉平原和鄂东、鄂西、山区的学员两千多人，他们在毕业之后都带着这支歌，回到原部队，原地区传唱、工作。

从八路军到新四军

常志义

我所在部队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所属的第八团。1944年我在该团任参谋长，1945年1月中央决定冀鲁豫派一个团南下，开辟豫中以打通八路军同新四军的联系，军区决定这个任务交给我团。

当时豫中地区日伪顽互相勾结，形势犬牙交错，日寇控制着平汉、陇海铁路和商丘漯河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及沿线城镇，伪军第三十二军郭受天部盘踞在黄河西岸鄆陵扶沟一线，国民党第五战区所属十二军霍守义部则猬集在项城以南地区。我们要插入敌人心脏，开辟新的根据地，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是久经考验的部队，指战员信心还是很强的。

部队作了几天的准备后即沿黄河故道向西南进军，经过近20天的长途行军，于3月27日晚越过了陇海铁路，次日进抵杞县东北水东分区。为了保密，部队代号为一二八部队，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政委袁振同志当天下午即赶来看望部队并决定配合分区武装拔除深入我根据地中心的伪军据点河堤岭。此镇位于伪“模范县”睢县城南，驻守着孟照华保安大队共500余人。孟部

原是土匪武装，为日寇收编，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乡亲们恨之入骨，29日分区部队攻击未克。30日晚我团参加主攻，在分区部队配合下，一举攻下河堤岭，全歼孟部，取得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仗不仅扩大了根据地，而且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声威，逼使盘踞在我根据地周围的日、伪、顽部队龟缩在据点，不敢轻举妄动。

战后，部队转到围镇休整，团领导紧张地研究渡黄河的具体计划。要顺利渡过黄河，必须（一）扫清伪顽军，控制黄河沿岸；（二）查清河西情况，选择渡河点；（三）准备好船只。

太康县西北彭庙、叶寨一带盘踞着泛东挺进军所属第五纵队及太康县保安武装2000人，扼住我南进咽喉要道。他们一面同日、伪暗中勾结，搞所谓“曲线救国”，一面对我根据地大举蚕食捕杀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挺进豫中，开辟新区，就必须首先吃掉这只“拦路虎”。于是我们开始了针对性的敌前练兵，在军分区的配合下，我团于22日（除夕）黄昏时分，突然将其包围，一瞬间，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在敌寨内开花。经过两三夜的激战，彭庙、叶寨守敌被我悉数聚歼，无一漏网，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泛东挺进军中将总司令张公达和第五纵队少将司令耿明轩乖乖地做了我们的俘虏。这是我们路过陇海路后取得的第二个胜利。这一仗使扶沟、陈留、通许一带的日、伪、顽游杂部队闻风丧胆，连夜逃过黄河西岸。这样，从西华到尉氏一段河岸被我牢牢控制。为顺利渡过黄河奠定了基础。

为查明河西情况，选择渡河点，根据军区指示我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党员王明章同志的掩护下，潜入河西实地侦察。我们经过淮阳，该城驻有日军一个联队，我们当夜住在驷马大店，第二天到黄河渡口。日寇检查很严，我们为了到逍遥镇收买伪军，在自行车内藏了一些大烟土，敌未查出。过河后，第二天到达道

遥镇，我在王明章家中住了 20 余天，把敌、伪、顽部队的番号、驻地、兵力等情况全部查清后返回部队。为了选择渡河点，副团长王定烈带领侦察参谋胡景星同志亲自作了一次侦察，最后确定吕潭东南作渡河点。难题是没有船只。

扶沟县吕潭镇是吉鸿昌将军的故乡，吉将军因力主抗日，被蒋介石杀害。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团党委决定，3 月 19 日在吕潭镇召开一次追悼吉鸿昌同志大会，慰问烈士家属，并拨出部分粮食、物资救济贫苦群众。我们为了表示继承烈士遗志，将部队代号改为吉鸿昌部队。这样我们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信任和支持，一些群众提供了船的线索，果然走了一二百里找到了 5 只小船。

但光凭这 5 只小船，在短时间内把部队全部运过黄河是不可能的。为防止敌人援兵早到，避免敌人白天派出飞机轰炸扫射，遭受无谓伤亡，我们决定夜间偷渡，把敌人控制的 20 多条船夺过来，以便在白天前完成抢渡任务。5 月 12 日下午，连以上指挥员集中到渡河场察看了地形、水势，并和向导一起研究了风向、流速和登陆点。

一切准备就绪，黄昏后，五连长冀述礼（代理营长）和六连长张四泉率领五、六两连登陆直取对岸，五连一排直指敌船停泊点，其余主力直捣敌据点，船民们一见是八路军过了河，不由的悲喜交加，说：“你们可救了俺们的命了。”他们听说还有大部队等着过河，立即扬帆东渡，迎接等待过河的部队去了。

这次神速般的渡过黄河，在豫中地区曾一时传为佳话：“八路军是神兵天将，一夜就飞过黄河。”是的，是人民群众给我们插上了搏击风云，翱翔九天的“翅膀”。

豫中的大门被捅开了。

我们过河之后的首要任务是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张坦然是西华县自卫团长，驻扎在砖桥镇，控制着西华县西南方圆数十里

的地盘。他是个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刽子手，无恶不作的地头蛇。

团领导同志商量决定除掉这个“心腹之患”。我部队只经过20分钟的战斗，就攻破围寨，生擒张坦然。我军乘胜追击，星夜奔袭，连克18个围寨，缴枪600余支，“地头蛇”被铲除了，群众拍手称快。战斗一结束，我们立即宣布西、上、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从此我们有了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

在这之后，我率第四连通过上蔡和平汉路之间的封锁线南下，和新四军五师汝、蔡遂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协助打掉一个保安大队。回来后又带两个连把我团（小后方鞋工厂）送到汝南西。

此时正值麦收季节，我们一面休整，一面帮助群众收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队，根据地迅速扩大。

6月初，何柱国纠集霍守义部几个正规团，以及上蔡、汝南、商水等5个县的保安大队，约14000余人，杀气腾腾地向我根据地扑来，情况相当严重，敌十倍于我，且我有半数兵力在掩护开展地方工作，能够集中的兵力不过5个连，敌众我寡。我们执行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绝不退让，坚决还击，保卫根据地。我们速战速决，当晚一营进攻，二营打援。战斗一开始，二连战士如猛虎下山，一阵狠打猛冲，很快攻进村庄，歼灭敌人一个加强排，抓了40多个俘虏，正当三连组织再次冲锋时，敌人点燃了村边麦垛，霎时间火光冲天，耀如白昼，我为避免打成消耗战，立即撤出了战斗。

敌人受挫后，放慢了进攻速度，我们乘机避实就虚，决定钻到敌人后面，以挖心战术偷袭贾寨。拿下贾寨不仅可以牵制霍守义的正面进攻，还可以为我补充粮食弹药。

我攻寨部队行程60里，越过敌人防线，迅速接敌。仅30分

钟，就结束战斗。全歼商水保安大队，生擒大队长朱占彪。天明后敌集中数千人，配以山炮数门将我团团围住，战斗终日，我凭借原有工事，打退敌人5次进攻，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突围而出，满载战利品绕回我区。

霍守义见正面不能取胜，便暗中策动盘踞在五沟营的伪暂编第八师从我侧后方骚扰，于是攻占五沟营就势在必行了。我们趁霍守义不敢贸然向我正面进攻之隙，突然掉转身挥戈西指，奔袭五沟营。敌人万万没料到我在大敌当前时还会走这一着“险棋”。待敌人警觉过来，我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五沟营。全歼伪暂编第八师800多人。

此后，我们又连续进行了逍遥镇、张明、邓襄寨、肖潭、十里园等一系列反日、伪、顽蚕食的大小40余次战斗，粉碎了日、伪、顽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我军越战越强，部队扩大了一倍多，发展到2900多人，并拥有了约4500多平方公里，近100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为我主力进军中原建立了巩固的桥头阵地，和皖西、豫南、嵯峨山、伏牛山根据地遥相呼应。

“八·一五”日寇投降了，蒋介石派高树勋的新八军、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向我区扑来，冀鲁豫军区电令我回华北邯郸集中，适逢大雨，黄河泛滥，大小渡口都被冲掉，只有扶沟一个渡口。我即向扶沟疾进，政委李士才率前卫营，主任杨劲率本队、王定烈和我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跟进，当我们到达扶沟附近时，扶沟已被曹福林部一个团占领，李士才带领少数人渡过黄河回华北，我们渡河无望，王、杨和我三人商量后一面电告军区一面向新四军五师前进。经过7天7夜的奋战，打了13仗，突过了平汉路，渡过汝河等，到达嵯峨山地区，司令员黄霖、政委粟在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部继续向桐柏开进，当我团进到桐柏后，王树声同志率豫西部队也到达桐柏，李先念司令员把王部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我团编在一纵二旅改为四团，王定烈任团长，杨劲

任政委，我任副团长。从此我们就成为新四军的建制，接着我团在程家河消灭了川军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连。部队又东进越过平汉路在朱堂店歼敌正规军一个营。而后继续东进在河南省光山县消灭敌一个保安团。此时中央通知停战，在原地不动，敌人十五师趁机抢占了光山县城。我们和该部隔河相对，对峙半年。光山县当时很穷，吃粮困难，部队吃野菜、树叶，买了些白布拿稻草染了做衣服，材料不够，裤子只做半截，战士们开玩笑起了个名叫“二裤子”，我们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待了半年。

1946年6月26日，中原部队突围，一纵队预定从平汉路王家店突过封锁线。7月1日清晨，纵队刘昌毅副司令指挥七团为北翼，我团为南翼浴血奋战，摧毁敌碉堡数十座，击退敌装甲车，撕开一条血路使纵队机关安全通过。随后，我团又完成了掩护纵队机关渡过襄河的任务，进入鄂西北。在谷城县石花街苍峪沟我团遭敌六十六师一八五旅五五三团阻击，驻石花街的敌人两个营也截击我后卫部队七团、九团，我团在五团和十五旅四十四团的配合下，七团在九团配合下，激战3小时，将敌击溃，歼敌300余人，缴获甚多，这是进入鄂西北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石花街战斗后，接中央电令，我突围部队就地展开，停止西进，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中原突围即告结束。

中原突围，我团从光山出发到停止西进，经历了37个日日夜夜。前后担任5次后卫，5次前锋，前后开弓，打得英勇顽强。可是，也付出了600余人的代价。其中：牺牲负伤者200余人，因疟疾、痢疾、体弱而无法随队者400余人。但是没有损失一班一排的事情。把全部精华都保存下来了，武器装备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多，不少干部战士变成了“双枪将”。较好地落实了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胜利完成了突围任务。

星光灿烂

任宁芬

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已过去 55 年了。回首往事，当我遭遇国难、家难，正在痛苦中挣扎时，新四军五师，犹如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把我引向光明。

童年幻想的破灭

我祖籍湖北黄陂，1930 年 10 月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任鹤宾，当时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母亲郭显恩，这时已辞去教师职务，闲居在家当官太太，整天在交际场中应酬。家中有听差、老妈子、奶妈等服侍，我一出生就过着优越的小姐生活。幼时我生性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在兄弟姐妹中深受父母宠爱。父亲闲时总爱给我们兄弟姐妹讲三姑娘的故事（姐妹中我排行第三），故事中的三姑娘最乖巧、能干，话语中流露出对我的格外关爱。父亲还会看相，他看我的手纹，说我将来会掌印，当大官。而我从小喜欢文学，识字后读了不少文学作品，特别崇拜冰

心、丁玲，幻想将来当个女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任湖北省京山县县长。他主张积极抗日，我至今还依稀记得父亲曾骑马带着我去修建飞机场的工地视察。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政策，武汉失守前，即率全家隐退还乡。

抗战形势日益紧张，人心惶惶。不久武汉失守，我姑父（京山县政府财政科长）被日机炸死，姑母带着女儿投奔娘家，外祖父一家五口也从武昌奔赴我家避难，家庭人口骤增。这时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抢劫，由于父亲喜好藏书，回乡时运的许多箱子都装满了书，土匪误以为是金银财宝，逼着父母要钱，拿不出钱，便把父亲打得死去活来。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六妹，藏在桌子底下，土匪开枪威吓她，幸亏母亲沉着没有动，子弹打在桌子腿上。后来母亲陪伴父亲躲在深山亲戚家养伤，我们兄弟姐妹跟着叔婶到处“跑反”。

日寇占领黄陂县城后，地方成立了维持会，日伪军驻扎在县城里。驻军师长是父亲过去的同学，一再威胁利诱父亲出来当汉奸，被父亲严词拒绝。他每次来“拜访”父亲时，父亲总是用黑纱巾缠头装病。后来他派手下一个姓周的营长以绑票方式把父亲抓到县城，他下阶亲自赔罪，说他不知此事，是手下人胡作非为，并把周营长枪毙了，企图以这种方式软化父亲，父亲仍坚持不从。母亲为了救出父亲，变卖了田产，并请当地乡保以及士绅出面将父亲赎回。

遭此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由原来天真烂漫充满美好人生幻想的少女，一落千丈，如坠深渊。感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均无希望，于是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看破红尘，吃斋信佛，一心想出家当尼姑。

投奔新四军

父亲从绑匪处赎回的当天，便连夜带领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投奔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早在大革命时期，父亲即与共产党有联系，与董必武等革命前辈有过交往，我堂伯父任建岳是烈士，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杀害，父亲为他料理后事，并收养了他的儿子任大庸。抗战初期在京山县当县长时也掩护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因此，父亲到豫鄂边区即被聘为边区参议员，和李实同志一起从事边区教育工作，并把我哥哥任伯黄送到洪山公学学习。当时我和两个姐姐也要求去，父母考虑我们年幼，又是女孩子，加之环境动荡艰险，放心不下。我们只好留下，在当地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如参加儿童团、宣传队，办冬学教农民识字等。根据地的火热生活重新激起我生活的热情，我眼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许多革命道理我虽然不懂，但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如黑夜中闪烁着一颗耀眼的星，我向往着光明，恨不得立即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时任黄陂县县长的任士舜是我同族人，县委书记是位女同志，人们称她孟（昭毅）政委，当时的边区首长记得有高云辉、孙西歧等，他们都来看望过父亲。李先念师长也来过，母亲曾做了一碗鸡汤粉丝，李师长吃了赞不绝口。在闲谈中，李师长夸我母亲有文化，很能干。武汉解放后，李先念同志亲自提名动员母亲出来参加了工作。当时许子威主席的夫人易齐萍、周志坚旅长的夫人肖杨等，都曾在我们隐蔽的山村里生孩子，日寇扫荡时，母亲帮助把他们转移到峡谷山洞里隐藏。

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父亲是减租减息委员会顾问。黄陂县最大的地主姓鲍，鲍家二房的鲍汉杰比较开明，为了贯彻执

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聘请他为边区参议员。大房主事的叫鲍余生（鲍汉杰的伯父）为人苛刻，外号“草不生”。父亲与他们时有来往，并利用个人关系做统战工作。有一年春节，鲍家邀请父母做客，父母把我带去了。鲍家庄园很大，房子很多，我们在鲍家住了一段时间，大人成天打麻将，我和鲍汉杰的几个女儿在一起玩耍。鲍余生的女儿嫁到孝感县大地主石家，她和石家的一些人当时也住在鲍家，由她做媒把我许配给他石家的侄儿，小名小四。于是当我们在一起嬉戏打闹时，鲍家的小姐妹们常开玩笑起哄，边跑边喊“小三，小四结成一对”。

1943年，边区政府为了扩大影响，吸收当地青年人学，把原来的干训班改为黄陂中学，教导主任是女共产党员陶静。父母把我们三姊妹送进黄陂中学学习。除原干训班的学员外，有许多当时边区干部子女，如副县长魏天一的侄子魏叔康、县政府财政科长的女儿陈鑫声（现改名陈玲），县参议长的儿子任士舜（现改名任佐）等。

我三姊妹学习都很用功，进步很快。我写过一篇关于抗日的作文，老师阅批：“如万马奔腾，传阅。”同学们看了都说写得好。我逐渐成为学校的活跃分子，担任了学生会文娱部长，1944年还曾作为黄陂中学的学生代表出席边区学生代表大会。王震同志带领三五九旅南下到达边区时，我们排练了一个歌舞节目参加欢迎大会，大家边舞边唱：“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八路军，欢迎啊，欢迎啊，欢迎老大哥……”。暑假，我们组织减租减息宣传队，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减租减息政策。我参加打三盘鼓的演出。胸前挂着一面鼓，手里拿着鼓槌，边打鼓边唱：“打起了三盘鼓呀，口里唱不住呀，叫声老乡听清楚呀，我来呀诉说一段苦呀，咚咚咚，咚！……”

学校环境虽然相对稳定，但有时也会突然遭到日寇扫荡。有

次我们正在吃早饭，日寇悄悄占领了学校东南面的山头，架起了机枪。我们发现后扔下碗筷往西北方向跑，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我们跳到稻田贴着沟堤往山上跑，一个个气喘吁吁，枪声渐渐稀疏后，我们找了一个山窝坐下稍事休息，几个男同学下山探听消息。这时我们又饿又累，坐下便起不来。--会儿，几个男同学回来了，边跑边喊：“来了，来了”，我们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爬起便跑，其实是给我们送饭来了。有时日本鬼子突然进了村，我们来不及跑走，房东大娘就给我包块头巾，脸上抹上锅底灰，坐在纺线机旁装做纺线。我还学会了纳鞋底，认房东大娘做干妈，在善良的群众掩护下，--次次躲过险情，使我没有直接遭遇日本鬼子。有时对日作战，伤员比较多，我们便组织临时战地救护队，给伤员喂汤喂水、洗绷带，小河里的水常常被年轻战士的鲜血染红一片又一片。一次，我负责照顾一位伤员，夜里我还给他喂水，第二天早晨，这位战士却离开了人世，英勇牺牲了。这激起我对日寇的无比仇恨，也使我对新四军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无限敬佩。

这时的我，早已不再吃斋信佛，并坚决要求和大地主家少爷解除婚约。

化装突围北上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们欢喜若狂，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人们盼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毛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和平协议，以马歇尔为首组成国共双方三人调停小组，协调国共双方关系。经三人调停小组调停，把我们黄陂中学所在地区划归了国民党，学校被迫解散，当地同学回家，组织通知我们隐蔽待命。父亲和哥哥随部队去了四望山。这时国民

党军队常来我家骚扰，说我母亲是共匪家属，我三姊妹是“小四老板”（称新四军为四老板）。有一次他们把母亲抓走，关押在姚家集，叔叔们怕受牵连，不敢露面，幸亏母亲沉着应变，能言善辩，最后被释放回家。当时还感动了一位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军官，后来专程来看望过母亲。

1946年初，组织派人把我三姊妹接到宣化店，当时国民党已对中原军区实行蚕食政策，逐渐缩小包围圈，修筑了许多碉堡，我们白天不敢走，夜里由民兵护送辗转来到宣化店，分配到中原军区民主建国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几件事：

1. “三八”妇女节时，陈少敏大姐对女同志讲话，要求大家自爱自立，还批评了一些女同志。陈大姐在边区威名四震，敌人称她“陈大脚”，悬赏捉拿她，同志们非常敬佩她。

2. 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同志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黑茶山失事遇难，在解放区引起极大震动。我们非常惋惜和悲痛，专门出墙报悼念“四八”烈士。

3. 董必武同志到宣化店，我们在礼堂开欢迎大会，气氛很热烈，民主建国大学有位女同学登台朗诵了一首欢迎董老的诗。

4. 蒋介石撕毁和谈协议，企图消灭新四军，调集30万大军包围宣化店，形势很紧张，供给也发生困难。救济总署运来一批物资，有衣服、食品等。我分得一件枣红色羊毛衫。至今还记得救济总署送来的面粉充满汽油味，用这种面粉做的食品也有一股很浓的汽油味道。

5. 形势虽然日益紧张，但同志们精神振奋，对突围充满信心，文娱生活丰富多彩，锣鼓一敲，首长和我们一起扭大秧歌，我们还排秧歌剧，我参加《兄妹开荒》的排练。

点点滴滴的记忆，经过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洗礼，仍然珍贵地保存在脑海里，回忆起来仍然激情满怀。为了保存力量，减轻战

斗员负担，组织上开始动员安排老弱病残及一切能通过社会关系出去的非战斗人员化装突围。我父亲社会关系比较广，决定带我们兄妹化装突围。离开宣化店时有几名战士护送，组织上还给父亲配备了一匹日本马，加了一副担架。我一直想学骑马，但日本马太高，爬不上去，战士把我扶上去，他在前面牵着马走，我还是很害怕。二姐任汉芬正患牙炎，半边脸肿得像包子，只好用担架抬着走。一路上战士给我们讲战斗故事，我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有他们在，心里也不感到紧张。有天傍晚走到一座山脚下，山上突然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喝令：“站住”。我撒腿往后跑，担心走在后面的父亲出事。原来山上是自己人，这下可放心了，晚上用稻草打地铺，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北上解放区

回家之后，母亲去汉口买来衣料、鞋袜，为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旗袍，扮成去北平上学的青年学生。我们先到武昌，住在亲戚家里，父亲设法去办通行证。这时听说周恩来到了宣化店，经过谈判，国民党允许我们有 1000 名伤病员乘火车北上去其他解放区。我们弄到的是同乡会开的证明，声称北平光复，回北平上学。上车后，父亲乘坐客车厢，我们乘的闷罐车。夜里父亲身上带的证件和路费被窃，只好到郑州下车投奔我一个远房堂叔，他当时是刘峙部下的一名少校军官，由他想办法给我们弄到一张盖有刘峙司令部大印的证件，又筹集了路费，我们才继续乘车北上。这时父亲发现车上有两名穿便衣的国民党特务盯梢，示意我们不要与他们搭话，由他应付。同行的还有任士舜和他父亲任启衍。车上还发现从宣化店化装出来的王逸夫、杨琨夫妇，彼此心照不宣，装做不认识，到安阳下车后，同住在一个小驢马店里，

这时才彼此相认，交谈起来。第二天，我们九人雇了一辆胶皮马车上路，通过国民党最后一道关卡时，盘查的特别严。他们说前面是“共匪”管辖地区，要我们绕道上海去青岛然后去北平。我心情非常紧张，生怕他们不放我们走，谈了好一会，最后才放行。走不多远，看到我们的民兵在路边巡逻，查问后得知已到了我们解放区，兴奋得情不自禁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可回家了！

到磁县时，有关人员敌占区来人单个提问，怀疑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这时我已不紧张了。他们把王逸夫和我哥哥留下做人质，其余7人到邯郸专为新四军五师突围人员设置的接待站报到，番号是青岛招待所。经北方局用电台与中原局取得联系证实我们的身份后，我哥哥和王逸夫也回到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我不习惯北方的饭食，常常拉肚子，很想到苏北解放区去。后听说晋冀鲁豫边区刚刚建立北方大学，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当校长，我便留在晋冀鲁豫边区，进入北方大学学习。由于年龄小，文化程度低，学校专为我们开设了附设班。秋季，一批同学转到邢台师范插班学习，记得有赵文林、徐林、钱文炯、杨琨、杨廉及我们三姊妹。我在邢台师范期间参加了《白毛女》剧团，配合土改和到前线劳军，饰主角喜儿。邢台师范毕业后，我想回到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当时院长是光未然，著名喜剧电影演员吕班是院秘书，几次动员我去艺术学院。这时陈少敏大姐召集五师的学员座谈，提出准备迎接全国解放，要培养自己的红色工程师，动员大家去工学院学习，我只好随大伙去了工学院。随着形势变化，工学院几度更名。在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连成一片后，我们与晋察冀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华北大学工学院；1949年北平解放，进城后与中法大学理科合并，改为北京工业学院，现在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陈大姐曾一再叮嘱我们要学而有成，做一名新中国的红色专家，不要当“寡鸡蛋”。我于50年代初即被抽

调出来做政治工作，终于成为没有孵出小鸡的寡鸡蛋。我的那些同学，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红色工程师，如钱文炯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生，分配在天津机床厂工作，高级工程师；我二姐任汉芬解放初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航天火箭发射工作，是航天部技术委员会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等。他们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没有辜负陈大姐的殷切期望。

我自从走入新四军这所大学，便奠定了人生的努力方向。无论是幼年当文学家的梦想，还是组织上使我们成为红色专家的期望，都无条件地融会在革命的需要里。尽管我没有成为文学家，也没有成为红色专家，但我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在纪念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 55 周年的时候，记下自己当年的有限经历和点滴感想，以此深深怀念那个伟大的时代。

“洪山公学”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晓 阳

多少年来，我都思考着一个题目，写写我的母校，然而始终未曾动笔，我总觉得两年的学校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我有时想起母校的生活，彻夜难眠，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从我脑中闪过，想到兴奋的事，觉得好笑。想到激动人心的事，又暗自掉泪。今天把她写下来，以饯战友。

我校的校风

“洪山公学”是在豫鄂边区党委领导下培养干部的摇篮。从1941年起，设营在京山县小槐岭山脚下。我当时在“十月剧团”，住在小槐岭山顶上，右边山下村子里是区党委机关，左边山下是“洪山公学”。平时我们联系不多，只有区党委召开大的会议，才见到“洪山公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从我们门前经过，我们一起去参加会议。

我1942年上半年曾到“洪山公学”小学部学习，没呆多久

就离开了。1943年春节后，又到黄冈滨湖咀“洪山公学”中学部学习两年。

1943年“洪山公学”更名为“实验中学”，由边区行政公署教育处领导。

在这两年里受到的多方面教育为我们后来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学校给我总的印象：她和抗大（抗日军政大学）校风一样，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来概括，恰到好处。

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像样的课堂，科班出身的教师。然而，我们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校培养我们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有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友爱、互帮互学、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所革命大熔炉里培养出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年的课堂就在老乡的大门外的稻场上、树林里，架一块木板作为老师的黑板，我们的膝盖就是课桌，我们坐的凳子有的是向老乡借个小板凳，有的是找块砖头或石头。老师讲，同学们记，记不下来的，课后抄同学的笔记。学校想给我们上英语课，换了好几个老师，没教两堂课就走了，吃不了苦。

政治课学：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等。有些课程，学校规定我们自学，出题分组讨论，会场气氛很热烈，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好在争是争，不伤和气，会后仍是好朋友。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改正缺点毛病。

星期天自由活动，洗衣服、洗头发。女孩子洗头发、洗衣服用的是过滤的稻草灰。夏天则用桑树叶子洗头，很清凉。或把皂角锤碎了洗头、洗衣服。

晚饭后，唱歌、做游戏、讲故事。陈铭特别会讲故事，大家

都爱听。范可人同学，个子小，唱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我们也是百听不厌。我们还不定期的组织联欢会，各班自筹节目：唱歌、京戏、演双簧，跳渔光曲舞等，大家很开心。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晚自习，一个小组围着一盏小油灯，有的想看书，有的想抄笔记，挤不上的只好去睡觉。再就是怕下雨，农村土路，下雨道路泥泞，布鞋踩湿了，穿在脚上特别不舒服。艰苦的岁月很磨练人，以后遇到多大困难，和那时候一比，都不在话下。

校址几次迁移

1942年2月，我到京山小槐岭“洪山公学”小学部学习，到校不久，正赶上国民党第五战区顽军向豫鄂边区全面进攻，组织上决定让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回天汉湖区（第三军分区所在地），下半年，我们随父亲（杨经曲，三分区司令员）到大悟山，他去开会，将我和弟弟送到抗大十分校青训队学习。12月日伪军万余人扫荡大小悟山，校领导决定让我妈妈（她住在校部）带我、弟弟、童鸿影到安应赵家棚隐蔽，形势好转，第二军分区政委文敏生派了一个排送我们回天汉湖区。

1943年春节刚过，我们又由天汉经黄陂到黄冈滨湖咀，这次有我两个表哥陈守中、陈守正（他们是从武汉跑出来的），我和弟弟杨铸新，后勤副政委庞俊的新婚爱人喻萍。由一支小部队护送。滨湖咀当年四周都是水，要坐船才能进去，空气清新，不受外界干扰。然而好景不长，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湖心小岛也不安全，容易被敌人一网打尽。学校立即将学员分散到上巴河、下巴河一带隐蔽在老乡家里，敌情缓和，学校就往陂安南转移。一路夜行昼宿，走夜路真是提心吊胆，路上沟沟坎坎，不小心就会

掉进稻田里。背包越走越沉，两条腿越来越拖不动。这时会有大的男同学，尤其是共产党员，把你的背包拿过去，背在他们肩上。他们常常一人背两三个背包。我记得周宏玉、詹伯超等几个男同学经常帮助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他们还要拉着我们跑。这种热情帮助是一种兴奋剂，本来拖不动的双腿顿觉轻松，于是加快脚步，赶上队伍。夜行军，特别犯困，稍一停顿，就睡着了。后边的人一推，才赶紧追上去。

当在村子里休息一两天时，白天晚上要轮流站岗放哨。我们班有两支枪，一支是汉阳造的，又重又长；另一支小马枪，还短一点儿。为了能背上小马枪，我是一叫就醒。当时用香（敬神用的）来计时。平时我胆子很小，听人家讲鬼故事就害怕。夜深人静在村口放哨，心里更是发憊，可还要壮着胆不让同学看出来，怕背一个“娇气”、“胆小鬼”的名声。

在陂安南一带，我们住了几个月，1943年底转移到大悟山（我和弟弟先回到大悟山师政治部父亲处）。1944年春，学校又返回陂安南，直到年底学期结业我们才离开陂安南。

组织群众大多数

1944年割麦插秧季节，陂安南中心县委需要一批干部到各乡去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学校挑选学员参加，起初认为我小，没有我。我找到班主任，申诉我能去的理由。组织上不仅批准我去，还让我担任三人小组的组长。我蹲点的村子，就在木兰山旁、棺材山脚下。

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高，好发动，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就把农救会、妇救会组织起来了。我和房东的关系处得很好。他家有这个大姑娘，比我大一点（我有15岁）。她把

织布机上未穿进梭子的一股纱剪下来，教我编织裤带，四股、六股，我编了好多根带回学校送给同学，好几种颜色编在一起，非常好看，在那个时候可是稀罕之物。

我们还帮助插秧。

参加少敏青年队

少敏青年队，是以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名字命名的，是党的外围组织。

1944年上半年，我已15岁了，在政治上已萌发加入组织的要求，可我以为只要我表现好，组织上会来找我的。学校由大悟山向陂安南转移的行军途中，我脑子里活动很频繁，我想：校长都表扬我了，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谈话呢！心里很不痛快。转念又一想，心里不痛快，就会闹情绪，表现就不会好，表现不好就不能入队。千万不能这样。经过思想斗争，心情愉快了，学习更努力，文娱活动也开展得很活跃。没过多久，经胡汉群和黄××介绍，加入了少敏青年队，爸爸妈妈都为我高兴。可是，每当我看见一些党员去开会时，心里就不是滋味。

1946年2月我调到十三旅文工队。3月5日党支部为我和曹彦举行了公开的入党宣誓大会（当时党组织是保密的）。入党时，我还不满17周岁。

同学情深

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到村外小溪边洗衣服，这条道通往校部，同学们要跨过几块大石头才能

走向对岸。我在溪边洗衣服，洗着洗着，我眼看着水草上边的水珠变成红的珠子，我是怎样回的家，一点也不知道了。同学们把我放在门板上。我满脑子出现的是《红楼梦》里的男男女女，我叫唤，要同学把水浇在地上（她们口里答应，实际上没有浇水。地打湿了晚上怎么睡？）。我意识到同学在骗我，我哭了。有个同学把雪花膏的瓶放在我心口上，凉的舒服些。我只模糊的记得实验小学校长向云英（鄂东地委书记程坦的夫人）来看我，安慰我不要哭，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同学们连夜把我送往医院，几十里的夜路，同学们轮流抬着我走，我偶尔清醒一下，觉得自己是睡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不知道在医院里老乡家的木板上躺了多久才清醒过来。退烧后，我能起来了，但前边的事我一无所知。在实小学习的童鸿影也在住院，她搬来和我一起住院（我们从1941年起就是天汉巡教团、十月剧团、抗大青训队的小战友）。在医院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学校才派人把我们接回去，小童也和我一起到了实验中学，我们就在一个班里学习，直到结业。

我的小命，如果不是校领导关心，同学们及时把我送往医院，也许早已一命呜呼了。同学们的深情厚谊，我是终生难忘的。

瘟疫流行

1944年，春暖花开时节，大悟山和周边地区发生流行性脑膜炎，来势凶猛，抢救不及时，死了一些人。我们学校也不得不暂时停课，采取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吃大蒜。我们学习小组有6个女同学，2个男同学，有一个姓周的男同学感到不舒服，当时学校找到一个土医生，他用破碗的碗碴子在患者的舌根处扎一根

筋，把里边的乌血放出来，放血后绝对不能喝水，这方法颇为有效。

野菜充饥志更坚

1943、1944 两年，生活尤其艰苦，敌伪顽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封锁。周围的老乡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我们 1943 年的冬装还没有着落，校领导千方百计才搞到一批土白布，我们各班各小组自己动手，采梓树叶，将白布染成土黄色，然后自己动手做棉衣。我弟弟才 13 岁，过去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什么事也不让他做，这回他要亲手做一条夹裤，做得还蛮好！

陂安南也算得上是鱼米之乡。可在那个时候，饭是有得吃，没有菜，周围没有荒山让我们生产自救。我们只好吃红薯叶。新鲜叶子味道还不错，干叶子就不那么好吃了。我妈妈托人给我捎来一盒切碎的干辣椒，放一点到盆里拌一拌，同学们吃起来还觉得很香哩！我们还吃过芝麻叶，荆条叶。

虽然生活上缺衣少食，但同学们把仇恨记在日本鬼子账上，个个还是生龙活虎，精力旺盛，十分乐观。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不平凡的学校生活经历，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培养了我的一些好思想和好作风，我能随军突围过黄河，不怕苦、不怕累，和当年的磨练是分不开的。我现在仍保持节约不浪费的好习惯，对周总理的教导，“不浪费一度电、一滴水、一粒米”，做到牢记不忘。

我们所知道的罗礼经光第三纵队

戚 涛 狄文蔚

1942年4月，日军进攻浙赣线时，国民党五战区当局却乘武汉日军空虚之际，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密令，部署全面对鄂豫边区的进攻。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为了粉碎这次敌顽的夹击和打退新的反共高潮，号召全体边区人民充分动员起来，反对内战；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边区自卫斗争；号召各部队和地方加强统一战线与敌军的工作，彻底粉碎敌顽的夹击阴谋。

为了加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统一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五师在4月间建立了三个军分区。由地委书记兼任分区政治委员。在豫南一带则分设信（阳）应（山）罗（山）礼（山）指挥部和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指挥部，坚持当地斗争。每个分区都是一个独立作战单位，在师部的统一指挥下，因地制宜地独立作战。《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的记载不确。据我们所知，当时该地区是“罗礼经光第三纵队”，其全称是：新四军第五师罗礼经光第三纵队。第一，当时该地区为中共豫南特委（特委书记吴皓）。第二，它是在边区党委和师部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下的一个独立作战单位。

罗礼经光第三纵队，于1942年五六月间在经扶（现新县）卡房正式成立。司令员何耀榜、政治委员吴皓（兼）、参谋长甘元锦、政治部主任张难。我们当时都在政治部工作。纵队属有二十一和二十三两个团，每团3至4个连，400到450人左右。一个特务连100人左右。二十一团团长孙宝元、二十三团团团长石昆山。所辖各县、区有支队和大队。

纵队活动区域范围：罗礼经光位于大别山脉的西端，东临黄安（现红安）县界；西在平汉（现京广）铁路线以东（信阳至广水）；南至黄陂、孝感县界；北至罗山、经扶（现新县）、光山县境之豫南广大地区。中心活动区为礼山之大小悟山、五岳山，罗山县南的大小金拢（人称西大山），经扶的天台山、老君山、卡房（人称东大山）等地。在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直接领导指挥下，积极开展了豫南地区的对敌斗争、政权建设，配合五师主力部队，动员本地区广大军民，参加和支援边区的自卫战争，粉碎了敌顽的夹击阴谋，打退了新的反共高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根据边区党委1943年军事建设整训部队的要求，同时，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决定1943年九十月间，罗礼经光第三纵队改组为豫南指挥部，豫南特委改组成豫南中心县委，分别划归鄂东军分区和鄂东地委领导。对所属中心县原领导关系不变，仍由中心县委和指挥部直接领导。中心县委书记何耀榜、指挥长居宗彩。

以上是我们两人在罗礼经光第三纵队工作时，一段真实情况的回忆。值此新四军五师建军60周年、中原突围55周年之际，特将此情况作一介绍，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局部，但对《五师抗日战争史》的充实和完整，也是有所裨益的。以后《五师抗日战争史》再版时，请能给予修正补充。

忆战斗岁月

喻 真

1936年10月毛主席在陕北曾对三局（通信）的同志讲：“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片片被分割的苏区，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座桥连接起来。”“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任质斌同志也曾说过，在漫长的岁月里，五师能同中央、军部以及其他解放区保持联系，就是靠空中电波通讯。1939年冬，三局局长王诤同志，在为《通信战士》写的发刊词中写道，“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拿枪和炮同敌人决斗，但是我们拿着更精明的另一种武器来实现战斗指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就是报务员、译电员。我1941年冬加入抗日行列后，在黄陂县梅店附近做户口田亩调查登记工作。1942年2月，在鄂东正义报社当译电员。不久调到五师模范教导总队报务训练班学习。在大悟山，我们除了频繁的行军外，就是抓紧学习。背包当椅子，二尺见方的木板，放在膝上当桌子。

我在报训班毕业后，分配到五师十三旅电台工作，旅长是周志坚同志。

1944年我在豫中挺进兵团司令部电台工作，当时司令员是

黄霖同志，他带领部队及司令部的警卫连、参谋人员、电台、机要员还有政治部门、后勤部门进军河南，从大悟山一直进到河南确山、舞阳、叶县。

当时环境艰苦，物资匮乏，我们电台用的是干电池。有时候用完了，没有新电池补充，我们就在旧电池周围扎孔，放在盐水罐内，泡着用。晚上值班，脚冷，就用稻草煨着脚过夜。

一次我的大腿关节疼，护士长用白酒和麸子搀和在一起敷在疼处，盖上棉被，敷了一夜就好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在中原军区电台工作，驻在宣化店。国民党军围困我们，封锁我们，生活困难，缺吃少穿，我们就上山拣柴烧，挖灰灰菜吃，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

1946年6月26日，中原开始突围，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天上还有飞机扫射，但阻挡不住我们这支六万人的铁流军队。突围部队到陕南后，我在新开辟的三军分区司令部电台工作，曾三次遇敌偷袭，三次都跟副司令员齐勇同志胜利突围。虽然许多同志生疮、拉稀、生虱子、挨冻、受饿，但我们的部队仍勇往直前。电台对党中央、延安、中原军区的呼叫，随叫随应，真叫人高兴。

1947年3月，我随突围部队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晋城南石店。在中原党校学习，经过整风总结之后，大部分同志重返中原，我随后也南下了，到江汉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司令员张千才，政委刘建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现在想一想，革命胜利实在来之不易，我更加怀念死难的烈士们！

有意思的是，中原突围时，我曾经走过的黄河、秦岭，全国解放后，在工作中我又到过这些地方架设通信线路。曾经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我执行任务时，也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饮水思源

纪念新四军第五师建军 60 周年

沈文倩

我 1939 年 8 月在抗敌救援会宣慰工作团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江西、湖南、桂林、柳州、贵阳、重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 年因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我所在的临时党支部遭破坏，党员都分散转移到重庆。1945 年初经南方局批准，我们分三批转移至中原解放区。我和另 5 位同志为第二批。

战斗在秘密通道上

在一个大雾迷蒙的下午我们离开了重庆，这个白色恐怖的中心。为了减小目标 6 个人分两组行动。我负责绍裘、夏理 3 人小组，晓侯负责黄海生、老吴 3 人小组。总负责是晓侯。

我们的路线是三斗坪→津市→藕池口→余家埠头。由余家埠头进入解放区。这条路线是南方局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党员到中原解放区精心策划的一条秘密通道，沿途都指定有投宿的客栈。当时鲜为人知。不过沿途的敌、伪、顽、军、警、

特都设有岗哨监控，需要严密注意，采取对策。

我们离开重庆乘船到三斗坪时，按指定的客栈住下。傍晚晓侯同我们小组联系上了，告诉我们：他们三人住在客栈大房，亲耳听到几个特务议论。说：“那个女的（指我）走路快，像航空母舰，看样子像奸党（共产党）。”并说：“要紧紧追踪。”为此，晓侯提出要我们3人深夜离开客栈，绕道到津市、藕池口；他和黄海生、老吴跟那几个特务“交朋友”，拖住他们。晓侯还提出，万一特务追踪上了，应合力将特务推下悬崖！我们同意。

大约凌晨三点我们爬高山，加速上路，有时也乘毛驴赶路。沿途人烟稀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赶到藕池口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终于摆脱了特务们的跟踪，在预定地点见到了晓侯、黄海生。可惜老吴掉队了，再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接下来就要通过“三不管”地区了。我们按照南方局的指点，请了一位当地的向导大叔，再一次轻装上路。

第二天一早离开藕池口，我们分别插入商队的人流，小跑前进。踏入“三不管”地区不久，突然听到枪声，经过芦苇丛的小道，一具尸体鲜血直流。据说这个地区发生此类抢劫事件是常事。敌伪顽军警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是他们的本性。我们随人流奔跑不停。几个钟头过去了，人流中有人说：“准备过关卡！”我们脚步渐缓，呼吸急促。

向导大叔镇定沉着，指点得当。他告诉我们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良民证”，要我们沉着过关卡。这时我感到大叔不仅是指路的向导，而且是我们的保护者。有他的指点，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力量 and 安全感。

日本兵查得很严，十分凶狠。但我们在向导大叔的指引下，检查了“良民证”，顺利的通过了。

我们踏上一只渡船时，向导大叔告诉我们过了江，即进入湖北监利县余家埠头。我们5人感谢他的帮助、指导。

这里处处是课堂

渡船离岸过江，远远就看见身穿灰色制服的岗哨战士。我们5个人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且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延安颂》。但向导大叔提醒我们：这里是中原军区的前沿边界，情况复杂，要大家注意。上岸之后我们经过岗哨，向导大叔跟他打招呼。我们受到哨兵和善目光迎接，进入一个大院。向导大叔带我们到民房休息并找到办事人员接待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向导大叔是中原局组织部陈少敏大姐要边区地方派来接待我们干部的。向导大叔的言行举止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带来了组织的关怀、爱护。我们感到“回家”的快乐、安全和温暖。同时也鞭策我们准备迎接新的考验，接受新的挑战！

接待站派了一个小伙子热情、亲切接待我们。他很朴实，介绍边区前沿地带的情况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使我们相信有边区政府、边区人民和人民的军队，我们是安全的。第二天派卫队送我们到军分区招待所休息。小伙子虽年轻，但机灵、朴实、热情。

招待所领导转达了师部领导的意见：要我们休息好，准备派干部和一排战士护送我们到中原军区、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军分区给我们发了军装、被子，派专人指导打背包、讲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生活作息按部队的要求。

我们第一次穿上了新四军军装，初步接受部队的军训教育。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驻地乡亲打成一片，休息时参加劳动，给老乡挑水，打扫卫生等等，亲身体会军民的鱼水关系。

休息近半个月，军分区派一个排护送我们和重庆剧专到中原的几位同志，丹敏、尤加利（田庄）、吕艾等及东北大学、武汉

等地来中原的二三十名知识青年，共约四五十人通过封锁线，日夜行军到中原军区、五师师部所在地的大悟山。

沿途，我们组织过几次演出，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朱大嫂送鸡蛋》等等；还组织驻地儿童团学习和教唱革命歌曲。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我们给驻地群众挑水、打扫卫生、打场等等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们离开驻地时，乡亲们依依不舍，他们问：“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到达大悟山，受到师部、中原局领导和首长亲切接见。李先念师长、郑绍文政委、陈少敏部长讲话并宴请我们。我们心情万分激动，情绪高昂。原来有的同志想经过五师休息一段时间再要求转赴延安。现在决心留下来好好工作，继续锻炼。

几天后，我们分别安排了工作。有的分配到七七日报社；有的分配到师部文工团；有的送青训班学习；还有的下连队或军分区。我和丹敏等分配到师部文工团，以后又分配到十三旅、十四旅文工队。先后到前方参加过新野和枣阳等战斗中的战地工作，第一次到战场，受战火锻炼、熏陶。

接受新的考验

1946年6月26日开始了中原突围，此时我在一纵队文工团工作。

26日黄昏，文工团的同志告别驻地依依不舍的乡亲们，他们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你们好像走得很远？”一个小姑娘抱着我的腿说：“姑姑带我去好吗？”我几乎哭出声来，抱着她没有答话，放下她匆匆拉拉她的小手走了……

我们在黑夜里踏上突围的征途。一路夜行军，充满了大战前

的紧张气氛。直到拂晓，枪声响了。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队长方堃、指导员张空凌传话鼓励同志们沉着，跟上队伍。队伍越走越快，几乎是小跑快速前进。接近平汉铁路，队伍进入枪林弹雨中。飞机在空中低飞扫射，炮弹和子弹擦身而过。大家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倒下。互助着你帮我，我帮你共同前进。飞机轰炸时，不得不疏散前进。最后你牵我，我牵他冒着弹雨越过一条河。冲过封锁线后，队里检查人数，我们这些文艺兵，竟然没有一个失散，个个斗志昂扬。

过了封锁线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天气非常炎热，同志们大汗淋漓，衣服透湿，却毫无倦意。

一天中午饭后，指导员张空凌约我到大晒场西边他宿营处，他在板凳上整理草鞋，做下午行军的准备，并对我说：队里决定让我化装突围！

我以为听错了，“怎么回事？叫我化装离开部队？！”当时我思想上、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一决定。指导员看出我有抵触情绪，放下手头的活，问我：“你有什么想法？这是旅首长根据当前形势必须减轻主力部队负担，保证主力部队胜利突围的决定。”接着他严肃地说：“文工团解散，一部分有条件的化装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一部分下连队。你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关系不少，领导决定你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你在国统区做秘密工作时，接触的抗敌演剧九队现在在汉口。你可以去找他们，争取援助。”我理智起来，理解了指导员的谈话内涵，问，“什么时候离开部队？”他说，越快越好。又说：“领导考虑你一人化装转移不方便，最好结伴同行，希望你征求王培德同志的意见，结伴同行。”我表示同意组织的安排，同王培德同志商讨结伴同行。他又再三叮咛，要我注意安全，发挥以往地下工作时的机灵、勇敢，保证两人安全到达晋冀鲁豫。”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接受新的考验，请组织放心。

当天晚上，部队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我和王培德同志结伴同行，领了两幅布、四块大洋做路费。

当日，我与王培德同志协商好作为姑侄关系，她称我姑姑。我出面对外，小王尽量少说话（小王四川口音比较重）；行动路线为经武汉至安阳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到武汉主要同抗敌演剧第九队和小王在“民大”的同学施惠联系。到武汉，对外说是由武汉到北平读书的学生。商讨好我向指导员汇报了计划，并得到他的认可。

我和小王的心情一样，不愿离开部队。但我们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认真执行化装转移的任务，确保安全。因此，我们沿途配合默契，临危不惧，同舟共济。

1946年7月6日我们随部队行军到随县淅河镇附近就离开了部队。当晚住在村里老乡家作化装的准备：换衣服、处理军装；打听去武汉的路线；了解沿路的基本情况，有什么关卡和监控哨所等。

我们了解到：淅河镇离村子不远，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人比较多，只有一个岗哨，随人流行动入镇不难；镇东头有一个码头，天天都有开往武汉的船，不过船只能开到长江埠，由长江埠转火轮才能到达汉口。

当晚同老乡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安静下来就想部队的同志和武汉演剧九队的同志；考虑如何取得掩护，在淅河镇过关卡可能遇到的麻烦，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小王化装向淅河镇出发，随人流分散过卡，机动灵活找掩护，沉着应战不慌张。我们一前一后，我同一位老乡沿路聊天，说是来串亲戚。他听我说本地话，不表示怀疑。远远看见哨兵上了刺刀晃荡吆喝着。小王随人流顺利过卡了，我心里暗自高兴。我随大爷走到岗哨，哨兵吆喝“站住！”刺刀指着。大爷见状没有走开，对哨兵说：“她是来我村串门

的，几个月了，来赶集，没带路条。”我随大爷的话也说了一遍。哨兵听我说本地话，一晃刺刀让我过去了。我高兴地随大爷继续走了一段路，对他表示感谢，他似乎并不在意，或许他心中明白我是什么人？！

小王一直跟着我们走，当我和大爷告别之后又走了一段路，就向码头方向走去。很快找到去长江埠的船，上船离岸顺流而下。

船上还有两个青年人和我们一样什么行李都没有。船老板对我们这4个人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好像心照不宣。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沿，船上静悄悄，4个人沉默着在想什么！

船老板说：“前面要过两个关卡，你们不要露面，有人上来稽查，不要慌张，我来应付！”他指着那两位青年说，“你们替我摆橹。”又说：“她（指我）帮烧饭，你（指小王）身体不好有病就躺下吧。”船老板一一安排好了，我如释重负。我深深感到普通群众的作用是多么伟大。

我正帮老板娘煮饭烧柴火，跳上来一帮一副狰狞面孔的稽查人员。他们一看船舱堆满柴、木头、米，几个人在干活，没有闲人，掉头就上岸了。过另一个关卡时，船老板吆喝了几声，没有人上船，顺利过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我和小王对视，相互默契地庆幸又取得的胜利。但此时，我们的心情并不平静，因为对汉口这个大城市十分陌生。想到部队在急行军；分散在连队的文工团同志们在去渐河镇路上那位纯朴、憨厚、诚实的老大爷和这对船老板夫妇，体会到“鱼水关系”的内涵和力量。严峻的现实要求我珍惜它，依靠它面对一切困难，增强和小王安全到达目的地的信心。

船到了长江埠，我们告别了两位同舱和船老板、老板娘，上了小火轮。这时人熙熙攘攘，我们的心情也是复杂的；陌生的汉口，到哪里找九队？找施惠？口袋里几乎空了，到哪里去落脚？

我和小王相依为命，毫无退缩的情绪，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找到演剧九队来实现到达晋冀鲁豫的目的。

小火轮到了汉口码头，我们随人流上了码头，看见许多广告。一张海报中突出、醒目的三个大字《孔雀胆》跃然在目。我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激动，告诉小王：找到九队了。我们反复看海报，知道九队正在演出《孔雀胆》这部有名的大型话剧。海报上剧场的名称和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立刻想到了队长夫妇吕复和于茵、导演查祥麟（夏淳）和梁国璋等同志。可是来不及回忆在国统区地下党工作时同九队接触的往事。更多的是同小王商量到剧场去找九队。

当我们按照海报所写的地址找到剧场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进剧场看到几位搞舞台工作的人在布景。咨询了他们之后知道九队的驻地在“大华酒店”。我们又找到大华。真是不知疲倦与饥饿，这一天我们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

近五点到大华。门口站着岗哨，我意识到面对国统区形形色色的白色恐怖，应当提高警惕。地下党组织传达的、中央提出的国统区必须遵循的“十六字”方针和其他一些政策、策略，使我控制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问题。我们具体的商讨：①因为九队有人知道我到了中原解放区；过去我认识的队里的人，有不少还在；队里的人员可能很复杂，所以我最好不要露面。②我们全副农村姑娘的打扮到队里太显眼，太特殊，容易引起怀疑。所以决定：小王以佣人的身份到九队驻地找吕复。考虑到吕复是队长，工作忙不易找到，我囑小王进去先找导演查祥麟（夏淳）（我在衡阳临时支部工作时了解他是地下党员）。

我在大华附近摊档等了一会，小王同小查来了。小查囑咐我们，不能到九队驻地，因人员复杂，容易引起怀疑。约我们散戏后在大华晒台走廊见面详谈，并安排我们住在走廊，并囑咐我们早出晚归。小王说她进九队驻地：“沈文倩小姐找查祥麟导演”，

引起过对方的怀疑。好在小王和小查都很机灵，才使这一失误未造成损失（注：因为我同九队接触时化名李若，人们不知道李若就是沈文倩）。

当晚十一点多散戏后，小查、于茵、梁国璋先后到晒台走廊看望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身体和五师突围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小查答应我们协助寻找施惠，为我们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办证件，解决路费等等困难。我们对九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十分感动。于茵、梁国璋还为我们改装（改扮成学生打扮）做了准备，带了一批衣服和鞋以及化装要用的必需品。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扮成学生模样离开晒台走廊在大街上溜达了一天。傍晚回到晒台走廊，十分疲劳。十一时许吕复、小查上来，要我们安心休息几天。路费、办证都可以解决。小查说，施惠也找到了。我们激动不已，不知说什么表达内心的激情。

为避免周围人的注意和国统区特务的监控，减轻沿街奔波的疲惫，我们商定第三天分散出门，在广告牌前等候，找公园游逛做适当休息，积蓄力量。

第三天一大早，按照预先商量好的计划，小王先出门在大华不远马路边一幅大广告牌前等我，同她会合。快到广告牌前，我发现一辆黄包车停在那里，一个车夫鬼鬼祟祟地蹲在旁边注视着我。根据我在国统区的经历，一眼就看出这个黄包车夫不是正常人！我判断他不是特务就是流氓。我装着若无其事、不注意他的样子，同小王说话，暗示我们被盯上了！接着我们七拐八拐穿过大街小巷，不知走了多远，最后在一间不起眼的拐角处的小食店坐下吃豆浆油条。许久不见跟踪的黄包车和车夫，于是我们出来到中山公园找了一处人多的地方休息。我们已疲劳不堪了。晚上，回到大华晒台走廊，十一点后小查、于茵上来告诉我们施惠答应办证，但他的意见希望我们留下来，在武汉参加新组织的一

个剧社，工作一段后再考虑回解放区。我和小王婉言谢绝了，坚决要求尽快帮助我们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去。小查答应同吕复、施惠再商量尽快提供条件让我们离开汉口由安阳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吸取被盯梢的教训，第四天我们仍然分散出门，改道会合，很早就到了中山公园休息。下午又发生了意外情况：有一个军人有意同我们搭讪，引起了我们警惕。这个军人胡搅蛮缠，吹嘘他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郑州有不少熟人。如果我们愿意去郑州大学上学，他可以介绍……等等。我们知道他不是好人，想法应付、摆脱，几次要离开公园被他“挽留”，最后以答应“明天再来”才摆脱纠缠。他还要送我们回家，被我们谢绝了。摆脱纠缠后，我们十分小心警惕周围的人，谨防盯梢。天黑了回到大华晒台走廊已是满街华灯高照。小查按时来，告诉我们证件、车票、路费都准备好了。明天就可以离开大华，找地方休息，下午乘火车到安阳。深夜吕复、于茵、梁国璋和我们告别。祝我们顺利早日“回家”！我们对九队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真诚感谢。这一晚我和小王睡得安稳。准备第二天上路。

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我们小心谨慎地离开大华，告别晒台走廊这一特殊的宿营地。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找到小客栈，准备下午乘车到安阳（对外说“到北平上学”）。我和小王根据前面的经验，思想上没有放松，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件！在小客栈适当休息时，检查了随身物品。我们想念五师部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畅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未来……

下午按时到汉口车站，顺利上车。当火车到安阳。我们非常谨慎地下车，转搭大车，发现同车还有几个青年，东北口音。我们没有交谈。离开安阳不远，大车上这几个青年下车换“边币”（用国民党统治区通用的“法币”换晋冀鲁豫解放区通用的货币，当时统称“边币”），我们开始觉察已经进入晋冀鲁豫边区！顿时

一身轻松，兴奋不已！这时想起在进入中原边界，在余家埠头向导大叔的话：“边界情况复杂”，我和小王没有下车换币，压制内心的喜悦，随车继续前进。

车到达磁县，这里有晋冀鲁豫接待站的同志。我们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在磁县接待站住了一夜，第二天接待站派人送我们和大车上那几个东北青年人一同到邯郸。五师突围和化装转移的同志全部集中在这里，由易家驹、魏西同志负责。报到后我们住在苏槽招待所。我们得到抗敌演剧九队地下党组织和施惠同志的帮助，终于到达目的地——晋冀鲁豫解放区。我深深感到化装转移是一堂精彩的教育课，它使我们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

到了晋冀鲁豫，小王分配到北方大学学习，我留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下属单位工作。我和小王虽然分开了，但我们配合默契，目标一致，艰苦奋斗的友谊是永存的。

纪念新四军建军 60 周年和五师突围 55 周年，百感交织，饮水思源，给哺育我成长的母亲再献上一支歌：

《歌颂人民军队》

军旗飘飘！
军歌嘹亮！
中华大地，
地动山摇，
消灭日寇，
战胜老蒋，
南征北战，
亿万精英，
茁壮成长。
建设战场，

一代一代，
继承传统，
立足中华，
改革开放，
面向全球，
再创辉煌。
军旗飘飘，
军歌嘹亮，
人民军队，
革命旗帜，
永放光芒……

情系中原

——一对未婚夫妻奔赴鄂豫边区纪实

林 扬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看看 1945、1946 年的日日夜夜，不禁使人感慨万千。一年时光，在人生的长河中是何等的短暂，犹如匆匆过客，一闪即逝。然而，这不是平凡意义上的一年，而是投身革命大熔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两种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生活内容的充实和战斗经历的丰富是一生当中不可多得的。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有什么显赫功劳，只不过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工作。更多的则是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受解放区首长们的关怀和爱护，这是感人至深，终生受用的。我欣然发现，在日后长久的革命生活中，不论处在何种逆境，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在我的意念中始终透着一种解放区培育出来的精神支柱，心怀坦荡地坚信光明的未来。一年中我所亲身感受的新四军五师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本色，一生未敢忘怀。

陈山和我的青年时代都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月。陈山出生于福建南安县，我出生于广东云浮县。我们都亲身感受到1937年日寇长驱直入，广大国土沦丧，千万中国人民在敌人的屠刀下惨遭杀害的情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无不义愤填膺，决心誓死保卫祖国。我党适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真是振奋人心，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随即卷进了抗战洪流。我和陈山自然也不例外，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行列。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恶浪，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随后，抗日救亡运动受到残酷镇压。1942年，陈山和我先后来到广西桂林。陈山在我地下党领导的“广西文化供应社”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俄文。他学习勤奋，仅三个月就开始在老师帮助下翻译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不到半年便着手翻译出版小册子。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我大西南。桂林吃紧，当时我正在桂林上学，此时无法同家人取得联系，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极端困难。恰在这时遇到陈山，他告诉我，俄专校长孙亚明（资深地下党员）准备带领一批俄专学生到桂北山区龙胜打游击，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觉得这是一条打击侵略者的理想出路，我决定参加。但孙亚明被特务盯上，组织通知他立即转移。他吩咐我们按计划前往，他随后再来。但他始终未来。就在从桂林到达桂北龙胜的这些日子里，我和陈山相濡以沫，彼此相爱，日后终成眷属。眼看日寇就要进犯桂北龙胜、三江一带。我们跟着源源不断向贵阳、重庆方向逃难的人群撤退。于1945年1月到达重庆。这一路目睹的情景，其惨状真是令人心碎。公路两旁

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风餐露宿。白天敌机轰炸，机枪扫射，无处躲藏，死伤无数，死者尸露路边，发出阵阵臭味，伤者血肉模糊，痛苦地呻吟，无医无药，只有死路一条。当时在国统区苦难的中国老百姓，逃也死，不逃也死，哪有活路。

到重庆不久，我们便同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外围组织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同时可以听到党内有关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和传阅一些党内文件。这使我们感悟到，日益壮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二

1945年4月，组织通知陈山、我和陈石3人一组到鄂豫解放区去工作。随着解放区的扩展，那里需要大批干部。要我们立即辞去市内的工作，到郊区去躲避一下，同时做好一切走的准备。路费要自筹，通行证件要自办。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到新华报馆楼上找青委负责人刘光同志检验准备情况，并告知行走路线、注意事项、接头地点和暗语等。

我们按要求一切准备就绪后，经过刘光同志的检验和认可，便告知陈山行走路线和接头地点、暗语等，并嘱咐说，这一切只能用脑子记，不得见诸文字，只能陈山本人知道，不得告诉任何人。

1945年5月，我们一行3人即离开重庆，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在船上，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严，我们自然是处处小心谨慎。这第一关总算安然过去了。轮船到达三斗坪，这是我们路线的第一站，我们当即上岸，日行夜宿，走了三四天，一路上少不了军警特务找麻烦。到达湖南津市后，我们住进了一家很不显眼的店铺，老板小心谨慎地接待了我们。这里可能是组织安排的住

处。主人把我们从重庆带来的衣物、证件等一概收下，然后给我们每人找来一套本地小商人打扮的服装和一些日常使用的物品，打成一个小包袱，并交给我们一张本地人外出做生意的证件。然后吩咐我们第二天一早即跟随本地外出做生意的一群人走，一定要跟上大队人马，不然会迷路，而且会有土匪打劫。这一群人清早上路，都走得很快，我们一路气喘吁吁地小跑，不敢掉队。经过一段荒无人烟的芦苇地，芦苇长得一人多高，十分恐怖。再往前走便进入日军日夜镇守的封锁线长江岸边的藕池口。这是敌伪重兵把守的一个小镇，日军巡逻队荷枪实弹来回走动。过江必须在这里受检查，办理过江手续，要忍受日军的多方刁难和野蛮行动。过了江便进入伪军把守的地区，也要受他们的检查。再往前走有一段三不管地区，村子里死一般沉寂，难得见到一个人影。据说，晚上日、伪、匪经常出没于此，偷鸡摸狗，赶猪抢粮，见什么抢什么。

终于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继续朝前走便离目的地余家埠头不远了。一路上可以隐约感到一股清新宜人的气氛，人来人往，欢声笑语。大路两旁绿树成荫，田地里麦浪起伏，稻花飘香，一片诱人的风光。我们到达余家埠头说明接头暗语，早有人出来热情接待。稍事休息，用过茶点，等齐当日到达的两三批人一起，即有专人租好船只，行驶在茫茫的湖泊里，小船从一片片荷叶、荷花丛中滑过，阵阵清香，沁人肺腑，不时伸手可摘取莲蓬。这般境况，真如走入另一世界，不久即到达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所在地。

三

在三军分区招待所住下，已有先期到达的几批人马。军区首

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并送来新四军全套军装，穿戴起来感到无比威武，为自己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而自豪。曾几何时，我们还是一对藏藏匿匿的“丑小鸭”，如今成了在解放区的蓝天下自由飞翔的“白天鹅”，在这广阔天地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尽情遨游。等到先后到达的约百余人，便组成干部大队，军区派武装战士护送到大悟山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我们这些新兵，对解放区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在去大悟山的路上，中间休息时我们喜欢同战士们闲聊，问这问那。我们说，你们这么年轻，抗战胜利后，准备做什么呀？战士的回答很干脆：“跟着党走，党有前途，我们就有前途。”我想，这个战士的话，也就是解放区所有干部和官兵们的心声。党和个人的前途如此密切相关，使我上了加深对党的认识的第一堂课。的确，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哪谈得上个人前途。

到达师部后，我和陈山等人被分配到党报《七七日报》工作。社长谢文耀和主编顾文华当即把我们领到报社所在地，开了欢迎会，第二天便由顾文华带领我们到驻地附近吴家大店做减租减息工作。首先集中学习有关党的农村政策的文件；然后下去做减租减息工作，总共只有十多天。收获是明显的，首先使我初步认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政策；同时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味崇尚轰轰烈烈效应的不切实际的思想降了温，向扎扎实实地深入细致的做好每一件“小”事迈了步。

回到报社后，陈山被分配到前线部队（十三旅）做随军记者，我担任地方采访。这样，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一次，在行军转移途中，陈山来到我们驻地找我。见他一身戎装打扮，腰间还别着一支手枪，好不威风。他告诉我，他在部队同官兵关系相处很好，精神愉快，工作顺利。作战时通常是跟随连长出入于炮火连天的战壕里，除了要为报社采写文章外，还要参加救护伤员和掩埋牺牲战友的工作。有时则随先

头部队攻占一个地方后，随即打扫战场，把缴获的枪支弹药和文件等登记上交，将俘虏或家属押送到安全地方看管起来。他告诉我，这支手枪是他亲自缴获的。“我说，不是一切缴获要归公吗，你怎么归私了”他说，哪敢犯这个纪律呀，都归公了，是上级见他经常出入于前线，需要一支手枪而送给他的。他还拿出一副颇为讲究的近视眼镜送给我，说这也是他缴获的。上级听说我是近视眼，送给我的。

在某天的行军途中，听到上级传达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无条件投降。解放区军民自然欢喜若狂，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然而。顷刻之间，抗战时期一直龟缩峨眉山的蒋介石要下山“摘桃”，要抢夺解放区地盘。直至调集 30 万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企图一举消灭抗战有功的新四军五师。严酷的内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解放区的生活是艰苦的，日常的伙食多半就是白菜、豆腐加米饭，不过后勤工作同志不管如何辛苦，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给大家“打牙祭”（改善生活），能吃到猪肉。日本投降后，受国民党军队围困，我军奉命集结在大悟县宣化店这一小块地方，就连这样的伙食也难以为继。平常一天要吃一餐稀粥，菜里缺盐少油，还要上山砍柴、挖野菜。不过大家都是乐呵呵的，没有见谁叫苦。

在解放区生活的初期，我感到最难以适应的是频繁的转移和夜行军。这时一般都把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编成干部大队，派武装部队保护。我们只要跟上队，不掉队就算完成任务。但是要做到这点也不容易。往往半夜三更，睡得正香，忽然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立即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到伙房吃饭后出发。哎哟，天啊，我的背包带在哪里？什么也看不见，背包怎么打呀。等我折腾好后，去伙房吃饭，人家已经快吃完，准备上路了。吃不上饭怎么上路呀，当然也有办法，把饭菜塞满一茶缸，边走边吃

吧。这样的情况经历过一两次也就长了本事，不再被难倒了，这就是磨练嘛。我是近视眼，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买眼镜，夜行军困难不少。有时前头的同志走远了，自己也没看清，直至后边的同志叫嚷：快跟上，不能掉队呀。这才恍然大悟，赶紧快跑跟上，结果跑过了头，撞到了前边同志的后背。后来有了那副战利品眼镜，就帮了大忙。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把它丢失了。

我在地方采访组担任记者工作，常下到地方基层政权部门，除了要为报社写稿外，日常就是向地方民众征粮、借粮，保证前线部队的供给；动员和组织民夫向前方运送粮食和运回前线下来的伤员。征粮工作在当时是比较繁重的，往往一清早出去，天黑才回来。有时还要到边远的“拉锯”地区。为防万一，都要带上枪支或手榴弹。每当前线任务下来，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立刻分头出动找民夫抬担架。这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领导一再交代，对老百姓不许简单化地强迫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说服讲理，对有实际困难的则要体谅。在进行这项工作中，我深深感到解放区民众觉悟很高。每到一处几乎都是随请随到，立即出动。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李师长的队伍是保卫他们乡亲们的利益的。这个队伍个个英勇善战，炮楼的鬼子才不敢轻易出动，我们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一些老百姓还津津乐道地给我们讲述一名女将领陈大脚（陈少敏同志）的动人事迹，说她英勇无比，还能骑在马上双手开枪，百发百中。鬼子只要听到她的名字，都吓得闻风而逃，不敢来犯。我深深感到，解放区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是新四军五师贯彻执行一切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的宗旨和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结果，也是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保证。

这期间我是一门心思投入这项支前工作，哪里还顾得上考虑给报社写稿的事。然而报纸是要出版的，记者不写稿，编辑部就犯了难。于是我们的主编亲自下来了解情况，布置写稿，并限期派通信员下来取稿。那天，我正忙于帮助民夫捆扎担架转移伤

员。天下着蒙蒙细雨，我脚上那双早已磨穿了底的布鞋，在湿漉漉的泥水里来回走动觉得很累赘，于是干脆把它脱了，光着脚板，挽起裤腿，忙前忙后。主编看到我这副模样，打趣地说：回头把你自已写进去，不就是一篇生动的稿子吗。我这个没有经受过什么锻炼的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虽有热情，并没有干出多少成绩，却受到领导的多方照顾和鼓励。

1946年1月，我军奉命集结大悟县宣化店，中原局专门为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几百名青年成立“民主建国大学”，把我们从各条战线调回来学习。报社也把陈山和我调回，在送去学校之前，为我们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第二天我们便到学校报到，编入“民大”第二队，住黄家寨。同班同学总共有百余人，学习内容以“七大文献”、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主要是自学，班组座谈、写个人学习心得等。此外还听首长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民大由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同志任专职副校长，李昌同志任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部队和地方干部中抽调来的。

我和陈山还有同班同学吴于冰同志在“民大”只学习了一个多月（总共办学3个多月），中原局组织科长（也是我队指导员）李其祥同志把我们3人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们立即到校部集中，准备化装突围。组织上为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如何安全转移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看来颇费了一番心思。了解到吴于冰是皖北涡阳人，便把我们两人托付给他。李科长同我们一起研究突围的路线和办法，然后决定由豫南经安徽入淮北解放区，转到山东解放区，然后进入东北解放区。并告诉我们，这条路目前还无人走过，敌人封锁很严，我们此行是冒险探路。我们是否顺利通过，组织会知道的。我们3人的关系，经过精心研究，决定我和老吴扮成假夫妻，陈山是我表哥。我们是重庆“中华制药厂”职员，抗战胜利了，回家探亲。这些口供要牢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改口。我们用肥皂刻了一枚印章，油印了一纸证明。一切准备就绪，经组织认可后，校部发给我们一笔足够的路费，挑选了几套符合身份的衣服，就准备出发了。临走时，刘子久校长请我们到他家吃饭，指示我们临危应变措施，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管处境如何都要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这些教导，我们自然牢记心上。

四

1946年4月中旬，我们3人换装完毕，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别了我们战斗和学习过的地方，离别了难以忘怀的领导和战友们，悄悄地上路了。第二天清晨我们即走出了解放区的地域，走过了一段三不管地区，便迈上了信阳通往阜阳的大路。这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来自信阳（国民党地区）。沿着大路往前走了约二三里路，突然从一座小山丘前的掩体处跳出两个持枪的国民党哨兵，见我们走近，大声喝道：“干什么的，站住！”同时将子弹推上枪膛，从山坡上下来，十分吓人。我们心慌不忙地解开包袱，拿出证件来，哨兵看罢证件，就示意让我们过去。刚走了几步，迎面来了个当官的，大声问哨兵：“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老吴紧走几步，递上香烟，笑嘻嘻地说：“重庆来的，回阜阳老家”。这时哨兵走到军官面前，向他报告说：“已经检查过，有证件”。当官的再没说什么，摆摆手让我们走了。走不远，进入一个小镇，正遇赶集，人来入往，夹杂着好些军人，熙熙攘攘。我们不敢停留，抄条小路穿过集镇，一路小跑上了公路，混在来往老百姓中快步行走。听过路老乡们说，这一带驻军不少，常出来扰民，还有土匪时常出来抢劫。我们不敢停留，拖着又饥又累的身躯继续前行。走了两三天

路程便到达老吴家涡阳县红集乡吴庄。老吴对他家人说，我们准备到徐州做生意，请他家兄弟帮忙疏通镇守河岸的军警行个方便，让我们安全通过。镇守桥头的两个哨兵是老吴的亲戚，老吴过去同他们拉了一会儿家常，加上老吴兄弟的关照，哨兵便亲自送我们上了渡船，并神秘地告诉我们：过河后一直朝大路走，这是通往徐州的，千万不要进右边那条小路，那是共产党地区。我们心里觉得好笑。

上了岸，我们迅速钻进了右边小路，憋足劲往前跑，走了约二三里地，眼前展现了一个绿荫环抱、鸡鸭成群的村庄。绿荫树下走出了几个手持红缨枪的少年，后边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娘。这种情景告诉我们，解放区到了，担惊受怕了十多天，终于到“家”了。我们兴奋的心情真是笔墨难以形容。老大娘笑吟吟地走过来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吴神气活现地回答：“去县政府，有公事。”两个“红缨枪”在老大娘的示意下领我们走了四五里地，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这是淮北解放区蒙城县政府所在地。马副县长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了饭便派人送我们到睢溪镇淮北行署找彭专员，因彭专员不在，行署秘书接待了我们，并说：“你们要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得到通知了”。行署专门派了一个排的武装护送我们越过铁路到达滕县。此后便一路有武装护送到临沂华东军区所在地，在那里聚齐先后到达的二三十人，便出发到黄县龙中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乘坐一艘汽船出海，向东北解放区进发。汽船在渤海湾中途，遇到两艘国民党军舰追逐。船长立即命令大家匍匐在舱底。大军舰转弯笨，小船灵活，兜了一阵圈子后，我们的汽船终于到达旅大海域，国民党军舰再也不敢追逐了。黎明时，我们胜利地在辽东庄河县登陆。已经等待在那里的汽车把我们载到辽东军区所在地安东（丹东），受到军区首长的热情接待。从此结束了将近两个月的化装转移生活，等待分配新的战斗任务。

五

组织上考虑到陈山的专长，尤其是当时苏军驻旅大地区十分需要俄文翻译人材，因而陈山和我被分配到大连工作。到达大连后，正遇苏军驻大连司令部准备在大连创办中文报纸《实话报》。苏籍华人苏联红军李必新少校（后升中校）到大连市委要求中方派干部协助工作，市委即决定派原《大连日报》副社长李定坤率领陈山和我前去协助筹办。该报除地方新闻外，基本上是苏联《真理报》的翻版。绝大部分稿子都要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因此翻译任务是很繁重的。陈山主要担任翻译工作，先后由报社任命担任翻译部主任和报社副总编。我先后担任记者、编辑、翻译工作。

1951年4月，经中央组织部调来北京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共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的前身）工作。陈山来局不久便被派去苏联和东欧各国工作。回国后即从事《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译校工作，先后任校审室副主任、历史室主任等职。1958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中心）。我一直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翻译组长、研究室副主任、《列宁全集》第一版译审工作等。80年代我们两人先后离休后，曾合作译校书刊和应约撰写多篇回忆文章。陈山于1994年10月因病去世。

中原突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的战斗历程，深感怀念。它对我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无形的激励和鞭策。尤其得知在突围中不少同志英勇牺牲，十分悲痛。我们的领导李其祥同志也在随军突围途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更令我悲痛之余肃然起敬。他胸怀全局，为了使一部分同志安全

转移费尽心血、精心设计、严密组织，使一批批有可能化装转移出去的干部安全到达别的解放区或敌占区。既保存了干部，又减轻了战斗部队的负担，在一定意义上使其轻装突围。当然，这是中原局领导的决策和部署，李其祥同志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的好同志之一。每念及此，想到许多光荣牺牲的领导和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心情都万分沉重。我们这些幸存者有什么理由不发奋努力，全力以赴为党为革命奉献终生呢。

中原突围和我投奔五师

周志钧

1939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河套地区。此前一年我参加了临河日报社，做夜班编辑，宣传抗日。

1935年我18岁，开始关心政治，日本特务机关已在归绥旧城设了据点，亡国奴的帽子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晃荡。绥东抗战，白灵庙战役，阵亡将士墓地就在我学校旁边（公主府）。冻僵的烈士遗体，卸车落地有声，白日避人，夜晚隔墙都震耳惊心。学联、各界声援会人士云集塞上，政客们也纷纷露脸显形。红军北上要求赴前线抗日的活动也有所传闻。我也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双十二事变，国事阴转晴。七七事变晋绥局势风云变幻，我们一批学生参加了十七集团军政训处，学习了游击战争课，但形不成拳头，西安、延安流向不定。直到1938年在临河聚成了一个小集体，在党的领导下。1941年傅作义河套战役后，赴重庆领到了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把中统、军统特务带回绥西，政治气候晴转阴，我在小学教员的岗位上被捕，脱党。1944年我在重庆社教学院大学课堂上第二次被捕。一年后经过补考毕业了，但是，国统区特务遍地，没有人身自由。日寇打通了京广

线，兵临贵州的独山都匀，中国共产党七大文件的传闻，是一股春风，经过奔走寻觅，才找到了去中原的组织介绍，同行3人，梁桂花、韩达是我们的领头人，1945年6月化装乘江船到三斗坪上岸翻山到津市，在古长堤过江进入解放区。

从前沿到接待站走了一天多。以后就是向大悟山走，沿路都有护送。与古长堤以前的路截然不同，处处给人一种亲切感。听说大后方来的大学生，连分区首长都亲自见面，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鲁持久接见，一次是招待吃糖。

过天门地区时，1945年8月间，听到日本投降的喜讯，朱总司令受降的文告也下达了。从湖区监利到天门我就不断生病，疟疾缠身，跟不上队，住了医院，没有奎宁、蚊帐，只有中草药，医护人员是尽心竭力的，只是没有奎宁、冷热病止不住。一直到四望山才集中到青训班，主持工作的是李昌同志，受到一次思想教育。

桐柏解放，大批学生集中到县政府招待所，县长姓欧阳，教育科长周达夫，我和韩达、崔巍任科员。从桐柏到光山，经息县潢川，有敌情，国民党军是想把新四军五师赶出老根据地，及至到光山一带驻下来，被包围的局面逐渐形成。和谈期间，我们吃不饱。粮食医药筹措困难，国民党隔河封锁，商旅不通行，当时我分配到一纵二旅政治部宣传科编印报纸，自己打野菜煮着吃，缺油。棉衣拆开，表里两面缝作两件。

韩达、梁桂花当时在二旅四团做文宣工作。1946年6月26日中原部队开始突围，二旅六团政委王用予任旅政治部主任，出报的工作停了，我仍在宣传科，宣传科下属有一个宣传队（演戏），各团有宣传股。

一纵一旅向东打到苏北去，我是过铁路后才知道的，二、三旅（除八团）突围到了鄂西北。

1947年春，4月，我因腿、脚病，跟队行军不适应，王用予

主任将我安置在红色保长冯么爷家教书休养，冯么爷是地主成分，一儿一女，正在学习。主人把他棉袍与罩衣给我换穿。我在家庭授课，不满10天，敌人扫荡，我被转移到红色甲长家在南山坡的两间草房。冯大爷50开外，新丧独子，佃农，有敌情就让我钻山洞，吃紧的时候，带上干粮、被子，住在山洞。晒太阳到青桐林里草丛中躺着。有一次一个戴大檐帽的国民党兵搜索到草舍前，见门锁着喊：“人哪去了！”无人答应，走了。东沟，北山都发生过鸣枪追人的事。3月后，坡田里烧胡柴，暖土备耕，也让我帮手，但不让我下河坎背水与多人接触。夜宿山洞，天明听杜鹃叫，不由得不想部队。香椿发芽，冯大娘在火塘里烤的饼子里，填加香椿做馅，十分可口，至今60年不忘。

红色保甲长把许多的招降证发给我，解释说：“带着，以防万一，自己人不会把你送给清乡队！相信！”他们是言行一致的，60年后想起来还有一股暖流从心田流过。

清乡过后，卫生队招我归队，另一位红色甲长（失记名姓）来通知，我拜别冯大爷、大娘。

交通员第一站带我往一户孤老太婆家住宿数日，吃睡在顶楼板上，有铺盖。她家养了蚕宝宝，不断添桑叶，十分辛苦。交通员告诉我这一户贫苦忠贞可靠，你放心住着吧！队长带队去远了，几天后才能见着。次日交通员来说：“这老太太没劳力，口粮困难，换个去处吧！”接着介绍说：“保长的后娘受气想找人给她充当娘家人说支持话，你若能说是从保康来的，是她内侄子就行。”我答应了。他说保康的乡俗，叫姑母为“娘娘”，再把口音变一变，有我帮腔，你放大胆去吧。又说：“这位妇女是红二方面军掉队的伤病员，没办法嫁给老东家了，前妻死时生有一子，长大成人后当了保长，老太太的孙子媳妇也二十几了，重孙子4岁，两代掌家，就这个老太太没有财权。保康娘家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从来没有来往，实在可怜！”第二天我棉袍罩衫穿

好，背个小包袱，经交通员引见，先见保长，说明来自保康经商过此，找我的亲骨肉，乳名江金花，我名江鸿保。老太太出来，我上去喊了一声“娘娘”，她就掉下眼泪来，家长里短，哭诉起来，足有一顿饭工夫。我说：“你见我应该高兴，你从此有靠山，再不会受气了。”我又说：“这位甲长和我一道走来，都还没有吃饭，你给我们弄些饭吃吧。”一家人也都转过话头来。4岁的重孙子一直随老奶奶抹鼻子掉眼泪。我拉他的手他就依到怀里来。当天无话，老太太趁孙子两口下地备耕，让4岁的重孙子跟我认字描红。老太太带我到她房里坐在她的床头，指给我看对面东墙上有一扇小窗，说有敌情可以越窗穿墙洞上山逃跑。我写了一张由保康县政府开给的出行经商证明，又要了一块肥皂，刻了印章蘸了印泥盖在上面，叙话间露给保长父子俩看了。我的“娘娘”有空就到小房（仓房搭铺）里诉10年来的苦情及对党与革命队伍的向往。我也赔了不少眼泪。三五日很快过去了。交通员通知我归队，“娘娘”第二天一早送我上路，预先备了干粮，走10多里路，一直送到站在梁上能望到驻地的位置，才让我就石板铺路的石上坐下，她也挨肩坐下来，哭着说，千言万语归一句：“不要忘了她！”鄂西北是贫困山区，红军和中原突围部队曾在这里战斗，这里的人民曾掩护过我们。五师的后代们！我今年82岁，爬不上武当山去了，你们要接着走啊！

1947年夏我回到卫生队，在二分区活动了一个多月，张才干、李人林、王定烈部队从江南返回根据地，我们跟上了。大队北上经唐河时，我编在黄民伟领导的一个工作队里，我的脚伤又犯了，连大腿都骑马吊肿了，实在不行。北上估计有大战斗，这里是边沿区，保长是两面派，黄民伟把保长叫来当面说：我的人交给你，我返回来向你要活的，这是我的介绍信，你把我的人交给大张庄×××人。

以后我就在大张庄的学田庄上隐蔽了4个多月，一直到刘邓

大军南下归队，我们有 10 多个五师的老人（张羽、张西峰等）一齐回到了江汉军区。

回忆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学习二三事

何 冰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中共中原局为迎接民主建国新阶段的到来，在宣化店创办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以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将在日本投降前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中原解放区的几百知识青年，集中到民大学习。

1946年2月底，我从一纵队文工团调到民大学习，编在第一队第一组（住陈家河），与我同在一队一组的有秦焕如，许力以。他们两人和雷白江、傅炼及我，都是于1945年夏从重庆由组织上编成一组同到中原解放区的。雷白江也在一队；傅炼比我们晚些时候到校，分配在二队（黄家寨）。我们到解放区后，经过在青训班短暂学习（秦许未到青训班），于1945年9月分配到部队或地方工作，从此各奔东西。这次到民大学习，是我们第一次聚会。我们激情地称为“经受磨炼后的聚会”。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次学习机会。我们五人还可以在学习中互相帮助、检查在民大学习有哪些进步。到解放区学习是我多年的心愿，过去在学校读书，虽有满腔革命热忱、革命理论懂得却太少，仅读过“大众

哲学”和“社会发展史”等少数理论书，在地方农村工作中显得十分幼稚。

民大学习内容以“七大”文献、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报告》为主，辅以时事形势报告。教学方法是以自学为主，结合班组座谈讨论；个人学习心得或论文写出来后，张贴在队的壁报栏上，大家阅读、讨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住在老百姓家。房东的堂屋既是宿舍，又是自学、座谈讨论的课堂。村里的大晒谷场是全队听报告的大课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学习的内容。每天清晨为房东打扫庭院、担水劈柴。真正做到军民一家。

通过认真学习文件，理论联系实际地展开讨论、辩论，对当时形势有较明确的认识，增强了争取实现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澄清了一度存在部分同学中的“惟武器论”的思想，如有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投降的决定因素是美国投了原子弹。结合对秧歌剧“周子山”的讨论，个人主义危害革命事业这一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了大家，使我们认识到改造思想的迫切性。通过总结在农村工作的一段经历，我深刻地认识到“实事求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由于国民党军队紧缩包围，严密封锁，整个中原解放区的供应十分困难，特别是粮食、医药和布匹十分匮乏。时至3月，民大同学还穿着仅有的棉衣，没有单衣服可换；每天的主食就是野菜面糊。学校提出了“苦熬生产”的要求，发动全校师生生产劳动渡过暂时困难。因此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男同学上山砍柴，女同学挖野菜、将大块木柴劈成小块。由于周恩来副主席的极力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给中原区一些救济物资。4月，救济物资运到，民大的生活情况稍有和缓。当时救济总署是否拨给救济物资，还要经过该总署的湖北分署进行调查。民大是被救济单位，必须经过调查。要调查清楚我们这批学员是不是为

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调查人员不仅要与全体同学见面，还要深入学校找同学个别谈话。调查组成员有两名外籍人员：一位是美国人，李敦白；另一位是法国人（姓名记不起了）。在宣化店礼堂，他们与全体同学见面。李敦白用中国话向我们介绍了美国工人斗争情况。同学提问，有的用英文。他们经过实地了解，与同学个别交谈，对我们这批青年为赢得抗日胜利，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到中原解放区，不怕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朝气蓬勃、坚忍不拔地认真学习建国本领的革命精神十分钦佩。临别前，那位法国人曾对一些同学说：“你们这所大学的条件、设备之差，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极少有的；而你们所具有的先进思想，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极少有的。”

在民大学习期间，还聆听了董必武同志和陈少敏同志的报告。这两次报告令我永志不忘。

1946年，国际“三八”妇女节那天，陈少敏同志在宣化店礼堂给民大女同学和女工作人员作报告。陈少敏同志是中原局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杰出抗日女英雄。她对干部，特别对女干部十分爱护，要求又十分严格。她对人和蔼可亲，干部们甚至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姐。关于陈大姐能双手打枪，打得日本鬼子丧魂落魄，以及她坚决反对国内反动派的压迫，挑着孩子到湖北闹革命等传闻，在解放区外的老百姓中也传颂着。我们在从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途中就曾听到过对陈大姐的颂扬。今天能当面聆听她的报告，感到十分幸福。陈大姐亲切和蔼地开始报告：她首先表扬女同学们经得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工作积极肯干；学习认真努力；精神振作，并能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是走上革命道路的好开端。要保持和发扬，不能因此而骄傲。接着她语重心长地说道，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困难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难以预料的。要勇敢战胜困难，不改革命初衷，坚定不移地将革命道路走到底，她还强调地说，对妇女同志需要

有双倍的革命韧性，才能排除来自主、客观的干扰因素。陈大姐这些充满革命哲理的教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激励我在革命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敢于抗争、取得胜利。

同年4月初，董必武同志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兄弟解放区来慰问中原地区的同志。董老还到民大看望我们，并作了报告。董老肯定了我们到解放区后的进步。他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殷切地期望我们茁壮成长。他着重在入党问题上谆谆教导我们。他说，入党不仅要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党员，才肯于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献身。我曾不断地思考着这些话的深刻含意，在实践中鞭策着自己，注意改造思想以符合党的要求。在民大时，我被民大第一队党总支吸收入党。由于突围，一纵队党委未接到中原局组织部转去我的组织关系。在突围途中，一纵队党委对我谈了以上情况，并说，待突围后建立了根据地再决定我的入党问题。我愉快地服从党委的决定。1946年9月间，鄂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成立鄂西北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我被分配到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工作。1947年1月，第一军分区党委批准我入党。

民大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多彩的、令人难忘的。民大从建立到结束，仅有3个多月，而民大这片沃土对我们几百名知识青年在政治上的成长和革命才干的增强是功不可没的。

实验小学给了我革命启蒙教育

朱忠革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生活在一个进步的家庭。我的伯父、姑姑、叔叔、姐姐（朱伯深、朱仲丽、朱仲芷、朱竞之、朱忠勋、朱忠芳等人）早年就参加革命，奔赴延安。

1944年初春，我还不满10周岁，父亲朱仲硕就带着我和德姐从湖南老家途经武汉，投奔新四军五师。当时五师驻在大悟山一带。在路上有时我走不动了，就由挑夫挑着走，终于到达了师部驻地。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和姐姐后来进入了边区实验小学学习。

1945年初，王震伯伯率三五九旅南下到中原时，我认识了他。他真威武，神采奕奕，性格爽朗而又平易近人。他见我年幼，天真活泼，而且他又熟识我的姑姑朱仲丽和姑父王稼祥，所以收我为干女儿，并为我改名为朱思造，为姐姐改名为朱思进。他曾几次到学校看我和姐姐，鼓励我们认真学习，学好了本事将来才能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他的关怀教导时刻牢记在我心里，终生难忘，后来一直成为我在小学、中学、大学努力学习上进的动力。

在实验学校，经过测验，我分在小学三年级。但在生活上，我却和年长的同学一样，穿军装、打绑腿。我学会了打背包。我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在有敌情学校转移时，我和大伙儿一起行军。夜行军时我也和大家一样认真地向后传口令。过封锁线时，遇上敌人的部队路过，我们就趴伏在路旁沟里，一声不响地让敌人过去，我们再继续前进。我最喜欢唱歌了，学校在饭前、开会前都要集合唱歌。每逢这时，我就特别主动，有好几次我还自动上前指挥。有些歌曲的歌词，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学校的环境非常艰苦，我们睡的是地铺，除学习外还要轮流上山打柴、帮厨。有一次帮厨，切菜时我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尖切下了一小块肉，指导员立即送我到卫生员那里止血、上药、包扎。至今我的左手食指上还留有疤痕。尽管如此，我却过得非常快乐。

1945年3月，王震干爹南下，父亲也随他南下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来看望我和姐姐了。但牛健校长对我们全体同学却是非常关心爱护的，使我这个远离亲人的孩子，感到革命阵营的亲切与温馨。夏季来临，天气逐渐炎热时，我长了两手疥疮，痒得受不了，十个指头只能张开，试了各种治法总也好不了。后来牛校长用土办法给我治疗，把我的两手放在淘米水中浸泡、搓洗、可以闻到硫磺气味。这样慢慢地就痊愈了。更为糟糕的是，我长了满头虱子，抓不尽，灭不了，实在无法可想。牛校长说：“干脆，把头发剃了吧！”于是他帮我头发剃光，然后敷上油包扎起来，同学们都说我像个男孩子。

短短一段时间的学习生活使我的童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使我的人生历程更为丰富多彩。它给了我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基础；并为我打下了后来努力学习上进的思想基础及艰苦奋斗的生活基础。

1948年8月，我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附小学习时，二姐朱

忠芳将我带到沈阳，姑母朱仲丽和姑父王稼祥将我送进了八路军的干部子弟学校——东北实验学校。10月1日，开国大典，我聆听现场广播，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时，我热血沸腾，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1956年我加入了共青团。1955年我考入了北京医学院，1956年在北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后来任副主任医师。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是从小就在党的教育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不到10岁我就走进了革命阵营，是党教育我懂得了革命道理，教育我如何做个有用的人。是领导、同志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关心我，帮助我克服种种困难，使我受到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还有我家中的伯、叔、姑、哥、姐等多人和姑父肖劲光、王稼祥，他们早年就参加了革命，有的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的是老八路，在我和他们的交往中，他们言传身教，使我受到革命的熏陶。我由衷地感谢所有这些亲人、领导、战友和同志。1956年我入党后，曾到干爹王震家看望他老人家。他亲切地接待了我，风趣地回忆起当年我身材瘦小的情形，他有说有笑，吃饭时还往我碗里夹菜。

对实验学校的牛校长，我也很怀念，可是从中原突围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多方打听都没有结果。直到1995年我绕了几道弯才找到他，和他取得了联系。

忆中原北路突围

马兆祥

1946年中原突围后，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延安。有人对我讲：你们打了败仗，敌人把你们赶回来了。我听后深感难过，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我们中原军区是打了胜仗，而且胜利不小。请读《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书，即可一目了然。我是跟随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突围的，我亲身经历那次艰苦卓绝的殊死大决战，而且在战斗中负伤。现在把我亲历中原突围的情况写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

我是八路军的老战士，在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学习后，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新四军第五师（中原军区）参加作战。

我新四军第五师兵强将勇、战功显赫，威震敌胆。先后受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和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领导、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打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胜仗，有力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侵华日军投降后，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决策，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和北返部队共同组建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反动派准备于1946年7月1日发动总攻，企图一举歼灭我军。毛泽东洞察秋毫，及时识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号召我全体军民，奋勇反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指示中原军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在敌人发起疯狂进攻的前三天，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超凡胆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全面指挥作战。他命令我军于6月26日晚夜幕降临时分，分数路齐心协力向外突围。我军如数把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利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猛出击，跳出包围圈，从此拉开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我中原军区二纵队在正副司令员文建武、周志坚，政治委员任质斌同志指挥下，以十三旅和十五旅四十五团，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和行政公署等机关突围，攻克了平汉铁路沿线敌人的重要据点柳林、何家店、平靖关等咽喉要塞，歼敌主力一部。我军在初战告捷后，即挥师向西直进，抢渡了唐河、白河、丹江，进入了秦岭山区，并在陕南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很快打开局面，发展了四个军分区，建立起十多个县的党政军组织。在半年时间内，开展和完成了多项工作任务。1947年春，得到党中央同意，我军主力北渡黄河抵达山西晋城，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和补充，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纵队，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又打回被敌人蹂躏的中原地区……

9月中旬，我十二纵队经豫东淮阳地区汲塚体整。陈毅军长应李先念同志之邀，在百忙中亲自赶来慰问和看望我纵队全体指战员，并讲了话。陈军长说：中原地区是战略要地。我当军长，在名义上领导你们，实际上我们没有见过面，你们在豫鄂、中原地区孤军作战多时，战果不小啊！你们辛苦了！八年抗战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队和解放区在不断地扩充壮大。中原地区

是日伪蒋的心腹之地，敌人把你们视作眼中钉，对你们恨之入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首先调 30 万大军包围你们，妄想先下手为强，消灭你们。你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像猛虎出笼般地突围出去，转战各地，这可了不起啊！是你们牵制了蒋介石的 30 万大军，配合支援兄弟部队打了不少大胜仗。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和你们分不开的。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你们进行的中原突围是很成功的，你们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原以为你们损失会很大，没有想到你们仅一路就有万余人，我很高兴。有少数人认为你们打了败仗，那是错误的想法，是无知的表现，应很好地教育和纠正。现在我们大团圆了，兄弟部队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形势是越来越好！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军实行的大反攻开始了，我们还要打更多更好的大胜仗，迎接新时期的到来，争取全国解放战争尽快的胜利……陈军长的报告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李先念司令员接着讲：我们的老军长陈毅同志在百忙中前来慰问看望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使我们受到启发，增长了见识，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凝聚力。我们要很好地组织学习、讨论，应用到实际工作行动中去……大家高呼：“感谢陈军长的教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胜利万岁！”……陈毅军长的这次讲话，使我军干部、战士备受鼓舞，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到埋葬蒋家王朝的滚滚洪流中去。前进！前进！再前进！胜利！胜利！再胜利!!!

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指挥的二纵队三五九旅和干部旅，在突围中通过鸡公山、李家寨、武胜关越过京汉铁路，进军四望山，沿桐柏山，抢渡了洪水澎湃的唐河、白河和丹江。经过昼夜行军，在一天拂晓到达豫陕之间的荆紫关山脚下，突遇敌军胡宗南部 4 个师、刘峙部 5 个师向我军前后夹击……在敌机的轮番疯狂轰炸下，我军面对强敌，

以一抵十，进行猛烈还击。经两昼夜激战，敌我双方伤亡较大，但我军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进入了陕南山区……我军跋山涉水，经过秦岭山脉，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慰劳，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在欢迎我们的大横幅上写着：三五九旅“威震华夏”四个大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接见和欢迎全体指战员。朱德总司令首先登台讲话：“把同志们欢送出去，又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这亲切的话语立即引起了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掌声。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健康长寿！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万岁！”……我军在延安休息了十多天，奉中央命令，随即开赴晋西北吕梁山地区整训补充3个月后，又奉令调回陕北，投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

中原突围的片断

王景瑞

我是在胜利坚持4年大别山黄（红安）麻（城）经（扶）游击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背着新四军五师大悟山整风学习班给我的错误处分（把我的党籍按1937年10月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给我恢复1927年3月的党龄）之后参加中原突围的。我虽然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但我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当时我的基本思想大有“好汉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概。只要其他同志能够做到的事，我也一定要做到；家贫显孝子，国难识忠良，在突围的关键时刻再看英雄俺！

突围之前，我的职务是鄂东区粮食局副局长，局长是任泉生同志。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做布鞋，慰劳南下的三五九旅。在这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往机关运粮食（大米），后来边区党委和五师司令部等领导机关转移到铁路西的桐柏山区，大悟山只留下一个教导团。任泉生同志也随大军去了路西。我带着家属进入大悟山北麓的村庄住下，村里空荡荡地无人，夜间老伴吓得直打哆嗦。第二天清晨，却突然热闹起来，几个县的财经局长找我来，边区参议员任启衡（任士舜的叔父，梅店人）和参议员任鹤

宾等也赶来坚决要和我们一起行动。黄冈地区的税收人员，黄安（现红安）和黄陂中心县的税收人员也挑着一担担边币、一些银圆，源源到来。我们没有武装作掩护，有的人只有几支短枪、几个手榴弹，我们把银圆送给了教导团。教导团不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行动。我们只好请参议员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同舟共济，共同出主意想办法，互相帮助，由二位参议员和全体人员作证，把不便捎带的十三担边币当众烧毁。事后，任泉生同志向李先念司令汇报时，先念同志说：“烧得好。”轻装之后，我们组成约 200 人的便衣队伍，用担架抬着二位参议员行军，就这样信心百倍地等待中原大军回师宣化店。

当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驻在宣化店的时候，有 100 左右的县团级以上地方干部也驻在宣化店附近的菜园里，其中也有我。后来组织上派我再回信罗边任县委书记。当时县委的中心任务是帮助过路干部转移和引路，夏忠武、王光力等许多同志都是从这里走的。县委的其他任务是收税征粮、维护治安等。我驻在杜家畈，和各区区长相处得很好。我和各区负责人约定：同生死共患难，在突围的时候，一定要把各区负责人和愿意跟着走的同志集合在一起走。

1946 年 6 月 26 日中原突围，信罗边县委是 6 月 28 日才接到通知的。我们紧急集合，组成便衣队伍，从东双河车站附近过铁路，没有敌人开枪，过了铁路就是信南根据地，就像回到了家乡，我们很快找到宋珪同志。他纪律严明、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命令我们把公家的钱都交公。从此在宋珪同志带领下，我们团结一致，跟着干部旅走。信罗边的人有事大多找我。在这支队伍里还有地委的同志，我们互相帮助，就这样走上了突围的征途。在路上，我曾遇见潘友谔、张子明、王治国、王安民等同志。还看见过郑位三、王震、陈少敏和许多我熟识的同志。蔡承祖同志曾赠给我一匹好骡子，荆紫关战斗之后，我赠给了三五九

旅一位负伤的营长。从此之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过丹江时，我们脚不着地臂挽臂地漂过了江。过江后，脚烂了。在弹雨中闯过漫川关后，吴祖貽同志命令（陈大姐和李子祥也在场）我负责做说服工作，带领一个连的干部化装突围。有的干部嚎啕大哭不愿意离开部队。没有当年的哭，就没有今天的笑。中原突围胜利万岁！

血战前坡岭

——中原突围途中东赵川战斗一角

周 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集30万军队自信阳、罗山、光山、商城、黄安等地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为粉碎敌人阴谋，中原军区部队分别组成南北两路突围军，分头向陕南、鄂西方向前进。

一、大敌当前

我当时在中原军区二纵队十五旅四十五团一营任教导员。我们团、十三旅、二纵队机关、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组成的北路突围军，在军区李先念司令员、郑位三政委等的率领下，从宣化店出发，于6月29日越过平汉铁路，沿鄂北日夜兼程不停奔涉，大踏步向陕南挺进。

在我们前头，国民党胡宗南部层层封锁，迎头堵截；后面刘峙部队穷追不舍。7月中旬，我军在鄂西北的南化塘，经过激烈战斗，又一次冲破敌人拦阻，开始向陕南进发。上级命令我们担

任前卫任务的四十五团，先敌占领商南县东赵川。东赵川是陕南重镇，它扼守着陕南的大门。与此同时，国民党刘峙部已调集精锐人马，从郧西县马不停蹄地向东赵川扑来，企图抢在我们前面占领东赵川一线高地，封锁通往陕南的惟一通道，继而将我们歼灭在一条狭小的山谷中。

情势急迫，四十五团的阻击任务关系着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两万部队的生死存亡。经过简要战斗动员，指战员们群情激奋，摩拳擦掌，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赵川决一死战，彻底摆脱敌人纠缠，早日投入延安的怀抱。尽管好多天没吃饱一顿饭，饥肠辘辘，许多天没睡个囫圇觉，但这时候大家睡意和饥感全无，振作精神向东赵川跑步急行军。我们不但要争取时间先敌到达东赵川，还想吃上一顿饱饭，再狠狠杀敌。

二、抢占前坡岭

7月19日上午，四十五团的三营、二营、团直属队先后到达东赵川镇上。我们营担任团后卫任务，刚刚来到东赵川东侧半山坡，突然间从东南侧高地上洒来雨点般的机枪子弹，霎时行进中的队伍一阵骚动，营部机枪班长的左臂挂了花，部队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营长周子怀和我马上组织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察看敌情，修筑工事，投入战斗。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国民党第二十师谭乃大的部队，装备精良，受命不惜一切代价要在东赵川堵住我军，阻滞我军突围，以待后援赶到，吃掉我们。团首长命令我们营在东赵川东侧的高地前坡岭组织阵地防御，抗击敌人进攻，掩护中原局、军区机关和大部队安全通过。保证突围大军安全的重担落在我们营500多名指战员的身上，凭我们手中远远落后于敌人的武器，与数倍于我

的敌人抗击 20 多个小时。其艰辛和险阻不言自明，我不由得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们营连干部很快熟悉了前坡岭的地形，简要合计一下，便做出部署。营长周子怀率一连、三连在左前侧高地设防，我率二连、营重机枪排在右后侧高地建立阵地。不出所料，敌人也知道占领前坡岭的重要，他们经过一番调整部署，集结重兵向我们冲了上来。按计划我团的团直、二营、三营从东赵川镇上一边战斗一边转移到西北方向的四条岭，敌人跟着占领了东赵川和西南各个高地，得以腾出力量来向我们一营发动进攻。

下午 2 点左右，敌人以 4 个营的兵力，向前坡岭发起猛烈攻击。恶战在即，战士们都屏住了气，手扣在了扳机上。富有战斗经验的周子怀同志根据我们武器差、弹药少的弱点，要求战士们待敌冲到距我们 30 米时再打。

三、血染阵地

敌人的几十门火炮一股劲地对着我们阵地狂轰，弹片横飞，硝烟弥漫。一连的三班长和 8 名战士，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中牺牲。这些不但没有吓倒战士们，反而更加增强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坚守阵地、为战友报仇的决心。

在炮火的掩护下，饿狼似的敌人从三面向我们逼近，当敌人到达距我阵地 30 米处时，周营长大喊一声：打！顿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喷出了仇恨的火舌，杀声、喊声、军号声交织在一起，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队形中开了花，震得山鸣谷应。一连郭副连长率领突击队，端起刺刀跃了出去，寒光闪闪的刀刃刺向敌人的胸膛，1 个、2 个、3 个……敌群中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一个个歪倒在战士们的脚下，残余的敌人吓得胆战心惊，抱头鼠

窜，凶顽的敌人垮下去了。

经过短暂沉寂，枪声又起。敌人重整旗鼓，再次蜂拥而来，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火力更凶更猛了。没等敌人迫近，三连刘德康副连长率领两个排，猛然冲杀上去。战士们在干部的影响下，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拼杀。一连七班长、轻重两用机枪射手杨保松同志，刚掩护出击部队回来，又抱起机枪扫射，不幸的是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光荣牺牲。副射手立刻接过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一梭子弹没打完他又倒在了阵地上。弹药手看到班长和副射手倒在血泊中，怒火中烧，抓起机枪接着猛打，不一会他又负了重伤。战士们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心切，激战中竟忘记了转移机枪阵地。背子弹箱的战士，还没有学会使用机枪，也接过枪便打，刚打完一梭子弹，也饮弹身亡。紧要时刻，排长想到我会使用轻重两用机枪，赶紧跑过来向我报告情况，我得知后，跟身边的同志交待了两句，就三步并着两步跑了过去，端起轻重两用机枪，迅速转移射击位置，一口气打完了仅有的一箱子弹。进攻的敌人终于又被我们压了下去。但是我们伤亡也较大，许多同志牺牲负伤。为了掩护中原局和军区机关及突围大军安全通过，大家誓死坚守阵地，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又冲了上来。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搬起石头砸敌人；刺刀拼弯了，就掉过头来用枪托搥；和敌人绞在一起，就用手撕，动嘴咬。只要有一个人在，敌人就休想占领前坡岭。战士们高呼：“李先念的战士没有孬种，谁也不怕死！”

几经激战，黄昏降临阵地。纵目远看，阵地上，堆着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足有好几百具。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斗减员十分突出。

四、老团长捐躯

夜晚9时许，团长汪世才，身背望远镜，带着警卫员，摸黑爬上了我们阵地。战士们在激烈的火线上见到自己的团长，心情十分高兴，都围住他问长问短，诉说一天的感受。汪团长一边了解情况，一边亲切和蔼地和大家扯家常，鼓舞战士们坚守阵地的信心。指战员们谈笑风生，几乎忘却了是在生死搏斗的战场上。

一根烟没抽完的工夫，敌人的又一次攻击开始了。营长出于对红军老团长爱护，一把拉住团长的手说：“团长，这里很危险，你到后边二连阵地上去，这里有我在就有阵地，请团长放心。”汪团长谢绝了周营长的劝告，严肃地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同大伙一起战斗的，这么一场关键的仗，我怎么能后退呢？”我们非常理解团长的心情，战士们把这看在眼里，默默记在心中。敌人已经冲上来了。汪团长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握住德国造的驳壳枪对敌点射，几乎弹无虚发，敌人应声倒地，战士们跟着团长奋起杀敌，打得敌人立不了足，便狼狈逃窜。我们又一次打垮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战士们又围住了团长，一位战士问起了大家关心的事情：“团长，我们这次突围，说是到解放区去，是不是到延安？毛主席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团长告诉大家：“我们突围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一是为了生存，保存革命力量。二是为了在外线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力，配合内线各解放区的作战，争取全面反内战的胜利。”战士们追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延安？”

汪团长回答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延安去，但敌人阻拦我们的去路，那我们也准备就地创建根据地，等待时局的变化，

也许还要打回去！”团长的一席话使大家心里暖烘烘的。

正当团长和我们说得来劲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打中了汪团长的头部。周营长和警卫员急忙扶住团长的身体，老团长用尽最后的气力对大家说：“要坚守阵地，掩护……”。话音没落，他就倒了下去。团长的阵亡，就像一头猛兽在撕扯着全营指战员的心肺，大家无比悲痛，齐声怒吼：为团长报仇！打败狗日的胡宗南！有的战士激愤得端起刺刀在夜空中乱舞，恨不得立时刺倒射死团长的敌人，报仇雪恨。

五、老师长鼓劲

深夜时分，经过与敌人 10 多次拼杀，正在战斗小憩。忽然，通信员来通知说中原军区司令员、新四军五师的老师长李先念同志，此刻正在山垭口，派人专程请营长周子怀和我去介绍战斗情况。关键时刻，老师长来到跟前，我们不胜高兴。两人高一脚低一脚下山，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首长面前。先念同志镇定自若，亲切而又详细地询问战斗和部队情况。我们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一天激战和全营伤亡情况。当听说部队伤亡大，三连只剩下 10 余人时，老师长很难过，他鼓励和赞许了一营的指战员。我们对老师长说，别的什么困难我们都不怕，就是全营的子弹、手榴弹差不多打光了，战士们手中只有刺刀和步枪了，要求师长给点弹药。先念同志点点头，但他身边也没有多余的弹药，于是他决定将他的警卫队给我们留下一个班。这使我和周子怀同志几乎高兴得要跳起来。我们向司令员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坚守阵地，完成掩护大军通过的任务。”

与老师长依依话别，我们带着警卫班上了阵地。虽然他们只有 10 个人，但他们有 1 挺轻机枪、8 支美式半自动卡宾枪，而

且子弹充裕，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支生力军。我们让警卫班简要地熟悉了一下情况，就把他们配置在三连阵地上，也就是汪团长生前战斗的地方，是全天敌人进攻最猛烈的地方。这个班进入阵地不到半个小时，敌人又发动了猛攻。敌人万万没想到李先念的警卫班投入了战斗，前几次敌人进攻时，我们没有子弹，是靠刺刀反冲击杀退敌人的。这次不同了，待敌人密密麻麻冲到二三十米处时，全班一齐开火，1挺机枪，8支卡宾枪，火力很猛，一天一夜战斗的高峰，我们还没出击，敌人就垮了，阵地上一片敌人的尸体。这次战斗后的几个小时，敌人没再发起进攻。估计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以为又增援了新的大部队。这时，周营长命令警卫班归队，让他们回到首长身边。

六、挥泪撤离

7月20日拂晓前，团部派人来到我们一营阵地，通告我们：中原局、中原军区和部队已经顺利通过，军区首长表扬一营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我们奉命在拂晓撤出战斗，跟上大军。

撤出前组织掩埋烈士，转移伤员。面对烈士的遗体，熟悉的面孔，我和周子怀同志悲恸难抑。数百位和我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战友，把正值美好年华的宝贵生命，把向往延安、向往美好未来的愿望，留在了这万山丛中的前坡岭。行动不便的伤员们双眼含着泪水，疏散到当地群众家中养伤。许多重伤员死活不愿连累同志们，纷纷要求把他们留在山上。一位排长噙着泪花对我们说：“营长、教导员，求求你们吧，快把部队带走，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相信我们不会当叛徒的”。伤员们争着要求我们给他们留下手榴弹，让他们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

东方泛白，天将破晓，敌人新的进攻又要开始了。我们一步

三回头地向背后撤去，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猛烈疼痛。黎明时分，我们撤到后面不远的高地。听到前坡岭阵地上骤然响起的枪炮声，我和营长回首举起了望远镜，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们将永远记住长眠在前坡岭上的老团长和 200 多名战友！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恶战，我们营在前坡岭上打垮了敌人 17 次猛攻，敌人伤亡 500 多人，缴获一批枪弹，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原突围的北路大军安全通过东赵川的任务。前坡岭一仗以后，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主力部队进入陕西，按预定计划向前迈进！

历尽艰险话突围

——中原北路突围纪事片断

马 焰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回首间，中原突围已过去了 55 个年头。但 55 年前突围的件件往事，仍然刀刻般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无线电波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大悟山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五师的《挺进报》与区党委的《七七日报》合并，联合出版，我和原三军分区宣传科长应敏，被派往信阳前线做受降宣传工作。由于蒋介石阴谋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调动军队向豫鄂解放区进攻，五师受降被迫停止，我又被调十三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桐柏自卫反击战役结束，部队转移平汉路东，随即陷入国民党 30 万大军的围困之中。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

1946 年 1 月，大别山区北风呼啸，天寒地冻。

中原野战军二纵队十三旅驻扎在毛家集（原湖北礼山县城）。

刚过完元旦，就传来军区率大部队东去苏皖解放区，留我们十三旅坚持中原地区斗争的消息。接着纵队司令员文建武、副司令员周志坚来我们旅加强领导，并迅速调整干部，精简部队，将不宜坚持艰苦斗争的人员统统调出，跟随大部队转移。我送走文工队及政治部转移的战友，即随部队经黄陂站翻越老君山（俗称东大山）向郭家河、白沙关、油榨河、南向店一带转移。1月12日到达南向店以南地区，这时传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议”，公布停战命令的电讯；同时也获得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八五师由罗山龙升镇兼程南进，侵占我周党畈、定远店，企图抢占战略要点宣化店的情报。军区命令我们旅配合十五旅立即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我们以“打好停战前最后一仗”的口号，稍事动员准备，即于当天深夜出发，13日拂晓向侵占我定远店之敌发起反击。激战至中午，歼敌一个团，余敌逃往广水，我收复了定远店地区。同一天，原拟向苏皖转移的部队，遵照毛主席向全党全军下达的停战命令，折回豫鄂边界，就地停止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地区待命。我们十三旅三十七团驻防黄陂站，警卫中原局、中原军区，旅部率三十八团、三十九团则停留于罗山县的定远店、周党畈、潘新店、涇港店、朱堂店一线，与相距咫尺的国民党军对面相持，担负起宣化店西北线的重要防务。

我军停止待命区域，纵横不过百余里，人口只有四十万，都是久经战争破坏的区域，当地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这就使我们部队的物资补充，给养供应受到极大限制，给坚持斗争带来极大困难。

众所周知，当时，国民党当局并无和平诚意，只是由于进攻解放区失利，发动全面内战没有准备就绪，为了争取时间加紧内战的部署，蒙蔽社会舆论，蒙蔽要求和平的人民，迫不得已，借签订“停战协议”公布停战命令作缓兵之计。因此，他们一面公布停战命令，一面破坏“停战协议”，调动大军对我军中原解放

区实施包围，并以“蚕食”进攻手段，逐步向我进逼，我主力部队所在地区逐渐缩小，中原大地战云密布，形势日趋恶化。

那时候，国民党军对我区实施经济封锁，不准粮食、布匹、食盐、医药等物资进入我区，造成中原解放区物价上涨，粮荒严重，部队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吃饭全靠预征公粮和向富户借余粮，未满半年公粮已经用尽，只好以稀粥、野菜充饥。冬春已去，夏季来临，干部战士还穿着棉衣，每月一元的津贴、菜金、烧柴费和一切日常用品供给，都因财政困难而停发。伤病员没有药，指战员营养不良，人们情绪烦躁不安。中原六万大军处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情况下，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困境。

为战胜危难，打破困境，粉碎国民党军“围歼”的阴谋，中原局、中原军区3月下旬在宣化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郑位三政委将中原地区的形势概括为：兵力不够用，财力养不活，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脱。惟一出路是“坚持苦熬，能苦必胜”。动员军民“坚持自卫、临危不乱；节衣缩食、生产自救，渡过难关”。号召部队“团结群众、依靠群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树皮山果野菜拌粮充饥；捞鱼捉虾、猎山禽野兽补充营养，保障健康。

中原部队热烈响应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战斗号召，全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围困斗争。我们十三旅在这场严重斗争中，既抓生产自救，也加紧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中心，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斗力；广泛宣传国内外形势，揭露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罪行，教育指战员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严重的内战形势。并针对部队因国民党军围困、封锁与我军反围困、封锁斗争的深入发展（由仇恨国民党罪行滋长的急躁蛮干情绪，因复员引起的思想混乱动荡不安的实际情况），反复地进行了生动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部队团结，提高了胜利信心，增强了战备

观念，为后来的胜利突围，奠定了思想基础。

配合军事政治教育，我们还在全旅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将旅文工队分派到各团，深入连队广泛开展“秧歌运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激励部队战斗情绪。6月5日，旅政治部组织了战士秧歌演唱竞赛大会，演出了由战士们自编自演反映连队生活实际的《丁思清转变》、《王福才归队》、《军民一家》、《反动派的罪恶》、《我们是挖野菜的》和《自卫舞》等节目，吴世安旅长亲临观看，讲话鼓励。我旅开展“秧歌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6月10日，《七七日报》曾在头版以“十三旅开展文娱活动，秧歌闹得热火朝天”的标题，作了长篇报道。指出：“这个运动已真正深入到群众里面，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它不但已经成为战士所热爱的文娱方式，而且已经成为战士们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工具”。二纵队政治部出版的《野战报》也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开展秧歌运动》的社论，热烈祝贺秧歌在我旅连队普遍展开，并对秧歌运动的巩固与提高，提出了五条很好的意见。

我们旅在节衣缩食、生产自救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旅部和各团根据各自实际条件，发挥各自技能，广泛进行种菜、打柴、捉鱼虾、做豆腐、挖野菜。有的组织了打铁、做木桶、粪桶、编笼子、织布、做鞋、烧炭。有的安排人力搞运输，抽出一些部队参加修筑宣化店至河口公路，换取善后救济总署的面粉、饼干、黄油等食品；有的自己织布、挖树根、淋草灰染色，自裁自缝夏衣；有的将棉衣改单衣，用稻草、破布编草鞋。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当中原父老得知曾经流血保护他们、出力帮助他们的子弟兵，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得每天只能喝两餐稀粥时，妇女们洒下了同情热泪。老大爷发出了无限感叹，连开明士绅也动情了。某部驻地一个姓李的绅士说：“部队这样困难，是国民党逼的，我们要坛里匀米帮助新四军”。他立即匀米一百五十斤卖给部队。

我们宣传科的同志在田里挖野菜，一个老板走来说：“这田里的草籽（一种绿肥）能吃，怎么不挖哩？”我们说：“留给你们肥田呀！”那位老板感动地说：“不要紧，这是我的田。你们没吃的，比我肥田更要紧啊！”

斗转星移，时令进入仲夏后，中原地区战争气氛益加浓重，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中原解放区周围构筑碉堡六千余座，挖通战壕十万多条，将我中原军重重包围。他们不断在两军前沿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在罗山前线与我对峙的国民党军，竟横蛮无理地要求我旅撤离涩港店、朱堂店等重要集镇。

6月中旬，中原形势更加紧急，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国民党当局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军的总指挥，在驻马店、信阳、花园、潢川、商城设置高级将领指挥所。刘峙限令其所属部队“六月二十二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26日开始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击，妄图在“四十八个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部队主力。于是，北线国民党军在信阳、罗山、光山边缘区对我炮轰，南线国民党军也在黄安（现名红安）、孝感等地蠢蠢欲动。中原内战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敬爱的老师长——李先念司令员来到我们十三旅视察。他以浓重的黄安乡音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要捉拿位老（指郑位三政委），还要捉拿你们的师长——我呀！你们要不要他们捉？！”“不要！”指战员齐声吼叫。这时候，司令员举起拳头有力地向前一挥，“那就打他们个狗日的！”这简短话语，像一团烈火，霎时就把战士们的战斗激情燃烧起来。突围前，这一幕动人心魄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永难忘怀！

突破平汉路封锁线

仲夏季节，中原大地暑气蒸人。

我们旅直属队这几天的气氛也像天气一样炽热，紧张地为突围作准备。天天派人到二十里外的杨店背粮，大家都在炒米、烤干饼，还要利用空隙编草鞋……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人们猜测着部队将有大的行动。果然，从纵队领导机关传来了“粉碎国民党军‘围歼’阴谋”的动员令。

6月26日，天阴沉沉的，一团团的乌云，前推后拥，像大海中的巨浪在翻滚。大家忙着打背包，装干粮，干部们还要用布袋装银元。当晚提前开饭，天没黑，旅部机关队伍就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张家湾前面的打禾场上。作战科长一声“出发”令，队伍就迈开脚步沿着乡间小道向西北方向开拔了。

进抵杨店，暮霭降临。天阴得更深了，不久就淅沥、淅沥下起雨来。我们踏着泥水艰难地行进。雨越下越大，半夜过后，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天地一片黑茫茫，伸手看不清五指，前后左右一片水潭，弄不清哪是路，哪是田。黎明前通过潘新店附近的九龙河时，只见平时涓涓细流已变成浊浪滚滚，齐腰深的洪水，冲得我们直打趔趄。天大亮后，在罗山县的稻田湾一带宿营。

第二天雨过天晴，空气特别清新，我们奉命原地休息待命。这天，武汉知识青年夏风、何浩、周紫高，经纵队介绍由宣化店救济总署来到我旅，我分配他们到三十七、三十八团做宣传文化工作。28日部队继续西行，进抵涇港店西南山地长冲一带隐蔽集结。这一带，层层叠叠的山岭连绵起伏，葱郁的松林莽莽苍苍，真是掩护大部队集结的天然屏障。

29日傍晚，夕阳残照，红霞满天。我们突围部队分头集合，

进行战斗动员。干部们作轻装检查，战士们整理武器弹药，首长们忙着听取先遣部队的侦察报告，研究突破地点和路线。

为了迅速突过平汉线，军区确定兵分两路：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从武胜关以北的李家寨突破；李先念率军区机关和十三旅及四十五团，从柳林与何家店之间突破。李先念司令员命令我旅三十七团，晚十时以前，一定要以夜袭战术拿下何家店与柳林车站，掩护机关、部队胜利突围。他说：“突得过去，就是胜利；突不过去，就是惨败；你们只能胜利，不准失败！”

在苍茫的夜色里，我们沿着峡谷匆匆向西进发。这天轮到我是旅政治部的带队值日，负责督促大家不掉队，顺利通过封锁线。我感到担子很重，确定重点照顾文工队那些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战斗和行军考验。我奔跑在队伍的头前尾后，大脑和肌体都十分紧张，弄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不敢稍有疏忽。快临近平汉路时，天空飘洒下霏霏细雨，我们穿行在山谷丛林，天漆黑，路难行，遇到陡坡隘路，一停就是十几分钟，过了隘路又得一阵小跑，才能跟上队伍。就这样停停跑跑，跑跑停停，行军速度越来越慢，大家非常着急，都担心天亮前如果突不过平汉路，那就糟透了。

大约夜里十点钟光景，机关部队到达扇子山脚下的戴家庙，从这里翻过一道山坳，出了山口就是平汉铁路。我们攀上山坳，眺望前方，隐隐约约显现点点灯光，显然，那就是敌人的据点。这时，队伍前面传来“原地休息，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的命令。大家精神陡然紧张起来。

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从何家湾方向传来了清脆的步枪声，紧接着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响成一片，原来是三十七团在攻打何家店和柳林车站。他们炸掉了敌人的碉堡，摸进敌人营房，战斗一个多小时，基本消灭了柳林、何家店敌人。可是铁路沿线的敌六十六军部队，听到枪声从南北两面赶来增援，我三十七团一、二

营迅速占领柳林、何家店左右高地，分别向南北两面堵击；三营封锁黄庄。双方对峙，战斗非常激烈。就在这时，一批战斗部队和中原军区机关工作人员，从撕开的缺口冲过去了。我们的旅直属队在天将破晓时，进入河谷，平汉铁路锃亮的铁轨立时呈现眼前，各条路口都有人指示方向，低声呼唤人们快速前进。铁路两侧有一小片开阔地、分布着一丛丛小竹林，越过铁路还有一条小沙河，敌人的机枪在不断扫射，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舞。我们冒着弹雨，不顾泥泞路滑，一溜小跑跨过铁路，涉过小河进入山口。就在临进山口时，一颗子弹击穿挑夫老张的衣袖，打进了我的背包，将我的夹被烧烂了一个洞。

30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已急行军20余里，在甘家冲一个村子休息做饭。我端着一搪瓷碗开水，坐在晒箩里边喝边休息，突然眼冒金花，满头虚汗，栽倒在晒箩里，多亏医生及时抢救，很快恢复了知觉，当时我只感觉浑身软绵绵、四肢没有一点力气，实在是太累了。饭后小憩了一阵，又带病随队前进。当天下午在霏霏细雨中，到达河南信阳的无双河附近，在一座大庙里宿营。

7月1日，我们在行军中庆祝了党的25周年诞辰。这天天色微明，灰蒙蒙的雾罩着田野，队伍顶着稀疏的雨丝又上路了。我们走了一程，来到大庙畈街东的飞沙河畔，上级命令就地停止，再次动员轻装。规定每人背包不能超过五斤。我只留下一个夹被、一套军装和衬衣、两双布草鞋，一把雨伞和挎包，其他什么东西都扔了。我背了七八年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实在舍不得，扔掉后又拣了起来。大轻装后，部队渡过飞沙河，走过大庙畈街道，翻越火烧寺，在豫鄂边界的朱家店与河南军区的同志会合，在这里我们停留了一天。

突围以前，我新婚的妻子汪诚就打摆子（湖北人对疟疾的俗称），体质虚弱，走路艰难。这两天又高烧不止，我只好搀扶着

她，走走歇歇蹒跚前进。到朱家店我去拜访了河南军区政治部的老战友张难主任和李建安宣传科长，商妥将妻子和文工队患病的两名由重庆戏剧专科学校来的大学生尤加利（田庄）、路瀛身留给他们，待机化装转移华北解放区。第二天中午，妻子的武汉同乡学友夏风、何浩、周紫高，都来赠助路费，道别送行，真挚友谊，感人肺腑。

飞越唐、白河

7月3日下午，我们离开朱家店地区，向西长驱直入兼程前进。7月4日进抵枣阳以北地区，使刘峙原定4日前在天河口、高城之线“围歼”我军的美梦遭到破灭。刘峙不甘心失败，又命令十五军、四十一军“跟踪追击”，协同第十军于7月7日前，在鄂北、豫南之间平原河流交错地区之苍苔一带，截击“围歼”我军。并出动12架飞机侦察扫射封锁唐河渡口，迟滞我军行动，迫我背水作战。

我前卫部队三五九旅在枣（阳）北刘升店、吉家河等地，击破第十军三师、二十师的伏击和阻截后，我们不顾疲劳和饥饿，以日行一百夜走八十的急行军，于7月6日进入河南唐河的湖阳一带，扫清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夺取了唐河东岸的程家河、郭滩渡口。

枣阳、唐河一带，曾是我中原解放军战斗过的地方，湖阳镇又是二纵队首脑机关所在地，我党我军在这里留有深刻的政治影响，这次我们十三旅到湖阳，人民群众就积极出夫、筹粮、找船、送门板、桌凳支援我军渡河作战。在人民群众的热情帮助下，我军很快在郭滩渡口架起了一座浮桥。

7月8日，部队分成数路纵队飞渡唐河，沿着湖阳——郭滩

——沙堰公路急速前进。大约九十点钟，国民党空军三架飞机呼啸着飞临我们行军纵队上空，顺着公路低空盘旋，轮番交叉俯冲狂射。霎时间，马达轰鸣，弹火纷飞，伴随着弹壳脱落的哗哗响声，组成一种特有的战争交响乐。人们就地隐蔽在公路两旁的道沟里和长满玉米、谷子的田野中。那时，我正走在路当中，无处隐蔽，就以公路边一块石碑作掩护，飞机从东向西俯冲，我就转到石碑西侧；它从西向东俯冲，我就转到石碑东侧；时东时西和敌机捉迷藏。我们能清楚地看见飞机翼上国民党狗牙党徽，时隐时露的驾驶兵的头盔，看着敌机那股疯狂骄横劲头，气得战士们不住地骂“蒋该死”。就在敌机疯狂肆虐时，突然响起一阵机枪射击声，原来是一个战士恨急了，端起机枪仰面躺在地上，对着低空盘旋的敌机打了一梭子。咳！还真见效，敌机怕再挨揍，翘起尾巴升上高空，不敢低飞了。于是战士们竞相效尤，只要敌机临空，机步枪一齐对空射击，就这样，敌机的狂劲被打掉了，再也不敢低空俯冲扫射了。这场延续十几分钟的地空战斗，除打伤我们旅供给部一位女同志和一匹驮骡外，别无任何损伤，敌机却白白消耗了许多汽油和弹药。

从这天起，我们改为白天休息，夜间行动。又经过一夜急行军，穿过了南阳盆地，在新野的沙堰附近跨越南阳——襄樊公路，渡过白河，从湍滩以北徒涉过赵河，9日沿着严陵河东岸，经邓县白牛、过镇平的黑龙集，到达贾宋附近的太山庙一带宿营。当夜，我们十三旅一部袭击贾宋镇，打掉镇公所，烧毁敌碉楼。10日清晨，三十七团部队进击马庄街，全歼国民党乡保武装，缴枪50余支。打开国民党贾宋区长王启予的粮仓，补充部队给养，救济贫苦百姓。

这天上午，阳光融融，万里无云。我带着文工队员进入马庄街，刷标语，宣传我党我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政治主张。在马庄小学会见了留校未走的教员赵寅玉，赵和我是同村，又是少年

时代的同学。我向他了解镇平的政治、军事情况，解释了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他对我讲述了1945年11月，我军解放新野时各阶层人士的反映。傍晚部队离开马庄前，我将他送出我军警戒线。

我们中原突围部队进入镇平境内，黑龙集一带群众，深夜聚集路旁，给部队送水送干粮；我们包围进袭贾宋镇，也得到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暗中配合。指战员们纷纷赞扬：“这里的群众真好！”

7月10日，夕阳西下，黄昏来临，我们离开镇平地界，向西北方向飞速前进。

夜幕渐渐张开了，淡淡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四周静悄悄地，除了嚓嚓的脚步声外，什么声响都没有，只有队伍经过村落时，不时听到犬吠和国民党保甲巡更铜锣的低沉声音，偶尔远处也传来零星的枪声，给夜阑更深增添了一些神秘而紧张的色彩。午夜时辰，我们徒涉宽阔的湍河。水浅滩阔，两岸之间尽是漫漫白沙，一脚一个深窝，行走很是艰辛。穿越内乡——邓县公路后，经过十林，11日拂晓到达内乡西南的师岗地区。

师岗位于伏牛山南麓内乡——淅川公路上，这里北靠高山，丘陵起伏连绵。内乡四个保安团，利用这有利地形，在四周山岗放冷枪阻击我军，妄想以“麻雀战”迟滞我军，好让国民党正规军赶上来与我们在丹江东岸决战。我前卫部队三十七团，听见哪里有枪声，便向哪里出击，把保安团打得四散奔逃，歼敌200余人，扫清了前进道路，保障了大军在师岗安全宿营。

至此，我北路突围部队历经四昼夜，飞渡唐、白河，横穿豫西南平原，插入伏牛山南麓，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要在豫南鄂北平原、河流交错地带截击、“围歼”我军的阴谋。

抢渡丹江

我们飞越唐、白河，横穿豫西南平原，插入伏牛山南麓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他斥责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行动迟缓，作战不力，“勒令查办”。严令刘峙督促所部“跟踪追击”，务于7月20日前寻找有利时机，“全歼”我军于丹江以东地区。并增调胡宗南部之第一师、六十一师，星夜赶赴豫鄂陕边之荆紫关据险防堵，迫使我军与其在丹江一线决战。刘峙不敢怠慢，急调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十五军、第十军配置于南阳、镇平、内乡以南和丹江沿岸的淅川一带堵击，另派两个师尾随我军紧追不舍。

我军遂由师岗兵分两路。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直属机关及十三旅和四十五团为左路，经南化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王震率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右路，取道荆紫关、竹林关向山阳、柞水方向前进。11日夜色苍茫时，我们正沿内乡——淅川公路向西疾进，路遇陕西商人的驮盐马帮，我们向他们商借了一些马匹和食盐（立了借据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归还）。天亮以前进入淅川境内，在沿公路的村落宿营。12日晚继续西进，从马蹬镇西北渡过老灌河后，天气骤然变化，狂风呼啸，闪电雷鸣，倾盆大雨铺天盖地卷了过来。分不清天地、田野、道路和村庄。我们顶着狂风暴雨，艰难地行进着，全身淋得像落汤鸡。雨水淹没了道路，人们滑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滑倒，满身泥水，简直和泥猴子一般。就这样经历了一夜艰辛跋涉，天将破晓，进抵淅川县城与大石桥之间的丹江东岸，在江堤丛林里就地休息。

内乡、淅川、邓县是宛（南阳）西土皇帝别庭芳经营几十年的老地盘，别庭芳和他的继承人刘顾三，心毒手辣，对人民统治

残酷。我们所经村寨，大都有人打更值夜，沿路都能听到断续的锣声和零散的枪声，那种紧张气氛，和唐河、镇平大不相同。尤其是部队进入淅川以后，由于老百姓深受国民党欺骗宣传，所过村镇，群众空室清野，逃避一空，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连一日三餐的给养都成了问题。加上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指战员普遍体力下降，疲惫不堪。愈是困难，就愈需要加强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强调部队要严格遵守纪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借住民房，不管有没有房东在家，走时都要归还所借物品，打扫干净；吃了群众收藏的粮食，都要在原地留下银元和信件，说明情况表示感谢；所到之处，就是见到一个群众，也要进行宣传慰问。我军这种秋毫无犯、爱护人民的实际行动，给宛西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7月13日，我们到达淅川地区时，淅川、马蹬、李官桥、荆紫关等地已被国民党军所控制，他们正从东南北三面向我们包围拢来。前有滔滔丹江，后有数万追兵，情况万分紧急。军区首长断然决定：三五九旅派部队包围淅川县城，并向荆紫关方向前进，十三旅以两个团断后，一个团包围马蹬，奇袭李官桥，掩护大队人马抢渡丹江，摆脱合围之敌。

丹江源于秦岭，蜿蜒曲折流向东南，经豫鄂陕三省边界，注入汉水，汇流长江。它本来并不算大江大河，平时中上游随处都可以徒涉。可是当时正值盛夏季节，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河槽涨满，江水奔腾咆哮，浪滔汹涌翻滚，看去好似一条小黄河。我们一整天就隐蔽在江堤树丛里，待命渡江。

雨过天晴，骄阳似火，潮湿的土地被晒得升腾起迷蒙烟雾，即使偶尔吹来一阵风，也是热的，吸进鼻腔，憋得你气都透不过来。我们零乱地散布在江堤上，有的依着树干打盹儿，有的盯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出神，有的议论着怎么过江。司令部的参谋们不断派侦察员出去探查江水深浅，寻找船只和徒涉路线。江面上空

三架敌机穿梭盘旋，监视、封锁渡口。银灰色的机翼，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亮光。不时另有敌机临空，盲目扫射，使气氛更为紧张、焦急和不安！

晌午过后，侦察人员找来了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大爷。在老人的指点下，反复探查，终于在淅川县城以西约五里的人字坎城，选定了可以徒涉的渡江点。简佐国参谋和魏赤龙警卫队长率领三十余名水性好的战士，跳进丹江徒渡到对岸，突然发起冲锋，赶跑守敌，占领了老人仓滩头阵地，后续部队一个连，也在黄昏前冒着敌机的密集扫射渡江增援，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大队乘夜渡江。

太阳好不容易沉入地平线，黑夜张开了帷幕。左翼部队在夜色掩护下齐集江边，进行渡江组织与动员。我们将人员按高矮强弱搭配，十余人编为一组，强助弱，高助矮，手拉手肩并肩，形成一个个椭圆的环状队列，徒涉过江。上级要求大家直线前进，不要拐弯，不要停留，否则误入深水区或深陷沙窝，就有被洪水吞没的危险。有的矮个子和女战士，干脆要他们双手拽住马尾巴，让马拖着漂浮过江。我们徒步进到江心后，水流湍急，如果脚步稍缓，脚下的沙子就被激流淘空，立身不住，身子轻飘飘，不由自主地直向上漂。白花花的浪滔，一个接一个地吼叫着，翻滚着，不由得感到头晕目眩。大家提心吊胆，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低声警告：“拉紧手，眼平视，向前看，快步走！”在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安全渡过了丹江，只有几个战友被无情的江水卷入激流葬身江底。我们面对着狂涛恶浪，向牺牲的战友志哀：安息吧！反内战、求和平、争民主的勇士们！

7月15日大清早，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赶到丹江西岸一个叫金家营的小山村埋锅造饭，并趁机向金玉光老乡做工作，将文工队一个不能继续随队行动的病号——张韬同志，安置在他家养病。大家挥泪同张韬告别，亲切嘱咐他病愈后自己设法

回解放区。如今已经 50 多年了，张韬同志您在哪里？战友们都还在想念您！

饭后，我们沿着滔河北岸，马不停蹄地向着南化塘进军，当天抵达湖北郧县的梅家铺宿营。右翼部队在掩护左翼部队渡江后，也在荆紫关下游的娘娘洞渡过了丹江，绕道鲍鱼岭进入陕南。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全歼”我中原军的美梦，就这样又化为泡影。

杀出一条血路

北路军左翼部队突破国民党军丹江防线进入郧县梅家铺地区，蒋介石狗急跳墙，接连三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地区，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并悬赏捉拿李先念、王震等人，标价捉一个赏洋 300 万元。刘、胡即调遣第一、三、四十一、七十六、九十等 5 个整编师，部署于鄂豫陕边境，构成三道封锁线，阴谋将中原突围的北路军合围于滔河南岸的孤子垭、白桑关一线，聚而歼之。

7 月中旬有几天，天气阴晴不定，变幻无常，一会儿烈日当空，暑气蒸人，一会儿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汗水和着雨水，我们的军衣经常是湿漉漉的，散发着浓重的汗酸臭味。16 日我们北路军左翼部队在李先念亲自统帅下，由梅家铺出发，沿着滔河行进在白桑关北侧的崇山峻岭中，日夜兼程地西进。行经孤子垭以东的鸡子岭时，遭遇国民党军的阻截。我们派出了一支部队，分成 3 路向鸡子岭冲锋，全歼敌人四个排，顺利地通过了孤子垭，越过白桑关一线，继续向南化塘挺进。此时，王震率领的北路军右翼部队，也已突破鲍鱼岭国民党军的堵截进入陕南。蒋介石的合围阴谋又告破产。

南化塘位于湖北郧县的最北端，是鄂陕边界的战略要点，也是我中原军西入秦岭必经之路。这里峰峦叠嶂，山势陡峭，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就是在这里击破胡宗南第一师的堵击进入秦岭和大巴山的。南化塘的东北，有一座海拔 940 米的玉皇山（当地人叫玉皇顶），它东南紧挨岗子梁，西北连接鲍鱼岭，峥嵘峭拔，高耸入云。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一旅，已于 16 日下午控制了玉皇山地区，封锁了鄂陕边界的重要隘口，堵住了我军进入陕南的通道。

17 日晨曦微露，我军先头部队进抵南化塘，发现前进路上高山阵地、重要隘口均为敌军占领，全军机关部队遂转到滔河左岸，翻越狮子垭进入黄土凹附近，拥塞在一条幽深狭长的山沟里，占据当面一线山头监视敌人，派出侦察部队另找新路。当时，我们前有大军拦截，后有追兵扑来，真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

这条山沟，三面环山，一条小溪由北向南缓缓流过。崎岖的山径循山根跨小溪。蜿蜒曲折直达一个马鞍形的垭口通往秦家曼，玉皇顶就在它的东北面。我们大队人马阻塞在这里待命，谁心里都明白，眼前已是万分紧急的生死关头，只有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才是生路。队列里悄无声息，谁都不愿说什么，每个人的脸，都像铁板一样凝重。

不久，从远处传来阵阵嗡嗡声，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它顺着山谷飞了两个来回，撒下许多反动传单，传单上写着：“要想还乡，投降中央”等等。要求我们部队就地停止，要李先念将军到老河口谈判。我们根本不理这一套，大家随手将传单撕得粉碎，有人还俏皮地骂道：“做梦娶媳妇，想的倒美！”

指挥员们不顾敌机骚扰，登上山头观察地形敌情，毅然下定决心：坚决冲破敌军阵地，打开入陕通道。决定由我们十三旅三

十七团担任主攻，正面突破，杀出一条血路。三十八团由右翼出击，三十九团在左翼掩护，十五旅四十五团阻击尾追之敌。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强攻胜利。李先念司令员严肃地对夏世厚团长说：“敌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企图在这里围歼我们。我命令你们三十七团担任主攻任务，选择一个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掩护部队突进陕南。”

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河南固始县人，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他身矮体瘦，行动敏捷，打仗精明灵活，能征惯战。战友们亲密地送他一个“夏猴子”的雅号，公认他是新四军第五师的一员虎将。他带领的三十七团是一支经得住任何严峻考验的勇敢坚强的部队。夏团长接受命令后声如洪钟，拍着胸脯向首长保证：“只要三十七团还在，不怕敌人不给让路！”夏团长选好地形，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只见前方山头、垭口，都有敌人构筑的简易工事，要杀出一条血路，必须突破玉皇山西南一条横断山梁。这条山梁长约2000余米，呈梯形状，顶部凸出，朝我军一面的坡度较陡，易守难攻。他收起望远镜，右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血路就从这里杀开！”猛地转过身对全团指战员说：“同志们！这一仗，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打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流血牺牲，与敌人战斗到底，不要说什么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就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要把它打个稀巴烂！”他右手指着横断山梁，提高嗓门喊道：“我命令全团一起出击，誓死夺取敌人阵地，为突进陕南杀出一条血路！”

战士们奋勇当先向山梁冲去。敌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固抵抗。我们组织了数次冲锋，一直打到下午，只攻到山腰，情况仍很严重。李先念司令员当机立断，指示十三旅炮兵打光炮弹，也要摧毁敌人火力点，掩护部队接近敌人，并命令夏世厚团长重新组织进攻：“一定要完成杀出一条血路的任务。”

下午3时许，更艰苦的血战开始了，四门八二迫击炮一字排开，所有的炮弹都准确地倾泻到敌军阵地上。然后，炮兵战士噙着泪花，忍痛砸毁了自己心爱的火炮。夏团长调整部署，以二营为突击队，组织党团员、战斗英雄，每人腰插三四颗手榴弹，由营长李俊山亲自带队，在数十挺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齐声高喊“冲啊！杀！”全营人马像旋风似的扑了上去，一、三营紧跟二营从左右两翼向前冲击，与敌军展开了白刃格斗。胡宗南的“王牌军”到底与刘峙那些“豆腐兵”不同，他们组织反攻，集中火力猛烈向我攻击部队射击。炮弹在山腰开花，子弹雨点般地倾泻，我军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一营教导员薛国斌（河南确山人）腹部中弹，肠子从伤口流出来，坚决不下火线，躺在地上高喊：“同志们，快冲啊！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二营长李俊山（四川人，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头部负伤，仍忍着巨痛，坚持指挥部队向前冲杀。兄弟部队也从侧翼展开猛烈进攻。经过几番激烈争夺，三十七团终于打破敌军三层防线，攻占了横断山梁的梯形阵地，歼敌400余人，硬是把国民党军玉皇山防线撕开了一条2000余米的缺口。我军坚守两翼，掩护大队于夜幕降临之前，头顶蒙蒙细雨，脚踩泥泞小道，穿过那个马鞍形垭口，突出重围，急速向滔河上游秦家曼进发。

突围的血路杀出来了，而我们的年轻英雄营长李俊山，优秀的政治教导员薛国斌，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三十九团副团长欧阳藩，以及近200名英勇的革命战士，却血洒玉皇山上，为保障全军安全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至今谈起来，幸存的战友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们，为他们过早的牺牲而痛惜！

最艰难的时刻

7月17日，我军在南化塘粉碎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的堵击，晚上越过鄂陕边界，在秦家曼稍事休息后，18日拂晓，沿着滔河向西北方向挺进。经过19日至20日在东赵川，21日在梁家坟的两次血战，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堵截，渡过了被围歼的危机，进入秦岭支脉——新开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又陷入了疲惫、饥饿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7月24日，李先念等电报中央就指出：“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豫鄂陕山地后，主客观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部队困苦之况，绝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

秦岭山区的道路，大都是随着山势蜿蜒形成的一条条很深的、不定型的崎岖小道，这里是所谓两山夹一沟，沟河相连，路沿沟走，沟路难辨。我们突围部队没日没夜地在这曲折、回旋的羊肠小道上奔波。其中，最叫人难忘的是那段被人称做“七十二道脚不干”的路程。那里山势巍峨，沟深路险，有些地方两山相接，形成“一线天”。山沟里阴沉沉地长年不见阳光。在7月炎热的季节，河水还冰凉刺骨，腐叶枯枝沉落沟底，使河水都变成黑色。我们随着山势沟回路转，一会儿走沟沿干路上，一会儿下沟底河水里，没完没了地交替盘旋，弄得一双草鞋，一两天就烂得不能再穿，没有鞋袜补给，只好充当赤脚“大仙”。脚丫被细砂子磨得露出了红肉芽，脚板被河水泡得脱皮起皱，就像海蜇皮。不少战友腿脚受感染，轻则奇痒难忍，重则腿脚肿胀，走起路来苦不堪言。我亲眼看见突围时才由地方转来我旅的知识青年夏风两腿肿得老粗，一颠一跛艰难地跟着部队走，我很同情他，但也爱莫能助，只能以“走到延安见毛主席”的宽心话，鼓励他

坚持不掉队。令人欣慰的是，小夏终于以坚强的毅力战胜困难，胜利地坚持下来了。

陕南地广人稀，一连几十里都难看到几户人家，加上军队所到之处，居民多逃避一空，想找一个带路的向导都极为困难。21日那天，我们到达黑龙洞一带宿营，那里是一片荒野，四周山峦长满灌木丛林，连一块稍大的平坝都没有。放眼眺望，只有两三个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错落地散在山洼洼里，被那高低不一的丛林掩映着，庄户人家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十三旅直属队在山坡丛林里露营，碰巧天公不作美，又滴滴答答地下起雨来。人急智生，大家就把相近的小树捆在一起，形成天然“帐篷”，折些树枝野草垫在地上，再在下面挖一条小沟，让雨水顺着小沟走，每两个人撑一把雨伞，背靠背坐在草垫上打盹儿。由于不断遭受风雨侵袭，我们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醒转来，连续的行军打仗，我们疲劳已极，只盼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息，也就心满意足了。突围路上，类似这样露天宿营的情景，算是家常便饭了。

抢渡丹江后，右翼部队三五九旅走在最前面，国民党军队在后面紧追，接着我左翼部队又跟踪前来，在这山高地狭少粮的贫困地方，经过大军连续三次过境，可吃的粮食都被在前面走过的部队吃光了，特别是国民党军队走过的地方，粮食、牲畜被抢得精光，后来的部队哪还能找到粮食！就在我们到达黑龙洞一带时，突围部队已完全陷于粮尽盐绝的困境。

人马饿得走不动了，首长命令杀马吃。这天我们每人分得一块马肉，没有锅、没有盐，就用枪探条穿成肉串在火上烤，虽说半生不熟淡而无味，啃着填饱肚皮，也还是令人高兴的。烤肉啃光了，就四处找南瓜、嫩玉米穗、玉米秆，生的吞着充饥。再后，连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就采集南瓜叶、豆叶、灰子白的老帮子，放入搪瓷杯里。三块石头架成灶，用清水煮软了吃。要问

这清水煮南瓜叶老菜帮是啥味道？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那时候，只管狼吞虎咽填肚皮，有谁能顾上去品味道！

土豆是陕南人民的主要食品之一，生长在很陡的山坡上。我们这支以湖北、河南人为主体的队伍，过去在中原，甭说没吃过土豆，就是土豆是啥样子也没见过，哪会知道怎么吃啊！来到这听说土豆能吃，跑上山挖出来，蹭去泥土就往嘴里塞，哪知道刚咬一口，就麻得舌头、嘴唇都木了。有了教训，才学会用火烧熟吃。后来，土豆成了我们的救命粮。

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要能找到一把燕麦面、几颗玉米豆，那就是最上乘的食品了。有一次，我们政治部几个同志找来了一碗燕麦面，掺在豆叶里煮稀粥，找不到锅，就用一个瓦罐代替，不料粥还没有煮好，瓦罐底却烧掉了，大家无限后悔和惋惜。

人不吃食盐，就会浑身软弱乏力。我们进入陕南，曾一连七八天没有吃过一粒盐，加上生南瓜、豆叶等杂物吃多了，人们普遍泻肚子、拉清水，弄得个个眼窝凹陷，下巴尖长，干瘦得不成人样。浑身发软无力，走路东倒西歪像贪酒的醉汉。那里气候无常，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山下是大晴天，山上却雨蒙蒙，或是山下有雨山上晴。我们穿的衣服也随着天气变化，一会儿湿，一会儿干。我们清晨向山上走，黄昏到山脚行，真是攀上这山翻那山，“走完一岭又一岭”。爬上山顶，远望层层叠叠的山峰，只见一山更比一山高，心里就犯咕噙，老惦记着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秦岭？就在攀越这些群山的征程中，体弱有病的战友们，有的掉队了，有的嘴冒白沫倒在路旁，我亲眼看到这些悲壮的场景，怎不叫人心酸悲痛！

我还清楚的记得，在到达白鲁础的前一天，要跨越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当时饥饿、劳累已把我们拖得精疲力竭，能不能跨越过去，谁也没有足够的信心。那天清早，我们政治部四位科长坐在山脚下休息，我正望着山腰淡淡的晨雾，天空飘动的白云，

沉思出神。旅副政委肖元礼忽然来到面前，把他杯子里的玉米豆，抓给我们每人一把，虽说这把玉米豆不能填饱肚子，但在那漫漫突围路上，在那人迹罕见，生死攸关的环境里，几颗玉米豆，却深刻体现了首长的亲切关怀，战友的深厚情谊，给我们增添了战胜艰难的精神力量。

队伍出发了，我仰头望着那云雾缭绕的山顶，禁不住头眩晕、腿发软。但我心里很明白：攀上去才有生路，掉队下来死无疑。下定了决心，就手拄一根树棍，咬牙拼命往前走，还自己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看准前面的树或石头，鼓励自己一气走到这个目标，到达后再向前定新目标。这样分段前进，逐步克服了发憊心理，树立了信心。我终于登上山脊，征服了这座高山，胜利到达白鲁础宿营地。

白鲁础是个稀稀散散有几十户人家组成的不相连的村庄，它坐落在一条宽阔的山沟里，在商南南部山区，这算是大的村庄。我们在这里停留一天，整顿队伍，安排化装离队人员。旅文工队的多数人，就是这次化装离队的。也是在这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前卫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24日大队离开白鲁础，北出狗头坪向山阳东南的龙山地区进发。我们旅直属队及四十五团一部，由肖元礼副政委率领，奉命向白鲁础西南郧西方向活动。就在这一天，路遇两个挑盐的，我们用银元买下这两挑像大理石样的“盐巴”，用石头砸成小块，大家迫不及待，两手抱着就舔。连续两个夜行军，在一天的黎明前，来到郧西黄云铺背后一座山上停下休息，等天亮后一看，山下公路上尽是国民党军队，黄澄澄的像蚂蚁样蠕动着。我们南去郧西不成，只好就地隐蔽在树丛里，没有吃，没有喝，顶着阳光晒得饥渴难熬。午后时分，大家分头下到山的东侧找吃食，不料前哨与国民军队打响了，在枪弹的呼啸声中，我们越过一条深沟，攀上另一山头向东北撤退。就在这紧要时刻，肖副政委的坐

马被流弹打伤，警卫战士搀着他撤到一个小村庄里，我们又陷进了十分险恶的境地。

这时候，肖副政委派通信员把王泽民、张俊才、韩白起、张昕和我找到跟前，神态严肃地对我们说：情况非常危急，你们一定要跟我一块，准备打游击到延安去。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要活在一起，死在一起。多么严峻的形势，悲壮的嘱咐啊！我们五个看着亲如兄长的副政委，点头示意默默无言，胸中升起一股暖流直冲脑际，两眶热泪禁不住簌簌地涌了出来。从此，我们日夜跟随着肖副政委，彼此互相关照，紧紧相随，不肯远离一步。

7月底，我们抵达龙山水草坪一带。龙山是我党领导的陕南游击队谭道鹏部的活动区域，这里群众条件比较好，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吃食，天天都可吃到一二餐玉米面、土豆糊汤或猪肉煮土豆、燕麦面土豆饼，虽不能保证都吃饱肚子，但比吃生南瓜、清水煮豆叶，要好千百倍。在这里我们熬过了饥饿、疲惫的最艰难时刻，奉命就地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根据地，执行外线战略牵制的新任务。

秦岭山里打游击

早在中原突围北路部队进抵丹江一线时，党中央就曾指示中原军：以机动灵活的行动，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协助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7月15日，党中央又通报中原局：“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截，北上很难通过”，“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任务”。要求中原军在豫、鄂、皖、陕、川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华北、华中主力作战。7月23日，中原局在白鲁础决定，将部队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

众，打击民团及国民党军小部队，建立根据地。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党中央毛主席当卫兵”的口号。

8月3日，纵队首长命令肖元礼、曾广泰（三十八团团长）率三十八团到漫川关、郧西以西，安康、镇安以东，汉水以北地区，以营为单位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于是，我们旅直属队就随三十八团部队，沿着鹈岭南麓向西行动。举目远眺前进路上莽莽苍苍插入云霄的大、小天竺山，山势陡峭，峰岭突兀，云和峰连接，一团团的白雾在山顶缭绕、飘荡。我们翻越海拔1658米的小天竺山腰，再穿过一列高低不等连绵不断的山岭，费了整整大半天工夫，才下到一条很深的河谷里。这几天阴雨连绵，我们穿越河谷时，山洪突然袭来，混浊的洪水卷起半人高的浪花，夹着砂石转着一个一个漩涡，撞击着，推推搡搡地向下游奔腾而去。我们没有精神准备，被突如其来的险情惊住了，队伍有些混乱，我禁不住打着寒噤，艰难地挣扎着，探着脚步涉过这宽不过十几米的河谷。正当我要迈步上河岸时，有人尖声惊叫：“嗨！有人被水卷走了！”我转身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黄浪里一个身影时隐时现地翻滚、沉浮着，眨眼被洪水吞没了。后来查明，这位被山洪吞噬的女战士，就是曾广泰同志的夫人杨秀云，她是湖北大悟山杨家湾人，当时怀着身孕，行动很是艰难。大家为失去这位战友黯然失神，对老红军团长失去爱妻寄予无限同情！

部队继续冒雨向连绵不断的山岭攀登，绕过石窑子（偏头溪）从长沟——漫川关之间渡过箭河，到达南宽坪以北半山坡上一个村子宿营。这里虽是群山绵亘，沟壑纵横，但山都不太高，遍山种满玉米、土豆，核桃柿子树挺立其间。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品尝到核桃油、柿子酒的特殊滋味、也是进入陕南以来最平静的一天。

南宽坪坐落在金钱河北岸一个小平坝里，是山阳县属一个比较富裕的小集镇，金钱河两岸的狭小川道，盛产麦子和小米；由

此东下直达漫川关，溯河西去，北是板岩，西是合河；周围是箭岭与郧西大梁之间的深丘地，在陕南来说算是很不错的地方。我们中午时分来到南宽坪，在街上进行了广泛宣传，说明我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午后队伍顶着盛夏烈日，凭借仅有的一条渡船，渡过金钱河，翻过一座山坳，进入天桥沟，当天宿营于沙坪。沙坪有一所小学，时值暑假，学校空无一人。我进入教室看见墙上贴有整张油光纸大小的所谓“喜报”，上面是木版印刷的黑色大龙图案，顶端横书“喜报”二字，下面竖行写着“×××山阳县沙坪小学校毕业，特此报喜……”在南宽坪一带老百姓家里，也有此种喜报出现。访问当地老乡得悉，谁家孩子小学毕业，就送来一张喜报，要招待送报人吃喝，还得奉送赏银。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旧戏中，当某人考中举人、状元时送喜报的情景来。谁料想时至20世纪40年代，这里还兴此种陋习，可见秦岭山区文化落后到何种程度！

从沙坪顺着一条弯弯山间大道西行，我们游击到了湖坪，当地人又管它叫老林。湖坪紧贴1705米的郧西大梁北麓，地势很高，山峦绵亘，群峰耸立，仅有几个山村，掩蔽在碧绿的树林深处。坡度很陡的山坡石缝中，稀疏地长着一些玉米和土豆，枝叶儿被烈日烤得卷曲着耷拉下来。在这个小天地里，除了阵阵蝉鸣和偶尔有山鸟的叫声外。大地静静地简直就是世外桃源。置身其间，一切战争、行军的紧张气氛，似乎都已消失殆尽。

我们向当地群众调查访问，知道湖坪曾是红二十五军的游击根据地，1935年还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军撤走后，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整得老百姓无衣无食，穷得精光，长年只能以包谷糊汤（玉米糝煮土豆、灰子白）糊口。冬天土炕上只有一条破席子、破棉絮，凑合着度过严冬。甚至有的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

衣裳，破得不能补了，就用麻线系着穿，一块块的皮都露在外边。我们普遍访贫问苦，慰问群众，说明我们是过去的红军又回来了，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发动抗粮、抗丁、抗差、抗税斗争。他们怀念红军，对我们倍感亲切，但心存疑虑——担心我们站不住脚，总还保持着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

离开湖坪向西又走一天，到了郧西、山阳、镇安边界的店垭子，在这里，我们的肖班长（肖元礼副政委代号）派出一支部队，攻克了郧西县属大小心川附近的艾家洞，严重打击了地主豪绅武装，缴获了很多猪油、腊肉和粮食，我们在此饱餐一顿，这是我们突围以来吃的最美好的食品，人人高兴，个个欢欣！此后几天，我被派到二营帮助工作。我们游击于杨地、米粮川、七里峡、大坪一带，又围攻了几个山寨和洞子，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降服了一些保甲长为我所用，通过保甲长和地方绅士提供情报，掩护伤员，给部队筹粮，部队生活有了改善和保证，士气大为振奋。当时甚嚣尘上的所谓“打不死饿死、饿不死拖死”的三死主义，也没听人再说了。

在米粮川，领导决定抽调谈风、刘端福、屠列斯等一批连排干部，组成几支工作队，由三十八团政治处主任高振华、旅政治部联络科长韩白起、民运科长张昕等同志率领，分别到茅坪、西沟、七里峡、大坪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政权。他们是我们进入山阳、镇安地区后，第一批派到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拓荒者。其中的高振华、韩白起、牛广才、屠列斯等，都为人民解放事业长眠于秦岭山中。

8月下旬，留下部分部队掩护地方工作，其余部队从大坪折向东行，经过扈家垣再渡金钱河，向板岩镇进发。我们路过扈家垣时，天空下着毛毛雨，灰蒙蒙的雨雾弥漫山野，远处什么都看不大清楚。扈家垣原是国民党乡公所所在地，当地国民党乡保武装利用天时地利，躲藏在街背后的山上向我行军队列打冷枪。我

军机枪对准他们，只一梭子就打得他们狼狈逃窜。我们进街里休息吃饭，当晚到达板岩宿营。

板岩是山阳西南马滩河边的一个只有十几户铺面的小镇，我们住在街头一座庙里。休息两天后，领导派旅经济工作队队长王泽民和我带一个排武装，到南宽坪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我们在南宽坪、鄢家河、莲花池一带，走村串户进行宣传，阐明我党我军的主张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内战的祸国殃民罪恶，动员群众实行四抗（抗丁、抗粮、抗差、抗税），并以南宽坪为中心建立了以王泽民为主任的山镇鄢办事处。9月上旬，分区调我回到板岩，由于电台没有电池和马达，不能与军区通报，吴（一分区司令员吴世安）、肖首长派我带两个通信员、一个侦察员东去商南、龙驹寨（丹凤）一带，寻找中原军区李（先念）、任（质斌）首长送信、汇报情况，并去龙山地区收容掉队失散的干部。接受新任务，我即从板岩出发，翻越云雾弥漫的大天竺山，循着鹁岭南麓东行，在银花一带收容我旅隐蔽掉队干部10余人。又经竹林关朔丹江北上在龙驹寨的寺坪附近找到了中原军区。从此，我告别了打游击的日子。

我在中原突围中做报务工作的回忆

苏 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从1946年1月起，蒋介石先后调动30万大军，构筑碉堡3000余座，将我中原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带。6月中旬，蒋介石令所属部队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军区主力。中原解放军根据党中央6月23日关于“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十万火急电报，以秘密、神速、巧妙的行动，于26日夜分路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未雨绸缪

我长期在五师师部二台工作，负责对军部、师属3个旅和各军分区以及友邻师的通信联络，确保师首长、领导机关对属下的可靠指挥和与友邻师的战略协同。突围前，我被调到中原军区一

台工作，仍任报务主任，主要任务是对中央延安台的联络，以及对北路突围部队的联络。面对严峻的形势，暴风雨即将来临，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中原军区在做出突围部署之前，就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准备。通信部门一方面搞好正常的通信保障，加强与延安电台的联络，及时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部署。另一方面，通信部门预感到部队有大的行动，早就未雨绸缪，进行着紧张的突围准备。

一是补充新报务员和转移部分干部。1946年初，原新四军第五师举办的第七期报训班奉命结业，44名学员分别补充到直属电台和部队。周云章等3名干部转回河南家乡进行隐蔽斗争，祁武、邢中里、季倩、张萍等8名伤病干部于5月底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留下精干的机构和人员，随时可以跟随部队执行通信保障任务。

二是健全通信部门的组织机构。中原军区成立后设立的通信处，尚未组建起来又宣布撤销，通信工作实际上由副处长潘流同志负责领导。随着敌情日趋严重和正在酝酿转移，健全通信组织机构已刻不容缓。4月下旬军区召开通信干部会议，专题研究了电台组织机构和加强政治思想领导问题。不久，军区下达命令，正式成立中原军区电台大队，由潘流同志代理大队长，潘文奇同志代理材料科长，邓健平同志代理管理科长，李庄同志为业务科长。大队部有5部电台和一部新闻台。全军区旅以上部队和部分团配备了电台，全大队共有干部179名，其中报务干部157名。

三是筹办通信器材。1946年初，原五师电料厂解散后，机务人员补充部队，对通信设备进行了认真地检修和维护，给部队补充了消耗器材。1946年1月底，李先念司令员到武汉商讨工作时，在德明饭店接受进步人士杨显东赠送的一部无线电发报机，补充部队。6月，熊景剑同志从军调处武汉执行小组执行通信任务返回部队时，采购了一批真空管、变压器等电信零件，以

备在突围中应急之用。

四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突围前几天，为隐蔽行动企图和造成敌人错觉，部队各项工作照常进行，晚上举行文艺晚会，表面上一片和平景象，夜间搞紧急集合演练。各级通信分队进行思想动员，做好吃大苦、耐大劳、勇于克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准备，树立了在任何艰难险阻条件下，都一往无前、完成通信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转移陕南

6月26日晚，电台大队及其直属电台拆线出发，随北路突围部队离开宣化店地区，向西北方向运动。29日，部队冲破平汉路封锁线，通信人员随部队昼夜兼程，一昼夜急行军180里，飞渡唐、白两河，踏过豫西南平原，进至内乡、淅川等地区。7月11日到达内乡以南师岗地区时，兵分两路行动。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右路，8月2日进至陕南柞水、镇安地区。后经中央批准，寻路返回陕甘宁边区，于9月17日到达延安。

中原军区机关电台随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第二纵队直属队及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左路，经南北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前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强行军，13日晚，因泥泞难行，人马拥挤，走走停停，一夜才走出了5公里，天亮到达丹江江边。14日，敌机全天轮番疯狂地向我江边部队扫射，当夜开始徒涉渡江。当时丹江水位上涨，白浪滔滔，通信人员手挽着手，互相搀扶，并精心保护机器，终于征服洪水，到达彼岸。在夜渡丹江时，因水急浪大，二台队长刘杰同志被水冲走。他奋力泳渡，被急流冲到对岸才幸免于难。

7月15日，部队进至豫鄂交界的梅家铺。这天，雨过天晴，气候爽朗，空气清新。宿营后，一台刚架好电台，就听到延安台的紧急呼叫，马上回答对方，抄回了一份急电。后来才知道该电是中央向中原局通报陕南敌情和游击队情况，指示中原部队在陕南敌后创建根据地。并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调动了程潜、胡宗南、刘峙3部力量，破坏了敌人进攻陕北的计划。中央这一指示和新的战略部署，给中原部队以极大鼓舞。

当部队行进到南北塘东北玉皇顶附近及东赵川、梁家汶时，遇敌胡宗南部重兵堵击，处境十分危急。军区首长命三十七团、四十五团进行强攻，占领阵地，打退敌多次猛扑，掩护领导机关及大部队通过。电台随军区机关连夜冒雨在坎坷狭窄山道强行军，泥泞山路又陡又滑，敌人居高向我疯狂扫射，摇机员齐永贵同志左臂负伤，身背的器材零件袋被击破，一个沉重的小东西坠落山谷之中。待天明冲出关口后，司令部有十万火急电报发往延安。我一台当即选点架机工作。这时才弄清昨晚丢失的是发报用的电键。正当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急中生智“有办法了”，于是我把两个金属小起子接上两根导线插入发报机插孔，用其撞击时间的长短发出电码符号。我们就用这个奇特的电键与对方沟通了联络。尽管电码声并不悦耳，但终将电报发出，完成了通信任务。

北路主力部队进入豫鄂陕山区后，情况变得日益严重。敌前堵后追侧击，行军路线常常改变，谁在深山峡谷中掉队就很难赶上部队，因而失散人员不少。由于连续行军，许多同志的鞋子磨破了，赤脚行军，脚被划破道道血口；涉水过河，浸泡感染，走起路来苦不堪言。在这崇山峻岭之中，人烟稀少，敌我部队很多，有时局部地区的敌我态势犬牙交错，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战斗。老百姓都跑了，找不到东西吃成了最大的问题。粮尽盐绝，浑身软弱无力，经常饥肠辘辘地行军和值班。饿急了就四处找南瓜、土豆、嫩玉米穗，甚至豆叶、瓜叶充饥，不少同志泻肚子。

困难没有吓倒通信战士，大家以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跟随着部队行进，并尽职尽责地做好通信工作，确保部队指挥的不间断。

针对敌情严重，供应困难和机关目标大，不易掩护等情况，军区首长于7月20日以后确定部队分散游击。我们电台也分成几个摊子。李先念司令员带少数参谋人员和三十七团在竹林关南北活动，继续指挥全区部队。我台队长杜力同志带一部电台跟随行动，担负中原局对延安及各突围部队的联络任务。潘流率领中原军区电台大队随魏国运参谋处长率领军区直属队在豫鄂陕边坚持游击战。郑位三、陈少敏同志已根据中原局决定在龙山桐木沟离队休息养病，也带了一部电台。鉴于中原局的处境已极危险，李先念等领导同志7月24日电报中央，请中央今后直接指挥一纵队、三五九旅、江汉军区及魏国运部的行动。我台仍与延安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并及时收到中央要我们就地分散开展游击战的重要电报。8月10日，刘、邓奉中央指示，向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策应陕南，迫使刘峙将大量兵力东调，陕南形势较前缓和，李司令员与魏国运处长率领的部队于8月18日会师。杜力同志与我们10多名电台人员又会合在一起。在这艰辛磨难之际，大家见面之后，都格外兴奋。虽说分开只有20多天，但有一日三秋之感。

在近一个多月的突围中，通信人员在潘流同志带领下，几乎天天跟随部队行军，虽然疲惫至极，但在休息时或宿营后仍立即架台工作。突围部队指挥全靠无线电。军区电台要联络延安党中央、本路各旅和其他方向突围的第一纵队、一纵一旅以及江汉、鄂东、河南军区各部队，通信任务非常繁重。特别是部队在紧张的作战行军中，只有双方都停下来才能工作，所以联络时断时续，不够稳定。我们和延安台的联络却非常顺利，只要呼叫一两遍就能通，双方电报很多，都能及时发出和收进。原因是中央台知道突围部队行止不定，形势严峻，对我们特别关心，用几部收

信机在几个波段上同时收听。从军区电台来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首先拍发（收进）十万火急电报；组织老手上机；双方双人上机，同时收发电报；情况许可时，电台随打前站的同志先到设营点架台工作，以争取时间提高电报时效性。这虽不是什么新鲜经验，但在突围中起了作用。

坚持在陕南

地处秦岭南麓的陕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进至这里后，决定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开展游击战争。9月24日，在丹凤县封地沟正式宣布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和豫鄂陕军区，文建武为军区司令员，汪锋为边区党委书记和军区政委。军区下属5个军分区。

豫鄂陕军区成立初期，中原军区到达陕南的一台和三台缩编为一个台，由潘流同志负责，报务员有田正本、杜力、苏明等12人。电台编成摇机班、运输班、通信班、工作人员班及伙食班，总共50人。10月底，军区建立无线电中队，由原五师通信科长缪伦任中队长，潘流任政治委员。中队部下设两个台和两个股，一台队长苏明，二台队长刘杰；业务股长杜力，器材股长田正本。各分区编为电台区队，有一至二部电台。全区共有电台11部，通信干部55人。这时情况暂趋缓和，大家的情绪也稍微轻松了一些，除值班外，歌咏、板报，篝火晚会又开展起来，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

边区根据地的创立，使敌人惊恐万状，先后调集大量兵力进行了两次“清剿”。边区部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针，广泛出击打击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边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对通信工作非常重视。1947年1月7日在给各地委、

分区的指示中，要求“加强侦察通信工作，各分区指挥机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应确保电台，并不间断地同军区保持联络。”在粉碎敌人残酷的“清剿”行动中，通信人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跟随各级指挥机关辗转游击，坚持斗争，尽力搞好通信保障工作。有的电台还侦听敌人通话。例如三分区电台随机关转移到商县台子坪宿营后，报务员周立德侦听到敌人用明语通话：拟于次日用3个团的兵力包围台子坪。此情况报告首长后，分区周光策司令员、齐勇副司令员即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于次日凌晨3时迅速转移。当我前沿哨岗撤下来，敌先头部队就占领了前沿阵地。我三分区机关和部队安然脱险。

郑位三、李先念同志在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后，先后奉命离开陕南于10月下旬回到延安。11月6日在延安设立了中原局，未配电台，是通过中央军委台对中原部队继续进行指挥和领导。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调集各分区主力5000余人组成野战纵队，于1947年1月14日宣告成立。在黄霖司令员、方正平政委指挥下，向豫西的鲁山、南召挺进，在外线打击敌人，连克栾川、嵩山数镇，军威大振。在解放栾川时，缴获了两部马达和一部收报机，这是北路部队自突围以来首次从敌人手中搞到的通信器材。

由于连续作战，供应发生困难，伤员无法安置，部队急需补充，中央军委批准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休整。军区机关和第一野战纵队的通信人员随部队从鲁山县的土门出发，经过几天急行军，徒涉洛河，突破陇海封锁线，在太岳军区的接应下，于2月19日渡过了“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黄河，胜利到达太岳解放区。

至此，我所在的北路突围部队经过艰难险阻的7个月零23天的日日夜夜，克服了种种困难，用我们的鲜血和壮举，为我党我军历史写上了壮丽的一笔。

中原突围第一夜

欧阳树强

宣化店。昔日这个鄂东不起眼的小镇，因为是中原军区战役运粮的机关所在地，它的知名度居然传遍国内外。

突围前几天，在宣化店的河滩上，搭起高大的戏台。军区政治部楚剧团，连续几天演出精彩的传统剧目，吸引着十里八乡的军民前来观赏。河滩上，还有许多小吃小卖的，好不热闹，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敌人。

一天，骤然接到军区司令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必须迅速地搞好轻装，准备长途行军转移，待命出发。

一个难忘的日子——1946年6月26日的傍晚，军区机关的大队人马，在河滩上短暂的集结调度。虽然没有激昂的动员，彼此间也没有话语，但人人心中有数：一定有重大行动。随着一声令下，部队紧张有序地出发了，一直向西奔去。

在行军中，我们电台中队紧跟在参谋处与机要部门的后边。我是电台一分队报务员，电台是纵队中备受关注的部位。

天色渐渐黑了。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大家把白毛巾系在左臂上，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一种标志；还要熟记当天的识别口令，

以防不测。一路上没有大声说话的，没有抽烟的，体现出严明的军纪。

趟过一条小沙河，翻过一座小山岗。强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急促的脚步声、马蹄声，汇成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行进中，前面有一女同志，看样子太累了，将背包放下想要歇一下。立刻有两位男同志上来，抢着替她背背包，鼓励她一道前进。

我们电台分队最辛苦的是摇电班。行军时要负载“死沉”的电台机器，宿营时又要手摇沉重的发电机马达，真够苦的。培班长是位体魄健壮的铁汉子，一路上坚持背负几十斤重的发电机，没有体息过，许多人劝他，让备份手换着背一下，他只是一笑了之。大家十分敬佩他的顽强精神。

部队行至29日午夜时分，前面平汉铁路方向打响了。枪声炮声越来越激烈，火光冲天。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我军发起攻击的军号声，这威武雄壮、发起攻击的号声，一阵阵吹响、响彻夜空，激动着人心，驱走了疲劳，激励着战友们奋勇前进。

这时，前头传来指挥员的口令：“跑步前进，不要掉队。”口令鱼贯似的向后面的部队传递，部队跑一阵，走一阵地交替前进。有的同志摔倒了，立即爬起来再跑。汗水像下小雨似的湿透了衣裳。

靠近铁路了，睁大眼睛一看，令人大吃一惊。这里对付我军的手段，远比看守监狱还戒备森严。

首先，从剪断的缺口踏过去，是用铁蒺藜组成的铁线网障碍；接着，就是几米深的大壕沟。再过去，只见一线式碉堡林立的射击区。当踏上平汉铁路的铁轨时，只见一列巡逻到此的装甲列车，已被我军击毁，正龟缩着躺在那里，动弹不得。

国民党煞费苦心，用障碍区、射击区与铁路线构成的封锁圈，被我军的重锤砸开了。当通过铁路后，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地

兴奋、激动，过了一阵，冷静下来，想到粉碎封锁线的勇士们，冲锋陷阵而洒尽鲜血时，心情忽然沉重起来。至今，我对那些为突出重围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仍然寄予深切的怀念。

一夜没有合眼，快到黎明时，两眼皮总“打架”。在行军途中，自然而然地打起盹来。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走路睡觉”。不料，瞬间就一头栽到前而同志的背包上，两人一块跌倒了；马上相互扶了起来。从深夜至拂晓，又从清晨至晌午。原有的睡意，早已被强行军的意志与激烈的战斗气氛所驱散。

烈日当空。约摸跑出距铁路线好几十里后，才休息一会儿。人也累了，肚也饿了。大伙从路旁的小溪中，掏一缸子凉水解渴，边吃点干粮，边议论起来。通信员小张，大有所悟地说：“怪不得在突围前演出几天大戏，原来是为了冷不防猛一下突出来呀！”电台队长田正本、报务主任苏明说：“这就是军事的谋略，为了迷惑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么！”

这是一个极不平凡之夜。这一夜，使人受到的磨炼与启迪，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护送干部队渡黄河

北 沙

1946年末到1947年初春，我在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五十八团任团长时，曾先后两次受领特殊使命。我带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先南渡黄河给豫鄂陕军区送密电码本和部分经费；尔后又护送干部队北渡黄河，先到平陆后赴晋城。先南后北，南征北战，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送密电码本，我已在《敢遣轻骑觅五师》一文中做了记述（见湖北出版《血火征程》一书）。这里，我再将护送干部队的经历做一回顾。

豫鄂陕游击根据地，是中原突围后初创的。这里敌我斗争十分激烈，艰险，部队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整，极度疲劳，生活异常困苦，加之大军压境，敌人组织对我军的第三次“围剿”又即将开始，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围剿斗争，军区领导决定，将一批年老体弱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尽快转移到华北老解放区去，于是，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当干部、战士听到又要打回我们原来的根据地时，个个兴高采烈，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大家坚决保证，一定要再一次圆满、胜利地完成上级

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不辱使命。

为了使干部队更加安全地渡过黄河。军区还指派了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水泉亲率七团3个连作掩护送到黄河边。

干部队的成员中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夏农苔以及许多师、团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不少女同志。带着他们穿过敌占区，闯过陇海铁路封锁线，飞越黄河天险等等难关，而且有些还是伤病员这不像送密电码本，谈何容易，真叫人担心啊！我的思想压力很大。

敌人“围剿”我边区的消息日紧，五师要走的干部也陆续向洪洞聚集，加上黄霖的野战部队和军政领导机关的集结，使洪洞成了惹人注目的地方。就在这时，豫鄂边区杨老的女儿晓阳也来到洪洞。在这之前，邹作胜同志知道，我是一个单身汉，就向我介绍过晓阳的情况。说她从小参军，性格活泼大方、能吃苦。这次突围出来到陕南，就接到中原局电报，让她和其他几位同志，随太岳部队北上转道延安。我们见面后，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彼此觉得情投意合。干部队的同志也热烈赞同。经樊参谋长和军区副主任夏农苔批准，结为终身伴侣。结婚之日，订在部队出发前一天，故意小题大做，让老百姓都知道，好麻痹敌人，以利于突出重围。

跳出“包围”圈

“围剿”的敌人已日益逼近洪洞，如何跳出敌人包围圈。需要时机，领导决定借我俩婚期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把婚期放在春节前三天。为了让敌人知道我俩结婚的消息，这天上午干部队的同志拉着晓阳去洪洞赶集，故意放言给团长买结婚用品，大家东挑挑，西捡捡绕了一圈，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还用红纸写了好多

对联，把洞房贴得满满的，又特意炒了几个菜，请房东吃喜酒，在院子里摆上桌子凳子举行结婚仪式，一伙淘气的警卫员买了鞭炮，在院子里和门口噼噼啪啪地放起来。这一手真灵，卢氏城的敌人很快传开，八路军的团长在洪洞娶亲了，他们要在洪洞过年。老百姓也信以为真。

除夕（21日）的早晨，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村庄一片白。我们突然冒着风雪出发了。忙着贴门神的老乡亲，拉着我们的手挽留我们，说无论如何要吃了年夜饭再走，我们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这是为了把进攻的敌人引到别处去打仗，让洪洞乡亲过一个好年，下雪我们也得走。老百姓感动得抹眼泪，捧出过年酒，非要我们喝一杯才行。

将近天黑，我们打进文峪镇，敌人摆好的过年酒饭，算请了我们的客。俘虏说：他们的大部队开到栾川、西峡打新四军去了（黄霖野战纵队），这里只是留守人员和管军需的。我们一跳成功。当我1986年重访文峪镇时，76岁的任文章说：“那夜你们像神兵天降，连锅端了保安团和警察所。”

正月初一下午，天晴云消路滑。为了隐蔽我们北上的方向，故意向东南方出发，我们三部分六七百人，行军队伍中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万群同志还背了个刚满周岁的孩子。突围后的五师同志冬季没发棉军衣，通过打乡公所缴获一些衣物御寒，行军队伍像一条花色的长龙。前卫翻过姚泉山，后尾才出文峪镇，夜宿槐凹、太原等村。

初二早晨，我军突然由南转北，大摇大摆地从范蠡镇西侧七里滩，徒涉洛河，吓得驻守范蠡镇的保安团长何桂林（原是土匪头子），只向我发射了三发迫击炮弹，把河水炸开了花。战士俏皮地说：“敌人放礼炮拜年欢送八爷爷。”

冬天的洛河水，冰冷透骨，好多同志受不了冷刺激，我牵着黑马来回送干部队体弱的同志过河。音乐工作者李季达说：“此

团长自己趟水过河，把马让给我们骑，我用音乐也表达不出来这样的友爱精神。”

我们采取了白天徒涉洛河故意暴露目标，这一招，是为了迷惑敌人，造成与黄霖部行动南北呼应的声势。初三，我们又突然隐蔽起自己的行动，专走人烟稀少的林区，穿峡谷深沟，翻高山峻岭，要人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围剿”圈。

天寒地冻，风雪浇身，身上只着单薄衣裳的五师同志吃尽了苦头；风餐露宿，盼着熬过雨天赶到黄河边。

雪夜取赵里

初四，太阳落山前，我们从老林里出来，到张茅车站南边歪头山口，远望三门峡东边黄河，似万丈深沟；近看陇海铁路横卧脚底，部队不能早出山，原地休息，吃饱干粮，整好行装，准备雪夜急行军。

夜幕降临，一连沿着下山小道，跑步猛扑山下丁家庄等村的乡保敌人，我们直奔黄河渡口。到白山，一连转为后卫，沿着白山、燕山山梁阻击可能尾追的敌人。我带着三连踩开一条膝盖深的雪路，直取赵里河防据点。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伪保长郭治因顽抗被打死，我们完全控制了渡口。按电报约定，太岳第三军分区李明如副司令员及五十八团政委肖平接应我们，各点三堆火为信号，我们很快联系上了。这一夜的战斗中三连一个同志掉在雪坑里，活活地被冻死了，令人痛心。

干部队的同志安排在老乡家里休息，把女同志让到热炕上取暖。南方人缺乏在北方生活的知识，冻僵的手脚是不能受热的，天亮后她们中有的人脚痛得下不了炕，只好扶着走。

绝地逢生

黎明我带着警卫员走到河滩，影影绰绰地看到河对岸蒋寿鹏主任指挥向河里推两只日本铝铁船和两只木船。后山上的一连尚无战斗情况，估计只要争取到两个小时就能全部渡过河，最后胜利将变为现实。

警卫员王合福突然喊：“团长，你看河里流着那么多那么大的冰块！”我心一惊暗喊了声“糟了！”低头一看，果真在汹涌澎湃的水流中，漂流着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着，比翻腾的巨浪更可怕。礁险可以让开，冰险摆渡难。怎样与黄河的流冰斗呢？老兵碰见了新问题。老天爷要把我们几百人的性命置于绝处吗？只见河北岸推下水的两只铝铁船，顺着水势被冰块推到下游去了。剩下的两只木船，横渡更不行。蒋主任真有个顽强劲，他组织人用纤绳把船硬拉到上游很远很远的地方，利用冰块之间的空隙，左躲右让地划过来，望眼欲穿的干部队同志们鼓掌叫好。但不能立即上船，必须把船拉到上游。干部队的同志要顺着河滩往上游走多远才能上船。船小人多，冰大危险，一次渡不了多少人，李三指点着水手们，使出全身的本领，一上午才渡了三趟，大家恨黄河的冰块是敌人的帮凶。

祸不单行，后山传来密集的枪声，一连的通信员报告，郭连长刘指导员各带一部分人，在白山腰上阻击敌人，已经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看敌人动作像是保安团。二排长陈庆新带着六班把进攻的敌人拼下去，负伤了不下火线，刘指导员劝他下山，他说还要与敌人拼搏一阵。我叫一连通信员立即返回告诉连长，我们一天渡不完，要他坚持到天黑，先把伤员撤下来，三连很快去增援你连。我安排好河滩的事情，也到山上来。

敌人在一连阵地，遭到两次失败后，从侧面山沟摸上来，此处是四分区七团任维礼连长的阵地，他们十几个人三挺机枪，以密集火力把敌人打下沟去，敌人伤亡很大，不敢再向这里进攻了，一连阵地暂时稳定了一下。任维礼对我团一连指导员刘随浪说：“方才看见你们以少胜多，打得真英勇。现在我们要下河滩集合，待命南返，不能与你们并肩战斗了。”刘当时犹豫了一下说：“你们撤吧。刚才你们的反击很及时，打得很好，谢谢你们的支援，这里有我们顶住。”

下午进攻的敌人是正规军，他们先以密集炮火轰击我军山头，然后步兵冲锋。敌众我寡，我们不能硬拼，当敌人用炮火轰击山头时，我们撤到山背后疏散隐蔽，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我们迅速回到原阵地，用密集手榴弹和机枪实施一瓢水火力急袭，掩护小分队冲锋，接着又迅速地返回原阵地隐蔽起来，敌人再次组织火力进攻，我们如法炮制。每个山头敌我双方就这样地反复争夺，敌我伤亡都很大，我们不得不逐步向后转移，战斗的主动权操纵在敌人手里。三连副连长刘金城同志牺牲了，战士们在高喊为刘连长报仇声中又与敌人拼搏在一起。

敌人约有3个团的兵力，他进攻我防御，我们控制着制高点。敌人每得一个山头，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轮番进攻的势头逐渐减弱，但我团能战斗的人也越来越少，有的同志连续负伤，不得不退出战斗，敌人也看出我们这一点，想赶在日落前占领黄河河岸。我五连增援上来后，我们的阵地又稳住了，敌人指挥官用枪逼着士兵集团冲锋，步步向我逼近，争夺战白热化。黄昏前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山头了，危险迫在眉睫。参谋李根宝一直跟着连队参加战斗，在敌人冲锋最猛的时候，他站起来举枪瞄准站着督战的敌人指挥官，那个指挥官也看见了李参谋，连忙举枪瞄准，两个隔条小凹地面对面同时开火，同时倒下了。进攻的敌人看到自己的督战军官被打死，阵地上一阵混乱。我们的战士，看

到与自己朝夕相处，冲锋在前的李参谋阵亡了，怒火中烧，一个个跳出战壕，发出一声吼“为李参谋报仇”勇猛地扑向敌人阵地，吓得那些没人督战的敌人士兵撒腿就向后逃。

根宝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传来，我悲痛欲绝：“好参谋！好战友！好兄弟！我和大家一同继承你的遗志，誓死要坚守住最后阵地，把干部队和伤员送过河去。”我们前沿阵地上，五连副连长，脚负重伤还不愿下火线，我命令两个轻伤员架起他下山了。

敌人怕天黑，故在黄昏前争夺最后一个山头付出了重大代价也未成功，后续兵力接不上，炮兵也看不清目标了，步兵更不敢继续冲锋。随着夜幕降临战场也逐渐寂静下来，敌人阵地上没有任何动静。我指挥轻伤员扶着重伤员下山。估计敌人天黑不敢再进攻，山头留下我们六个人，继续监视敌人的动静。我叫小战士卫栓栓慢慢地摸到敌人阵地去侦察，等了他好久不见他回来，我以为出了事，正准备接应他时，听见栓栓嚓嚓的脚步声，这才放了心。栓栓说：他顺着小路悄悄地摸了两个小山包，敌人早跑光了。又等一阵还是听不见响声，估计敌人怕我军利用黑夜摸他的老营，主动地后撤了。

二更天以后，我们下到河滩，一连长郭中兴组织轻伤员担任警戒等我们。郭连长说，除四分区七团邵敏政委天黑时带一百多人返回卢氏外，其余的人，乘后半夜水暖冰少时，都过了河。只有你的饲养员加万，不愿丢下黑马，坐在河滩硬要等你一道走。我只好迁就他，我也喜欢这样的人。

1月27日上午，干部队和过河的部队，都到望原村去休息了。我和团里在黄河北的一些同志，留在鳖盖村的前坡沿，处理善后事宜。眺望昨日战斗过的山山水水，我怀念还躺在那里的阵亡同志，心痛难忍。忽然空中出现了一架敌机，沿河低空盘旋，掩护它满山搜索我军的步兵。天上地下的机关枪一阵乱射，以此显示“国军”的威风。敌机对我军卸下笼头的马匹（未能过河），

如临大敌，疯狂地俯冲扫射。在国民党联勤总部郑州军运指挥部我内线的报告中，蒋匪错误地认定我五师部队已是“械少弹绝”且“衣不遮体”，唯白（北）沙有少壮气概”，急令胡宗南部速派兵由潼关东进，刘茂恩部由渑池西出，再加上陕州师管区保安部队，在陕州至渑池间的黄河南岸，生俘“白沙”。

干部队在平陆休息几天后，分区奉命送他们到太岳军区腹地晋城，临别时我们之间离合的情感，尽在不言中。

我团旧历元宵节在平陆县望原村，召开过河部队庆功受奖大会。柴泽民政委代表地委、分区和军区首长讲话。表彰了李根宝、刘金城等烈士英勇善战的事迹，慰问受伤的同志，特别向留在豫西医院的伤员家属致意。同时表扬随我团过河的民兵水手，和为过河做准备有贡献的同志。王塘司令员代表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和第三军分区宣布立功嘉奖令、发奖旗。会后聚餐，举行晚会，军民联欢，共庆胜利完成中央军委给予的任务。

回顾往事，久久难忘。虽然 1947 年 4 月我调到第三分区五十六团。对五十八团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记忆犹新，感叹万分，即兴抒怀：

强渡三门斗险滩，
闯过陇海智擒顽。
熊耳破网鱼得水，
伏牛会师敌胆寒。
飞雪送行轻骑舞，
护送干部再斩关。
黄河冰阻追兵急，
绝地逢生胜利还。

停战前的一仗

陈士俊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盼望和平。蒋介石却调兵遣将，疯狂进攻解放区，积极发动内战。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新四军第五师首长决定发起了桐柏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前后两个阶段的桐柏战役共歼敌 9000 多人，牵制了国民党五六个军的兵力，为其他解放区的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桐柏战役后，我中原军区部队撤向平汉以东的豫南、鄂东北一带时，接到中共中央停战命令，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最迟在 1 月 13 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1 月 12 日，我们部队刚到达定远店附近的黄家岩一带，就接到国民党以两个团的兵力即将向我十五旅进攻，并企图抢占宣化店的消息，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坚决维护停战协议的执行，12 日晚，第十五旅旅部紧急通知各团，要求在 1 月 13 日天亮前把部队调到定远店至宣化店公路边的指定地点集结待命。部队经多日长途行军，很是疲劳，脚上的水泡一个接一个，多想休息一会儿。但我们通信排还是连夜将调动部队的紧急命令送到了各营，准时完

成了送达紧急命令的任务。13日上午，敌人从公路上浩浩荡荡向我防区进攻，因我们有所准备，又占据了有利地形，将敌人击溃，消灭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战斗胜利。

按旅部原来的作战计划，我们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公路沿线，又占据了有利地形，完全可以吃掉国民党这两个团。战斗打响后发现四十三团没能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给敌人留有活动空间和部分有利地形，虽消灭了国民党军一部分，但未能全歼。原来是两名通信员因疲劳，在路上休息，未将命令及时送达，贻误了战机。这次事件，深刻地教育了我，这就是对上级的命令、决定，一定要准确无误地执行，否则将会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件事我一生铭记在心。

杀出包围圈 转战鄂西北

王定烈

中原一纵队二旅在突围中的一段经历使我永生难忘。那是在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争取胜利的一段经历，是在死神面前争取生存的一段经历。

—

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为发动反革命内战，不断调动兵力，对中原我军进行封锁包围。到同年6月，形势发展已十分严重。当时的敌情是：敌四十一军位于许昌、确山至明港一线，六十六军位于信阳、广水、花园、应山地区，十八军位于汉口、黄冈、孝感、汉阳地区，四十七军位于罗山、光山地区，四十八军位于金寨、新县、商城地区，七十二军位于新县、黄安及麻城之宋埠、福田河地区，七十五军位于安陆、云梦、应城、天门、东山地区，十五军位于方城、泌阳、桐柏地区，六十九军位于桐柏、枣阳地区，十军位于南阳、襄阳、

谷城地区，七十六军位于沙市、荆门、当阳、宜城、枣阳地区，共11个军26个师及保安队，30余万人，对我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200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此外，并于安徽之阜阳、太和、凤阳、寿县、舒城、巢县地区集结重兵防我向东突围，以便策应和堵击。

当时，我们二旅驻守在光山县城以南的望城岗、槐树店一线，同光山之敌四十七军对峙。我任四团团团长，杨劲任政委，常志义任参谋长。当面之敌利用“停战”、“调停”的幌子，不断向我挑衅，干部和战士们都预感到，一场恶战已势不可免。

二

1946年6月26日，中原部队分路全面突围。

纵队下达我团的任务是担任后卫，掩护纵队主力向西突围。25日接到命令后，稍事准备，利用夜幕向宣化店方向摆脱敌人缓缓西进。敌人一时摸不清我意图，我连续走了4天都未发生战斗。28日到达大悟山之汪洋店以东十余里处宿营。29日凌晨，突然接到纵队命令，要我团变为前卫，务必于黄昏前赶到王家店，担任突破敌平汉铁路封锁线，掩护纵队突围的任务。驻地距王家店约80余里，部队已长途行军4天，加上天气炎热，吃不好，休息不好，大家都很疲劳。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黄昏前到达，其艰难是可以想象的。命令传达下去，大家听说要当前卫，有仗可打了，个个精神振奋，连早饭也顾不得吃，就立即出发了。纵队主力（包括：纵队、二旅、十五旅）都闪在道路两旁让我团通过。见此情形，我们的心情十分焦急，加快速度向前赶路，惟恐耽误全军的行动。可是由于天气炎热，接连有七八十人中暑晕倒，部队行军速度也越来越慢。下午5点钟，抵达离王家

店以东 30 多里的堽家阪，集结整顿队伍，待后续部队到达，即投入突破战斗。

当夜见过王树声司令员后，我和杨劲同志火速赶回驻地，命令各营营长、教导员迅速率领部队抢占附近的有利地形，控制制高点，做好防御战斗准备。当我三营部队冲向堽家阪西北的大米山山顶展开时，正巧，敌人一八五旅也拼命抢占这个山头。三营八连抢先一步登上山顶，以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下山去。但是，在山头的西面，敌人迅速把守铁路线的兵力调来，增加到两个团之众，并集中炮火轰击，把我八连的山头抢占了。双方成了“拉锯式”反复冲杀，然后变成胶着对峙。与敌激战一天，我伤亡 60 余人。八连连长周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三

30 日黄昏，纵队主力开始向王家店方向运动，又令我团转为后卫，掩护主力过铁路。晚 8 点多钟，天色已黑，我们才撤出战斗，开始跟进。

7 月 1 日上午 8 点，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纵队直属队、五团一个营、二旅直属队的一部、还有十五旅的部队却在离王家店只有四五里的地方集结，王家店东面磨山上的敌人迫击炮不断在向我军集结地域轰击，情况万分险恶。我们跑步赶到纵队司令部，王司令员一见面就问：“王定烈同志，你们团还有多少部队？”我答：“还是那么多，只是昨天伤亡了 60 多位同志。”他说：“那就好。”他命令我团充当前锋，打开一条血路掩护纵队通过，并决定将五团一营交给我指挥。我们马上由杨劲、常志义率二营、三营和五团一营分两路平行向王家店以南突击敌人防线，我和一营营长郭瑞功、教导员邓林向花园方向担任警戒。为了保

卫纵队首长安全，并令一营一连副连长陈世谦带一连护送王树声司令员过铁路。

王家店附近，丘陵起伏，平汉路从两山之间蜿蜒而过。敌人在铁路东侧构筑了坚固的碉堡、水泥工事。敌人发现我突击后，便猛烈向我扫射，阻我通过，我四连连长胡金星等多人负伤。但是，我们的部队打得很英勇。二营长冀树礼带领部队冲下山岗，很快歼灭了铁路旁边固守在碉堡中的敌人一个排，打开了突破口。这时部队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样涌向敌人。守备在铁路沿线之敌长于防守，一旦防线被突破，便慌了神，跑出碉堡便被我缴了枪。我军便分多路从约2里的地段上横越铁路，向西猛扑过去。就在此刻，敌人4架飞机临空轰炸扫射，汉口增援之敌第十师也乘铁甲列车赶来。我们同敌人激战一阵后，见纵队主力已全部过完，便从容撤出战斗。部队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主要封锁线。

四

7月1日当天，我们赶到赵家棚宿营。我团又改为前卫。原拟由平林西渡沮水直插大洪山。但敌人穷追不舍，据侦悉：敌滇军一个旅当天抵安陆，有堵我西渡之势。我便决定绕道向寿山、大帮店、塔儿湾，再由安居奔茅茨畈。正遇天下大雨，河水暴涨，在大帮店附近渡河，采取集团涉渡，险些把我冲走了。道路也十分难走，我们昼夜在泥泞中跋涉，绕了一个大圈才到达茅茨畈以西宿营，已是7月10日下午5点了。部队正在休息做饭，王树声司令员来到团部。他命令我团当晚赶到流水沟，把江上的船只搞到手，部队过汉水前卫营。立即向流水沟方向进发，抢占渡口，控制船只。计算起来，到流水沟约有100里地。我们急行军，整整走了一个通宵。

7月10日9点钟，全部抵达流水沟。我前卫的侦察排长韩天明率队迅速到上游、下游搜集船只，总共只搞到大小船只5条。汉水西面还不时向我放冷枪。就那么5条船，大的能装二三十人，小的能渡七八个人，大队人马，何时能渡完？如果敌人追来，岂不背水一战？当天下午，我们开始渡河，速度之慢令人着急。我猛然想到牲口有凫水的习性，即令将所有重武器、驮子搬到船上，迫击炮连、机炮连的干部、战士以及饲养员们一律抱着马脖子，揪着马尾、马鬃随马游过水去，步兵连就集团泅渡。全团人马很顺利的到达对岸。那5条船我们又沿用了渡沙河的老办法，用几条长绳拉来拉去。搞了一个通宵，总算全部东西渡完了。

凌晨，我们继续向璞河璠挺进。刚到襄（襄阳）、沙（沙市）公路上的璞河璠放出警戒，三营就同敌十六旅一个团遭遇。原来他们是由钟祥之丰乐渡江，从倒口赶到璞河璠来堵击我们的。为了掩护主力渡江，我三营营长楚毅指挥部队来了个猛打猛追，一直把它赶回了倒口，并准备一举将其歼灭。宜城之敌此时也向南来堵击，与我三旅九团打响。

后面上万人的队伍，由于船实在太少，过江过得很慢。敌机不断临空轰炸扫射，木船又被炸沉两只，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还有不少部队在江那边过不来。这时敌人已逼近江岸，空中投下照明弹，枪炮声、轰炸声，响成一片。显然，我后续部队已无法再渡，便沿江北撤了。后来由闵学胜同志（三旅副旅长）带上伏牛山去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我只好放弃进攻倒口的计划。

五

13日，我团主力集中在快活铺以北，利用丘陵地形固守，

同敌人十六旅战斗了一整天，以掩护西渡主力西进。再转为后卫，然后，沿汉水右岸，经报信坡、盛家埭向武当山方向前进。

21日，王树声司令员令我团再转为前卫。战士们顶着烈日行军，当经石花街走到苍峪沟时，前卫部队突然停止，经查，原来捉了敌人一个司务长和两个列兵，他们是前来号房子的。据称：敌六十六军一八五旅五五三团奉命由保康增援石花街堵我去路。我立即令一营营长郭瑞功带领部队迅速抢占山头。战斗顷刻打响。地形于我十分不利。苍峪沟位于石花街西南约七八里，沟两侧山峰林立陡峭，一条小路于沟底横过。我处谷底东侧，敌占据西侧主要山峰，居高临下，并从我左翼向我三营运动。石花街之敌暂编六十四师之一五四团亦倾巢出动向我后卫侧击。当日，天气炎热，加之连续行军部队已十分疲劳。我们当即决定把行军队形转为战斗队形，九连抢占左侧山头固守防御，让主力部队休息，吃饱、喝足再反击。我和杨劲同志一道去三营机炮连阵地上观察敌情，布置进攻方案，不幸他被敌弹打中，背部负伤。

下午3时，在十五旅配合下，我团发起总攻。我集中一、三营的兵力从正面向沟对面山峰之敌攻击，二营营长冀述礼、教导员黎朝正由右侧迂回敌侧后，战斗异常激烈，逐山争夺，到晚上9点多钟，将敌据主峰拿下，捣毁敌团指挥所，将敌完全打垮。敌人弃尸遍野，除被俘虏者，余皆钻入森林逃散。天黑如漆，山险路滑，我们在山梁上下不来，即令部队就地过夜。

天亮一看，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被服，还有军官家眷们的旗袍、鞋袜、粉脂。我们无心搜山，只收集了一批弹药，还有一部报话机（它在以后的战斗中，帮了我们不少忙）。

此仗，生俘敌300余人，我伤亡70余人，二营教导员黎朝正牺牲。黎朝正同志是南洋华侨，原籍广东。抗日战争初期，怀着满腔报国热忱，从新加坡涉洋返国，参加了我抗日队伍。八年

的浴血奋战，残暴的日寇没奈何，但却被国民党内战的罪恶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我在悲愤之中吟出：“战友碧血洒关山，自古征战几人还？赤子报国今生愿，一片丹心留人间。”

六

石花街战斗之后，我们跟随大队向房县急进，准备夺取房县县城。7月26日，接近青锋镇时，发现敌人已占了该镇。去房县的道路已被堵死，只好南绕千家坪，向马桥口方向转移。这里崇山峻岭，山路崎岖，全是羊肠小道，人尚难攀登，骡马更为累赘之物。粮食奇缺，无奈何，我们率先将坐骑分给连队杀吃了，并进一步轻装，把保存多年的文书、资料付之一炬，决心在山中同敌人周旋。

就在这时，接到中央电令。我突围部队就地展开。停止西进，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中原突围即告结束。

我团转向马桥口南山之冷盘垭。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我们抓紧整编，把机关人员下放，迫击炮、重机枪埋掉，全部骡马一律杀吃了，把营改为战斗“梯队”，编余干部集中到侦察队，干部层层下放一级。采取这些措施后，机关轻便了，连队充实了，指挥灵活了。最可贵的是，我们的全体干部战士，毫无怨言，毫不气馁，这些为尔后坚持鄂西北一段残酷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中原突围，我团从光山出发到马桥口停止西进（1946年8月2日），经历了37个日日夜夜。前后担任5次后卫，5次前锋，前后开弓，打得英勇顽强。可是，我们也付出了600余人的代价，其中：牺牲、负伤者200余人，因疟疾、痢疾、体弱而无法随队者400余人。但是，没有损失一班一排的事情，把全部精华都保存下来了；武器装备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多，不少干部战

士变成了“双枪将”。较好地落实了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

七

我二旅四团奉命停止西进后，即按上级部署在保（康）、房（县）、兴（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保、房、兴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交通阻塞。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贫苦农民长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老人孩子骨瘦如柴，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条裤子都没有，冬至春寒，家家只好围着炉火取暖度日，腿上尽是红斑点，真是苦不堪言。

部队来到这样的苦山沟，一面要对付敌正规军的“围剿”、乡保队的袭扰，一面还要克服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其艰难可想而知了。粮食接济困难，被服无处筹措，无医少药，无弹药补充，无后方，加之突围长时间的行军战斗，部队体质受到很大削弱，炮弹打光了，重机枪子弹也打完了，不得不忍痛将其埋掉，处境极为困难。但是战士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吃苦吃惯了，对战胜困难，充满必胜的信心。

8月初，我团在房县之千家老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进入马桥口。由于我行踪扑朔迷离，追击之敌整编六十六师宋瑞珂部一时失去目标，我团在阳日湾、马桥口之间插上南山（冷盘堰），利用山险之利，休整了6天。恢复行军、战斗消耗的体力，换洗衣物，理发修面，突击医治伤病员，调整建制，进一步轻装，进行政治动员，要为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牵制敌人向西北、华北进攻的力量做出贡献。然后即沿长淌河、龙口河、小月岭直捣兴山城。

八

8月13日下午，当我团抵达兴山城西北10余里之麦仓口时，突然遭敌县保安大队的阻击。麦仓口东面是山地，且陡峭，西面临河，只有一条人行窄路，很难通过。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我伤亡数人，尖兵排长李永斋同志英勇牺牲。李永斋同志是全团有名的神枪手，战士们夸他：“李永斋，顶呱呱，战斗胜利离不开他。发一枪，中一个，发三枪，逃不过仨。”

我见情况于我不利，便立即将团主力从左翼带上林家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万家院子攻击敌主峰言家山阵地，直指兴山城区；另一路经仙女庙占领凉风垭。经激烈争夺，守言家山之敌不支，弃阵退却，我即跟进追击。敌人逃窜，14日凌晨我占领兴山城。

15日得悉：敌六十六军之一九九旅由保康县南下增援兴山，企图断我归路。我决定撤离兴山，向北转移，乘夜幕经界牌垭、教场坝、红石寨与敌人来一次遭遇战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6日拂晓，当我前卫抵达红石寨时，发现敌人已达万福山、石佛寺一线。且敌已居山占险，易守难攻。这里所能运动的只是山脊梁上的一条独路，我兵力无法展开。于是我趁敌尚未发觉，迅速从右翼绕开敌人，奔袭歇马河敌之后方。我们在羊肠小道上穿越丛林，跋涉了一整天，黄昏后接近歇马河镇，立即展开两个中队向镇内摸去。其实镇上只有敌乡公所武装，他们十分麻痹，我未放一枪就将其全部缴械了。可是得手的消息却未很快传回来。夜死一般宁静，大家屏着气息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仍不见前面的动静。我忍耐不住了，带上警卫员、通信员想前去看个究竟。在转过一个弯曲的山路之后，猛然看见前面几

十米远有人打着手电筒迎面而来。我还以为是前面部队派通信员回来送信呢，我心里嘀咕：这帮小子，发洋财了，刚搞到电池，就烧包啦。双方越走越近，大约只有十步左右了。对方突然发问：“干什么的？”我也马上反问：“你是干什么的？”对方答：“是警察所放岗的。”随即看见几个黑影迅速散开，接着听见“哗啦”一声拉开枪机子弹上膛的声音。我顿时意识到是碰上敌人了。躲闪已无余地，而警卫员、通信员全在我身后，无法施展。于是我灵机一动，便从容回答：“国军一九九旅的。”并大声叱骂，“他妈的，胆小鬼也配当警察，你要走火打伤我的弟兄，我非枪毙你几个不可。”我火气冲冲地逼向那个戴白色大盖帽的军官，并下令：“把他枪拿过来！”这时，警卫员吕东武敏捷地从左侧上去，一下子抓住敌人的手腕，夺过短枪。“叫你的弟兄们都过来集合！”他看我气粗势壮，便张三、李四地一一呼叫名字，4个持长枪的警兵一个个从草丛中应声走了出来，乖乖地缴了枪。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向我叫屈说：“国军，不该缴我们的枪呀。”“我们去站岗，是防共军的呀。”……唠唠叨叨个没完。我说：“你们唠叨什么？黑天半夜的，谁晓得你是什么人？你要是共军呢？那还了得。到镇上弄清再说嘛！”他们真的把我们当成国军了，一路上跟我们还边走边唠，好像真是一家人搞误会了似的。进了镇，来到灯光下，我说：“你们好好看看，我们是啥子军？”那位警官（所长）这才恍然大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说：“四老板（指新四军），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下次决不敢和贵军作对了。”我们就让群众出面把他保释了。而吕东武同志呢，这小鬼高兴得不得了，站在一边，嘿嘿直笑。他搞到了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还加上120发子弹。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歇马河镇在一个山沟里，地形对我不利。为了防止敌人反扑，我们不顾战斗劳累，星夜转移到镇北而一个半山腰，占领有利地

形宿营。果然，敌人跟踪而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为避免同敌人纠缠，我即转移，摆脱了敌人。

九

为适应鄂西北地区斗争形势，8月27日鄂西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南、荆、当、远结合部为第四分区（张才干任司令员、刘子厚任政委）。

8月初，我团在一段时间内，曾以欧家店为轴心，同敌人周旋。敌人依仗其优势，总是寻我作战，你走他跟，你停他打，双方插花、穿梭，就像捉迷藏一样。我们还常常遭乡保队袭击。

9月22日，我团奉命由欧家店（南山）出发，在张才干同志率领下，准备去四分区。当天拂晓，敌一九八旅分三路向我围攻。我且战且走，时至黄昏撤到金竹园集结。张才干同志和我们挤在一个小茅草房里，大家背靠背取暖，一直坐到天明，才抄小道经数日奔波，来到了巡检司地区。我团遂兼荆、当、远县指挥部，我兼指挥长，杨劲兼县委书记，王展任县长，李秉范任副书记兼副政委，常志义任参谋长。这时，敌正集中主力“围剿”我武当山地区，我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敌十六旅与我周旋。我即迅速分散，打击敌之乡、保武装，抓紧筹粮、筹款，准备冬衣。

鄂西北战略展开之后，在敌人十万重兵的纠缠下，要创造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两竹（竹溪、竹山）白河、武当地区相继撤出，军区指挥机关于1947年1月，转移到荆（荆门）、当（当阳）、远（远安）地区与我团会合。

十

为了立稳脚跟，我们决定利用敌人一时骄狂、眼中无我、常常小部队就贸然追击的情况，抓住战机积极主动打击敌人。

1947年1月1日，刘子厚同志带领军区警卫团两个连和杨宏先支队一部，在观音河（远安东北）与我团会合。但他们后面却拖了一条“尾巴”，敌人紧追不舍。我和杨劲同子厚见面寒暄了几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辛苦了，好好睡一觉，吃顿饭，洗个澡，‘尾巴’来了，由我们收拾它。”他笑着说：“那好，今天就拜托你们各位了。”话音未落，果然从警戒线传来了“砰砰”的枪声。我三中队迅速抢占右翼山头，敌人亦拼命抢占此要点，我快敌慢，我先登上高处，待敌人接近，即开火反击，将敌击溃。可惜开火早了点，敌人逃向西面山岗，只俘获一人一枪。那个俘虏诉说：“小的是决不敢跟贵军为敌的。这不，他们发了我一百发子弹，我连一发也没打，全叫你们给缴了。”他说的是真话。在当时极力避战的情况下，这一仗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只要敢打，敌人是可以打垮的。从俘虏口供中得知，这股敌人就是敌整编七十二师十六旅四十五团之第一营（加强营）。营长叫叶栋梁，他指挥不足400人的队伍，竟敢远离主力，对我穷追不舍，可见其猖狂的程度了。

2日，我决定移防到南山上之老观窝（寺），利用其地形之利，摆好阵势，等他来进攻。等了半天却不见踪影。这时，得到了一个新情况。据房东说：“从远安县开来一个保安大队，已到了陈家咀，今天下午就到此地驻防打你们哩！”因说是一个大队，我立即派出三个中队，主动寻其作战，乘敌人还未集合之际猛扑下去，将其大部歼灭（其实敌人只有一个中队），俘敌80余人

枪，缴获子弹 30000 余发，我无一伤亡。特别是在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每条步枪只有 5~10 发，轻机枪只有 30~50 发），这简直是雪里送炭。

从缴来的敌文件中得知：敌人对我有个“围剿计划”。3 日，我们决定跳出敌包围圈，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当阳以北）。说来也巧，真是冤家路窄。我当天拂晓出发南进，将到横店子（远安东北）时，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敌人。”我从望远镜中一看，敌人像一条龙似的由西向东而来，还有不少行李担子。后面究竟还有多少，也看不清楚。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咬他一口再说。于是我决定立即出击，打他个猝不及防。战士们像猛虎扑羊一样，冲下山去，只打了 30 分钟，就将其全部歼灭。共击毙、生俘敌 300 余人，缴获枪支 300 余条、子弹 60000 余发，其中还有重机枪 3 挺，迫击炮 1 门。原来此敌就是叶栋梁那个营。可惜的是叶本人钻树林子逃掉了，未抓住他。我五中队中队长胡金星等多人负伤。从俘虏中查出一个机枪射手是日本人，叫富井（改中国名字叫李明）。此人是高中学生，被日军征募来中国打仗。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留下来打共产党。我们要放他回国，他坚决要求留下参加我军。我们安排他在三中队当战士。他工作认真，作战勇敢，还能写一笔汉字，经常提上桶子写标语，还当上了班长。后来，在高山铺战斗中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接连 3 天打了 3 个小胜仗。取得了 1947 年的“开门红”。我军在鄂西北地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我各解放区战场的斗争。

迟到的春天

——对坚持鄂西北斗争经历的回忆

沈甸之

中原突围，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时隔久远，很多事情都已渐渐地淡忘了。可是我对在鄂西北保康、南漳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和坚持游击战争的经历，却仍是历历在目，而且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又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此，我曾在1979年至1982年初写过一些回忆文章，1982年6月21日，我又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题为《怀旧——久盼访南保揖谢众父老》的长诗。为了实现我这一多年的夙愿，于1983年6月，又专程到保康、南漳作了一次旧地重游，拜访了当年的老房东、老战友，重温了我们之间当年的深厚情意。特别是也向在当年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掩护我军，保护我军的伤病人员而遭到敌人杀害者的家属、遗属，并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和亲切的慰问。现在再让我怀着依然十分激动的心情，对这段难忘的经历，再作一次较系统的回忆。

一、展 开

我当时是中原军区一纵二旅五团的副团长。当我们二旅的部队，突出敌人重围并粉碎敌人的尾追和拦阻，又从兴山、房县和神农架折转到当时已成为敌人后方的保康地区时，已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了。

10月4日下午，纵队张才干参谋长，在保康县金斗乡一个叫东沟水的地方，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也就是后来编入毛选四卷的《三个月总结》。毛主席指出：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军队，一共190个旅。在过去3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了25个旅，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阻击敌军的进攻，并可全部收复失地。他在文章中还着重指出：“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的毅力克服困难，除一部分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随后，张参谋长还传达了纵队王树声司令员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命令我军，必须在今后3个月内，再歼灭敌军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再有一百天左右的时间之后，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全国形势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就好转了。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顽强作战，力争钳制住更多的敌人，继续援助老解放区打更多更大的胜仗，歼灭更多的敌军。”

接着，张才干参谋长，又向我们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在鄂西北

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他说：“原来在我们后边拼命追赶的敌军大部，都像是一头头老黄牛一样，被我们牵着鼻子拉到兴山、房县以西的大山里去了。目前，敌人还不能立即调转头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立即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力争钳制住更多的敌人，更有效地援助老解放区作战行动。”

在这次会议上，我接受了带一个连在保康、南漳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在接受任务之后，我很快把七连的干部和将随同我一块行动的地方干部，其中包括原大别山地区礼县县长孔晓春同志，原豫西根据地禹县九区区长李浩同志找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及上级的有关指示和决定，并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之后，便在夜幕下向目的地出发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保康县城东南，距城约四十多里的庙子堰停了下来。这里是保康县的永峰乡、黄化乡交界的地方。东边是永峰乡、西边是黄化乡。两乡东西长达五六十里。这两个乡的东面、东南和南边是南漳县的长坪乡，明阳乡，马良乡和歇马乡。整个地区方圆约一百多里。地区的中间，有一条东西长约三十多里的大山叫“千家老林”。它的周围，都是连绵起伏，纵横交错和灌木丛生的中小起伏地带。“啊，这里的确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呀！”

二、扎 根

部队在山堰口休息和看完地形，布好警戒之后，就到附近一户姓姜的家里住下。房东一家人并不害怕我们，不仅没有躲避，而且还主动地为我烧水做饭。附近的群众，也在当天下午闻讯赶来向我们问寒问暖。其中有一位叫姜纯德的，更是特别热情。开

始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有些纳闷。心想：这里是我军从未到过的新区，群众也都是初次见到我们，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经过同群众的交谈之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十多年前，贺龙同志所率的红二方面军曾在这里住过和开展过土地斗争的地方。姜纯德本人，就是红军的掉队干部。他的家就在庙子垭附近，他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当他得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后，便向我介绍了很多对后来开展工作十分有用的情况，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我们讲了很多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有关红军的故事，特别是我们突围部队在突围后的行军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动事迹。群众都称赞我军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这些情况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是我们在这里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于是，我便决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抓紧时机，迅速开展以下三项工作：

（一）继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向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广泛宣传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和他抗战胜利后，不顾全国人民在胜利后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迫切愿望，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特别是要说明我们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同人民一起反对内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坚强决心和方针政策。尤其要以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际行动，让群众进一步认识我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

（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特别是当地包括乡长、保甲长、红帮大爷等上层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力争早日建立民主自治政权，团结群众，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坚决斗争。

（三）向地主、富家和富商募捐布匹、棉花和征收少量商业税，解决部队的冬衣和菜金问题

根据姜纯德的介绍，得知永峰乡乡长张逸仙是当地的一家地

主，过去曾教过书，当过一任县中的校长，还在县政府当过一段司书，也还比较开明。他虽然当乡长多年，但群众反映尚好，民愤不大。“在野派”头目万书筠，是一个小恶霸。他虽早有想当乡长的欲望，可是群众，特别是上层人士都不支持而未能得逞。但他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据说全乡十二个保中的西六保，就是他的地盘。由此看来，我们要想在这里站得住脚，就必须先做这两个人的争取工作。

为了尽快去做张逸仙的工作，我在第二天中午，就带部队住进他家。他全家人都没有躲避，只有他一个人躲到别处去了。当时他的母亲正卧病在床，我亲自到她床前表示问候和安慰，并劝她尽快把张逸仙找回来同我们见面。正在这时，从外而回来一个挺干净利落的年轻人。他自称是张的“长工”，而实际上是张的护身随从，张逸仙就是在他的保护下仓促离家的。我在对他做了一些宣传解释工作之后，就给张逸仙写了封很简短的信，向他交待了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约他尽快回来见面，共议大事。不久，即接到了他的回信，表示愿意在当天晚上和我见面。

这次会见是在他的一个佃户家里进行的。当我和孔晓春一同到来时，他早已准备了一桌酒菜，并站在门前等候了。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我便很快把话题一转，讲起我党我军的一贯主张和政策上来了。我既讲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和在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主张，也揭露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在抗战胜利后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之后，我更着重讲了我军在鄂西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和联合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改革，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和政策。张逸仙也向我讲了他自己所耳闻目睹的，有关我突围部队，在行军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动事迹和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恶劣行为。他称赞我军“是真正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在会谈中，他还高度称赞毛

泽东、周恩来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称赞刘伯承是军事家而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他只是半个军事家。除此之外，他也向我提出一些他早有耳闻但又不甚了解的有关我党在华北老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等政策问题。对此，我都对他作了细致的回答，他也都一一地表示理解和赞赏。

最后，我便向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一、乡公所不得向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报告有关我军活动的情况。不得建立监视我军行动的情报组织。二、我军要吃饭，要向较富裕的农户借用粮食，乡公所不得以任何借口和方式进行阻挠或干涉。三、冬天快到了，而现在我们战士们的身上，还只有一套槛楼不堪的单衣。因此，我们要向富裕农户和富商募捐布匹、棉花制作棉衣，乡公所不得从中捣乱和破坏。对以上这些，张逸仙也都一一表示理解和赞同。

在这次会谈之后，孔晓春又单独同他多次见面。我同他的第二次会见，是在10月18日晚上。这次会见主要是同他协商在永峰乡建立民主自治乡政府的问题。在这次谈判中，他突然向我提出：想要一支护身手枪的要求。当时我心里虽也猛地怔了一下，但我又很快猜出了他的真实用意。于是，我就二话没说，立即把自己腰里的一支手枪从皮带上解下来，双手递到他的面前说：“您看这一支是否可以？如果张乡长不嫌弃的话，就请收下吧！”这一下可真的把他惊呆了。他立即站起身来，摇晃着双手说：“不……不……不能，不能！逸仙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这时我又说：“我们已是多次见面的老朋友了，如果对我信得过的话，就请您把它收下！”这时他才双手接了过去，尔后又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沈大队长！您真够朋友！”

常言说：“心诚能使铁石软。”也就是在这次谈判中，张逸仙也爽快地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在该乡建立民主自治乡政府的主张。而且他还推荐他的大儿子出任副乡长。10月21日，他又主

动地交出了乡公所的枪支、弹药和印信、档案等。与此同时，我和孔晓春同志也多次去做万书筠的工作，最后他也表示同意和支持成立民主自治乡政府，并愿意担任副乡长职务了。于是，这个以孔晓春同志为乡长，张××、万书筠为副乡长的永峰乡民主自治乡政府，便于1946年10月25日下午，在原乡公所所在地塔湾召开的，由全乡12保的保长、保代表共同参加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乡长孔晓春发表了施政演说，我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我党我军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改革，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和政策。我在会上还明确宣布：从即日起，除每个保征收40石包谷，分散保存在各保作为公粮和征收少量商业税之外，其他各种捐税将一律废除。在永峰乡的影响之下，黄化乡以李浩为乡长，姜纯德为副乡长的民主自治乡政府，也于11月11日在原乡公所所在地黄堡坪正式宣告成立了。

同这两个乡相毗邻的南漳县的长坪、明阳、马良、歇马、板桥等乡，虽然没成立民主自治政府，但那里的大部分保甲长也都能为我军办事，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到12月中旬敌人一部分正规军调转头来对付我们时，我们已有了一个方圆一百多里的游击根据地了。

三、募捐寒衣

解决部队过冬棉衣问题，虽早已列为我们要抓的三项主要工作之一，但当时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大都用在做统战工作和建立民主自治政权上去了。现在这些工作已基本完成后，天气也越来越冷了，解决棉衣问题也就更加迫切了。那么如何解决呢？对此，姜纯德同志也早有建议，并把永峰、黄化两乡的地主、富农

和富商的名字列了一个单子给我。我对此也十分重视，而只是在方法上稍加改变，即把强制改变为劝募。于是我就和孔晓春、李浩同志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写这封劝募信的问题。信是先由孔晓春同志执笔起草尔后经我修改的。信中，首先讲了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指出自抗战开始，我军即转入敌后战场，全体指战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继而又揭露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安危和人民在抗战胜利后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迫切愿望，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后又讲了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转战至此，而又时届严冬，使全体指战员陷入身无御寒棉衣的困境。最后才提出盼望慷慨解囊，捐助布匹棉花的殷切希望。在修改过程中，我又满怀激情地在信中加上了一首短诗：“秋风起兮恨衣单，夜入更深倍觉寒。壮士虽怀不屈志，岂能敌得凛冽天？”信写成之后，就用浓重的洋绿水写在麻纸上，再用水印的办法复印了二十多份，然后由我亲笔签名后分送各家。

信发出之后，很快就收到了不少回信。他们都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尽力帮助。也有不少人很快就送来了布匹和棉花。少者一匹两匹，一斤两斤，多者三匹五匹，三斤五斤。每匹土布长24尺，宽1尺4寸。可是在这些来信和捐物中却未看到王子安的动静。

王子安不仅是黄化乡的首富，而且在全保康县也是数得着的大户。他不仅有大量的土地、山林，而且还开了几个造纸厂。为了开展统战工作，我过去曾到他家作过专访，向他做了不少宣传工作。他对我军的态度也比较友好，可是这次却又为什么见不到他的动静呢？如果他真的不肯捐赠，我们这一百多人的棉衣问题就无法解决。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还是再亲自去一趟。

在一天晚上，我带一班战士，冒着初冬的寒风，踏着被重霜薄冰覆盖的十几里山路来到他家。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我便问

他：“几天前我给王先生的信，不知可曾收到？”他回答说：“子安早已拜读过了！大队长的文采实在高雅，深感敬佩！”稍停一下之后他又接着说：“我早已准备了一担（100斤）耳子，准备送到南漳去换布回来，不过只是……”他的话音未落，我便接着说：“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常言说：‘树大招风’，王先生当然也应谨慎行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你找两个可靠的人，担上耳子随我一起走”。我们这几句话正道出了他的心事，于是他就十分激动地握我的双手说：“是的！是的！是的！知我者乃沈大队长也！”之后，两位工人就担着木耳随我一起离开了。事后，我又转托别人，把它运到南漳换了35匹白布回来。

我们在先后逐批收到这些白布之后，也就随即用稻草灰和从地下挖了的黑炭灰，分批地把白布染成了灰布，再由我们随队带的裁缝师傅剪成为衣片，分发给大家，自己动手缝制。此外，每人还做了一条棉被。我没有要棉被，只是自己动手做了一件很漂亮的棉大衣。在12月中旬前后，棉衣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为了解决部队的菜金和零用钱问题。我们在着手解决棉衣问题的同时，也在活动区内的重要通商路口设了三个税卡。由于我们的税率低，态度好，商人们也都愿意交纳。在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之后，战士们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也就减少了，即使是有个别战士或过路部队，无偿地用了群众的油、盐和打草鞋的麻绳等，我们也有钱可以按价赔偿了。

四、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主席早就说过：“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又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

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主席的这两段话，是从我军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又在我们的这段斗争的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7年1月28日晚上，我们从千家老林北麓的八字岩出发，准备去偷袭敌人设在刘家湾后山上的军士哨。主要是想在消灭这个班之后能缴获一些子弹，因为当时我们的子弹实在是太少了，每支步枪只有三五发，每挺轻机枪还不到五十发。可是当我带部队来到距敌人只有四里路的地方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这一连敌军已在黄昏前离开那里回保康孙城去了。于是我们只好顺原路返回，天亮前来到一个叫莲花瓣的几户老乡家休息。我住的这家姓邓，我们在他家房后的山上设了一个哨兵，另在前面的两条路上派出了游动哨。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另一股敌人却从我们后面来了。由于我们后山上的哨兵失职，没有及早发现敌人，直至使敌人来到我住房的背后。这时我正在和房东的一家人叙家常，突然听到敌人在房后大声喊道：“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咧！”“准备好了，打！”几挺机枪同时响了。我连忙右手提枪、左臂夹着大衣往外走，刚到左边屋角处，就迎面碰到两个敌人，一个端着刺刀对我大喊：“缴枪不杀！”另一个正蹲在地上给轻机枪换弹夹。机枪又正好在我脚下，我猛一抬脚把它踢翻后转身就往后跑，敌兵打了我一枪没有打到，我又纵身一跳，跳到大约两米多高的坎下，这时敌人甩的手榴弹又在我身旁爆炸，但没炸伤我，只是气浪把我的帽子吹飞到坡下的树丛上去了。之后我便爬起来往下跑了几步，抓住帽子往头上一戴就又向下跑去。后边跟上我来的只有一个排。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又来到距莲花瓣只有四里路的陈家湾休息。我的老房东邓大爷得知后就连夜来看我。我们这次见面虽然只是第二次，可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却真像是长期在一起生死与共和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各自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我含着

热泪问他一家人在当天早晨受惊受害的情况。他也老泪纵横地向我叙说了我们当天在他家受袭击时的情景。当天我们在他家住的共有16个人，随我逃出来的只有8人，其余8人中有四位同志当场牺牲，另四位同志在负伤后被俘。后边他又说：“你的镜娃，也就是你的千里眼没有丢！没有被国军搜走呀！”接着他便讲了详细经过。当敌人进屋搜查时，他的儿媳突然看到望远镜仍挂在墙上，于是她就急忙上前把它取下来，塞进抱着孩子的怀里。后来她怕搜身，又把望远镜扔到床底下，当敌人问她“扔的是什么”时，她说“是孩子鞋子”，敌兵过来看了一下，果然是有一双小孩鞋子，就没有再往床下看了。后来他老人家又说：“我知道它对你有用处！本想把它给你带来，可是我怕在路上遇见坏人没有敢带。等你什么时候消停（即得空）的话，就再到我家里去一趟，我再把它拿出来给你呀！”

四天之后，我又来到他家。他们一家人都把我当做贵客来迎接，随后便很快把望远镜拿出来给我。我说：“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一家人对我们的爱护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来向你们表示谢意！”这时我把缝在衣袋里的一块大头银元取了出来对我身旁的老太太说：“我身上只有这一件东西，就给您的小孙子作个纪念吧！”可是老太太说什么都不收，而且她又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已是二十七八的人了，成年累月的为我们老百姓受苦受累，现在还没有成家，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让我这个孙子给你做干儿子，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立即回答说：“那真是太好了！”于是就立即把孩子从她怀里接过来，搂在我怀里，并把大头银元装进了孩子兜兜里。这时，老太太又指着我的脚说：“看你没有鞋子，一双脚都破成这个样了，到处都是伤！我已经打好了裕楷，想让儿媳妇给你做双鞋子，可是不知道你的脚大小，你今天把脚底样留下，再过上十天八天的你再来拿！”后来我没有再去，鞋子也没有拿到，可是他们一家人的深情厚意，却永远地铭刻在

我心上！

在这次遭敌袭击时跟我出来的只有一个排，另两个排在连长蒲正华（原三营营长）的带领下跑到另一个方向去了。后来得知，他们在当天晚上冒雪来到千家老林的冯甲长家里。冯甲长又把他们送到山林深处的一户老乡家里隐蔽休息。可是当他刚刚返回家时，追击的敌兵也来到他家门口。因为我们部队留下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再加上天气又冷又黑，路也难走，敌兵也不想再继续追了。机警的冯甲长，便乘机把他们让进家里，为他们生火取暖，并借到屋后取柴的机会，用柴火把我军在雪里留下的脚印全部扫掉了。而后，他又打着灯笼四处高喊：“对面张家，你看到新四军了没有？要是看到就快到我家向国军报告！”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向我们的部队通报了消息，让他们及早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在两天单独活动之后，又在白保长的帮助之下，顺利同我会合了。

当地群众都管老虎叫“老巴子”。这时，群众就用“老巴子”来作为对国民党军队的代称。在敌军进行“清乡”时，群众便自发的在一些重要山头 and 路口设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敌人，便彼此间一问一答地高喊：“噢嚟！”“哎嘿！”“老巴子来了！”“到哪了？”“到××了！”就这样一站传一站地迅速传送到整个山区。这时群众既可以及时地躲避，我们也可以随时知道敌军的动态。

董尚友，是峪河上边段家湾一所私塾的青年教师。我们已是多次见面的老朋友了。在一次见面时，我对他说：“我们有四位同志生病，不能随队行动，你能不能帮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他稍加思索之后说：“我是同意，但我得回去跟瓢把子（即他当家的大哥）商量一下。”经他大哥、二哥同意后，就把我们这四位同志领回他在百峰坪的家里。每天天亮前把他们送到山洞里隐蔽，中午给他们送饭，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来，直到他们全部病愈归队。可是后来村里的坏人向敌人告了密，敌人就

把他们兄弟三人一齐抓去，吊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我们的四位同志和枪支。他们严厉地对敌人说：“他们早已回部队了，枪也带走了，你们想要就去找新四军去要吧！”大哥董尚伦是一位个性刚烈的硬汉子，敌人愈打，他就愈是大骂，直到最后被敌人杀害。

有一天下午，我在岢峪河的路上，遇到一位从百峰坪去南漳县城卖草纸的老乡。他说：敌人为了隔断群众和你们的联系，防止群众向我部队报情况，他们就把百峰坪的二十多个青年都抓起来，锁在张家塘的一孔窑洞里，已经是三天三夜了，要求我快去救他们出来。他还告诉我说：敌军一连全都驻在百峰坪，张家塘没有住军，只有三个保丁在看守窑洞。张家塘，我曾去过多次，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于是我就在当天晚上带部队顺小路爬上张家塘，来到那孔关着二十多个青年的窑门前。在窑前看守的那个保丁，正坐在石头上打盹。另两个保丁正在旁边的一个火塘里打鼾。我沿着墙根，来到窑门旁那个保丁的背后，猛地向前一扑，就连人带枪地拦腰把他紧紧抱住，又用手堵住他的嘴巴命令他：“不准乱动！”火塘的门也被我们的战士堵住。这时我很快认出，被我抱住的这个人，正是十二保的保丁白小武。他曾多次为我们送过信和带过路。我便立即让他拿出钥匙打开窑门。被关的青年一拥而出，把我团团围住，向我表示感谢。我向他们嘱咐说：“你们暂时不要回家，先到亲戚家里躲几天。”这时也有几个人向我提出要求想参加我们的部队。我对他们说：“你们都先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苦了，怕你们不习惯。现在你们先回去，参军的事等以后再说。”这群年轻人是自由了，可是这三位保丁问我：他们明天又怎么向“国军”交代？于是，我就向他们讲了我们在华北地区夜间破坏敌人的电话线之后，又把被迫来看守电话线的老百姓，一个个堵上嘴巴反捆在电线杆上，到第二天敌人来查看时，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把他们一一放开的故事向他们讲了一

遍。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随后我们就用这个办法，把他们三人捆在火塘的木柱上之后，就向他们挥手告别了。

茨菇塘，是千家老林山上住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周围大部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南北两条小道可以上下。南面的小道是沿着山谷上去的，坡度虽稍缓一些，但有两处隘口同样也是易守难攻的地方。这里群众对我军的态度很好，我们常有伤病员和临时掉队的同志在这里休息。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又处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中心，所以就被人们把它看做是我们这块游击根据地里的根据地了。因此，敌人对它特别忌恨，把它视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曾多次放出“要进攻茨菇塘”的消息。当地群众也早有防备，把过去多年不用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又找了出来做了擦拭磨砺，在各个隘口道旁的山头上也堆满了滚木礮石。到1947年的4月，敌人似乎是真的要来进攻了，所以他们就派出三位代表，连夜打着灯笼跑了几十里路到板桥乡来找我们搬兵求援来了。他们要求我们连夜同他们一道返回到他们那里，同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击退敌人的进攻。江团长和我听了他们的要求之后，既不能简单的拒绝，更不能轻率的同意，而只好耐心地和他们一块分析情况和研究退敌良策。既要让他们懂得在敌我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绝不能同敌人打硬仗的道理，又要同他们研究出一套如何打退敌人进攻和减少损失的办法来。为此，我们就向他们介绍了不少有关华北老根据地群众如何进行坚壁清野和民兵如何同敌人打麻雀战的生动事例，给他们上了一堂十分生动的游击战术课。他们听了之后，既觉得很有道理，但也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情绪。之后，我们又对他们说：“你们回去之后，先抓紧时间做好坚壁清野工作，过一两天后，我们再去看看你们。如果敌人真的来进攻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想办法支援你们，共同打退敌人的进攻！”

时隔一天之后，江团长我们又带部队来到这里，看了他们的

准备情况，又作了一些指导和帮助。又隔一天之后的一天早晨，敌人的进攻果真是开始了。敌人大约是一个营的兵力，主要是从南面来的，北面只是钳制方向。茨菇塘的群众，也正是按照我们教给他们的办法，使用鸟枪、土炮和滚木、礮石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我们也在敌人的右侧背后给予了火力支援。敌军见势不妙，就不敢继续贸然进攻，在当天下午就撤退回巢了。但是残暴狡猾的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在第二天夜里，用一个连的兵力，偷偷摸摸地从北坡上爬了上来，天亮时才对村子里群众进行了火力袭击。尔后又在这里“驻剿”了三天之后才悄然撤退。由于群众早有准备，人员、牧畜和物资的损失还不算十分严重。

永峰乡长孔晓春和黄化乡乡长李浩他们，都仿效华北敌后武工队的办法，带少数人单独活动，但也常和我见面。有一天孔晓春同志对我说：“西垭的王大爷要我给你带个口信，他想请你到他家里坐坐！”我和这位王大爷也曾在路上巧遇过一次，有过一面之交。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红帮老大，又有些学问，待人也比较和气厚道，很受附近群众尊重，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王大爷！”在孔晓春同志向我转达了他的口信之后，我也时常想去看他，可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一天早晨，我冒雨带部队从他门前经过，想顺便拜访一下这位老人。经过扣门之后，从门缝里露出一位老人的面孔，我说：“你是王大爷吧？我是沈甸之！你托孔乡长带的口信他已告诉了我我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今日正好从府前经过，想顺便来看看您！”可是这位老人仍是紧紧抓着门不肯打开，但却含着眼泪对我说：“沈大队长，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呀！因为国军一个连就住在山脚下刘保长家里，离这里只有二里多路。他们为了让刘保长交出你们的人（当时我们也确有一位女同志和另外三位男伤病员在刘保长的掩护下隐蔽休息），昨晚把他吊打了一夜，他那惨叫的声音在这里都能听得到呀！今天我实在对不起你，因

为如果国军知道了，我们全家就全没命了！”这时我又问他：“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了？你老人家能不能再去看看呀？”老人点头表示同意，并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进门之后，他便立即让儿媳妇为我们准备早饭，然后就带着我们的侦察参谋邱发顺同志一块下山去了。当他们返回时，我们已吃完了早饭，并得知敌人仍住在刘保长家未走。在我们就要马上离开他家时，王大爷又捉了一只大白母鸡递给我说：“今天没时间了，你就把它带上，什么时候消停了，就把它杀了给大伙打个牙祭！”我对他说：“你心意我领了，但这鸡我不能收！”并随即把它放飞了。这时他的儿媳又拿来十个熟鸡蛋和一个大包米面饼子，让王大爷转交给我。我说：“这个我可以收下。我实在太感谢你老人家 and 你们全家了！”这时，他老人家又双手紧握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孟子曰：‘得民者生，失民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是得民心的呀！我们老百姓的心都是向着你们的呀，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呀！可是你们现在太苦了。听说大军已经到河南了，你快派人去和他们联系呀！等大军来了，你们就不再遭这个孽了，我们老百姓也有出头之日了！我等着你们呀！”王大爷的这些如金似玉的言语和他那滴滴泪水，都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使我激动不已，真想马上大吼几声，可是我还是极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满含着热泪以颤抖的声音对老人说：“王大爷，我太感谢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深情、信任和希望了！待革命胜利之后，我一定再来看望您老人家！”

在这个地区里的保甲长们，大都还是比较好，都还乐意帮我们办事。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十二保的保长白振武。当敌人大军压境进行“清乡”时，他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应酬一下，面多半是由他人代他出面应付的，而他却时常亲自和我见面。他还常常派人给我送信，通报情况。第十保的张全道表现较差，但他还没有对群众和我军造成太大的损失。表现最坏的是十一保的保长李成

孝。他曾在一天晚上带着敌军一个连追了我们一夜，并把岷峪河的两名造纸工人抓了起来。因为他们拒不说明我军的真实去向，就在第二天上午被敌人杀害了。同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还有我军的两位伤病员同志。事后，为了严惩这个为虎作伥的败类，为被敌人一同杀害的四位烈士复仇。在一天夜间，我们派人把李成孝抓到岷峪村外就地正法了，而且还在他尸旁的树上张贴了由我和孔晓春共同署名的布告。布告在宣布李成孝的罪行，指出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后又提出警告说：“今后如再有敢于认敌为友，为虎作伥与我军作对和残害老百姓者，本部定要深加追究，严惩不贷！”

五、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队伍内部的坚强团结，正是我们能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展开长期坚决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我们的这支队伍，开始是由一个连队和团部的十几个人共一百零几人组成的。在1947年2月上旬康家山战斗之后，这个连队被纵队副司令员刘昌义同志带走了。他认为我同当地群众的关系比较好，对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所以就让我带少数人继续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久，我们团的江贤玉团长带的一个排也从兴山、房县九道梁地区来到这里和我会合。我们两个人带的人加在一起总共是42人，而当时集中到这个地区内外，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敌军兵力已是三个正规团、两个县保安大队和几个乡保队等共达近万人之众，甚至连保康县的县太爷也亲自披挂上阵了。因此，从2月中旬到5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可说是我们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不仅在这个地区周围的各个集镇都驻有重

兵，而且在我们活动地区内部，如百峰坪、长岭、岷峪等地，也都有整营、整连的兵力长期“驻剿”。敌人每天早出晚归，把部队撒开，逐山逐沟地进行“清剿”、“搜捕”。他们如认为哪里可疑，就向哪里用机枪疯狂扫射和进行讹诈狂叫：“我已经看见你了，你还不快些出来！”喊罢之后，又是一阵连续扫射。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才又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法炮制。如果他们发现哪个山林里有我们隐蔽时留下的痕迹，他就放火把这片山林全部烧掉。如果发现哪个老乡家里，住过我们的部队，他们就杀人烧房，杀一儆百。

我们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确实是十分险恶，而我们队伍的内部，却是十分团结，上下级的关系更是非常融洽。领导对全体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情况都非常关心。为使部队不再遭到严重损失，为使所有同志身体健康，减少疾病，领导每天除要呕心沥血地选择最好的作战方案和行动路线，以避免敌人的追击和分路合围之外，还要做到使大家每天夜晚都住在群众家里，使部队每天都能吃上两顿热饭。中午还能吃到干粮。对少数几位长期安置在群众家隐蔽体息的伤病员同志，我们还派有医护人员专门去照顾他们。为此，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都是每天凌晨三时前起身吃饭，尔后在拂晓前走出一二十里路之外再进入隐蔽地区休息。不管敌人怎样打枪、鸣炮、狂吼乱叫，只要他们不走到自己身边，我们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等到下午5时左右，敌人“清乡”搜山的部队大都相继回巢之后，我们才走出树林，到附近老乡家里，请他们帮我们弄些饭吃，并派出侦察员四出打听情况，待天黑人静之后，我们再走出十几里路之外去找新的宿营地址。到达驻地之后，由我自己或让别的同志到房东屋后窗户上轻轻敲几下，当里边问“是谁”时，我们就说：“我姓沈！”房东就快起身披上衣服，先把狗子关起来，然后再开门让我们进屋，为我们笼火取暖。大家就各自抓一把稻草或包谷叶铺在地上，躺在火堆

周围睡上三四个小时。第二天3点前后，房东给我们做些饭吃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但也有时由于情况不明，一时不能确定行动方向，我们又过于疲劳，而且房东又愿意留我们继续在他家里休息时，白天也就继续住在这里休息，外边的警戒也完全由房东负责。但这样的情况只有过一次，主要的是怕一旦被敌人发现，会给部队和房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了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和分路合围，我们常常需要在一夜之间走几十里路，通过敌人强迫老百姓设在通路口的几道哨卡。每个哨卡通常都是由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现我军，就鸣锣放炮，向敌军报警。他们为了取暖和壮胆，两个人之间都生一堆火。我们为了不致走漏消息，为了防止放哨的群众惊慌失措，大喊大叫，鸣锣放炮，就由我和江团长走在最前面，静悄悄地从身后接近放哨的人，尔后突然把他们拦腰抱住，堵上嘴巴，然后在火光的照耀下，让他们看到我们的面孔，使他认出是自己人。在向他们问明敌情之后，就请他们跟我们一块行动，到新的地方隐蔽休息。和我们一块吃干粮、喝冷水。当我们第二天傍晚向新的地方转移时，再向他们表示歉意之后，先放他们回去和家人团聚。

我们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是这样日夜不停地，在这块南北不过几十里东西至及百里的土地上，同敌人反复做捉迷藏的“游戏”。敌人想消灭我们，但他却找不到我们，而我们要想打击他们时，却又十分容易得手。我们想打就打，想走就走，非常主动，而且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士气和必胜的信心。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仅有42人的队伍中，却有着以江贤玉同志为首的24位老红军。他们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的中坚力量，是我们这座坚固堡垒的坚强柱石。

在1945年初我和江团长就相识了，他当时是十团团长，我

是十一团团长。同年10月，部队在桐柏进行整编时，我就和江贤玉团长同在一个团里工作，他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了。我们两个在以往长期共同工作、共同战斗中所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以及所形成的互敬互爱，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密切协作的优良作风，又在这段岁月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扬。我们彼此之间总是互相敬重，遇事多作商量，同时又很注意互让互谅，充分照顾和发挥对方的特长。特别是江团长，自知他到这个地方时间比较晚，各方面的情况不如我熟悉，所以他对我的主张和意见都是十分尊重和支持。特别是在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通常都是由我做主和出头露面。每日白天，我们带部队在山林里隐蔽休息时，总是由我俩轮流用望远镜观察周围动静。在夜间，也都是互相照顾对方休息。当时我还有一件棉大衣，晚上睡觉时，它就是我俩共同的棉被。

在我们的这一支队伍中，还有一位使我终生难忘的好同志，他就是我们的“老班长”王天祥同志。他是川北人，从小给地主放猪、打猪草、放牛、种田、抬滑竿。1933年参加红军，扛重机枪，在长征路上当了班长、排长。1937年整编时改当司务长。但因为他没有文化，不会记账，又主动要求当炊事班长。1942年在大生产中，他是七七一团有名的劳动模范。团的首长、旅的首长，都十分亲切的称他为“老班长”。1947年我们一块在保康、南漳活动时，他已年满46周岁了。他又有十分严重的哮喘病，走起路来，总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样，他不仅一直紧跟着部队，而且还是照常为大伙炒菜做饭。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如过去了，江团长和我就想给他找一个比较可靠的群众家里让他隐蔽休息一段时间。一天我对他说：“老班长，你的身体近来一天不如一天咧！我想给你找一个可靠的群众家里让你休息几天，等身体稍好一点之后再回部队。如果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一定派人把你找回来！”我的话音未落，他就紧紧地握住

我的双手说：“副团长，我知道你的好意！可是请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跟上部队，什么时候这口气一断，往路边一倒，你有时间就给我身上掷几锹土，如果没有时间，你走你的，我绝不连累部队，绝不能让部队为我受损失！”他的这几句话使我很受感动，我也满含热泪地对他说：“我的‘老班长’你真是我们的好同志呀！我怎么也舍不得把你丢下！只要你有这个决心，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从此以后，不管当时情况怎么紧张，他的身体如何劳累，他从未掉过一步队。1947年6月，我们回到豫皖苏地区后，他被评选为二级功臣，光荣地参加了军区召开的庆功大会。

当时和我们一同并肩战斗的还有一支由郑登武同志所率领的，于1947年3月在南漳长坪乡龙凤坪为反对当地恶霸、长坪乡乡长张偏脖子而揭竿起义的地方武装。他们开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后来又有发展，而且也有我军的少数掉队人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快就发展到30多人了。他们大多都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他们常常都是单独活动，有时也同我们会合一起行动，是我们十分得力的助手。

六、威震敌胆

自从我们受令到保康、南漳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以来，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中的“三个月内”以及王树声司令员讲的“一百天左右”和“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一直在我们大家脑海里盘旋和激荡。大家都在以十分急切的心情盼望着全国形势，特别是我们这里的斗争形势迅速好转。加以当时我们完全失掉了同上级的联系，对外边情况，特别是我军对敌作战的胜利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就有少数同志产生了一些急躁情

绪，他们天天都在关注着树梢的变化，似乎是想从那里得到一些春天到来的消息。但其实大家也都更清楚地知道这是无用的，因为季节的变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我们这里形势的好转，是要靠我们自己主观的努力去争取的。如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钳制更多的敌人在这里同我们纠缠，也就是对我老解放区作战行动的有力支援，他们就会打更多更大的胜仗，整个革命形势以及我们这里的形势，就能更快的好转。为此，我们不仅要在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避免损失，而且还要想方设法抓住有利战机，积极主动地去消灭敌人。例如，在1947年3月的一天黄昏，我们刚刚摆脱敌人一整天的追击之后来到张家塘休息，得到消息说，当时正在积极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行“清乡”的后坪乡的乡保队30多人，就住在距张家塘只有几里远的对口店。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十分疲劳，但还是由江团长和我，冒充敌人军官带部队绕了一个很大弯子，闯过敌人哨兵，对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这次战斗虽然只消灭了十几个敌人，但在精神和心理上，对敌人却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也是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威力的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我们还及时抓住了一些十分难得的机会，巧妙地对敌军高级军官进行了两次强有力的心理攻击。

第一次是在1947年春节后的几天里。一天早晨，我正带着部队在长岭上从北向南行进，迎面来了一位大约50岁上下的老人和一个20来岁的小伙。据老汉自我介绍，他姓张，是保康县城里一家油坊兼邮政代办所的老板，那个年轻小伙是他的儿子。他老家在千家老林下边的金竹荒，是在节前回老家探亲和给他的侄儿送结婚礼品后现要返回县城去的。我本想向他打听一下情况之后就让他们过去的。所以在我们见面时我就对他说：“老先生，不要害怕，我们是新四军！”可是这位老先生就是不相信，硬说我们是“国军”，而且还说：“你们的罗团长就住在我家里，我还

看到过你！”说来事情也确实是凑巧，据说敌人当时也确有一营人穿着不带任何军队标志的灰色军装，冒充我军，到处欺骗老百姓和引诱我军个别掉队人员上当受骗。那天我也穿了一身灰军装，还披了灰棉大衣，所以他就把我们认成为“国军”了。于是我也就伸出大拇指对他说：“张老板的眼力果然不错，我就是三营的张营长，想不到今天又在这里相遇，可真是太巧了！”之后我便向他提出请他给罗团长带信的问题，他也随即满口答应了。于是我立即来到跟前一家老乡家里拿出信纸信封，写了这样一封信：

罗团长阁下：

我们素不相认，今日冒昧致函，请予见谅！

自从抗战军兴，我军即深入敌后，转战沙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虽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独夫民贼蒋介石，却不顾全国人民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迫切愿望，一意孤行的发动全面内战，妄图全歼我军，消灭一切进步力量，实行独裁，重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属令人难忍！

我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再让的情况下，不得不冒险突围，转战至此，但蒋介石仍以重兵压境，星夜斩杀，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其用心之险毒，更是天理难容！

阁下乃堂堂军人，当应深明大义，认清形势，择义而行，切不可助纣为虐，与民为敌，残害百姓。常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上述进言有当与否，望祈三思！再会！

遥 致

钧 安

新四军鄂西北军区第五游击大队

大队长沈奠基谨上

1947年3月

信写好后，又在牛皮信封上写道：“烦呈，罗团长钧启，内详”等三行小字。封好后交给了张老板，并嘱咐说：“一定要带好！不要让新四军搜查了去！”

后来从保康县城传出的消息说：这封信确实是带到了，但它却也给这位好事的张老板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位罗团长拆信一看，便马上拍案大骂：“你通匪！快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后来经过多方运动，请客送礼，花了大钱之后才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对张老板来说，尽管他受了惊，破了财，但好歹总算是了结了。但对这位罗团长来说，它却又好像是插在他心上的一把刀子，使他时常感到阵阵剧痛和暗自发抖！可是事情却也真正奇怪，时隔不久，他又接到了我的第二封信，又在他那颗受伤的心上深深地捅了一刀。

1947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的部队在长坪以南约十几里路的山上隐蔽休息，突然听到山下村子里狗叫得厉害。我用望远镜一看，正是两个蒋军的士兵进入了一个老乡家里。我们想把他们抓来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江团长就立即换上便衣，带着两个同志下山了。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久这两个士兵就乖乖地跟着他们来了。经过审问，得知其中一个罗团长团部的司务长，另一个是值厨的士兵。他们说，团部就住在长坪镇里，他俩是出来采购，而实际上是来向老百姓抢劫猪肉、鸡和鸡蛋等东西的。我们向他们讯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又从这位司务长身上搜出了15万元关金票。我问他：“这些钱都是你的吗？”他说：“有5万元是我的，另10万是公家的！”我说：“那么！这5万是你的还给你，另外10万元我们暂时借用一下！”司务长说：“那……

你得给我打一个借条，不然我回去不好交待！”我说：“这好办，我和罗团长已是老相识了，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请你带回去给他。”他说：“那可太好了，我一定能替长官带到！”当时我已没有较好的信纸，只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下来，在上面写道：

罗团长：

您好！前信谅已收阅？今日又与贵部司务长×××先生相遇，故得以再次致函，实属幸事！

贵部司务长随身所带的私款5万元已如数归还本人，其余10万元公款，敝部暂为借用，等待革命胜利之后一定如数归还谢谢！

新四军大队长沈奠基

因为没有信封，写好后只是折叠了一下，便就交给他了。我们把这两位“客人”送走之后，又立即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休息，当晚又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里住宿。可是在第二天拂晓，我们刚吃完早饭正准备转移时，突然发现敌人从两个方向一声不响地向我们住地飞跑奔来，情况十分危险，但我们还是顺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无一人伤亡。而后他们却又紧追不舍地追了我们一个整天。后来听说：敌人的这次奔袭行动就是由罗团长亲自率领和指挥的。事后敌人又连续进行了几天的“清乡”、“搜剿”，但仍是一无所获。后来我想：这位团长大人当时更可能会仰天长啸和怨天不公了吧？

七、胜利迎春

5月4日下午，郑登武同志带的部队又同我们会合了。他非

常高兴地对我说：“原来住在长坪镇上的敌军一个团已于昨天全部调走了，现今在长坪住的只有南漳县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他又接着说，“在长坪镇的东头外边住着一个国民党的侦探。时常四处侦察我军的消息，我想把这个坏蛋抓起来问问情况。”我说：“那就太好了！”尔后我便更进一步地交待说，“你明天拂晓带几个人去把那个侦探抓起来，顺着河向东走，我在那里等你。”

第二天拂晓前，江团长和我就带部队绕道来到长坪东边的香耳山下，在树林里和小河边的一家民房里设下了埋伏。天亮后，看到郑登武等5个人押着那个敌探沿着河川走了过来。不久，又看到一个女子，发疯似的向乡公所跑去。随后又看到约一个排的敌军士兵在乡公所门前集合，尔后就飞快地沿着河边小道向我们走来。待他们完全走进我们的埋伏圈后，我们的机步枪一齐开火，很快就把一排敌人全部消灭了，共打死打伤十儿人，活捉了6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多支。我们在打扫完战场之后，便立即押着俘虏向对面的山上转移，来到一个叫马槽埡的地方。我们刚刚坐下休息，便又听到从南边山上传来了稀疏的机步枪声。随后又看到有大约二三百人，其中有军队，也有老百姓，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由远及近地向我们走来。这时有一个俘虏对我说：“大队长，这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呀！”后边他又接着说，“听我们的长官说，今天是保康、南漳两县保安大队的‘汇剿日’，这里正是两县的会合点。还听说保康的大队长也要来。”江团长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都感到特别高兴，心想：“这真是送上门的好买卖呀！”于是我们便在这里设下了埋伏，规定以哨音为号，哨音一响，机步枪一齐开火。之后，我便口含着哨子躲在树丛后面，静待敌人的到来。不久，敌人果然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便衣侦探，我们没有理他，把他们放过去了，在后面紧跟上来的，是一个头戴大檐军帽，敞胸露怀，手摇马鞭，摇头晃脑，鼻子里哼着小曲的军官。估计他可能就是那位大队长了。他

的后边是一匹高头大白马，再后就是喘着粗气的士兵。这时，我把哨子一吹，并马上站起身来高喊：“打！”机枪声、步枪声顿时连成一片，而那位大队长这时却仍在美梦里没有醒来，还以为向他们开枪的是自己人，所以他就高举双臂大喊：“自己人，不要误会！”可是他话音未落，就已倒在他自己的血泊里去了。其余的敌人也大都横尸山坡或举手投降了，走在最后的也都吓得魂不附体地钻到树林里四处逃跑了。这次战斗，我们又消灭敌人3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和步枪数十支。这天是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所以江团长就非常高兴地说：“这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取得的胜利呀！”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长坪西南一个叫张家冲的地方住下。在第二天早晨4点钟，部队大部分已吃完饭正要准备转移时，村外的哨兵向我报告说：“有一个老乡说是非见你不可，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我说：“可以让他进来。”我也随即外出迎接。这位老乡一进门便立即握我的手问道：“大队长，你还认得我吧？”我说：“似乎是见过面，但我记不清是在哪里了”他说：“我可认得你呀！你还给我们讲过话。我姓张，是龟坪的”。他又紧接着问我：“你说我是来干什么的呀？”我着他身穿长衫，腰结麻绳，怀里揣着一个大包米而饼子，背后又斜插一把砍刀，于是就说：“你不是去砍柴的吧？”他说：“不是，我是给‘国军’当探子来的。‘国军’一个连由乡长带着从后边来包抄你们了。乡队副也带60多人到了龟坪，离这里只有三里多路，他要我来看着你走了没有？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呀！”这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你快回去报告，就说我们昨晚是住在这里，天亮时已经走了。要问你向哪里走了，你就说是向东北方向走了”。我把他送走之后，便立即带着队伍向东北方向的山坡上爬了一段之后，便左转弯下山到西边山坡上隐蔽了下来，使敌人扑了一个空。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把明阳乡乡队副带的60多

人团团包围在龟坪村的一家四合院里了。

据当地群众揭发，这个乡队副姓张，他原来是个保长，因为反共有功被提升为乡队副。他曾在一天之内杀死过我军的6个伤病员，其中还有一位女同志，而且手段特别残忍，毒辣。他这次带的60多人中，只有6个持枪的乡保队员，其余都是被强逼着来为他助威的老百姓。我们把他们包围在一家老乡的楼房里。经我们开枪恐吓和喊话之后，被强迫来的40多位老乡都带着他们的大刀、长矛、鸟枪等出来举手投降了，6名带枪的队员除一名在门外放哨的早已被我们击毙之外，其余的也都很快缴枪投降了。最后那个罪恶累累的乡队副也不得不先把手枪掷出窗外之后徒手出来投降了。

这次战斗之后，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的另两个团，也都在5月10日前后全部离开这个地区，剩下的县保安队，乡保队等，也都纷纷逃回县城或躲到远处去了。从此之后，在这个方圆一百多里的地区内，已再没有敢于公开带枪同我们作对的敌人了。我们再也不需要起五更睡半夜地到树林子里去躲藏了。我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地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了。

由于这里地处武当山脉的高山地区，春天到来的时间比之长江沿岸来说是要稍晚一些，但现在已是5月的上旬了，杏花、桃花也早已随风飘落，满山遍野的野玫瑰、杜鹃花、珍珠梅、白刺梅等，也正在争艳怒放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正在道旁和远处山坡上劳动的群众，也在热情地向我问好或者是遥遥向我们挥手致意。以上这些都不禁地让我们由衷地高呼：胜利的春天终于还是到来了！

正在这时，我们又在5月15日，接到了张才千参谋长的来信。得知他带的部队已经从长江以南重返江北，而且已早到远安县的巡检司等我们前去会合，啊！这更是从天而降的莫大喜讯呀！

在我们归队之后，部队又进行了重新整编，江贤玉同志任一支队副支队长，我任参谋长。在经过几次作战之后，随部队一同于5月26日夜間，在庙滩东渡襄江，最后告别鄂西北地区。

从襄南坚持到创建荆当远根据地

李秉范

一

我襄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后，同样面临着反内战的严重局势。部队撤出襄南后，襄河地委决定成立中共襄南坚持工委，继续坚持斗争，随时准备应付事变。地委决定由我担任坚委书记兼襄南游击大队政委，付明发任大队长，和李韬、万洪纶、朱作云等，五人组成坚委。在大洪山地委那里开完会之后，我们带了两个班的武装和 20 多名地方工作干部，共 50 多人枪，连夜出发经天汉湖区到天门县的泊江地方，偷渡襄河，回到原天潜沔地区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天潜沔地区，已经部署了正规军两个团的兵力，分驻天门岳口与沔阳仙桃，另有三个县的保安中队和区乡土顽武装，他们得悉我们回来，便接连不断地向我原抗日根据地，联合发动“清剿”，清湖清乡，捕杀我党我军人员和家属，鱼肉乡里，征兵、征粮、征款，抢劫、拉夫，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恨之人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乱敌人

的“清剿”部署，我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基本群众的拥护以及统战关系支持的深厚社会基础、充分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神出鬼没、飘忽无常打游击的特长，加上创建地下工作和基层组织的经验，不断打击敌人，与强敌周旋。

我们建立两面政权，叫他们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我们办事，筹粮，筹款、收税纳粮，保护人民利益。天潜沔交界的刘河、范溉观、三伏潭、毛咀等集镇，以及沿襄河，通顺河这一狭长地带，都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有时我们也突然伸到岳口对岸和张截港等地，有时又回到熊口、老新口，决不死守一地，广泛宣传我党反内战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和各层人士密切交往。有一次敌人准备围剿我们，住在范溉观附近高屋台的沔阳县有名士绅杨芹香老先生，他是抗日时期我天潜沔县临参会参议员，民主人士，不顾天黑大雨、泥泞路滑，带着儿子手提灯笼（烧洋油的马灯），摸黑走了20多里，连夜赶到毛家场寻找我军送情报，告诉我们：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由沔阳县县长肖赞何率领两个县保安中队配合，现驻范溉观，天明后就要开始在这一带清乡、挨户搜查。我们得到这个紧急情报立即连夜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我们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敌人不断进行残酷“清剿”的恶劣环境下，硬是坚持了四个多月，不仅没有被敌消灭或赶出襄南，而且我们游击大队还由进襄南时的两个班，发展成一个连和一个10多名队员的手枪队，共150多人枪，还从张截港、毛咀缴获敌人4挺日式轻机枪装备了部队，使火力、战斗力都得到了加强。

1946年4月16日，我们接到中共天汉中心县委的紧急指示，要我们立即从襄南撤退到襄北天汉地区，接受新任务。我们到达天门县南地区不久，周围的敌人也先后赶来了，在襄河沿岸和汉宜公路遍设据点，构筑军事设施。一时间炮楼，碉堡林立，

敌人层层封锁包围压缩我军活动地域，并且每天派兵四处骚扰，组织清乡、“围剿”我军，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配合当地组织和部队，掩护群众跑反、逃难，保护人民利益，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断地同敌人战斗和周旋，继续坚持在县南。

两个月之后，整个中原形势发生巨变，天汉中心县委6月22日紧急通知，要我们迅速从县南撤出，准备突围。次日晨，我们在汉川县斗埠头与敌正规军一个团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我游击大队长付明发英勇牺牲，我们迅速撤出战斗，当晚赶到中心县委驻地杨叶陂，向吴云鹏、余学礼等领导汇报情况后，得知我中原突围的重大行动已经开始，我们就在吴云鹏同志的带领下，连夜出发北上大洪山地区，向突围的大部队靠拢集中。

二

1946年9月初，鄂西北区党委、军区成立，我任第四地委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王展任副书记兼行政委员会主任，许猛为指挥长，樊敏夫为副政委。中心县委下辖紫山、荆当、北山三个工委，约近50名负责干部，他们都是有着丰富地方工作和打游击经验的优秀同志，对开展工作经验极为有利；武装力量除原江汉军区警卫团的两个连外，还有一支近30人的手枪队和一支近50人配有武器的地方干部共约500余人枪。

荆当远地区，位于鄂西北地区的最南端，东临襄河，南近长江，是连接鄂西山区和江汉平原的纽带和通道。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贺龙领导的红二军曾在这里活动过，抗战时期这里又是我新四军第五师的游击区，有我党的影响和工作的基础，群众对我党我军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又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四地委和军分区，9月下旬在南漳县板桥召开会议，传达鄂西北区党委指示，要求在大敌未到之前，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横扫土顽，摧毁伪政权，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以便对付敌人的追堵和“清剿”。会后我们立即行动，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情报，以军事手段歼灭敌人，打开局面，随着铺摊子、建政权、深入发动群众，做好统战对象工作，争取旧乡保人员为我工作。从上到下广泛工作的结果，使我们的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得以安全地隐蔽于北山地区，不为敌人所发现。

正在我们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由于荆当工委总队长张炳辉轻敌麻痹，以致在敌人两个团的“清剿”中，工委及其武装遭受了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11月5日，我和王展向地委与军分区做了汇报，领导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亲自代中央起草的全面反内战《三个月总结》，给我们以很大鼓舞，又通报了当前的敌情，布置了三项任务：1. 军事上，要坚决打击最坏的土顽，在基本区彻底摧垮敌乡保政权组织。2. 经济上，抓紧解决冬衣，为此必须组织一次行动，“借大户”、过“游击税”，打敌汽车，筹款筹物。3. 加强群众工作，建立点线根据地，设立隐蔽的红色山头、村庄、独户窝子，安置好伤病员，使秘密联络站（点）之间畅通无阻。

接受任务后，我们分头传达并具体布置，中心县委以紫山乡根据地为重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畅通，以点带面外加巡回指导。发动工委和游击队在荆沙、汉宜公路上打敌汽车、在襄河边设卡过“游击税”，去甘溪、肖家堰、巡检司“借大户”搞布匹、棉花。很快我们就在荆沙公路上截击了一辆敌军车，缴获了一批经费和100多匹布料，每个人背一匹，剩下47匹分存在6个可靠的群众家里。我们三次派人到远安城里去买棉花，一次挑两担，来回路上用的是敌乡公所的路条。我们还组织了一次较大的行动，王克强、王展带一个连在襄沙、汉宜公路上，接连截获敌

两辆军车，又缴获了一批布匹。这样我们就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冬衣问题（包括四团和地委、分区机关人员）。消灭了穿短袖、短裤、单衣甚至披麻袋和被单的现象。

11月24日，我们在柏杨岭与许猛带的游击队会合。我们共同研究了加强“游击坚持”、建立“梅花式小型根据地”以及进一步加强北山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隐蔽斗争问题。从调查社会情况入手，积极建立了各级秘密联络网点，在通讯联络和搜集情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一个绝密点设在小峰岭下，一个土地庙的神龛底下，三五天或逢五逢十去取一次情报，由最可靠的手枪队员刘德勤负责。他是湖北石首人、共产党员，从江南挺进支队跟我撤退过来的。燕山坳设有总站，是位于四面悬崖绝壁下的一户人家，刘老头过去当过红军，60多岁了，老两口清贫度日。我们经常派人住他家。总之，我们各处的联络站点都选在地理条件特殊和独门独户的穷苦人家。

军分区派给我们当向导的芦英，是巡检司人，原是我豫鄂边区保安司令部洪山支队的一名分队长。他在我身边既当向导、又当情报员，是个“活地图”、“万事通”，在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政权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撤离鄂西北，他在当地隐蔽，坚持斗争，1947年底我们打回来，他又参加了黄德魁，许猛的部队。

三

1946年12月，鄂西北地区形势恶化。我分区周围是敌整编六十六师一八五旅和第十师之八十三旅，对我分区形成包围，防止我军重返襄东和襄南。敌人大搞什么“棋盘战术”，将我军活动区域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逼我们连续不断地转移或上山，欲将我们饿死、冻死、困死，使我们昼夜也跑不出他的“棋盘”格

子。敌人还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企图割断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接近我们的群众“格杀勿论”妄图使我们失去耳目，行动困难。敌人还利用乡保武装搜寻我伤病员和地方工作干部，我荆南宜工委书记廖学道同志遭敌杀害。

针对敌人的疯狂“清剿”，我分区主力四团和各工委游击武装，英勇地开展了反“清剿”斗争。一天，我们得到情报，敌一八五旅一个团要进山“清剿”，我们决定在珠宝沟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选择地形埋伏好，等敌人走进“口袋”时，我四团一个冲锋，中心县委武装配合，狠揍了敌人一顿，歼敌一个先头营，后续之敌被我打垮，俘敌营长以下15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10余挺，长短枪200余支以及一部分军用物资。敌人原以为只是游击队，直到战斗打响，才知道碰上了我主力部队，此后就再也不敢贸然地穷追我军了。

过了两天，敌人从荆门，当阳又调来一个团协同“清剿”，战斗打响后，王展随四团悄悄地向东转移，过漳河去了；王定烈团长命令三营教导员王芸生带该营跟着我往北走，上呼儿山，掩护四团主力安全转移，不料，我们被敌人死死咬住不放，从天亮打响，一直打了一整天。我们边打边走，快到泥龙堰时，又碰上远安县保安大队的两个中队（约200人枪）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往前往后都冲不出去，被围困在呼儿山的堰口上。三营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敌人四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伤亡100余人。我夏金山连长也负重伤，天色渐黑，枪声才渐渐稀疏下来。但我们仍然下不了山，后来发现了一个小庙，我们通过芦英这位本地人给庙里的老道人做工作，说明我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老道人才说出山背后有条陡峭的砍柴小路，可以从庙后门下去，并当即吩咐一小道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下山。当我们下到山下时，正碰上敌人在开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竟如神兵天降。我们突然一个猛打猛冲将敌歼灭，毙伤敌50多人，俘虏约30名，

并美餐了一顿。

吃完饭，王教导员问我：“政委，怎么走？”我说：“往北走，找军分区去！”我们撇开大路走小路，一整夜才走了六七十里，终于抵达板桥乡雷家坪地委，军分区驻地。打了一整天的仗，又走了一整夜，已是极度疲乏，现在找到了分区，我们不顾一切，倒头就睡在分区门前的一棵大白果树下。天一亮，刘子厚同志见我就问：“你们怎么来了？来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打了一天，走了一夜，逃难来了。”子厚同志连忙吩咐炊事员给我们煮苞谷糍吃。饭后，叫我们先好好休息。

1947年1月，鄂西北形势更加严峻。我兄弟分区领导同志牺牲的消息不断传来，如许明清、雷天明、张谦光、吴士芳、朱正传、吴云鹏等，使我们十分震惊和悲痛。我们中心县委积极做好应付严峻形势和迎接区党委和军区首长机关到来的准备。加紧搜集情报，收拢各股游击队。很快许猛、王克强、王展等所带部队分别从北山、荆南回到紫山坪一带，与我们会合，统一指挥，集中领导。樊敏夫在去襄南的途中与敌遭遇负伤，正在隐蔽养伤。

1月中下旬，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第三军分区副政委颜东山、王良，军区首长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等，先后带少数部队转移到我分区，与我四地委、军分区会合，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带七团也来到附近山上活动。

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老观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在鄂西北坚持斗争，主力分路转入外线，打大圈子；还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同志化装转移到华北、华东解放区。按照地委指示，由王展带一个排和手枪队，先护送刘子久、刘子厚、文敏生三人去北山，然后再转往华北解放区。刘子厚临走时对我说：“我们走了，以后由张才干同志领导你们，待中央批准后，王树声同志也要走。”又说：“张才干要

带军区主力到江南敌后打大圈子，这叫‘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你抄我的家，我抄你的家！’李人林来电说江南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我们到处打胜仗。”子厚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在鄂西北坚持斗争近半年，已经完成了中央部署的战略重任，牵制了大量敌人，支援了华北、华东和陕北解放区的斗争。现在我们不得不奉命走了，你们留下来坚持，要提高警惕，保存自己，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等待时机，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星期之后，王展又带部队护送王树声同志去北山，然后化装转移到华东解放区。

我因为原来在江南工作过，加之吴云鹏曾交给我一些江南地下党的关系，所以领导决定我跟随张才干同志去江南。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战斗近半年的荆当远！我永远怀念当年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 and 长眠子那里的战友！

智取郝穴 飞渡长江

——李人林支队渡江传奇

张育英

智取郝穴 神兵天降

1947年初，豫鄂边游击支队在襄东艰苦转战了118个日夜之后，为了更好地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决定打过长江去，转向湘鄂西，在江南开辟游击战争的新战场，配合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

正是腊月三十，雪大风急，路断人稀。乡亲们都在忙过年，我们却心急如焚，汗流浹背，艰难跋涉在茫茫雪地之中。傍晚时分，部队到达距长江约15公里的江陵县公义场，以高度的戒备和临战的姿态同乡亲们共度了一个难忘的除夕。

支队领导忙着筹划过江之事。经过一番研究，渡点选定在江陵县的郝穴镇。

郝穴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陆重镇，我军从未进占过，而且当地还驻有国民党的保安、水警部队，镇内有坚固的江防工事，易守难攻。鉴于这一情况，支队领导决定智取。

大年初一拂晓，漫天下着鹅毛大雪，四处爆竹声声。一队全

副武装的“国军”，带着一些破衣烂衫的“壮丁”，急速向郝穴奔来。

来到郝穴街东大堤边，领头的“国军”军官示意让“壮丁”们停下，自己则带着几个人，大摇大摆地向堤边的碉堡走去。

“哗啦”碉堡内的河防队员拉着枪栓走出来，“什么人？”

“国军”军官不慌不忙地上前回答：“我们是六十六师补充团的，是奉命来郝穴驻防和送壮丁的。”

河防队员们一看黄呢军服大盖帽、威风凛凛的“国军”军官，哪敢有半点猜疑，慌不迭地立正敬礼：“欢迎国军驻防！”

“国军”军官见状，朝后面的队伍挥了挥手，只见数十名“国军”一齐上前，二话不说地缴了河防队员的械。

稍稍聪明一点的河防队员，这才明白，“国军”和“壮丁”，原来都是“四老板”（新四军）扮的。

我们就这样，智取了郝穴，歼敌 200 余人，控制了长江渡口。

将近中午，部队发动群众，陆续弄来一些大小船只准备登船过江。恰在这时，一艘轮船停靠在码头上，从船上下来一位真国军军官，带着太太和两名卫兵，趾高气扬地向我们“补充团”下达命令，要我们上船给他搬东西。李人林同志一面满口答应，一面向我作了示意。敌军军官刚一转身，我和几名战士便迅速冲上去，敌军军官及他的太太和卫兵做梦也没想到，大年初一成了共军的俘虏。

接着，部队在李人林、钟春林等同志的带领下开始渡江。一只只木船，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下颠簸，艰难前进。

当船队驶入江心时，忽然从下游又飞快地驶来两艘巡逻小炮艇，敌军荷枪实弹，大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干什么去？”

李人林同志镇定地回答：“我们是六十六师补充团的，送壮

丁去!”

敌人根本就没想到大年初一会有这么一支天降的神兵，毫不怀疑地飞速驶过，我们又一次化险为夷，胜利地抵达江南，进入广袤千里的武陵山。蒋介石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江防天险，竟被我们巧施一计，便如此这般地被突破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江南转战与“相机北返”

1947年2月24日，中原突围后，原八路军新四军的两支劲旅，在长江以南的五峰县红渔坪，这个敌人的大后方胜利会师。横渡天堑又胜利会师，我军的这一伟大壮举，惊动了国民党上峰。湖南当局惊呼：“共军人湘已成我心腹之患。”先令驻岳阳、常德之线敌整编五十二师三十三旅立即整装进剿，再调川黔驻军协同围堵，以防入川。

两军敌后会师，通过电台报告中原局并中央，很快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祝贺，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番号。张才千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两支部队改称一、四支队。

回顾我鄂豫边游击支队，在李人林、钟春林带领下，1947年1月22日、即农历大年初一奔袭郝穴、智渡长江、改番号为“江南游击支队”以来，在湘鄂川黔边之武陵山、湘资沅澧四水源头活动、转战，到5月2日渡江北返，恰好100天，作战数十次、歼敌约千人、行程四千里，历经22个县市，缴获甚多，装备更新。

支队领导通过电台向中原局报告了从豫鄂边区到江南半年来斗争的情况和战果，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

术原则，总结出的七条经验。后来得知中原局转报中央后，周恩来副主席曾批转发给华东敌后负责人。

我支队与张部会师，实力大增，群情振奋，斗志更加旺盛，胜利信心更加坚强。两支部队如鱼得水，长驱直入，横扫土顽，摧毁伪政权，破坏国民党打内战的征兵、征粮、征款的“三征”工作，贴布告，撒传单，写标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扩大影响，如同一把利剑刺入敌人心脏，大闹敌后方，以吸引敌人，配合兄弟战场。

4月上中旬，两支部队又协同作战，干净利落打了两个大胜仗。先于大堰垱歼敌三十三旅一个营，击毙敌营长；后于磨岗隘歼敌两个湘保大队上千人，活捉大队长。两次大捷，打出了我军军威，震慑了敌人。

我军忽东忽西、时合时分、行踪无常，敌人摸不清我军意图，于是，调兵遣将，组织“围剿”。据侦察获悉，敌整编五十六师一六三、一六四旅和新十七旅，已出川黔前来堵截，防我入川，整六十六师一九八、一九九旅由江北跟追过来，加上五十二师三十三旅的西进和湘鄂两省一大批保警部队的协同配合，本来极少正规军的敌人大后方，骤然间敌情严重，形势紧张起来。

与此同时，鄂西北地区自从老观窝紧急会议后，主力部队已分路转入外线作战，敌人随之外调，目前比较空虚，而留下继续坚持的小股游击队和零散隐蔽人员，又亟待予以收拢集中。

经报告中央提出北返建议后，得到中央军委“相机北返”电示，纵队领导研究决定，5月2日即由（松滋县）刘家场出发，奔袭长江南岸之洋溪镇，即枝江县政府所在地。由四支队负责歼灭守敌，占领有利地形，控制渡口，并担任后卫警戒，防堵敌人追击；一支队负责搜集渡江船只，并先行渡江，控制北岸，举火为号，接应后续渡江部队。

经过急行军100里，四支队突袭了枝江县政府及两个保安中

队，除少数溃逃外，大部被我歼灭。此时，一支队发现敌人将船收拢，控制在江北岸，我军无船可渡，正在情急之中，我手枪队员截获自上游来的一个小舢舨，经过说服动员，一同迅速划向江北岸，立即奔赴上下游搜寻船只，发现护船之敌将其打跑，终于陆续搞到大小船只五六十条船，解决了大问题，遂动员船工、渔民扬帆江南，接应我军。

我随李人林，钟春林二位首长第一批乘船过江，察看地形，布置警戒，选定部队集结地点，准备三堆火为信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就见一批批船只来往迎送部队过江。等到全纵队指战员全部渡江完毕，东方已显出鱼肚白，天已拂晓，黑漆的夜晚即将过去，天上只剩下星星点点在向我们眨眼。

我一支队遂向下游移驻董市，并作短暂休整。尔后，全纵队按既定计划，向目的地鄂西北地区挺进，不日即与罗厚福，吴昌炽等部队和人员会合。

我查到枝江县敌伪档案，记载我军渡江北返的经过，现节录两段，以供佐证。

《湖北省枝江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肖县长施政报告》

“堵剿李人林股匪，自李人林，王定烈两股奸匪先后南渡长江，流窜湘鄂边境，本县警力薄弱，迭电层峰派队固守江防。本年5月2日，李、王两股人枪两千余（按：实为1600余），由刘家场经观音桥进窜楼子岩，与本县保警第二中队激战，因众寡悬殊，阵地被匪突破，直驱洋溪，围攻县政府，经本人亲率保警第三中队坚守县府碉堡，与匪苦战（按：实为一触即溃），终无法截堵。”

又云：“对沿江船只经伤封锁，不准停靠南岸，洋溪无船可渡，不料江岸绵长，无法控制，该匪截获上游下驶木船一只，载十余人赴宜都县境搜集船只……终于石鼓与石灰窑抢渡北岸。3

日晨由顾家店窜扰董市，次日经仙女庙，周家场向当阳（县）窜去。”

从敌人的档案中也清楚地看到我军渡江北返的事实与壮举，它为我军的艰苦转战，奔袭歼敌，顺利渡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40年后的1987年2月24日，五峰县委、县政府在红渔坪召开“江南游击纵队”诞生40周年纪念大会暨纪念碑落成典礼。湖北军区政委周焕中代表张才千同志，李秉范和我代表李人林同志参加了纪念活动。

红渔坪，一座高山上的小平地，是早年间贺龙老帅拉起队伍闹革命的地方。如今在两军会师的地方又竖起一座纪念碑。碑上除镌刻着纵队首长张、李撰写的碑文和挽词外，还刻了王定烈团长一首七言诗。碑的另一面则是“渔家河乡红渔坪村”敬献的诗，曰：“四十年前旌旗奋，江南红渔聚忠魂，今日回首建丰碑，承先启后振乾坤。”以此寄托当地人民群众永远的纪念。

纪念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周焕中在大会讲话中着重讲到我军在江南的转战和江南人民的支援，以及全国时局的发展。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激情所至还凑了几句打油诗：“转战千里到五峰，两军会师红渔坪，军民欢腾庆胜利，土家迎来子弟兵”；“四十年后今相逢，昔日旧貌变新容，土汉人民展宏图，协力建设新五峰。”大会后还举行了座谈、参观、军民情谊，令人难忘。

少女随军突围记

范兆林

告别读书会 投奔新四军

1945年初夏，我还是一个17岁的少女，就瞒着父母和师友，穿过蒋军和日寇的封锁线，从四川跑到湖北投奔了新四军。

我在成都蜀华中学上高中时，由于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腐朽的社会现象，心中积聚着强烈的不满，急切地寻找光明之路。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引导青年学生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参加“读书会”后，通过阅读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籍和文章参加争民主、求解放等话题的讨论，使我如在深夜的荒野看到了指路明灯，眼界大开，心情振奋，过去心中的郁闷一一解开，向往光明的希望日增，就在这个时候，读书会传来新华社发出的号召：知识青年到中原去，打鬼子，除汉奸，协助工农大众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抗日救国奉献青春。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起我热血沸腾，我朝思暮想，盼望脱离万恶的旧社会，奔向光明的理想圣地——解放区。机会终于来到，我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

到解放区去，读书会共有7位同志到中原解放区，我们穿过重重的封锁线，到达新四军驻地——湖北大悟山地区。从此，我就成了新四军五师的女战士。

新天地 新生活

到了解放区，换了新天地，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大家为着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充满了乐观、愉快。我们从蒋管区来的500人，有大、中学生、记者、教师和作家等等，我们的工作很平凡，很具体，如向群众宣传打日本、求解放的道理，在行军间隙教战士识字、唱歌、读报、讲时事等，事情虽小，但觉得很有意义，件件都要认真做好。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图谋抢占、消灭中原解放区，便不断进攻新四军驻地，我们不得不开始行军转移，与敌周旋。我被分配到由轻伤员组成的荣誉团，做文化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1945年10月，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部队随即就地停战，回到了宣化店驻扎下来。

由于战事平定下来，我就被分配到民教馆工作，我一个人既是馆员又是馆长，在地方领导帮助下，找了一间空铺面，我从各处找了几张旧桌子，一些长木板和砖头，搭成板凳，又收集一些解放区出版的报纸杂志摆放起来，挂上“宣化店民众教育馆”的牌子。如此简陋的民教馆，却也吸引了一些老乡常来看书、读报，我则和他们聊天，做些宣传工作。

有一天上街办事，突然看见我中学的同班好友，曾一起参加读书会的王培德，分别之后，总是在日夜思念之中。现在竟然奇迹般地巧遇，两人同时发出惊问：“你到哪里去了？”随即紧紧相

拥，兴奋异常，由于喜出望外，以至喜极而泣，哭了起来。

随后，又碰到从国统区来的大姐黄琪，陆芳等，她们对我们像亲姐妹一样关怀，鼓励我们努力上进，战胜困难。

民主建国大学成立后，王培德和我都被调到民大学习，从国统区来的 500 多知识青年大都去了，经领导按各人学历编班组，我和王培德编在预科，我们再次成了同学。

民主建国大学的建立，是为了培养和平建设人才。由于抗战八年国力损耗殆尽，人民盼望和平，重建国家，百废待举。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青年，都想学些有用的知识，为新中国建设尽份力量。民大初建条件十分简陋，吃的是变质的面粉和自采的野菜，睡的是稻草铺，头枕砖头。尽管条件很差，大家却像冲出牢笼的飞鸟，满怀对新生活的希望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愉快地学习各种知识，朝气蓬勃地唱抗日歌曲，扭秧歌，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大家都知道，是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才使我们走在一起，都感到无比的快乐幸福。

有一天，我和班主任李力同志聊天时，他问我：“小范，你叫范兆麟，你知道有一个李兆麟吗？”我说：“李兆麟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领袖，在严酷的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最后壮烈牺牲的大英雄，我很佩服，敬仰他。”李力同志又说：“你愿意学习革命英雄，加入组织做一个共产党员吗？”我听后当即急切地说：“我时刻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坚定不移跟党走。”边说边流下热泪，并即速写了入党申请书。

风云急变 随军突围

1946 年春回大地，有一天我们小组政治讨论时，忽听李力

同志叫我，他神情严肃地说：“蒋匪帮已撕毁停战协定，调集 30 万大军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党中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命令我们突围到别的解放区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老弱和女同志可以化装分散通过敌占区到解放区。你是否愿意化装突围？”我当即表示：“我缺乏战争锻炼，不愿意再到蒋管区去周折，希望随部队突围。他说：“那也好，党组织通过了你的人党申请，我会把你的材料转到部队去。”在我思想里，蒋管区黑暗统治，特务如麻，很难有我安身之地。我既然到了解放区，就不会再离开。

1946 年 5 月初，我和王培德等民大一部分同学被分配到一纵队文工团，在那里学发声，识简谱，排练秧歌剧，并为部队演出“周子山”等剧目。部队于 6 月底开始突围。突围部队数万人，分多路出发，首尾看不到尽头，吃饭住宿都很困难。

第一道关口是过平汉铁路，临近铁路时，为免遭敌机轰炸，我们只好夜行军。当晚下雨，一片漆黑，道路两边是水田，人马众多，几路纵队在泥泞中行进，已分不清是田是路。我紧紧跟着前面的男同志急行，几次滑倒在水田里，急忙爬起来追赶。突然炮声四起，前部与敌交火，我的衣服里里外外都被汗水、雨水、泥浆浸透了。天亮了，我们终于穿过了铁路。听同志们说，由于人多、路滑，一夜只走了几里路，而我还以为已经走了几十里。

过了平汉路，我们文工团指导员发给女同志每人两块银元和一块撕下的幕布，以做路费和换群众的便衣便于化装突围，但我还是不想离队，即使牺牲也要随部队走，尽管有的人化装走了，我仍然留在部队。

渡河被阻 绝处逢生

第二道难关是过襄河。在敌人追击中，我们躲进襄河岸边的

芦苇荡里，要在就近村里做饭、休息，但因国民党反共宣传，老百姓都跑光了，屋子里既无锅灶，也无米面。我们小组找到一些小麦，煮了一阵，就吞嚼着吃了，稍事休息，就准备渡河。由于河水又深又宽，敌人把船封锁了，战士们急忙扎木排。黄昏，指导员传令：今晚必须过河，船少人多，必须严守铁的纪律，按顺序过河。大家手挽着手，谁都不得插队抢先，违者就开枪。

天黑下来，我们列队在河岸上，沉默紧张，空气凝重，我紧紧地挽着两边同志的手臂，心情激荡着欲闯生死大关，一面急盼着先行的同志尽快渡河，一面又希望黑夜慢些过去，让我们天亮以前都能过去。但是这一夜好似短短的一瞬，很快东方天空就发白了。太阳升起时，我正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看着满载着大部分文工团的同志们的船只远去时，不由自主地喊道：“你们快点过来接我们呀！”……话音未落，轰隆隆的敌机已飞速而至，向着岸上低空扫射。明晃晃的子弹在我们头上乱飞，我们急速跑到芦苇丛中。我一边跑一边看到几匹战马，在岸上奔腾嘶鸣，战马仍在，骑士已身亡，我在芦苇中急跑着找伙伴，直到中午，敌机和追兵都去追击过了河的大部队去了，我们未能过河的人员，重新集合起来，继续往北方前进。我看见队伍首尾不过一两千人，心中顿感已与主力大队脱离，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

原来在敌机阻截我们之后，闵学圣旅长看着还有这么多人未能过河，当即派警卫员抢过河去，追回一部电台，才使我们这支队伍能够与上级保持联系。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并不孤立，党中央关怀着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军民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过不了河就不过河了，可以另辟新路，保存有生力量，拖住一部分敌人，为解放战争的全局做出贡献。我听后大为振奋，思想上又坚定明亮起来。

伏牛山中度艰辛

我们这支被敌人阻断前路处于困境的部队，避开了敌人的锋芒，转战在伏牛山，秦岭一带，这里山高谷深，急流险滩，正适合和敌人兜圈子，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连续行军几天几夜，赶到一地准备休息时，突然侦察员回来说，前面村寨已被敌人占领，于是，我们又掉头后转。因我们已离开了根据地，缺弹药补充，不能与敌人正面打消耗战。我们偶尔有幸找到个村子，匆匆吃过饭，找块木板或铺点草在地上睡。头枕背包，和着衣服和草鞋，刚刚睡着一会，忽听外面有动静，立刻爬起来背着背包就往外跑。敌人已在山头把我们包围，前哨战士冲开一个山头掩护着我们，我们跟着往上冲，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左右前后爆炸，我们左冲右突，跑着跑着背包丢了，有时连一双鞋也拿不动丢了，又被后面同志拾起来交给我，“这是行军重要工具丢不得！”一声忠告使我铭刻在心。

这样日夜行军，饿了随时找到什么能吃就吃，一个窝头是最好的食物，有时找到点豆类，用个瓦罐架在砖头上，折些树枝烧起来，未等煮熟罐子爆破了，只能找个瓜皮当碗，树枝做筷吃起来，由于缺油少盐，有人得了夜盲症，不得不由别人扯着棍子走。有时碰巧找到盐，就蘸在萝卜叶上吃起来，美味无比。

奔走于生死之间

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最怕生病，大家拄着棍子日夜行军，异常疲累、再无力气担抬别人。我们文工团的丁浩川同志，患了

痢疾，边走边拉肚子，瘦得皮包骨头，又无药物，最后他就掉队了，另有位姓徐的同志，高度近视，在行军中把眼镜丢了，无处去买，无法行军，只好到老乡家做长工隐蔽下来。若被当地国民党保甲长发现，后果难料。幸好后来南下部队从此地经过时，他被解救出来。另有文工团的赵明珍同志，是参军较早的老同志，她很活跃也很能干，我很佩服她，一天中午，我们准备找粮食做中饭，她和两个男同志去找粮，我们等了很久，一直不见他们回来，后来在路上听老乡说：“有几个新四军被国民党绑走了。”

一天黄昏走在山坡上，迎面碰见我们读书会的战友贺天镛，在白区我们叫他七哥，见他消瘦异常，胡须满面，拄着棍子艰难地走不动路，我当即把文工团发给我的两块银元给了他，帮他补充点营养。

由于日夜行军，过度疲倦，男同志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有时正走着就忽然站着不动了，我看见前面的同志不动就知道他又睡着了，就赶紧推他一下；如果不赶快推，我就得跑好多步才能跟上前边队伍。我怕掉队，从不会走路打瞌睡，因为跟上队伍和掉队实为生死之界，再困再累也不敢松懈，但只要停住小憩时，哪怕只有几分钟，不管地上是泥是水是尖石，我都会立刻躺下睡去。出发时大家会互相叫醒再走。有一次经过河滩乱石地，我的脚抬不高，一走一摔，两个膝盖碰得全是血。（至今两膝长满疤痕，我在夏天总不愿穿短裙、裤）所幸的是，尽管流血流汗，吃苦受累，总算没有落入掉队的死亡线上。

相互鼓励 苦中寻乐

突围过程中的艰难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在我们同志当中，却听不到悲观和叫苦的声音，反而大家满怀乐观和自豪的

心情，充满必胜的信念，互相鼓励、苦中寻乐。

由于日夜行军，居无定所，无衣可换，无水可洗，汗湿雨淋，大家身上长满了白虱子，头上是黑虱子，同志们笑谈，这是革命虫，“虫多兵马众，增加革命性”。有一武汉大学戴眼镜的同志，一边捉虱子一边吟诗：“虱子、虱子，你是我忠实的情人，我多么厌恶你呀，你还是紧靠我身。”引得大家发出欢快的笑声。

过秦岭时，上、下六七十里，山上冰雪常年不化，我从早上抓着树枝往上爬，往下走时天黑了，在月光下，路途模糊不清，我用背包垫着往下滑行，到山下天才亮。一些经历过长征的师级首长，骑的马都摔死了，和我们大家一样背着背包走，他们说这次突围，比长征还苦，长征时敌人追不上，他们怕吃苦，并未经常跟着追，而我们现在却是时时有敌人追击，连民团、保安团都敢袭击我们。在如此艰险的关头，能坚持战斗不息，是值得自豪的。

我们白天爬大山，爬了一座又一座，似无尽头，白云在我们脚下半山中缭绕。大家边走边说：“将来把老蒋俘虏了，让他也来尝尝爬大山的滋味。”大家苦中寻乐，有的说：“全国解放了，我要睡它三天三夜，享受个够。”说说笑笑，互相鼓励，有点吃的，大家分着吃，有好铺位让着住，谁走不动了，大家用棍子拖着走。有时碰到邻近队伍相熟的同志，总要跑过来握着手说：“小范，要坚持啊。”说完就跑走赶他们的队伍去了。短短的话语，字字千金，充满真挚的友爱和革命情谊；中原行署主席许子威同志看到我累得快走不动了，他对我说：“小范，革命就要胜利了，将来你想用钱买也买不到这样的斗争生活了。”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振奋了精神，总算坚持下来了。

转战豫鄂陕，从炎夏到寒冬，在寒风之夜行军在黄河边上，单衣难以御寒，战士们打开一个敌人守卫寨子的碉堡，我们似飞一般急行军几十里跑到碉堡里，每人穿一件棉衣，五颜六色，在

外面再套上原来的破军衣，再飞也似的离开。行军时每人拄一根棍子，战士们除了拄一根棍子外还多背一支枪和子弹带。我那时想我们真像夏伯阳的英雄部队，虽穿着破军装，但理想崇高，斗志昂扬。这使我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

严寒中迎来春意

11月，我们终于在河南芦氏的大山中，打开了一个镇子，就地休息了半个月，部队党组织召开了党员大会，干部战士聚集在一个大屋子里，我的人党介绍人黄作舟，顾文华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最后评论说：“范兆林同志从来到中原军区和参加突围以来，一直表现很好，已经具备党员条件，我们愿意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了我的人党申请。这使我有了新的政治生命。

1947年春，我们队伍经过几番奔突，辗转周折，长途急行军，终于在华北太岳军区的接应下，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冲破敌人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渡过了天险黄河，回到华北解放区——晋城，群众把我们当成英雄的儿女归来，夹道欢迎。老乡们把花生、核桃、红枣往衣兜里装，水碗送到手上，老区干部战士们欢迎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同志们相互拥抱、热泪滚滚，恰似久离家的赤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以后几天，我们又参加多次欢迎归来的慰问演出及聚餐，感到无比幸福。身上积累的困顿很快就消除了。

在晋城停留几天后，组织上就派人送我到晋冀鲁豫北方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已从邢台转移到山西长治，我到了文教学院，又与王培德等几位从各路突围回来的中原军区女战友相逢。大家历经艰险，走过千山万水，终于回到华北解放区的和平环境中来学

习，这怎能不使我们禁不住兴奋地相拥、喜极而泣啊！

一年拼搏 终生教益

在我青春年少时，满怀追求光明的理想，投奔中原新四军五师的战斗队伍，经历了惊心动魄，千难万险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却铸造了我终生受益的革命意志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性格。艰辛的战斗生活不仅锻炼了筋骨，也确定了我的人生方向。突围的胜利，昭示着真理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由于党的领导英明，人民事业的正义性，为此而奋斗的干部、战士才能不怕千难万险，万众一心，终于战胜大于我们数倍、数十倍的强敌，粉碎了多次围追、堵截，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几十万敌军，为赢得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突围至今，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女，变成了古稀老人，但我昔日的情怀仍在，奋斗的朝气不减，我离休后积极地锻炼身体，无论春夏秋冬，不怕严寒酷暑，天天5时多起床，去公园健身锻炼。体健精神好，生活得幸福愉快。

当前正逢太平盛世，振兴中华的大业蓬勃发展，我所以能保持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进取精神，皆因我是一名参加了中原突围的新四军五师战士，在革命的战火中学会了怎样做一个永不掉队的革命战士。

想念菠萝崖的亲人们

李 炬

我是中原军区一纵三旅卫生处组织干事，丈夫胡鹏飞是三旅参谋长。中原突围时，我们的儿子中原已七个月了。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孩子突围，困难实在太多了。夏末，我们打到鄂西北地区时，四川国民党数万军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中央指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部队就地战斗与敌人周旋。鄂西北本来就山大人少，生活贫困，有这样多的部队转战，吃的成了问题。搞不到粮食，连地里的南瓜、土豆、萝卜等，凡能吃的都买下来充饥。部队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顿也吃不上。大人可以忍耐，孩子饿了就哭、就闹，我就千方百计地找吃的，并把仅有的一点吃的留下来，以备他哭闹时喂他。有时，同志们把自己的土豆、萝卜塞给他吃。在当时的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吃上一口就能走几十里地，每当他们把东西塞给小中原吃，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

八九月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深山老林里已经很冷了，我们穿的还是六月突围时的单衣，搞不到衣服，搞不到鞋子。冷、饿、潮湿，很多人病了还长了疥疮。我和小中原也不例外。他不像在突围时背在背上就能昏昏入睡。他要活动，要玩耍，时常兴

奋，特别是晚上在敌人附近穿插时，他会偶尔哭叫，我心中实感不安。

经过与敌人几天的战斗周旋，我们进驻均县菠萝崖村。旅部住在一个朝南的院子里，房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她的丈夫已去世，小女儿名叫英如，儿子业华正读初中，大女儿冰如二十多岁，师范学生，文质彬彬，家里的一切由她张罗着。她的叔父母及老奶奶也热情地为我们忙碌着，旅政治部胥治中主任对鹏飞和我谈：这地方原有地下党活动，这家有个儿子就在新四军工作，你们考虑是否把小中原放在他家一个时期。部队目前的情况你们了解，今后形势会比现在更残酷，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关系不容易呀！我和鹏飞，决定先和冰如谈谈。我们谈得很投机，很高兴。突然枪声大作，鹏飞同志习惯地拿起手枪一步跳到院子里，稍停片刻喊道：“李炬，敌人从后面追来了！部队在阻击，你就把孩子交给冰如，快去追赶部队。”说着他去指挥部队了。我舍不得放下孩子，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卫员郭海德着急地说：“干事！把中原交给大姐，部队已经走远了，快走！”我含着泪把中原递给冰如说：“你就把这孩子当成你大哥的孩子看待吧！我们一走，敌人马上会来，他一时搞不清你家有多少人，可以混过去。万一走漏风声，你们就说捡了一个男孩，长大可以放牛。”她！这个文静的姑娘，一下搂抱住孩子说：“快走！放心好了！”我看了看孩子的小脸，热泪夺眶而出。孩子就这样在枪炮声中寄放在武当山下的菠萝崖村中。

蒋介石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对我们进行疯狂的“围剿”。敌人采用棋盘战术分进合击，分块吃掉的打法想置我们于死地，特别是甘家垭子突围一战，把我们惟一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我们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处境更困难。领导决定：女同志、轻伤病号就地隐蔽，寻机化装回华北、陕北根据地去。汪乃贵司令给我下达了命令。我向司令员报告说我身体好，在部队

困难时我不应离开部队。我愿和同志们及我的丈夫鹏飞同志战斗到底。汪司令严厉地指出这是组织决定已与鹏飞同志谈好了。现在就由鹏飞送您到寄放孩子的菠萝崖村，天亮前鹏飞赶回部队。

夜间行进在深山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进。鹏飞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李炬，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需要我们合时，我们合，需要我们分时我们就分。合、分应是革命军人正常的事。目前，残酷的形势，组织上采取这种措施也是对我们的关心。你到张家一切小心、细心，提高警惕保存自己，照顾好中原，我相信你能胜利完成党交给你隐蔽和秘密转移的任务。”我好久没说话，最后表态式地说：“我本心愿与部队和你共存亡。既然组织下了命令，我坚决服从，保证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动摇，更不会……”“好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我相信你。”在冰如家我们简单地向她说明来意，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鹏飞又看了看孩子就匆匆到后山张子重先生家进行些工作赶回部队去了。

在冰如家第一天比较平静，第二天傍晚狗叫得厉害，我和冰如到外面察看，原来是三个保丁路过此地。第三天傍晚狗又叫起来，我感到不妙应避一避。冰如同意我的想法带我到三四里地的山上一贫户家过了一夜。第四天我们没等狗叫就主动到对面山上龚二爷家躲避。龚二爷见到我们劈头就说：“昨天夜里保丁在阴坡抓走两个女新四军！”我忙问：“阴坡离这儿有多远？”龚说：“七八里！要当心啊！看来这里风声很紧了！”我们躲躲藏藏又过了两三天。突然有人喊道：“大帽子来了！快跑啊！”我抬头一看，敌人正沿小山下山，有的已到大门口，我一个箭步冲到厨房，从后门向山上飞奔。冰如迎上前去同敌人搭腔，为我争取时间。

出了后门我沿小道拼命跑。叭！叭！两枪。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我意识到不能直线跑，必须以“之”字形跑避开敌人子

弹。拐过山嘴，左边有一洼地，我纵身扑过去，紧紧地趴在草丛中，七个全副武装的敌人，顺小道追赶而去。这里离路边太近，我迅速转移。到一个石岩处，岩上野草枯藤从上面垂下来，形成一个天然门帘。我刚钻进去，崖下传来脚步声，说话声。我屏住呼吸，生怕有半点声响。“她妈的！眼看她在前而跑，硬是没打中她？一个女人，能跑到哪里去呢？”敌兵扫兴地说“搜！”又一个兵喊着。“搜个屁！还没喂脑壳哩！”听得出这是些四川兵。

敌人远去了！这时我才发现这石崖正在小道的上面，上下相距也只有十多米！好险呀！天黑了，山林一片寂静。我想回去看看情况。刚拐过山嘴，远远望见冰如家后门有堆木柴在熊熊燃烧。两个敌人背着枪来回走动。再抬头四周看看，山垭子处也有火光。糟了！敌人把这一带封锁了！我立刻感到情况严重。突然两声凄厉的号叫，使人毛骨悚然。狼！是狼叫！我伸手摸着块石头，想做自己的工具。敌人没抓到我，决不能让狼吃掉啊！可能是狼没发现我，只是本能地号叫两声就走了！天，愈来愈黑。冬夜太长了，我浑身发冷，瑟瑟发抖，赶紧用力搓手搓脚，暖和下身子。天刚蒙蒙亮，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不好，敌人来搜山了，我弯腰向山深处转移，被一高崖堵住去路，前进不能，后退不可！我只好向左边纵身跳下有几丈深的崖底。移动下身子还好，没摔伤转身发现一扁扁石洞，想钻进去，洞口太扁，急中生智，趴下，先进腿，后进身子，手把着洞口顺边跳下去，紧靠洞边坐了下来，喘息未定，突然有人喊：“这里有块手帕！”糟了！手帕肯定是我跳崖时丢的！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脚步声愈来愈近，敌人如获至宝喊道：“这里有个洞。”我屏住呼吸朝上看着，敌人用头猛往里钻，钻不进，垂头丧气地说：“是个野猫洞”。说完扫兴地走了！很久很久，洞外没有什么动静，我把住洞口向外看。天已是下午，啊！对面山上一群持枪的兵还在搜索！看来敌人是不抓住我不甘心。

我在洞中一天，口里没有唾液，嗓子干得无法形容，就是敌人抓不到我，渴也要渴死，饿也要饿死的。这里不能呆下去，必须突围。决心一下，把洞中石块捡到一起，垒高后拼命钻出洞口，往哪里去呢？我寻找北斗星的位置。右边是冰如家的方向，决不能去，向左边走！跳出敌人包围，时间就是生命。山上没有路，深一脚，浅一脚，有时抓住树枝杂草往沟底溜。到沟底有小小流水，我美美地喝了一肚子，仍顺溪前进，总算走到小溪折流的沟口。前面一条白晃晃的小道。向左，一定要向左，我急促地向左走着走着。一片小竹林！啊！两个月前部队路过此地！是张冰如九爹家。我扣开门，九爹见我，又惊又喜，连忙问我如何逃出来的。还说：今天乡公所还来人告知，如知情不报者罚，抓住还有赏呢！我简单述说敌人如何在山上搜捕我和我如何甩掉敌人来到这里的经过时，一个中年妇女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酒，里面还有三个荷包鸡蛋。九爹告诉我这就是九妈。我一阵心酸，热泪夺眶而出。多好的人哪！九爹十分惊讶地说：“奇迹！真是奇迹！九死一生啊！”我怕连累他们，商定明天拂晓九爹送我到山上隐蔽，再请他设法给冰如送个信，请她无论如何来见面谈谈情况。她们为我担心着急啊！

在山上，我找了个较隐蔽的地方躺下来，身上暖暖的，想我们的部队现在哪里！鹏飞怎样了！又想到我留在太行山的女儿……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几天来太疲劳了。冰如怎么还没来？天黑了，想回九爹家看看。刚下山坡，听到冰如和九爹说话的声音，我迫不及待地冲了下去，握住她的手说：“你来了！我担心你出事了！”“我不要紧，倒是你的情况很严重，敌人是专抓你面来，营部就住在我家。找不到你，把我母亲和中原都看管起来了！扬言你不回来，把小中原带走，说你是女共产党员，新四军司令的太太。还看不到敌人有走的意思。”听了她的话，我心如刀割一般，别无选择只有赶快离开此地，减少她们的灾难。

九爹几乎和冰如同时说出：走！三十六计走为上。你先到老河口，张业新大哥开的巨新货栈，找他为您想办法化装到解放区去。也只有这样了，我提出把中原一齐带走。冰如说，看来不行。中原已作为人质被监视起来，连房门都不能出，不准任何人接近。就等你上钩！你怎么能把他带走？！时间不允许你再等下去。说完，脱下她的旗袍给我穿上，她穿我的衣服，外面仍罩上她的罩褂催我快上路！“由吕大哥趁夜送你到石花街后，你去老河口找业新大哥！”难道我眼巴巴地看着孩子落入敌人手中了！忍心地走吗？！不，不行！我抓住冰如的手说：“大姐！人往远处看，水往低处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打回来，孩子由你家扶养，我放心。为防万一，你把他左脚小指给剪掉！就是敌人弄走，以后我们寻找也有个标记！”九爹催促快走，送我的吕大哥也在旁催着。“冰如，我走了！部队转回来，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会当俘虏的！”

“放心走吧！小中原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的。”在茫茫黑夜里吕大哥在前我在后上路了。

在老河口，巨新货栈门前我走了两趟，见无任何差异就去买火柴。售货人抬头一看是我，惊奇地说：“你怎么来了！”他正是两月前在冰如家见到的业新大哥！三言两语我向他说明情况。他以冰如同学的名义送我到他姑夫黄巨龙家。

老河口，是国民党剿共司令部所在地，检查很紧。路条几天搞不到，使人十分着急。一天张冰如弟弟业华来看他姑妈，见到我也很惊奇。我又简单给他说了在他家的情况及现在的处境和任务，他也十分焦急。夜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想法，浮现在我脑海中：找业华借他的书籍，衣服，别上他的校徽作为中学生化装北上。比成年人搞路条可能不那么惹人注意。这想法和业华一谈，他十分同意，并十分坚决地答应想办法帮找。几天后，他把所用的书籍，校长、教师的名字，盖了章的路条都送来了！

啊！十八九岁的孩子办了这么大事，太难能可贵了。

业新大哥，业华在1947年元月6日送我上了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送我踏上了北去的行程。历经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我终于到达太行山革命的根据地重新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去。

我时时思念着菠萝崖，思念着冰如大姐和他的弟妹们，思念着她的母亲张四奶奶和幺叔幺婶韩国秀和她的老奶奶，思念着张子重老先生和业新大哥以及张征侯九爹九妈及黄巨龙姑妈一家，还有龚二爷和黑夜送我的吕大哥，从江大哥。他们舍着身家性命帮助了我，掩护了我的儿子中原，他们都是革命队伍的亲人，都是无名英雄啊！

70年代初，我约冰如大姐来京。白天我陪她去长城、颐和园、故宫、香山，晚上我们彻夜长谈，回忆那刻骨铭心的岁月。以后她又来过两次，最后一次她由业伟家来我家把丈夫和儿子也带来了。正好中原休假在京，我们相聚高兴极了！以后虽有书信往来，但冰如大姐去了！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我几次约业华来京，他都因血压高，未能成行，但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和鹏飞曾专程去丹江口看望他们，又在丹江口解放四十周年会议期间相聚，但两次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去菠萝崖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亲人们！亲人们：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的小中原，今已五十五岁了，他曾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现在外交部驻外国大使馆工作，他知道要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在最困难的时刻帮助过革命的亲人们！你们放心吧！

我在鄂西北的片断经历

罗会三

1946年9月初，鄂西北军区成立，我分在军区政治部。跟保卫部长张竞同志随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同志率领的三旅七团转战鄂西北。在险恶而又残酷的斗争中，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

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初创时期，敌情还不像后来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残酷，因此，我军虽接连打过好几次胜仗，有的还受到了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的表彰和嘉奖。刘司令员指挥七团继8月中旬在房县冠木河附近设伏，歼敌一个加强营，缴获颇多。9月中旬又在原江汉二团的配合下，攻占均县草店歼敌一个营，接着又攻打县城南关歼其守敌百余人，特别是缴获了一批急需的过冬物资，还有一批粮食，我是负责搞伙食的就更加高兴了。

记得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七团同二团又转移到谷城以西石花

街附近之黄山垭村，正遇敌整编六十六师一八五旅之五五三、五五四团企图对我夹击，我军采取猛打猛冲战术狠击一翼将敌击溃，10月中旬，七团越过老河口至白河公路，进到襄河以南，趁夜幕掩护，一举将郧县保安团千余人包围歼灭，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特别是还有一幅鄂西北20万分之一地图，非常宝贵。

到11月初的时候，敌情越来越严重，天天行军作战，部队异常艰苦，可以说已到了饥寒交迫的程度。七团在万家坪附近与老冤家一八五旅五五三、五五四团又连续进行了四次战斗，双方互有伤亡。撤出战斗后，我们转移到老白公路以北，真是冤家路窄，又遭遇该敌对我包围合击，经过一场激战之后才冲出包围，终于化险为夷。

一个月以来敌人为什么总是尾随我军，穷追不舍，我军行动难以隐秘？后来我们发现可能是七团政委何德庆同志爱人阎同志怀抱婴儿骑的一匹大白马，成了敌人追踪的目标。于是，何政委同爱人商量，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为了部队的生存，把马处理掉，忍痛割爱把自己的婴儿寄养。正好，找到了当地一位大嫂，人很热情、朴实、愿意收养，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托，并且表示，一定会像自己亲生的一样照顾好，保护好，请放心，还说万一遇到敌人搜查盘问，我就说是自己的双胞胎（她也有一个同龄孩子）。一个在战火中降生的婴儿，就如此这般地与父母骨肉分离，令我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而掉泪！

二

敌人发疯似的不断对我围追堵截，我军连续日夜行军转移，还多次投入激烈战斗，部队吃不好睡不好，体重下降，减员增加，走路打瞌睡，又加上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时不时又是雨雪

交加，许多人还打着赤脚穿着单衣，但大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一天，我们进到了家莹，准备在此突过老白公路，前卫部队遇到敌人打响了，后面部队临时停下来，这一停，大家全不顾雪地冰冷，机不可失一个个倒下去就睡，过了一会儿部队又开始行动了，前面起来的人就伸手去推拉后面睡着的人，睡在路边稍远点的人，也不知是否被推醒了没有，自己怕掉队就急急忙忙走了。等到天亮清查人数时，发现刘副司令员的警卫员小王和粮秣科科长通信员贺本海不见了。小贺当时只16岁，体格结实矮胖，不大爱说话，但人聪明、机灵，黎科长很喜欢他。等到傍晚时分，仍不见人影，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小贺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了，一看到我们便哇哇地大哭起来。他讲了掉队的情况，说他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睡在旁边的小王还在呼呼的打鼾，山洼里静悄悄空荡荡，自己既紧张又害怕，不知部队到哪里去了。他赶紧推醒了小王，两人商量，太饿了，先找老乡弄点吃的，就来到一间草房里，老百姓给他俩吃了一顿白米饭，小贺提出马上上山先隐蔽起来，可是小王说太乏了，坚持要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再说，小贺说咱们得防备敌人来搜查，小王还是坚持要睡觉、不上山，小贺只好自己走了，但他不放心，就隐蔽在山上能看到草房的地方，等了大约一小时就看到保长带的五六个乡丁把小王五花大绑的押走了。大家听了，既为小王惋惜，又为小贺的机智勇敢，意志坚定平安归队而高兴。

三

进入1947年，形势未能和缓，敌情更加严峻，这时上级要求我们树立必胜信念，咬紧牙关，共渡难关，保存力量，以待时

局变化。元月里一连有五个昼夜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睡觉，只要听不见枪响，大家几乎都是闭着眼睛在打盹，渴了遇到小河沟喝几口水。饿了就找个生玉米啃几口。一天，部队向十堰镇的茅坪方向急行军，我们刚从山上下来向一个小河沟走过去，机关人员正走到山沟，突然敌人从北面山沟里钻出来了，距离我们也就100来米，机关人员不顾一切向对面山上跑，这时敌人用手电一边照亮河滩，一边大喊：“捉活的！”“捆起来！”我们跟随张竞部长的9个人始终跑在一块。

大家到了山上之后，经过稍事整顿，随即又从另外方向下山沟去，找不到道路，遇见大约有20米的悬崖大家也不管不顾地往下跳，我们刚跳下到沟里，对面山上敌人此时又打照明弹，又吹军号，大家就地卧倒不动，过了一会儿，我们感到敌人没有发现就又向山沟里面摸去，结果发现前面是一条死沟，我们只好再向对面另一个高山上爬去，后来发现这是茅坪附近的平顶山，从山上看去，四面八方都是层层火光，好像火烧十里连营一样，敌整编六十六师、十师各一部将我七团和襄河大队团团围困在山上。我看到刘司令员两次派出的侦察员下山侦察，回来都说敌人到处封锁，无法下山出去。此时，刘司令员叫参谋把地图展开，借着手电光亮他仔细看了一眼，便下决心，命令部队从西面一个山沟里下去，我们机关人员紧紧跟着部队向后山爬去。连爬过两个山梁之后，总算胜利地又一次突出了敌人的重围，便迅速穿过老白公路，向武当山方向挺进。这时精神又突然松懈下来，眼睛开始睁不开了，眼皮又打架了。

四

鄂西北区党委在老观窝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央和中原局的

指示，要求保存实力，继续牵制敌人和坚持斗争，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外，其余主力部队分路转入外线作战。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也是鄂西北游击根据地的一大转折。

老观窝会议的前两天，就发生了保康县西南之康家山战斗，我七团、江汉二团以及军区机关人员等共千余名，被敌整编六十六师层层包围。战斗异常激烈。我是负责伙食的，便利用战斗间隙的瞬间下山，想赶到前面去搞足粮食，刚跑到一块稻田里，敌人从山上投下来一枚手榴弹冒着黄烟在田里打旋，我看见一位首长正站在田埂上，一声巨响，我们没有被炸着，却都弄得一身泥上。警卫连的江指导员赶忙把首长拉到一个土窑旁边隐蔽，我便跟随部队向北面的山上跑去。刘司令员命令七团七连连长从侧翼迂回，攻占了江家山顶，控制了制高点。经过三昼夜的浴血奋战，打开了一条血路，胜利地冲出了重围。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我亦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二团政委被敌俘去英勇牺牲，电台也被打坏，数十人被俘或失散。

康家山战斗后，刘司令员带领部队继续与敌周旋，同时收拢被失散的零星部队和人员。在荆当远地区转战中，我在行军路上被组织留在了荆当远指挥部，以后又到罗厚福所率的部队当班长，再后与张才千、李人林部队会师，北上豫皖苏，整编为中原独立旅。

4月中旬刘司令员率部奔袭钟祥县石碑镇东渡襄河，长驱直入挺进大别山，到达皖西与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所部会合，创建根据地。他的沉着、勇敢、高超的指挥艺术，斗争策略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原东路突围亲历记

何根毅

我抗战末期在豫西参加八路军皮（定均）徐（子荣）支队，1945年10月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后，编为中原军区一纵队一旅。中原突围时，我在旅政治部通信班工作。

一

1946年6月26日，我旅完成掩护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任务后，旅首长决定撤离白雀园，乘夜隐蔽开进刘家冲集结，相机向东突围到苏皖解放区。当天夜晚，阴雨霏霏，道路泥泞，行军速度很慢。天亮时分才到刘家冲，隐蔽在树林里。28日从刘家冲出发，我们以神速的行动，从敌军间隙穿插，边打边走，在小界岭越过麻（城）潢（川）公路封锁线，突出敌人包围圈，开始了东进的征程。

我们顶着霪雨天气，昼夜不停地走了三天，同志们个个疲惫不堪，旅首长决定在瓦西坪稍作休息，再通过东进的咽喉——松

子关。这时，侦察员跑回来报告：敌人已经埋伏在东面的两座山头上。首长当机立断，改变了休息计划，部队立即行动、命一团结占前面山头，掩护旅直和二、三团抢越松子关。

一团的勇士不顾疲劳和饥饿，发扬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把敌人打垮，占领了山头。我们沿着一团打开的通道，向松子关前进。走到山脚仰望上山的队伍，犹如巨龙盘旋上升，由于疲劳和饥饿，到了半山腰就走不动了，张着嘴直喘粗气。偏偏天公不作美，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顺头往下浇，水在脚下哗哗地流，人们隐没在云雾里，稍站不稳，就滑倒在地。崎岖山路虽然难行，但我们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爬上松子关顶峰，举目远眺，悬崖峭壁，万丈深渊，松树，竹子满山遍野，片片彩云在脚下飘动，好像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

突围以来的连续行军作战，使得我非常疲劳，走路还打盹，坐下还打鼾，有时部队走了还不知道，有时又会迷迷糊糊撞到前面人的身上。我们整天在大山里行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不少单位已经断炊。我和李宪争、齐宽凯几个参军时间不长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艰苦环境，政治部的年长者组织科长卢富贵，保卫科长莱真等，对我们非常关心。教我们怎样行军走路，如何洗脚保护脚板，亲自给我们挑脚上的泡。还鼓励我们说：“困难是暂时的，要鼓起勇气，增强革命信心。”把我们当成革命的幼苗来扶持，使我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二

7月4日，我们到达皖西金寨县的吴家店。这里是大别山中

心地区的一个小集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苏区，群众基础好。旅首长决定在吴家店休息，恢复体力，筹集粮食，草鞋，查明敌情，准备下一步东进计划。

老区人民从我军纪律严明、举止言谈，对人民的态度，一眼就认出：红军回来了。但是由于红军走后遭受国民党残酷迫害的记忆犹新，他们时刻防备敌人的耳目，警惕敌人的报复。所以表面上对我们冷淡、疏远，面暗地亲近我们，向我们诉说国民党军的罪恶行径。还告诉我们，吴家店祠堂有国民党粮库。这消息对我们说来，真是雪里送炭啊！

旅政治部立即派人前往查看，看守仓库的匪军早已闻风逃遁，仓库里边尽是稻谷和白米。首长决定满足部队急需粮食后，开仓济贫。而群众怕部队走了反动政府找麻烦，不敢去仓库背粮。我们就向群众宣传，说明粮食是国民党从劳动人民手里榨取的，应当归还贫苦人民。各团还组织人员把分给群众的粮米送到家里。群众也主动帮部队碾米，磨面。甚至把自家养的猪，鸡杀了送给部队。军民亲若家人，有的大娘大嫂给部队缝补衣服，赶做鞋子；有的做糍粑、年糕送给部队吃。我们说声谢谢！都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婉言谢绝。群众纷纷传言：你们回到老区就是到了家，咱们军民一家人嘛！

我们通信班住的那家房东大娘看到我给她家背回一袋稻谷，就杀鸡做菜款待我们，我们婉言谢绝了大娘的盛情后，她知道我们还要走就帮我们找稻草、布条打草鞋，还拿出她儿子的一双八成新的布鞋，不依不饶地非要我穿上它好走路。望着大娘真挚慈祥的面容，我含泪叫了声“娘，”娃儿收下了。就是这双鞋，伴我走完了中原突围的后一半征程。人民恩情重如山，它鼓舞着我战胜一切困难，夺取突围的最后胜利。

三

离开吴家店，涉过漫水河，翻越天险青峰岭，7月9日傍晚到达磨文潭。磨文潭位于淠河西岸，是大别山东陲的门户，旅首长料定敌人会在这里截击我们。到达磨文潭就命令三团派出一个营渡过淠河，占领有利地形担任警戒。其余部队，人不卸装，马不下鞍，就地休息，埋锅做饭，待机渡河。就在我们刚端上碗要吃饭时，淠河东岸枪炮声大作，“啾……”的子弹声伴着“咚……”的迫击炮声，响彻磨文潭的上空。我把米饭装在上衣口袋里，掂起枪就向渡河地点奔去。淠河河面不宽，水流湍急，部队在两岸水面上拦有一条绳子，我扶着绳子，班长拉着我一只手向前移动。河水两边浅，中间深，脚蹬不到底。我们渡过淠河后，就沿着山道向东南挺进。7月10日到达毛毯厂，在这里召开了全旅军人大会，旅首长号召全体指战员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发扬人民军队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的革命传统和阶级友爱精神，以坚决神速的行动，争取五天五夜的急行军，跃过皖中千里平原。会后彻底轻装，除武器弹药和必需的服装外，一切多余物品和炊事担子，没有铁掌的骡马，都统统丢掉。

六安和合肥之间，是一望无垠的平原。7月13日夜晩，我们这支跳过大别山的人民军队，借着皎洁月光，以急行军的速度，跨过六合公路，向大平原挺进。17日过淮南路，进入定远地区，摆脱了敌人的堵击。

四

7月18日下午，我们到达定远的池河。这里距津浦路不远。跨过津浦路就是苏皖解放区。但由于四天五夜的连续急行军，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许多同志没有鞋穿或打赤脚，或用破布包缠。我们鞋子早没有了，用布条缠着脚，走起路来一跛一歪，简直像鼓捶一样。为了加快前进速度，旅团首长们，站在路边大声呼喊：“快跟上！过了铁路就是苏皖解放区了！”顿时，人们都提起精神向前跑。

7月20日天亮，我们在张八岭以北的石门山过铁路。铁路两侧都是起伏地形，沿线有碉堡和工事、护路沟贯通。我跟着队伍快步踏上铁路，真想多看两眼，这是我第一次白天看到铁路，还没见过火车是啥样！铁路边的碉堡被我们包围着，敌兵在里面向外窥探，但不敢向我们开枪。

我们旅直越过铁路走上东侧一条山岭，一团部队正过铁路时，从滁县方向开过来一辆装甲火车，边走边向我们部队开枪。子弹从我们头顶嗖嗖飞过，打在岩石上直冒火星。旅首长命令参谋通知二、三团组织火力向装甲车射击。用炸药炸铁路，掩护一团过铁路。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齐鸣，铁路上冒起一股股白烟，装甲车呜呜狂鸣着，像乌龟似的返回了滁县方向。我军还用迫击炮轰击敌人碉堡和两翼增援之敌。张参谋长说：狠狠打，我们给苏皖人民一个见面礼！

我们这支队伍，经过24天征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堵截，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受到苏皖人民热烈欢迎。我们驻地，满街墙上贴出了红色标语，“同志们辛苦了！”“向你们学习，粉碎蒋介石对苏皖地区的进攻！”儿

童团打着红旗，向我们欢呼。群众纷纷送来大批的大米、白面、猪肉、鱼、鸡和蔬菜。房东老大娘更把我们当儿子看待，她们心疼地说：“看，娃们都瘦得不像样了。”紧忙着给我们做吃的，缝补、清洗衣服。我们倍感亲切和温暖。只有亲身经历了中原突围艰苦斗争的人们，才能深切体会胜利回到母亲怀抱的喜悦心情。

中原东路突围二三事

袁文通

1946年6月26日这一天是不平凡的一天，也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奉上级指示完成了掩护中原部队主力向西突围任务后，由旅长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等领导同志率领，在这天夜里开始集结部队，准备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苏皖解放区挺进。这天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天气由闷热转而下起了瓢泼大雨，为了迷惑敌人，开始时部队佯装跟随主力部队向西突围，走到半夜时突然掉转方向，向东南方疾进。天亮的时候，旅直各单位已全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了预定集结地——刘家冲。从刘家冲开始，部队每天行军都在百里以上，遇见小股敌人就战斗，遇见较强的敌人就绕着走，走走停停，打打战战，经过数十次战斗，24个昼夜的奔波，部队终于到达了苏皖解放区。

一、吴家店补充给养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六七天了，由于突围之前时间仓促，

指战员们的干粮和粮食已经基本吃完了。正在这时，领导决定在安徽金寨县的吴家店休整两天。我们做粮秣工作的，不顾疲劳，马上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哪有富豪？哪有粮仓？吴家店一带是过去红军时代的老苏区。四处可见一些苏维埃时期的老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这些标语虽然被国民党用石灰渣刷过并经过风吹雨淋，但仍现出了鲜艳的红色。群众知道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时，无不欣喜，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他们很快告诉我们，距吴家店不远的山坳里就有一个大粮仓，我们跑去一看，真有一个大粮仓，守粮仓的国民党官员早已跑光了，粮仓里堆满了大米，看见白花花的大米真是高兴死了。我们很快向领导作了汇报。我们的供给部长范惠、粮秣科长张成义听了汇报，都非常高兴，亲自到粮仓查看，范惠同志指示我们，马上通知部队派人来领粮食，每个单位不仅要把吃的、带的粮食都领足领够，还可以用大米和群众交换猪、羊和鸡鸭，改善伙食，也可以用大米和群众换鞋子给战士们穿。我和宋秋冬、张太康等几个粮秣员白天给部队发粮食，晚上就睡在粮仓里。在白雀园时，我们吃的大米都是糙米，就是把稻谷放在擂子上擂一擂，把谷壳去掉，做出的饭又青又不好吃，这仓库里的大米白生生的，做出的饭香喷喷的真好吃。我们几个商量，想用大米换些肉类改善伙食。第二天，我和张太康两人，每人背了一袋大米（约百十斤）到附近老乡家里换鸡鸭。到了老乡家里，老乡说啥也不要我们的粮食，老乡说：“鸡是自己养的，想吃就抓几只吃吧，大米我们不要。”我们说了好多好话，老乡就是不答应。可是，我们有铁的纪律，老乡若不要我们的大米，我们也不能拿老乡的鸡。后来，我们分析老乡不要我们的大米，可能是怕我们走了，反动派回来整他们，于是经过商量，我们给老乡挖了一个地洞，把粮食埋好，这样，我们用两袋大米换了一只鸡。中午，我们吃上了大米饭和清炖鸡，真香，长了20岁，这还是我头一次

吃这么好的饭菜呢。

三天快过去了，部队的粮食已领足领够了，没有人再来领粮食了，但是粮库的大米依然是堆得高高的，我们只发放了三分之一，剩余的大米咋办？大家议论纷纷，有的同志提议干脆一把火烧了，最后还是请示了领导。范惠部长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把眼一瞪说：“这可不是小事情，咱们把它烧掉了，反动派回来后没有吃的，还得向群众摊派。等我请示一下旅领导再说。”很快，范部长回来说：“旅长、政委都在，他们都说，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是把大米给反动派留着吧。”

二、突围路上添了一枝花

范惠同志是在豫西一分区行署当专员的时候和薛留柱同志相识、相爱、结婚的。日本投降后，一分区南下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后，改编为一纵一旅，范惠同志调一旅任供给部部长，薛留柱同志也调入供给部工作。中原突围前，留柱同志已怀孕，即将临产，部队里另外有几个女同志也将临产，突围前，其他的女同志都化装离开部队到太行解放区去了，可是留柱同志坚决要和部队一起突围，为此，部队领导专门给留柱同志配备了一头骡子。薛留柱同志同战士们一起每天行军 100 多里。爬山涉水，风吹日晒，虽然是骑在骡子上，可是颠簸的滋味也不好受。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在到达安徽吴家店的这天夜里，留柱同志平安产下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中原突围，有的同志提议就给她起名叫范中原，范惠和薛留柱同志都认为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乐呵呵地同意了。在吴家店休息了三天部队又上路了，为了照顾产后身体虚弱的留柱同志和“一枝花”——范中原，部队领导决定派出几名战士轮流抬着她们娘俩，跟随部队前进。留柱同

志躺在担架上，看着部队又要打仗，又要照顾自己和孩子，实在是拖累了大家，当部队到达安徽的磨子潭时，她和范惠同志商量，把孩子寄养在群众家里，等胜利后再来接她。正好有家姓项的农家，刚生了孩子，可是孩子夭折了，经过商量，这家愿意收留孩子。和孩子分别的时候，夫妻二人紧紧抱着孩子，亲了又亲，他们默默的告诉孩子，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来接你。

全国解放后，范惠和薛留柱同志多次给安徽霍山当地政府写信，请求帮助查找女儿范中原，并亲自到安徽霍山寻找，当地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但由于范中原曾几次被转托寄养，情况比较复杂，直到1974年才找到。找到时，范中原已和当地的一个农民结婚，并育有4个子女。后来，他们时常带着孩子到北京同父母团聚。现在范中原已经当上了奶奶、姥姥、儿孙满堂，在安徽农村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

三、我的枪掉了

7月7日离开了吴家店，经过10多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安徽定远以北距红心铺不远的一个山凹里短时休息。在这10多天里，我们没有一天吃过3顿饱饭，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常常是白天行军打仗，夜里12点以后才宿营，宿营后赶紧埋锅造饭，烧热水烫脚，往往休息两三个小时，就又赶路了。没过多久，战士们带的粮食差不多都吃光了，也没再遇到机会给部队发粮食。经常饿得很了也就习以为常。可是疲劳和瞌睡是最难对付的事，常常是前面的部队稍一停留，后面的同志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前面的同志开始行进了，后面的就叫一个地跟着往前走。许多同志说，啥时候到了解放区，一定要美美地睡上一觉。

在这个山凹里，参谋长张介民同志给旅直各单位做了动员报告，大意是：我们突出重围后，在敌占区已经奋战了20多天，大量的敌人围追堵截，企图把我们这个旅吃掉，但是，蒋介石的阴谋失败了。再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就要到达预定目的地苏皖解放区了，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艰苦再战，做好准备，渡过难关，彻底胜利地完成中原突围任务。而后，供给部长范惠同志对供给部的全体同志讲了话，大意是：一、要管理好财务，全旅的经济并不富裕，仅有的几麻袋银圆驮在三四匹骡子身上，决不能丢失，更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二、大家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对有病的同志要落实照顾的人员，争取一个不拉地都到达解放区；三、万一部队被打散了，每个人都要设法过铁路，然后往东北方向走，到安徽自来桥集合。

听了动员，大家开始都非常激动，后来听到“万一被打散了……”一下又紧张起来。看来津浦铁路是敌人对我们进行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定要做好拼搏的准备。我身上带了一支土八音枪，是河南巩县造的，它是张太康同志在豫西抗日时期从敌伪手中缴获过来送给我的，我把它擦了又擦，共有五发四〇三子弹，平时枪弹夹里只装一发子弹，这时我把它全装在子弹卡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和往日一样我们又开始了急行军，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已经到了半夜，部队走走停停，平时我的手枪都是用铁卡子，卡在左腰部皮带上，今夜为了取枪顺手，就把枪卡在右腰部位皮带上，当部队停下来后，我仍习惯的向右倒下就睡，枪口着地从皮带上顶了出来我也不知道，等我被别人拍醒后，继续向前走，走了五六步时，我突然发现我的枪不见了，赶快回头找，才走两三步，范惠同志碰见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你干啥去？”我说：“我的枪丢了。”他一拉我说：“快走，不要了，跟上你的位置。”我知道他是怕我掉队。部队规定的纪律非常严格，行军路上谁挨

着谁是规定死了的，两个人中间决不允许任何人插进来，你要是掉了队，谁也不让你插进队伍里，你只好掉到队伍最后面，因为大家都很疲劳，如果没人管你，你可能会趴在地上睡几天都不会醒。范惠同志怕我掉队，所以他说宁可不要枪，也不能让我掉队。又走了几十里，天已蒙蒙亮了，我们听到了“做好准备，就要过铁路了”的传令，我们的步伐更快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是啥样的，1945年冬过京广铁路时是在夜里，当时情况又很紧急，一路跑着就过了，啥也没看见，这次一定要好好看看。走到铁道边时，天已经大亮了，一个指挥部队过路的同志低声说道：快跑，敌人的装甲车快来了。我一面跑，一面想，不管怎样也要看看铁路是啥样的，跑上铁路后我又趴下，用手摸了一下铁轨，心里想，就是两根铁棍，火车咋在上面跑呢？过了铁路就爬山，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敌人的装甲车开过来了。这时旅直各单位已全部过完铁路上山了，当后卫一团的部队正陆续穿越铁路急速前进时，敌人的铁甲车开过来了，最早过铁路的二、三团已奉命将迫击炮、轻重机枪对准铁甲车一齐开火，打得敌装甲车没敢停留就溜走了。就这样，全旅部队经过24个不分昼夜的艰苦行军战斗后终于胜利地到达了苏皖解放区，中原军区一纵一旅的中原突围胜利结束。

坚持不掉队

王 克

我现在过着幸福愉快的晚年生活，我珍惜这种生活来之不易。人最宝贵的当然是生命，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人们也很难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环境迫使你不可能考虑的那么周到。

我常回想起战争年代里我生活中的一个戏剧性插曲，这个插曲几乎使我的一切成为泡影，当然也包括生命。这件事还得从1946年6月26日的中原突围说起。

中原突围时我在中原军区一纵一旅一团政治处任技术书记。突围的当天晚上，我们部队由河南商城县的余集出发，天下着倾盆大雨，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靠着不时的雷电闪光，同志们一个挨一个地急速前进。每人的左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这是联络识别的记号，这时谁若掉队使部队中断了联系，那必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一夜大都在泥泞的稻田埂上行进，使人感到特别吃力。天明时雨停了，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感到特别疲乏，而且也有些头疼。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在开始行军的几天里，真可谓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而且风雨无阻。从行军的第二天起，我感到周身发冷关节痛疼，头晕发烧，经医生诊断这是疟

疾，按常规疗法应是服药打针多喝开水卧床休息，但在当时急行军的条件下，这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坐下来休息五分钟也很难办到。大别山的6月，气候多变，一会儿是烈日当空，一会儿是倾盆大雨。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雨水汗水交织在一起。饥饿和疲劳连续不断，过封锁线时还要跑步前进，这种环境对于一个身患疟疾的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我们还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在这种环境下，除了拼死的挣扎前进之外，别无良法。我靠着一根棍子和同志们的搀扶艰难地随部队前进。

急行军四天之后，部队走到了大牛山，这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大山，海拔1900米，能否翻过这座大山，对我是个严重考验。从上山到下山近一百里的路程，部队走了一天，队伍穿插行进在浓云密雾中，阵阵暴雨不时地倾盆而下，山下炮声隆隆，敌人还在追击，我们必须急速前进。我也亲眼看到真正走不动的同志有的倒在路边，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们却走完了革命的道路。

我是个幸运者，在翻大牛山时靠同志们帮助和自己的毅力终于翻过大山并和同志们一道来到了安徽省金寨县的吴家店。这里曾是革命老区，部队要在这里休息三天，以恢复体力和补充干粮，我高兴极了，希望能在休息三天之后把病治好，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继续行动。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三天之后，病仍未好，因为没药治疗，不可能好。

部队又要出发了，同志们出出进进地在整顿行装。我有气无力，焦急地躺在那里，头疼发烧。只有患过疟疾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痛苦。这时政治处的组织股长马匡汉同志找到我说：“部队马上要出发，经领导研究，把一批身体不好不能随部队行动的同志留下来，就地休息，待身体恢复好之后，再向东边苏皖解放区找部队。你身体不好，下一步行动更艰难，就暂时留在此地休息吧！你有何意见？”听了之后，我的心像揪了一下似的，紧张不

定，在略思片刻之后，我当即表态，若没有其他办法，我也只有留下来，领导上在出发之前才把决定告诉我，这也是出于十分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我立即把政治处的公章交给了他，随即又躺下休息。其他同志知道我要留下来的消息后，也都与我作了告别，并互相勉励。当我与民运干事仝全让、青年干事刘贯三同志握手告别时，心情特别难受，不觉流出了眼泪。我们三人是同时期参军同时分配到一团政治处工作的，经常互相帮助，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翻越大牛山时，是他们搀、扶、推、拉，才使我渡过难关，现在就要分别了，今后会不会再见，那就很难定了。他们去集合出发了，屋内仅剩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孤独、空虚、恐惧的心情油然而生。今后前景如何？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是我故意脱离革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休息！休息！再休息！

我躺在门板上迷迷糊糊地似要睡着了，突然有人把我推醒了，是团部的指导员徐恩光同志来了，部队出发之前他是来检查群众纪律的。他看到我还躺在那里不动，说：“部队要集合出发了，你怎么还躺在这里。”我说：“因身体有病，被领导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他听后哦了一声说：“你还是跟部队走吧！你从小在家也没出过门，一个人留在这里吃饭都是问题，敌人来了你怎么办？”我不由得看了看留给我的一袋米，这是我惟一的生源，这是一袋生米呀，我身上连一根火柴也没有，能吃生米吗？赤手空拳如何对付敌人？当时同意留下来不走，是因为身体发冷发烧，生理的本能要求非休息不可。现在到了真要留下来当思考到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和危险时，就不得不再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求生的愿望占了上风。

徐恩光同志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抗日时期曾在我的家乡当过小学校长，由于他的启发教育，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继而参加了革命。他是我参加

革命的启蒙老师，他的话我特别重视。他动员我紧跟部队行动的话，使我猛醒，也容不得再过多考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有紧跟部队前进，才是惟一生路。我随即拿起棍子、干粮和他一块紧赶到集合地，又和政治处的同志会合在一起继续前进。

离开吴家店一天之后部队在行进时暂停在路边休息，只见从后边来了个一瘸一拐急忙向前赶的人，及至到跟前，才认出他是在吴家店出发时，因身体不好被留下来的炊事员老冯。同志们围上去问他的情形，他说我们部队出发后敌人即进村抓人，他乘混乱之机逃了出来，我急忙追问留下的其他同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我这是多余的一问，能逃出来就是万幸，他还能顾那么多？此时我联想着留下来同志们的处境，也联想到我的情景，真是有些惴惴不安。在吴家店出发的两个小时之内，关于我的走留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如若我当时坚决留下不走，一定是凶多吉少，也决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那一瞬间要走的决心，竟成了我一生中幸福与灾难的分界线。

自吴家店出发之后部队即进入皖中平原，敌人处处设防追击，大小战斗几乎天天不断，但都被我们冲杀过来了，经过24个昼夜的行军战斗，行程1000余里，终于胜利地到达了苏皖解放区。在24天的艰苦征战和1000余里的紧急行动中，除了经常和敌人打仗之外，还需忍受饥饿疲劳风风雨雨等恶劣条件的侵扰，然而我的疟疾竟不治而好了，这真是难以理解，但却是事实。

部队到达苏皖解放区之后，即改番号为华中军区十三旅，旅长仍是皮定均，政委仍是徐子荣，在稍事休整之后即参加了保卫苏皖边区的战争。我参加革命时的启蒙老师徐恩光同志，在苏北盐城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了，那时他是十三旅一团九连的指导员，我永远怀念他。

突围前组织干部化装转移

须浩风

提起中原突围，我们不会忘记突围前 300 多位旅、团、地、县干部和家属化装转移到兄弟解放区这一巨大胜利。我当时在中原局组织部工作，参与了组织干部化装转移的全过程。现将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一、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和具体实施

中原局领导为了保存干部，减轻中原突围时部队的负担，1946 年初春，决定安排干部化装转移到兄弟解放区。

通过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郑绍文（原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军调部武汉执行小组任士舜（原中共陂孝礼——黄陂、孝感、礼山——中心县委书记）的周密调查研究和周旋，设法安排了少数旅、地干部，化装为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人员，乘军调部的飞机去北平到延安。中原局批准贺炳炎（江汉军区司令员）、程坦（鄂东地委书记）、刘西尧（圻黄广地委书记）、孙西歧（区党委

组织部副部长)等近10位旅、地以上负责干部,用这种特殊办法化装转移。这在1946年3—4月间胜利完成了。

由王震(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代表中原军区向军调部交涉,达成用火车将我中原伤病员运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协议。军区决定安排护送一小部分县、团干部和伤病员,由原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袁文化装为伤病员带领同行,打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于1946年5月安全到达河南安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其他大量化装转移的县、团以上干部,则由中原局组织部、城市工作部负责组织,每组3~5人,从1946年4月至6月中旬,共转移300多位县、团以上干部及家属。

在组织实施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

1946年3月,中原局派蔡承祖以盐商身份去江苏省扬州一带了解进入苏北解放区的途径;派王锡璋赴河南安阳一带了解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路线;指定罗礼经光地下党负责人吴行宾(即吴皓)派地下交通了解步行去苏北解放区的沿途情况并建立联络点;中原军区派甘迈外出了解沿江(长江)一带情况。得知当时国民党官员正忙于复员和接收城市的争权夺利,还顾不上注意我们干部化装转移,只要有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路条或通行证,行走前准备好应付的假口供,胆大心细,沿途通行并不困难。中原局领导听完汇报后,决心更大了。

中原军区政治部利用在国民党部队里的统战关系,靠内线提供通行证,供高级军事干部及家属化装转移用。

罗礼经光地下党负责人吴行宾组织地下交通人员收集国统区沿途使用的各种路条及通行证进行复制并模仿刻制县、区、乡、保的签章、路条、通行证,供化装转移干部使用。

由蔡承祖、甘迈开辟的沿江大道路线主要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走,或由边区民主建国大学内有可靠社会关系的学员陪同一起走。这条路线由武汉至南京再至六合县进入苏北解放区,或走

镇江至扬州再至高邮、邵伯进入苏北解放区；由王锡璋开辟的路线经信阳、郑州至安阳再到邯郸晋冀鲁豫解放区，主要供工农干部走；由吴行宾开辟的步行去苏北的路线，由地下交通带路，主要供老红军工农干部走。

中原局事先密告晋冀鲁豫中央局、山东中央局、苏北区党委，今后几个月内有中原干部化装转移到这些解放区，请他们接待安排，沿途有何特殊情况和经验，速告中原局。

中原局组织部和城工部负责组织干部化装转移的具体事项。组织部负责组织干部化装转移人选的搭配，提供路费（董必武同志从武汉运来一批国统区使用的关金券）和化装用的服装（新做了一批，另从救济物资中选了一些西装、皮鞋，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转移使用），干部到达目的地后，组织部负责用密电转去党的组织关系。城工部负责确定转移干部的具体路线，介绍途经的联络点，帮助转移干部准备沿途如何应付的假口供，提供通过国统区的假路条。罗礼经光地下党组织负责对老红军干部的化装转移，训练他们沿途如何应付，直到演习好才出发。当时中原局组织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有我，马兆祥，中原局城工部有顾大椿、李其祥负责；罗礼经光地下党由吴行宾、田绿野负责；中原军区政治部由白相国、汤瑞甫负责。

化装转移形式多样、生动有趣。

一是对老红军干部化装转移的准备工作最为细致。由于老红军过去长期战斗在苏区，对国统区总感到不安全，茫然。乃至走前他们不愿下枪，不愿丢下警卫员，总觉得空身在国统区走，很不安全。往往经反复说服，勉强同意。有的走到半路就折回来了；有的带家属前后同行，总是向后看，还叫着“快跟上，不要掉队”一套部队行军的习惯用语。凡发现有破绽的，都让他们重新回来，由吴行宾或田绿野把他们再训练好，才鼓励他们成行。老红军干部，原豫鄂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他做过地下党的

工作，就不一样，很自然。化装成赶猪的，把路费藏在赶猪的竹竿内，他步行很顺利到达了苏北解放区。

二是江仲华大姐的转移非常顺利。她是豫鄂边区党委的秘书处，过去没有出过远门，大城市也没去过，我们安排一位在上海有可靠社会关系的民主建国大学学员陪她一起转移，经上海安全进入苏北解放区。

三是巧妙避开内奸。马沂（原中共孝感县委副书记），化装转移经信阳，在车站遇到自首分子高维乐，马沂避过去，高维乐紧追上去跟她讲：“我不会害人，请告上级，这里还有潘道武（自首叛变分子），要注意。”马沂让她的交通回来告诉了我们。以后我们转告转移干部，在信阳车站要千方百计避开潘道武这个人！

四是高非的“金蝉脱壳之计”。高非、左群两位女同志，带着夏农荅不到一岁的婴儿，经扬州、邵伯，快进苏北解放区时，遇国民党军警阻挡，并放走了她们的乘船。军警打开高非的手提箱，见到她嫂子送她的一串项珠，动心了。高非急中生智，说：“这箱子，留在这里，我们先回娘家，明早再来取。”军警高兴，放她们走，还为她们再雇了船。这样她们顺利地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她们将此情况向苏北区党委作了汇报。后来我们在中原局见到苏北区党委来电称：“高非的经验是金蝉脱壳之计，可以采用。”当时国统区，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经济主义，给点钱可以买通关节。

二、我化装转移的经过和体会

中原突围前3天，陈少敏突然决定我化装转移。到1946年6月20号为止，中原局组织部具体负责组织干部化装转移工作

宣告结束。23日下午，陈少敏大姐叫我去，说：“浩风，你们从3月组织干部化装转移县、团以上干部300多人，虽然每次通过电报向兄弟解放区打过招呼，但仍不放心，还得你去作些介绍才好。你明早就化装出发，你们有经验。”我立即接受了任务。大姐又说：“你可找个伴同行。”我考虑后问大姐：“林维可不可以？”（林维当时任大姐行政秘书）。大姐说：“当然可以。”并约我和林维晚上到她那里一起吃晚饭。我俩去了，大姐对我们特别关心。大姐又说：“你们化装的行装组织部有，位老（郑位三同志）那里还有个毛毯和手提皮箱，你们可以带去用。”接着，就叫她的警卫员孔繁亮取来交给我们。饭后，我和林维向大姐辞行时，她的眼圈红了。

晚上，我和林维商量，我化装为河南鸡公山教会学校的高中教员，林维化装为我途中相遇的一位初中教员，一路乘火车去武汉转南京上海。从组织部留下的救济物资中挑出西服和皮鞋穿上。6月24日拂晓，城工部配给我们的地下交通老万领我们上路。傍晚到达信阳边境的地下联络站过夜。25日拂晓，上信罗公路不久，迎面从信阳开过来国民党部队，大声问我们：“哪里来的？”老万马上回答：“从罗山来的！”这样，就顺利过去了。快到信阳火车站，为避开站上自首分子潘道武、高维乐我们就快步进了一个小客栈。休息一会，就叫茶房来：“给你小费，给我们代买三张去武汉的火车票，我们要休息休息。”茶房很高兴，一下就把车票买回来了。我们吃了点东西，火车快开前，就找那茶房领我们走捷径到车站列车旁，直接上了车。车厢里坐满国民党士兵。我对身旁的士兵讲：“对不起，我感冒头痛，请挤个位置给我们坐坐。”这样我们三人总算都分头挤坐了下来。到了汉口进城时，我们主动打开箱子，请门岗检查。他翻了一下，就让我们进去了。在汉口，老万引我们进一家招牌为“上海百货公司”的楼上，一位老婆婆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早饭后，给老万关

金券让他去买到南京的轮船“黑票”，多花一点钱，主要求个快。我和林维分头去理发和擦皮鞋。理发师看我头发又长又乱，问我“是哪里理的？”我答非所问地说：“就因为你这里理得好才来的！”我和林维回去，老万很快把“黑票”买回来，是轮船甲板上的票。下午3点，老万把我俩送上轮船就分手了。

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官“护送”我俩进南京。

在轮船甲板上，旁边卧着一位军人，自言自语地在骂人：“他妈的！我这个第一集团军司令的副官，把司令太太送回武汉，任务完成了，他就把我辞退不要了，真气人！”我和林维都觉得和此人同路走，可能有用。于是一路上请他抽烟，聊天，一起吃饭，一路上“关系”不错。到南京码头，这位副官成了我和林维的“保镖”，给我们提皮箱，在前面开路，上岸后，国民党宪兵也不查问我们。这位副官也去上海，我们为了要摆脱他，送他去上海的车费。我说：“我们要在南京看看同学，你先走好了。”就和他分了手。我俩车站上喝咖啡，遇到国民党粮食部的一位职员同桌，话说到投机处，他说：“有粮食部的证明，优先买票，你们如要买票，可拿我的证明去，方便些。”果然如此，票一下买到了。我们一路顺风，从信阳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再从南京到上海，一路上都很顺利。我对化装转移的亲身体会是：只要胆大心细，路上可以充分利用“掩护关系”，行走起来就方便得多。

我还在中原局组织部时见到董必武的一份电报：“中共南京代表团刚成立，事多人少，中原局不要介绍化装转移的干部来找代表团。”所以我们没有去中共南京代表团，而是先去上海我的姐夫邵志清家落脚，并请他找关系去苏北解放区。在上海等了一段时间，姐夫从地下关系找到了去苏北的渔船，准备第二天清早出发。晚上，上海救济分署的李实同志找我，告诉我中共南方局（驻中共南京代表团内）的钱瑛大姐（当时她任中共南方局的组织部长）正在找我，要我快去她处。我即去南京得知钱大姐要我

在她身边处理中原来的干部化装转移。我对钱大姐讲：“陈少敏大姐交我另有任务，我不能留下。”后经宋平同志（当时任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布置，我们一批路过南京的中原同志去上海搭乘去山东解放区运救济物资的轮船。一清早，我们去码头快上船时，一位通信员赶来送信：“船不开了，快回上海办事处去。”当天下午，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那批从中原转移来的同志讲：“张家口我们已撤退，现在形势很紧，你们都没有国统区的身份证，住在这里是‘黑人’办事处不能留你们。你们要像大革命暂时受挫折时期那样，到社会上去生根开花，明早拂晓前就离开这里。”我和林维打算出去再找我姐夫，请他设法帮助。半夜，刘真从南京中共南方局来了，说：“最近新华社要撤退到延安，军调部派飞机送，可带走一批干部。”他拿出一张名单，上面有我、安天纵（中共安陆县委书记）夫妇、魏天（黄陂县长）夫妇、洪学敬（张文津夫人）。深夜，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向我交代：“须浩风同志，你带这批干部去南方局，还带一份秘密电报到南方局去发，一捆‘谈判纪要’也带去。”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黑人”带文件从上海办事处到中共南京代表团有惊无险，我接受钱之光交代的任务后，回头一想，我们6个人都是没有国统区身份证的“黑人”，从红色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到更红的中共南京代表团所在地梅园新村35号，沿途要特别警惕和小心；要准备好一套应付的假口供。好在我的一位姨表姐夫在南京国府路邮电总局工作，我确定是去找他的，我们决定用这张王牌来对付国民党军警的盘问。我把密电交给洪学敬，藏在贴身，我和她装作假夫妻；把“谈判纪要”藏在我随身带的行李内，捆得紧紧的。拂晓前，安天纵、魏天一两夫妇坐一辆车，我和洪学敬坐一辆车，先后离开上海办事处。附近有一座岗亭，我想如果岗警将我们的车号打电话给火车站等有关方面，很可能会来找我们的麻

烦。一进火车站，就见到“三民主义青年团服务站”。我想，如果他们来找麻烦，就打那张王牌。但进站很顺利，没有盘问我们。可是火车经镇江站，又出现惊险迹象：有两个家伙上了我们车厢，男的穿西装，身上别的是“中统”徽章；女的穿军装，身上别的是“军统”徽章。那男的坐在我身边，女的坐在斜对面。我们真被盯住了？！到南京站，我们雇了一辆板车送行李出站，我让魏天一先出站叫两辆汽车去国府路，以示光明正大。那个中统男特务把他的皮箱也放在我们板车上，我想，糟糕，我的那张王牌真的要用上了，出了车站，那男的却又意外地取下他的皮箱拎着走了。我们内心一阵惊喜。我们坐的汽车快到南京中华门时，前面宪兵正在检查门口的另一辆车。我们的司机为抢时间，想从前面那辆车右边穿过去。宪兵转过身来叫我们停车，我马上下车，把车门开得大大的，对宪兵讲：“请检查。”这办法不错，宪兵挥手放我们过去了。车快开到国府路邮电总局时，我低声对司机讲：“多给你小费，你把车快开到梅园新村35号去。”

两天后，我们乘军调部撤退新华社工作人员的飞机去了延安。

从中原到苏北

——一个化装突围组的经历

甘 迈

1946年春天，中原局、中原军区决定采取化装突围办法，转移一批县团级干部及家属到其他解放区。抗战前，我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地下工作，对武汉情况也比较熟悉，领导就派我先到武汉侦察了解交通情况，尽可能在武汉建立秘密兵站转移干部。我从武汉返回宣化店后，由于情况变化，建立秘密兵站任务撤消，另派我带领一个化装突围小组，向苏北解放区转移。

—

我的这个组共有七个人，除我们夫妻带一个孩子外，还有周庆鸣的爱人李玉清，宣传科长韩光甸夫妇和襄河报的一位编辑。

临走前，组织上给每个人准备了化装服装和国统区的身份证件。每个人都编了一套与身份证件相吻合的经历。并规定万一个人出了事，绝不许连累别人。组织上派骡马送我们到四站墩化装，进入国统区的河口镇。第二天打早乘汽车前往武汉市。到达

黄陂县城休息时，中原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穿着军调部执行小组的军服，从副驾驶座位突然向我们走来，还大声打招呼说：“你们到武汉，不要到办事处去，那里不方便招待……”我对此很吃惊，很警惕，因为人多复杂，就没有理他，连脸都未朝他看，让别人觉得不是和我们说话。我灵机一动，也就跳下车，乘机碰他一下，向厕所走去。他也跟过来了。我不客气地指出：你穿着军服，不该向我们穿便衣的说这些话，被国民党特务听见，我们这群人就可能发生意外。幸亏一路没事，安全到达武汉。

二

在汉口住进一家旅馆，我就着手解决襄河报那位编辑的去留问题。当即就跟他一道来到市中心一家规模较大的贸易公司，他一进门，工作人员就齐声叫喊说：“小老板回来了！”要他赶快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我陪他进入他父亲的寝室，父子见面，抱头大哭，又激动、又高兴。见此情况，我就告诉他，我们后天离开汉口，你可以留在家和家人团聚谈谈，有何考虑，到旅馆商谈，就和他父亲告别离去。

当天下午，他在姐夫陪同下来到旅馆告诉我，他决定留下不走了。同时，说明他父亲恳切要求我们全休到他家吃顿饭，几经辞谢不掉，只好勉强同意。

次日中午宴请我们，他父亲带病作陪，全家十分客气。餐后，我同他个别谈话，申明临走前组织上交待过：他如要求留下，可以同意。并关照他要注意保护自己，注意安全。必要时，可到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联系。他非常感谢组织的关怀，并表示永远忠于革命事业。

下午，我安排好江边的民船（舢板）回到旅馆，没想到遇到

一个难题，李玉清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要求去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我们反复解释劝说，她还是坚持要去。我们只好召开党小组会，明确申明：来前组织上不让我们去办事处，谁要坚持去，出了事自己负责。李玉清仍然坚持意见，表示一切都由自己负责。

翌日晨，我安排好同志们去江边上船的计划 and 约定了会合的地点、时间后，就带着李玉清去办事处，并把我事前去办事处附近侦察了解的周围环境、道路交通情况，对她详细交待清楚。我俩走到距办事处不到百米的大路边，我停在那里告诉她：前面那栋楼就是办事处，门口有哨兵，楼前走动的穿便衣人是特务还是老百姓弄不清楚，嘱咐她机动灵活，小心从事。万一遇到麻烦，就迅速设法脱身回来，我在路口上等她。

李玉清朝办事处走了一段路，又转回头迅速向我这方向走来。我看到她往回走，也迎着她向前走，到人多热闹的街上，确知后面无人跟踪，才和她走在一起。她告诉我，大楼有好几个门，不知道进哪个门。楼前有一些不三不四很可疑的行人，害怕出事，决心回来跟大家一起走。就这样，我又带她与大伙会合，乘船离开汉口，顺长江东去。

三

长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远眺天水相连，直接天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思绪万千，无心欣赏。只想着此行如何战胜恶浪，返回“家园”。我们租的船不大，类似舢舨，依靠人力划桨摇橹，白天走夜间停，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一时谁也说不准。

小船起航后，我们就商量从哪里转道赴苏北。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路线比较熟。主张从上海转，有些同志们认为上海

“太远”，近期情况如何难以估计，不如到南京看情况再定。当晚船停黄石港附近过夜，那里有很多民船，估计国民党军警不会查船。谁知与我们估计相反，夜里国民党军队查船来了，好在只是验了身份证，简单盘问几句，随即离去，我们安全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黄昏时分，船抵九江附近，我们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过夜。不料刚吃完饭，就窜来四个国民党乡公所派来检查的武装人员，硬说我们这群人来路不明，我们出示证件也不行，非要带人到乡公所问话。他们留下两人看守船只，两人带我去乡公所。乡公所的副乡长兼会计向我问话，他一开口，我就听出他是宁波口音。我就告诉他我是宁波人，抗战开始逃难到河南信阳做买卖，现在是回宁波老家。还拿出一些钱给他买烟吸，希望他能照顾老乡。他高兴地接了钱就连声说：“好说，好说。”就让我走了。

有了这次经历，我们吸取教训，每晚都把船靠在大城镇岸边过夜。这些地方停靠船多，虽有国民党地方武装盘查，但大都马虎了事，有些地方还根本无人过问。就这样，我们平安地到达南京。

四

我们到达南京时，天色尚早，岸边船只甚多，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我和韩光甸上岸了解情况，从买的一张地图上，知道可经仪征县进入解放区，同时打听到每天上午9时有一班轮船从南京开往仪征，还专程到江边进行实地考察。摸清情况，回到船上后，就决定翌日乘轮船去仪征。

次日早晨，我们排队买票登船，起航不久，就有官兵验票，检查乘客证件、行李，因为乘客较多，检查比较简单，我们又混

过了一关，顺利到达仪征。

轮船在码头停稳后，旅客蜂拥离船上岸。我们混在旅客中间，避开岗哨的盘查，分散绕道城边向北行进。沿途看见不少国民党军的巡逻兵，气氛显得很是紧张。我和韩光甸绞尽脑汁也没找到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哨卡的办法，为难时刻，迎面来了个50来岁的老汉推着一辆独轮小车，车上只有几根粗绳，别无他物。显然，是搞运输的车。我就问推车老汉，可否送我们到毛家集？老汉注视我一会说：“前面没有毛家集，只有谢家集、金集和陈集，你搞错了！”并告诉我北边是共产党新四军的地区，这边是国民党地区，双方都不让人随便过去，国民党这边盘查更紧，不光要证件，还要军队的通行证。你们可要小心，不要惹出麻烦来。老汉这一席话使我们倍感担心，还有些紧张。我表面镇静地告诉老汉，我们从上海来，到淮安探亲戚的，对这人生地不熟，还请大爷照应。我们想多出点钱雇你的车，把我老婆孩子送过去，老汉看我和气诚恳，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告诉我说，他知道一条小道，能避开国民党军的哨兵。他家住金集，经常和新四军打交道。他推车跑运输，常走这条路，有时也送国军哨兵点烟钱，同他们混熟了。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方便。我们和老汉沿着小道边走边谈，很快就越过封锁线来到了解放区的前哨区。两位便衣哨兵带我们到检查站，一位干部确认我们是中原来的干部后，让我们赶往大仪集过夜。我们同独轮车老汉结账道谢后，怀着回到“老家”的喜悦心情，欢欢喜喜走在解放区的大道上。

两天以后，我们顺利到达高邮县城。先期到达这里的五师一位锄奸科长受命接见我们，他说，中原已来电报，我们的组织关系已经转来。传达领导指示：李玉清由其丈夫周庆鸣接走，韩光甸夫妇和我的一家，在这里稍事休息，即刻启程去临沂华东局新四军军部报到，转调东北工作。至此，我胜利完成了中原地区领导交给我带领7人化装突围的任务。

化装突围追记

肖 仁

1946年5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拿着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弄来的国民党乡公所的通行证，在湖北省孝感县徒岗埠附近，由当地两位党员同志护送，走上汉（口）宜（昌）公路，开始了化装突围的行程。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们决定不到汽车站去买票，采取在公路上拦车的办法乘车。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流行，乘长途公共汽车只要给司机一些钱，你不用管买票查票的事，他负责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三人就用这办法，坐上了开往汉口的汽车。中间经过了许多汽车站，每站都有人上来查票，但是，不用我们张口，都由司机和查票员耳语一阵就放行了。大概他们是共同作弊，就这样在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到达汉口。

汉口，本是我生长的地方。抗战八年，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实指望胜利了能过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但这美梦完全被蒋介石打破了。一踏上汉口的土地，就使人感到气氛紧张，军警戒备森严，街上宪兵警察巡逻不断，在居民中实行“联保连坐法”，规定凡隐藏“奸匪”不报者十家同罪。旅店昼夜有完兵盘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住到郊区一个菜农家里，他是护送我来的一位党

员的亲哥哥，并且是当地的“甲长”。我们问他：你不怕我们住在这里给你惹祸吗？他说：老百姓恨死国民党了，谁还按他们的章程办事，我当“甲长”还不是无可奈何的事，应付应付完事。你们住在我这尽管放心，保证平安无事。由此可见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是多么不得人心。

按照预定计划，我应从汉口坐船去南京，可是当时买船票十分困难。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要从重庆迁往南京，交通非常拥挤。招商局的船票，早已被达官贵人们预定到第二年了。一般人休想坐轮船。至于我们更没有福分坐上轮船。但不走是不行的，而且得快走。只好托送我来的两位同志到街上找关系买了一张由小火轮拖带的木船票。广告写着：当晚开船直放南京。可上船后拥挤不堪，船已是满载了。但是，贪心的船老板为了多赚钱，还要卖票装人。当晚船没有开走。乘客多是国民党的的小公务员、学生、教员，也有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退伍军人。我们的同志也有十几人在船上，虽然有的相识，也装作陌生的路人。第二天早晨，船才在乘客的一片抗议声中向南京开去。但是，并不是直放南京，而是沿途见码头就靠岸装人装货，为了多赚钱，不顾乘客的安危。尽管乘客中有人为此叫骂不休，甚至还有国民党下级军官，把船老大的衣服都撕破了也无济于事。原来这艘船的老板是日伪时代武汉的大汉奸汪步青。胜利了他逍遥法外，并在国民党的保护下当起阔气的船老板来了，赚钱是他的惟一宗旨，乘客的安全他却无动于衷，真是令人恨之人骨。

到南京上岸后，我和同船的严叔端夫妇、苏化龙同志结伴同行。本来想直奔中共代表团住处，但听到同船的一位地委书记说：还是到上海找地下党关系好。南京中共代表团住处，国民党特务一定监视得很严密，难以进去。于是我们四人就乘火车去上海。下车后就住在北站大旅社。说是“大”旅社名实不符，旅社又小、又臭、又脏。资本主义的虚假性在上海表现得很突出。

住下后，我们即关门商议如何对付宪兵的盘查。决定把我和苏化龙同志到南京为止的通行证烧掉，只用严叔端同志一张证明携带家属去天津就业的通行证，因为上面没有注明人数，有漏洞可以利用。正当我们烧通行证的时候，房门被拍响了，我们赶紧把纸灰扔到窗外，不慌不忙地打开门，进来两个宪兵，严叔端同志就把通行证给他们看，他问苏和我是严的什么人？严说是他的表兄弟一同去天津的。宪兵又问有通行证吗？严说都写在一起了。有一位宪兵是武汉人，不知什么原因，他听了我们说话的口音后就拉起老乡关系来了。他关心地说：在这年头出门最好每人一张通行证安全方便。我们谢谢他们的关照，他们很高兴地走了。当天晚上，由苏和严到霞飞路余庆里找到生活书店的一位同志，请他转告潘梓年同志，设法送我们到解放区去。那位同志要我们等一天听信。等到第二天晚上，再去找那位同志，他说形势很紧张，你们去不了苏北了，赶快回南京找董老去。他给了我们一些路费，我们又连夜返回南京。由于我们在上海走得太急，忘了问清南京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到了南京不知到哪里去找，只好在下关先找一家旅店住下。正愁无处寻找的时候，恰巧门外有叫卖报纸的声音：“看×××拜访中共代表团的报！”我即跑出去买了一张，上面写着梅园新村17号和35号是中共代表团的住址。于是四人一商议，决定由我去找。我记得梅园新村可能是一个四方形坐西朝东的建筑群，房屋是一排一排的，门牌是单双号分开的。当我走到15号时，以为下一间一定是17号了，可是映人眼帘的却是19号。再走过去到了33号，我想隔壁定是35号吧，谁知又是大失所望，那是37号。17号和35号到哪去了呢？国民党要搞什么鬼名堂？我心里在不断地咒骂国民党，脸上却要装得若无其事。周围国民党的军警宪兵很多，稍有不慎即可能引起敌人怀疑，引出事故。我不停地向南走去，向西一拐再转入北边的街道，又向东走了一会儿，发现有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是35

号，大门半掩着，我前后看了一下，见附近无人，就大踏步推门冲了进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同志，他很沉着冷静，而我是既紧张又极兴奋。心里说：党啊！我可找到您了。像久别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里的幸福感情在我全身激荡。当我一口气向他说完情况后，中年同志招待我喝水休息，他上楼去向董老汇报请示。大约十多分钟后，他下楼来对我说：董老指示先把你们四人安排到新华日报社去住，到解放区去的事以后再说。他立即派了一辆吉普车，陪我到下关去接我的同伴。车到旅店门口刚停下，我跳下车就飞奔向店内跑去，高兴使我忘记了那是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禁大声喊着：老苏老严！代表团派车来接我们来了！当我们刚搬完行李上车坐好，两个宪兵出现在我们车旁，司机把油门一踩，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甩下两个宪兵在原地呆望着。真险啊！要是迟开一步，让宪兵盘查起来就麻烦事多了。

我们住到新华日报社，真是回到了革命大家庭中，心情非常舒畅，每天给报社写写向外寄发新华电讯的信封。半个月后，接到通知，我和苏化龙同志扮作黄河水利委员会菏泽办事处王笑一副主任的随员。（王当时是冀鲁豫解放区的一位专员），以合法身份顺利回到华北解放区首府——邯郸。

怀念敬爱的刘子久校长

龙世华

我们敬爱的刘子久校长离开我们已整整 12 个年头了。每当我想起他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言词，不禁潸然泪下。敬爱的刘校长走了，在那个人们称为吉利的年月日（1988 年 8 月 28 日）走了。他走得那么从容而又匆忙，致使在外地出差的我们（陆彦林和我），未能赶上向校长送别。庆幸的是，在我们出差之前两月，曾去北京医院探望校长，那时，他躺在病榻上，头脑清醒，精神还佳。他谆谆地告诫我们要把“到中原去”这个课题继续搞下去，给当代青年以启迪。他说：你们当年是青年的先锋，走在时代前列，把这种精神不悔地传下去，对国家、对人民、对青年都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刘校长的这一席话，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原望他病愈后仍像几年前一样和我们亲切磋商有关问题。没想到这竟成了刘校长的诀别辞。待我们回到北京，只能在刘校长的遗像前留影凭吊了。

时代返回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正在豫西地区开展受降工作、时任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的刘子久同志，奉中央的命令，与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

委戴季英等，率河南军区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南下桐柏山，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及王震率领的由湖南北返的“三五九旅”会师。解放了桐柏县城，成立了河南军区和区党委，韩东山任军区司令员，刘子久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在这个地区开展受降和支前工作。

1944年底和1945年春，在大后方（蒋管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响应中共南方局的号召，纷纷奔赴各解放区。我们这批从重庆到新四军五师的青年，正在四望山李昌同志办的青训班学习。由于局势发展的需要，青训班学员组成随军工作团，随军开展受降工作。到了桐柏县城，我因患疟疾久病不愈不能继续前行，遂留在桐柏县城地方工作队工作。我被分配到高队长领导的城关镇第十保工作。任务是宣传我军有关政策，动员民众交粮（交款）支前，动员民夫随军出征，动员妇女做军鞋等。工作队定期汇报工作，有一次我汇报到第七甲（山区）工作的情况：七甲是二保的边沿区，只有一条仅够一人行走的小山路，两个甲丁一前一后陪我到七甲。做完宣传动员工作，已近黄昏，急忙往回赶。七甲距我队驻地有十几里路，甲丁每人背了一支大枪，我对他们十分陌生，是保长临时派的，让他们一前一后陪着我走，如后面的一个开枪打我，一枪就完蛋了。不让他们在后面跟着，又怕土匪出来无法对付。左思右想仍然只能照老办法走，走一段，我让他们两人互调一下，观察他们的动静，但还有两三里路才到队部，仍需他们送我。保长点燃马灯，有了亮光，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而且已经在平原地区，不那么恐怖了。回到队部，同志们正焦急地等待，见我平安归来才安下心来。当我讲述这段经历时，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一再告诫我今后不能再冒这种险了。没想到我这次冒险行动让刘子久同志知道了。有一天，刘子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详细了解第十保的工作情况，表扬我不怕苦和累，甚至冒险去做宣传动员工作的精神，谆谆告诫我：“这是战区，

敌伪顽势力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镇住了，隐蔽起来，随时都有搞破坏的可能，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子久同志，他是政委，我是小兵，那种忐忑不安，甚至带有点畏惧的心情，一下子被他那亲切关怀的言辞打消了。使我感到共产党的干部竟是这样的可亲，没有架子，并非高不可攀，对他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1945年12月中旬，我军主力部队奉命向平汉路东转移，并以宣化店为中心地区集结。同时建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把从蒋管区来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学习，当时任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子久同志兼任民大副校长。我从桐柏地区随王树声司令员率领的第一纵队转移到路东后，即在纵队宣传部的文工团工作。光山县解放后，随第二纵队转移的陆彦林（即陆明达）也随之调来一纵文工团与我会合。春节时，我们接到去民大学习的通知，宣传部长李心清和文工团长焦心河都不想让我们走，鼓励我们留下。之前，我和陆明达曾到一旅一团去体验生活，到群众中采集素材，已采集到30多首民歌民谣，正准备编写宣传材料，很想留下来。没想到上级来了命令，再三重申一定要我们去民大学习，于是我们赶在三八妇女节之前到达民大二队驻地黄家寨。当时民大正在掀起对延安辩论的“骡马路线”的热烈讨论，我们立即投入这一场大辩论中，觉得解放区的大学生活十分活跃和民主，与我们在蒋管区的学校生活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一到民大，就得知刘子久同志担任校长，而且就住在距我们黄家寨不远的校部。一个休息天，我和陆明达去校部拜访他。一进门我刚要问：“刘政委你还记得我吗？”没想到他立即叫出我的名字，并且问我：“你现在还打‘皮寒’（湖北地区把发疟疾叫做打皮寒）吗？那是很伤身体的，我这里有几盒女性荷尔蒙，你拿去让卫生员给你打打补补身子。”在当时，解放区医药条件很差，药品很缺，听了刘校长的话，看到他给的针剂，一股暖流直通全身，陆明达和我

都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刘校长问我们有关学习辩论的情况也不知怎么回答了。刘校长像慈父一般爱护关心我们这些年轻人，使我们真正体会到宣传材料上说的：共产党的部队里真是“官兵一家”。

此后，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各自东西，再也没有刘校长的消息，更不用说见面了。1953年秋，我们作为新华社培养出国记者的第一批学员，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法文，当时的学院就在颐和园西边原华北局的大院内。某星期日，我们领着孩子到颐和园游玩，在昆明湖边的佛香阁前，遇到刘校长。他穿一身洗旧了的蓝布中山装，戴着一顶蓝布帽子，看上去像个老工人模样，他身旁还有一位老年妇女，衣着朴素，像是农村来的农民。我们真有点不敢认了，因为刘子久同志当时已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了，我们正愣在那里想问又不敢问。刘校长一眼就认出我们，并主动介绍说，这是他的婶婶，从山东老家来的，今天陪她来看看颐和园。他看到我们领着孩子，十分高兴，让孩子叫他爷爷，对我们问长问短，互通了点信息就分手了。

这一别就是30年，一直到1983年他搬到崇文门西小街一号居住，正好和我们的亲家张光年是隔壁邻居，我们就近拜访了刘校长。此时的他，已经满头白发，完全苍老了，这就是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结果。但刘校长见到我们时，心情十分愉快，问了一番我们的情况后就把他在1982年写的《纪念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创建36周年》的诗给我们看：“当年逐鹿中原，宣化店旁设教坛。民主建国为宗旨，政治思想要领先。”同时把重庆红岩纪念馆的邓棱、张鲁两同志介绍给我们。他们两人当时来京主要是为搜集原中共南方局青年运动史资料，联系筹备召开青年运动史座谈会等事宜。邓棱同志谈到，中央组织部已决定成立原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此后，在刘校长的主持下，多次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磋商，会同北京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几个同志：韩达、万

青、万孝信、宋锦祥等组成筹备小组，负责征集《到中原去》这个专题的组稿编辑和到中原去的数百人名单的搜集工作。刘校长一再指出：这批青年是在党的“七大”之后、“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时刻，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到敌后去的。他们的举动是真正的不平凡，是去和敌人战斗，而不是旅行一样，走了一圈又回来，那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历史就是这么写的。他还指示说：第一，写回忆录一定要真实，不能有半点虚假，筹备小组一定要负责审查；第二，召开座谈会人数不能太多，50~100人足矣。《到中原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校长为此书写了序言和《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两文，还写了《到中原去》诗二首。其一：立志到中原去，决心抗战到底，豫鄂边区打游击，风餐露宿草履。“九·三”日寇投降，重庆国共谈判。和平民主望实现，民建大学兴办。其二：中原突围旌旗，直指汉江两岸。武当秦岭鏖战激，锁住蒋军十万。随军突围参战，经受严峻考验。幸存目睹庆凯旋，历史谱写新篇。刘校长还为这次活动专门给李先念同志写信，请求关注与支持。

1984年4月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大聚会。全国各地能联系上的校友差不多都来了，大家欢聚在北京师范学院教学楼内，刘子久、李昌、马兆祥等当年的领导都到场。最难得的是当年在重庆南方局青年部的负责人张黎群也来了，他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说：“马兆祥同志是你们这一批精英的接收大员，而我是招兵的输送大员。你们是周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培养出来的尖子。当年，党是把你们这一批青年作为党员输送到解放区去发挥作用的。这些经历经验值得很好总结。”刘校长在会上作了简短发言，他说：“你们是‘忧而学，专而行。’前一段大家走的不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风雨同舟走过来了；今天五湖四海来相聚，很难得，大部分都已离休了，祝大家安度晚年。”会后大家合影留念，校长却匆匆走了，没有参加大家的聚餐。

刘子久校长为这次难得的聚会和《到中原去》一书的出版操够了心，我们多次在他家里开会，商讨筹备事宜，几乎每一步都是在校长的具体指导下筹划决定的。他在《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一文中写道：“这是从大后方来的学生，冒着被捕、坐牢、以致杀头的危险，投奔到当年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区，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社会。理想高尚，意志坚定，目的明确，没有什么个人的打算。而这些品德正是今天为建设两个文明为己任的现代知识青年所必不可少的。”读着刘校长的这些诗、文，翻阅着当年的日记，校长的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再一次在我的脸颊上流淌。刘校长，敬爱的校长，我想念你，你将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的心中。

怀念杨学诚同志

须浩风

每当我回顾近六十年前抗战时期在豫鄂边区那段艰苦历程的时候，就想起杨学诚同志。他是最难忘的领导同志之一，他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时，我在他直接领导下任干部科长。他也是我最亲近的学长，我俩曾是清华大学 1934—1937 年的同级同学。直到现在一提起他，当年新四军五师、豫鄂边区的战友们，没有一个不爱戴他，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艰苦卓绝、克己奉公、调查研究、善于思考、及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优秀品质。他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是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学诚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是：

一、在清华大学，他读物理系（后改读哲学系），我读化学系，平时不相认识，但在“一二·九”救亡运动中，清华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开始参加的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人，为此开了一个群众积极分子会，近二百人，在一个教室里，学诚同志坐在左后角。会开到半中间的时候，身穿皮长袍的学诚同志站起来发言，讲述了“民先”在抗日爱国救亡运动

中的作用，鼓励有决心从事抗日救亡的先进同学，参加“民先”来起骨干带头作用。话虽不长，但说得头头是道，宣传鼓动作用很大，会后许多救亡先进同学参加了“民先”。

二、1938年他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期间，非常重视为发动敌后抗日的游击战争作准备，强调抓枪杆子的重要性。他把特委机关设在应城县乡下的汤池临时学校内，这个学校表面上是为失学青年补习功课，实际上是为开展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基层干部的。他把发动群众和建党重点放在应城县盐矿区内，后来武汉沦陷，由蔡松云（现名蔡斯烈）组织的第一批武装8条枪、13个人就是由他和沈少华（即沈德纯）从矿区带进大洪山的。进入山区以后，晚上他带头背枪单独在外放了第一个哨，这一行动，对大家影响很大。当时他身为中共鄂中特委书记，22岁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在茫茫黑夜中，周围情况不明，带头放第一个哨是十分难得的！他进山以后，非常注意发动群众，他提出组织“抗日十人团”，凡愿抗日的群众都可以参加“抗日十人团”，力量由小变大，为以后边区建军、扩军、拥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1939年末，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学诚同志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后又兼任豫鄂边区行政公署的党团书记。他善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1940年他经过对农村党员的思想调查研究后，发现一些农民入党后，在困难条件下，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很突出。入党为了保产，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有的甚至动摇。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在区党委办的党刊《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反对中农思想》一文，又在边区党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要警惕出新贵》的动人报告（后得到党中央陈云同志的赞扬），推动了边区农村党支部阶级教育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自私、狭隘、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对边区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四、1943年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面临转折关头，在党中央强调一切服从战争的指导思想下，为了应付豫鄂边区敌情十分严重的艰苦环境，学诚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强化政权的方针，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都纳入一切服从于战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工作，这使地方建设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五、他为革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3年冬，学诚同志受区党委的委托，和刘少卿参谋长一起去开展鄂南新区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他操劳过度，营养很差，在鄂南病倒了。回到边区党委以后，经医生检查，发现了肺结核，肋膜炎等病。他瘦得不成样子，领导要他休息，但他忍着病痛，用最大的毅力把鄂南工作总结写了出来，向干部们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疼痛得满头大汗，大家都劝他下来，但他一直坚持到讲完。从此他卧床不起。区党委派了医生、战友专门护理他，并派地下交通到武汉去买药为他治病。他经常对护理他的同志讲：“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他的母亲、弟弟、妹妹来看他，他不让他们住下来，要他们快回家，坚持不让他们接受路费。他在病中听到他的女友由于和他长期失去联系而和另一个同志结婚了，他叫人把她的照片取出来，边看边笑着说：“我胜利了！”（他和他的女友过去分别时，曾互相立下誓言，要等到胜利再结婚），大家听了很感动，都说学诚同志是很有道德的人。由于战时边区医疗条件差，虽经党组织和医务人员尽了很大努力，1944年3月病魔终于夺去了他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去世时仅29岁。豫鄂边区的干部、群众对他的去世，无不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许多同志痛哭流涕。出葬的时候，大家争去抬棺。在追悼会上，五师副政委任质斌同志致悼词，给了学诚同志很高的评价。

大洪山上的松柏长青，杨学诚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5 年秋，我去学诚同志的墓地悼念他，写了以下留言：
“学诚同志，你是今天我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学习的光辉榜样！”

一纵队文工团的姑娘们

王培德

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虽然和一纵队文工团的姑娘们，只同行了一段极为短暂的路程——只有 60 多天，但她们的英姿，她们的音容笑貌和一件件往事，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是 1946 年的春天，我和一起参加革命的高中同学范兆林在豫鄂边区民主建国大学的预科学习。此时，中原军区上空战云密布，突围已不可避免。4 月底的一天，预科领导征求我俩的意见，是化装转移还是随部队突围。我们果断地回答：“跟随部队突围。”于是我们被分配到了一纵队文工团。此时一纵队驻在河南光山县泼陂河镇。我们于 5 月 3 日到达文工团。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正是多梦的年龄。我一出校门就到了解放区，没有进入过社会，思想单纯。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受影响颇深，对人生充满了好奇、幻想和浪漫色彩，似乎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有阳光、有鲜花、有歌声。未曾想到过会有荆棘、会有暴风雨、会有痛苦和灾难。现在我来到这个集体，这个用歌、用舞、用戏剧来歌颂英雄、歌颂人民、歌颂革命、歌颂人生中的真、善、美；揭露敌人的凶残、丑恶、必遭灭亡的文艺团体，我

是非常高兴的，更何况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文工团共有 13 位姑娘，除 3 位年龄稍大外，其余 10 位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在我的眼中，姑娘们个个都靓丽标致，除身材容貌出众之外，各有特长。有的演技高超；有的歌喉嘹亮、婉转；有的舞姿婆娑、活泼；还有的长于做后台工作。所有的姑娘都朝气蓬勃，工作积极热情，充满了青春活力。13 位姑娘中，范玉洁、赵明珍、戴敏和刘星 4 位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战士。其余 9 位，龚若青、龚必明、沈文情、黄琪、陆方、何冰、孙卉、范兆林和我，都是 1945 年春、夏季响应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的号召，从蒋管区的重庆来中原解放区的。

1945 年春天，一批随王震南下到中原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盛行于延安的秧歌舞和秧歌剧，于是中原军区各部队掀起了扭秧歌和演秧歌剧的热潮。我到达文工团时，文工团正在排练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和小秧歌剧《一朵红花》。《周子山》的女主角由龚若青和沈文情分别扮演。她们两位都是在抗敌演剧队长期从事演出工作的演员，演技高超，很有舞台经验。《一朵红花》的女主角则由全文团最漂亮的两位姑娘黄琪和刘星分任 AB 角。黄琪是来自四川成都燕京大学的学生。她，大眼睛，皮肤白皙，长相清秀，举止言谈活泼大方。在燕京大学学习时，颇受男同学的倾慕，她投身革命到解放区时，曾有一位男士穷追不舍，跟随而至，也到了解放区。但黄琪是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姑娘，在个人的事情上决不迁就。在民大学习期间，一位领导干部也喜欢她，她到了一纵队文工团后，这位领导干部发来电报，邀请她共同和平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但她拒绝了，她决心随部队突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刘星则是另一类型的姑娘。她脸型椭圆，肤色微黑，红润，一双不太大的眼睛清澈明亮、灵活，睫毛浓密。小小的嘴，红红的唇，笑起来略带羞涩。据我的观察，她是文工团在政治上、业

务上培养的重点。她演技平常，但导演却非常耐心地指导她。

此时文工团的活动就是加紧排练这两出戏，我们驻地的村后和村旁有几棵大树，大树枝繁叶茂，树下是有大片浓荫的草坪，这就是我们的排练场。几乎全天我们都在这里排练。

晚饭后，除开生活会和政治学习外，是自由活动时间。村前紧靠着一个大水塘，塘对岸的堤埂很宽阔，长满了青草，喜好唱歌的团员就自动集合在这里，由龚若青指挥唱歌。此时星光闪烁，月光如银，稻田里蛙声咯咯，萤火虫在田间、草地飘来荡去，夜空中弥漫着禾香、花香。阵阵清风驱散了白天的暑气。不愿唱歌的团员三三两两地漫步谈心，或独坐塘埂欣赏夜色。歌声、明月、星光、清风使这温柔的夜充满了诗情画意。

当剧目排练好后，文工团就为驻扎在泼陂河的部队机关、连队和群众演出了几场。6月初李先念司令员来泼陂河时，我们曾为他演出专场。之后，我们就下部队演出并帮助连队开展秧歌活动和教部队唱歌。

6月24日晚，文工团正在三旅九团演出时，突然接到上级急电，命令我们火速赶回驻地。回到驻地，才知道部队要立即突围，于是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连夜赶制干粮，归还所借群众的物品，轻装。26日傍晚，我们集合在村头，告别依依不舍的乡亲，背起小背包，颈上挂一袋炒米就出发，走上了突围的征程。从此，突围改变了13个姑娘的命运，姑娘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文工团随纵队机关往西，向平汉路进发。开头几天，烈日炎炎，我们汗流浹背。29日夜，突然下起滂沱大雨，经一夜行军离平汉路已不远。30日白天休息，夜晚继续行军，向王家店前进，预定当夜就从王家店突过平汉路。但由于雨后路滑难行，机关又没有组织好，致使道路堵塞，行军队伍分成好多路，一齐向前拥进。文工团只好从田埂上、稻田中往前赶。整个机关行军的

速度极慢，以致一夜行军，离王家店还有几公里时，已是7月1日清晨。此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住我们。情况十分危急。纵队领导决定7月1日白天冲过平汉路封锁线。为适应这新的情况，文工团重新整理队伍，组成了新老搭配的互助组，一个老同志搭配一个新同志共同闯过封锁线。在铁路两侧，二旅四团部队浴血奋战，摧毁敌人的碉堡，击退敌人的装甲车，撕开一条血口，我们才得以在敌人的枪弹、炮弹横飞中，冲过铁路，跨过小河，进入铁路西的丘陵地带，跳出了包围圈。到宿营地清点人数时，文工团竟无一人伤亡。

部队继续向西前进。两天后，文工团传达上级决定，为减轻战斗部队的负担，要精简纵队机关，文工团撤销。并动员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和有关系的、体弱的、年纪小的女同志化装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凡留下随部队突围的，男同志下连队，女同志到旅、团工作。沈文倩约我同行化装转移。龚若青、龚必明也决定化装离队。

文工团将尚未用过的新幕布撕给女同志每人一块（足够做一套衣服），发给每人两块银圆做路费，并提供给我们一个在武汉的关系，这个关系名叫施惠，是民大的学生，我认识他。我利用行军的间隙向老乡换了一套粗布旧衣服和一双旧绣花鞋。7月6日，部队在随县淅河镇外的村子宿营，淅河镇位于淦水岸边，有船通武汉，7日是淅河的集日，四乡群众都要去赶集，正好可混入人群到河边搭船，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这里离队。

沈文倩比我年长几岁，广东人。她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蒋管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不少地下党员共事或相识。1944年她奉命转移至重庆，那时她名叫李若。因国民党一直追捕她，所以党组织批准她于1945年转移到中原解放区。她的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擅于调查研究，更长于接近群众，搞好群众关系。在语言方面她也有专长，她虽是广东人，但却能说一口

湖北话，甚至连当地的方言、习惯语都说得很好。当夜她就对淅河镇周围村子的名称、交通及其他情况进行了调查，做了充分准备，以防不测。

7日清晨，我们告别了相处两个多月的战友们，他们出发继续西进，我和沈文倩则化装上路，从此我就和那11位姑娘天各一方了，有的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有的也只是在20多年后，各自历尽沧桑，尝遍酸甜苦辣后才再次相逢。沈文倩将长发在脑后梳成髻，扮作我的姑妈，此时我仍是一口四川话，一开口就会露馅，所以我们约定，路上不论遇上什么情况都由她出面应付，我不开口。在前往淅河镇的路上，我们遇见一个忠厚的老人，他自愿为我们带路。我们跟随他混入人流进了小镇向河边走去，突然城门口的两个国民党哨兵喝令我们站住接受盘查，多亏沈文倩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充分的准备，再加她一口地道的湖北话，她镇静地把哨兵的注意力引向她自己，从容地应付哨兵的盘查，才使我们得以脱身。在河边，我们又得到一对老年夫妇的帮助，用小船将我们送往长江埠。我们沿岸步行60里到达蔡甸，再搭乘小火轮到了武汉。在汉口我们又得到沈文倩的朋友——演剧第九队的导演及其他朋友（均为地下党员）的帮助，通过他们又找到了民大同学施惠。此时，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道路是否走得通还没有把握，贸然前往有很大风险。因此施惠建议我们暂留武汉工作。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溯长江而上回四川老家；留武汉工作待路通了再走，这两条路最便捷安全。第三条路就是硬闯，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但前途未卜，风险最大。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解放区的路，我们甘冒风险，不管前路有多少险阻，我们也要去闯。演剧九队的朋友们和施惠为我们搞到通行证，筹集到路费。此时我们改扮成学生，借口要到北平上大学，从武汉到北平必须经过晋冀鲁豫解放区。我们坐上火车，途经郑州、到达安阳，铁路到此中断。我们改乘大车，出安阳不远就到

了蒋管区和解放区的交接处，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检查就进入了解放区，21日到达磁县。从离队到到达解放区只用了14天时间。当时我只是一个极为单纯、毫无社会经验、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多亏了沈文情的带领，我才能如此顺利地回到革命队伍。应该说我们是文工团13个姑娘中最幸运的两人，此后，沈文情留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而我，则被送往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1947年5月，我被调回已北渡黄河在山西晋城休整的中原突围部队。后部队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十二纵队。纵队文工队成立时，我又被调入文工队。8月5日，我随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夜渡黄河横跨陇海铁路，涉过黄泛区，越过沙河、汝河、淮河，步行千里打回了中原，直抵长江边上。

1946年7月7日，龚若青、龚必明在我和沈文情离队不久，也出发了，可是她们就在浙河镇我们被盘查的那个城门口被俘了。敌人在抓她们时还狠狠地说：“刚才我们就放过了两个人，没能把她们抓住，真可惜。”这就是指的我和沈文情。从此，龚若青和龚必明就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吃尽了苦头。

龚若青，江苏苏州人，从1938年起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在抗日前线。这个战地服务团受国民党部队吴奇伟的领导。吴曾任湖南省主席，全国解放前起义，曾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当时他的秘书黄清宁、张风楼及政治部主任杨凡都是我党派人该部的地下党员。龚若青、龚必明被俘后，被关押在随县看守所。她们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威胁，坚决不写反动文章，也拒绝记者的采访。龚若青写信给黄清宁求助，黄清宁在征得吴奇伟同意后，以吴的名义发电给随县政府保释她二人。她们于1946年10月出狱，随后到了武汉，此时武汉中共办事处已关闭，她们找不到党，只好回到龚必明的老家长沙暂住。几位老战友热情地帮助她们，他们为龚若青缝制

衣服并筹集路费。于是龚若青独自一人去到上海住在亲戚家，并找到党在上海的办事处，要求党组织帮助她回到解放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2月，她和中原民大的4位同学一起，搭乘运送救济物资的轮船，到了山东解放区，分配在山东省粮食局工作。全国解放后，调潍坊专区供销社任计划科长。从1956年起一连串打击降落在她头上，她遭受政治迫害，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并被迫离婚。“文革”期间又一次被迫害，在“五七干校”劳动3年。在前后共达20多年的时间里，她尝尽了人间的辛酸，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孤身一人忍受着各种磨难，有苦无处诉，有泪只能暗地里流。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她退休回到苏州与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虽然她受了那么多委屈，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没有了党籍，但她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先后担任过居委会和街道的工作。党的三中全会后，1981年她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并改退休为离休。此后她担任了街道党支部书记。在休息后的20多年中，由于她思想好、工作好，作风好，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三八红旗标兵，获江苏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并获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及平江区优秀党员称号。她还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委员。

龚必明在回长沙后，参加了长沙地下党组织。全国解放后，任湖南省妇女干校副校长职务。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没能逃过劫难。她遭受迫害，在下放干校劳动期间，患了急病，但造反派不让抢救治疗，以致含恨而死。

我们四人离队后两天，文工团的其余9位姑娘和全体男团员就分头下到了各旅、团，从此一纵队文工团不复存在。分配在二旅的是孙卉、陆方和何冰。她们随二旅渡过襄河后，进入了武当山区。一纵队奉党中央命令，在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成立了鄂西北军区。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她们3

人分配到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做宣传、群众工作。鄂西北地区山高岭大，地旷人稀，土地贫瘠，人民穷困，环境十分艰苦。敌人调集重兵对我军围追、堵截、设伏、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我军。我部队日夜与敌人周旋，拖住了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部队。

1946年在枪炮声中过去了，此时形势愈来愈严峻，严冬笼罩着鄂西北地区，大雪飘落在田间、山林。部队缺吃少穿，单薄的征衣抵御不住严寒的侵袭，常常没有食物充饥。不少体弱的同志生病了。为了适应这严峻的形势，保存实力拖住敌人，分区决定将部队一分为二，孙卉和陆方分在一个队，何冰分在另一个队。孙卉本来身体就较弱，疟疾复发，每天带病行军，更为不幸的是她又得了痢疾，高烧不退，无法随部队行动，领导只得安排陆方陪伴她到山区隐蔽。她们离队后，找不到人家投靠，就躲藏在--个山洞里。这里，荒山野岭，远离村落，整天群山寂寂，没有行人。陪伴她们的只有刮过洞口的寒风，天边的残霞冷月。她们得不到群众的帮助，病情继续恶化，孙卉去世了，她年轻的生命熄灭了，这时她只有23岁。孙卉是河南郑州人，在西安读完高中后，去到重庆，1945年8月，响应党的号召到了中原解放区，在纵队文工团时和我住在一间宿舍。她身材较为高大，沉静稳重，不爱多话，眼睛略为近视，她能唱一口相当棒的河南坠子，很受听众欢迎，在民大学习期间，每次的联欢会上都少不了她的演唱。在鄂西北行军途中休息或到宿营地时，同志们常要求她唱一段，她总是有求必应地引吭高歌，赢得阵阵喝彩声。

陆方比孙卉年龄稍大，出身于上海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是武汉大学学生，也是1945年夏天到中原解放区的。她个头娇小玲珑，眼睛近视，戴了一副眼镜。她长相秀气，皮肤细嫩，举止温柔文静，说话慢声细语。孙卉去世后，她用手、石块和着悲痛的眼泪掩埋了患难与共的战友的遗体，然后独自下山寻找食物充饥。她不幸被俘，关押在兴山县的看守所。后由她上海的家人保

释回家。全国解放后，任湖南省青年团宣传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此时，分配在另一队的何冰，仍与部队一起转战在崇山峻岭中。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避免和敌人作战，部队每天都要转移几十里地，白天躲避在深山老林，坐卧在厚厚的积雪上。待黄昏时分，才出林下山，转移二三十里宿营。此时何冰上身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衣御寒，下身却只着一条单裤。累、饿、冻，何冰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夏天患过的疟疾又复发了，隔一天就要发一次烧。1947年2月的最后一天，凌晨两三点钟，部队遭敌人突袭，何冰和同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紧紧跟随部队转移。由于天太黑，路太滑，她们摔了两跤就掉队了。她俩不幸被俘，先关押在谷城石花街监狱，后转至老河口集中营。

何冰，广西人，身材瘦小，聪明、活泼、能干、思维敏捷，长于思考。从被俘后，她就一门心思想要逃跑归队，她仔细观察集中营管理人员的言谈举止，思索和分析其中的含义。整天捉摸着逃跑的可能和办法。此时全国战局已发生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8个月的英勇奋战，已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为扭转败局，急忙抽调兵力对陕北、山东地区实施重点进攻。此时老河口正在抢修机场，由于劳动力不够，就将集中营从集中关押营地临时搬往机场附近，以便利用男俘到机场劳动。因此处没有集中关押的场地，只好将被俘人员分住在老百姓家中，每四人住一户，又因抽不出兵力看守，所以没设岗哨，俘虏们可以到厨房打饭，自由上厕所，厨房工作也由被俘人员担任。一天晚饭后，何冰在厨房偶遇民大同学刘炬，刘炬因手臂摔伤而被俘，现在在另一队的伙房当采购，他借此之便到各队悄悄找人联系。他告诉何冰，已有10多位同志逃跑了未被抓回，他正要逃走，问何冰敢不敢逃。何冰喜出望外，果断地回答：坚决逃走，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约定分头准备，下次见面就是逃跑之

时。3月18日，这个何冰永生难忘的日子，午饭后她到伙房时，见刘炬正站在门口，刘炬向她微微点头，用眼光示意麦田间的一条小道，何冰立刻领悟了。为免人怀疑，她装着上路旁的厕所，然后从厕所后面上了小道。刘炬迅速赶上来，在一所空房里，他们迅速脱去号衣，穿着号衣内的便装，快步走进远离集中营的树林。他们终于逃离了牢笼。到达武汉后，在民大同学张国祥的帮助下，他们到了上海，何冰在一个老乡的书店里安身。一天在街上偶遇同在一纵队文工团的范玉洁，通过她，何冰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安排下，她们于1948年5月回到了江汉军区。

现在说说范玉洁。她是1941年入伍的老战士、老党员。文工团解散时，她和黄琪、刘星3人分配到了三旅九团。在随部队渡过襄河后，她和“七七报社”的女同志郑志文一起化装离队。她本是湖北汉阳蔡甸人，因此语言方面没有问题，而且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她的叔父已先她而化装到了汉口，和地下党有联系，帮助掩护、安排过往的同志。有如此方便的条件，因此，在路上虽也遇到敌人的盘查，但她们从容镇静地都一一应付过去了，顺利地到达了汉口。在叔父的帮助下，范玉洁去到兰陵剧场话剧团做杂工作为掩护。此剧团的负责人应云卫是中共党员。后来特务追捕她的叔父，她叔父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上海，她也随剧团转移到了上海。她和何冰、郑志文等人一起，于1948年5月经党组织安排回到了江汉军区。

关于分配到九团的黄琪的情况，我是从九团政委周凯那里听说的。1947年8月我随十二纵南下“打回中原老家”，抵达平汉路东时，一天周凯来访，他是专程来谈黄琪的情况的。他知道我和黄琪在到中原解放区前都在成都念书，而且同在一纵队文工团工作。从他口中，我才知道黄琪已在突围中牺牲了。在牺牲前已和周凯在患难中结为终生伴侣。黄琪最初是在九团政治处工作，1946年9月组建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九团属第三军分区，

黄琪调任分区政治部秘书兼做宣传、群众工作。她一如既往，工作十分积极努力，对自己要求严格。她虽然身体单薄瘦弱，但从不接受特殊照顾。不管行军多苦多累，一到驻地放下行李就编写宣传鼓动材料、做群众工作。机关、部队的同志们都喜欢她、敬重她。1947年春季的一天，部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一颗炮弹击中了她，她倒下了，满腔热血喷洒在被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践踏、饱受蹂躏、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上，她的鲜血滋润着这千疮百孔、渴望解放的土地。黄琪，这个正处在如花年华，才貌出众的中华女儿，为自己的理想，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时她年仅22岁。周凯在谈到她的牺牲时，悲愤、痛惜、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表示，在四川解放之后，他要到黄琪读书的成都去工作。后来全国解放后，他果然去了成都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没有离开过成都。

分配到三旅八团的3位女团员是戴敏、范兆林和赵明珍。在部队渡襄河时，三旅旅长闵学胜率领八团部队掩护纵队机关过河，纵队机关、二旅、三旅七团、九团及八团机关的部分人员都过了河，可是闵旅长和八团部队却未能过河，后来转战到了豫鄂陕地区，这3位姑娘中，只有戴敏随八团机关渡过了襄河进入武当山区。戴敏是河南信阳人，抗日战争期间，她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工作，父亲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几个哥哥是新四军战士，1942年她年仅15岁就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名女战士，并于1943年入党。一纵队强渡襄河后，敌军沿途阻击，都被我军击溃。在谷城石花街附近遭敌夹击，经过3小时激战后，歼敌300余人，取得了突围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从8月底起，敌人实施“清剿”，形势愈益严峻，斗争愈益残酷。戴敏和部队在一起经受着考验。部队几乎天天有战斗，有时一天打几仗。此时筹粮困难，他们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12月上旬，部队在房县东南天池堰一带遭敌伏击，经激战后，杀出包围。三旅再一次精简旅、团机

关，充实连队，戴敏也下放到了连队。戴敏在入伍后的几年中早已学会了打枪。所以她和连队战士们一起直接参加战斗。1947年2月，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部队在康家山遭敌人夹击，经过3天最为激烈的战斗，才杀出一条血路，突出敌人的包围。为保存有生力量，纵队决定日夜急行军东渡汉水返回大别山区。女同志在连队到底诸多不便，领导动员戴敏化装转移到别的解放区。戴敏偕同荆当远中心县委的一位同志到了枣阳。不久，刘邓大军南下中原，戴敏回到了中原部队。后来她随刘邓大军参加了淮海战役、贵州的剿匪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未能渡过襄河的范兆林和赵明珍，一直跟随闵学胜旅长转战在豫鄂陕地区。对赵明珍我了解的情况最少，而且直到现在我都未和她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只知道她随八团到陕南后，一天和另一位同志外出筹粮，不幸被俘。出集中营后，曾到华北解放区接受审查。再后来和原十三旅的一位作战副科长结了婚。全国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南充市银行工作。现在仍居住在南充市。

范兆林是一纵文工团13个女团员中惟一个始终没有离开过突围部队的姑娘。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在成都一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领导的读书会，一起响应党的号召于1945年7月奔赴中原解放区，一起在民主建国大学预科学习，又一起在突围前夕分配到一纵队文工团工作。未能渡过襄河的她，一直跟随闵旅长率领的八团部队进入了伏牛山区。后来这支部队和黄霖、张水泉的部队会合，合并组建成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转战在陕南豫西的山区。这里的熊耳山、伏牛山、崤山都是秦岭的余脉，山高林密，敌人穷追不舍，环境的艰苦是常人所以难以忍受的。范兆林以惊人的毅力下定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离开部队，部队打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在部队行军、作战中，她从不掉队。当她日夜不得休息，行军时困得睁不开眼

睛，行军速度放慢她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时，瞬间她就会猛醒，快步追上部队，而没有掉队。当她几天无食物进肚，饿得全身无力，挪不动腿，面对耸立眼前的高山时，她拄着棍子，手拉灌木枝条顽强地向上爬，没有掉队。当秦岭的风雪肆虐，严寒穿透她单薄的衣裳，她的肌肤如针扎般疼痛，大雪扑面打来，连睁开眼睛都困难的时候，她强忍痛楚，挣扎着前进，没有掉队。就这样，从突围的第一天起，她紧随部队走过了夏天，走过了秋天，走进了冬天，度过了7个月共200多个艰难的日日夜夜，行程几千里，她没有掉过队，始终是突围部队行列中的一员。

1947年1月，她随干部团，在太岳军区部队的掩护下，渡过黄河，终于回到了华北解放区。不久她就到了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

最后，我要说的是刘星。她是湖北沔阳新堤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五师。当年她是纵队文工团最漂亮的姑娘之一，文工团把她作为业务骨干培养。她随三旅九团进入鄂西北山区后。于12月被敌军俘虏，关入老河口集中营。她是文工团13个姑娘中惟一没有再回到革命队伍的女团员。1948年她家保释她出集中营后，她回到了新堤老家。她家乡的一个极其反动的保长不断找她的麻烦，骂她是共产党，威胁要惩治她，扰得她和她家不得安宁。其实1947年底，中原突围部队就已打回江汉地区，建立了江汉军区。以李人林为司令员的第三军分区就活动在她家一带，甚至，有一次三分区就有一支部队宿营在她家隔壁。但她的父亲十分顽固，目光短浅，怕她回到部队，就将她锁在家里。并托人将她带往外地，一方面而躲避保长的迫害，同时也便于阻止刘星回部队，可惜，刘星屈服了。在外地期间，曾有极短的一段时间她到了国民党的一个部队，在我军与该部交战时，刘星逃回了老家。此时她的家乡已解放，刘星找到她在解放军的一个舅舅，要求归队，但遭到了拒绝。从此以后，在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

她过着黯淡悲凉的生活。50年代，她在武汉一家街道装订厂找了份当工人的工作。街道把她视作动摇变节分子。在政治上，她受压抑、被歧视，在生活上，穷困潦倒，她的工资很低，1985年，她每月的工资才只60元。1994年1月，她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黯然离世。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我感慨万千。我们有幸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性时代；我们有幸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在中原突围中，两位姑娘牺牲、病故，刘星未能归队，我们其余的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随部队突围、化装转移或者被俘，不管经受多少艰难曲折，都想方设法地回到了党的怀抱，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我认为我们是华夏历史长河中无数优秀儿女中的一员，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即便是刘星，她也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工作过。虽然她曾一时软弱糊涂过，但终归很快地醒悟过来，要求归队。后来她虽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毕竟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现在我们幸存的还有8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都已年逾7旬，都已离休在家欢度晚年。我为已逝的战友献上我深深的怀念，祝愿她们在天之灵永远安息！并祝愿健在的战友们健康长寿，青春常在！

岁月如歌

——时乐濛和他的战友们

潘 成

—

1945年端阳节那天，我带着地下党员孟纪孔的介绍信，来到伊洛解放区的东赵堡参军。一踏入伊洛地界，最先听到的是歌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衣着朴素的八路军战士。我一下子就被解放区崭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给迷住了。我的眼睛有点使不过来。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从小就听说过的，神秘的，有着许多传奇故事的红军，心里好不激动。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衣，衣裤上大都补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年轻的脸膛，黑里透红。他们有的在帮老乡打场，有的在沟坎上割柴草。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歌既新鲜又好听。我跟着一个背着一大捆柴草，哼着歌的八路军战士走进赵堡庄寨门。他要转弯，就指着前面说：“你一直往前走，走到那个门楼那哒，往北一拐就到了。”在我和背柴的战士说话的时候，从我身旁走过去一个人，也是一身灰衣服，身材匀称，有点瘦。他用一双与众不同的黄眼睛回头看看我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伊川来的。”他说：“你到办事处找谁？”我说：“找翟衣萍（翟仙萍）。”到门楼那里，他指着一个小门脸儿说：“那就是。”声音有点沙哑。

找到翟衣萍，我从袂衣里抠出那封叠成一个小纸条的巴掌大的介绍信。翟衣萍看完信，一副十分欢迎的样子说：“你是南街的吧？”我说：“我是东街的。”他说：“东街怎么姓李？”看来他对谢庄挺熟。我说：“我不姓李我姓谢。”他“啊啊”了两声，表示明白了，说：“你以后就叫自己的真名吧，在解放区没事的。”他简要地给我讲了点革命道理，纪律和规定，特别提醒我：“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是要流汗的，革命是要流泪的。”就分配我到伊洛区办事处当通信员。还说：“董笑干同志也在这里。”董笑干是我的小学老师，我喜出望外。

中午，董老师带我到大食堂吃饭：油条、粽子。供给制，不要钱。那个给我指过路的人，打了饭，端着碗直奔我们的饭桌而来。他和董老师边吃边唠，还淡淡地跟我打了个招呼。他们的话我大多不懂。饭后董笑干问我：“你知道这是谁么？”我说：“他给我指路来的。”董说：“他叫时乐濛，‘西北角落’的音乐家。会作曲，提琴拉得可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提琴”这种东西，不禁肃然起敬。我在学校音乐不错，天不亮就跑到伊河边上练嗓子，长大想当音乐家。听说给我指路的人就是音乐家，感到特别的荣幸和自豪。后来我才知道时乐濛是酒后村人，离我家不远。他和董笑干、翟仙萍、孟纪孔等人，是我们伊川县最早的一批地下党员。

我在伊洛办事处的职务，名义上是通信员，实际上是勤务员，每天给专员张剑石和办事处主任翟仙萍送信扫地抹桌子打洗脸水。有时张专员翟主任已经自己把活都干完了，就说，“你们几个小鬼学文化去吧。”办事处除了我还有两个通信员，一个叫赵林东，另一个好像是叫陈芬。都不大。一天晚上我们嘻嘻哈哈

逗着玩忽听隔壁有人在唱歌，女的。细听不是，也不像留声机。我一下明白了：提琴！时乐濛在拉提琴。

我循声向时乐濛的房子跑去。赵林东他们也跟着去了。只见时乐濛穿条短裤，靠着门框，把那提琴用下巴夹住，像叼着一个踩扁的葫芦，架着膀子在一晃一晃地拉。我们直瞪瞪地仰着脸看。我见过京胡、二胡、三弦和风琴，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模怪样的乐器。弓子浮搁在弦上，动不动还拿下来掂着。赵林东比我早参军几天，他已经见过时乐濛拉提琴，所以显得很内行的样子：“这叫提琴，知道不？一般是提着拉的。也能夹在脖子里头拉。那得技术好。夹不住就掉下来了……”好像他拉过似的。

从那以后，晚上没事我就到时乐濛房子外面溜达，常为那月光流水般的琴声所陶醉。没多久我就明白了，他当时常拉的是《二月里来》《南泥湾》、《黄水谣》一类歌曲。董老师说：“他拉得最好的还是二胡，可以称得上‘圣手’了。”我不知道“圣手”的含义，以为“胜手”大概是在比赛中总得第一的手了。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听时乐濛拉提琴。

不久，我调到支队司令部当测绘员去了。随十八团（三旅八团前身）打黑山，打立顶山，打阎庄，打高茂斋。回赵堡后又去听琴，时乐濛的房门却上了锁，赵林东也不在了。一打听说时乐濛去嵩北县当县长去了，赵林东好像是跟时乐濛当通信员了。我心想，叫我跟时乐濛当通信员该多好呀！又过了两个月，日本投降了。西边下来的国民党军，顺陇海路连天连夜往东开拔。我们伊洛解放区方圆不到百里，东边是伊河，北边是洛河，西边和南边又都是搞“曲线救国”的国民党保安团的老窝子；眼皮底下就是西赵堡的土顽徐吉生。形势一天紧似一天。边沿地区的人民政权逐渐被反动武装蚕食。忽一天，我见时乐濛的房门开了。我扒着窗子一看：时乐濛回来了，他又黑又瘦像害了一场病。嵩北地区被高茂斋侵占了，他正趴在桌子上写总结。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时乐濛的琴声。不久，伊洛支队奉命放弃东赵堡，向嵩岳军区转移。

二

离开东赵堡那天，是下午三四点钟。部队从一条小路斜插西北而去。翻过几座荒岭，再向西赵堡通往韩城的大道北行。正是初秋时节，出发不久，西北半边天里呼呼的云头，奇峰怪兽般涌上中天，压了过来。不大一会儿，瓢泼大雨就下来了，且越下越大。雨声水声，闪电雷鸣，天地间浑沌一片。部队在一跳一滑地行进。赵林东和我一前一后地走。时乐濛的提琴，像宝物一样捆在背包上。他总想找样东西把琴盖住，可怎么也盖不住。那风，一会儿把草帽刮飞了，一会儿把油布掀上了天。不知他又从哪里拽出个包袱皮把琴包上。其实那一点用也没有。

宜阳、洛宁一带，是黄土高原余脉，雨天道路极其难走。行军队列里摔跤之声不绝于耳。赵林东为了护住那把琴，每次身体失去平衡，总是取“屁蹲式”或“侧卧式”，闪电中我看到他的鼻子上耳朵上都是泥。他每摔一跤，那琴就“铮铮”响一阵，在雨声、雷声和杂沓的脚步声中，显得甚不协调。

半夜时分，我们到达一个名叫和曲的小村。这小村南靠荒岭，北临洛河，河对岸就是韩城和柳泉。有个指挥员站在路边喊：“快跟上！洛河就要涨水了！”大家趑趄趑趄往河边跑，到河边就赶快结成人链徒涉。有人喊：“千万不能松手！”还有人喊：“快躲开上面漂来那树！快躲开！”我个子小，下水没走几步，呼隆一下就齐脖子了。一个浊浪卷过，我连人带背包米袋就飘了起来。只有那只土造步枪在下头坠着。洪水来得太猛又半是泥浆。我们那一串人眼看就要渡过河心了，却被一个翻滚而下的箱笼般

的东西一下子打成几截。我被身边的一位大个子死死揪住带上了岸，赵林东喊了两声就没影了。

我虽上了岸，却没了裤子，还丢失了一只鞋。这时柳泉方向响了两枪，韩城的狗叫声乱成一片。我们快速通过洛潼公路，又跑了一阵子，在一个满是石砬子的岭岗上停下来整理队伍。这时雨已经停了，月亮在破絮般的云层里出出入入，照得地上的东西朦胧可见。我解开水淋淋的背包，拿出一条裤子一双鞋穿上，忽然听到赵林东在说话。他像落汤鸡似的低着头站在时乐濛跟前。时乐濛说：“人没冲走就好！唉，琴冲走也是好事，以后就省得我行军打仗老为它操心了。”

第二年中原突围到卢氏，有一天我见到赵林东。两人重又提起过洛河的事，他仍感到对不住老首长时乐濛。“你不知道那把提琴的底细，”赵林东说，“那是他在延安鲁艺上学，从家里带去的。行军打仗，什么都轻装了，就是舍不得丢了那把琴。”还说，“对时乐濛来说，除了命，大概就是那把琴了。”赵林东说这话时，下意识地抚弄着靠在怀里的擦得锃亮的捷克式步枪，很是愧疚的样子。赵林东从1945年南下到中原突围，一直在八团当战士，而且是个出色的战士。自从卢氏见面后，就再没见到这个人，也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早就牺牲了。中原突围我们死了几千人，活下来的，又有许多同志牺牲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和朝鲜战场上。要是赵林东活着，胜利后他绝不会不去看望时乐濛的。

三

到嵩岳军区后，伊洛支队与王戴部队六支队合并。一直到桐柏山，我有小半年没有见到时乐濛。双沟战役后，有一天集合出

发，部队还没到齐，先到的部队坐在刚收割过的稻田里你吼我喊地拉歌。这时我又见到了时乐濛。他比在东赵堡时气色好多了，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他找个较高的田埂站好，对部队喊了声“咱们唱支歌好不好？”“好!!!”大家一看是时乐濛，都呼呼啦啦鼓起掌来。那掌鼓得最富煽动性、最别出心裁的，要属八团一营文化教员杨连存了。

王戴部队文化系统最受战士欢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时乐濛，另一个就是这个杨连存。杨连存河北武安人，小学文化，1938年参军，是个李有才式的人物。会说快板，才思极为敏捷，记忆力特强，现说现编，眼睛往天上翻两下，一个精彩的段子就出来了。随便拣块瓦片就是道具。部队出发前集合拉歌的时候，总是拉着拉着就拉到杨连存身上。杨连存又总是借口找不到瓦片什么的，躲在队列里不肯出来。战士们不一会儿就找来一堆瓦片、石片以及别的一些能够敲得响的东西放在他跟前。他又借口“有点感冒，嗓子不好”赖着不肯出来。而结局又总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几个相熟的老战士揪住耳朵龇牙咧嘴拽到队列前头说上一段才算了结。行军休息时，杨连存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喧腾。他是文化教员，却常见他汗流满面扛着机枪行军。我们还一起参加了中原突围。全国解放后多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听说50年代唱遍了全国的豫剧《朝阳沟》和歌剧《小二黑结婚》竟是他老兄的作品，“四人帮”倒台后那出轰动全国的《七品芝麻官》是杨连存的艺术指导。杨连存1947年春天在晋城住院时，由于马大哈护士的误写而改名杨兰春。从60年代起，杨兰春就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那天，时乐濛先领着大家唱了一支老歌，然后对大家说：“我教大伙唱一支新歌好不好？”又是齐声欢呼：“好!!!”当时部队上上下下全是年轻人，旅长政委年纪大点的也不过30左右岁，连长指导员还有十六七岁的，正是唱歌的年龄。时乐濛说：“咱

们部队现在已经是中原野战军了，我教大家唱一支《中原野战军战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喊：“好!!!”时乐濛说我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听。接着就放开他那略嫌尖细而沙哑的嗓门唱了起来：“叭叭叭（那个）咚咚咚，/你听那机枪叫得凶。/通通通，（那个）轰轰轰/手榴弹一炸一个坑。/叭咚、叭咚、叭咚、叭咚呼啦啦啦轰！/像暴雨（那个）像狂风，/像海啸（那个）像山崩。/咱们中原野战军，/抗击蒋匪爱百姓。/要是敌人敢来进攻，/就要消灭他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大家齐声叫好，而且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前面那个描摹战场音响的乐段，老是唱不整齐却又平添了战场上硝烟弥漫的艺术效果。这自然是时乐濛的早期作品，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在那艰苦、繁忙的战争年代，这支别开生面的部队歌曲，不仅娱乐了部队，还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我们一纵三旅是唱着这支歌开进大别山的。直到1947年中原军区主力改编为十二纵队重返大别山，开辟江汉解放区，原三旅八团的一些连队，晚点名时还在唱这支歌。如今这支歌早已不为人知了，但它却带着那段金色的岁月，永远留在老战士的心中。

这是我在解放战争期间最后一次见到时乐濛。

四

全国解放后，不断听到时乐濛一支支风靡全国的歌曲。如《三套黄牛一套马》、《歌唱二郎山》、《英雄战胜大渡河》、《小河淌水》、《抬头望见北斗星》，以及后来的《花溪水》、《心中的玫瑰》等。或气势磅礴，或优美动人，不仅为国内众多演出单位列为保留节目，还流传到国外。

1952年冬，上甘岭战役期间，我作为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

部队代表，到东部战线慰问朝鲜人民军部队。人民军战士自发组织的战地乐队，用自制的乐器，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给我们演出节目以示答谢。第一个节目竟是《歌唱二郎山》最后一个《英雄战胜大渡河》。那时这支歌在国内，也还流传不久。

但是这位部队音乐家，伊洛解放区嵩北县的“影子县长”，中原突围后怎么到的二野，到的大别山，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只知道中原军区时，他在一纵政治部工作；中原突围，随大部队在流水沟过了襄河，后来的情况就再也知道了。

1953年春，我从朝鲜回来，到鄂东南作巡回报告。在黄冈见到董笑干从他那里得知三旅过了襄河的部队，在武当山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周旋。武当山山大人稀，环境极为艰苦。刘昌义司令员还是那个老脾气：见敌人就眼红，“三不走。”几个月下来，亲自带着三旅七团拼掉国民党六十六师和七十五师好几个团。七团也只剩下三百来人。三旅机关被敌人打散。董笑干历尽坎坷，回到老家。国民党一天到晚抓共产党。在家呆不住，又到外面流浪。一天，在一个熟人处听说时乐濛在唐河，就赶紧找了去。心想时乐濛也许会知道部队或地下党的消息。找到时乐濛才知道他也是在武当山和部队失散的。时乐濛历尽千辛万苦化装走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祁仪镇。1945年南下时三旅在祁仪打过仗，他想沿着南下那条路线回华北解放区。身无分文，衣服也卖光了，浑身虱子，还讨过饭。后来找到一个小学，说他会修风琴。那时中原突围不久，国民党到处抓人，人家不敢用他，怕他是“化整为零”的新四军。他说他是鄂西北张自忠部队的逃兵，当过教员，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求他们讨个生活。人家看他像个读书人，才收留了他。时乐濛给那个小学修了几天风琴，管饭，给了几个钱，还送了一套旧衣服，继续往北走。但是路上盘查太紧，实在是过不去了，就又转到唐河县找他在开封师范时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在学校时因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抓捕过）。住了一阵子，

什么消息也听不到。感到老这样住着也不是个事儿，又要走。那同学不让。说：“如今已经是这个局势了，你还往哪走啊！我给你找个事干干吧。”时乐濛听说是给一个小学当音乐老师就一口回绝了。说：“那可不行。教音乐得唱国民党歌。我教不了。我宁可讨饭。”

等呀等呀等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了突然而至的陈谢大军。

五

60年代初，我又见到了时乐濛，这次是在银幕上。他在音乐史诗《东方红》担任艺术指导兼指挥。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到处一片金光闪闪。从眼神可以看出：这时的时乐濛，仍然是过去那个时乐濛——战争年代的时乐濛。

一晃又是二十几年过去了。其间还夹着那个“文化大革命”。在那场文化大劫难中，时乐濛被江青亲自点名，以莫须有的罪名蹲了七年大狱。

80年代初，湖北音乐界在汉阳龟元寺举办的“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届音乐会——“琴台音乐会”上，我又见到了时乐濛。这次是在电视屏幕上。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在众多新老音乐界人士中，把他认出的。除了那双眼睛我几乎已经不能将他辨认。这是时乐濛吗？这是那个在东赵堡为我指路的时乐濛吗？这是那个在豫南的田埂上给部队教唱《中原野战军战歌》的时乐濛吗？

一代歌人垂垂老矣！他那天籁般的歌将永远年轻；那如歌的岁月，将永远与祖国的清风明月相伴，与祖国的美好明天相随。

电键声声响到今

——忆王子贵、王占鳌同志

潘 成

尽管岁月沧桑，但是每当我听到无线电波的“嘀嘀”声时，就会想起王子贵同志，就会想起被和平的日子久已湮没了的战争岁月……

一

我最初见到王子贵，是在离少林寺不远的百里坪。我们伊洛支队与嵩岳军区会合后，我被分配到六支队管理科当见习文书。那时我参军不久，对什么都新鲜。皮带上拴着一枚太行造的圆体木柄手榴弹，这里走走，那里荡荡，不管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歪把机枪、掷弹筒，还是我们自己打凿的、尚未装药的石雷，都要站在跟前看半天。胳膊上的“八路”臂章，更是一天要端详个无数遍。

一天上午，杨指导员叫 I 跟他一起清点登封战斗缴获的固体酱油，半道他有事被人叫走了，叫我自个清点。那活挺枯燥的，

又是一个人干，越干越没意思。半截院墙那边又不断传来奇怪的嗡嗡声，我就循声走了过去。

这是河南农村常见的那种灰瓦土坯房。房内光线很暗，不大的窗眼下一张做工粗糙的桌子上，并排放着两个草绿色铁箱子，有个同志，头戴“护耳”，袖子挽得高高的，正在用三个指头揪住一个比订书机大不了多少的铁玩艺儿不停地抽动。铁箱上的小灯也随之明明灭灭，我手扶门框探身往里瞅。我发现桌子那边角落里，有张脸正友好地向我微笑，雪白的牙齿闪着亮光。他骑在条凳上，正摇着一个绞水辘轳似的东西。我听到的“嗡嗡”声正是从他那里发出来的。戴“护耳”的人，拖着长腔说了声“好——”角落里的人停止了摇动，“嗡嗡”声渐渐止息，而铁箱子里却响起秋虫般的叫声：

“嘀嘀嘀嗒嘀，嘀嗒嘀嗒嘀……”

坐在桌边的人，用铅笔急速地记着什么。铁箱子的叫声停止了，他也停了笔。这时他发现了，转过身来向我点头示意。好像在说“进来进来”。因为到嵩岳后，我见过他，就向他笑笑。正想抬脚进去，却被杨指导员从身后叫住了，把我带了回去。他批评我不该丢下工作去玩，更不该到电台看热闹。他还极其严肃而又带着几分神秘地对我说：“那是最机密的地方，能随便去的吗？”我争辩说：“我没有进去。”杨指导员说：“不叫住你，你不就进去了？”我说：“是他们叫我进去的。”杨指导员不管这些，扳着指头耐心地给我讲解机关工作的“三不”纪律。什么“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讲了还问我：“知道了吗？”

“这有什么机密啊？没事尽管来玩！”说这话的时候，部队已经南下到嵯峨山了。“我们这里只管收报发报，至于收的什么，发的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指指正拿着一个不大的硬纸夹子去找刘昌义司令员的机要科长牛寺删说：“机密在那里哪？”这时

我已经知道了，他是我们六支队的电台队长王子贵。他工作时戴的护耳叫“耳机”。那天在角落里朝我微笑的人，是摇机班长王占鳌。南下路上我们常走在一起。王占鳌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行军时背着铁圪塔似的手摇马达。他那宽阔的泛着白色汗渍的肩背部位，围着鞋底般的垫肩。他向我问这问那，还教我许多军事常识。像“三天背包两天脚”啦，“打绑腿腿肚子那里不可勒得太紧”啦，“子弹在头上‘哟儿哟儿’叫是敌人在盲目射击，要是‘哧溜哧溜’在身边乱窜可就要注意了”等等等等。

双沟战役后部队折返桐柏休整。一天我正在淮河边洗床单，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说：“小鬼会洗吗？”我回头一看是王队长，就说：“会洗。”王队长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样洗不行。要抖搂开。……这也跟打仗一样要先易后难一块一块消灭。”又说：“你这棒槌也用得不对，那样会把床单砸破的。”说着就蹲下来给我作示范。“皂角，得在石头上砸碎了再放到脏地方搓……要多叠几层……看，这泡沫不就出来了？”他熟练如农家大嫂，一大堆雪白的泡沫，顺着清澈的河水向下漂去。“怎么啦？衣服一件也不洗？”我脸上像着了火，支支吾吾地说：“衣服不脏。”他朝我领口看了一眼说：“这都快成抹布了，还不脏！”他大概是怕我这个参军不久的小战士下不来台，接着说：“没关系的，我刚参军的时候也画过地图。”我赶紧说：“从参军到现在，我就尿过这一次。”他说：“那实在是不多。来，咱拧拧吧，快！棒槌要飘走了。飘走了老乡的棒槌，可是要赔偿的啊！”

回到驻地，王子贵和王占鳌像杀猪一样把我的衣服扒了个精光，烧了半锅开水，洗了烫、烫了洗。一直到大别山，我都没有长虱子。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尿过床。

二

在中原被围的那半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电台。我特别崇拜王队长他们。他们手擦电键，就那么“哆嗦”一阵子，什么敌情动态啦，我军状况啦，请示呀，汇报呀，就准确无误地传送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领导机关或兄弟部队去了。从耳机里传来的“嘀嘀嗒嗒”声，就是那边的回答。

王子贵是个老报务员。他在我军的电台系统，有许多熟悉的战友，他能通过对方发来的声声电码，识别给他发报的是哪位同行。对那些从来不曾谋面的同行战友，他也能识别是老手还是新手，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和所有老报务员一样，有一个不受空间限制的、电波组成的神秘世界。

有一天，电台没有任务。王子贵在调试机器，中间解手去了，我偷偷地试着戴上了他的耳机。一片杂乱的，翻江倒海般的音响扑面而来。我也学着轻轻拨动旋钮，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在唱歌：“桃花红/是美人窝……”我十分惊愕，里头怎么会有人唱歌？唱完了歌，一个男人讲话：“……大别山共匪……”我像被火烫了一般赶快把耳机放在桌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凳子。

王子贵回来后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问我怎么回事，我指着机器说：“里头有人说话……”王子贵笑了：“你来。”他又把耳机给我戴上，摘下一个按在自己耳朵上，轻轻地调动旋钮。我从一片杂乱的声浪中听到一个微弱的，时有时无的，有如从银河星空飘来的声音：“……四平街保卫战的最新战况就播报到这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下面请听音乐……”我的心都颤抖了，禁不住大声喊道：“咱们的！”王子贵一手控制着旋钮，示意我不

要出声。接着里面播放的是优美动人的女声独唱歌曲：“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中间被杂乱的声浪淹没了多次，等再次调好了，歌也唱完了。随后又断断续续听到我中原军民节衣缩食，遵守停战协定的报道和大后方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新闻。后来，这声音被杂音和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大音压制再也没有出来。

王子贵见我对无线电如此痴迷，就说：“来电台学报务员吧。”我说：“中！”可是过了很久也没有消息。后来听说他跟我们科长谈过多次，科长不放。那时我已调到作战科好长时间了。他宽慰我说：“其实报务工作干久了也挺腻味的，‘龙头凤头妈妈头，十个字码写春秋’。报务员测绘员都是革命工作，好了！安心工作，反正我们同在一个司令部，没事来玩。”

三

1946年春节刚过，王子贵和我们科长张文华共同找我谈话。他们的表情欣喜、庄重、严肃、还有几分神秘。我已经知道我要入党了。他俩是介绍人。那时发展新党员是秘密进行的，党的介绍人，不仅要对发展对象十分了解，还大多是在一个战壕滚过的生死战友。

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王子贵和张文华同我的那次谈话，仍然就像是在昨天。他们先叫我谈谈对党的认识 and 入党动机。这是装在我心里很久很久，又是他们对我讲过多次的问题，所以我对答如流。张文华对我讲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还讲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那时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不仅以身作则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大都养成了随时随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习惯，一

般都能言善辩。王子贵却是个不善辞令的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主要是表现在工作上、生活上、作风上，和为人处事上。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显得格外的有分量。那天他讲的是“党的三大作风”“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说了好几遍。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亲切而又严肃的目光，审慎地凝视着我，好像在说：“你能做到吗？你能永远做到吗？”

四

我们的部队，一直在外线作战，武器装备全部来自战场缴获。缴获一部电台是很不容易的。艰苦的战争环境又很容易使机器损坏，王子贵不仅是收、发报的能手，还会修理机器。王子贵13岁参加工农红军，文化底子薄。他全是靠着忘我的钻劲和非凡的悟性，在千万次实践中，成长为中原部队优秀的无线电行家的。他还会修表。部队一有短暂的休整，他的桌子上总有各种各样待修的手表、怀表、马蹄表。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为了同志们多睡点觉，他经常包揽了与上级机关、兄弟部队的呼叫任务，长年的缺觉生活，使他养成了走路睡觉的习惯。他把“走路睡觉”、“走路撒尿（夜行军时）”和“走路喝开水（一般都是生水）”戏称为“三大技术”。夜行军撞到树上，踩进水田、跌下沟坎是常有的事。还把开花的荞麦地当成堰塘以致弄出许多笑话。

流水沟阻击战，王子贵的电台架在镇东河岸上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我们是背水作战，数倍于我之敌，从东、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对我实施压迫。战斗异常激烈。在多处阵地上，我们的战士，是用刺刀、手榴弹，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

和所有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把敌人一次次拼下去、砸下去的。

打到第二天上午，敌人又派了多架次飞机对我前沿阵地、滩头和渡船狂轰滥炸。小村被淹没在浓烟火光之中。王子贵和他的电台，是和掩护部队最后撤出村子的。他们刚撤离村子，房子就中弹起火了。

路过镇平和邓县交界处的黑龙集那天，由于尾随之敌迅速赶到，两厢又有保安团的侧击骚扰。我们更担心南阳的整十五师会抢先一步，在晁陂、曲屯一带的渐——南公路上堵截我们。所以包米糗子刚下锅，就又立即出发。忙乱中，电台不知谁打破了老乡一个和面盆。王子贵已经端着一缸子半生不熟的包米糗子走到街上，又转回住地，把一块光洋塞到老乡手里才急匆匆追赶部队。这时掩护部队已经退到村东口，机枪子弹打得头上的枝叶乱飞。

正值中伏。那天烈日当空，没有一丝儿风。气温总在40摄氏度上下。行至中午，车辙里，坑洼里，和路边毛沟里的积水都被部队喝干。各种水虫，在干涸的泥地上被烤得乱蹦。饥饿、疲倦、暴晒和脱水，使部队的体力和耐力都达到了极限，汗流尽了，往脸上一摸，全是细碎的盐粒子。大家的肩背上，原是白花花的汗渍，现在又都染了一层淡红。这时除了武器弹药和手里那根赖以节省体力的棍子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东西：背包扔了，斗笠扔了，挎包扔了，空米袋子扔了，甚至口袋里的羹匙，也成了不胜负荷的赘物。部队在快速前进。三面都是敌人，部队处于四面被围的危机之中。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这时身背马达的摇机组长王占鳌，仍在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行；不曾落下一步。他的意识却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但他知道，现在大家都一样在挺着、熬着。自己是电台身体最棒的一个，又是党小组长。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力气帮自己一把。关键是自己不能放“堆”！这背上背负的，可是我们部队的“神经”啊！作

为王子贵的亲密助手、老搭档，王占鳌以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拼着最后的生命力，在南阳平原滚烫的乡道上顽强前行。午后两点多钟，北方天际的伏牛山，已经隐约可见了，王占鳌却突然失去意识。他那阔大的脚步，开始零乱踉跄，手中的棍子也已不听使唤。见到他行为异常，王子贵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抢上去要扶住他，抓牢他，要把马达从他身上卸下来。王占鳌却脸色铁青，两腿发直，不管不顾，兀自前行，直到轰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这位太行山下来的老战士，这位钢铁般的汉子，到死也没有哼过一声。多少枪林弹雨都经见过了，万没想到他会这样走到革命的终点、生命的尽头。

五

部队进入伏牛山后，形势并未好转。这是我们不曾想到的。牲口全丢了，病号一天比一天多。国民党搞“保甲连坐”，空室清野。部队断粮断炊，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民团四山打冷枪，抓住掉队的就用石头砸死。

伏牛山人烟稀少，山路崎岖。行军时一个连展开，往往有一二里长；宿营时则要散布在方圆好几里内，有时还要隔着山岭和沟壑，所以进山后我一直没有见到王子贵和电台的人。只是听说他们有的脚烂了，有的在拉肚子。王子贵和大家轮流背发报机和王占鳌留下来的手摇马达爬山。在伏牛山深处的栾川境内，由于前面的人迷迷糊糊看错了路标，他们还差一点误入原始森林。尽管环境十分艰苦、险恶，在伏牛山的那段日子，我三旅“南路北上部队”（史书上也称“闵部”）始终保持着和军区首长、中央军委以及太岳军区的密切联系。因为有了王子贵带领的这个坚强可

靠的“神经系”，我们这支孤悬敌后的突围部队，才能在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在8月上旬，与先期突围到陕南的军区主力胜利会师。

到陕南后，我们奉命与黄霖部共同组建并开辟豫鄂陕第四军分区。王子贵任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长。1947年初，闵学圣司令员升任军区参谋长，我作为随行人员，离开了四分区。和王子贵分开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十二纵南下时随闵旅长留在华北了。

30年过去了，我从基层到机关，从部队到地方，王子贵的消息仍杳如黄鹤。当时大家都忙；又是工作，又是政治运动，难以打听到老战友的情况。

70年代末，我与一位几十年不见的老战友邂逅相遇。提王子贵，他却说：“这个同志早就没有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王子贵是在我们之后，随陈先瑞、韩东山率领的第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未果，在折返伏牛山途中，遭敌伏击牺牲的。至于详情，他也不清楚。多少年来，我曾向许多同志打听王子贵牺牲的详细情况，埋在哪里？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我也遍查了我能搜集到的中原突围回忆录，中原突围烈士名单和多种有关中原突围的战史资料，同样找不到王子贵的一点踪迹。我们中原部队的一位优秀的电台行家，我的人党介绍人就这样像夜空的流星一样，倏然消失了、殒灭了。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年他26岁。

半个世纪过去了，说起来就像是在昨天。每当我在收音机里，在梦里，听到从渺渺太空零星飘来的电键敲击声时，那个被岁月淡化了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眼前。那亲切而又严肃的目光，仍在审慎地凝视着我。好像在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远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做到了吗？”

缅怀胞姐欧阳辉

欧阳树强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一位年仅 17 岁的少女，怀着抗战救国与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湖北云梦，参加了革命。她就是我的胞姐欧阳辉。

1939 年春，姐姐从亲友家得知新四军豫鄂边区前青山培训班招收有志知识青年的消息后，她毫不犹豫地约好表妹，一同投奔到了这个学习班，踏上一个新的艰苦的人生历程。

学习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先在鄂中主持开办了一所流动性的抗日小学，之后，到桑树乡当指导员。1939 年 7 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京安县中山区妇女委员、县委妇女部副部长兼区委书记、鄂中地委组织部地方科长兼巡视团长和“组织群众大多数”试验区区委书记等职务。这期间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及对顽斗争。在一次出差中，途经云梦北乡时，被一小股游击队的人所盘问。当时正是抗日初期，在豫鄂地区有许多以抗战名义，拉起的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他们中有的是自发的抗日组织；有的是地主武装；有的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也有的是群众性自卫组织等，真可谓五花

八门。他们都是靠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南下的，经过豫鄂两省的国民党军队手中弄到武器，装备自己。姐姐从与游击队贺队长的对话交谈中，看到这支游击队势单力薄的弱点，摸准了他们想找个靠山的心理。于是，她晓以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大道理，指出分散的小股游击队危险何在，出路何在，光明的前途在哪里。结果，使这位农民出身的贺队长，大开脑筋，大受启发。在她的劝说下，这支游击队终于投奔我军，被收编为正规建制部队。

姐姐调往白兆山当区委书记兼区武装中队指导员时，一次被日伪军包围。她当即与区长、武装中队长分析敌情，她认为：只有我们最熟悉这山区的复杂地形与道路，最了解这山区的民心与民情，何况，每到一地又有应付突发情况的能力。于是，她立即做出决策，选定了突围的方向及部署。由于她沉着果断的指挥，在区中队的英勇掩护下，区委区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沿着一条偏僻崎岖的小路，安安全全地冲出了包围圈。因而，姐姐得到同志们的信赖与赞扬。

在担任槎山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政治指导员时，她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深入、泼辣，以为民忧而忧的举动得到老百姓的欢迎与好评。在“组织群众大多数”试验区工作中，由于她发动群众好，全区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及对顽斗争中，她率领区中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很有成绩，受到县委的称赞。她工作的安应县槎山区被豫鄂边区誉为“组织群众大多数”试验区的模范区之一。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姐姐分娩后，在这动荡恶劣的环境里，为了做好残酷斗争的准备，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襁褓中的小宝宝，送到贫困山区的农家寄养。当她抱着婴儿送往农家的路上，她泪湿衣襟，为了建设新中国，让所有的孩子们能过上好日子，她义无反顾地牺牲家庭利益，母子分离，只身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她前后丢下三个孩子（第三个没有过周岁

的孩子曾因受父母的牵连同奶奶一起坐牢)，至今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下落。

1946年夏，中原突围前组织决定，姐姐与爱人程超明化装经华东向东北转移，这是进入另一种特殊战场，其特殊性在于：既要斗智，又要斗勇。要想从敌人重重包围圈里溜出来，要想从国统区里穿出来，要想从道道关卡中钻出来，不知要经历多少危险。他俩经缜密分析后商定，尽可能地多从敌占大城市和中心区走。这比从较小城镇和边沿区走要安全些。他俩凭着镇静、机智与勇敢，闯过了敌特无数次检查与盘问。先去武汉，再赴南京，后到达苏北解放区，继而，辗转到东北解放区。

到达辽宁时，被分配到复县担任妇委书记。因扎根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与妇女工作有特色，受到了省委的表扬。

建国后，姐姐任江西九江地区妇委书记，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秘书长、第一副书记。任职期间她大胆负责，顽强工作，善于总结和推广群众经验，发挥各级团组织的作用好，因此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尤其是在她曾工作过的地区，人民更熟知她，敬佩她。回到她身边的一个孩子，就是地方干部从报纸上看到她的名字，帮她找到的。她的工作得到群众的称赞，领导的赏识。

1956年她调到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任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后到北京电工研究所任党总支书记、北京开关厂党委副书记。1976年，唐山地震，开关厂有一批电器设备要运往唐山，支援开滦煤矿恢复生产用。当时余震不断，她身体也不好，但她勇挑重担挺身而出，亲自率领车队护送电器设备去唐山。她平时能经常深入车间参加劳动，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听取群众意见，及时解决问题，被群众誉为“好书记”。“文革”中，当她受到批判时，许多群众为她打抱不平，有的还为她流下热泪。

十年动乱期间，她被诬陷为“走资派”，受到抄家等残酷迫

害。在寒冷的冬天让她睡在大礼堂的水泥地上，脖子上挂着几斤重的“走资派”的大牌子，低头弯腰挨批斗。但她坚持党的原则，据理斗争。她恢复工作后，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找过去批斗过她的人谈心，消除顾虑，团结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恢复生产和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1979年2月她调回全国总工会后。更加焕发出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积极主动下基层。1981年，为照顾年轻同志孩子小，家庭有困难，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亲赴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水解厂，处理液压油罐爆炸事故。她深入群众慰问受难职工家属，协助主管部门处理善后工作。继而又到丰林林业局了解工会工作情况。夜晚，她不顾体息，去看望工会主席，在家访途中，因年老体弱视力不好，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9岁。

姐姐欧阳辉，虽已仙逝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她为人师表的言行，仍在耳边回响。

姐姐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在革命高潮时，不因形势大好而飘飘然；在革命低潮中，不因环境的险恶而被吓倒、退却。当取得成就时，不自满；当遇到困难时，不低头。

处于顺境，不忘乎所以，处于逆境，不委屈、沮丧、悲观。甚至在蒙冤遭受打击时，也不动摇其顽强的革命意志。

胞姐的人格与精神力量，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它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更好地为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努力工作。

敬爱的姐姐，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 研究会五师分会(1997-2001) 名誉会长、顾问、理事、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工作机构成员名单

名誉会长：任质斌 刘少卿 刘子厚

顾 问：王定烈 王景瑞 冯仁恩 刘 放 任泉生 江勇为
 李 昌 严家安 林佳楣 胡志学 胡鹏飞 栗在山
 夏 菲 聂菊荪 曾 志 程振声 黎 光 蒲 云
 蔡斯烈 樊作楷 魏国运

理 事：马兆祥 马学林 马 焰 王之铎 王培德 冯抗胜
 冯抚平 冯高潮 任全胜 朱佳木 沈甸之 肖 健
 李振华 李紫阳 吴道英 吴世希 何界生 张育英
 周 村 周玉中 陈佑铭 陈卫平 须浩风 黄永贵
 赵小洋 郑飞迟 顾大椿 栗秀真 栗克悟 夏 夔
 原 野 晓 阳 潘友谔 樊明辅 薛国衡

会 长：顾大椿

副 会 长：栗秀真 夏 夔 肖 健 须浩风 黄永贵 潘友诤

马 焰 李振华 沈甸之 周 村 朱佳木 任全胜

秘 书 长：夏 夔(兼)

副秘书长：周玉中 王培德 原 野 吴道英 冯高潮

办公室主任：吴道英(兼)

副 主 任：原 野 (兼) 魏 群

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培德(兼)

副 主 任：张育英 谢潘成 冯抗胜

委 员：王培德 张育英 谢潘成 冯抗胜 汤正义 徐新民

刘梦松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五师分会会员照片、简历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兆祥，1918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1933年参加革命并参加长征。曾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县长、县委书记、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轻工部党委委员等职。离休前任教育部副部长。



马焰，1921年出生于河南镇平县。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前任五师十三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建国后任四十三军政治部宣传处长。1982年离休前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



王震，1919年出生于武汉市。1936年入党，武汉“一二·九”运动领袖之一。曾任湖北省委候补委员、鄂西北区党委秘书长。建国后，任北师大系总支书记、人事处长、图书馆长等职。1982年离休。



王之铎，1922年出生于湖北襄樊。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战争期间曾任宣传股长、科长、团政治副主任等职。建国后任工程兵宣传、文化、青年部长。离休前任工程兵后勤部副政委（副军职）。



王长仙，1930年出生于湖北应城。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入党。历任文工队员、文化教员、政治干事、副科长等职。1985年离休。



王石泉，1925年生于湖北黄冈县。1940年入党。曾任五师、中原军区司令部三处科员、军分区连指导员。二野二局副股长、军委二局干事、总参三部股长、科长等职，离休前任三部保卫部部长。



王世宁, 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学政治教员、北京市公安局科长、副处长、高级工程师等职。1987年离休。



王定烈, 1918年生于四川宣汉县, 1933年入伍并参加长征, 1936年入党。曾任中原军区一纵团长、江汉军区师长。离休前任空军副司令员。

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是全国人大第五、第六届代表, 党的十大代表。



王泽民, 1916年生于河南叶县, 1936年参加革命。在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河南军区、豫鄂陕军区历任编辑、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县长、团政委、支队政委等职。1961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离休前曾任中纪委“特约检查员”、中央机关纪委会常委。

1961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离休前曾任中纪委“特约检查员”、中央机关纪委会常委。



王培德, 1927年生于四川荣县, 1945年入伍, 任中原军区一纵文工团员。建国后, 任报社编辑、记者; 电视台新闻、文艺组长; 海洋局秘书处长等职。1982年任海洋出版社副社长。1987年离休。

1982年任海洋出版社副社长。1987年离休。



王景瑞, 1905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27年参加革命, 同年入党。曾任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特派员、河南确山县委书记、竹沟地委书记。建国后任二轻部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待遇。

建国后任二轻部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待遇。



牛书灏, 1921年生于河南栾川县。1939年参加革命。在竹沟教导大队、五师师部等单位任通信、作战、情报、外交参谋及副团长、代理团长等职。于空军第七师离休, 正师职。

于空军第七师离休, 正师职。



文华，1916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历任文书、秘书、译电员、股长、科长、办公室主任、处长、总后营房部顾问等职。1982年离休，副军职。



文教瑜，1935年生于湖北武汉。1945年就读于五师子弟学校，后到印刷厂工作。1956年入党。曾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员、中苑宾馆副总经理，1995年离休前任中国银行老干办正处级干部。



方历，安徽桐城人，1925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战争期间在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文工团和豫鄂边区吉河区工作。1983年离休前任北京铁三中校长、书记。



方古田，1918年生于河南唐河县。1936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中学校长、北京教育学院党委负责人及学院顾问等职。著有《汗滴禾下土》一书。



孔照年，1925年出生于山东平阳县。1940年入伍，1942年入党。战争期间任连、营长，团副参谋长。建国后历任海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职。党的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89年离休。



龙世华，1923年出生于云南建水县。1945年参加革命，在中原军区一纵文工团工作。中原突围后，到山东新华社工作。全国解放后，任新华社总社记者、编辑。1982年离休。



北沙，1919年出生于陕西镇安县。于西安一中参加西安事变，后参加红军。历任指导员，营、团、师长，军事学院歼击教授会主任。1984

年离休前任后勤学院副教育长。



冯钧，1925年生于河南信阳。1940年参加革命。历任指导员、干事、文工团员、科员、省教育厅教导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研

究员、政法学院办公室主任等职。1990年离休。



冯屏，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43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历任护士、检验士、技师、主管技师、副主任技师等职。1987年离休。



冯仁恩，1912年出生于湖北麻城。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入党。历任红四方面军供给科科长，新四军五师第二纵队四

团团长，纵队司令员，第十三旅三十八团团长。离休时为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兵团职待遇，少将军衔。



甘迈，1915年生，浙江舟山市定海县人，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共青团，1937年到延安并入党。历任五师参谋，作战科

长，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国驻外大使馆武官、政务参赞、总参二部七局政委、外事局副局长等职。1981年离休。



朱少杰，1925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县。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曾任会计、医生、主任医生等职。1983年离休。



杜威, 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1938年6月入伍。1939年入党。曾任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政治指导员, 渤海三分区宣传股长。1955年转业任昌潍百货公司人事科长。青岛市北区监委副书记, 1959年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降为烟台罐头厂副厂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 恢复原职级, 享受司局级待遇。



朱晖, 1924年生于江苏苏州, 1945年参加革命, 1948年入党。曾任江汉行署、湖北教育厅、交通厅秘书、人事科员、科长等职。1983年离休前任中央民族学院系总支书记。



朱忠革, 193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1944年就读于豫鄂边区实验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于北医大, 任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1990年离休。



仲平, 1928年出生。1940年入伍, 1942年入党。战争期间任宣传队员、文工队员。建国前后, 任区委委员、地区团委组织部长、省机关团委副书记、地区卫生局副局长等职。离休。



任宁芬, 193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39年随父到豫鄂边区, 入黄陂中学、中原民大、晋冀鲁豫北方大学学习。曾任中组部干事、北京大学总支书记、校统战部长、北京市统战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离休。



任泉生,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 1938年入党。曾任豫鄂边区地委秘书长、副专员、边区粮食总局长; 辽宁省财政、商业厅长; 东北局财政部长; 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等职。1984年离休。



华光, 1922 年出生于湖北光化县。1938 年入伍, 1939 年入党。战争期间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建国后, 任贵州省劳动局副局长、外交部驻外使馆参赞、东欧司副司长等职。1982 年离休, 正司待遇。



齐日华, 1930 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党员。1949 年参加革命。曾任恩施地委文工团导演, 1952 年任职于教育部办公厅, 处级干部。1988 年离休。



刘毓兰, 1923 年生于湖北咸宁市。1937 年参加救亡工作, 1938 年参加革命, 1939 年入党。任黄陂中心县委机关指导员。1982 年离休前任全国政协联络处处长。局级。



刘醒亚, 1929 年出生于河南西华县。1945 年参加革命。在江汉军区卫校学习后, 曾在江汉独一师、恩施军分区卫生队、广州空军医院、济南铁路中心医院工作。1985 年离休。



许力以, 1923 年生于广东遂溪县。1941 年入党, 做地下党工作。解放战争期间, 任《七七日报》、《冀鲁豫日报》记者、编辑、新华社前线记者。建国后, 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1989 年离休。



许之善, 1925 年生于河南信阳。1942 年参加五师, 1943 年入党。在纵队、军区、总参作战部、彭德怀办公室、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任秘书、参谋、研究员、秘书处长、研究处长等职。1982 年离休。



刘放, 1914 年出生于山东临清。1933 年入上海复旦大学。1934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 十五旅政治部主任兼襄南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国驻苏商务参赞、石油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离休后定为正部级。



阮浩堂，湖北黄陂人，1925年5月出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战争年代曾在武汉做地下工作，在豫鄂边区陂孝县政府工作。离休前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室主任、人事处长等职。1990年离休。



孟昭毅，1918年出生于河南舞阳县。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五师竹沟地委妇女部长、湖北黄陂县县委书记、湖北江陵中心县县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煤炭部干部司副司长、中国驻罗马尼亚参赞、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1999年中组部定为副部级医疗待遇。



汤正义，山东蓬莱人，1921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原突围时任军区司令部情报处三科书记。1982年离休，时任中直西苑机关副处长。



李垠, 1919 年出生于湖北襄樊。1930 年随母在大洪山打游击。1938 年参加战地服务团, 同年入党, 做宣教、群众等工作。突围后在阳泉报社工作。后参与编豫鄂边区战史。1982 年离休前在国家经委调研室工作。



李瑛，1924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战争期间，在冀鲁边区基、地委任工作队长、秘书等职。中原突围后，任沈阳市办公厅支部书记、中央民族大学副处长等职，1982年离休。



李静, 1927 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40 年参加革命。曾任十月剧团团员、地委巡视员、宣传干事、军大女生中队指导员、军大大队副政委、海军基地干部干事、烟台港务局科长。1983 年离休前任北京崇文区教育局副局长。



李才荣, 1943 年 3 月参加革命在新四军五师, 江汉军区, 湖北军区、总参二部等部门历任勤务员、文书、会计、参谋、副科长等职。离休前任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指挥部副参谋长。1984 年离休。



李秀亨, 1920 年出生。1938 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妇女部长、省税务局办公室主任等职。建国后, 任商业部组织处长、纪委书记、北京市二商局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83 年离休。



李宗毓, 湖北荆门市人。1944 年参加革命, 任团政治处干事。1949 年后历任湖北枝江贸易公司经理、宜昌日报指导员、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副馆长等职, 1983 年离休。



李振华, 1927 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1940 年参加革命, 1942 年入党, 历任孩子队员、文工团员、参谋、团政治处副主任、高级炮校教员、炮兵政治部科长、副部长等职。离休前任炮兵合肥学院政委。



李清福, 河南罗山县人。1942 年参加五师, 1943 年入党。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海军 701 工厂政委等职。1983 年离休, 师职待遇。



李国超, 1919年生于广东梅县。1938年入党。曾任抗大十分校文教主任, 鄂东教导团指导员, 全总保险部副部长, 绵阳地委书记、全总生活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秉范, 1915年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 1938年入党。曾在豫鄂边区任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中心县委书记、团政委等职。建国后, 任国家建材部副局长、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



李朝山, 1927年生于河南遂平县。1944年参加五师。曾任连指导员、团保卫股长。1955年后历任武汉军区八师保卫科长、农业部保卫处长、农科院政治主任等职。离休前任花卉蔬菜研究所党委书记。



李承志, 1930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市, 1947年入伍, 曾在江汉军区洪山分区政治部工作队任班长。离休前任中国科学院党委正处级调研员。中共党员。



李蒨田, 1917年出生于河北高邑县。1938年参加革命, 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司长、司长。1982年离休。



杜兰, 1928年生于湖北宜昌。中共党员。1949年参军。曾任部队文化教员、编辑、宣传干事。1954年后, 在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化部教育司等单位工作。1983年离休, 处级待遇。



严正，1926年生于江苏句容县。1939年入伍，1945年入党。曾任侦察员、管理员、干部干事等职。建国后，任北京市建筑部门公司的科长、工会主席。1986年离休前任建筑运输机械厂顾问。局级待遇。



严家安，1917年生于安徽金寨县。1928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战争年代历任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武警部队参谋长、二炮副司令员等职。1962年晋升少将军衔。



吴萍，1928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兴山县；1949年8月参加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一师，做宣传员等工作。1954年转业冶金部和部属管理单位、企业，做管理工作。1984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教育副科长等职（享受处级待遇）。1985年7月入党。



吴文凤，191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市。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军分区连长；大学科长、办公室主任、医院政委；国务院八机部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局级待遇。



吴玉阶，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1938年入党，1939年入伍。历任译电组长、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军分区副政委、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前任商业部干部学校副校长。



吴志刚，1930年生于湖北应山县，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历任报务员、译电员、政治指导员，空军师干部部助理员、邮电部纪检组处级检查员等职。1985年离休。



吴道英,1928年出生于湖北襄樊。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历任豫鄂挺进纵队宣传队员、五师译电

员、华东机要局副局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基建总处党办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时阳,1917年生于河南镇平县。1938年入党。中原突围前任豫中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1982年于商业部离休。



肖仁,1922年生于湖北武汉市。1939年参加革命。曾任宣传队员、队长、指导员、组织干事、教导员、科长、团长、县

委民运副部长等职。1986年于海军后勤秦皇岛办事处顾问岗位离休。



肖鹤,1923年出生于河南遂平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机要科组长、股长、科长、彭德怀的机要秘书等职。离

休前任处长、主任、政委等职,副军。



肖健,1923年生于河南商水县。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战争期间任教导员、县委书记、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任三十八军副

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治主任等职。1961年晋升大校军衔。1985年离休。



何冰,1922年出生于广西荔浦县。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历任一纵文工团员;宣传、群众工作员;专署秘书。建国后任湖北

省人事厅科员、广东省外办科长、驻外使馆一等秘书等职。1984年离休。



何根毅, 1928年出生于河南登封。1945年参加革命。战争时期任师政治部收发、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离休前任装甲兵军事法院副院

长、装甲兵部正师职研究员。



狄文蔚, 河南鄆陵人。1922年生; 1938年10月参加革命, 1939年入党。历任干事、股长、营政委、科长等

职。1985年离休前任解放军北京政治学院训练部顾问。



宋世荣, 1917年出生于陕西大荔。1935年参加红军, 1936年入党。历任五师机要科长、华东局机要处副处长、中央机要局处长、北京饭

店党委书记、北京服务局第一副局长等职。1983年离休。



宋锦祥, 1923年生于江苏苏州。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学教师、总务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1982年离休前任北京

79中校长。



汪诚, 192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前任五师十三旅宣传科干事。建国后任中心小学、中学党支部书记。1983

年离休前任北京海淀区学院路中共街道党委副书记。



汪钦文, 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38年参加革命, 1944年入党。历任五师卫生部门司药、医助、卫生所长、医生等职。建国后, 任铁道部总医院医生、卫生局长、铁道

医学院临床部主任、衡阳医院院长等职。1983年离休。



汪卓明, 1925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宣传干事、建筑科学研究院专职支部书记等职。1982年离休, 副局级待遇。



沈文, 1916年生于湖北浠水县。1938年入党, 做党的地下工作。后在鄂东地区专署任主任秘书、区委书记等职。建国后, 一直

在中央文教部门工作, 曾任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 时任外文出版社顾问。



沈文倩, 1922年出生于广东。1939年入党, 做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入伍, 任一纵队文工团员。建国后入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 毕业

后在北航学院、航空工业部工作至离休。高级经济师(司局级)。



沈旬之, 1920年2月出生于河南郾城县。1938年3月参加革命。中原突围时任一纵队二旅五团副团长。1983年离休前任空军

学院训练部顾问, 副军职。



苏明, 1925年生于河南偃师县。1938年入党, 1939年参军。历任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队长、华北通校训练副部长, 成都军区通信

副部长、国防大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87年离休。



张华, 1920年出生于湖北均县。1938年参加革命, 同年入党。历任党支部书记、县委妇女部长、地区党校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南海军干部部科长、广州中医学院

组织部长、湛江市财贸办主任等职。1980年离休。



张勋，1916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历任五师宣传干事、助理医生；入朝志愿军医生；驻外使馆办公室主任、三秘；总参二部油印科副指导员等职。1983年离休。



张秀华，1930年7月生于河南宜阳县，1944年参加革命。曾在伊洛解放区、中原军区工作。离休前任北京钢院医务所所长；高级医师。1992年离休。



张保三，1924年2月生于河南偃师，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政治部保卫干事，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离休前，任装甲兵技术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张育英，陕西省渭南市，1923年10月生，1943年5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教员、参谋、作战科长、建筑公司经理、中央建工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建委研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张海龙，河南确山人。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42年中原突围时任河南军区挺进二团卫生队长。1964年任国家海洋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时任海军后勤部研究员。



张海涛，1945年5月参加革命。曾在中原军区任司务主任、区委书记；中原突围后在《吉林日报》任经理部副经理、吉林书店经理。离休前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耀彩,河南正阳人,1929年1月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历任缮写员、会计、文化教员。离休前任股长、秘书



张俊才,1919年生于河南新乡。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战争期间曾任特派员、股长、科长、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任沈阳军区保卫部长、组织部长、工交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测绘总局副局长等职。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



张菊牛,1925年11月生于湖北武昌。高级工程师。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武汉化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及北京首都师大化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88年离休。



陆梅林,1923年7月生于上海,1945年7月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五师华中《新华日报》、旅大《实话报》、中宣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文化部等单位工作。离休前,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陈伟,1923年12月生于湖北均县,1939年3月入党。曾在鄂豫边区、中原军区、湖北军区、高级步校、航校、防空学校、新科院等单位历任文书、干事、政指、股长、科长、主任、副政委,离休前任新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陈觉,1928年3月生于湖北省应城县,1942年5月参加革命。历任文工队员、学员、湖北军区文工团员、政治部文艺创作员、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离休前,任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干部。



陈士俊, 1931年12月生于湖北应城县, 1945年3月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五师四十五团和豫鄂陕三分区司令部任通讯员。

1947年2月随周光策司令员被敌冲散掉队回家上学。1992年8月退休, 正处级, 高级经济师。



余显斋, 1928年7月生于湖北省大悟县, 1943年9月参加革命。历任班长、排长、连正副政指、股长、科长、县武装部副部长, 县兵役局副局长、

科研所政治部副主任、技术学校副校长等职。1988年离休前, 时任航天部二院教育中心调研员。



林英, 1925年生于湖北黄冈县。1942年参加革命, 同年入党。任区民运部长、区委书记等职。建国后, 任地质部人事司副科长, 测井处

处长。离休前任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党委组织部长。司局待遇。



陈佑铭, 湖北武昌人, 1922年生, 1938年参加“乡村抗日促进会”活动, 1940年参军, 1942年入党。战争时期历任排长, 手枪队班长, 参谋, 营长, 作战科长, 团参谋长, 指挥长, 团长。湖北省

军区独立五团团长兼“长湖剿匪指挥部”指挥长、中共长湖工委书记。离休前为海军装备部部长。



邹敏, 1923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40年参加革命, 1943年入党。曾在七七报社、江汉行署、湖北民政厅、中南财政部、中央财政部、中科院

地理所等部门工作。离休, 副局级待遇。



林扬, 1924年10月生于广东省云浮市, 1945年5月参加革命。曾任鄂豫解放区《七七日报》记者。离休前, 任中共中央

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副研究员。



林佳彬，1924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曾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退居

二线后，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儿童发展中心顾问，国家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杨阳，1927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历任宣传队员，组织干事、科长、副县长、县委书记、地级财委副主任、

广州市副区长、北京燕京饭店副经理。离休前，任北京市旅游局调研员。



杨柄，1921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1941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任地委秘书、干事。突围后从事新闻工作。

1979年到中科院，从事哲学、文艺、古典诗词等的研究。已问世的专著、编注、译文、散文等著作约五百万字。



杨平，1926年生，湖北钟祥人，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十月剧团孩子队、京钟县南山工作队队员，五师司令部三处技侦科

员。1984年离休前任北航职工二总支常务副书记。



杨火星，1926年出生于湖北。1940年入伍，同年入党。曾任宣传队员、干事、指导员、秘书、参谋。建国后，任军区干部部科长、工程兵司令

部处长、工程指挥部主任、独立师师长、二机指挥部副主任等职。离休。



杨空丽，1926年11月生于河南舞阳，1945年4月参加革命。曾在豫中军分区叶舞支队和叶舞、方泌指挥部工作。全国解放后

任中南公安干校和湖北省委党校干事，幼儿园副园长。1982年离休。



杨艾荪,1927年9月生于武汉市,1945年8月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五师文工团团员。离休前,任中国东方歌舞

团灯光设计兼舞台美术队队长。



杨敏毅,1924年12月生于河南信阳,1939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在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任排长、指导员、机要股长等职,建国后任保密室主任、处长、办公室主任、军区空军工程设计室主任。离休前任修建局副局长、顾问等职。



杨震东,1919年生于湖北荆门。1938年参加革命,入党。历任江陵独立团副政委、江南挺进支队支队长、基建工程兵

后勤副部长(副军职)。1984年离休。



吕朝清,1931年出生于湖北枣阳。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入党。曾在沙市军管会工作。建国后,在航空工业部下属工厂、北

京三环联营公司任科长、董事长等职。1988年离休。



罗群,1923年1月生于湖北广济,1942年参加革命。在豫鄂边区十月剧团、新四军五师、中原军区六团、黄冈军分区、二十步校、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历任团员、看护

长、医助、司药、干事、支部书记等职。离休前在北京卫校工作。

590



罗家育,1921年4月出生,1933年参加革命。1946年中原突围前在中原军区一纵九连任指导员。1982年,在化工部北京化

工研究院副院长岗位上离休。



罗端柔，1933年出生于广州市。1951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北京市第一棉纺织厂财务科长、审计科长、会计师等职。1987年退

休。



范兆林，1928年生于四川省罗江县，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一纵文工团员、中组部科员、吉林团校处长、政研室主任、鞍山市委档案处

处长、革命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离休前，任外交部驻外使馆秘书、办公室主任。



范惠，1912年生于河南开封市。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专署财粮科长、专员、支队供给部长、中原军区一纵一旅供给

部长。总后财务部部长、财务物资部副部长等职。



周村，1926年生于河南信阳，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历任剧团团员、政指、政教、营长、大队长、系主任、防化兵处

长、校长、副部长、国家地震局政委、总参动员部副部长、陆军指挥学院正副院长。1988年授中将军衔。



周玉中，1929年生于河南信阳，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在五师历任先锋剧团团员、宣传员、参谋、干事。中原突围后在二野司

令部任情报参谋。1950年调总参三部工作。离休前任银川警备区顾问。



周志钩，1918年生于内蒙包头。历任二旅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秘书、江汉军区一专署工商局股长、湖北人民政府工商厅合

作科副科长。离休前，在北京市政三公司工作。



武尽法, 1929年出生于河南西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事务长, 税收员。突围时做侦察和筹粮工作。1990年离休, 曾任总参二部

部长、政委。



武联合, 1932年生于河南西平县, 1945年参加新四军五师。曾任勤务员、宣传员、文工队员、文工团班长、副指导员、青年助理

员等职。离休前, 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部局局长。



易新民, 河南信阳人, 1925年2月生, 1939年3月参加革命, 1940年入党。中原突围前历任勤务员、宣传员、制图员、十四旅侦察参谋和一纵队作战参谋。离休前任总参测绘局处长、研究员。



柯长青, 辽宁铁岭人, 1931年5月生, 1949年参加革命。曾从事文艺工作, 和到前门饭店、和平宾馆、西苑饭店工作。1987年, 退休后任特约记者。1992年任《当代中国画报》记者至今。



胡冰, 1922年生于湖北汉川。1942年参加革命, 在安应、礼山等县工作。建国后, 历任北京中级法院民庭副庭长、海淀区法院副院长。1981年筹建司法局任局长。1983年离休。

592



胡含, 1924年4月生于湖南湘潭, 1941年3月参加革命。历任地方工作队队员、连队文教、豫鄂陕边区郑商县县委秘书。离休前任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胡志江,湖北武昌人,1929年生,1942年参军,1946年入党。战争期间历任班长、会计、县妇女

委员、干事、股长、协理员等职。离休前为北京飞达电子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胡志学,河南新县人,1921年10月生,1928年参加童子团,1933年参加红军。抗战时期在豫鄂边区做地方工作。离休前任

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



胡鹏飞,1915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县。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参加长征。曾任作战科长、旅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支队长、二

野副师长等职。建国后,任海军二航校校长,海军副参谋长、正兵团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须浩风,1916年生于江苏无锡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任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干部科长、蕲春县委副书记。离休前任

国家标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姜宗礼,1924年出生于河南南召。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勤务员、宣传员、译电员、机要股长、科

长、军务科长、处长等职。离休,副局级。



袁露,湖北襄阳人,1925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历任宣传员“十月剧团”演员,豫鄂边区、15旅、河南军区和

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机要员。1982年离休,时任二机部华北物资管理处处长。



袁永宝，北京人，1923年生，1940年参加“民先队”。1942年8月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从事学生运动，1945年到中原解放区，1946年入党。任刘子久秘书，一纵队司令部参谋。离休前任吉林市文联主席。



晓阳，湖北武昌人，1929年4月生，1940年8月参加革命。历任文工队员，“十月剧团”演员。1951年于空六师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基础部党委副书记、中国工运学院进修部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夏菲，1913年生于湖北武汉市。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历任地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县委书记、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组组长等职。建国后，任武汉妇联主任、北京二一八厂党委书记、市机械局副局长等职。1983年离休。



栗秀真，1915年出生于河南沁阳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医生、救护队长、医院院长、五师卫生部长。建国后，任湖北省卫生厅长、国务院卫生部司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顾问等职。



顾大椿，1915年出生于南京市。1936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战争期间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建国后，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是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和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离休。



夏夔，湖北仙桃人，1924年6月生，1940年3月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江汉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江汉支队政工科长、团政治处主任。离休前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夏应凤，河南正阳人，1925年1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历任护士、报务员。离休前任北京市交电公司保卫股长、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原野，河南信阳人，生于1922年4月，1938年5月参加革命。历任战士、文工团员、文工队长、宣传干事、文工团长等职。离休前任商业部蔬菜局科长（处级待遇）。



倪金钟，1932年出生于南京。1949年参加革命，1984年入党。历任宣教干事、青年干事、政法大学教师等职。1987年以教授职务离休。



马沂，女，1918年12月出生，河南巩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孝感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新四军五师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解放后转业到地方，担任过大连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监察处处长、电子部11所党委书记等。1983年离休。1992年病故。



徐敏，广东湛江人，生于1922年12月，1943年参加革命。曾在南方局做青年和情报工作。后任豫鄂边区《七七日报》记者，新华社中原分社记者。离休前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著有《中原东路突围记》。



栗在山，男，1916年1月出生，河南方城县人。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刘少奇秘书、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参谋处长、豫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空三军任政委，参加创建了我国导弹卫星试验发射基地（航天城），担任政治委员，1971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副政委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离休。



唐旭中, 1924年出生于湖北枣阳。1938年参加革命, 1939年入党。历任秘书、干事, 并在南京梅园新村做译电工作及在二野、西南军区总参等单位做政治工作。1987年军职离休。



萧继何, 湖北沔阳人, 1923年10月生, 1945年8月参加革命, 1956年入党。历任豫鄂边区、襄南、襄北军分区见习医生、干事。离休前任北京海军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系病毒大组副组长、病毒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常志义, 1918年出生于山西原平市。1937年入党。战争期间曾任团长、师参谋长。建国后, 任军分区司令员、十三军副军长、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长、系主任等职。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正军级。



高礼第, 河南罗山人, 生于1924年11月, 1939年参加革命, 同年入党。历任战士、正、副所长, 宣传员、测绘员、参谋、科长。离休前任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副参谋长。



戚涛, 1921年出生于河南新蔡县。1938年参加《民先》, 同年入党。曾任县委交通员、秘书、指导员、区委书记、区长、县长。建国后, 任山东省地质厅副厅长、地矿部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等职。1983年离休。



彭忠, 1925年生于湖北荆门。1940年参加革命。在豫鄂边区, 大别山区, 中央重工部钢铁局设计院、国家机关等单位历任情报员、指导员、区委书记、地委组织科长, 县委组织部、党委副书记、中校助理员、处长等职。离休前在自动化研究院工作。



谢潘成，河南伊川人。1931年1月生，1945年6月参加革命。曾在伊洛支队、中原三旅、江汉四团、湖北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任通讯员、测绘员、宣传员、正副指导员、

干事、秘书、股长等职。离休前在辽宁司法系统任纪委书记、督导员；锦州市作协理事。



荆云，1917年出生于四川平昌县。1933年参加红军并参加长征。1935年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宣传员、医院护理员、新四军四师

医院党支部书记、五师护理工作；湖北省委秘书等职。1982年离休。



解耕畴，苏州人，1921年10月生；1941年10月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战争期间在十三旅文工团和吉河区工作。中原突围后任东北铁路总局课长、沈阳铁路局军代表、中长路

局副总工程师、处长等职。离休前任铁科院通信信号研究所所长。



靳鲁雨，河南新郑人，1914年生；1942年入党。1945年到中原解放区，先后在北方大学、新华社工作。1974年离休前在天津八十六中工作。



康杰，1925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县。1941年参军，战争期间任中心县委干事、区属乡分区委书记、野战医院指导员、区长等

职。全国解放后任专署工业局局长、冶金工业科技情报图书馆馆长等职。



雷润蔷，1933年出生于湖北蕲圻县。1950年入团，1951年参军，1956年入党。1989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秘书。



谭秉武，河南西平人。1925年1月生；1945年7月入伍。历任文化教员、参谋、正副科长。离休前任总参军务部参谋、副处长、研究员。



熊大奎，1921年出生于重庆涪陵市。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宣传干事、华北军大教员、军事学院副主任教员、政治学院主任教员等职。离休前任军械学校普技系主任。

潘友诒 1921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战争期间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团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县指挥部政委、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局长、民政部副部长。



黎光，安徽霍邱人，生于1917年6月；1931年参加革命。战争时期任过师长、师政委、军政委。离休前任基建工程兵副政委（大区副职）。



薛国恒，1924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战争期间任作战科长、团参谋长、指挥长等职。建国后任二十七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



喻真，1925年生于湖北黄陂县。1942年入伍，1943年入党。曾任五师司令部报务员、报务主任。建国后，在通讯部门任训练主任、营长、科长、处长、副参谋长等职。1980年任通信第二总站副主任，1981年离休。



喻真，1925年生于湖北黄陂县。1942年入伍，1943年入党。曾任五师司令部报务员、报务主任。建国后，在通讯部门任训练主任、营长、科长、处长、副参谋长等职。1980年任通信第二总站副主任，1981年离休。



薛留柱，河南

偃师人。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华东独立师财务科见习出纳、留守处班长、家属学校分队长、川北军区见习会计、重庆市税务局托儿所所长等职。



魏国运，1914

年出生于湖北监利县。1932年参加红军并参加长征。1934年入党。曾任参谋、科长、旅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等



魏群，193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市。1945年参加革命，在鄂豫边区洪山公学高级研究班工作。离休前任总政白石桥干管处第二干休所政委。



詹希勤，1927

年出生于湖北随县。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随南宣传队员、五师司令部技侦科员。突围中任电台台长、代股



欧阳树强，1930年出生于湖北云梦县。1943年参加革命，任中原军区司令部报务员。离休前任空军第三研究所副所长，副师职。



蔡斯烈，湖

北省应城县人。191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建国前任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鄂中军分区司令员。1982年离

刘子厚，河北任县人，1909年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县、地委书记、红军师长、新四军五师游击纵队、军分区政治委员；行署副主席、主席。解放后，历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军区政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政委。离休前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陈山，男，1918年1月生于福建南安市。1943年毕业于桂林淮南俄专。1945年5月入伍，任新四军五师党报《七七日报》随军记者。解放后先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95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任副所长。

杨显东，男，1902年出生于湖北沔阳。1927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193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37年放弃高薪厚禄回国参加抗日，为新四军筹集大量经费、医药和物资。被誉为“战斗在虎穴里的洋博士”。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汤汉清，女，1916年生于湖南岳阳。1939年开始参加我党地下活动。解放后在农业部办公厅工作，与丈夫杨显东同志一起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87年在农业出版社离休，1996年逝世。

未寄照片及简历会员名单

于行前	万 青	王若松
方鹏程	朱 冰	任秀珍
刘 勤	刘岚山	江勇为
李 昌	李 野	李远东
李承志	李春声	张厥元
张锦元	赵莲英	郑非迟
荆朝阳	侯 政	段群景
袁 杰	袁一冰	聂菊荪
党彦琴	唐家栋	郭 纶
海 啸	鲁 风	程振声
傅 菱	曾 毅	解梦新
蔡 坚	樊明辅	樊作楷
樊晓歌	霍 震	

1997 年 10 月新四军研究会 五师分会成立后已故会员名单

马学林	汪乃煌	王 斌
陈彤深	严家安	邓启群
杨显东	庞 俊	牛德胜
杨明鼎	柳 钊	任质斌
刘 东	吴世希	罗朋友
何奇伟	曾 志	周全义
李树诚	程超明	姜 涛
黄永贵	杜 威	詹希勤

五师分会老战士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会员名单

万 力	于晓明	马长征	马汝爱	文跃征	文燕伟	文燕芳
方 晋	王 奕	王 柯	王启新	冯世平	冯亚平	冯西平
冯抗胜	冯抚平	冯国胜	冯高潮	北江渊	宁应平	宁苑平
左 忠	甘京丰	任 杰	任大中	任大国	任大新	任全胜
任在齐	任远征	任淑雅	刘力进	刘梦松	吕朝青	吕冀环
朱 宁	朱 岩	朱 岳	朱 勇	朱小红	朱丹妮	朱尔谨
朱平壤	朱佳木	朱绍鹏	齐海燕	何 平	何亚光	何界生
何敏之	余 力	余小苏	余高峰	余景华	吴 旭	吴 皓
吴世希	吴晓瑞	宋 强	宋方方	张 弘	张 弦	张立燕
张延凤	张成福	张新宪	李 平	李 炎	李小林	李巧燕
李念亲	李战平	李春佳	李紫阳	李舒明	李舒姪	杨元惺
杨晓星	沈洪征	沈晓明	肖 任	陈卫平	陈凯江	陈胜华
陈胜虹	陈晋南	周小平	周安泰	周雪松	庞扶民	庞迎潮
范 雪	范 斌	范小弟	范山东	范四川	金立明	姜 洪
姜 琳	娜仁花	胡 炜	胡 娥	胥晓琦	荆 歌	赵小泮
赵晓钟	党大建	凌连进	唐沙林	唐新桥	唐新渡	夏小蟾
夏晓鸥	奚 静	徐 华	徐 兵	徐 侠	徐 杰	徐 高
徐新民	栗卫东	栗克悟	栗建华	栗建国	栗建林	栗松北
顾 红	高风英	高晓耘	梁士顺	彭立华	鲁嘉微	谭 浩
谭晓晨	樊 宁					

编 后 记

为纪念新四军第五师建军 60 周年，中原突围 55 周年，使人们了解和正确认识五师暨豫鄂边区从创建到中原突围的斗争历程，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五师分会决定编辑出版在京五师战友回忆录，定名为《驰骋江淮河汉》。经过近一年的征稿、编辑，现已出版面世，这是大家热情支持，共同努力的成果。

自 2000 年 7 月 30 日发出征稿通知后，在京五师战友纷纷响应，踊跃投稿。特别是以 95 岁高龄的王景瑞同志等一批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同志，不顾年迈体衰，或认真回忆，或与人座谈，都将自己在战争岁月最难忘的事件撰写成文，实属不易，令人敬佩。我们阅读、编辑这些文稿，深受感动，心情激奋不已，仿佛又回到那抗击日伪，浴血奋战，中原突围历尽艰险的峥嵘岁月。

本书出版及经费，得到林佳楣、任泉生、李秀亨、任志强、朱忠革、中国农大东区图书馆王永进等同志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关于本书征编情况，我们还需申明：（一）从征稿到编成，共收文稿 84 篇（包括代序及专题研究），编入本书 68 篇。其余 16 篇由于来稿太迟或篇幅所限，只得割爱。谨向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二）作者文稿中的某些历史事实，事件情节，由于编

委斗争经历、历史知识和人力、财力所限，无法一一核校。文责作者自负，尚请谅解。（三）关于会员照片、简历，征稿通知发出后，又经电话催请，截至书稿编完，尚有少数会员仍未将照片、简历寄来。因时间限制，本书只好付缺。（四）我们政治、文化水平有限，讹错、疏漏之处，实所难免。恳请老战友和读者批评指正。

《驰骋江淮河汉》编委会

2001年2月15日

